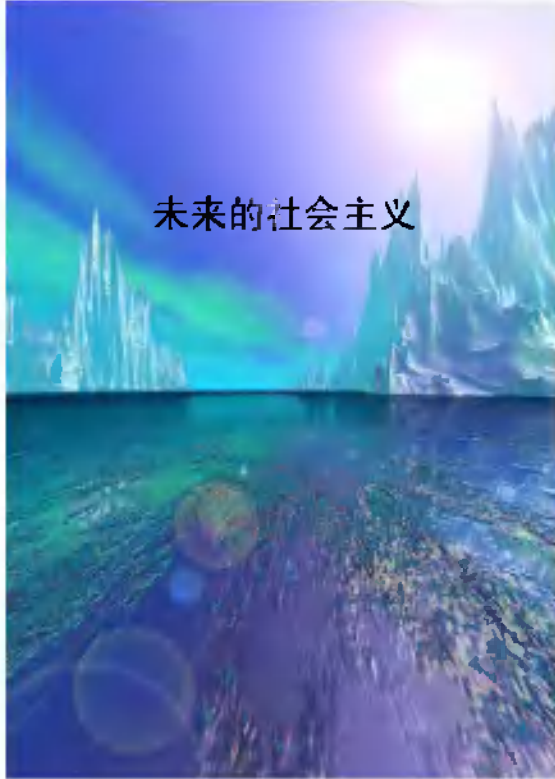


# 未来的社会主义





定价 2.060 6911 8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丛书

# 未来的社会主义

戈尔巴乔夫 勃兰赫等 著

中央编译局国际发展与合作研究所编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4年·北京

(京)新登字 305 号

Der Sozialismus der Zukunft  
Die Neue Gesellschaft/Frankfurter Heft  
Sonderheft 1 1990  
Sonderheft 2 1991.  
Verlag J. H. W. Dietz Nachf. Bon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未来的社会主义:当代世界和社会主义/(俄)艾尔巴乔夫  
(Gorbachev, M.)等著;中央编译局国际发展与合作研究所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1  
ISBN 7-80109-000-1

I. 未…

Ⅱ. ①戈… ②中…

Ⅲ. ①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世界 ②现实社会主义

Ⅳ. D038.4

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 邮政编码:100032)

北京朝阳科普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1994 年 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400 千字 印张:15.25

印数:6000--9000 册 定价:12.8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缺面破损,请寄回更换)

62539/5

## 前 言

本书是根据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刊物《新社会/法兰克福杂志》两期以未来的社会主义为主题的特刊编译而成的。这些特刊也可以说是一份国际性杂志最初两期的德文版。在1989年至1990年苏联东欧发生剧变时，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总书记阿丰索·盖拉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副主席奥斯卡·拉封丹共同建议设立一个国际论坛，供他们所理解的最广泛意义上的“欧洲左翼”就“未来的社会主义将是怎样的”这一问题进行自由的讨论。根据这一建议，西班牙的《体制》基金会在1990年春天创办了以《未来的社会主义》为名称的杂志，并打算除西班牙文版外还同时用意、英、德、法、葡等5种文字出版。与此同时，基金会还把出版这一杂志的俄文版列入它与原苏联国际工人运动研究所的合作计划。我们迄今见到的只有这两期德文版特刊和俄文版第1期。德文版两期特刊的标题是《社会主义的未来》，先后于1990年夏和1991年夏出版。俄文版第1期与德文版第1期内容相同，名称为《未来的社会主义。政治辩论杂志》，并标明“第1卷第1期，1990年”。

这两期特刊的作者的政治面貌是多种多样的。例如：

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和共产党的领导人和理论家：戈尔巴乔夫、弗罗洛夫（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真理报》前总编辑）、沙夫（波兰科学院院士）、弗兰尼茨基（南斯拉夫萨格勒布大学校长、政治学教授）。

西欧一些共产党的著名活动家：卡里略（原西班牙共产党主席、现为西班牙工人党主席）、克劳丁（曾任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后退党，已故）、纳波里塔诺（原意大利共产党议员、意大利议会外交和共同体委员会主席）、埃伦斯坦（历史学家、曾为法国共产党党员，后退党，现为《宇宙》杂志主编）。

西欧各国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勃兰特、拉封丹、盖拉、罗卡尔（法国社会党领导人之一，前政府总理）、特扎诺什（西班牙工人社会党联邦执行委员会教育书记）、埃普勒（德国社会民主党联邦执行委员会成员、基本价值委员会主席）。

左翼知识分子：米利班德（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教授，新马克思主义者）、科皮（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希默尔施特兰德（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教授）。

托派第四国际主席芒德尔（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经济学教授）。

他们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分析了苏联东欧剧变的原因和这些国家的发展前景，论述了西欧各国共产党和社会党的经验和问题，对欧洲和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的未来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其中有些观点无论从研究还是从批判的角度来看都是值得重视的。这里将它们的主要内容综合介绍如下：

这些文章发表的时间虽然有先有后，但都是在苏东剧变开始之后写的。那时候大部分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已经或即将丧失政权，苏联的混乱日益加剧，整个形势虽未最后定局，但趋向已基本明确。对于这一形势，作者们普遍采取肯定和欢迎的态度，认为这是“反独裁统治的民主革命”，或甚至是“起义”。他们普遍对这些国家的“现实社会主义”作了激烈的批评和攻击，但也有一些文章对十月革命以及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特别是早期）作了肯定的评价，甚至芒德尔也不得不承认共产主义的“局部成就”。有些作者表示希望这些国家今后的发展仍旧不要脱

离社会主义的方向。例如维尔布兰(原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和佩利康(意大利东西方研究所所长)论述了自己对这些国家发展前景的看法,后者还详细分析了1990各国选举的结果,认为左翼(主要由于分裂)失败了,但右翼并未胜利,今后最好能由一个或几个社会主义政党掌握政权。绝大多数作者认为在这些国家中应当以多元化议会制民主取代原来的制度,但也充分估计到这样做的困难。有些文章认为特别需要警惕的是,少数野心家可能利用群众在生活上的不满,煽动民族主义和民众主义情绪,夺取政权,建立新的专制统治。

在经济方面,这些文章认为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国有化、农业集体化以及否定市场机制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已彻底失败,特别是佩利卡尼(意大利《工人世界》杂志主编)的《集体主义的反经济》一文对这一问题作了详细的分析。但有的文章反对在这些国家实行全面私有化,认为建立以公有制经济为主的混合经济仍是切实可行的。不少作者认为,在这些国家取消统一的经济计划,走向市场经济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不能反过来完全迷信市场的“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米利班德认为,国家固然不能够把计划贯彻到经济活动的每一个细节,但这不等于说,民主国家不应当规定经济和社会方面的优先项目并对市场机制进行调节。国家还必须为广泛的集体服务如保健、教育、交通、生活服务设施、环境保护等承担责任,不应听任这些服务完全受市场规律支配。希默尔施特兰德在《社会主义的前途》一文中还根据瑞典的情况论述了社会民主党如何以妥协办法克服市场机制局限性的经验。勃兰特一方面认为,“对经济权力实行社会控制并不排除市场关系,而恰恰包括市场关系在内。同中央集权官僚体制曾经做到的相比,凡是有意识地不使市场摆脱责任的地方,市场都是社会对经济决策施加影响的更有效的工具”;同时又强调必须充分考虑目前各国经济高度的相互依赖性:“我们赞成经济竞争,但我们反对盲目地崇拜一般的市场,尤其反

对盲目崇拜世界市场。因为我们打算从政治上即以对公众负责的态度影响市场规律,所以必须赞成密切的国际合作。自行其是只能走进死胡同,因为民族国家的调节很容易受到国际性企业和银行的破坏。”

在从社会主义理论角度探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制度崩溃的原因时,绝大多数作者认为这是因为,苏联实行了“斯大林主义模式”并把它强行推广到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但一般并不把这简单地归咎于斯大林个人,而是认为这是由于这些国家本来并不具备建立社会主义的客观和主观条件而造成的,而且列宁也要对此负责,斯大林不过是把列宁的某些理论推向极端而已。因此,大多数作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明确表示怀疑。《新社会/法兰克福杂志》主编格罗茨在德文版特刊第1期中的社论中说,戈尔巴乔夫在为自己的改革提供论证时谴责斯大林,却仍旧坚持列宁的理论,他认为,“这是一种遭到西欧社会民主党坚决拒绝的立场”。同一期上的《纲领性声明》则进一步主张在讨论中“必须实行绝对的批评自由,而且任何人都不会处于不受怀疑的地位,这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只要能够证明他们的某些论点在与实践的冲突中是错误的或者必须转换成新的现代表述形式,对他们也不例外。”实际上,大多数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已被证明为不符合实际的,而埃伦斯坦的文章仅仅从它的题目(《马克思主义正在死亡,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社会主义万岁!》)来看就典型地说明了问题。作者在简要地回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以后说:“现在是把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全部埋葬的时候了”。当然,许多作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思想史和世界文化史中的重要地位及其某些观点的现实意义仍旧是承认的。盖拉在《新的和旧的社会主义》一文中强调应对迄今的从事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前辈”表示真诚的感谢。沙夫在主张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正时坚持认为,马克

思主义对于未来的社会主义仍旧是有效的。

芒德尔的文章与其它作者的调子不一样,这是他的托派立场决定的。他认为,社会主义危机的根源不在于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有什么重大的缺陷,而在于社会主义者的实践背离了社会主义的理论,因此,“社会主义的危机实质上是社会主义者的实践的危机”,这种实践既包括“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主义的历史性失败”,也包括“改良主义渐进论的各个变种(欧洲共产主义和第三世界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在内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失败”。他对中国的社会主义也持否定态度。芒德尔在否定了苏联、东欧、西欧和中国的所有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后认为,历史已经证明,罗莎·卢森堡关于“本世纪的基本趋势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矛盾日趋尖锐”的论断是正确的,而伯恩斯坦关于资本主义矛盾日趋缩小的论断是错误的。这是目前西欧托派常常使用的论据。芒德尔在文章中指出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一些矛盾和问题,格罗茨也承认欧洲社会党人在讨论中往往忽视了这些问题。但是芒德尔提出的解决资本主义矛盾的方案是非常脱离实际的,这就使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成了虚声恫吓。

本书的作者在探讨苏联东欧剧变的原因和影响时还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情况,这就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和理论家的反应。目前在这些国家中执政的新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政党领袖及其舆论喉舌把苏联和东欧剧变看成整个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也包括民主社会主义在内)的失败,并力图利用这一机会否定社会主义的前途和侵犯劳动人民的利益。佩利卡尼在他的文章《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中列举了从撒切尔夫人到哈耶克的一系列这样的言论,指出“保守的新自由主义者打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旗号向福利国家发动了反扑”。特扎诺什的文章《社会主义和社会进步》着重批判了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企图把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永恒化的论点。勃兰特也指出:“以强凌弱的心理



状态和早就被认为已经得到克服的曼彻斯特自由资本主义的粗野方法再次得到流行。由于受到东亚经济发展的迷惑,有些保守的“现代化者”想要竭力压缩国家的社会福利。但是,他们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撒切尔主义的努力将继续遭到民主社会主义力量的反对,而且这些反对多半会有成效”。

本书的作者们就是在上述总的背景下探讨社会主义的未来的。如上所述,有些文章在分析苏联东欧剧变时实际上已触及这个问题,而且不少人显然是站在民主社会主义立场的。勃兰特首先说:“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在斯大林之后出现的危机,证实了那些从民主社会主义角度不仅揭示了彼此之间程度上的差异,而且指出了原则对立的人们的观点。”这就是说,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的崩溃证明社会民主党和民主社会主义是正确的。克劳丁也说:“用共产主义理论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的衰亡,加上西方共产党的不可逆转的危机”已使“社会民主党成为唯一传播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重要力量。东方的那些企图保留他们的国家的社会主义前途的改革运动,都把目光转移到社会民主主义上来。同样,西方的还能起一些政治作用的少数共产党也这样做了”。戈尔巴乔夫在《未来世界与社会主义》一文中也承认,今天在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之间已不存在从前那样的鸿沟,双方尽管对基本价值的理解仍有差别,但在政治立场上和世界观立场上都接近了。

卡里略的文章也证实欧洲共产主义实际上已接受了民主社会主义。佩利卡尼在驳斥新保守主义的观点时肯定地说:“社会民主主义时代并没有结束”,同时也指出:“尽管社会民主主义的模式有其局限性和不足,但社会主义仍旧是唯一能够不用牺牲平等而获得自由的制度化的运动。虽然社会民主主义的战略肯定并没有给我们带来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它至少能够使资本主义‘文明化’,并且使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不那么残酷无情和非人道。”

尽管如此,谁也不能否认,社会民主党本身也存在许多问题,

而且有些是严重的。正如克劳丁所说：“社会民主党的阵营决不应当因为这个论断而产生胜利的感觉。它们自己在对待意识形态革新和在政治上适应以令人目眩的速度变化着的世界等方面也存在着问题。”他认为，无论是“现实社会主义”还是社会民主党都未能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的和工会的斗争促使对资本主义的弊病作出了决定性的修正，然而资本主义的基本结构并没有被取消”。希默尔施特兰德在《社会主义的前途》一文中列举了瑞典社会民主工党在执政中遇到的5个严重的挑战：1、传统的社会民主党选民的社会分裂；2、公有经济成分的效率和社会福利事业的财政支出；3、环境问题和生态运动；4、失业问题；5、资本主义的消费社会所造成的文化矛盾——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的心态与团结互助的结构改良要求之间的矛盾。另一位研究瑞典社会民主党的专家科皮在分析“瑞典模式”的经验时也指出，瑞典社会民主工党在90年代的处境“非常困难”。尽管它在30年代和50年代曾经通过采用新的政策而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但到了80年代，它已不能依靠一种新的经济思想，只能倒退到“通过提高赢利来改善私营企业的环境，同时要求工会忍受工资限制并且使工人保持平静”，而这一战略对于社会民主党政府来说是非常危险的（此文发表后不久瑞典社会民主工党就因在大选中失利下台）。

因此，本书的作者在展望和分析社会主义的未来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共产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传统对立而更加看重新时期的物质和社会条件的影响，并据此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值得思考或反思的问题。当然，他们的观点决不能完全摆脱自己的意识形态立场，有时甚至相当强烈地表现出这一立场。

在德文版第1期的《社论》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未来的社会主义是什么？人们是应该把目前的社会党所推行的现实政策称为“社会主义”呢？还是“应该根据最近几十年的模式转变而要求变更概念，实行重大的历史转折，与长期受到尊敬的象征告别呢？”同

一期的《纲领性声明》实际上已对这一问题作了初步的回答。《声明》中说,人类在20世纪末已迈入一个新的工业革命时代,这场工业革命所引起的社会生活的根本变革就其规模和速度而言可能将远远超过第一次工业革命。由技术发展而产生的结构性失业将在今后二、三十年导致资本主义社会分层结构的决定性变化:今天这样的工人阶级将逐渐减少甚至消失,资本家阶级的作用和社会地位也将改变,有可能出现一个“新的有产阶级”,他们是新的生产资料即知识和信息的所有者并且力图发展成一个“新的统治阶级”。这些情况将使人们在不远的将来不可避免地对于既作为社会制度、又作为政治运动的社会主义产生新的观点。沙夫在《当代社会主义的“空白领域”》一文中也针对不久的将来提出社会主义理论应当研究的一系列主要问题。在经济方面有:未来社会主义中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与私人所有制的关系,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集权制与分权制的关系。在社会阶级结构方面有:将会出现哪些阶级?能否有一种没有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在政治形式方面有:国家与民主,政治多元化与一党制的关系。此外还有:造就社会主义新人与“伦理社会主义”的作用等等。

上面提出的问题涉及一个根本的理论观点:谁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主体?论述这一问题的作者一般是从两个方面来考虑的。其一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将导致传统意义上的劳动的消亡以及随之而来的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的消失。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家、工程师、管理人员和自动化生产的操纵人员并不会取代工人阶级过去的位置,而是会形成一个新的“占有者阶级”,并在一定程度上变成“统治阶级”。与此同时,社会上的中产阶级将随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不断缩小而日益扩大,也就是说,社会将“中产阶级化”。这就产生了新的社会将由谁统治谁的问题。其二是:新的社会运动迫使人们对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反思。《纲领性声明》中提到了裁军与和平问题、环境保护问题、妇女问题、青年问题以及

其它许多问题。沙夫还特地提到了“一种与宗教相联系和以道德原则为基础的革命的(反资本主义的)群众运动”。拉封丹的《社会主义与新社会运动》一文专门论述了社会民主党对待新社会运动的态度和政策。他认为,民主社会主义和新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必须超出政治左派的两个社会势力的和平共处的范围,而形成一种“共生”。他说:“我只能把社会主义设想为一种‘运动’,它也从其它许多左翼运动中汲取精神的和政治的动力,但是这种动力与这类运动的短暂性相比,是由一个全面的计划武装起来的。因此社会主义运动不能当作一种时髦商品来推销,它的批判锋芒也不能被剥夺和磨光。”特礼诺什认为,社会主义的产生不是只有一个“动力因素”,产生不幸、依附关系、异化、剥削、贫困等等的原因也不是只有一个。因此,未来的社会主义必将放弃过去的“以劳动为中心的”和“经济主义的”观点,并且必将以对社会的更全面、更深刻的理解为出发点。与此相应,也必须“从唯一的革命主体的理论转向社会主义主体的多元性。”

另一个重要观点是,大多数作者把社会主义理解成一个对现存社会不断进行改良的长期运动。克劳丁说:“我认为,社会主义不过是一个在更多的自由和社会公正的意义上改变现存社会的实在的运动。理论上的思想体系可以预见这个运动的发展,并为其政治实践提供动力,却不能用来臆想出一个社会必须适应它的理想的图式。很可能以后会有那么一天,那个时代的人会约定将他们的社会与从前被称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彻底区别开来。”卡里略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差别不是“量的”而是“质的”:“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终究将是继资本主义之后的,并战胜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中间阶段,它们是取决于生产力的实际发展的。”他提出一些看法:第一,不要把还不是社会主义的东西称为社会主义;第二,必须考虑到可以从资本主义遗产中找到不少实现社会主义的工具。他说:“今天某些为资本主义机构服务

的东西也能为社会主义服务,只要用国际层次的政治行动来改变它们的实质就行”;而且“在资本主义本身中正在形成一些与其说是适应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不如说是适应社会主义世界经济所需要的工具和结构。”因此他建议“制定一个能消除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对立的改革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纲领。在这个纲领中必须预先确定要实现的目标和阐明要在国际层次采取的措施。”他还用原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奥凯托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坚强的改良主义”的纲领。他的这种意见与社会民主党是基本一致的。

上述问题在某种程度与国际工运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上关于“目的和运动”的争论有联系,而实际上有些社会党领导人在谈论社会主义的未来时更多地着眼于当前和最近将采的国际国内政策,带有相当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对于这一情况,沙夫是反对的。他一方面承认“我们不打算预见未来。因为在出现如此众多变化和未知因素的情况下,未来学无法对未来社会进行精确详细的描述”;另一方面仍强调:“人们必须有能够指出发展目标的意识形态”,并且说:“我仍旧听到有人用惋惜的口吻重复改良主义的陈旧‘经验’并固执地认为目标是微不足道的。这是不正确的!如果没有目标就无法认识为达到这一目标所要经过的整个道路。……没有明确目标的‘道路’必然要遭到失败,同样也是短命的。”当然,沙夫的这种批评意见只能说明他们彼此之间在色调上的差别,因为整个说来,本书的作者们(芒德尔除外)都是主张走改良主义道路的。”

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民主。民主是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之间长期争论的一个主要问题,也是当前欧洲和世界政治现实中的一个关心的焦点。社会民主党一直把民主理解成抽象的一般民主,认为民主既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手段,也是社会主义的目的本身。在本书中有许多作者从各个角度考察了这一问题。克劳丁认为,两次世界大战和两次大战之间时期的经验教训

已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民主的价值以及团结起来保证和捍卫民主的必要性。社会民主党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担当了先锋的角色。在它们的意识形态和实践中，表示局限性的‘资产阶级民主’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消失了，不附加任何修饰词的民主本身成为一种价值，即虽然不是社会进步唯一的前提条件，却是任何社会进步都必需的条件。”他还说，西方的共产党也同样接受这一发展的影响，“在当前，20世纪伟大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成就是民主的巩固和发展，它将影响到21世纪。”这些言论和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已没有什么区别了。卡里略则更多地从西欧国家的现状出发来考虑问题。他以法国为例，指出资产阶级政党已分裂为愿意坚持民主原则的左派和与民族阵线串通一气的右派，后者奉行那种曾使法西斯主义通过议会途径在德国和意大利夺取政权的策略，因此“人们看到，民主的未来毫无保障，它需要我们经常保持警惕并进行政治斗争”。他也进一步驳斥了那种认为在技术统治的时代没有意识形态的地位，因而左派和右派的对立已经过时的理论，认为虽然在保护自然界和反对核灾难等问题上很多思想右倾的人会赞成社会党的政策，但这不等于说已不再存在右派和左派的差别。右派的意识形态反对民主、人权和人道主义，在一些民主制相当稳固的国家中也有突出表现，甚至渗透到具有传统左派倾向的群众之中，利用民众主义为煽动手段，这就要求左派保持警惕。

沙夫在论述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关系时提出一个问题：专制与极权的上层建筑或共产法西斯主义的上层建筑是否能存在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他认为，苏联和东欧国家从经济基础即生产资料公有制来说确实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由于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具备必要的主观条件，因此上层建筑未能与基础适应，结果成为“共产法西斯主义”，而在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一观点与考茨基以来的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家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在实质上是一致的，但沙夫的一个新观点在于，他认

为在未来,随着传统社会阶级(首先是工人阶级)的逐渐消亡,有可能产生新的有产阶级(它掌握着像信息这样的生产资料),“这个由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和经理人员等等组成的新阶级有可能依靠部分官僚体制和旧的有产阶级的残余变为统治阶级,从而有产生社会斗争的危险并由此导致极权统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社会是以集体经济为基础,就有可能产生新型共产法西斯制度。”

本书作者们提出的问题还有生态问题、技术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向及其引导问题等等,这些都是目前西方国家关于社会主义和社会进步的讨论中经常涉及的,这里不打算详细介绍。但有一点需要着重提到,这就是当前日益加强的世界经济联系和相互依赖性与未来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勃兰特指出:“在历史上,我们第一次能够谈到交通、远程通讯、经济关系以及货币和资本流通的真正全球化。世界上某一地区的经济发展从未像现在这样对全球各地造成如此直接而长远的影响”,而且,“不受控制的工业主义会造成全球性破坏——尤其在环境方面”。不过他认为“当前的环境危险在许多地方已经有利于开创性的意识转变,危险是超越社会制度的。”因此他主张:“朝着全球性政策发展的长期趋向也要求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对国际主义有新的理解”,这里的核心问题就是南北关系问题。纳波里塔诺、希默尔施特兰德、卡斯特尔斯等人的文章都以许多篇幅谈到这一问题。罗卡尔和埃伦斯坦则把这一问题和当前法国社会党对欧洲共同体的政策联系起来讨论。埃普勒的《欧洲的紧密结合和世界范围的共同体》一文把欧洲共同体与南北关系结合起来分析,尖锐地指出南北关系在最近十年来比上一个十年更加“令人悲哀”,“南北之间没有作过一次真正的对话”,在国际会议上南方的要求常常遭到拒绝,北方对南方的援助是微不足道的等等。他主张“创造一个面向南方、对南方开放的欧洲”。他说:“关于只有一个地球的意识以及从而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世界政策的意识,借助生态要比通过经济能够更迅速、更彻底地

渗透到人们的心目中。欧洲可以成为这样一块大陆,使这种意识在这里,首先在政治决策中,在政治机构中,甚至在宪法中得到反映”。

上面提到的言论和观点涉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些重要问题。本书作者们的观点在许多方面是与马克思主义者不一致的,甚至是对立的,其中芒德尔否定一切的极“左”立场、沙夫关于“共产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埃伦斯坦关于“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的观点等等尤其需要加以分析和批判。但另一方面,这些文章整个说来反映了欧洲当前各社会主义流派的主要观点,具有高度的代表性,是我们在研究苏联东欧剧变后世界政治形势、特别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前景时必须了解和考虑的。因此,我们把这两期特刊编译出来,供我国从事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工作的同志及有关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参考。

本书由中央编译局国际发展与合作研究所组织译校。大部分文章是根据德文译出的,少数文章从俄文或参照俄文译出,每篇文章后都对此作了说明,殷叙彝负责统阅全部译稿并写《前言》,张世鹏负责技术规格工作。

1992年10月



# 目 录

《新社会/法兰克福杂志》特刊《未来的社会主义》	
第1期(1990年)社论	
彼得·格罗茨	(1)
纲领性声明	(4)
未来世界与社会主义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8)
民主社会主义的未来	
维利·勃兰特	(24)
旧的和新的社会主义	
阿丰索·盖拉	(39)
社会主义与新社会运动	
奥斯卡·拉封丹	(58)
当代社会主义的“空白领域”	
亚当·沙夫	(72)
共产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	
费尔南多·克劳丁	(122)
社会主义的状况和未来	
欧内斯特·芒德尔	(132)
未来的社会主义	
焦尔焦·纳波利塔诺	(172)

社会主义和社会进步	
霍赛·费利克斯·特礼诺什·····	(180)
什么样的社会主义?	
卢恰诺·保利卡尼·····	(201)
社会主义的前途——斯堪的纳维亚和非洲的展望	
乌尔夫·希默尔施特兰德·····	(207)
斯大林主义之后	
安德采伊·维尔布兰·····	(232)
《新社会/法兰克福杂志》特刊《未来的社会主义》	
第2期(1991年)社论	
彼得·格罗茨·····	(258)
当今的社会主义行动	
米歇尔·罗卡尔·····	(261)
社会主义—自由—民主	
克劳迪奥·马尔泰利·····	(273)
共产党政权将由什么来接替?	
拉尔夫·米利班德·····	(287)
未来的社会主义:改革和人道主义	
伊万·T.弗罗洛夫·····	(301)
共产法西斯主义——起源和社会职能	
亚当·沙夫·····	(307)
运动和纲领——共产主义的发展	
圣地亚哥·卡里略·····	(336)
历史的开始	
曼努埃尔·卡斯特尔斯·····	(350)
集体主义的反经济	
卢恰诺·保利卡尼·····	(370)

---

自治——持久的革命	
弗雷德腊格·弗兰尼茨基·····	(409)
欧洲的紧密结合与世界范围的共同体	
艾哈德·埃普勒·····	(422)
东欧的变化和社会主义	
吉里·佩利康·····	(431)
马克思主义正在死亡,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 社会主义万岁!	
让·埃伦斯坦·····	(442)
改良主义社会党在混合经济制度中的 战略——瑞典模式	
瓦尔特·科虎·····	(452)

## 《新社会/法兰克福杂志》特刊

### 《未来的社会主义》 第1期(1990年)社论

彼得·格罗茨

本刊坚持天主教左翼《法兰克福杂志》的传统,后者在德意志第二共和国初期曾对衰败的德国、而且也对衰落的欧洲产生过巨大的精神影响。本刊也坚持希法亭主办的杂志《社会》的传统,后者在长时期内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喉舌之一。以上传统促使我们接受阿丰索·盖拉和奥斯卡·拉封丹提出的建议,为围绕“未来的社会主义”的大争论提供一个德国论坛。1990年,本刊将以这一题目出版两期特刊。这些论文将用6种文字同时发表:西班牙文、意大利文、英文、德文、法文、葡萄牙文。用盖拉的话来说:“我们要发行的是一种真正的国际出版物,它反映社会主义的各种流派,而且是带着明确的目标问世的;我们想要建立进行对话和相互理解的坚固桥梁,并围绕未来的社会主义这一问题发起一场公开而活跃的争论。”

本期分为3个不同的组成部分:开头是由当今欧洲和国际左翼的两个伟大人物——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维利·勃兰特——撰写的两篇文章。随后,是根据3个报告——盖拉、拉封丹和亚当·沙夫——修改而成的论文。1989年9月在马德里举行的一次学者和政治领袖的国际会晤上所进行的讨论就是以这3个报告

开始的。在第3部分,发表了各抒己见的论文,它们讨论了同样的问题:我们必须怎样理解未来的社会主义?

答案是各种各样的(本编辑部不为这些答案承担责任)。这是由于我们采取这样的工作原则:作者的范围包括整个欧洲左翼——不仅有民主主义左派(他们在必要时也能够相互磋商),而且有不同类型的列宁主义者。长期目标是要制定一个纲领。本期开头的《纲领性声明》为这一纲领提供了一些初步的要素。但是,在能制定这样一种纲领之前,必须弄清一些先决问题。在这样做时不应该有前提条件,不应该害怕接触以及出于恐惧而划定界限。

这样就出现了下述情况:在本期专刊中戈尔巴乔夫论证了他的改革政策,而且表明了他虽然谴责斯大林,却愿意坚持列宁的思想。这是一种遭到西欧社会民主党坚决拒绝的立场,但后者必须认真研究这一立场。问题是这样提出的:如果戈尔巴乔夫虽然承认“现代经济如果没有市场、竞争和赢利,要正常运转是不可思议的”,但另一方面又拒绝任何一种有陷于“资本主义翻版”危险的经济政策,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

比利时的芒德尔(“第四国际”理论家)同样提出了这一问题。他不仅断言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主义已经失败,而且断言社会民主党和“改良的渐进主义”也已经失败。他的粗暴的卢森堡主义的基础是一种绝不可能不予理睬的全球观。他利用第三世界(以及工业国的某些大都市中)的苦难状况来阐明,卢森堡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冲突不断尖锐化的论断所得到的证实,远远超过伯恩斯坦关于社会国家的安抚作用的理论所得到的证实。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读到芒德尔的历史推断时(例如,指责德国社会民主党隐瞒杀害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及几千名工人的罪行),虽然会感到震惊,但这些东拼西凑的东西不能掩盖芒德尔在其分析中所指出的在欧洲的讨论中经常被忽视了的事实。当然,芒德尔提出的治疗方法在欧洲的一些大的左翼组织中很难得到支持。

未兴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换一种问法:人们是应该今后仍旧把诸如冈萨雷斯、罗卡尔、科克、弗兰尼茨基、卡尔松、或拉封丹等政治家所推行的现实政策称为“社会主义”呢,还是应该根据最近几十年的模式转变要求变更概念,实行重大的历史转折,与长期受到尊敬的象征告别呢?在今年的特刊中我们正是要阐释这些问题。第2期特刊预计于11月出版。\*

(原文为德文,陈育国译,殷叙彝校)

---

\* 第2期特刊实际上是在1991年夏季出版的。

## 纲领性声明

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工业革命的时代。这个革命所造成的经济、社会、政治及文化变革的规模和速度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引起了根本的转变。与前一个历史时期相比,这种转变可能将远远超出第一次工业革命。

这些巨大变化——它们植根于我们亲眼目睹的科学和技术革命——对于当今工人阶级和所有雇员的前途来说将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由于技术发展造成的结构性失业在今后 20 或 30 年间将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分层出现深刻变化,其结果是工人阶级的减少并逐渐发生深刻变化。人们甚至可以谈到工人阶级逐渐消失的趋势,至少就它今天存在的形式来说是如此。

为了克服不断增加的结构性失业,社会不得不采取大幅度缩短工时并随之制定保障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得到的最低收入的标准等措施,因此,资本家阶级的作用和社会地位将出现变化。有可能出现一个新的占有者阶级,它将努力使自己成为新的统治阶级。这个阶级由新的基本生产资料占有者所组成,而新的基本生产资料就是按词的准确意义来理解的知识和信息。

上述情况在不远的将来可能深刻地改变当今社会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特征。因此,必须对社会主义(作为社会制度以及为这种制度的胜利而奋斗的政治运动)的未来提出一种新的看法。

此外,还存在另一些新的要素,这些要素使社会的发展朝着与

上述相同的方向前进,并迫使我们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反思,而且就这一运动在当今世界上的各种存在形式进行反思,即日益紧迫地提出来的裁军与和平问题、环境保护问题、人口增长问题、妇女问题、青年问题以及其它许多问题。所有这些问题最终都取决于当今社会的经济、社会、及政治发展。正因如此,必须重新考虑社会主义问题即它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某种不满意的情绪四处蔓延,而且与对于为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胜利而奋斗的现存运动的这一特殊状况所进行的思考联系在一起,这是可以理解的。目前存在着使新思维难以发展的重重障碍,造成这些障碍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毫无疑问,这是一种任何无偏见的观察者都无法否认的现象。据此可得出下述结论:社会主义的未来要求我们必须结束这种停滞状态。达到这一目标的最佳方式是,人们在没有任何禁忌和没有任何“神圣化内”限制的条件下进行富有创造性的讨论。在这种讨论进程中,必须实行绝对的批评自由,而且任何人都不会处于不受怀疑的地位,这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只要能够证明他们的某些论点在与实践的冲突中是错误的或者必须转换成新的现代表述形式,对他们也不例外。这种讨论在进行过程中也必然会在教条主义者圈子内引起“震动”,因为这些人尚未最后丧失所有认识现实的能力。倡议创办这一刊物的集体正是打算通过开展一场新的辩论来达到这一目的。

建立这种集体的倡议起初是由一个团体提出的,该团体好几年来已在“体制”(SISTEMA)基金会的范围内促进对“社会主义未来”的反思。这是一个开放的和多元的群体,他们在某一时候得出结论说,应该努力使他们的思考在国际上广为传播,而且不要仅仅局限在对社会主义的一种观点上,因为这里涉及的是一种有国际范围影响的思想,它在形式和色调差异上是丰富多采的。于是就与一些人物交流各自的观点。这些人尽管受到各自的民族、文



化及政治环境的制约,但都以具有下述共同特征而知名: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对这一事业具有理论和实践方面的认识,而且明确表示愿意公开讨论社会主义的所有问题。

标准与观点的交流导致形成一个群体。属于这个群体的人物在政治观点上持这种或那种的党派立场,这涉及他们对社会主义运动、共产主义及新左派等问题的不同观点。不言而喻,存在着使我们出现分歧的东西,但一个基本的要求促使我们联合起来:按社会主义塑造社会是我们努力的目标。这个社会应该怎样,它应采取什么具体形式,这是我们给自己提出的重大问题,而且,我们并未认为自己占有唯一的神启真理,正是这一事实使我们团结成一个“集体”,尽管我们的观点不同。进行公开讨论的愿望是我们共同具有的,而且我们相信只有沿着这条道路才能获得更加深刻的认识,才能对我们所探讨的问题作出较为符合实际的回答,这一信念使我们联合起来。

关于“未来的社会主义将是怎样的?”这一重大问题,我们愿意在本期杂志中探讨它的不同方面和范围。在讨论中,一旦各个组成部分得到澄清,我们就能比较容易地尝试作出综合性表述,而且取得成果的希望也较大。

促使我们联合起来并作为集体实现这个倡议的另一个观点是,对我们将要分析的问题要素进行探讨,而且既采取文章的形式,又采取对话记录和圆桌会议的形式。这种工作方式使人们能够建设性地而且有效地反映多种不同观点和见解。我们每一次都将精心挑选论文的作者和国际会议及圆桌对话的参加者,以便展开真正“生动活泼的”科学讨论,并且保证差别很大的(包括相互对立的)观点能得到阐述。

我们将通过这种方式达成共识吗?如果想要为这个问题提供令人信服的答案,是不谨慎的,而且这并不是我们给自己确定的主要目标,我们宁愿通过专家们各抒己见来集众家之长,如果这种方

式随后可以促使对问题感兴趣的人们广泛地进行探讨,那就会富有成效地给社会主义思想以新的推动力,从而阻止某种趋于停滞的倾向。目前这种倾向到处可见,而且在国际运动的若干范围内已表现为公开危机的形式或者至少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我们的倡议能否取得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读者和我们讨论的男女参加者。如果我们能做到在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运动的广泛范围内,尤其在左翼国务活动家和政治领袖那里唤起强烈的兴趣,那么,我们就达到了我们的目的。为此我们将努力在各个国家以西欧文字而且尽可能以东方国家的文字同时出版这期刊物。我们希望苏联和中国及其它共产主义国家的思想和政治代表人物协助和参加这一讨论,从而对我们所有的人都产生有益影响。

以上是我们提出倡议的基本原则和目标。其余的一切都取决于它们怎样转化为实践。

(原文为西班牙文,陈育国转译自德文,殷叙彝校)

---

## 未来世界与社会主义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出版《未来的社会主义》杂志,这是历史急剧转折时期一项颇有意义的、必要的倡议。再也没有什么能比为社会主义思想提供新的动因、激发围绕社会主义问题进行国际辩论的企望更为紧迫的了。因此,我应约为创刊号写下本文。

对今天在欧洲和世界上发生的深刻变化,有不同的理解和阐释。右翼和保守的政治流派试图把东欧的事变说成是社会主义的破产和资本主义的胜利。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观点和理论,它们断言,似乎西方自由主义的经济和政治体制解决了或者能够解决所有问题。据说,这就是历史的顶点。

许多具有各种各样信念的人,被这些可以同过去的最大规模革命震荡相比拟的急风暴雨般进程弄得惊愕不已。现在有迷失方向的现实危险,存在着怀疑和张惶失措。正在所处的世界历史阶段的实质是什么?等待着人类的未来是什么样子?今后欧洲的关系将是什么样?问题很多……

十分自然的是,社会主义问题是世界舆论的焦点。问题在于社会主义思想的命运。我们给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在现在世界变革

---

\*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原苏共中央总书记、原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总统。

的背景下社会主义思想占有什么样的位置？它的各种方案的相互关系如何？在寻求对时代的挑战的答案中这些方案的作用如何？这同我们对未来的看法有何关系？

世界上所发生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变动的深度与速度，的确要求在各种社会主义流派代表人物的参与下对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进行新的详细研究。

当然，本文不可能最终解答，尤其是包罗万象地解答这些社会主义问题。任何人都不能垄断真理。我只能在考虑到改革的经验的情况下谈谈自己的看法。

“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在几乎 160 年前的法匡就已经出现，但社会主义的思想则要早得多了。它反映着人类生活的这样一个方面，这个方面与人们的普遍利益而不是局部利益相联系，与人们多少世纪以来所追求的社会平等和正义的艰苦努力相联系。

马克思主义使社会主义成为一种科学的理论。马克思明确地划分了社会主义与粗陋的平均共产主义的界线。众所周知的是，他对“兵营共产主义”进行了怎栏的毁灭性批判。同样众所周知的是，他认为新社会的建立是与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个性自由和民主联系在一起的。

社会主义把使人摆脱各种形式的剥削和压迫放在首位，并以创造保证使尽可能多的人自由发展的社会条件为目标，由此便产生了一个著名的公式：“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是社会主义各种解释的拥护者——社会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共产党人原则上都赞同的。

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历史地形成了两种基本立场。一种是把社会主义理解为将社会主义价值观纳入现存社会的社会改良进程：

另一种是把社会主义看成是通过辩证飞跃而代替已耗尽其历史潜能的资本主义的制度。这两种观点都渊源于马克思。这两种方法即进化的(改良的)方法和革命的方法都有自己的客观依据。

俄国 1917 年革命是法国大革命所追求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回声,同时也是实际实现这些崇高理想的大胆尝试。近代历史上的这两次革命都起到了人类进步的火车头作用。尽管在这两种情况下迈向未来的深入突破没有给人民带来作为其目标所宣布的一切,但是,自由、民主、正义的思想还是吸引了一代又一代人,得到了他们的拥护并鼓舞了其它国家的人民。

十月革命是 20 世纪世界历史上的转折性事件,它改变了世界上社会和政治力量的对比,改变了它的总面貌,为解放运动——反对殖民主义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运动提供了强有力的推动力。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为争取自身权益、为民主地改造资产阶级社会、提高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的福利水平及其社会保障而斗争的新质量,归根到底,是这场革命的间接结果。

在苏联,我们力图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历史,恢复全部真相。在改革的条件下,这样的理解是我们的切身需要。只要坚持历史主义的立场,就不能不承认:十月革命既不是错误,也不是偶然事件。它是由国家以前的整个发展准备好、并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加速实现的。二月革命既没有给人民带来和平,也没有带来土地。十月转折是不可避免的。除了十月革命,现实的选择不是像今天某些人试图要我们相信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是无政府主义的骚乱和军阀的血腥独裁。

然而“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历史是戏剧性的。它融汇着英勇精神与悲剧。为什么斯大林能够把自己的纲领和自己的方法强加给党和整个社会呢?这是评价我国历史问题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斯大林巧妙地利用了革命的急躁情绪,利用了所有群众运动固有

的空想的和平均主义的倾向，利用了先锋队希望尽快实现预期目标的意愿。对于向新社会过渡的方式和方法所作的必要探索导致了残酷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占了上风的不是列宁主义的，而是另一种与之相反的构想。我们已开始深入研究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这一工作将继续下去。

斯大林主义的扭曲导致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质被替换，导致了群众对它的理解的歪曲，导致抛弃了马克思和列宁社会主义设想中的最主要之点，即把人当作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再说一点：这种曲解不仅背离了社会主义思想，而且背离了欧洲的人道主义传统，而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种传统的土壤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主义的揭露，未能打碎行政命令体制，这种体制被保留了下来，甚至有所发展，给社会带来了极其消极的后果，使社会最终陷入了经济停滞、政治消沉和道德滑坡的境地。所谓的停滞时期，就是错过了时机的时期，而且是在世界发展的极其重要关头错过了时机。这就既给我们国家、也给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严重损害。

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也遇到了困难，尽管性质不同。在建立“社会福利国家”的同时，也伴随有引起居民不满的现象，这些现象被资产阶级政党所利用。由于新的技术革命，由于社会结构、劳动的性质、人们的生活方式及其心理、期望、需求与行为中的深刻变化而造成的问题也已产生出来。社会主义运动未能及时提出可供选择的纲领。

但是，我想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当代世界的实际情况赋予社会主义思想以新的现实意义，这就证明了社会主义思想的生命力。那些旧有的社会问题，一部分已得到解决，一部分得到缓和，而在某些地方则是激化了，又出现了新的问题。人类第一次遇到了生存问题。使调节世界矛盾的原则观点国际化，成了绝对命令。这既涉及到消灭核战争的危险问题，也涉及到其它的全球性问题——经济、

生态、信息、人口、资源和其它问题。

因此,必须根据历史经验和新的现实情况来重新思考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论证为经济必然性、论证为资本主义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已经不够了。即使在完全变化并处于“长期变化过程”(马克思)中的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的绝对命令仍在为自己开拓道路,但越来越多的其它类型的问题不能用老的方法来解决。

关于社会主义运动的主体问题,也以另一种方式提了出来。在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时代,社会主义首先是工人阶级的事情,而现代技术革命使传统的工人阶级人数减少,知识分子、其它社会阶层和集团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作用得到加强。

“社会主义”概念是作为个人主义的反题出现的,而极端形式的个人主义是资本主义在其上升时期所固有的并在意识形态上表现为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吸取了自由主义中的具有持久性的内容,并把自由的观念同社会平等和正义的原则结合起来。

当代社会主义思想(它已经和预测 21 世纪社会轮廓的社会、政治、技术和文化变动联系起来),正以新的势头强调人的个性的意义,当然,它同时也保留着对上述原则的忠诚。

## 二

我国到 1985 年时已形成的局势,要求我们对整个历程进行批判性的分析。我们向自己提出了最困难的问题,同时也力求对这些问题作出坦率和直接的回答。我们试图重新思考自己的经验、自己的历史,真正而不带幻想地理解我们这里所形成的社会,这也要求我们不带成见地评价我国在处于科技革命的强有力影响下的当今世界上的地位。我们就是这样得出改革的构想和新思维的。

我不久前发表在苏联报纸上的理论文章中,已经详细地阐述了改革的实质。因此,这里只扼要地涉及一下这个问题。

在着手改革时,首先需要“抛弃旧我”,坦率地评价言论和行动、理论和实践的相互关系。列宁晚年著作的深刻思想再一次展现在我们面前,这些著作贯穿着对社会主义命运的忧虑,力求考虑革命后的俄国及其当时的周围世界的现实,告诫党不要曲解它的使命的革命性和创造性意义,防止滥用权力和出现官僚性蜕化。

我们一步一步地意识到已经建成了什么,为什么必须对我们整个社会大厦进行根本改造。我们这里产生了有时被称作“国家社会主义”的体制。毫无疑问,这不是资本主义,但也不是那种符合我们本来原则的社会主义。

我们着手改革,是要通过它走向真正的社会主义,在这种社会主义中包含着原来就为社会主义运动其它流派所赞同的基本价值观。

随着改革过程的深化,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正在发展和丰富。“虚假的认识”正让位于对社会主义原则及其在全世界发展中作用的清晰理解。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为我们开拓了新的理智的视野。应当说,改革是一个困难的多灾多难的过程,比最初想像的还要困难。在社会复兴的道路上,每前进一步都使新的问题泛上表层。现在我国社会正在经历显然是最重要的阶段。许多事情已处于孤注一掷的境地。

改革的困难不仅仅因为这是探索和与现有观点的冲突,必然遭到那些不愿或不能改变自己观点和行为方式的人的抵制。问题还在于,已经提上日程的改革想法五花八门。除了更新社会主义的设想(这些设想也是不尽相同的),社会上还有不是同现实发展的辩证法相联系、而是同原有观念的教条相联系的思想,只是带有相反的征兆而已。更糟糕的是,还有利用在变形的社会主义条件下产生的落后观点进行投机的思想。

党以及大多数劳动人民认为改革的意图是要根本革新社会主义。关于社会保护和公正的观念,关于作为社会主义不可分割的标



记的集体主义观念，已深深地扎根于我国人民的意识之中。试图把这样或那样的抽象的乃至借用来的模式强加给社会，是违背改革的精神及其民主意旨的。

我们摒弃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所有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东西。同时，我们也在摆脱由于革命急躁情绪、由于催促和加速历史进程的意愿而引起的幻想。我们还要有理有据地思索由此而产生的世界观的和哲学的结论。但有一点是清楚的（我们的经验也在证明这一点）：社会主义不能借助于暴力来建立，强制性的“社会主义”有害于社会主义的思想，那是对社会主义的亵渎。

在改革的洪炉中，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新的现代概念正在产生。同不久以前相比，现在我们观察许多基本的社会主义问题时要广泛得多，深入得多，现实得多，理智得多。这涉及到关于所有制、关于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的作用、关于政治民主、多元主义和其它许多问题的观点。我们今天衡量正在进行的改革的方向和内容的尺度，不是它们符合这种或那种先验构想的程度，而是根据关于它们能给每个人和整个社会带来什么的现实预测。

社会主义不应当从意识形态结构，而应当从生活本身、从人民的利益中推论出来——我在党的二十七大（1986年）和自己的论改革的书（1987年）中已经谈到过这一点。顺便提一下，与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同，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恰恰是这样看待社会主义的。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应当在考虑历史经验和变化着的条件的情况下不断发展和日臻准确。而且，这里需要的不仅仅是指南针，还有路标。什么样的路标？把它们树立于何处？怎样树立？只能通过民主机制来确定。

把社会主义理解为科学，并没有使我们摆脱用人民的民主意志检查政策的必要性，应当承认：在我们的历史上，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性”的说法常被滥用。既然要使社会主义政策成为科学的政策，就应该不仅仅考虑到社会发展的法则，而且还要考虑到各个

社会阶层的具体利益,人民的意识水平,这种意识在每一阶段的心理特点。

社会主义需要科学和民主的联盟。既然科学的立场对于制定正确的政治方针来说是重要的,那么向社会主义迈进本身就只能是依靠大多数人意志的民主过程。社会主义不是上面赏赐的福利,不是愿意“普渡众生”的造物主的事务,用列宁的话说,这是群众自己的活生生的创造。

改革的意图在于,应该为这种创造提供广阔天地,应该创造现实条件和保障机制,把人作为主角吸引到改革过程中来。处于中心地位的应该是人。国家是为人民服务的,而不是相反。社会的所有机构都应为人民的利益服务。我们的政治进程就是以此为目标的。

我们坚决同过去的做法决裂。过去认为,社会主义可以根据上面的命令,根据详细描绘的计划来“建成”,这个计划则使日常的生活从属于争取“伟大目标”的斗争。建立社会主义应该是自然而然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人们自己通过宪法的民主程序作出决策并将其付诸实施。

当然,在协商和尊重所有社会集团的权益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比借助于暴力强迫人们接受兵营式生活方式要复杂得多。从行政命令形式过渡到民主形式是极其复杂的,令人痛苦的。深刻至极的冲突和矛盾,包括民族冲突和矛盾,正在暴露出来,社会紧张局势正在产生。这就是社会主义同民主脱节的必然代价。

但是,没有别的出路。应当创造政治条件,以便弄清已经积累的矛盾,通过对话寻求一致、协调利益,依靠民主的法纪和法制来解决问题。我们相信,这样的途径所导致的将不是社会的崩溃,而是导致创造新的社会——哪怕是经过危机,导致生活的健康化。这是现实的进步之路。

我们在坚持社会主义选择的同时,也要告诉我们那些对一切非同寻常的、不够划一的、没有包含在习惯的刻板公式中的东西感

到恐慌的“原班纯洁性”的捍卫者：今天在报刊上、在学术界和文学界、在艺术界的知识分子范围内、在社会组织中、最后是在党的自身中展开的辩论、争论和争鸣，并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风格练习。

这是人从不拒绝探求最佳生活方式的证明。人们始终是并将仍然是前进着的。而我们今天的探索，目的就在于找到能够赋予社会主义以人道的形式的合理方式。

改革正在使十月革命的最初目标复活——消除人同生产资料、政权和文化的疏远，改革正在使我们回到社会主义的不容歪曲的价值观上去。今天所采取的决策的总的方向，就是要在实践中消除人的隔阂。简而言之就是如此。它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概念，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观点。

现在，在苏共二十七次代表大会4年之后，已经需要另外的决策、对问题的另一种思考了。在改革范围内，加速改革，首先是经济改革的条件已经成熟。我们已通过一些基本法律——所有制法、土地法、共和国和区域自治与独立地位法、统一税制法等。关于租赁、关于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经济独立的法律和法令，作为全联盟进程中的第一次实验，已经通过。

所有这一切为包括个体经济在内的各种经济活动形式、为这些形式的竞争创造了现实条件。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正在借用资本主义的逻辑。我不怀疑，工人阶级、大多数劳动人民会支持这一点。我们想要创造的是这样一个社会，它将既不是资本主义的复本，也不是原来那种东西的翻版——哪怕是得到改善的翻版。

对于我们所追求的社会，我们还有许多未知的东西。我们确定的是总的方向。我们知道人们想要看到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的，但它会是什么样子只有时间、经验和实践才能表明。我相信一点：改革如通常所说，是“认真而长久的”。我们没有放弃社会主义道路，也没有放弃民主、社会主义与自由的联姻，这是改革的特殊标

志。

即将召开的苏共二十八大将通过近期行动纲领，制定我们党的新党纲问题正在提到实践方面来。在我们这里，围绕纲领的辩论不能不涉及苏联社会生活的基本问题和我们整个理论与政治活动原则的基础。重要的问题是深刻革新本身。

我们最老的作家、在这里被视为苏联文学经典作家的列昂尼德·列昂诺夫对我说过，我们正在进行这样的转折，作出这样的决策，它们将规定我国未来数10年、100年、200年、可能是300年的面目。我不放眼那么遥远，但想重复在斯特拉斯堡所讲过的一句话：在90年代，西方的政府、议会和人民将会同迄今已有的完全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打交道。

### 三

我已经说过，改革要求以另一种眼光来看待我们周围的世界，重新思考整个世界形势。的确，新思维最初仅仅是与我们的对外政策相联系的。然而，它现在已经成为我们这里实行改造的普遍哲学，它证明国内改革同我国对外政策的有机联系。1988年12月7日我在联合国大会所发表的演说中已经阐述了它的基本原则。

我不想在这里复述演说内容。据我所知，它引起了强烈反响，得到了广泛的讨论和解释，但是对我们立场中的主要东西的理解是正确的。这就是：现实主义，放弃刻板的模式，放弃公式主义，理解世界上的根本变化需要新的政策和全球标准，需要预见和考虑事态的现实进程及其动力。

我们的改革引起了普遍兴趣，这是理所当然的。苏联这样一个国家的革命改造不能不在国外引起高度重视，因为它对整个国际局势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世界各国的千百万人都把对更美好的未来的期望同苏联的改革联系起来。

但是,这里并非一切都是简单的。是的,人们祝愿并希望我们的改革成功,但有时又掺杂着一些自鸣得意的腔调——社会主义的反对者希图把这里所发生的事情描绘成西方的胜利。他们并不掩饰这样一种如意算盘,即苏联会由于改革而失掉自己的面目,失掉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成为一个尽管是民主的然而却是平庸的国家。

然而,这是自欺欺人的想法。我们走的是自己的路。我们这里有的是另一种根本性的进步前提。我们的国家是这样一个世界大国,当代文明发展的许多问题都取决于它。在十月革命后的70年里,苏联成了对人类历史使命承担特殊责任的国家之一。

颇有典型意义的是,军事战略因素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降低,但并没有在全世界的眼中减低苏联的国际作用,因为尽管我们存在着各种缺陷和落后现象,但你既不能挖掉国家的社会根基,也不能耗尽其政治、文化和精神的潜力,这种潜力可以通过改革获得深刻的新的生机。

在今天的世界形势下如何支配所有这一切呢?我们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了教训。我们为自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向两个制度对抗的天平增加筹码,试图通过对外政策进一步军国主义化和军备竞赛的途径来达到某种目的,这不符合社会主义,对大家、对我们自己都有害。根据新思维和正常思想对新的现实的分析,我们得出了一个简明的结论:让每个制度都来证明自己有能力为了人类而成为当代进步的因素,让差别不是成为敌对的动因,而是成为相互丰富的交流、健康的竞赛、“共同发展”与“共同创造”的动因。

我不得不谈到这一点,尤其是在1989年1月会见三边委员会代表时。当时我讲过,我们不应该再用对抗的范畴来思考,仅仅想着怎样才能给另一方带来失败。我们有着不同的社会制度,但这决不会使冲突、相互恐惧和战争成为不可避免的。我们力求在实践中用自己的政策来证明这一点。特别是,我们已经改变了对待意识形

态斗争的态度,国家不应当再充当某种宗教战争的十字军骑士了。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不同的制度,但它们都在发生变化。资本主义现在远不是从前那种资本主义了,而社会主义,正如我们现在所理解的那样,已经不再否定、不再拒绝其它社会已经做到的或者正在做出的一切,而是要掌握和利用人类的思想与实践所取得的最美好的事物。因此,无论从政治中还是意识形态中我们都要取消“敌人形象”。

但西方呢?它是否已从它一开始就对社会主义采取毫不妥协的对抗和敌视而把世界引向何方这一点中得出了结论呢?须知,在对待我们的态度方面,许多人仍然在用胜与败的范畴进行思考。这样的立场不能促进信任与合作,这难道还不清楚吗?在我看来,停止谈论“社会主义的复兴和再生”的要求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接受的——可它却提出来了,因为据说这种谈论会妨碍对我们的信任。

稍稍刹住自己的傲气,不要以为只有社会主义世界应该改变,而是承认西方世界也应该改变,这对西方来说并不过分。想靠牺牲对方来得分的奢望会使彼此受害。

我们力图通过改革,保证我们国家在当代文明的主流中、在总的文明潮流中向前发展。由于维护和平的军事因素退居次要地位,经济、政治、道义、道德和法律因素便上升到首位;我国社会就是根据这些标志进行革新、创立法制国家的。

其它社会主义力量有权指望我们进行将为社会主义提供魅力并使社会主义思想得到新的充实的那样一种改造,我们也希望如此。我们把这一点视为自己对社会主义运动和整个文明发展的贡献。我国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它会成为什么样的国家。同样,社会主义本身的今后命运也取决于它如何经受效益、民主、人道的检验。

东欧的深刻变化是不可逆转的。在苏联,人们是根据新思维的

精神、以良好的愿望并且颇有兴趣地理解这些变化的。那里正在发生的进程的向量，总的说来是要更充分地揭示社会主义的民主潜力和它吸收这个或那个国家的民族特色的能力。

我国对外部世界是开放的，为的是研究和利用他人经验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在社会民主党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中，我们看到了许多有意义的、富有启发的内容。我确信，由于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深刻变化以及社会民主党内的进程，我们正变得彼此接近起来，我们主张有意义的对话，其中包括有关社会主义、科学技术革命、生态、民主、人权问题的对话。

同社会民主党交换意见，将会为广泛地、不带成见地、大胆地看待过去、现在和未来提供推动力。

我为近年来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认真而富有内容的接触得到发展而高兴。1914年后第一次开始了新的进程。我对此表示祝贺。在当今世界所发生的变化的背景下，消除工人运动的历史性分裂具有巨大意义。

今天，在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之间，已不再存在从前使他们分裂的鸿沟。共产党人对自己的弱点、失误和错误估计进行了毫不留情的自我批判。社会主义国家的革新进程，就是要对美好的光辉的十月革命思想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共产主义运动进行重新思考和改造，以适应新的情况。

社会党国际十八大所通过的纲领性文件证明，我们有许多共同之处——无论是在对当代世界的看法上，还是在理解所有进步力量所面临的任务上。在人道的、民主的价值观的基础上，我们不仅在政治立场上而且在世界观立场上都接近了。这种接近是当代世界发展的逻辑，是世界形势乃至历史经验的要求。这种情况已经发生，这对社会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前景、对整个世界都有巨大意义。

尽管同社会民主党有着相互影响，但我们仍然忠于自己对基

本价值的理解,我们之间仍旧保持着差别。但我们认为,这些差别会激发对话,会给世界提供非常重要的、对于进入 21 世纪的预想来说是具有本质作用的思想。

#### 四

全世界社会主义力量对维护文明、对拯救这一文明使之免遭法西斯主义威胁而作出的历史贡献,是无可争议的。它们在消除“冷战”、转向实际裁军方面的作用,也在得到广泛承认。由于社会主义在对当代世界的基本趋势和绝对命令进行哲学理解方面实现了真正的突破,国际社会变得越来越习惯于照亮了通向人类历史和平时期的道路的新思维。

今天,可以肯定地说,世界已开始迈向大合作,在承认每个民族的选择权和利益平衡的基础上关系正常化。

经过新思维,我们对作为理论和社会实践的社会主义有了更广泛的理解。社会主义思想来自于许多源泉,正在以各种形式发展着。这种思想是在丰富多彩的社会经济过程和社会运动的土壤中产生的。常常是在人道主义信念的基础上或者通过对世界的艺术性理解而产生的。

这一切使人们有理由说,社会主义是一种世界进程,它不仅限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范围,我们从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看出了它的许多表现。社会主义的一些特征,诸如公有制、计划化、社会保障,在某种程度范围内已经成了先进的西方社会生活习以为常的部分。现代的民主和法制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社会主义思想和行动的成果。

生产组织形式、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不断发展的多样化,对于并不十分准确地被称为“第三世界”的广大地区来说,也是有代表性的。尽管各个地区和国家的条件有巨大差异,它们所选择的道路



不同,但都不能掩盖主要之点:占地球人口大多数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正处于世界发展的国际化和全球化进程之中。

怎样根据社会主义思想来评价这种情况呢?生活在这里也表明,经济和社会的落后性不仅没有为社会主义进程造成方便,反而在很大程度上给它造成困难。这是否意味着谁有权宣布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趋势是无效的,从而给它们的人民“关闭”(不管出于何种意愿)通往社会主义理想的道路呢?我认为,答案是清楚的。

然而,有理由认为,在这些国家里,21世纪的社会将不会是我们同时代的社会主义的或者资本主义的社会的重复或复制。毫无疑问,正是各国人民的独特贡献,将世界文明提高到崭新的水平。这就要求——今天已经在这样要求——“北—南”路线的相互关系具有另一种质量。

人类正处于转折阶段,这就要求必须改变有关进步的性质和标准的观念本身。

过去,尤其是在革命时代,进步的推动者主要是暴力——这种或那种形式的暴力,其中也包括武装暴力。

现在,暴力不能再履行这种职能。世界社会已经到了这样的临界点,即暴力等于是倒退,对文明的基础自身和生活本身造成威胁,因此,它应该让位于对话、寻求相互理解、在利益平衡和自由选择基础上的协调一致。这也是不断发展的民族形式的多样化所要求的。

从进步的内容来看,全人类的价值观、保护人权、保护自然环境使之免遭工业、技术扩张后果的危害、消除“工业主义”意识形态,正在上升到首要地位。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我们未能摆脱从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继承下来的那些观念的重负:不惜任何代价地扩大物质福利。现在我们看到:人类正在被拖入对它具有致命危险的与大自然的冲突之中,因此,我们今天要重新求教于马克思关于人和自然的相互关系的深刻思想,在这个问题上转向建设性政策,转

向国际化努力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现在常常谈到世界文明的危机,这种危机常常被理解为道德和精神的滑坡。的确,可以谈论自私自利的道德危机,这种道德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关系的绝对化、一切社会生活领域都服从于它的结果。

这就向社会主义力量提出了不轻松的问题,我们清楚地懂得,现代经济的正常职能离开市场、竞争和利润是不可思议的,但怎样把这一点同人道主义价值观、同迈向更高级的人的共同体形式结合起来呢?怎样使市场关系摆脱那些导致社会非人道化和个人道德堕落的消极后果呢?

世界的道德形式的另一个令人忧虑的方面是,人难以适应不断提高的技术和社会变化的速度。在许多人、特别是青年人那里,产生了茫然失措感和疏远感。在这样的土壤上,嗜毒、恐怖主义、其它各种反社会行为的形式都在发展。

深入地重新思考人对待自然界,对待其它人、对待自己的态度,成了人类生存及其进步的必要条件。为此需要有意识地进行真正的革命,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形成新的世界政治。

所有这一切,指的就是要思考社会主义在 21 世纪前夕的作用和地位。社会主义选择的意义首先在于,它把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观推到首位。在这方面,我们不是在构筑幻想。社会主义并不消除矛盾和利益冲突,不许诺完全的和谐。但是,它有助于使人们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在各个社会中,还是在世界社会中——变得更加文明,更加人道和公正,更符合人类存在的最高意义——一个人在自由社会中的自由发展。

(原文为俄文,戴逢斌译)

# 民主社会主义的未来

维利·勃兰特\*

尽管世界、特别是欧洲的迄今受共产党统治的部分在向本世纪最后 10 年过渡时遭受了巨大震动,但是谁也不会怀疑,民主社会主义在这期间在理论和政治实践方面已经度过了一段意义重大的历史时期!恰恰在 80 年代末,欧洲的各个社会主义政党——在中欧和斯堪的那维亚国家我们习惯地称之为社会民主党——得以回顾了 100 年或甚至 125 年以来它们在争取政治自由和社会解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1989 年夏季,社会党国际也纪念了 100 年前它在巴黎的成立。

在以往的道路,不仅有成就和不可抹煞的贡献,而且有悲剧性的错误估计和大伤元气的分裂。例如,法西斯主义的危险(以及掠夺性战争的危险)在许多地方没有得到足够严肃认真的对待。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如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那样,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或者说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在许多国家的重建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这些政党和运动的国际联合得到了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得多,其范围也远远超出欧洲。

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在斯大林时期之后出现的危机,证实了那

---

\* 维利·勃兰特:曾任联邦德国总理、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和名誉主席、社会党国际主席。1992 年逝世。

些从民主社会主义的角度不仅揭示了彼此之间程度上的差异而且指出了原则对立的人们的观点。在这期间,甚至在那些妄以为自己非常优越的人们的领导集团中也可以看到向“改良主义”立场的接近。党的名称也改变了,当然在这样做时,内容仍旧比招牌更为重要。

尽管如此,关于民主社会主义未来的问题仍旧被重新提了出来。一位颇富声望的自由派人士认为,宣布社会民主主义世纪终结的时刻已经到来——它的使命(在工业国家中)随着民主制和社会福利国家的建立已经完成了。苏联共产主义的世界末日、人类自我毁灭的生态危险以及第三世界广大地区不断增长的苦难,使得一些献身于为社会主义未来工作的人们产生了严重的怀疑。在 100 多年前预言将要治愈各种严重社会灾难的思想,在不少人看来已经过时。

显而易见,新的挑战要求新的回答。经过 10 年的自我批评式的讨论和建设性的工作,在一系列国家至少产生了重要的中期答案。这样,在经过较长时间准备之后,1989 年 6 月社会党国际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的原则声明,它为所有深思探索的人们提供了关于建立一个和平、公正、民主、以及自然界基础不受损害的世界的现实理想。当然,这种讨论将继续进行。但是,民主社会主义者通过新的原则声明宣布了它有权利在塑造 21 世纪的过程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社会党国际制定新原则声明的同时,国际的许多成员党也围绕各自的新基本纲领展开了彻底的讨论。无论前提条件和新政策道路方面已经以及将要出现什么变化,基本坐标系仍将继续有效。民主社会主义将在无条件尊重人权的基础上,在法制国家不可侵犯的基础上实现社会正义和社会的全面民主化以及一种高效率经济体制的民主化。它为自由的人和平等的人的社会而努力奋斗。

民主社会主义者是通过各种不同途径而确定基本价值的定义

的。这些价值产生于工人运动的经验、民族解放运动、相互帮助的文化传统、以及世界上许多地区的共同团结。此外,这些价值还受到多种宗教的和人道主义的传统的促进。尽管存在着文化差别和世界观差异,但建立和平与民主的世界社会这一理想使社会主义者团结起来,这种理想将自由、公正与团结互助结合在一起。

### 新的进步观

在一个自然界的毁坏和资源的滥用日益严重、技术飞速发展、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军火储备愈来愈威胁生存的世界中,进步能预示什么呢?自从进入近代以来,历史过程总是在不断进步——这是一种整整一个世纪内始终没有受到怀疑的确定性。民主社会主义者与自由派长期相信这种确定性,在一定时期内“现代”保守派也相信这种确定性,当然,有不少信奉共产主义的人们也是如此。

法国革命时期,进步理论的权威哲学家孔多塞在 1789 年后不久预言:历史的运动是一个向愈来愈自由、幸福,和谐、富裕发展的必然过程,是一个向人类将最终获取征服桀骜不驯的自然界的能力的必然发展过程。自从基本政治派别组成政党以来,在这种信念方面人们持一致观点,但从未就这种一致进行过系统讨论。当然,在这一并非无关宏旨的问题上也有争议,即怎样最有效地加速这种进步,怎样最公正地利用这种进步。历史上争论的主要题目是:民主原则对社会的影响范围,对公正的要求在分配和参与中所起的作用,以及真正的自由需要什么样的现实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前提。

在与其它政治力量进行这一争论时,民主社会主义可以举出给人深刻印象的成果,尽管这些成果还大大落后于人们当初的希望。朝着更为民主、更多的社会保障和更为自由这个方向的进步,在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力量强大的国家中是不容否认的现实。

但是,传统的“进步”所包含的内容的可能性、可望性和前提条件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且本身已成为政治争论的题目。技术、经济、社会政策等领域的进步愈来愈经常地不仅陷入相互竞争,甚至陷入了相互对立的境地。虽然,崭新的技术发展就其本身来说总是被当作进步,但是,对于一个有生存能力的自然界的发展来说,对于有保障的社会生活来说,对于个人和集体自由的机会来说,它们却经常被证明是风险。

这就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在提到进步时我们的意思什么。我们不应该听任一些人用这一概念来粉饰一种与自由和社会保障没有足够紧密关系的政策。但是,如果仅仅毫不变通地坚持100多年以来根据这一原则所理解和维护的东西,也不会使我们更接近这一目标。相反,我们必须将激情而不是灰烬作为民主社会主义的传统而保存下来——正如让·饶勒斯在上世纪和本世纪之交时所表述的那样。这就是说,要敢于进行彻底的重新思考,以便指出,哪些理想还保持它们的效用,以及为了能达到目的,必须在哪些地方改变方针。

### 新技术带来的挑战

人类在自己历史上第一次借助史无前例的技术而掌握了对人类生存及其自然基础造成致命威胁的能力。责任感要求我们重新检验在行为方面必须改变什么,以便使我们自己和后代的机会得到保障,而且不致掉以轻心地失去自主的生活。

愈来愈可怕的具有大规模杀伤力的化学、生物及核武器系统的存在,已经成为对地球上所有人生命的现实威胁,这些武器的潜在影响无法估量。这些武器系统由于其技术特征包含着违背人们的意愿而被使用的危险,因为它们的信息系统都是自动化的。而且它们还包含着出于似乎理性的功利计算而被使用的危险,因为它

们击中目标的准确性使得通过突然袭击万无一失地打败敌人似乎成为可能。

尽管核大国之间的关系——以及东西方的一般关系——表现出令人欣慰的缓和,但下述事实仍然存在:军火生产由于大规模地滥用那些本来为保障生命所迫切需要的资源,不断威胁着世界大部分地区的生命和人的尊严。应当通过一种现实而坚持不懈的维护和平的政策来排除上述危险。民主社会主义作为国际主义的历史运动,在全世界范围推行共同安全的政策。我们坚决主张,通过日益加强的国际合作与联合来保障和平。

然而,人类在自己的历史上还第一次拥有了这样一些文明技术,它们使人类有能力持久地损害、甚至无可挽回地摧毁生命的自然基础。违背自然界循环规律的负荷——这种负荷是我们用科学技术文明的产物强加给空气、水和土壤的——使得自然环境的再生能力出现了问题。自从 19 世纪科学技术革命以来,在我们的技术所能做到的与关于我们从此在自然界中所造成的后果的认识之间所存在的矛盾,不断地变得愈来愈尖锐。现在的问题归根到底取决于使控制自然界的科学技术方法与我们对后代的责任协调一致。

然而,抛弃技术进步不会使我们接近上述目标,因为这只能造成一种糟糕的状况。我们所需要的是在许多方面更加明智的、更加有利于生态的行为和产品。未来时代的民主社会主义必须是一种深刻的、全世界协调一致的、持久发展的代言人。

当讨论涉及民主社会主义基本观点的时候,人的尊严、个人不受他人支配的独立性、个人维护自己个性的权利和自我决定的权利愈来愈多地被提到。不受约束的技术——它使得人的存在能从技术上受到控制——剥夺了人类尊严的基础。基因遗传技术的危险也许是说明高度现代技术如何获得政治性质的最令人震惊的例证。原子能、新的通讯技术或新的生产系统同样如此。由于存在着所有人都会遇到的危险,因此对各种替代方案的抉择也必然变成

确定政治意愿的问题。

因此，未来的一个中心政治任务应该是发展有利于用民主方式塑造技术的目标和行动。在这一过程中问题绝不是在于阻止进步所允诺的东西得到实现，不如说是在于，不能仅仅在实验室和董事会会议中决定未来的工作环境和生存环境。

### 世界经济的挑战

在历史上，我们第一次能够谈到交通、远程通讯、经济关系以及货币和资本流动的真正全球化。世界上某一地区的经济发展从未象现在这样对全球各地造成如此直接而长远的影响。

这样，被金融中心抬高的利率加剧了债务危机。可怕的债务负担和资本外逃造成发展的障碍，而且出现了严重的社会、生态及政治后果：愈来愈多的人们被迫陷入非正规部门的贫困经济之中，贫穷和苦难加速了对自然界的掠夺。而且，日益增长的社会紧张状况威胁着通常是刚刚争得的民主制度。

同时，在世界市场上，为取得竞争优势继续进行着残酷的斗争。贫穷国家无法匹敌，而且显然在毫无希望地倒退——正如许多非洲国家出现的情况那样。所有地区都在期望着结构适应，这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仅仅意味着向低水平适应。在西欧工业国家，结构变革的代价是由流动性和灵活性而产生的新要求所造成的众多人口长期失业和社会紧张状况。以强凌弱的心理状态和早就被认为已经得到克服的曼彻斯特自由资本主义的粗野方法再次得到流行。由于受到东亚经济发展的迷惑，有些保守的“现代化者”想要极力压缩国家的社会福利，但是，他们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撒切尔主义的努力将继续遭到民主社会主义力量的反对，而且这些反对多半会有成效。

必须看到，那些基本上在反对资本主义弊病的斗争中形成的



政治的(以及工会的)组织更多地注意资本收益的分配,而不是注意这些收益是怎样产生的。关于从经济政策角度看来需要(或必需)什么的争论一定会发生。此外,还要加上苏联及其前沿国家中实行的被称为社会主义的国家经济已发生濒临崩溃危险的经验。在这一过程中也进一步看清楚下述事实:民主社会主义与专制的集体主义不仅在一些具体方面上,而且在总体上和基本原则上存在着差异。

我们赞成经济竞争,但我们反对盲目崇拜一般的市场,尤其反对盲目崇拜世界市场。因为我们打算从政治上即以对公众负责的态度影响市场规律,所以我们必须赞成密切的国际合作。自行其是只能走进死胡同,因为民族国家的调节很容易受到国际性企业和银行的破坏。

欧洲共同体在社会和生态方面也得到加强了,这种地区性全面合作方案是完全可以当作楷模来推荐的。应当通过跨地区协议来防止区域化所导致的讨厌的封锁和保护主义壁垒战。

此外,谁还会怀疑,不受控制的工业主义已造成全球性破坏——尤其在环境方面!然而,当前的环境危险在许多地方已经有利于开创性的意识转变。危险是超越社会制度的,切尔诺贝利的放射线尘雾尤其表明了这一点。工业国对资源的滥用招致全球性的环境灾难,我们至迟在发现不断扩大的臭氧洞之后已经知道了这一点。人们还逐渐理解,全球性环境破坏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不发展状况的存在而正在加速。布伦特兰委员会向联合国提交的报告特别提醒人们注意这种全球性关系。在斯德哥尔摩,社会党国际据此提出了生态安全的战略。

如具“从全球的角度考虑问题,在局部理智地处理问题”,就可以取得许多成果。工业社会拥有改造生态的财政力量和技术可能性。充分地动员政治意志以约束只顾眼前的经济利益,应该是可行的。然而,全球环境问题不可能仅仅通过东西方的工业国消除它们

本国制造的危险就得以解决。这需要全球性行动。

谁知道日常生活的贫困迫使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对自然界进行掠夺性开采,谁就必须努力促使符合人的尊严的,有利于生态的发展在南半球成为可能。仅仅悲叹不毛之地的扩大和关注热带雨林的减少对气候的恶劣影响是不够的。凡是想要拯救环境的人,都必须乐于在全世界范围改变发展战略。在这方面,尤其对民主社会主义者提出了要求。

### 塑造未来

新的危险也为合作、力量的聚合,以及清除压迫、排他和极端不平等现象提供了史无前例的机会。

未来的民主社会主义必须利用这些机会。朝着全球性政策发展的长期趋向也要求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对国际主义有新的理解。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反对外国干预,而主张自己负责和参与决定——在国际合作领域中也是如此。因此,对社会党国际来说,各成员党完全的独立自主性始终是一个不受支配的最高准则。现在也必须如此。

我们仍旧必须努力加强合作,因为未来的不断增多的与大家有关共同问题要求在政治方面作出协调一致的反应。形成共识不总是轻而易举的——甚至在欧洲议会中的社会党党团这样的领导机构中都不是轻而易举的。然而,如果自觉地约束特殊利益,那么我们就能在国际上取得进展。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在许多领域墨守成规的甚至主张倒退的力量仍旧在决定国际化的形式和速度。因此我们不能容忍蜗牛式速度。鉴于一国政策的活动范围日益缩小,对民主社会主义者来说,国际合作具有特殊的必要性。

考虑到按照民主方式建立的全球社会。我们必须组织超国际合作,以便在和平政策、经济、环境和发展政策、技术以及其它基本

问题方面相互理解。要使社会主义运动的国际主义传统适应现实，这在我们未来政策中将必须是一个基本方向。

北半球的工业福利社会与南半球的贫困地区之间的矛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尖锐和令人不能容忍。不发达状况和造成数百万人死亡的饥馑是人类大多数的命运。当前，有 8 亿以上的人口在绝对贫困中勉强度日；他们在最低生活水准之下过着悲惨的生活。这些人的数量还将由于人口的极度增长而增加。

世界经济关系和国际金融关系的不公正秩序以及世界许多地区的巨额军费开支阻碍了发展和进步，而通过这种发展，至少是基本的供应本可以得到保障。这种状况对日常生活造成威胁，从而损害了人类的尊严。结束这种状况对北方和南方同样有利。只有通过协调，我们才能够在地球所有部分建立一个和平与幸福的世界。对于民主社会主义者来说，为这样一个世界而奋斗——在这个世界中每个人都有机会享受有一定保障的生存以及有尊严的生活——是自己信念的一个准则。团结必须在全世界范围实行。

因此，为了创造在南方也取得巨大发展的条件，民主社会主义将必须投入更大的力量。我们需要一种新型的世界经济关系秩序以及相应的国际机构，在这种关系和机构中南方的利益发挥着适当的作用，在这一方面，通过削减军费而达到节约——象社会党国际长期以来所要求的那样——无论如何也应该成为南方贫困国家中国际协调形式的一个组成部分。

民主社会主义未来观的基本原则产生于所谓的人类继续生存问题：

——一种共同安全的新政策，正如它在东西方关系中事实上已经开始发展的那样。

——在工业社会和发展中社会实行生态改造的政策。

——由社会塑造技术的政策。

——有效地调整南北关系。

以上述基本目标为取向,应能使各个社会制定有利于未来的政策,无论这种的政策在具体方面可能造成怎样不同的结果。这种新取向用一种自我批评式的进步观取代了线性进步模式。关于不受约束的经济增长自然而然会带来更多的自由和公正以及个人幸福的信仰,已化为泡影。但是,这并不必然意味着,我们必须抛弃解放的目标。它不如说是意味着,对于一度被视为正确道路的实际上将在多长时间使我们接近自由、团结及安全生活的目标这一问题,我们都必须采取更为敏锐、更为认真、更有批评性的态度。

民主社会主义仍然是推动进步的历史运动,然而,这是这样一种进步,它当旧的道路不再继续向前或者干脆引向谬误时将采取新的道路。民主社会主义的运动承担着为新型的进步充当辩护人和组织者的历史义务。

### 对话的新的可能性

不同政治阵营中的有责任感的力量已经认识到并明确表示必须把人类的利益放在比集团和地区的利益更为优先的地位,这是已经改变的现状中崭新而特别充满希望的因素。在最近几年,尤其是苏联元首、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令人信服地强调了这一点。

如果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苏联改革方案能够持久地得到证实,这就会在世界范围造成巨大影响。甚至在中欧和东欧的民主革命成果由于倒退到某种客观上已陈腐的民族主义而暂时黯然失色的情况下,这种影响仍会存在。

关于超越制度的全人类利益的意识的形成,使得新的对话成为可能,这毕竟是我们时代之希望的重要标志。理解与合作在一些问题上代替了意识形态上的教条主义。由于人们日益认识到,尽管继续存在对立,但不可避免的共同性的领域却在不断扩大,这就为不同的政治组织提供了改变相互交往方式的机会,所有组织都可

以从这些机会中获益。

民主社会主义运动能够在创造一种新的国际政治文化,即超越一些对抗、利益冲突与价值冲突而进行对话的文化的过程中起先驱作用。这种相互理解并同时进行合作的方案绝不等于一蹴而就使重大争端得到解决。而且,对于符合人的尊严的社会的基本原则的理解,当前仍然存在着重大差异(例如与苏联领导人相比)。这种差异也存在于下述重大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方面:人权的作用及其保障,民主的组织 and 范围,社会多元化的作用和形成。

当然,我们也并不掌握创造无冲突的社会变革的魔法。民主社会主义者懂得,要在市场经济中保障社会公正是何等困难,维护和扩大民主制和法制国家要花费多大的力量。我们仍将乐于提出我们多方面的经验,但我们无法提供独此一家的灵丹妙方。

### 人权这个中心任务

在捍卫人权方面,民主社会主义者在未来也不能实行任何妥协。无论北方和南方、东方和西方的社会在向 21 世纪过渡时采取的改革道路多么不同,保障人权必须在各地都成为发展的绝对必需的基础。

我们今后将更加无条件地对那些人权受到侵害的地方提出忠告,并将更加坚决地敦促那些人权没有得到充分保障的地方改变状况。民主社会主义者认为自己是不可分割的人权的维护者,宽容的自由权利不应受到局限,然而绝不是仅有这些权利。我们同样反对传统共产主义维护的这一观点:社会保障权利是唯一决定作用的事物。为了维护人的尊严,人权既不能受到限制,也不能被分割或被相互对立。宽容的自由权利、民主参与权利以及社会保障权利互为条件,三者共同才能保障人类的自由。

男女平等是未来的民主社会主义所面临的巨大挑战。谁严肃

地主张人权,谁就必须为男女之间的完全社会平等而奋斗。如果人们愿意充分利用社会的发展机会,而且愿意使妇女善于以特殊方式提供的价值、思维方式及经验对我们社会的人道化起有益的作用,那么男女平等是不可或缺的,无论北方还是南方、东方还是西方的社会都面临着这种挑战,尽管各个地区将要走的道路长短各不相同。

### 为了一个开放的民主社会

处于变化中的共产主义阵营中的坚定的改革家们接过了民主社会主义运动在其历史上曾为之操劳和为之困扰的许多东西,这绝非偶然巧合。民主社会主义在其产生阶段的最初思想就是(当时资本主义的阶级统治和自由派对民主的限制从根本上歪曲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自由要求),只有当自由适用于所有的生活范围和所有的人时,它才是真正的自由。这种观点已一再被从那以后的历史证明有现实意义。平等的自由、真正的自由只有在人们对人类在其共同生活中遇到的所有问题共同地、也就是民主地作出决定的地方才能存在。政治上得到保障的、从社会方面加以完美化的民主,现在是、将来也仍是民主社会主义未来设想的核心。这涉及人的尊严及其在与其他人团结协作的条件下作出自己的决定这个不可或缺的要求。

民主社会主义的理想就是那些将全世界民主社会主义者联合起来的共同观点:人在工作环境中的自主性、社会对经济发展的参与以及有效地监督政治和经济权力。这不仅排除了不受社会制约的私有制为所欲为的统治,而且排除了国家对生产资料的全面控制和对它的中央集权式的安排。但是,对经济权力实行社会控制并不排除市场关系,而恰恰包括市场关系在内。同中央集权官僚体制曾经做到的相比,凡是在有意识地不使市场摆脱责任的地方,市场

都是社会对经济决策施加影响的更为有效的工具。

民主社会主义政党根据各国不同的经济发展状况及不同的传统,确定不同的社会控制方式。各党对私营企业、合作社、社会化、参与形式及宏观规划的侧重互不相同。然而,就混合的和民主化的经济制度这一基本思想而言,它们完全一致。经济民主也是未来的一个主要目标,因为它维护劳动者的尊严,是监督权力的一种手段,而且因为社会对经济决策的参与仍旧是必要的。此外,经济民主还是对不可预料的失业开展有效斗争的前提条件。

相当长一段时期以来,西方工业社会中产生了史无前例并且带来许多后果的个人主义化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是由于群众福利的增加,教育机会的扩大以及实现了基本的社会保障而触发的。根深蒂固的传统生活模式在瓦解。这种情况也完全适用于工人运动中旧的生活文化,这种文化在将近长达 190 年的时间内使得集体共同生活成为可能。在这种文化中,工人及其家庭从生到死都能够感到安全无虞。这种促成团结的文化已经丧失了有效影响。

收入丰厚、教育水平较高,并通过勤奋努力和才干而在职业生活中成为佼佼者的工人、职员和公务员,不再了解那种集体主义经历,他们经常发展一种明显的个人主义意识,把他们本人看成自己的成就和生活状况的创造者。事实上,他们在所有领域也确实能在几种方案中进行选择,也就是说,有享受自由的天地,而对过去的劳动者来说,这种自由是从未有过的。保守派和新自由派为了实施某种政策经常很有成效地利用新个人主义作工具,然而那种政策的结果却意味着降低生活水平,减少社会保险和受教育机会。因此,对于普通工人和职员来说,个人的自由天地被大幅度缩小了。

### 新的挑战

因此,对于发达工业社会的民主社会主义来说,出现了一个新

的巨大挑战。民主社会主义是以维护某些群体的利益为主要目标的,但正是对那些群体来说,民主社会主义的要求似乎不再是一看就明白的实现他们社会理想和个人生活方案的最近纲领了。一方面,我们必须对新的自由机会——对生活机会和生活方式、交往形式和事业模式的选择——表示欢迎,因为正是我们主张许多个人的自由。然而,另一方面,必须弄清什么样的社会条件实际上提供依附者和弱者的自由。新个人主义也是有其社会基础的。

民主社会主义要想取得重新提出令人信服的主张的机会,不仅要通过团结的呼吁,而且要通过提出经济、生态、教育政策和文化方面的方案来实现,这些方案将明确指出,必须保障什么样的社会前提,才能使所有的人都享受高度的个人自由。

未来的工业社会将受到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的广泛技术化的决定性影响。将这种社会称为“风险社会”并非毫无道理。不仅在健康和生活方面存在着风险——这种风险在所有那些在技术发展过程中忽视了社会预见的地方不断增长。而且,由于闲暇时间的技术化,越来越多的人——正是工作时间减少的结果——被强大的闲暇时间企业推动而采取某种被动的消费行为,从而使自己的经验、创造性和自主性被扭曲,这种危险也在增长。因此,反面的乌托邦将是这样一种社会:它虽然使得生活愈来愈舒适和满足,但同时也使人们愈来愈被动和具有依赖性。几十年前,奥尔德斯·赫胥黎所描述的情况,现在已经进入技术上可以实现的领域了。

对民主社会主义来说,今天必须同其初创时期一样,关心使自决的成年人能在与其他人协作的条件下自己决定其生活状况并能这一范围内自己追求个人幸福。这种理想不需要进行任何修正。在我们这个日益受到消费主义影响的、在某些方面还受到它的威胁的社会中,文化政策具有关键作用。这种政策不仅应该为所有的人提供理解尽可能多的民族文化和国际文化的条件,而且应该为所有的人提供自我体验、交往和进行创造的条件和机会,从而使



们在科学技术文明中也能够成为成熟的主体,而不是变成没有独立性的客体。现在需要提出一种文化政策方案,这种方案应维护与促进人的真正的自我体验和集体体验的领域,以反对那些轻而易举地利用人们实在的兴趣并加以操纵的闲暇时间工业的弊病。

### 未来的机会

当今世界不仅带来了新的危险,而且提供了史无前例的机会。通过有意识的塑造,新技术可以成为幸福的源泉,成为有利于自然界的劳动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源泉,成为完善保健措施、保障工作岗位以及增加闲暇时间的源泉。

社会的民主化以及对进步的前景进行负责任的决策是不可或缺的,由此可以使关于符合人的尊严的社会的理想成为现实。

在我们这个密切相关的世界上,民主的全球社会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它可以为一个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与公平合作时代的到来创造机会。

民主社会主义者认为它的关于符合人的尊严的、民主的全球社会的观点表现了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所承担的责任,同时也是呼吁对话与合作的建议。

(原文为德文,陈育国译,殷叙彝校) -

---

# 旧的和新的社会主义

阿丰索·盖拉<sup>\*</sup>

## 一、旧的社会主义

现在,在论述过去的社会主义和未来的社会主义的人当中,有许多人确信,我们现在正经历着对社会主义一个多世纪以来所赖以生存的公理和基本的、分析性的原则进行深刻修正的时刻。1985年,我在哈韦阿会见<sup>\*\*</sup>中曾经指出,现在开始普遍意识到,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些旧有公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已变成了没有什么益处的陈词滥调,我们应该提出革新这些原则(其中的一些可能已经失效)的问题。今天我坚信,考虑到各个共产党国家近几个月的事态和理论讨论中广为传播的新观点,在分析和更新社会主义观点方面的这种犹豫不决的心理开始消失。

与此同时,多年来,我们在对某些具体问题进行批判时曾经历过困难,或者因为某种精神上和政治上的羞耻感,不得不对这些困难保持沉默,在这之后的现在,我们可以放胆对历史的社会主义作

---

\* 阿丰索·盖拉: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书记、西班牙副总理。

\*\* 即每年一度由体制基金会在西班牙阿利坎特省哈韦阿组织的《未来的社会主义》讨论会。

总体的、绝对的批判了，在这种批判的过程中，过去的经验和理论思考中有价值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将被贬低。

毫无疑问，左翼知识分子有能力对过去的遗训进行严厉的批判性重新思考，需要多么严厉，就多么严厉。然而在这种批判中，必须做到使那些要破坏历史的捣乱分子或者那些要葬送体现着人类解放愿望原则的人的不负责任的做法不能得逞。

所以，在提到那些已经无人接受或者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某些传统的社会主义原理之前，我认为，公正的做法是：我们不仅要对那些从 18 世纪中期以来以自己的观念、思想和理论丰富了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思想家表示感谢，而且要对所有那些在我们全球的各个不同角落，以自己的努力和战斗积极性促进了争取更美好、更公正的社会而斗争的人们表示感谢。没有他们，当今世界会是另一个样子，并且毫无疑问会糟糕得多。

我们中掌握了对几千年文化进行政治分析方法的那些人非常清楚，不考虑到特殊的情况及其所处时代的背景，就无法做到以应有的历史公正态度去评判我们的先驱者。由此可见，社会主义运动尽管有其一切错误和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却履行了它所追求的诸多职能中的一个职能：改变世界。

我们大家都受自己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时代可能性的制约，社会主义的前辈们也完全一样受自己所处时代的制约。那是一个受实证主义哲学家、康德、黑格尔的庞大精神理论体系所影响的年代，这些哲学家有其共同追求，那就是希望能够理解无所不包、无所不晓的意志。社会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希望成为综合性的、统一的、包罗万象的思维，然而，实际上，这种奢望却表现为对简单化和二分法的竭力追求。

同时，社会主义不仅仅产生于认为能够建立一种科学上可信的和最终的思维大厦这一信念占上风的时代，对它产生影响的还有其它一些思潮，这些思潮来源于犹太基督教的传统或时代的革

命精神,并浸透了目的论的历史观,这种目的论历史观规定,任何社会和政治活动都具有“拯救”使命,从而导致了革命的神话化,革命因素的神话化——导致一种其结果将会“拯救”人类(当时人们这样认为)的普遍净化观。

与宣布要制定科学理论的意愿(这种意愿本身也是科学技术发展中的巨大飞跃引起的)相反,所有这些因素都变成了追求社会主义神学幻影的强大倾向,而这种社会主义又固有着教条主义、简单化和非批判性的特征,这些特征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后马克思主义阶段已变得更加明显。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中表现得尤为强烈。

这种认为只有在最终的革命的净化时刻才能消除人类一切苦难的准宗教的社会主义概念,在相当长的几十年中支配了左翼力量所进行的大部分讨论。甚至在民主社会主义的拥护者中,特别是在50—60年代,激进分子提出的主要指责并没有涉及——如果你们也记得的话——通过已在无情的政治斗争和社会斗争中实行的或争得的改革使劳动人民的生活条件得到重大改善的现实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感兴趣的是某些行动使我们接近还是远离伟大的革命时刻这一问题。今天,在80年代末,当我们离新世纪的开端只有10年的时候,那种神话化的革命信念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破产,已使许多类似的讨论结束了。

社会主义革命这一观念,同样也是与两极的、非历史主义的社会冲突观分不开的,这种社会冲突观只给唯一的革命主体的理论腾出地盘。

这种观念赋予无产阶级以全部积极的特点和革命的潜力,认为无产阶级是一个固定的、新兴的、广泛的阶级,它被卷入日益贫困化过程之中,并长期(一直到革命爆发为止)受集中掌握着生产资料、变本加厉地剥削工人阶级的另一个阶级的奴役。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是作为愚笨的压迫机关出现的,本应被摧毁或消灭。

这些观念的机械结合和不受时间约束的表现(即使其中的一些观念在其形成之初符合当时的特点),导致了目光短浅、因循守旧的思维和政治实践的产生。这些观念,经过难以置信的困难、创伤和波动,逐渐被一些人卓有成效地表述得更加准确和更易于为人所适应,或者相反,被另外一些人解释得更加教条化和僵化。

唯一的革命主体的理论是以各阶级之间的社会对抗的不可避免性为前提的。由于对社会冲突的看法或者比较僵化,或者比较灵活,由于对个体的个性和自由的价值估计不同,又导致了各不相同的政治和组织方面的社会主义观念的产生。这些观念产生于一个共同的历史树干,这一树干起初不象后来所变成的那样枝叉繁多。

从理论观点来说,完全可以假设,如果马克思是在弗洛伊德之后进行写作的,如果他的创造力能在更加开放的当代科学观念的影响下形成的精神环境中得到发挥。那么马克思巨大的综合和分析能力对整个以后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影响就会有相反的表现。这种假设令人伤感。然而,历史不会重复,也不能发明,我们应当以准确的历史材料的依据,通过新的折射镜和我们时代的可能性掌握历史的教训。

从历史观念来说,阶级概念,特别是阶级救世主说法,逻辑上已经完成了向阶级政党思想的转变。从这个方面说,在相信阶级政党不可避免地进行解放革命的人当中,一些人立即作出了关于先锋队政党所必需的结构结论。如果党已掌握了政权(正常的看法是通过暴力行动),那么,为了净化社会,它就要利用国家,因而也就要实行阶级的专政。实际上,在某些国家中,党已变成了上述先锋队的专政,即变成了党的专政。

与本身的发展变化相适应并在30年代流行的专断文化的总影响下,党的专政变得除了纯粹的专政以外没有任何其它内容。还在1917年,罗莎·卢森堡就预言并批判过这种消极的后果,这种消极的后果后来表现得非常明显。此外,还有个别具有健康思维的

共产党人,如葛兰西,能及时地与这种形式划清界限。

民主社会主义也从阶级政党的一般概念出发,吸收了民主的意愿和策略方法作为其纲领的有机组成部分,目的在于进行有组织的自我调节,进入并可能掌握政权。然而,在历来所主张的社会二分法破产并在实际生活中被埋葬之后,民主社会主义向能够获得多数选民支持的更广泛的群众性政党这一观念演变,为的是借助于民主的、和平的方式和程序,实施渐进的改良政策。在个别情况下,群众性政党的观念本身又演变成一种更一般的、对人不加区分的表述(“人民的党”、“超阶级的党”、“全民党”),这种表述过去和现在都伴有使社会主义方案在社会学和政治学方面缺乏确定性的危险。

然而,有一点是清楚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观点尽管有其缺点和局限,却使很大一部分欧洲社会党能通过民主的途径取得政权,并使社会民主党人有机会检验利用国家这个长期受诅咒的工具来实行社会福利政策和重新分配政策的可能性。也许许多人需要看到60年代国家的财政危机和80年代新保守主义者对普遍福利国家进行强大的进攻,才能充分理解社会民主主义在这方面提出的改良和社会变革的可能性。

这一历史性错误——相信作为机构的国家是万能的,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坚实工具——不仅暴露了想象和分析能力之贫乏,而且暴露了在只容许这种简单化解释的时代背景下,组织社会学的水平之低下。

利益是各种组织成立的基础。除此以外,各种组织还具有自己的目的和职能,在这些组织内部按照各自的目的和任务开展活动的各种团体的情况也完全一样。从这个意义来说,在西方民主制中,一度确实曾是为资产阶级服务工具的国家逐渐丧失了这种特殊作用,变成了保护最脆弱的社会部门的工具,变成了区域均衡的因素和维护集体利益的一体化因素。因此,为了完成有利于劳动阶

级的革命而建立的先锋队政党,最终是为了自身利益而进行革命,早在许多年以前,吉拉斯在《新阶级》一书中就指出了这一点。

在这段对过去所作的简要评述的结尾,我们只说一点,从封闭的、静止的阶级观念中还产生出天真幼稚的平均主义的概念,这种平均主义往往实质上既扭曲了政治讨论,也扭曲了社会要求的论据。今天几乎已无人怀疑,这些要求,就其整个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复杂性来说,已再也不能仅仅根据简单划一的集体主义回答来处理了。

## 二、改革的目的与新的社会主义

现在,有关现实发生变化的前景和可能性的信息和材料,已经积累到这种程度,甚至不完全了解情况的人也有一定的理解能力,可以预测到社会变化的论据。今天,可以肯定地说,不仅是社会上有文化素养的那一部分人,而且是更广泛的公民阶层,都有社会变化的共识。我们正好碰上了日新月异的社会,这个社会正处于非常强烈的、深刻的变革过程的临界点上。所以,对变化的认识成了理论思考和政治实践最主要的出发点之一。

从类似上述我所作的对过去的简单考察中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这样的一个事实:所有理论家和政治家是其时代的文化知识局限性的产物,而经济、社会、技术和政治的实际情况在不断发生变化,并分解出许多新的、出人意料的方面,必须寻找新的,目前尚未考虑成熟的解决办法。

必须谨慎小心地深入到我们当前的或临近的新的现实中去,必须实施我们有能力提出的新的解决办法。

所以,先这样问问自己也许并不坏: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至少是具有最起码的未来观的社会主义是什么?

### 1. 什么样的社会主义？

未来的社会主义既不能从零开始构想，也不应当理解为某种已经先验地形成封闭体系的事物。社会主义是一种解放的理想，是历史进程的产物，它既对具体的社会发展本来已有的情况产生影响，又受这些情况的影响。

我们已经指出过，历史经验告诫我们，要提防政治冒险和理论歪曲，这些理论歪曲会导致企图把理想理解为给一切生活情形准备好了公式和预言的“封闭体系”。我们，我们同时代的人都非常清楚，绝对的公式往往有利于变形的社会机制和恶劣行为方式的发展，这些社会机制和恶劣行为表现出极大程度地违背客观情况的逻辑，以致这种公式的绝对化最终不仅压服了现实，而且压服了真正的人和社会的需要。

我们希望，未来的社会主义被理解为某种完全与教条或伪宗教不同的东西，教条的或伪宗教的东西体现为教义问答或指南中的公式，这些公式总是指定什么该实现，什么不该，而丝毫不考虑合理性。

社会主义，这是一种动因，是历史进程中发展和形成的理想，它来自理论的反思和具体经验的对比。社会主义不想制造先验的俗套；不想给某种社会形式绘制一张十分完备的图纸，作为一种不容置疑的样板供人模仿。相反，社会主义是一个发展过程，它使解放的理想适合于处于一定历史时期的具体社会。从这个意义来说，它所包含的内容可以说是：社会主义不是在某一时期内最终可以达到和作为历史顶点和极限的某种至善；相反，它是未来社会发展的基本因素，促使人类社会逐步走向至善，而这种至善是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完全达到的。

因此，为了在把社会主义建造成解放的理想、建造成给社会组织形式的具体发展指明方向的因素方面有所进步，重要的是能够



对未来作出明确的表达，因为认识未来才能克服缺点，矛盾、异化、统治关系，消除贫困与社会苦难等等的根源，这些东西完全阻碍了具体的社会在一定的历史前景内自由发展与进步的可能性。

可见，未来的社会主义必须建在绝对自由的、没有成见的讨论的基础上，这一讨论的主要任务是对社会主义进行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所以，知识分子和负责的政治活动家进行密切的、直接的合作是极其必要的。现在，为了促使社会主义向前发展，我们需要的不是搜集一大堆替不久前的政治实践作过迟辩解的理由，不是就脱离客观现实的原则作抽象哲学的高谈阔论，而是今后几年政治实践的理论指导。

## 2. 未来社会的展望

从当代现实来看，很难具体地预见到未来社会构成的详细情况。但是目前普遍存在着这样的一种广泛印象：我们正处在一切部门都将发生极其重要的变革的门槛上，这些变革将对我们社会所形成的各个根本性方面产生持久的影响。

一些理论家——社会学家甚至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正在临近的变革将比由传统的农业社会过渡到现代工业社会所导致的变革重要得多。

尽管我们现在正处于这些过程的最初阶段，很难说，要经过多少时间才能准确描绘出新社会的轮廓，但我们现在已能多多少少有些把握勾画出未来改革的一些基本思路，因此，在最近和稍远的时期内，可以预见到劳动的性质和作用将发生重大变化，劳动与手工劳动的相似之处越来越少，不得不说这是从劳动文明向闲暇文明逐渐演进。随着新阶层的出现，随着其它团体加速丧失其社会份量和经济份量，各社会阶层的配置将发生某种变动。权力结构也会发生变动，它越来越成为跨国度的和佚名的，并日益受新的文化、技术和其它因素的影响，社会关系越来越依赖微观的因素，形式的

印记越来越少,将很快被新的社会认同所替代。世界政治空间的再分配将导致各种今天已经可见的非常重要的经济变化等等。

就事物的逻辑来说,社会变化和新形势的这种结合使我们猜想到,未来社会的社会冲突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将会不同于工业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第一阶段所固有冲突的性质。

因此,重要的是,社会主义要有能力十分清楚地预料到,在历史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工艺技术先进的新社会中,会产生什么样的冲突问题和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缺陷。

可以笼统地说,这些冲突和社会不公正的因素将是极其多种多样的,在一个非常复杂的、经历着激烈变革的社会中,情况只会是这样。摆在第一位的已不是经济平等的幅度。与个人因素相关的不平等变得尤为重要,例如年龄(年青人就业机会更少,退休者的养老金不够)、性别(保留着妇女受歧视的基本因素)、文化水平(完全不同的生存机会和社会机会)、生活地点(不同的生态环境及由此产生的不同的生活质量)。显然,民族因素就更不必说了。民族因素所造成的后果是:在我们这个星球上,这些或那些民族生活在极其不平等的条件下,他们对未来的期望也极不相同。

这些新情况的复杂性要求人们花大力气了解哪怕是最近将来的社会需求。我们应当从研究个人的要求做起。我们的不知不觉地走向未来社会的公民们主要想要什么呢?他们要求社会主义者做些什么呢?认为个人的要求是一个次要问题的社会主义,在先进的工业社会的公民那里,是得不到什么成功机会的。因此,我们应当准备优先考虑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只能简单地说,个人的首要要求将是一定的富裕水平、占有物质资源(住宅、消费品、收入等)的一定程度、以及获得教育、文化、保健的机会,这些是关于居民在某一时期“可以达到的”生活水平的设想——这在实际上也已经做到了。

这一平均生活水平不仅是现实情况的反映,而且也是某种“期

型”、某种社会已确定的生活水平模式，这种模式在集体的意识中得到反映，并在大众媒介中得到传播。因此，这会在那些没有达到该历史时代应有的这一生活水平的公民中引起失望和某种差距感。此外还加上一种与安全感有密切联系的强烈的个人要求，一旦大家最起码的生活条件得到保障，安全感就越占有份量。在经历着激烈的、本身就具有一切紧张和不稳定因素的改革过程的社会中，安全感一定会具有其特殊的作用。这种安全要求远远不同于通常的公民安全（对个人权利的承认和保护）。这将是一种由社会地位和社会认同（承认在与所有人的关系中都要公正和平等）加以保障的安全；一种就业安全（作为一种有益于社会的积极活动或者生存的手段）；一种免遭不幸和疾病的安全（较健康的和高质量的生活保障）；最后便是在集体受到巨大威胁（战争、灾难等）时的安全，并且在一切方面，生态因素的重要性将会大大增强，其中包括它的特殊表现形式，即个人要求生活在更好的环境中。

应当研究集体的和团体的需要和要求及其演变和表现的途径，这里所讲的不仅是从经济性质来看传统意义上的各社会阶级（当阶级为争取大部分社会权力和分占利润而进行斗争时）的需要和要求，而且是具有特殊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各种各样的新团体的需要和要求。这种团体有时会变成组织压力的重要手段（这是一些在经济上或制度上的压力集团、同业组织、消费者、邻居等等的联合会）。

应当特别重视那些非正式产业部门中人们的要求，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正在遭到排挤，那些处于社会较低层的广大集团的情形就是这样。这些团体往往不受市场的逻辑制约，某些社会学家把他们界定为底层阶级，他们基本上是根据文化因素和个人因素（受教育程度、性别、年龄等）来评定这些集团的社会地位及其缺陷的。

在设想未来的社会主义时，不可能不考虑到各社会的社会体制本身的需要，特别在那些存在着体制错误发展危险的社会中更

是如此。这种危险之所以会产生，是由于古典的经济理论中的某些原理已不能保证其协调的、持续稳定的、既不需要过高费用又不产生环境危险的经济增长。因此社会不公正成了未来社会主义方案必须考虑的基本因素——这种不公正之所以会发生，是由于难以保证给所有人提供可靠而有价值的工作，难以保证环境的基本平衡，难以保证后代能使用足够的自然资源。特别是如果考虑到，有一些臆造出来的说法和促使紧张因素增加的危险正在影响社会的动力机制，就更应当考虑上述问题。而这些臆造和危险是由新保守主义者的观点及其关于自由贸易和超级个人主义的绝对假设造成的。

因此，从对社会问题复杂性的理解中，从我们所能提供的作为对各种社会需要的回答的替代方案中，社会主义能够为未来社会提供保障。在这种未来社会中，完全有可能达到最大限度的物质丰富，不会对社会的或自然的基本平衡构成威胁，或危害人类的基本价值和基本权利。

### 3. 未来的社会主义

我对未来社会主义的理解，当然，应当是现在所进行的多次讨论的成果。毫无疑问，要预测那些深刻的、五光十色的讨论的最终结果还为时尚早，但另一点却很重要——讨论和思考应当在更加开诚布公的情况下继续下去。我们深信，我们将通力合作，逐步使未来社会主义的轮廓具体化，这是时代对我们的要求。我们也将以一切可能的坦诚态度和辩证方法，通过广泛而富有想象力的理论和实践工作使之具体化。

然而，不可能把未来的社会主义理解为一个新阶段从零开始的起点或新的绝对现实，我们只有把历史一笔勾销以后才能设想这种现实。诚如我们已经着重指出的，未来的社会主义是植根于一个漫长的人类和社会进步的历史传统中的，所以，在制订其方案

时,我们必须首先以最近几十年通过社会福利政策和重新分配政策已经取得的全部成就为基础。

如果我们国家周围的西方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共存的民主形式,经济增长达到了一定水平,并因此保证了广大居民一定的最低生活费用,那么,未来的社会主义本身就应该旨在消灭统治人类的任何特征,这种统治是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或种族的统治。未来社会主义也应当解放人类。

我们建议:

——完善民主形式和程序,并使之深入发展到生活的所有方面,使公民有可能积极参与社会事务,最终改善集体的社会自我调节机制;

——使文化教育的平等与普及能唤醒人们的自由感;

——拓宽社会时间与空间,使有可能发展和享受个性的创造能力,同时获得更加健康的、得到更好补偿的生活条件;

——克服造成社会边缘和贫困的因素,广大的居民阶层还生活在这种社会边缘和贫困之中;

——为社会平衡与和谐创造良好的条件,这种平衡与和谐能保证民主政治制度必要的稳定,保证公民生活水平质和量的提高,为所有的人确定有尊严的社会“标准”。

——在国际关系中确立和平与均势,这能提供安全感,使耗资在军备上的资源有可能转入为福利和自然资源保护提供保障的有益用途。

当然,目前在我们全球的一些地区,就已经为按这一方向发展社会主义造就了必要条件。然而,未来的社会主义不能只理解为一个进步的公式,理解为给地球上最富裕、享受最优裕的民族提供福利。没有团结互助就谈不上真正的社会主义。所以,全球这些少数发达民族的社会主义应当竭尽全力使自己按照上述目标前进,同时还要创造有利的国际条件,借以在当今不均衡的、充满依附精神

的国际关系中发展有效的团结政策和恢复平衡的政策。

我们非常清楚，社会主义者独创的、非具体的、冠冕堂皇的国际主义提法已造成什么后果。我们对在一国范围内建成的社会主义变种的局限性及其正在日益增加的问题有着清楚的认识。与“一国社会主义”概念相关而将一国傲慢地说成是“社会主义故乡”的断言是特别荒唐的。

某种“犹太人隔离区”的思想或“享受特权的天堂”的思想与社会主义者企求的根本原则是不相容的。现在，主要的问题在于，正是我们才能有效地发展——这已不是简单的夸夸其谈——社会主义所固有的团结互助的国际政策。

各民族之间的不平等，多种多样的文化、政治、地理生存条件，使我们很难在一个如此复杂的世界中表述最佳社会主义方案，并使之完全适用于全球所有国家的人。这就是说，我们应当认清国际舞台上现实情况的多种复杂性，不要再陷入空洞的、过于冠冕堂皇的国际主义宣言的圈套，这些宣言尽管没有败坏任何人的名声，然而却什么也不能解决。

经济、政治、技术、文化以及其它性质的理由，要求把未来的社会主义作为一项适用于实际存在的地理区域和经济区域的方案来研究，并同时创造有可能在国际范围内实际行之有效的条件。这样，随着在欧洲国家中形成团结互助这一社会主义发展的条件，欧洲社会主义本身应当积极、紧张地致力于严密的理论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只有借助于这种准备，才能取得政治上的领导权。这种领导权有可能按照预定的方向发展，使欧洲巨大的潜力服务于团结合作政策。这种政策无论如何既不当建立在扩张主义的计划基础之上，也不应当建立在企图确立或巩固任何一种形式的附庸或统治的基础之上。

在中期或者比较长远的时期内，能否创造出我们在这里所描述的那种概念的社会主义？欧洲的社会主义能否造就出形势所要

求的组织手段？它能否在欧洲社会中那些富裕的、已经站稳脚跟的、然而在许多方面缺乏互助精神的部门中得到应有的社会支持？需要何种动因和社会支持才能建设未来的社会主义并使之向前推进？

在传统的工业社会中，推动历史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主要是新兴的工人阶级。然而，在今天，当深入的劳动自动化过程已经实现，手工劳动工人数量大大减少的时候，就应当坦率地问问自己，社会主义能够依赖的社会大多数将由什么人构成，以使用和平的、民主的方法发展自己未来的方案？难道可以把未来的社会主义理解为一种没有主体、抑或没有特殊社会主体的纯意识形态的方案吗？

看来要去尽力弄清楚这类问题还为时尚早。现在只能断定，与传统的支柱相比，未来的社会主义将会得到更广泛的、更加多种多样的社会支持。所以，它应当特别重视巩固与自称为“底层阶级”和“新社会运动”的那些不属于工人阶级的集团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这些集团反映了在一些当代问题尖锐的条件下和社会不公正因素的条件下（青年就业困难、新型的社会边缘的存在、环境问题、妇女地位的不平等、等等）所产生的政治、社会意愿。

与一些活动家的看法完全相反，在这些新的社会条件下，社会主义能够取得新的动因，如果它能够在其传统的支持外，还能得到其它社会领域的热情支持的话，这些社会领域人们的政治敏感并不仅仅限定在严格的劳资关系范围之内，这样将使社会主义本身得到改造。

从这样的前景看，未来的社会主义有可能成为争取到社会中大多数人信仰的方案。也只有到那时，它才会用和平的方法，通过完善民主实践的途径来促使社会进步。

### 三、结论

在现代条件下,社会主义成了唯一联结人类解放和社会进步的主要因素。在社会主义的理想中,体现着对自由、平等、和谐与社会平衡的最良好、最先进的文明愿望。今天,社会主义理想成了一些社会部门解放的动因,这些部门还没有为自己争得基本的个人权利和社会权利,还不能享受现代科技进步的成果。除此之外,这种理论还成了普遍认识全球社会平衡和自然平衡必要性进程的基本因素。

所以,今后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应当建立在某些集体的具体要求的基础之上,同时也应考虑未来全球的需要。就其实质来说,社会主义是一种未来的方案,它可以——而且必须——保证后代对人类文明进步的信心。它必须正好成为具体的政治行动与理论思考的参照点。

如果以充分的历史眼光和适当的理论准备来对社会主义的成就和它对我们当代社会的影响作一次当前的总结,那么,我们就得抛弃一些肤浅的、显然是偏袒的评价,而应当承认,对让人这种解放理想的发展中的一个新阶段来说,我们已经达到了足够的成熟水平。如果对最近一个世纪工业世界中所产生的进程进行严格的、客观的分析,就可以说,在漫长的历史道路上,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伟大古典作家所提出的经济和社会模式进行政治战斗时,已取得了道义上与政治上的胜利。今天,谁也不敢真正维护自由贸易资本主义和前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论家与实践家所依据的特殊道德前提。甚至最固执的新保守主义的理论家也坚信,在当前社会中上述模式绝对行不通。当前社会尽管保存了所有违背团结精神的残余,但信息过程的全球化及其直接接近消费者的特点提高了人们的精神觉悟,这种觉悟反对种种最令人触目惊心的不平等、压



迫、剥削、社会不公正的形式。

从历史的角度看,我们必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导致野蛮竞争、允许“物”(商品)对人拥有价值优先权的最初的资本主义,无论在道德领域还是从一般实践的角度看,都遭到了失败。从政治观点看,这种失败明显表现在大多数发达社会中各劳动者阶层和最贫困的社会集团所争得的社会福利、劳动权利和经济等方面的成就。十月革命中计划要实现的东西同样也是这种失败最重要的历史前提(尽管十月革命后来的影响完全不同)。特别是,在我看来,还有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影响,它在西方社会的发展中成了重建平衡的主要因素,这也适用于我们所知道的福利国家,当然要考虑到这种实行团结互助和重新分配的组织也存在许多局限性。

所以,尽管社会主义赢得了一些道义上和政治上斗争的胜利,但仍然不应该忽视: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无论是“现实的社会主义”(它带来了经济崩溃,尽管它使生产资料社会化,但未能实现自由),还是社会民主党(它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保存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却建成了福利国家),都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样板。但同时,它们有助于从不同的方面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创造技术经济条件。

社会主义能够以一定的乐观主义精神迎接未来。我们在下一个世纪的几十年中,不仅能感觉到我们理想已取得的成就和进行动员改革的能力,而且还坚信我们有能力去学习。根据实践经验进行革新的才能把活生生的、日新月异理想与木乃伊式的学说区分开来。毫无疑问,最近几十年的经验使社会主义者学会了许多东西。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吸收了深入人心的、各种完全不同的经验。现在,我们正好在参与某种运动,这种运动宛如各种试验硕果累累的收获季节。在某种范围内可以设想,如果当代的社会民主党人、共产党人和其它左翼政治力量同意并且认为现在应该是对最近经验作出总结和收获的时候的话,那么,这就会使我们

把谷粒从杂草中筛选出来。

我相信，作为解放思想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之处主要在于，它有能力依靠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和乐观主义精神进行革新，适应新的时代和新的现实，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是一种活生生的、真正的社会运动的特点。

我们面临着强烈的时代呼声和巨大的历史、政治责任。我们的责任在于，要努力使自己为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积极贡献。未来社会主义是从过去和现在的社会主义中产生出来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活动家应该把对未来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赶在我们现在的政治实践的前面。他们要批判性地评价过去，研究历史理论与实践的缺点和局限，努力扩展新的途径，指明新的目标。他们最终应该深入到社会主义理想所固有的最高的改革使命中去。

社会主义，这是一种理想和社会运动，它不仅能够复活，而且能够迸发出力量来，它能够从其经验，甚至从其危机中获得动力。社会主义无论在试验中还是在理论思考中都充满生机。这就是我们为什么用不着去过多担心的原因所在，因为现在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是从广义上说的）正处于关键的时期——对观点的重新研究、分析、讨论的时期。坦率地、非教条地迎接类似危机的能力，这是我们大声疾呼从现在争论中摆脱出来的最好保证。

我们现在已理解了那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在最近的两个世纪中，经历了明显的形成轮廓的阶段，第一阶段是“前奏阶段”——毫无疑问，它与启蒙思想和鼓舞伟大的法国革命的精神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以我们时代的民主革命而告完成。

但是，实际上，社会主义在第二阶段才有了它的内容并具有自己独特的面貌，这个阶段是“理论化的阶段”。通过上一个世纪伟大的思想家们的智慧，它大张旗鼓地宣传了自己的本质，并宣称能够给社会阶层的意愿和需要提供十分肯定的历史前景，这些社会阶层比其它人更多地遭受到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后果的痛苦。

第三阶段是“实践阶段”——时期划分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苦难开始，是各种不同方针的社会主义组织需要承担具体的政治责任之时。正是从那时开始，社会主义不再是一种纯粹的理想和一套理论提纲，它已具有了政治实践的经验。我们还知道，这个发展阶段充满了激烈的争论，划分了重要的界限，在争论和划界中，暴露了以前理论观点的弱点和缺陷。所以，这个阶段也不失为严肃的理论思考阶段。然而，多半是在事后为凭着经验已经进行的实践进行辩护的局限性理论，而且也是非常具体的政治实践——列宁主义的实践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实践。这就是为什么某些国家（主要是俄国和德国）的“行动”和“言论”在伟大的创始人时期之后的讨论中产生了巨大作用的原因。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非常特殊，并因此很难重现，很难推广到其它的形势中。不应奇怪，在第三阶段，社会主义真正的理论探讨因为每一个参与者具体的政治实践而黯然失色。

从历史观点来看，可以说，社会主义的第一阶段是某种动因，是理想变成现实的火花。我们继承了第二阶段许多的思想和理论研究的结果。但是，我们从第三阶段开始却实际上只有——而且也将停留在历史书本上——我们应该竭力从中作出适当结论的全部实际试验。

实际上，只要仔细照照“自己的镜子”，甚至就会明白，一些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观点已经不能胜任自己所规定的角色。由此可见，我们现在正在社会主义的历史中开辟一个新的阶段。这是第四阶段，它一定将是“制定理论的新阶段”，这个阶段对于创造新的动因、给实践中的社会主义新发展指明方向是必要的。

在这样的时刻，我们的优越性——如果可以引用牛顿那句著名的话——就在于，我们当今的社会主义者也将会“看得更远一些”，“因为我们站在伟人的肩膀上”；还在于，今天，在社会主义思想经典作家理论贡献的基础上，我们有能力使我们对未来的理论

贡献通过已经积累的具体经验而更加丰富。

最后，我们要提醒的是，在确定新的航行路线的时刻，社会主义者要知道我们在自己的道路上已经走过了一段路程，所以，我们可以利用重要的经验去选择自己的道路。

当旧时期正在过去，充满巨大的科学、社会可能性的新阶段正在地平线上涌现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达到一致意见，为了新一代，把革新的社会主义引向运动和新的时代，这种革新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历史的社会主义的坚实基础之上的。我们的任务就是如此。

（原文为西班牙语，戴隆斌转译自俄文，刘文建、殷叙彝校）

## 社会主义与新社会运动

奥斯卡·拉封丹<sup>\*</sup>

在 60 年代的学生运动衰落之后,社会抗议首先分化为下列派别:影响微弱的政治教条主义者小集团、自发的新左派团体、私有化住宅共同体、替代方案派、自我体验团体、以及第三世界团体。议会外反对派的另一个相当重大的部分在工人运动的传统政党由于学生运动的影响开始注意改革时受到鼓舞,重新回到了制度化的政治之中。然而,第一批公民倡议运动在 70 年代初期也已破土而出,妇女运动也开始重新组成。那时还未能预料到,从这种分散的状况中会产生一种波澜壮阔的抗议运动——这种运动不再是由学生运动重新抓住的资本主义统治制度的问题,而是由社会再生产问题触发的。

只是在 1973 年石油危机的背景下,工业增长所造成的生态后果问题、自然的和社会的生存环境的不断毁坏、或者由新兴重要技术产生的不断增加的风险和强制才受到人们的关注。对于增长的极限、环境的负载能力以及生活受到技术的压抑和控制等问题的敏感,是来自对抗性文化的抗议运动的真正基础,这种运动以新型社会运动的形态活跃起来了。

自从 70 年代后半期以来,抗议运动随时随地都在发生,对工

---

\* 奥斯卡·拉封丹:德国社会民主党副主席、萨尔州州长。

业主义、家长制、军队和军备、国家、技术、和进步都提出抗议，也对社会主义提出抗议。在新社会运动问题上，安德列·格鲁克斯曼似乎说对了（至少这一次他是说对了）。他提出消极的人道主义这一概念，并把它解释成人类不再从人类存在的积极方面去界定自身，而仅仅从划定与非人道和灾难的界线这方面去界定自身。我也认为，新社会运动——在这里我将妇女运动排除在外——的抗议的动机过于强烈，过于片面。它是一些反对运动，这些运动的动机不是产生于为人类的权利而奋斗，而是产生于对侵害人权的抗议；不是产生于为种族平等而奋斗，而是产生于对种族隔离的抗议；不是产生于为一个更为清洁的环境而努力，而是产生于对环境污染的抗议。这种区分绝非强词夺理。我只想以此说明，这种新运动是一个饱和社会中的典型现象，因为在这种社会中的自由和福利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即不需要再去为之奋斗，而只需要加以维持。新社会运动的骨干主要是新中等阶层中的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们，这一事实也证明了上述解释。

同时，来自对抗性文化的抗议也是过去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那些社会主义运动难道不是也主要被理解为反对运动吗？反对资本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资产阶级，或者还“反对”其它什么。“新的”运动难道真是这样新吗？

150年前，“社会运动”是作为工人运动出现的，因此这个概念首先应该用于对“社会问题”作出社会主义答案的运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社会运动主要是与工人运动这种传统的制度化形式——工会、社会民主党、社会党或共产党相比而被认为是新型的。这是否也意味着与社会主义理想和“旧”工人运动的观念决裂呢？我们将探讨这一问题。

68年的学生运动不同于“新”运动，它还完全继承了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理论，尽管就使用非传统的、从美国学来的“公民集体非暴力反抗”行动方式——它们包括从充满幻想的示威到静坐或

煽动性即兴演出,再到有节制的破坏规则等形式——这一点来说它已经预示了后来的运动的斗争方式。60年代反权威的抗议基本上也已形成了自主的、分散的、网络状的新社会运动组织结构。学生运动在政治上把自己理解为议会外反对派而不是反议会反对派。它们的政治行动之所以如此缺乏制度化,首先是由于它们未能拥有政治机构,因此不应把这误解为它们原则上拒绝政治的制度化。鲁迪·杜契克不是曾经大声疾呼,宣称要举行“通过制度的长征”吗?许多68年运动的参加者曾走上这条道路,而且在此期间进入了政治机构,最近,甚至丹尼尔·柯恩-本迪特也成为法兰克福市负责文化事务的市议员。

相反,“新”社会运动的政治规则包含一种从根本上反制度的成份,而且带有对制度化政治的解决问题能力持深深怀疑态度的特点。从历史角度看,这种反制度立场根本不是崭新的;对欧洲工人运动中大的无政府主义或无政府工团主义流派来说,同样的思维和认知方式恰恰是它们的特征。

因为每个社会运动本身都有一些反制度或制度外的特征,所以,人们很难根据它们与制度化政治的差距来衡量它们带来的哪些是真正的新东西。一个新运动完全可以与以前运动的制度化形式决裂,但它所争取的却是同样的基本社会目标。

甚至“旧”工人运动为了再次成为真正的运动,必须与其组织形式决裂,因为它今天在其中已经僵化。一旦它真正以运动形式表现出来,它就具有处于制度外的特征,而且与新运动同样有意识地与国家机构保持一定距离,同样重视自主性的价值——反对资产阶级政治的无产阶级自主性,同样坚信非传统的行动形式和参与形式。

而且,过去曾鼓舞早期工人运动中的自助组织和合作组织以及今天支持新替代表运动的,肯定还是同样的追求全面、团结、自决的工作愿望以及同样力求摆脱生产关系统治的尚未实现的梦

想。如果现在提出某种不同于以往的替代生产方式问题,那么,并不是因为人们头脑中的社会乌托邦理想已经改变,而是因为在这100多年的岁月中社会条件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社会运动是社会转变的指示器。因为,只要群众是社会转变的独立自主的承担者,那么他们采取的形式就是社会运动。然而运动也总是意味着参与;在此过程中人们不是历史客体而是历史主体,他们本身对历史进程产生直接影响,而不再仅仅充当统治国家之精英们的政治行动的拥护者。但是和“旧”工人运动所设想的不一樣,这还远不足以使社会运动单凭本身就成为民主主义的,远不足以使它们与进步力量认同。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在它向前猛进时忽视了一点:人们同样可以开展向后倒退的运动。不过至迟法西斯主义已经使它有所醒悟了。

没有人会声称社会运动是不民主的。相反,它们对制度化政治的拒绝植根于建立一个更加激进、更加直接的民主制的愿望。它们是按照“基层群众民主”原则组织起来的。当然,这种基层民主倾向绝不象它有时被认为的那样新,它也是“传统的”左翼激进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基本要素。

从早期工人运动的斗争中(例如在巴黎公社期间)曾流传下来一些轶事,它们即使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却比任何干巴巴的科学分析更多地说明了这个运动所具有的群众性民主特征。例如,有这样—个关于一位普通人的有趣故事:他在市政厅昏昏入睡时是一个臣民,一觉醒来后却成为市长。1871年3月18日,这个老实人本应到巴黎市政厅办—项老—套的行政事务,但是,当他按照规矩到达时,却发现整个建筑阒无—人,因为官员们已在起义者来到之前逃之夭夭。为了找个人帮助,这个可怜的人逐房察看,最后到了市长办公室。在那里,他—定感到非常惬意,因为占领者发现他时,他正在市长的长沙发上香甜地打盹。公社社员们认为这是命运给他们的暗示,因此,毫不犹豫地把他这位目瞪口呆的人推选为新市长。



当然，这个群众性民主的童话持续时间不长，因为巴黎的社会主义新市长很快就证明自己根本不称职——他既不能读也不会写。

如果人们指出卡尔·马克思曾把巴黎公社视为革命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典范，这绝没有什么新意。后来，试图原封不动地以这种典范的精神继续思考社会主义理论或将其付诸实践的所有的都遵循这条激进民主主义指导路线。例如，罗莎·卢森堡设想社会主义社会只能是一种从群众运动的自由的、不受约束的、革命的自发性产生出来的制度。卡尔·李卜克内西的思想也相差无几。他的确是在 20 世纪德国伟大的和平运动中受到群众拥戴和赞扬的英雄和烈士。这一运动于 1914 年底以上千名工人的罢工为开端，此后不断发展，到 1918 年以 150 万工人的罢工而达到高潮。1917 年，李卜克内西在狱中写下了一些论点，它们在民主激进性方面完全不逊于“新”社会运动的群众性民主信条。我要引用其中的一句话：“通过教育使群众及每个人具有精神和道德方面的独立性、具有不相信权威的精神、具有果断的自我首创性、具有自由的行动意愿和能力，唯有这样才能为一种胜任其历史使命的工人运动的发展提供可靠的基础，而且是根除官僚主义危险的基本前提。”

在左翼激进派对社会主义的“官僚主义式”蜕化的批判中，“新”社会运动的反制度主义已经被置于首位。新运动试图对问题作另一种解释并提出可供选择的社会化形式。在他们之前，左翼社会主义者和苏维埃共产主义者也作过这种尝试。“新”运动反对在一个按技术官僚统治方式组织起来并由技术决定的社会中使各个个人平均化、佚名化和贬值化。在它们之前，无政府主义也曾这样做过。正如各种流派的左翼激进运动历来所做的那样，“新”运动现在也反对那种深入到日常生活的制度化认识方式和行为方式之中的统治结构。托洛茨基的要求——促使革命成为一项不间断的事业——也毫无二致。

即使“新的”反制度主义运动在基本问题上与“旧的”运动的冲

击方向相同——都涉及通过运动扬弃公开的或隐蔽的制度化统治，它的政治和社会观点毕竟已经改变。随着制度化的、力求占统治地位的认知方式和行为方式在社会变革过程中的不断改变，新社会运动的可供选择的取向模式和行为模式自然不可能再与左翼激进主义的传统模式相同。摆脱造成依赖性的旧的约束和旧的形式尝试，又使人们发现了新的强制——例如，工业标准化和生活方式商业化，还有由于高度复杂的体制强制性的束缚而缺乏自我塑造的可能性，或者社会生活中的“保险国家”组织愈来愈包容一切的现象。

然而，现代社会的发展不仅以诸如此类的限制个人自由的倾向为其特征，而且受到一系列与此完全背道而驰的过程的影响，其中包括以劳动环境的结构变化为基础的不断发展的个人主义化和多元化倾向——它通过人们的自我塑造愿望表现出来。这种倾向表现为对传统规范和权威结构的激烈反抗，对促进新的观念和新的认同的社会形式的追求以及多种多样的亚文化生活方式的形成。新社会运动对官僚机构的控制和监管的抗议，对数据化和机械化的抗议以及对国家监督和核国家的抗议，明确地标出了以人类对自主决定的不断增长的需要为一方与以同样不断增长的对系统控制、对社会过程的技术调节和监管的需要为另一方之间的新的冲突。促使新社会运动形成的凝聚中心不再是由社会结构决定的生活状况，而是一种根据情况而随时变化的由具体问题触发的情绪。如果民主社会主义不是很严肃地对待这种冲突，不把上述反对这种冲突的社会倾向当作为它考虑战略的出发点，那么，它将必然失败。在这里我用不着强调民主社会主义者应该支持什么倾向和反对什么倾向。在争取扩大社会的和个人的自决可能性的斗争中，社会主义者与新的运动可以说是“天然的”同盟者。

随着社会的变化，运动的凝聚点必然转移。甚至“旧”题目——无论是妇女解放、社会的民主化、劳动的未来还是和平的维护——

在不同社会条件下也要以不同形式出现。还要加上以前没有受到注意的新题目,例如首先是人类在生态方面造成的对其自身的威胁。

在我看来,仅仅因为某一运动给某一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早已出现,当然现在的表现形式与以往不一样——提供了相应的不同答案而把这一运动就称为新运动,是没有道理的。如果“目的”,制度化的社会主义不愿成为过时的东西,它也必须根据时代要求表述自己的回答。难道人们仅仅因此就说这是某种“新”的社会主义吗?

然而,生态问题的情况如何呢?事实上,它是新出现的,因为它的确在近几十年刚刚被“发现”。因此生态运动就它的确实具有崭新的凝聚焦点来说就是一场新的运动,而且这使它与具有传统主题的运动、妇女运动、民主化运动或和平运动区别开来。此外,就我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来说,这个新题目具有它特有的动力。与这个运动相联系的对传统的经济方面的非合理性的批判也象题目本身那样新——这不仅是对资本主义经济而且也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原则性批判。因为,不仅已经由马克思证明的资本主义追求利润最高值的趋势和积累趋势,而且社会主义抱着工业增长将保障所有人的福利这一希望来发展生产力的趋势,在这一期间都暴露出对整个人类的继续生存所构成的威胁。如果对社会主义运动来说,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基本矛盾以及劳动的社会安排与劳动产品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引起愤怒的原因,那么,新的生态运动的抗议则是由于生产力发展与环境利用之间的同样基本的矛盾激起的。如果说前者更多地涉及分配问题以及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变革问题,那么后者则更多地涉及改变错误的生活方式,涉及爱惜资源的生产和合理的消费,涉及克服一味追求增长的唯生产主义。因此,新的运动不怎么从属于哪一个特定阶级的角度去认识,而是更多地从技术统治和工具的角度去认识社会权力结构。我不隐瞒,我认

为对于我们今天生活在其中的风险社会来说,这种先后次序是恰如其份的,但要补充说:我们民主社会主义者在赋予全人类继续生存的问题以优先地位时不应该忽视阶级问题。增加社会公正的要求,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必然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质所在。

对于旧的社会主义运动与对于新的生态运动一样,劳动仍旧是关键概念,因为劳动是所有生产和所有生产方式的前提,也是造成技术风险或生态风险的前提。

在大规模失业问题的愈来愈大的压力下,社会开始讨论劳动的未来。主要在联邦德国(当然也在其它国家),民主社会主义与新社会运动的立场观点在这种争论的过程中有所接近。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新的基本纲领草案中,劳动被界定为对社会有意义的活动,劳动概念从而超出了原来的赢利劳动范围——由此产生了对经济生活和家庭生活造成影响的各种后果。新社会运动——替代方案运动、妇女运动、生态运动——的未来设想也主张一种极为相似的劳动概念。

现在我想讨论下述问题:关于劳动的这种新定义根本不是崭新的,相反它与传统社会主义的、甚至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未来观相联系,在这种观念中,劳动不再作为异化了的商品,而是作为人类自我实现的手段而出现。然而,遗憾的是,我不能在此文中就这一重要题目作深入探讨。安德烈·高兹在其新作中对这一问题作了值得注意的论述。

新社会运动至少部分继承了以前的社会主义运动,这是不容否定的。重新界定劳动概念这一例子表明,民主社会主义与新运动之间在关于未来的基本问题方面也有一定程度的内在一致性。而且,不仅“运动”与社会主义之间在劳动这一题目方面的讨论已被证明是富于成果的。和平运动的裁军建议在此期间也列入了外交谈判日程。“无进攻能力”的防御这一概念原来是由和平运动创造的,现在它已写入社会民主党的纲领。

关于技术应对社会和环境有利的问题，关于受到停产威胁的工厂中的产品改变或企业自主管理的问题，工会也早已谈到过。如果没有妇女运动的压力，德国社会民主党就不会对性别比例问题作出决定。如果社会主义政党没有不断地受到反核能运动或生态运动的压力，那么它们一定较难认识到生态问题。

新社会运动以某种“新”思维为其基础。这种新思维在70年代四处传播，因为那时生态危机迅猛异常地变得显而易见。而对生存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毁灭，无止境进步的乐观主义（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曾为之献身）已不再合适。这种毁灭已是有目共睹的了，进步本身愈来愈受到怀疑，很大一部分政治左派陷入一种新兴的文明悲观主义。人们往往将孩子同洗澡水一起倒掉；如果进步导致毁灭，那么导致进步观的思想也必定大谬不然。因此，欧洲的启蒙思想（包括其理性主义）遭到公开谴责，而左派却是从这种思想产生的。

显而易见，“新”运动的“新”思想具有某种毋宁说是保守的、新浪漫主义的特征。当然，我在这里没有给“保守”一词加上它在政治术语中具有的那种否定意义，而是在维护传统价值的意义上运用它。而且，我明确强调，我没有把“向后看”——它使新社会运动与旧社会主义者区别开来——与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向后退”混为一谈。新的运动按照民主主义精神来接受旧的价值，而社会主义的特征则是按民主主义精神来接受新的价值，前者与法西斯主义的“向后倒退的恐怖”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正如后者与斯大林主义的“向前进的恐怖”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一样。

与民主社会主义相比，新社会运动的困难在于丧失了乌托邦的理想，它以不再拥有关于一个更加美好的制度——社会应向此制度前进——的全面观念。新运动的主题随着推动它的浪潮起伏涨落而变换，它们的未来观与激励它们的题目同样具有局限性。由于不能从乌托邦理想获取养料，它们缺乏坚韧不拔的持久性。（这类单项运动之所以不能耐久，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它们没有涉及

真正的生存保障问题——经济政策,社会福利政策,劳动市场政策)。与此相反,社会主义者不允许抛弃进步观念以及可以达到更美好状态的信念——恩斯特·布洛赫称之为希望原则。谁如果把社会乌托邦理解为政治行动的指南,就要相信进步的可能性,否则他就会丧失希望。针对来自新运动的诽谤,民主社会主义必须捍卫启蒙运动的原则。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者在进步的道路上不应该问或停下来回顾一下——正如瓦尔特·本杰明在其历史哲学论文中所建议的那样。恰恰在风险社会中,守成时期也是进步的组成部分。不管人们对新运动厌恶进步的态度怎样批判,它至少促使社会主义者得出下述认识:不能用一种天真的“对进步狂热欢呼的乐观主义”来争取未来。因此,新运动在把社会现代化提高到更加慎重的层次——在此层次民主的控制机制可以更有效地发挥作用——的过程中也参与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

新社会运动的特征——与社会主义运动相比显然是新的特征——是公开表明反理智主义:除了丧失乌托邦理想外,再加上丧失理论。我认为这两者相互联系。虽然68年学生运动已经采用了后来运动的行为方式,但是它仍完全囿于社会主义左派的传统,总是努力从某种包罗万象的社会理论的论证出发来指导它的政治行动。当然,它的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分析联系在一起的期望——它寄希望于工人、工业社会的边缘群体或第三世界解放运动——是靠不住的。失望导致理论僵化成教条,68年运动瓦解成一些宗派。但教条没有为新问题提供任何答案。“新左派”的理论似乎丧失了解释新一代的经验、希望和恐惧并且把这些聚合成新的乌托邦理想的能力。

这样看来,新社会运动与传统工人运动的决裂也是摆脱“某某主义”的决裂——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还是简单朴素的社会主义。如果我说这种决裂也有其益处,那么我不是以此来

为“新的”敌视理论现象作辩护。我无须宣布，对最新的左派来说“修正主义者”的称呼不再是一个谩骂的字眼，而这一事实对民主社会主义多么有利。与“主义”的决裂是必要的，因为它有利于社会主义者摆脱意识形态重负，有利于他们更为实事求是地解释现实。决裂之所以必要，还因为社会主义（尤其在东方）已经处于困境。在那里僵化了的教条也在瓦解。

生态危机使得社会主义理论的弱点暴露无遗。新型运动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工人运动中相沿成习的制度化政治思想已不能控制这种危机（新社会运动总是产生于重大问题不再可能在传统的政治任务范畴中得到解决的时候）。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社会主义者现在应该象新运动那样没有理论性。相反，如果左派的旧社会主义方案不再有效，那么，构想新方案恰逢其时，这种新方案不仅依靠抗议而生存，而且从关于美好社会制度的乌托邦理想中汲取精神力量。这种精神过去曾使社会主义包含比仅仅抗议资本主义的运动更多的东西；而现在正是这种精神最明确地象征着民主社会主义与新社会运动的区别。

现在，我们亲眼目睹了共产主义制度由于缺少自由和民主而陷于瓦解。社会主义理想由于这种瓦解的确可能受到损害，而这种瓦解却提高了资本主义效益的魅力。由此可见，正是现在左派需要一种新的自由的——社会主义的方案，左派可以拿这种方案来与共产主义计划经济的破产对比。如果这不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时刻……！那么还有什么别的政治力量能够在普遍不知所措的情况下为左派制定和实施一种预示未来的方案呢？当然，为此目的民主社会主义必须再次置身于真正的“运动”之中；充当左派就意味着要从事运动。

我已经从多方面谈论过的新运动还产生于对社会主义的无所作为状态的抗议——与其说是对社会主义本身的抗议，不如说是对它在表面上或实际上的无所作为的抗议。并非只有东方的“现实

存在的”非社会主义才是无所作为的。我们不要自己骗自己：用社会主义乌托邦理想所预见的东西为衡量，社会主义——凡是在它取得国家权力的地方——都没有做出多大成绩。社会主义更多地是以采取反对派态度获得历史成就的，它是处于反对派地位时获得伟大胜利的。这适用于共产党人——人们只须将他们在反对法西斯独裁的民主斗争中的功绩与他们在自己的统治范围内所容忍的糟糕的民主状况相比就够了。这同样适用于民主社会主义者。他们最伟大的历史功绩——自由的社会福利国家——是通过反对资本利益的工人运动争取到的。我有意识地说“争取到”，因为为此目的所需要的手段，无论罢工还是群众抗议，都更多地是反对派手段而不是统治艺术。

我并不是要说，在这100年中一再在西欧社会民主制中当选执政的社会主义政府是不好的或完全多余的，相反，对于使社会主义运动的自标合法化来说，它们是完全必要的。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政府将以前工人运动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提上了日程，例如，在德国，1918年由革命将其推上历史日程的民主体制需要由社会民主党政权来加以巩固。而且从原则上看，在68年运动参加者唤起的改革狂热使社会民主党重新执政之后，1969年的发展进程也毫无二致。在60年代，社会运动为改革提供了政治和社会气候，而其中不少改革到70年代初才从制度上得到了保障。

有些人低估维利·勃兰特和赫尔穆特·施密特的社会党与自由党联合政府的功绩，我绝不是这样的人。因此，如果我今天认为社会党自由党联盟随着时间的发展后来丧失了它最初的改革热情，那么这绝不是指责某个人。德国社会民主党全党都容许使它的改革方案国家化，都容许改革方案在脱离最初倡导它的那些社会运动之后，在国家机构的行政管理之下勉强维持。在这方面我不愿被误解。我自己非常了解，必须对付客观事物的强制力量，社会党政府也不能绕过这一事实。但是按照社会主义的理解，执政应当



比对付客观事物的强制力量做“更多”的事。

那种来源于社会运动的推动是这个“更多”的组成部分。

由于局限在国家行为上,在70年代末期德国社会民主党不再能够接过由新社会运动在社会中发起的改革政策并使其在制度上确定下来。结果是大家都知道的:改革阵营由于“绿党”分裂出去而削弱。社会民主党此后只能依赖国家这一条腿。但是,人们用一条腿走路(如果还能走的话)难免步履艰难。尽管如此,对于一个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来说,甚至当它是执政党的时候,要架起通往社会运动的政治桥梁,也根本是不困难的。何况经常的情况是,它的成员非常积极地参与“运动”。例如,社会主义民主党人使西德和平运动成为真正群众性的运动;社会民主党人——首先是艾哈德·埃普勒——是西德生态运动的理论先驱。毫无疑问,政治权力的丧失使德国社会民主党更加容易同意新社会运动。西德的抗议运动在1983年,也就是在保守派取得竞选胜利之后不久达到它动员的高潮,这并非偶然。

民主社会主义只有在其本身仍是一个运动时才能够实现自己提出的要求。如果它不再是一个运动,它就必须再次进入运动状态。而且它不应该仅仅在处于反对派地位时才是一个运动。它必须做到在它执政时也能维持国家权力与运动之间的困难的平衡关系。一方面,这意味着除了对付客观事物的强制力量,还要接受来自社会的解放冲动,并使其转化为政策。另一方面,这意味着,为了有利于工人运动的高度自由的传统,要限制黑格尔主义的国家干涉主义的强大传统。

这是为符合时代要求的非国有化提出的辩护词。未来将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民主,取决于左派能多大规模地实现公民对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参与。由国家承担监护个人责任的帝国主义(die Individuen eutmächtigender staatlicher Verantwortungsimperialismus)最终将引向绝路,这也是值得从共产主义世界的发展中汲取的教

训之一。因此,未来也应当使责任民主化。在这方面,新社会运动作出了重大贡献。它们已经打破了专家对决策权的垄断,而且使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的方式及对其进行社会控制的方式等问题成为公开进行的政治讨论的题目。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构想其它社会发展模式的可能性才进入人们的视野。民主社会主义可以放弃这种动力吗?

民主社会主义与新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必须超出两种政治左派的社会力量——一种具有权力意识,另一种则提出挑战——的和平共处状况,而达到——一种共生状态,我只能把社会主义设想为一种“运动”,它也从其它许多左翼社会运动中汲取精神的和政治的动力,但是这种动力与这类运动的短暂性相比,是由一个全面的计划武装起来的。因此,社会主义运动不能当作一种时髦商品来推销,它的批判锋芒也不能被剥夺和磨光。

现实政策与抗议之间,责任与乌托邦理想之间,国家权力与社会运动之间的创造性的辩证张力关系,甚至在那些以社会主义思想的名义进行统治的地方也不应该被破坏。我懂得,说易行难。但这是使社会主义政府在通往未来的道路上不仅仅总是成为插曲的前提条件。

(原文为德文,陈育国译,殷叙彝校)

---

## 当代社会主义的“空白领域”

亚当·沙夫\*

“空白领域”这个词本是绘图学术语。在古代用它来表述未考察过的大陆，在现代人们则用这一概念来表达尚未精确测定的大陆及其某些部分，如河流走向等。因此，“空白领域”这个词的涵义非常清楚。在人文科学的其它领域一般是作为比喻来使用这个词的。这时它的涵义具有不确定性和多义性。但在每一个具体场合的涵义则是明确的，不过为了避免前面所提到的多义性的危险，需要作些补充说明。

虽然我意识到了这种危险，但我在这篇思考中还是决定使用这个概念，因为我相信，用这个概念至少还是可以把我心里想说的事情讲明白的。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产生了一大堆没有答案的问题。但是，既然我想自觉地从事我的研究工作，我就应当根据自己的理解予以解答。回答这些“困扰者”我的问题促使我奋笔疾书，正是这些问题令我难以平静。正因如此，选题的多样性是我的所有著作的基本特点。

社会主义危机鞭策着我去分析思考，同时，对当代社会主义“空白领域”的关注激励着我参与创立和发展“未来的社会主义”这一国际组织。该组织从一开始就得到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支持，它

---

\* 亚当·沙夫：波兰科学院院士、原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为建立当代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运动新的“意识形态国际”奠定了基础。它的活动最初仅限于欧洲，但预计最终会扩展到世界其它地区。这是件极好的事情和光荣的任务。但它要求首先进行深刻的反思。鉴于所说的这个运动目前所处的形势，这种反思本身就是巨大的成绩。

种种原因不允许我们沉湎于“教条主义的昏睡状态”。一个令我绞尽脑汁的问题是：我们应当怎样理解“社会主义”？如果我们要谈论未来的社会主义，那么搞清这个问题就是绝对必要的；如果我们准备接受不太遥远的未来的挑战的话，那么就不能避而不答这个问题。

当我开始投身于所说的这项工作时，立刻遇到了一个“空白领域”：虽然我“有根据地”确信我对所研究的课题还是具有一定知识的，但在回答带根本性的问题时却遇到了巨大的困难。而不解答这个基本问题也就无法回答其它一系列问题。我越是深入思考，发现的“空白领域”就越多。因此，我感到需要对“空白领域”问题进行详尽的研究，至少可以抛砖引玉，就这个题目展开讨论。

我个人相信，目前工业革命所产生的社会后果，新的生活方式（至少我认为，它们还带来了一种新的社会主义）都迫使我们去完成这项工作。什么是新的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基本问题。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填补当代社会主义地图中的“空白领域”。我的全部思考的意义就在于此。我再说一遍，我自己要设法搞清楚一系列问题。

在转入我所思考的问题之前，我想借于这一开场白使这个任务变得稍微容易和准确一些，如果说对于某些与“空白领域”、“社会主义”和我借用这些术语、概念所表达的涵义有关的问题还没有找到最终的表述形式的话。

如上所述，“空白领域”这个词是我从其它学科借来的，我是作为比喻来使用的。因此需要解释清楚我借用它所表述的内容。我

从开始就这样做了,以避免由于我所使用概念的多义性使我的反思过程变得更加复杂化。

在我们这方面,“空白领域”可以意味着“未知领域”,包括真的或者假的“未知领域”,即出于各种原因,使人们讳言的以往事实的各个方面。这就是历史的“空白领域”。

当前在波兰被广泛使用的正是这个意义上的“空白领域”。人们通常用它来表示过去被禁止涉及的有关波苏关系的一些事情。我认为例如包括 1937 年共产国际下令解散波兰共产党和斯大林的镇压机关对波兰共产党人的大批杀戮; 1939 年由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签定的苏德条约中有关瓜分波兰的秘密附加条款; 12,000 名波兰军官被杀害,其中 4,000 人被害于卡廷,其它人死于何处? 1944 年,已推进到距波兰首都仅有几公里的苏联红军眼看着华沙起义遭到失败而按兵不动;在苏联和波兰军队解放波兰东部地区后,结束地下状态的科拉约瓦军队中的波兰抵抗力量官兵被逮捕并被驱逐出该地区等许多问题。这些事情具有很大的意义,虽然不时有人只是尝试公开地大声说出人们反正已充分了解的事情,这涉及到对事实的承认。我不象一些波兰人或外国人一样,我对这些或另一些类似的“空白领域”并不感兴趣。总之我们谈论的不是历史,不是它的阴暗领域。

“空白领域”这个概念还有另外的意义,在这里它使我们颇感兴趣。“空白领域”可以同今天的现实和我们对这个现实的认识联系起来。如何理解作为政治运动和作为一种结构的社会主义?——这是我们感兴趣的方面——还有许多十分重要的这一类问题。不言而喻,这里是指当今具有多种具体表现形式的广义的社会主义运动所面临的问题,是指那些在经典作家所撰写的社会主义“圣经”中找不到答案的全新事物,它们不仅没有存在于我们生活的环境之中,而且我们也几乎无法对它们作出预测。这迫使我们运用自己的思维,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解决问题。

这涉及到例如关于对当前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后果的分析,关于这些后果对于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对于结构性失业的增长、对于工人阶级的逐渐消亡等问题所起的作用。也就是说,这些由工业革命引起的现象正在以各种方式改变着社会主义运动的竞赛规则、它的目标和行动,如果要使这个运动更为现实的话。

还有,如何对待广义的社会主义运动中马克思主义阵营的马克思主义?它们的行动是建筑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意识形态之上的,而客观现实的发展已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所依赖的基础面临被摧毁的危险。这主要是指无产者的逐渐消失和与此相联系的剩余价值、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许多其它内容。还有,由于对宗教改变了立场而形成了一种新的局面,而这恰恰是因为宗教运动扮演了一种革命的角色并且有意识地把自己同作为制度的社会主义联结起来,把它及它的意识形态解释为社会发展的目标。

还有关于群众运动问题。这些运动今天已成为社会主义运动客观的同盟者,而以前则完全没有出现过,因为其存在的理由尚不具备。例如生态运动,它正日益发展成为广泛的群众运动,或者再如妇女运动,由于它的人数和运动水平也应当属于这个范畴。我在结束列举这一系列事例时,最后要提出这个我们始终高度重视的命题:即我们今天应当如何理解社会主义?

不能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就很难甚至不可能自觉地从社会主义运动,从而更难于思考未来社会主义的问题,并在这个意义上找到预见性的口号。这不仅因为今天的客观现实已发生重大变化,而且因为“社会主义”这个词长期以来已出现多种含义的弊端。另一方面,在语言交流和或多或少带研究性的思维过程中都无法阻止人们漫不经心地对待这个概念以及过分滥用它。

可见,“空白领域”可以同未来相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就是未来,因为人们在现在还无法认识它,它本身就成了一个“空白领域”。但这并不是指对未来进行猜测,或者对将要发生的事情作

出预言。而是指要使预言兑现,甚至具备科学的准确性,在这里出发点是我们今天人所共知的事实以及其推动力的可能运动速度。

如果我们摒弃一切机械的、僵化的认识方法,在我们所掌握的现有认识的指导下我们就会因此承认,日益加速的结构性失业现象作为生产技术领域革命作用的结果将不断发展。由此产生了两个问题:一是如何保障那些丧失传统意义上的工作岗位的人们维持生活;二是如何确保这些人获得新型劳动岗位(即从事于对社会有益的就业活动),否则社会就会蜕化堕落。这种病理演变对于青年人是尤为危险的。

在这种未来的蓝图中,还有另外一个“空白领域”,现在已引起我们的注意,而当代的经验使我们有可能用以解决未来的问题。正因为如此,本文将在预见未来一节中对此进行阐述。我们认为,这就是社会主义对待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态度问题。在历史上,曾把废除这种所有制理解为取消有产者阶级和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并把它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基础,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尽管如此,现实的社会主义历史在这个领域还是给了我们很大的教训:仅仅消灭私有制还不足以建立起广义上的社会主义制度,它并没有保证社会主义在两种制度的竞赛中对资本主义的优势地位。70年竞赛的实际经验迫使那些极端的教条主义者竭力退缩回避。而这种后退本身就有一种投降的意味。于是就重新出现了马克斯·韦伯和其他人早在上个世纪末就曾辩论过的老问题,即生产资料的国有化与社会化的关系。

另一方面,技术工艺的进步为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塞鲁姆佩菲尔就此提出了一个公式:“小的是美好的”。他从他的那一方面,以全新的方式提出了生产领域的私人所有制问题。那么,现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究竟在哪里?这个问题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只有在未来才能作出理智的回答。但是它现在已经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目前从这个问题又引出许多疑问、怀疑

和争论,今天,由于人们所积累的经验不足,归根到底它还是一个“空白领域”。

在这个视野内还出现了许多其它“空白领域”。其中一个如继续教育问题。每个人一生中都应该在社会的帮助下经历这种继续教育过程,同时社会也必须为个人建立相应的机构,并保证他在业余时间内利用这些机构。在历史上人们曾多次谈论这个问题,例如古希腊的柏拉图就研究过这个问题。但古希腊哲学家所阐述的这个问题,其标准和涵义都与现代有相当大的区别,与未来则相差更远。

在建立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出现的令人失望的各种反面经验还提出了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个人道德的培养教育问题。在19—20世纪之交同所谓“伦理社会主义”曾进行过一场论战,以“伦理”学派的失败并被逐出工人运动的革命阵营而结束。马克思主义哲学也研究伦理道德问题,但与我们这里所关注的命题完全不同。这涉及到这个命题在社会主义运动实践中的地位、在亲社会主义立场人们的内心中所处的地位。马克思主义者理所当然要注重政治与经济问题,而一向把伦理道德纳入与大众心理有关的一般性问题予以轻视。因此,如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反面经验所表明的,人们必须重新提出培养造就社会主义新人的问题。这又是一个“空白领域”。

最后还有纯政治上的“空白领域”,即在以往导致社会主义运动分裂的原因业已消失的情况下,这种分裂是否还应继续下去?或者说,人们应预见社会主义运动在未来将重新统一并在这一方向指引下继续前进。

以上是一些例证,这些事例所说明的问题正是我们所关注的对象。事实上,在我们的“菜单”中可点的“菜”要多得多。尽管这张需要思考的问题清单并不完全,但这份不完全的清单已表明,我们必须从中选出几个问题,不要使我们所作的这篇随笔文章变成宏



篇巨制,尽管如此,我还是相信,指出问题的多元性是应作之举,这种多元性是很重要的,也应列入“空白领域”。

在结束上述解释之前,我想简要谈一下“社会主义”这个词的多义性——这是一个我现在考虑较多的问题。在此我只想重提一点,即人们往往在不考虑其多义性的情况下使用“社会主义”这个词。有时是在“社会主义政治运动”的意义上使用它,有时是指社会的社会主义构造(制度)。毋庸赘言,二者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但如果对此只字不提,则容易在考虑问题时引起一系列严重混乱和错误。因此,为谨慎起见,我提请首先注意到这一点。其余的则要从我们的中心思考中得出结论。

### 亲社会主义运动目前形势中的“空白领域”

我从上述列举的问题中选出那些我认为迫切需要尽快阐明的  
问题,以便于我们更有成效地探讨未来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些选题  
如下:

一、在考虑社会主义的未来形式时,我们应该怎样理解“社会主义”这个概念?

二、当前的工业革命对于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具有什么样的影响?

三、社会主义运动应对当代各种群众运动采取什么态度?尤其是必须如何同宗教社会主义运动和与之有关的社会运动进行交往?

“社会主义”一词历来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反义词而被广泛加以运用的。这种用法不会受到任何大的阻力,我们也没有去深入思考社会主义的内涵。当它涉及社会问题时,事情是十分清楚而且是

人所共知的。但只要我们稍微推敲一下，就会感到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社会主义”一词是多义性的，其内涵缺乏明晰度。

现在我尽量不涉及多义性，上面已经谈到把“社会主义”这一概念作为政治运动或者作为社会结构来使用。我们目前在使用这一概念时，二者无疑是有区别的。在这里，我们感兴趣的首先是“社会主义”一词中与社会政治制度有关的涵义。这种制度是社会主义运动努力建立的，并且由这个运动的意识形态作了舆论准备。

在同“现实社会主义国家（这是这些国家的自称）并非社会主义”这一命题的拥护者讨论时，我遇到这个问题，应当提出的是，在左派之间也展开过这种辩论。而政治上的右派并不否认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国家中所出现的变形正是人们从对社会主义的期待中所得到的唯一结果。因此这一讨论是在左派中进行的，他们对这些国家存在的政治畸形感到困惑迷茫，因为它与这部分左派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主义格格不入。

至于我的态度，我不会为这类畸形和它与理想社会主义的矛盾冲突进行辩护。但我历来坚持并将继续坚持这种观点：如果用马克思所主张的社会经济结构（即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性质）的基本定义来衡量，那么从这个角度上说上述国家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其现存的上层建筑却同公认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相矛盾冲突。我认为，正是这一矛盾给了社会主义拥护者以重要启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革命和消灭由资本家所构成的阶级并不是建设具有自由、平等和博爱这些特征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充分条件，在一定环境下，在生产资料国有化的基础上甚至会出现一个具有共产—法西斯主义结构的社会。

如果考虑迄今为止所积累的大量经验，那么我认为就应当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一启示。一部分左派要同目前社会主义所建立的社会在实践中划清界限，无视几十年来全世界一直将其视为社会主义国家和它们一直以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方式存在这一现

实,而采取了不承认其社会主义性质的做法,这种简单化的做法是幼稚的,甚至是政治性错误。为了避免在未来时代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扭曲,就不能无视,而应正视并深入研究这一现实。

以上只是我们在我们所关切的主要范围中所做的简单说明。我想说的是参加辩论使我抛掉了错误的见解。在这以前我一直认为“社会主义”一词是没有多义性的,现在我认识到它是有多种涵义的。例如:当我用该词仅仅表示某一涵义时,那么我的精明而内行的论敌就会指出我的错误并否定这种用法,从而促使我去认真思考其广泛而多样的涵义,使“社会主义”这个词所包涵的多义性充分展示在我面前。

决不要轻易下结论(包括根据马克思的以现存所有制关系对社会结构进行分类的方法下结论),而应当对社会的整个基础进行仔细分析,以确定其社会政治制度的社会主义或非社会主义性质。社会的构成不仅包括(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基础,而且包括一定的上层建筑。但是,当我们进行分析研究时就会发现,“社会主义”这个术语和概念又碰到了那些老问题:社会主义的一种概念被许多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概念所代替,以至无法确定哪一种概念更为准确。社会主义概念的真实涵义应当根据各种极为复杂的情况和条件的总和加以确定。在这里,引用经典作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也无济于事,因为他们有意避免对这个问题作出定论。列宁的话则更不能作为依据,因为它只能代表参加争论的一部分人的意见,并非所有人都承认其权威性。鉴于这种情况,就应当承认(作为制度的)各种社会主义概念的现实性,用以说明各种自称为“社会主义”、有时甚至是朝相反方向运行的政治运动的多样性。社会主义思想史和社会主义运动中各派彼此仇视的现状向我们表明,这样认识问题是正确的。“自我残杀的”斗争也说明了这一点:如果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不发生分裂,那么希特勒就不会上台;如果在西班牙内战中,共产党人、社会党人、无政府主义

者和托洛茨基主义者不彼此残酷斗争，那么佛朗哥将军也不会获胜。

为使“社会主义”这一术语现有概念的多样性更加鲜明，并使其多义性更加突出，我们应仅限于引用在这方面的论战中使用的一些“定理”。要更加精确地表述这些争论，需要争论双方通过辩论详细阐述各自的观点和论据，然后再举行“圆桌会议”对其加以分析和讨论。如某些长期（其中有些已长达100多年）争论的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国家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作为行使权力的工具的国家和劳动者强制机构的国家将逐渐消亡。同时他们指出，国家还具有管理物质和文化财富的职能。而有些人则常常乐于“忘记”后一点）与无国家的社会主义（如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及其拥护者和继承人的无政府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这是当代社会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借助于恩格斯的权威和他对议会制度及其作用的看法提出的主张）与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这是列宁的主张，他出色地运用了马克思的有关思想。但是这些思想被布尔什维克进一步加以解释并被共产国际运用于各个不同的国家）；官僚社会主义（这是对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实践经验的总结）与人民自治社会主义（主要指南斯拉夫脱离共产国际之后实行的社会主义，它得到了以第四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为首的许多反对斯大林主义的人的赞同）；计划经济社会主义与“市场”社会主义（但对于什么是“市场”社会主义，其中包括对生产资料所有制这一复杂问题的看法不尽相同）；一党专制社会主义与多元社会主义（在两派之间的争论是民主社会主义与专制社会主义之间的争论的一部分。但我们这里所说的是更为重要的方面。尤其是从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来看，我们在分析问题时应对此予以特别关注）。

我曾经说过，“菜单”中可点的“菜”很多，但从已经上桌的“菜”来看，我们所遇到的是极其复杂的问题。知情者都非常清楚，这全

是些没有现成答案的问题和地地道道的“空白领域”。本文决不算参加就上述问题展开争论的双方中的任何一方，更无意加以评论。各种观点、意见、定义和理论都可以成为某一次或多次“圆桌会议”关注的对象。对各种观点的可能的综合与评价应当产生于学术交流之后，而不是它之前。

这是否意味着目前我们对“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其中包括以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为依据的、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社会主义概念）还缺乏真正的了解？怎样才能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将其拥护者统一起来？尽管他们之间存在着相当深刻的分歧，他们以各自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解释作为自己信念的出发点。回答显然是肯定的，根据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来看，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存在着一个有利因素，即他们都坚信，消灭人剥削人的一切形式是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主要目标。其余一切，包括“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都从属于这一基本原则，是对它的说明和补充。

但是，承认消灭人剥削人这一原则的人是否就能表明他是社会主义者呢？只要我们稍加思考，就会发现这一原则的概括性和深刻性，它完全能够成为社会主义者统一的基础。我是1956年10月在华沙认识到这一点的，当时，刚获释的弗拉基斯拉夫·哥穆尔卡在一次大规模群众集会上提出了这一原则。我想他的这一结论是在斯大林时代的单人囚室中形成的。老实说，当我头一次听到这种提法时，我深感自己对马克思主义者有关社会主义定义的各种观点缺乏了解。在经过深入研究之后，我坚信，哥穆尔卡的提法是正确的，而这些观点（不论其类型和属性）无论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与社会主义的实际内容相比都只能屈居第二位。这一真理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者之间存在着一致性，尽管他们的看法有差异，甚至有很大差异。例如，有些人，即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他们根据马克思的理论所选择的价值体系（这正是我们所说的根本问题）是正确

的，而另一些人则信奉解放神学，<sup>1</sup>他们从上帝那里得到启示。但这种差异无法剥夺任何人探索未来社会主义新的和具体形式的责任。不过，这种探索应以迄今为止社会主义发展所积累的全部经验和当代新的工业革命所造成的社会环境为依据。

## 二

社会发展的逻辑必然要把我们从当代社会主义（不论将其理解为社会政治运动还是现存社会主义国家所说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空白领域”带向另一个“空白领域”，即当前的工业革命造成的社会后果正在对社会主义产生（显然还将继续产生）什么影响？

我曾多次写过这个问题。在这里，我禁不住又一次提到它。因为我感到，思维方式的不可使分为赞成和反对社会主义这两个营垒的那些有头脑的人们无法在如此简单明了和不容置疑的论点上达成共识的唯一障碍。因此尽管可能又一次遭到非难，但我还是想从探讨“空白领域”的角度再次提出这个问题的主要方面。当前，思考问题的内在逻辑需要这样。鉴于我已就此发表了包括《我们怎样认识未来？》一书在内的许多论著，所以，在这里我只简述一下其中的重要内容，有兴趣深入探讨这个问题的读者请参阅拙作。

当今世界正处在一个由新的工业革命所引起的变化时期，尽管由于各地区的发展水平不同，这种变化的程度亦有所不同。这一革命的基本动力之一就是，电子学领域的重大突破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和服务行业自动化和计算机化。这一进程在社会领域导致了

---

<sup>1</sup> “解放神学”一词源自天主教神学家古斯塔夫·古铁雷斯于1971年出版的《解放神学》一书。解放神学是一种把基督教对贫苦大众的怜悯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罪恶的分析相结合的神学理论，它主张被压迫民族通过暴力获得解放。这种理论70年代曾在拉丁美洲盛行一时。——译者注

大规模结构性(技术性)失业。早在1930年,本世纪最杰出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预见到这种现象是无法消除的。到60年代,美国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密尔顿·弗里德曼和詹姆斯·托宾重提凯恩斯的学说,当然不是简单地重复。他们被公认是自由市场经济的“鼓吹者”。为了清除赤贫化过程带来的经济后果,他们提出实行“非劳动收入”。随着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即雇佣劳动的消失(马克思称之为Ich — Arbeit)以及工人阶级的消亡,将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即必须保证人们获得与传统概念上的劳动无关的一定水平的收入,这就涉及一个全新的更广泛的概念——从事各种有益于社会的职业(显然,不这样做就使社会堕落,而受到这种社会病态伤害的则主要是青年一代)。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怎样不厌其烦地在“社会主义”前面冠以“民主”或“改良”之类的形容词都于事无补。直言不讳地说,我讨厌这些“陷阱”和“迷彩服”。因为我深知,这无助于解决任何问题,充其量不过是一块体面的“遮羞布”而已。唯一现实的出路就是重新分配社会产品。不这样做,就无法保障“非劳动收入”的经济来源。在这里,我应当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从彼岸进行报复的见证人。因为“民主”与“改良”等提法的目的在于掩饰现实。但真正的革命(即使这一革命是通过民主和改良的方法完成的)已出色地表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基础的根本变化必然要引起上层建筑的变革这一基本论点的正确性。莫里哀笔下的汝尔丹先生\*在当代的追随者用他们惯用的平庸语言说:真正的革命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他们为自己的发现而沾沾自喜,但又对它存有戒心。毫无疑问,革命至少已出现在经济制度方面,同时在社会结构的其它方面,如阶级关系、政治制度以及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化等方面正在发生

---

\* 汝尔丹是17世纪法国著名古典主义文学和喜剧作家莫里哀的作品《贵人迷》中的主人公。他羡慕上流社会,向往贵族生活。——译者注

明显的变化。也就是说，我们正处于整个人类文明（即人类精神和物质文化）的变化时期。任何对于这种有着巨大困难和强大阻力的发展前景熟视无睹的态度都是极其危险的，因为在这一变化时期，仓促应付将会付出可怕的代价。

有必要谈一谈受到上述变化进程影响的新型社会主义的前景。凡是没有患心理学上称为“封闭心态症”（孤独癖）的人都知道这里所说的是新的社会主义现象。我之所以特意把“新的”一词与“社会主义现象”连用，是为了用以表示当代社会主义的“空白领域”。确切地说，这个“领域”的规模宏大，意义重大。因此，必须立即着手对它研究，而且不应担心犯“忌”和打破传统的研究禁区。拖延是危险的。在这个问题上，求助于马克思和圣经都无济于事，因为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在革命意义上的全新的形势，所以，只能依靠我们自己的聪明才智。

概括地说，就是当科技革命（主要指在生产和服务行业）的结果不再需要人的直接劳动时，这种劳动方式将逐渐被淘汰，随之而来的则是结构性失业的不断增多。某些批评家试图把这一论点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用以暗示它是不可信的。但上述论点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正常思维的结果。它不是来自书本，是源自实践与合乎逻辑的推断。马克思及其成为经典作家的追随者们并未谈论过这个问题（马克思在19世纪中期写的《大纲》中提出的某些预言除外）。凯恩斯在1930年以富有说服力的方式曾谈到过这个问题。运用马克思的演绎法（即在客观阐述事实的基础上对未来做出一定的预测），对于所选择考德的这个命题是无法作出结论的。不过这个命题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上面已经指出了，也就是说在社会基础方面出现的变化必然要引起上层建筑发生相应的变化——这种情况实际上也已经发生了。由此当代整个文明预计也将

· 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1857年——1858年草稿》。——译者注



要发生一场革命。

马克思确实在他的基本理论(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中已经讲到这一点,但是“尽管如此”,这却是符合事实的。我在这方面曾多次听到人们说“尽管如此”,象这里所说的那样。25年前一位计算机方面的著名理论家 and 实践家在向我讲述“电子”与社会进步的关系时,我回答他说,“马克思早在100年前就说过了”。这使他感到非常惊讶。“尽管如此,但这是符合事实的”——这句令人陶醉的话是一种惊恐情绪的证明,在一定范围内说,这种惊恐不是由马克思的名字引起来的,而是由于他的理论至今仍具有生命力这一事实引起的。

让我们再重复一遍“尽管如此,但这是符合事实的”这句名言。如果我们所说的作为当代工业革命的结果而引起的结构性失业是不可避免的观点得到证实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确定所讲的这场革命的结果将使社会主义在其社会领域面临着一项崭新的、内容广泛的任务。

通过人们正常思维就可以得出支持这一观点的论据(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并不是得出这一结论的障碍,也不是必要条件)。如果结构性失业是当代工业革命的内在现象,而且这一现象仍在持续增长的话,社会就必须至少采取两方面的具体措施:1、保障不再从事雇佣劳动(这是与失业不同的概念)的人们具有适当的生存手段;2、为人们提供有益的社会职业以取代传统的雇佣劳动。

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指出的,我曾多次谈到过这个问题,因此本不应再多费笔墨,但我还是想重复一下总的结论:我们面临着实际面具体的现实问题。关于社会必须采取具体措施的论断则为我们展示出社会主义新的前景。这一新的前景不仅表现在所要求推行的措施生效后所形成的社会结构方面,而且还表现在以实现这一社会结构为目的的社会政治运动方面。不对社会产品进行重新分配,就无法筹集必要的资金用于解决大规模结构性失业和重新组

织劳动——不是雇佣劳动的劳动，而且要把劳动理解为于社会有益的就业——的问题。这种重新分配是摆到日程上很重要的一点。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立即着手研究社会经济结构和随之而来的社会政治结构改造等重要问题。

可以郑重地断言，正在孕育中的我们所领会的这个新社会不同于现存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后者无论在经济还是在社会政治结构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人们也可以说它也不会是传统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社会，因为后者是不会以必须赋予崭新意义的非资本主义的劳动方式为自身基础的。那么未来的新社会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呢？这对于所有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首先是社会主义运动（最广泛意义上的）都是一个最迫切的问题。

### 三

我们在着手研究当代社会主义的“空白领域”和不久的将来（约30—50年，如果下一代计算机还不能缩短这一期限的话）对社会主义的挑战时，将尽力回答这个问题。但我认为，在研究与未来有关的问题之前，我们应当在我们思考处于目前形势中的社会主义运动的“空白领域”（这个问题正是我在这一部分所要探讨的内容）的基础上，还要研究一些与这一运动结成同盟的运动的运动。总之，我们必须彻底研究这样一些群众运动，根据他们的观点，是要建立“新社会”，或者为社会主义提出了一项新的任务。

显而易见，正是由于在传统的亲社会主义运动史中这是一个新问题，因此需要进行新的探讨，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空白领域”。但应当注意到在这整个命题中各种事物内在的逻辑性。如果从人的正常思维出发（我再说一遍，能够这样思考问题的人，并非都是马克思主义者），那么我们会看到生产和服务领域的技术工艺革命必然引起社会生活其它领域的变化，并相应改变其整个功能机制，而下述结论也是完全正确的：这种变化同样会（虽然是以另外

的方式)影响到群众性的社会政治运动,这是在科技革命道路上一个独一无二的对应物。因为它是一种主观因素(人)与客观因素,例如社会生活的经济基础的结合,或多或少地是自地发展起来的。如何理解社会发展中的这种新社会主义倾向?人们可以把这种主观因素的影响同上面所说的客观因素的影响作一比较。但这绝不是说,主观因素的发展,唯一而且仅仅是科技领域革命(客观因素)的结果。二者存在着一定的相互依存性。但这不能说成是使我们感兴趣的那些现象的原因,它不是一种单方面的依赖性。相互依存的基础来自其自身的反馈。

这些问题的新颖特点和重大意义无论如何都已显示出来,而传统的亲社会主义政党又无力提出实践口号,于是就又出现了使我们感兴趣的“空白领域”现象。这里所说的重大问题不仅是因为它涉及到当代社会主义运动(指广义的)的“空白领域”,也许,在更大的范围内还涉及到未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命题既把社会主义当作社会运动,又是指它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建构所具有的意义。此外还特别涉及到对以宗教为基础的运动所持的态度,这种运动的潜在力量显然正在增长。

本文无意对如此广泛而复杂的问题的细节进行详尽的分析,也不想对我们所提出的问题作出最终的答案。任何这种企图都是不负责任的,甚至是可笑的。但我们能够提出现实问题并将其与一系列理论问题相联系。

如果人们只是寻求一般性的估计,那么确定对于生态运动、妇女运动、青年运动及其它运动的立场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认识到这些运动的存在并承认其相对的独立自主权(即使传统运动在自己的行动纲领中可以而且必须包括这些表态和问题),这也就够了。这些运动对于社会主义倾向的支持,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传统运动本身的策略。而这一点又首先取决于传统运动对这些新问题的理解和开放程度。这件事并不是什么重大的理论问题,仅仅需

要同教条主义决裂。

当前,一种与宗教相联系和以道德原则为基础的革命的(反资本主义的)群众运动非常引人注目。在世界上,这类运动的数量日益增多,它对群众的吸引力远远超过了传统社会主义运动,例如,与天主教有密切联系的解放神学无疑是拉丁美洲最强大、最有效的革命力量。由部分亲伊朗的什叶派运动提出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以及公开宣布亲社会主义倾向的、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在他的《绿皮书》中所阐述的思想都是这些流派的代表。它们彼此间的区别的总的取决于作为其灵感来源的宗教基础的差异。

无论这些运动以什么形象出现以及为了维护这一形象采用了什么惯用辞藻,我们所说的这些运动的最初基础在于当代世界各地区不同范围内存在的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常常由于各自的地方历史和文化的不同而带上彼此不同的理论和宗教色彩。尽管它们的宗教色彩各不相同,但由此产生的运动的基本宗旨都是相似的。如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都主张过渡到“新社会”的必要性。结果是这个运动在目前的情势下具有了一种反资本主义的革命性质,同时它本身又要同社会主义划清界线,尤其是同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实际完成的变种划清界限。这就使情况更加复杂,如果我们由此要对庞大的传统社会主义运动的战略和策略作出结论的话。

这既是迫切的现实问题,也是未来的问题,从而增加了这一课题作为“空白领域”的重要性。对于这个与群众运动具体关联的问题不能千篇一律地对待。因为正如我们已说过的,这些运动的成因、动力和形成是极其不同的。尽管如此,对其基本特点和理论进行一些思考还是可能并且适当的,因为对这些现象所作出的任何一种归纳都是我们这里感兴趣的。下面,我们仅限于论述这样一些思考。

首先谈一谈传统运动对宗教的态度。传统运动与作为意识形

态的马克思主义仍然以某种形式保持着联系,或者说,它们具有启蒙时代反教权主义运动的传统。这是在社会主义政党中经常碰到的现象。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根据启蒙运动的传统宣布,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从唯物主义无神论的立场出发,社会主义为了反对宗教及其对社会的影响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里不想讨论这个问题抽象的哲学方面,只集中探讨它的历史根源。马克思之所以在黑格尔左派的范围内接受布鲁诺·鲍威尔的口号,并且通过这些口号把启蒙运动对于这个命题的传统立场也接受过来,不仅是出于哲学教义上的原因,而且还是社会斗争的需要。当时,在反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正在发展的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教会起着反动的和反革命的作用。正在开始兴起的工人运动之所以对于教会采取一种反抗的立场,完全是由于后者所扮演的角色。

另一方面,无神论与宗教信仰之间的矛盾至今仍然是一个“永恒的”哲学问题。争论双方所提出的论据的特点决定了这些有争议的问题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争论总是以确认各种无法实践和检验的前提存在而结束。因此,争论结束了,而问题则“永远”得不到解决。而这就无法以任何一种方式确定对于具有决定性特点的宗教运动中众多信徒应采取的态度。如果我们否认宗教信仰,把它视为各种虚伪论点的大杂烩,那就无法判定在这些论点指导下人们的行为结果。相反,历史却告诉我们,许多带有宗教色彩的社会运动往往具有革命的性质。

因此,传统的社会运动在研究群众社会运动(如解放神学)时,不必过于担心那些非信徒们是否会承认这个运动的成员所承认的宗教前提,或者其理论是否与马克思主义相一致。对于一部分传统运动来说,例如对社会民主党人来说,这已经毫无意义,因为他们早就不再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与思想基础。他们必须对于这些运动的社会目标、有时还针对资本主义而公开提出的革命目标予以注意。

马克思说宗教是毒害人民的鸦片，首先是从当时教会宣传的宗教教义对于无产者的阶级斗争的消极影响这一角度考虑的，马克思并未一概否认宗教社会运动，他对宗教旗帜下进行的德国农民战争的评价就是证明。

而今天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今天所谈的往往是革命运动，是传统的、无产阶级的、亲社会主义运动的同盟者，当宗教运动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为社会主义而斗争时，是否还要教条地、甚至——更加糟糕——毫无任何意义地不断重复宗教是毒害人民的鸦片？这种做法是极其荒谬的！这种立场应彻底改变。但是，这并不是说在对待无神论和不可知论的立场方面要有什么改变，在思维过程中应当继续反对宗教的形而上学，捍卫自身的科学立场。后一个问题实际上是哲学问题，尽管它在某种程度上与我们所感兴趣的政治和实践问题有联系，但毕竟不是这类问题。这就是我们所得出的结论，也是我们得出上述阐释的原因。

上述结论对于人们行为的意义应视具体情况而定，因为在斗争中是千变万化的，但有一点必须明确：没有任何理由禁止各种流派的传统工人运动以任何一种形式与宗教教会相接近的亲社会主义运动进行合作。相反，这种合作是一种时代的要求，在未来塑造新人方面，道德因素将起很大作用。关于这一点，我将在本文后半部分加以阐述。

### 在可预见的未来中社会主义的“空白领域”

在我们研究社会现象和未来范畴的时候，在对我们这里所关注的特殊现象作出预言的时候，“空白领域”问题就开始变得更加复杂化。因为未来本身就是未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整个就是一个“空白领域”。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未来问题，特别是在那些涉及不久将来的事情上，人们还是能够根据对情况的认识，根据发展

规律和推动力作出比较准确的预测。

有一些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问题，人们可以通过有意识的行动对它施加预防性的影响。正如我指出的，这是人们行动中对未来和现在的“空白领域”所作的反馈。为使未来社会的结构与我们的计划和意愿相吻合（我们是能够办到这一点的），我们必须注意这些问题，思考所选择的口号，在许多事情上现在就要采取行动，我们希望在未来发挥我们所期待的影响。我们根据现实积累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对于未来社会主义所作的这些考虑是重要的。人们必须研究“空白领域”，绞尽脑汁地去思考，以便使我们认识我们尚不了解的事物，在这里我们必须为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寻找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

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得出的结论必然会影响到我们当前的行动。任务的复杂性需要自由的思考和摒弃一切教条、禁忌以及各种限制。从事这项困难而责任重大工作的人们决不应被某一机构或组织对他们的“忠诚”进行的监督捆住手脚，让这些机构或组织详尽地划出哪些是允许的，哪些是禁止的。在我们这个时代，拒绝自由思考无异于自杀。为此，必须反对这种限制自由的企图。毫无疑问，肯定有人企图这样做。而抵制这种企图的有效行动就是把思想自由的权利制度化并且在国际范围内开展辩论。

下面，我仅仅提出几个我们的视野所能看到的我认为十分重要的“空白领域”（不能再多了）问题。为此，只能从绪言所罗列的问题中精选出部分问题来加以阐述，否则文章就无法收尾了，因为探讨所有的问题已超出了本文的范围。

为了对未来社会主义有一个清晰的概念，我们应当准确地规定其结构的经济形式。这就需要回答许多非常复杂的问题。如果人们想弄清楚这个题目的话，通常会有几种答案。为了能够理解它们，并能够对它们作出表述，所谓的“灵感”是需要的。为慎重起见我再重复一遍，这并非包括所有问题，而且主要是以作者个人的

观点进行选择的。我认为有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未来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

- 1) 未来社会主义中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与私人所有制的关系；
- 2)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
- 3) 集权制与分权制。

第二，未来社会主义的社会形式。首先是阶级结构：

- 1) 在这种结构中将会出现哪些社会阶级？
- 2) 能否有一种没有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

第三，这个社会的政治形式。它包括以下几个问题：

- 1) 国家与民主（随着工人阶级的消亡，无产阶级专政逐渐消亡）；
- 2) 政治多元化与一党制的关系。

第四，造就社会主义新人与“伦理社会主义”的作用。

第五，马克思主义在未来社会主义中的作用。

即使这样一个简明扼要的提纲，它所包含的内容也是相当丰富的。要探讨上述全部问题，需要写一本大部头的专著，这决非一篇文章，哪怕是一篇长文所能容纳得了的。因此，本文只能对问题进行粗线条的概述，并对问题的答案提出建议。

不言而喻，正如我在前面所提到的，对于上述问题的选择和认识问题的方法取决于作者个人的意见，因此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如果我个人对某一问题作出大胆的回答，应仅仅被看作是讨论问题。因为我也有参加讨论的权利。

—

首先人们需要从未来社会主义的经济结构入手，人们希望回答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应当怎样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只要稍加思索，我们就会确信，这正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空白



领域”。

如果我们对于本文前半部分在探讨当代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有所理解,我们就不会对此感到惊异。作为社会客观现实迅速而深刻变化的结果,这种未来的难点无疑将会增多。对这些问题,我只能指出它们是需要绞尽脑汁加以思考的对象,我没有确切可靠的答案。另一方面,我知道,理论与实践方面还会提出许多问题。但令笔者感到高兴的一点是,我确信,在科学史中,对问题的概括和提出几乎与解决问题同样重要,有时甚至更重要,因为这会丰富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这是因为,如果我们提出一个新的题目,问题的解决答案(准理科学除外)总是某一过程的结果,而不是绝对真理。

#### (一)

我们首先面临的是社会主义中的生产资料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具有一种独一无二的意义,是因为在我们将要探讨的(第五点)关于作为理论和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在未来社会主义中的地位与作用的问题中,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迄今为止,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特性一直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区别的主要内容和最可靠的特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在马克思看来,这是一条公理。由此形成了他在《资本论》中所描述的思维进程(如剩余价值、通过生产资料私有制对无产阶级的剥削)的整体结构的基础,也是他关于资本主义之后社会经济结构的观念的基础(见《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是在指出各自占统治地位的所有制权利方面的特征的同时,对两种经济结构进行了区分。按照这种概念,社会主义是社会发展的最高形态,因为它意味着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受这种所有制制约的阶级结构。生产资料的社会性是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最主要的区分特征,这里唯一有争议的是社会化与国有化之

间的关系问题。而在资本主义中情况则完全不同，在那里所有制具有私有的特点。

这些都依据于各社会主义思想流派所同意的这样一种信念：社会主义将以社会化的所有制消灭资本主义阶级制度、消灭对无产阶级的剥削，消除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市场机制所引起的经济上的无政府状态；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的接班人们都认为，在社会主义中对产品重新分配的形式（在低级发展阶段要根据个人的劳动，在高级发展阶段即共产主义中要按照人们的需要）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领域进行这种根本的革命性变革的必然结果。

自然，马克思把社会看作是由经济基础和由它所决定的上层建筑，更确切说是上层建筑体系共同构成的一个整体。但是，除了一些个别的注解之外，他没有对社会主义中上层建筑作过系统的论述。尽管他是学者，但他没有这样做，这是为了避免人们责难他醉心于预言。由此可见，我们所捍卫的下述观点是正确的：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尽管其上层建筑已经变形，但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由于其生产资料国有化的经济基础，它仍然是社会主义的一种类型。

我说的这一切并不是为了重复老一套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真理，而是为了更清楚地探索未来，社会主义在所有制这一点上将是什么样子？

由于今天已引起人们关注的各种原因，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显然已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因此很难推测，就社会主义的社会形式这一意义来说，未来社会主义是否还会坚持今天的一些看法和与之相关的实践；所以可以预料，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们将会陷入更加严重的困境。

我们在提出“从这个意义上看未来的社会主义将是一种什么样子”的时候，我们所考虑的并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大多数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已不再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其意识形态。

与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相比，他们的处境较为有利，因为他们和他们的观点不会成为前进道路上的传统清规戒律式的阻碍。尽管如此，这些亲社会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政党至少有时也要陷入很不愉快的处境，因为他们必须对新问题作出回答，必须填补由于放弃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变得空空荡荡的武库，而这种思想库是不能空泛无物的。改良主义的老伎俩就是声称，目标是微不足道的，而道路是最重要的，但是在一个革命变革的时代，也就是说当人们要问，目前这条道路将把他们引向何处的时候，这种诡辩伎俩就变得毫无用处了。

人们必须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这是因为新社会运动其中包括生态运动，已经提出了自己的答案。一个政党，如果不能向自己的拥护者，尤其是向青年一代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它必将垮台。今天，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它必须指出其所致力目标，而不是仅仅指出达到目标所通过的道路。就连保守政党也懂得这一点。我之所以谈这些，就是为了说明，在目前形势下，每个人，其中包括没有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遗产影响的人，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既然如此，我们就应当力求深入分析研究这些问题。

我们不算预见未来。因为在出现如此众多变化和未知因素的情况下，未来学无法对未来社会进行精确详细的描述，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抛弃自负，仅仅指出这种发展可能出现的变化。

我们将从对众所周知的事实与可能的发展速度和动力的分析出发。这个基础是很有益处的，因为它涉及到了很重要的事情，这就是从社会运动的需要及其目标的远景出发——鉴于它所提供的替代方案——能够在所希望的方向上引导未来的发展，因此，人们必须有能够指出发展目标意识形态。正因为如此，坦率地说，使我感到担心的是，我仍然听到有人用惋惜的口吻重复改良主义的陈旧“经验”（尽管这在今天已经受到了批判）并固执地认为目标是微不足道的。这是不正确的！如果没有目标就无法认识和掌握为

达到这一目标所要经过的整个道路。对于那些不愿把他的视野仅限于直接现象的政治家来说，都应当清楚“我们向何处去”的问题。没有明确目标的“道路”必然要遭到失败，同样也是短命的。

根据我们对问题的认识，关于最近的将来，有几点是可以肯定的：

第一，它将为我们提供一个从某种意义上说集体经济的因而在实质上也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社会。这一点已被日益加速的当代工业革命所指明。其结果必然要导致传统意义上劳动的消亡和新的社会产品分配制度，以便为那些被自动化和计算机化排挤出传统劳动的整个社会边缘大军提供资金保障。这些人员必须从事产生社会公益的就业，也就是说一种新式劳动，它以另外一种方式从社会那里获得资金来源。在这里，还应该提到“第三世界”的结构性失业问题（到2000年，世界人口的85%将生活在“第三世界”），不对全球的财富进行重新分配，就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否则的话，就会面临一场全球性灾难的威胁。

我不厌其烦地多次提到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克服“封闭心态”（孤独癖）保护机制的唯一有效的方式。在有关这方面的论著中，除了真正的无知和为了百般迎合反动营垒中的权贵们而蓄意歪曲与欺骗之外，找不到足以反驳上述见解的任何正当论据。在我所思考的问题中，首先应当提到的命题是：我们能够就未来社会的经济内容这一方面来谈论未来的社会主义（而不仅仅是社会主义的未来）。

第二，如果研究这个社会的上层建筑，尤其是它的政治，就会看到一个明确的选择：我们将拥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民主制度，这是有史以来从未遇见过的，它不仅出自于人们的要求，而且借助于社会使财富高度增长的能力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这是把社会主义作为高度福利、自由和民主的理想憧憬），或者出现一种镇压性极权主义类型的制度。我毫不怀疑，在当代国际政治力量的大角逐中

完全有可能出现共产—法西斯政权。它产生于原有的统治阶级同把信息垄断作为新生产资料的新阶级相互合作的结果。这个新阶级充满了落后的意识形态,其中包括民族主义。

借助社会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认识和研究这两种前提,对于他们的斗争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更准确地说,为了消除未来可能出现的危险是极其重要的。

我认为,这个基础和出发点对于重新回到我们所思考的下述中心问题是必须的,即生产资料的社会公有制及私有制在未来社会主义中的作用。

首先应当承认,我不能对这个问题做出准确无误的回答。因为我对这个问题相当没有把握。我认为,随着新社会的日益临近,越来越迫切需要解决这个具有巨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问题。因此,应当在没有禁忌、教条和任何限制的前提下对它不断地进行分析研究。这种分析研究应当是对新的客观现实的十分坦率的承认。

一方面,正如我们所说的,这是社会主义概念的基本因素。在整个历史进程中人们都是这样理解的;我们一些人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是资本主义对工人阶级进行剥削的根源和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市场经济的基础;这些人还断言,建立生产资料社会公有制可以根除这两种消极现象,因此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

另一方面,在现实社会主义存在 70 年之后,我们被迫在实践和综合研究的基础上,对上述公理提出一些看法,而对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持第二种思想学说的人正是从这个前提条件出发的。

第一,很清楚,革命地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来说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完全的充分条件(我们不知道,这一条件是否还将存在于未来。如果存在,那么它是否还会象今天这样)。确认这一点会使所有的人——包括那些献身于以马克思所主张的反对“资本”的革命者头脑清醒,如对 1918 年的葛兰西那样。当时他

关于俄国十月革命写了一些著述，他并不赞同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等马克思主义的权威理论家对十月革命的否定立场。几年之后，他在监禁中所写的《狱中札记》中“转而主张”把社会协议和协调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先决条件。如果社会主义运动，特别是它的分支——共产主义运动能够及时听到马克思（见他于1847年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葛兰西（见《狱中札记》）的警告，那么就不会把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徒有其名的社会主义”搜罗在自己的名下，以致大大损害了它的威信，而且还能帮助被这类“社会主义”模式抛入受奴役境地的人民摆脱无数苦难和屈辱。同时，按照传统的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认识观念，二战后在各人民民主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它只能如此，因为它要服从于1948年苏联所考虑的战略利益的需要）被看作是其发展的必然结果。正是这一结果给社会主义阵营的威望带来了巨大损失。多少年来，直到今天，它仍然为此，其中也包括为可能在各国出现的反社会主义浪潮付出高昂的代价。最后还应当指出现实社会主义中两个最大的国家即苏联和中国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重大失误。近年来，这两个国家也遇到了非常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困难。

第二，实践并没有证实那种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而社会所有制会加速其发展的观点。相反，这两种所有制形式在科学技术革新、劳动生产率和生产力发展方面竞争的结果的比较是令人相当难堪的。

第三，更没有证实那种认为市场经济的无政府状态及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不可避免的生产过剩危机对于社会生活会起消极作用的论点。目前在所有的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危机比之在资本主义国家更大的范围产生着消极影响。今天，共产主义宣传仍在坚持的资本主义最后危机的论点，特别是在西方已成了黑色幽默的滑稽戏，尤其令人难堪。顺便提及，马克思写过一封信，但人们很可能出于对分寸的考虑，从没有引述过。这位科学社会主义的创

始人说,如果资本主义能够消除周期性降临的危机,也就不需要推翻资本主义了(马克思认为这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市场经济和对私有制经济实行让步的办法来探索摆脱经济困境的出路,这是马克思所无法想象的,因为在他的创造性思维中认为这纯粹是一种荒谬的想法。

第四,实践表明,经济无政府状态并非产生于市场经济,而是由于过分的中央集权制,由于这种中央集权制在思想理论上的贫乏,由于缺乏有效地实行经济计划所必需的技术基础。幸亏在社会主义国家及其不幸的灾难(准确地说,应该是破产)之外,出现了超资本主义的跨国公司,这种新一代的金融资本产生于列宁称之为资本主义最狡猾的,也是最后的产物卡特尔和托拉斯。从这种跨国公司可以学到如何有效地计划经济。与此同时,在西方也显示出国有化经济(在一些国家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并具有非常现代化的形式)也困难重重。因此,人们要强迫取消它。这种情况以再私有化的形式甚至出现在冶金、煤炭等一些社会所必需的、而且没有国家财政支援就无法维持的部门当中。

## (二)

据我看来计划经济与市场和未来社会主义的问题如此尖锐明确地摆在我们面前,实践在这里又一次使社会主义理论家们陷入一种可怕的新的失算,在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又歇斯底里地迷恋于市场经济,这再一次表明,在这个领域缺乏那种盘根究底的深入研究。

在这个问题上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

第一,毫无疑问,传统共产主义观念中的计划经济的方案与实践干脆失灵了。这一现象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使那些守旧的理论家和政治家产生了恐怖的幻影,并设法用暴力来消除它。这些观念多年统治的结果是一场灾难。我认为,东西方对这个制度进行批

评的各种政治派别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种灾难的严重性,而在这件事情上对此缺乏认识(估计不足)的原因各异。

第二,这种危机的公开影响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与实践家对这个问题产生了极大的(国际性)混乱。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这种混乱导致一些人把市场经济看作是唯一的神圣武器,认为它能够最好地解决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在我看来,这股主张市场经济的潮流作为遭受挫败的结果采取了一种歇斯底里的狂热形式。这是很有害的,尤其是如果人们考虑到作为这种“新浪潮”的出发点的前提是缺乏任何现实基础的。

第三,对市场经济的这种狂热产生于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中与这个题目利益相关的集团对于计划经济中所运用手段的失望以及这样一种看法,即把西方经济的成就都归结于市场经济。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东方国家的许多反共分子或因遭到失败而陷入迷途的“昔日的社会主义经济专家”所寻求的市场经济,其实无论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不存在。

我不知道在对世界市场上的经济专制进行掩饰这件事上,是什么在起主要作用,是跨国公司和支持它们的金融资本,还是那些属于马克思主义阵营的经济学家们的可怕智力上的无能?他们宣称信奉马克思主义,但又不能清楚地知道他们应当做什么,当他们思考问题的时候却又对当代最基本的经济问题避而不谈。我要说研究现实并非一定要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点已为那些并非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进行研究分析的作者们就这个问题所写的内容丰富的著作所证明。如果马克思主义者最终要开垦这块“处女地”,那么他们千万不要忽略我们这个时代跨国公司的计划活动。

第四,在一个全球性经济的世界中,在我们面前的不断发展的世界中,经济计划而不是自由市场变得越来越重要。但这决不是指那种被错误理解的计划,也不是指那种控制国家经济并试图全面干预整个经济生活的垄断力量。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必须是竞争的



结果,因此也必须是市场发挥作用的结果。我们在这里是指那种建立在掌握和了解社会各种实际需求而且是国际范围内需求的广阔前景基础上的计划。这种需求是在某一时期产生的,而且可以预测或者甚至能够有意识地制造出来。这种以科学和创造性思维为基础的计划(日本政府和工业部门近20年来在发展微电子技术方面的成功就是一个很突出的例子)既能预防和遏制市场无政府状态对社会所造成的消极后果,又不会消灭在市场中处于竞争中的各种力量,至少能够以某种方式和一定程度上做到这一点。

乍一看,上述意见似乎是相互矛盾的。其原因就在于把经济计划理解为这样一种作用机制:它使一切经济现象服从它的指令,它变成独一无二的力量,并排斥其它能够有效和顺利地组织社会生活的传统力量的参与。出现矛盾的原因首先在于对经济计划的错误理解(这在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已成为传统)。必须承认这样一个普通的事实:当今经济的正常发展需要计划与市场这两种推动力量的合作。

计划既能预测国家经济生活发展的基本方向,它同样也必须建立在对社会需求的了解,对技术工艺和生产的科学认识的基础之上。它必须能够对发展进行创造性的思维,并且创造出新的需求,这种计划必须伴之以发挥作用的市场力量和各类企业间的竞争。我们前而已经说过,经济计划的力量和市场的力量必须在其各自的范围内,在每个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共同有效地发挥作用。

这就从根本上消除了计划与市场这两种力量之间所存在的矛盾,但不可能消除在具体场合各种不同的目标、利益之间可能发生的矛盾冲突。这种情况是指例如社会的切身利益迫使一些亏损企业继续存在和发挥作用。这对子一种自觉的有计划的发展是必要的。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也是可以接受的。例如,日本在研制第五代电子计算机的10年发展规划中投入了大量的人才、物力资源。这个计划是由为这个目标在日本建立的研究机构 ICOT 执行的。

因此,为了确保这两种力量中一方对另一方的统治而废除任何一种力量的作法都是错误的,都会对社会生活造成消极的经济后果。例如在社会主义国家,在计划经济的名义下消灭了市场结构和市场机制。相反,如果废除经济计划,用市场取而代之,也会对国家经济生活造成(而且完全有可能是更大的)消极后果。

我并不是说这种倾向在今天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中能够贯彻实施,在未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就更行不通了。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将比当代社会更紧密地同整个全球性经济融合在一起。这种全球性经济由于各种原因——大多是由于国际关系,将更强烈地需要自觉的计划。不过,我认为,特别强调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活中把计划因素与自由市场规则结合起来的这种一揽子建议,还是很有必要的。这似乎是老生常谈,但实际上却具有重要意义。

第五,必须明确地告诉那些批评东欧国家计划经济的人,他们的立场是由于这种经济使人们形成的经验而推导出来的,是那些拥护计划经济的人把这种经济引向错误的结果。而这种错误则在于对计划经济强加上从任何一个方面来看都是非常糟糕的解释,把计划经济等同于彻底消灭市场因素。这种理解所造成的恶果是众所周知的。这种恶果之一就是对市场经济概念的歇斯底里式的狂热崇拜,这是计划经济所产生的失误而带来的结果。其次,对于我们来说,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即没有现代通讯交通联系的基础设施是不可能有名副其实的经济计划的。尽管如此,在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内还是采用了这种计划(多么无知啊!)

我们知道,在立法中,对于任何采用无效手段的犯罪未遂行为(如用木制手枪杀人)可酌情宽大处理。俄语将其精确地表述为“无效手段未遂罪”(我不知道在其它语言中是否也有相应的表述)。从技术角度看,在东欧国家最初实行的计划就是一种“无效手段未遂行为”。首先,当时还没有发明电子计算机。后来虽然有了电子计算机,但数量不多,功率不大,而且没有实行联网。从现代信息学的

角度看,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计划”不过是一种代价高昂和徒劳无益的儿戏。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计量经济学的基础再好,计划也不可能产生任何积极的效果。

从上述消极后果中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显然不能断言经济计划本身是行不通的。它之所以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关键在于这是一个蹩脚的计划,是在交通通讯业领域缺乏相应基础设施的计划,因此是典型的“无效手段未遂行为”。即使撇开经济理论问题不谈(这一理论可能也是错的),我们的论证目标已经说清楚了,即指出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缺乏实行现代经济计划所必需的相应技术基础设施。

前不久,我听到这样一种说法(在波兰),认为电子计算机决不可能模拟市场上的“波动”。这很象是一个神话,它只能出自那些对第三代电子计算机的功能毫不了解的人之口。他们对于将在90年代投放市场的具有“人工智能”的第五代电子计算机更是一无所知了。

从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充满信心地说:从技术的角度看,实行经济计划也是可能的,即使在全球范围内。同时,我们坚信,在向未来前进的过程中,计划经济正在和将更加符合实际并趋于完善。这对于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无疑是个极其重要的启示。

### (三)

按照本节开头时所列提纲,本小节将探讨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经济结构中的“集权制与分权制”问题。

请记住,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前面有关“预测”的补充说明仍然有效。科学技术领域的专家们应当先于社会科学家提出几种可能的发展方案(和对这些发展的科学预见)。尽管已做了上述补充说明,但我还是要说,我之所以探讨这个问题仅仅是由于,我根据旧式计划权力过于集中的反面教训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同时我认为,

重视这个问题对于深入研究未来的社会主义是十分必要的。

那些引起我们关注的事情可以说是相当矛盾的。一方面，以微电子技术为基础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们看到（这也是生产实践的基础），在工业和服务行业实行分权制是必然趋势（在美国硅谷拥有最先进技术的小型企业中，微电子技术的发展就是最好的例证）。可以预料，科学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电脑）的发展将促进在服务行业占优势的小企业的迅速增长；但另一方面，经验告诉我们，微电子技术领域的生产需要越来越多的投资，越来越大和日益复杂的生产设施，从而导致另一个极端——投资和生产过程本身的集权化。是否可以说，这两种趋势都是非常必要的和同样是微电子技术革命的产物？或许这并没有任何矛盾，如果所指的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或在这样那样的过程中所同时产生的两种后果的话。我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我却深知它的重要性和继续研究它的必要性。

## 二

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社会结构（阶级结构）问题。

### （一）

在研究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时，我们的注意力不能仅限于“空白领域”，还应当注意到作为资本主义对立物的社会主义在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上的传统模式也已经发生变化。当人们分析未来社会主义的社会阶级结构时，这一现象就显示得更加清楚了。

我已多次提到，随着在生产和服务领域使用自动化和机器人的进程，必然要导致传统意义上的劳动的消失以及随之而来的传统无产阶级的消亡。因此，本文没有必要再讨论这个问题。我再次重申，我已多次并且非常详细地写过这个问题，同时我也没有看到

过任何足以驳倒我的论点的充分论据。如果有人想对这一论点提出质疑并推翻它,那么他就首先应当论证当技术的发展已不再需要人的直接劳动时这种劳动的必要性。我恭候这种证明,尽管我不相信会出现奇迹。

这意味着在未来社会主义的蓝图上出现了一个新的重大“空白领域”:有可能存在无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吗?虽然从历史上看,社会主义的产生是与无产阶级(首先是工业无产阶级)的出现和资本对它的剥削相联系的。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任何企图回避它的态度都是错误的,如当前某些倍受尊敬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那样,他们关心的仅仅是如何保持自己的理论和思想的价值。他们辩解说,作为现在的工人阶级,特别是工人阶级中从事体力劳动的集团将会消亡,但是学者、工程师、技术员、经理人员和其他自动化生产的操纵人员将取代工人阶级的位置。毫无疑问,生产过程需要人(不论是什么样的人)来操纵(马克思在1857年写的《大纲》中论及学者和工程师在那个时代的作用时,提出科学是一种新的生产资料),但这并不意味着由这些人组成的阶级将会取代受到资本剥削的无产阶级的位置。相反,这一新的阶级能够成为占有者阶级(例如它垄断着信息这种新的生产资料),并在一定条件下变成统治阶级。因此,根本谈不上它是无产阶级的“继承人”,因为这里不存在剥削人的劳动。但是却可以产生许多剥削人的新形式,尽管对人的劳动的剥削将随着这种劳动的消失而消失。机器人和自动化装置能够完成生产过程,但不会受到象劳动者所受到的那种剥削,即剥夺他们生产的剩余价值。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正在发生变化。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未来的社会主义建立在上述原则之上,那么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是什么涵义?它指的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

当然,这只是我们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之一。从整体来说,它涉及到未来社会主义的阶级结构(即社会结构)。

问题的实质在于其现实意义，它彻底推翻了马克思的一个基本理论。马克思根据他亲身所处的那个社会的阶级结构及其发展进程作出预言，认为将产生更强大的两极结构，这种两极化的结果将使大多数中产阶级进入无产阶级的行列。但是，经过近 150 年的时间，我们所看到的情况恰恰相反。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不断缩小的同时，中产阶级却在日益扩大（关于这个问题已有不少论著，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马德里大学教授萨卢斯蒂亚诺·德利·坎波·乌尔班诺于 1988 学年开学前夕发表的专著《中产阶级社会》。该书逻辑严谨，立论分明）。

我们生活在与马克思的设想完全相反的社会。这是一个中产阶级的作用不断增长的社会。未来将会是什么样？从当代社会今后的发展趋势（即无产阶级和资本家阶级的逐渐消亡）来看，这一消亡进程将会加速。这就意味着未来的社会主义有可能成为中产阶级的社会。

我们所提出的这个“空白领域”是非常现实的。提出这一现实使我们比较容易回答完全符合逻辑的问题：如果在一定的和适当的条件下上述新的有产者阶级变为统治阶级的话，那么它将统治谁？它将统治目前正在形成的中产阶级。同时还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些中产阶级会不会产生马克思主义所预言的那种资本主义？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如果社会主义能够产生资本主义的话，那它就已经不是什么“空白领域”，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难解之谜。

## （二）

这个问题需要回答什么是完整意义上的未来社会主义。至少应当意识到在这个词背后所隐藏的新问题。

本文的宗旨首先在于揭示社会主义思想过程中存在的“空白领域”。我将努力起到“台词提示者”的作用。但这并不妨碍我个人

就解决我们所面临的新问题发表看法。我将尽量做到这一点。

我认为，社会主义问题并不仅仅限于经济上的人剥削人，而且应当包括整个社会的社会结构的各个方面。因此，社会主义也应当涉及到人对人的压迫与剥削的其它方面（如民族和妇女问题等）。确切些说，社会主义应当考虑到以变化了的价值体系为基础的新人的形成和文化素养问题。但是在传统观念看来，经济剥削是最主要的问题，它历来被视为一切罪恶之首。因此，正如历史所表明的那样，其它问题被作为次要事情而束之高阁。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具有广泛含义的社会思想，被用于同社会生活中的一切罪恶进行斗争；而作为社会生活的组织形式，它则试图通过制度手段来消除这些罪恶。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问题是极其广泛的，它实际上包括了整个社会生活。只要正视这一现实，就会清楚地看到，改变或取消纲领的某一点是无法消除其全部思想的，而只能表明改变其某些组成部分是必要的。

尽管一切都可能发生变化，但社会主义无疑将会以更加完整的形式存在下去，它将致力于人类生活的各种中心问题，形成更为完善的价值体系，并在此基础上造就这样一种新人，他们能够身体力行去实现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普遍的人道主义思想。因为他们具有务实精神，而不会沾染那种理论脱离实际的旧习气。这将是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新现象。这种社会主义当然不会忽视以人的日常生活为基础的组织和社会问题。

这是可能的吗？它是不是一种乌托邦？这当然是可能的，而不是乌托邦。因为它拥有人类社会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崭新、丰厚的经济基础。最令人感到气愤的是那些形形色色的“现实主义者”。他们喋喋不休地对各种社会主义运动评头论足，借口现实社会主义

的困境讥讽其为“阿卡迪亚式的乌托邦”。<sup>①</sup>我认为,这些人不了解,而且无法想象当代社会主义的种种发展趋势和可能性,他们是一些“感觉迟钝”的人。那些嘲笑社会主义思想的人历来惯于这样做。而目前最可悲的是,这些先生恰恰来自社会主义运动内部。但愿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进程中能够淘汰这种人,并使人民相信,社会主义运动在高度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将不需要牺牲生命和英雄主义行为。在以往那种英雄辈出的时代,“英雄”产生得太容易了。

### 三

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新的政治结构问题。下面让我们着重探讨社会主义民主(民主与专政)问题。

#### (一)

在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应搞清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的夹龙去脉有重要意义的问题。在有些人看来,这些问题在原则上乃至细节上都一清二楚(例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的在社会主义两个不同发展阶段中的分配原则),并认为它们不属于本文所说的“空白领域”的范畴。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其根源在于70年来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失误。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终于有机会公开谈论这些问题,并在公开性的前提下在关于斯大林问题上产生了“真正的持不同政见者”。但是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存在着极其重大的“空白领域”。这不仅是由被斯大林推向极端的列宁主义的法律、法令所决定的,而且也是由列宁及其陶醉于革命后快感的乌托邦之中的最亲密的战友们(为了忠于历史的真实,在此仅举两个极端:一极是布哈林,另一极是托洛茨基)的遗产所决定的。如果实行

---

<sup>①</sup> 阿卡迪亚是古希腊的一个省,在16—18世纪的田园诗中,它是“幸福之邦”的代名词,意即盛行古朴道德风气的天国。——译者注



的是真正的公开性,那么我们就只能得出以下结论:为了能够理智地谈论(与思考)未来,我们就首先应当打扫干净过去的一切角落,而不必对任何大人物有所顾忌。同时也不应忽视,我们所处的社会和政治条件是不不断变化的。

如上所述,本小节涉及的问题非常之多,我们只能从中选出民主这个中心问题来加以探讨。民主在抽象思维中是一个非常简单明了的、相对于一切专制的概念。但在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中,这一概念被扭曲了,变成了把民主与扼杀它的专制混为一谈的矛盾概念。这种政治上和思想上的亵渎犯罪对于作为社会组织形式的民主原则构成了威胁,这种怪现象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并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中找到了最尖锐的形式。这种学说把专政等同于“我们的”民主,等同于高于一切的“最高”形式的民主,从这个角度看来,资产阶级专政,尤其是法西斯主义更加直言不讳,它们公开宣称消灭一切站在与自己敌对立场的民主。它们从未承认其纲领是民主的“最高”形式。然而,根据马列主义理论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所进行的斗争是反民主的、伪善的斗争。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以及目前残存的共产主义运动正在为这一学说付出高昂的代价,使自己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我们要根据现已了解的社会发展状况,从探讨未来的社会主义和“空白领域”的角度出发深入思考这个问题的某些方面。

本文不打算探讨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复杂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仅非常棘手(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方面都是如此),而且它不是我们所感兴趣的“空白领域”。我丝毫不怀疑,在高度工业化的国家,未来的社会主义有获得各种民主国家形式的可能性。这也是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所提供的历史教训,是长期以来由于放弃民主并接受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而付出和正在付出代价的结果。社会主义新制度被引进一些还不成熟的国家,这违背了马克思的禁令。在这些国家,不使用专

政和强制手段就无法保住政权。我们不排除还会出现新的“徒有其名的”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在拉丁美洲)并在这些国家产生“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所共知的恶果的可能性。可以断言,在高度发达的国家是不会发生上述情况的。因此,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对于我们来说并不具有特殊意义,因为我们的着眼点主要在最发达的国家。

出于同样的考虑,本文将不把国家问题作为未来社会主义的“空白领域”。尽管无政府主义者仍然在鼓吹没有国家的自治社会,但我们坚信,这不过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乌托邦而已。在最温和的马克思主义者中也有大致类似的思想(列宁在1917年写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就曾为这种充满乌托邦的思想进行过辩护)。他们认为,国家作为镇压机关的职能将会消亡,而其作为组织和管理机关的职能将得以保留。经验表明,国家是非常重要的工具,只有幻想家才认为政权可以不需要国家而存在。

尽管衡量的标准与过去有所不同,但国家与民主问题对于未来的社会主义仍然是一个迫切的问题。因此,可以将它当作一个“空白领域”,只不过与我们以前所研究的“空白领域”具有不同的涵义罢了。它不是指民主将以怎样的形式存在,而是指民主将是否存在。由此产生了一个新问题:专制与极权的上层建筑,或说得尖锐一点,共产法西斯主义的上层建筑是否能够存在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

回答是肯定的,历史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对于未来的科学预见也提出了这种可能性。

关于过去,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告诉我们,由于社会主义革命是通过一切可以采用的手段完成的,在这种情况下,当革命不具备必要的主观条件时(马克思主义理论明确地论述过这些条件),那么就必须建立专制政权,甚至通过暴力来维持其统治。共产法西斯主义这个怪胎正是由此应运而生的。这是一个使那些还不了解它的人感到担心的问题。要真正了解它,需要进行大量、细致

的分析,而这是本文力所不及的(这不仅受篇幅所限,而且也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不过,我将即刻着手这个问题的分析研究,并向读者提供一份研究报告。在这里,我仅想指出,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进行过上述研究。不要把有关斯大林主义问题的讨论范围限制得过于狭窄。我再说一遍,有关斯大林主义问题的讨论涉及的是政治体制问题,而不是斯大林个人。研究斯大林这个人物或许对于苏联和共产主义活动是非常必要的,而这相对来说要容易一些。

关于未来,我们应当估计到,随着传统社会阶级(首先是工人阶级)的逐渐消亡,有可能产生新的有产阶级(它掌握着信息这种新的生产资料)。这个由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和经理人员等组成的新阶级有可能依靠部分官僚体制和旧的有产阶级的残余变为统治阶级,从而有出现社会斗争的危险并由此导致极权统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社会是以集体经济为基础,那么就有可能产生新型共产法西斯制度。

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个“空白领域”。必须懂得,其结果如何取决于人的活动,因此,应当从现在起就采取预防措施。

我之所以提出这一点,就是为了通过对上述问题的讨论来提请社会注意并采取相应的行动和预防措施。

## (二)

下面的讨论旨在为政治多元化问题的研究提出人们能够普遍接受的原则和范围。

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表明,对于持有不同观点的人(如罗莎·卢森堡)来说,没有多元化和对国家提出批评自由的民主本身就是矛盾的概念,或者不客气地说,是愚弄老实人的骗局。70年来,按照列宁和斯大林的学说进行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实验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充分说明,社会主义民主应当是多元化的(即多党制的)。未来社会主义的民主就应当是这样的民主。未来的社会是不

是民主的社会?这个前面早已提出的问题构成了一个“空白领域”。我们知道,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两种可能性。我们也同样知道,在共产法西斯制度下是不会有多元化的。最后,我们还知道,这个结果将给社会造成许多消极后果。因此,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已不是向人们发出预报,而是应当立即动员社会舆论防止出现这种危险。

多党制在未来社会主义中的作用如何,取决于现实具体条件和人的活动。因此,只有当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到来之后,我们才能得到准确的答案。

#### 四

毫无疑问,第四个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主观因素,即未来的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及其社会教育制度所共同造就的新人的作用。我们总是强调,未来时代的许多现象和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的活动所决定的。这是没有疑义的。但应当切记,任何疏忽大意都有可能使最好的计划贬值。

从社会主义实验开始之日起,就提出了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问题。可惜结果是令人失望的,或者说与最初的设想完全相反。不但没有成功地将旧人改造为新人,而且打碎了他们的脊梁骨,摧毁了他们的道德准则。对此,即使是任何“局外人”也会感到痛心。因此,我建议人们留心一下苏联报刊上揭露的营私舞弊行为(这种恶习已经渗透到最高决策集团内部)。存在着类似 30 年代芝加哥的黑手党组织以及酗酒、吸毒、卖淫现象。偷窃行为更是泛滥成灾,连许多用于亚美尼亚地震的救灾物资也“不翼而飞”。公开性有助于真正剥去这些罪恶现象的伪装。至于其它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我只能说波兰存在这种现象,而其余那些谨慎小心的国家则声称,它们的制度非常优越,不需要任何公开性。那些头脑简单的人可以相信这种说法,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可以绝对肯定地说,如果未来的社会主义不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必将遭至失败。

那么应当怎么办呢?不了解未来的具体情况,只能提出荒谬的建议。这并不是说需要什么新的提法。这些五花八门的新提法在这里是多余的和毫无意义的。这是不是说我们遇到了“空白领域”?回答是肯定的。马克思曾经说过:我们不想预见未来。

19—20世纪之交,在工人运动中(特别是在德国)掀起了一场反对“伦理社会主义”的无情斗争。这种思潮的主要代表是新康德主义哲学学派。该学派在分析工人运动的起因时,试图用伦理学来偷换马克思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理论。为了便于读者更好地理解我所要探讨的问题,需简要介绍一下这场斗争的实质。新康德主义者企图使工人运动倒退到旧的乌托邦立场。我认为,“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对“伦理社会主义”理论的抨击是完全合理和正确的。新康德主义者的观点对于20世纪初的工人运动是十分荒谬的。他们试图按照康德的哲学来“补充”马克思主义。但在这场意识形态斗争中,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却丧失了极其重要的东西——各种伦理学价值。

在各社会主义流派的理论观点中无疑都存在这种价值。否则他们就不可能为争取这些价值,如自由、平等、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和国际主义而进行忘我的斗争。同时,由于完全可以理解的历史原因,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将意识形态的其它因素放在次要地位。一旦出现旨在消除经济社会学因素和阶级斗争,并以普遍的人的价值为依据的政治流派时,这种情况就更为严重。

我并不打算为“伦理社会主义”恢复名誉,当然也不希望批判已经根据现实情况进行适当修改的现代社会主义运动的科学理论。我唯一的目的就是思考关于培养未来的社会主义新人的问题,并强调必须使伦理价值重放异彩。我们感到,目前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特别是在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中缺少这种价值。当然,这并不是要用布道式的说教来抹煞客观生存条件对于人的观念的影响。决无此意。而是说应当认识到价值体系对于每个人及其行为的影响。

正因如此，有必要形成一种能够促进建设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

那么如何实现这一任务？我想以后再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 五

最后我想谈一谈马克思主义(它的内容与思想)在未来的社会主义中的地位与作用。初步分析表明，这是一个困难而复杂的问题。它是未来的社会主义中的又一个“空白领域”。

社会主义是科学的理论。这种理论是建立在对相互关联的事物的主观分析之上的。人们通过一定的分析手段对社会活动及其基本规律进行系统的论述，并由此预见社会的发展。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并不能够保证它的每一个理论结论都是正确的。这些结论经过实践验证，有些是正确的，有些则是错误的。对各种理论结论的批评决不会贬低其科学性，这对于任何科学来说都是十分正常的现象。既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是它的实践性，即形成于对事物观察、概括的基础之上，那么这种理论就必然要随着现实环境的变化(这在社会生活中也同样是正常现象)而相应改变或摒弃某些过时的东西，甚至理论的某些整个部分。正是这种大胆革新和务实精神证明了理论的科学性。自此可以肯定地说，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它是一种开放性理论。任何试图将它变为教条，把反历史性强加给这种实践性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行为。

马克思主义同时也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在专业文献中许多有关意识形态的定义往往是相互矛盾的。因此，我想尽量解释清楚我使用该术语的涵义。现在我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认识人的信仰(beliefs)和态度(attitudes, 指行动的意愿)的意识形态体系的。这种体系是根据社会所能接受的价值体系来决定人的行为目标的，目的是要达到公认的最佳社会生活方式。

没有这种人们所能理解的意识形态就不可能存在任何政治运动，也不可能存在自己没有任何主张的政党。只有从这种意义上才能够评判某种意识形态是进步还是反动的，是无产阶级的还是资产阶级的，是苏维埃的还是宗教的等等。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今天才在日常生活和科学领域中使用了意识形态这个术语。有许多理论提出了关于“意识形态时代终结”的论断（意识形态曾在某些时期在社会生活中具有特殊意义）。这种试图把科学同意识形态对立起来的做法只能表明，它或者在语义上不理解这个术语，或者是伪科学。这种论断实际上等于宣判了马克思主义的终结。似乎马克思主义是意识形态采取多种多样形态的时期中唯一存在的意识形态。可见，在这种做法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十分明显和反动的政治意图。由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上述特点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有机联系（这恰好证实了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意识形态这一论断），因此它的某些论点完全有可能出现变异，有时甚至是彻底的变异。在探讨本节的主要问题之前，我首先对意识形态的语义进行了考察。请允许我用下列提示来结束上述考察：马克思是从“虚幻意识”这个意义上来使用“意识形态”这一术语的。他将其称之为“暗箱”。这种“暗箱”使真实的事物扭曲变形，本末倒置。不过他是用此来专指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他看来，从定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不是这种意识形态。历史证明，马克思的这种观点是错误的。除了某些教徒认为罗马教皇不会有过错之外，世界上没有一贯正确的人。马克思认为他同罗马教皇一样是不会犯错误的。由于这种情绪和自信，使马克思把上述错误概念看作是绝对正确的。我通过历史观察来结束对意识形态语义的讨论并用以补充说明，我的上述观点丝毫没有改变。正如我们所指出的，没有意识形态的政党是无法存在的。如果你不知道，或无法告诉民众，你的前进方向和所要达到的社会目标，那么争取民众（这正是每一个具有不同政治色彩的政党所希望和应该达到的，如果它不想使自己在

政治上垮台的话)就变得毫无意义。不懂得这一点,动员群众就是一句空话。如果我们所说的这个真理同一切政党有关的话,那么它对于那些高举社会主义旗帜的工人政党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从实践经验中我们还看到,意识形态被认为具有不断改革的特性(指这个术语的原有意义。因为现在几乎所有高度工业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其中也包括共产党人都是“改革派”)并坚信“目的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道路”。

当前的一切运动,包括保守运动在内都提出了自己所要达到的目的和指标。在当代条件下,形势变化如此之快,在全球和各个地区产生了大量新的问题。那种要求人们脱离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无异于是一种失败的意识形态。这种失败威胁着整个运动和它的领导人,如果他们想自我拯救的话,必须坚决地对这个运动进行变革。

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传统的意识形态。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两个错误:一是这种意识形态的教条化和僵化(成为这种意识形态特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它忽略了与时间和空间相联系的形势变化所引起的各种变异;二是战后,社会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运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在摆脱教条的同时也丧失了意识形态。在一个文明变革的时代这种作法必然会被宣判破产。而不要让自由党取代自己地位的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需要革命口号这个新问题是自发产生的。我再说一遍,这指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革命,即用暴力来解决问题——我们谈论的是高度发达国家——而是指革命口号的社会内容。

在当今工人运动的两大流派中,我们感到意识形态的极度匮乏。今天我们需要的是符合时代的现代意识形态。应当创造这样的意识形态。本文所提到的“空白领域”的历史向我们提出了这一点。需要在此补充说明的是,是社会主义运动的现代意识形态。那么是不是说应当提出抛弃在历史上与其传统有联系的一切现存的



东西,从零开始呢?如果这样做就意味着丧失时间,因为过去的历史和大多数工人政党是无法一笔抹煞的。何况那些与共产主义运动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相接近的工人政党以及与马克思主义相接近的运动(尽管它们不属于共产主义流派,如解放神学)丝毫没有表现出希望脱离作为理论与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更糟的是,如果这样做的话,甚至可以说是反对必要的改革。在不同程度上与马克思主义相联系的群众运动也是本文在探讨未来的社会主义中所关注的问题之一。至于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我认为它们在变化了的形势压力之下,为了获得行之有效的意识形态已不得不承认:它们过于轻率地丢弃了他们所得到的意识形态遗产。因此,马克思主义重新引起了它们中一些人的兴趣。即使现实状况并非完全如此,我仍然认为,在探讨未来社会主义时,研究马克思主义在这种社会主义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必要的。

研究这个问题的必要性还在于马克思主义危机的呼声四起。持这种观点的人多数缺乏有力的论据。他们仅仅根据当今共产主义运动所遭受的危机而断言,马克思主义作为共产主义实践的正式理论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如果共产主义陷入危机,那么作为其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也必然要陷入危机。这是典型的不应有的错误。为了判断这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误,首先需要搞清楚,共产主义实践是否真的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而事实完全不是这样。在现实社会主义的起源和整个发展过程中,它的一系列行为往往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立场。可见,它的危机只能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危机,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危机。

当然,部分地承认经典马克思主义存在危机是正确的。并且这一危机进程将随着当前我们所正在经历的工业革命的发展而不断加快。对于这个“空白领域”应尽早加以研究和解决。

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和意识形态是一个开放系统。这个系统将随着现实的变化和科学知识的新成就而发生相应改

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论点都需要加以变革。

例如：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第一次工业革命时代，是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结构的理论概括。而我们则生活在第二次（也有人认为是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这一革命改变了客观环境，并使一系列对于马克思主义有重大意义的前提条件退居次要地位或者不复存在。

《资本论》的整个逻辑结构是建立在资本家剥削工人阶级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这一概念之上的。

由此产生了许多问题：

当着生产实现自动化和计算机化的进程导致传统意义上的劳动与工人阶级的消亡时（种种迹象表明，在未来 30—50 年内，发达国家将在工业方面出现这一进程），将会是一种什么状况？我不想具体描述它的细节，尽管这同我们以及本文所研究的问题有关，但也只能点到为止。不过有一点是绝对肯定的，那就是，《资本论》作为论述工人阶级遭受剥削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一，将只能同关于科学史的著作放在一起。这些著作所论述的问题对当代实践已经失去了意义。

还有一个必须事先思考的问题：是否可能出现没有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如果有可能，那么我个人认为应当研究这是具有何种涵义和形式的社会主义？

最后，还有一个社会学方面的问题：对于中产阶级的观察将比过去更为细致。马克思的有关理论显然已被历史的发展所推翻。马克思预言，社会呈两极发展趋势，即贫困的无产阶级和富有的资本家阶级数量的增长。中产阶级将逐渐消亡，其大多数被抛入工人阶级队伍。然而，正如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历史的发展与此截然相反，而且出现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经济后果：构成资本主义发展基础的中产阶级（罗莎·卢森堡语）在未来的社会主义中也将存在。因此，

必须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极为深刻的修正。

马克思的另一个论点也被社会历史的发展所推翻,即马克思关于劳动阶级日益贫困化的错误观点。承认这一事实,使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并使之现代化。

还有一个政治学问题:没有无产阶级将对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产生什么影响?社会主义国家将会是什么样的?

还有一个与宗教有关的问题:宗教真的是毒害人民的鸦片吗?既然连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以及基督徒和伊斯兰教徒等等)都不同意这一结论,那就只能说上述论断是具体条件和环境的产物,它在今天已经过时了。既然如此,究竟应当怎样看待无神论运动?这种运动不仅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而且还将继续存在于民主社会。同时,如何对待上述社会的宗教宣传?

在简要地举出这些事例之后,让我们回到本文在前面予以特别关注的问题: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问题。

可以看出,以上所举事例仅限于本文所探讨问题的范围之内,以便论证本文开头所提出的论点。同时我认为,这些例子足以强调说明,我们需要多么深入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多么需要现代化。与社会问题相比,在哲学领域也同样存在不少新问题(这也是自然科学进步的结果)。我们可以评价马克思主义危机形成的条件,也同样可以认为这对于科学(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来说是正常的。因为危机是发展的必然结果。所以有必要根据新的发展成果来修正理论。至于我个人,出于同情,我更倾向于后一种解释。

总之,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我们遇到了“空白领域”。我相信,马克思主义(当然是现代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在未来的社会主义中也将作为理论和意识形态发挥重要作用。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将直接取决于从事马克思主义发展工作者的智力潜能。应当立即着手这方面的工作。必须尽早并令人信服地消除这些“空

白领域”。无论什么样的权威都无力拖延或阻碍这一进程。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本文涉及的是在思想和政治上的推动力。我把主要精力放在选择当代社会主义运动需要解决的问题上。但有时我不得不阐明自己的观点或提出简明扼要的答案。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因素。但是这种在选择和认识问题方法上的主观因素应当成为促进我们对有关课题进行讨论的媒介。若是这样，就完成了本文的主要任务：围绕上述问题展开讨论并将这些问题列入讨论议程。”

(原文为西班牙文，何小平转译自俄文，殷叙彝校)

---

• 本文1969年1月8日在奥地利萨茨林写成。

# 共产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

费尔南多·克劳丁\*

目前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历史时代的结束,这个历史时代是从布尔什维克革命和 1919 年的分裂开始的。在这个历史时代中,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一直进行持续的斗争,尽管它们曾在短暂的时期内有过一定程度的合作。

在共产主义方面,最重要的成就是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制度,他们的领袖和理论家们称之为社会主义。这种社会制度开始只局限于老沙皇帝国的欧亚疆域内,但在 1945 年以后,一些落后国家通过独立的革命,在欧洲则由于克里姆林宫借助其军事力量的保护向外输出苏联的模式,这种新的社会制度形式在世界上广泛地传播开来了。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就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的社会民主党,维护了自己的地位,仍旧是受欧洲绝大多数工人运动拥护的一支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民主主义扩展到了其它地区,并且成为社会改良和民主进步以及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中不断增加的实际的政治和社会权力的最重要的倡导者(这一评价不是要贬低其它政治团体的贡献)。

---

\* 费尔南多·克劳丁:已故,原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巴布罗-伊格列西亚斯基金会主席。

用共产主义的理论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的衰亡,加上西方共产党的不可逆转的危机,标志着这一历史阶段的结束。因此社会民主党就成为唯一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力量。东方的那些企图保留他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前途的改革运动,都把目光转移到社会民主主义上来了。同样,西方的还能起一些政治作用的少数共产党,也这么做了。

社会民主党的阵营决不当因为这个论断而产生胜利的感觉。它们自己在对待意识形态革新和在政治上适应以令人目眩的速度变化着的世界等方面也存在着问题。但是,如果把共产主义试验的失败与社会民主主义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当作对称的、可以比较的现象相提并论,那么这种解释更可以说是对从目前正在结束的这一历史时代中得出的最重要的认识置之不理。

苏联共产党中还有一些领导人明显地倾向于这种“对称论”的观点。他们甚至把社会民主党人关于“共产主义的失败”的言论称为“攻击性的行为”。<sup>1</sup>但这种意识形态观点还不如说是苏联的阻碍改革的保守阶层的特点,它与由(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着手进行的对历史的彻底的修正是背道而驰的。

在西方左翼的阵营中人们也认识到——当然还不能把这种认识与上面提到的倾向等同看待——不能把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功绩与失误拿来比较。我最近读了许多研究东欧事件这一题目的分析文章,有篇文章中写道,东欧事件“不能简单地解释为谁对谁不对的事后证明”。在同一篇文章中,作者在提到一项不言而喻的理由(即1917年的革命“不能被说成是一个错误”)后,得出一个令人吃惊的论断:“历史上不存在错误,只存在事实。”<sup>2</sup>毫无疑问,简单化的观察问题的方式不是分析问题的好方法,但是能说如下的结论是“简单化”并予以摒弃吗?从全球的角度而不是囿于某个具体事件来看,这场现在就要结束的伟大的历史实验已经表明,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思想要比共产主义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

线更符合自由、民主和社会公正这些社会主义理想。

### 事实与错误

关于“历史上没有错误，只有事实”这一观点，如果它指的是错误也是事实的话，那是无可厚非的。只不过，选择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是不高明的，因为它会使人们错误地认为，在分析历史事实的时候，除了分析其它因素外，无需考虑造成这些事实的行动者的错误和功绩。难道在对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走过的道路的研究中，在分析先驱者的行为的时候，可以放弃错误和功绩的标准吗？抑或一定要从下面这个角度出发，即他们在任何时候只能以命定的方式顺从他们所面临的不容许作别的选择的“客观条件”呢？

然而在方法论上正确地使用这种标准则会是一幅景象。只有按照行动者自己的目的，而不是按照别人的目的来使用这些标准，才是合法的。因此问题在于了解个人的或集体的行动主体是在一定的客观条件——这些条件同样是需加解释的对象——范围内选定了实现预期目标的方法，还是在作出决定的时候犯了错误。

我认为十月革命的领导人的目标是正直的，他们想建立一个优越于资本主义的社会，而不是要建立一个今天日益崩溃的古拉格群岛式的、官僚专政的、没有经济效率的制度。他们使用了一种意识形态、一些政治方法和一个纲领，造成了事与愿违的后果，就这一点来说，错误的标准对他们适用的。发生在他们身上的这种戏剧性的事件已不是第一例，而且也不是最后一例。

1917年的革命是从打倒沙皇开始的，这当然不能视为一个“错误”，因为这场革命不是任何人计划的，它是各种客观矛盾和形形色色的主观行为的“自然的”结果，就象其它任何历史进程及其结果一样。错误或成功发生在这场革命（或进程）之内不同的政治的和社会的行动者按照他们各自追寻的目标而行动的时候。孟什

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目标是确保革命的民主特点，他们在追求这一目标的时候犯了错误。历史学家对此已作了深刻的分析。这些错误使布尔什维克的十月暴动成为可能。列宁和他的党利用了这些错误和混乱的局势夺取了政权，恢复了秩序，并且实现了他们的纲领。

他们的错误在于，相信这一纲领——对经济实行完全国有化，取消市场，党的绝对专政等等——将带来一个更公正、更自由的社会，这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选择问题，而不是某些“客观条件”的自动的产物。还有，这一事例的不寻常之处还在于，他们面对极其不利的客观条件保持住了优势。其它的参加者，其中也有一些著名的布尔什维克，对“客观条件”（人们对这些条件的评价是相差很大的）的解释却完全不同，并且赞成那些与列宁意见相左的解决方法，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如果他们的观点、或者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观点得到了实施的话，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或许历史学家今天又会按照他们追求的目标和取得的结果来谈论他们的错误或成就了。

在当前苏联热烈进行的“关于历史的辩论”中，对在某个时期犯下的错误的研究占据了中心的位置，并且完全排除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所特有的决定论和机械论的历史观。布尔什维克阵营中反对列宁的人认为国际和国内的条件不利于在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他们的观点是否有道理呢？列宁拒绝和其它社会主义政党在妥协的基础上联合起来，拒绝在十月暴动之后立即和他们一起共同组成联合政府的决定是一个错误吗？

解散立宪会议是错误道路的开端吗？列宁彻底清洗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确立了共产党的独揽大权的地位，同时却又将制定“新经济政策”视为一个成就，这是列宁的错误吗？支持拥护斯大林路线的统治集团，反对布哈林，这是一个致命的和决定性的错误吗？



这样的问题可以一直问下去，一直到今天的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最近我们经历了这样的一个时期，过去大量的错误都被承认了：在行政的计划机制已明显表现出低效率时仍旧维持它；军事上试图赶上和超过美国的决定；入侵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等等。对这些错误的承认的规模和速度也令人晕头转向，而且远未结束。当然，这些绝不是一些偶然的错误，每一个错误都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内外政策的因素，由于个人的特性或干脆由于无能而造成的。

对社会民主党历史的批判性的分析也同样会揭露大批的错误，但这些错误并没有导致社会民主党的灭亡。其原因或许不只是在它们的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设想对于它们所追求的目标——通过改良、而不是通过革命的变革来改善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争取更多的自由和民主——是比较适合的，而且还在于他们的组织的民主的工作作风，以及这样一个事实，它们必须不断地重新从社会得到以民主方式对它们的合法性作出的确认。这样就使它们有可能改正错误。

### 名称与内容

如果我们尊重现实，而不是盲目地受意识形态左右，那么我们必须说，这两种政治倾向都没有能够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和工会的斗争，促使了对资本主义弊病作出决定性的修正，然而资本主义的一些基本的结构并没有被取消，而且现在还看不出来它们中间哪些是符合可以预见的历史进步的必然需要，哪些是违反时代而必须克服的障碍。说到共产主义，那么今天甚至那些最顽固地抓住陈词滥调不放的人也明白，即使它也未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除非把名称当作事实。

关于苏联社会制度真正性质的争论，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从一开始就一直进行着，但直到斯大林死后才有巨大的反响。这意味

着,那些虽从批判性的角度出发,但却一直为这一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作辩护的主要理由,即似乎存在一个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的论据破产了。斯大林的继承者所揭露出来的事实证明,这些生产资料以及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所有其它领域的财富,实际上也被一个新的阶级,或者说被由这个国家党的高层官僚组成的统治精英所独占。从这一论断出发,人们对这种社会制度性质的种种假说进行了研究。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将它界定为国家资本主义,但大多数人则认为它是一种至今尚不明确的社会制度,它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sup>1</sup>很长时间以来,西方的左翼一直认为,这种制度至少解决了平等问题,尽管它是以牺牲自由作为代价的。而实际情况却是,它在下层实现了一种贫困的平均主义,在这之上建立了新的统治阶级特权的金字塔。现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就是反对这种平均主义和为受压迫者而斗争。平均主义不仅是特权的另一侧面,而且也是导致经济低效率和社会道德败坏的一个强大的因素。

如果人们要为这一社会制度找出一种理论模式,那么得到的无非是受到马克思指责的“兵营式的共产主义”。经济的完全国有化导致对整个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的严格控制监督,导致取消个性,并且最终导致生产和分配机制的不合理。为了建立这种制度——首先在苏联,然后在其它国家——必须对社会实行恐怖。戈尔巴乔夫打开装有这样一种“社会主义”的潘多拉匣子,引起了一场震动,我们今天是这场震动的见证人。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 由“同出一源”走向对抗

怎样去解释,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 and 政策来源 尽管同出一处,但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道路呢?实际上列宁使用的纲领和当时社会民主党的“最高纲领”十分相像。虽然他们并不是同

样对“资产阶级民主”抱敌对态度，但他们对它的猜疑和不信任却是共同的，尽管这种民主在很大程度上是工人斗争的成果，他们把它看作这样一种统治形式，他们可以用这种形式为工具来推动重大的突破，推翻资本主义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尽管当时有些理论家、政治家和工会领导人已开始持不同的看法，但这种观点在第二国际各党中还是流传很广的。

如果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之间对立的发展，就可以得出这样的论断，民主的问题是两个政党之间意见日益分歧的主要原因。在共产主义的学说和实践中，那些在“同出一源”时就已存在、并且不仅反映在党的设想而且也反映在社会主义设想中的反民主的成份走向了极端化。与此同时，在社会民主党内则发生了截然不同的现象：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在政治实践中民主的价值日益受到重视，甚至“资产阶级民主”这一概念几十年来也已收入了社会民主党的词汇。

为了解释它们分道扬镳的发展过程，必须一方面考虑到“俄国的情况”对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专制独裁的政权，缺乏自由主义的传统，在布尔什维主义产生时的革命的民粹主义的影响（列宁的三个关键思想——社会主义革命在落后的俄国发生的可能性，在这样一次革命中农民的革命的作用以及关于政党作为职业革命家、“新型的人”的组织构想——在19世纪的革命的民粹主义中就已经出现）。另一方面还必须指出“欧洲的情况”，指出自由主义的传统和为代议制民主而斗争的传统，欧洲的社会民主党正是在这些情况下发展起来的。社会民主党的左翼代表人物罗莎·卢森堡对于列宁关于党的反民主主义的观点的反应，或者她对于解散立宪会议的反应，恰恰说明了这种不同的文化传统。

“俄国情况”和“苏联情况”相结合只能最大程度地加剧反民主主义的极端化。要把“社会主义”的方案硬塞给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只能通过绝对的专政才能做到。当列宁在他生命快要结

束时认识到并且公开承认他们所走的道路至少在战略意义上是错误的时候，曾有过改变方针的可能。但是在新的领导集团中占主要地位的是以斯大林为首的极端反对民主、仇视西方的一派人，他们结束了列宁刚刚开始公开性。这种对民主的恐惧症在整个共产国际蔓延开来。社会民主主义被看作“社会法西斯主义”，并进而发展成为“头号的敌人”。

斯大林的恐怖岁月开始了。尽管赫鲁晓夫也作过改革的尝试，但直到今天的苏联改革之前，这种制度的基本结构在本质上保持不变。

反对法西斯主义和保卫民主的斗争——在希特勒早已攫取政权之后很久才发生——为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接近创造了较好的前提条件。然而这种接近碰到了两个无法克服的障碍。第一，苏联共产党这个“领导党”将它的专政的极权主义和恐怖主义的现象发展到了极端，而西方的共产党对这种新的方向表示赞成。第二，共产国际的学说继续把民主视为通向“无产阶级专政”道路上的一个阶段。

希特勒与斯大林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使反法西斯的斗争戏剧性地中断了两年。今天，苏联的历史学家认为，即使把两个独裁者之间瓜分他们在东欧的“势国范围”的秘密条约议定书考虑在内，也不能只用“战略上”的原因去解释这个条约。马克思列宁主义所特有的、并在斯大林身上深深地扎下了根的对民主的仇视和蔑视在这件事上起了重要的作用。众所周知，斯大林一直试图在两个独裁者之间达成长期瓜分世界的协议，但希特勒置之不理。

随着希特勒进攻苏联和大联盟的组成，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揭开了新的篇章。在保卫独立的过程中，苏联的国家和人民在战胜希特勒并因此拯救民主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胜利的荣誉却被用于进一步巩固极权主义专政。苏联人民仍被排除在民主之外，在克里姆林宫统治之下的中欧各国人民也同他们一样。

## 民主, 20 世纪最伟大的成果

两次世界大战和两次大战之间时期的教训、斯大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经验使自由的欧洲各国人民进一步认识到民主的价值和团结起来保证和捍卫民主的必要性。社会民主党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担当了先锋的角色。在它们的意识形态和实践中, 表示局限性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消失了, 不附加任何修饰词的民主本身成为一种价值, 即任何社会的进步所必要的、虽然不是唯一的前提条件。

西方的共产党也同样受到这个发展的影响, 但它们和苏联的专政的血肉联系, 它们坚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和十月革命赋予它们的历史合法性, 成了实行真正的民主变革的不可克服的障碍。在民主色彩日益浓厚的社会中, 它们日益受到排挤。即使是那些在革新的尝试中走得最远的党——意大利共产党是这种党的榜样——也落后于时代。它们终于因为它们从中产生的、几十年来从中受到鼓舞并且曾被它们奉为楷模的社会制度的灭亡而大受震惊, 并且被压倒了。

没有人会对几代共产党人的这场悲剧无动于衷。他们为社会主义而生, 为社会主义而战, 并且相信它已在苏维埃制度中得到了实现。但突然有一天人们揭露了这个可悲的现实。然而可能会发生的最糟糕的事还在于, 他们对这段戏剧性历史的教训仍旧打算不予理睬。

70 多年来一直似乎是社会主义化身的这一制度的瓦解也使社会主义思想的本身受到了沉重的打击。首先受到打击的是那些亲身经历过这种制度的各国人民, 但西方社会也受到了打击。社会民主党人由此看到了自己所担负的巨大责任。起初我们说, 共产主义的船沉没之后, 只剩下社会民主党来担当社会主义理想的重要

旗手了,但这只是我们就这个理想的抽象的和乌托邦式的意义而言。但现在走向灭亡的正是“权力的乌托邦”,正如两个苏联流亡历史学家给他们写的苏联历史的书所取的名称一样。<sup>1</sup>我认为,社会主义不外乎是一个在更多的自由和社会公正的意义上改变现存社会的实在的运动。理论的思想体系可以预见这个运动的发展,并为其政治实践提供动力,却不能用来臆想出一个社会必须适应它的理想的图式,很可能以后会有那么一天,那个时代的人会约定将他们的社会与从前被称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彻底地区别开来。在当前,20世纪伟大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成就是民主的巩固和发展,它将影响到21世纪。民主起源于欧洲,并正向世界扩展,进入地球上其它地区,在这一时刻,民主已把阻碍它向苏联世界扩展的墙推倒了。

#### 注释:

1. 亨利·布鲁特沃:《苏联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载于《和平报》1935年9月9日(作者为苏共中央国际部副部长)。

2. 约迪·索勒·图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载于《和平报》1929年10月23日。

3. 我在我写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危机》(1970年)一书中以及在这几年的其它著作中维护了第二种观点。

4. 米歇尔·赫勒和亚历山大·涅克里蒂希:《权力的乌托邦,1917年至今的苏联史》,加尔曼·勒维出版社1982年版。

(原文为西班牙文,王怀成转译自德文,殷叙彝校)

# 社会主义的状况和未来

欧内斯特·芒德尔\*

根据社会主义的过去分析其现状并要预见其未来,这意味着研究本世纪的全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思想史。因为社会主义的历史贯穿着 20 世纪的整个进程。

要详尽地论述这个题目,恐怕需要不止一部大部头的著作。因此,要想以一篇短文的篇幅圆满地论述这个题目,这是不切实际的冒险。在短文的论述中,细微差别、科学的基础和事件间的相互关联要尽可能地略去,留下的只是以合乎逻辑的(辩证的),其结果必然无可辩驳的论证为基础所作的分析。

我们可以直截了当地断言,这样的分析绝不是教条的或演绎的。

它以大量经验材料为依据,这些材料任何人只要想得到我们都可以提供。不过读者首先必须满足于追随作者的思路,并主要根据这一思路的本来意义及其自身说服力对其作出取舍。

## 一

社会主义的危机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150 多年来,社会主义一直是同一股思想和行动的潮流融为一体的,这股潮流试图用

---

\* 欧内斯特·芒德尔:第四国际领导人,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经济学教授。

一个全新的、各方面都更加美好的社会来取代资产阶级社会。

更加美好当然并不意味着尽善尽美。除了若干已再次销声匿迹的少数派外，绝大多数信仰社会主义的流派从未幻想过尽善尽美的千年王国，而既无知又不诚实的敌人却一再以此来非难他们。社会主义并不是要创造“人间天堂”或一劳永逸地结束人的发展，更不是要达到“历史的终点”。

恰恰相反，在马克思、恩格斯和无数其它社会主义思想家看来，社会主义意味着人类古代史的终结，意味着人类真正的历史的开端和有悖人的尊严的生存状态的结束，在这种生存状态下，人们总是受到强制，为起码的生存问题和一点点可怜的利益而争斗并自相残杀。此后将开始进入真正人的生存状态，在这种生存状态下，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将不同于野兽之间的争斗而与人类的尊严相称。

社会主义者一致勾画了这样一种社会，在这个社会里，资产阶级社会的根本缺陷将被铲除，任何形式的阶级社会将被埋葬。社会主义者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压迫、强权和不公正，没有任何一个人类集团明显受歧视的社会。这是一个不以竞争、人皆为敌和个人发财致富的渴望、而是以合作和团结作为社会行为的主要动因的社会，废除主要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私有制和实行计划经济，被视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尽管尚不充分、但却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这就涉及到要为实行社会变革即深层含义上的社会革命（不是这一概念的狭义解释即“革命等于暴力”）制定具有连贯性的计划。直到 20/30 年代，所有的社会主义者，无论其在政治上和战略上属于何种派别，对这类计划都是普遍认同的，对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来说，这种共识甚至还又持续了长达数十年之久。甚至他们的主要同盟者，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解放运动的战士，也接受了这样的计划。



对此下面的例子是很典型的：当 30 年代的经济大危机爆发时，整个社会主义运动及其所有流派几乎异口同声地作出了这样的回答：“用计划经济（依流派分别有社会主义的、民主的或国家的计划经济）克服资本主义危机”。

而在今天，在 70 年代爆发了至今仍远未结束的长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衰退之后，<sup>2</sup> 无论是在地球的西方、南方或东方，以社会主义为旗帜的文职官员和高级军官的绝大多数集团都不再作这样的回答，即使有人这样回答，也只是半心半意的和没有多大信心的。我所属的派别虽然仍十分坚定地这样回答，当然使用的是 1930—1955 年间尚不为人知的论据，<sup>3</sup> 但是它不抱任何幻想。它目前只是一个有限的少数派，尽管具有这种倾向的并非只是它这一个派别。

因此社会主义的危机首先是社会主义计划的信誉的危机。5 代社会主义者和 3 代工人曾为强烈的、不可动摇的信念所激励，即认为我们刚才所说的那种社会主义是可能的和必要的<sup>4</sup>。而今天的这一代人却不再确信它是可能的，他们甚至还至少是部分地怀疑这种社会主义是否必要和有益。<sup>5</sup> 所以说我们遇到了深刻的危机。

## 二

社会主义的危机实质上是社会主义者的实践的危机，这是我们的第一个中心论点。社会主义的危机一方面是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主义的历史性失败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包括改良主义渐进论的各个变种（欧洲共产主义和第三世界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在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失败的结果。

乍一看，这样硬性地把理论和实践相互分离，可能会令人感到奇怪。对于主张辩证思维方式的人来说，这种分离大概尤其显得缺乏根据。我们必须以某种方式对此作一番细致的说明。我们把社

会主义的危机解释为首先是实践失败的反映,依据的是4条难以辩驳的论据。

第1条论据是,在广大群众的心目中出现了对于社会主义计划的信念危机;这就是说,这种信念危机绝非仅限于知识界和政界的狭小圈子。

广大群众的态度不是由他们对理论的看法决定的。马克思的《资本论》或列宁的《怎么办?》的所谓的缺陷,在95%的群众甚至从未读过这些著作的情况下,怎么能决定数千万人的态度呢?广大群众形成其信念和思想倾向是根据他们的经验,而不是通过阅读或上进修班——就连已经部分摆脱了统治阶级思想影响并且已不同程度地具有一定阶级觉悟的劳动群众也不例外。广大群众通过与社会主义者交往而获得的与他们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日常体验不同的、具有决定作用的经验,显然是从社会主义者的实践中,而不是从他们的理论中感受到的。

此外,无法证明共产党人至迟从1923年以来的实践和社会民主党至迟从1914年以来的实践与19世纪末曾得到普遍公认的那种社会主义的(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有任何相符之处。而这一理论在20世纪初曾得到社会民主党的赞同,在1900—1920年间先是得到革命的社会党左派,后来又得到共产党人的赞同。既然灾难性的实践是在同理论决裂之后才发生的,那么人们又怎么能用理论的失误来解释这种灾难性的实践呢?

要想论证一种社会发展理论的成败,人们必须首先回答下列问题:这种理论是否能对最重要的社会经济发展作长期分析?它能否预见本世纪重大历史事件的一般进程?它今天是否也还仍然适用于对今后的20—30年作出分析和预言?

对上述问题我们毫不犹豫地用“是”来回答。我们能够证实这一点。因此在我们看来,让正确的理论为错误的实践的罪过负责,这起码是荒谬的。此外我们还确信,这样来考虑社会主义危机的解

决办法，会使人看不到清除弊端的合适手段。它将把它的支持者引入死胡同。

我们的中心论点的第4条论据绝对是最有说服力的。我们在论及本世纪社会主义两大群众性流派和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失败时，针对的既不是“错误”，也不是可宽恕的过失或个人意义上的不愉快现象。<sup>7</sup>我们针对的是规模惊人的罪行，这些罪行给数千万人造成了令人愤慨的后果，把这类后果与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或其他某个人的这一个或那一个重大分析错误或预见错误（如果确实能证实有这样的错误的话）所造所的后果相提并论，那是荒谬的。

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主义实践的罪行尤其涉及以下方面：至迟从1923—1924年起（如果不是更早的话）对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苏维埃民主和共产主义工人参与政权的一切努力的镇压；农业的强迫集体化和把富农或所谓的富农流放到非人的生活条件下；从1934年开始的至少使100万共产党人丧生的恐怖清洗；希特勒—斯大林协定所导致的领土后果和镇压后果；1945—1953年间在被苏联占领或统治的国家中实行的大清洗；对1956年匈牙利革命的军事镇压；为镇压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而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占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血腥镇压为特征的文化革命；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的暴行；入侵阿富汗以及苏联社会福利事业的严重衰退，由此该国实际上成为70年代末80年代初世界上平均寿命下降和婴儿死亡率上升的唯一国家。

这些罪行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它们绝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合乎逻辑的”或“命中注定的”结果。无数共产党人曾对必将导致这些罪行的政治决定及时敲起过警钟。他们对这些决定的后果当时就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而不是在10年、20年或30年以后才提出批评。这在许多情况下往往使他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例如布哈林、托洛茨基和伊姆雷·纳吉等人的情况。但是面对

由数千万具尸体所揭示的罪行的可怕记录,这些人的个人命运在群众的心目中自然就不那么重要了。

把这些罪行说成是帝国主义宣传的“发明”或借口揭露这些罪行会使工人“气馁”而有计划地对其进行掩饰的企图,在历史上注定要失败。人们不可能长期否认将近 15 亿人亲身经历过的事实。真相最终总要暴露出来。西方、南方和东方的大部分工人意识到事实真相至少已有 20 年了,至迟从 1956 年起真相就已暴露出来了(一些先驱者意识到事实真相甚至还要早得多)。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以苏维埃国家本身的名义确认了这些事实真相。但是,让公开性所作的揭露来为斯大林及其继承人的罪行对各国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信念的灾难性影响负责,这是毫无道理的和极其反动、反共产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的。出现这种无可争辩的迷惘和气馁的原因不能在罪行的揭露中寻找。这种迷惘和气馁是由这些罪行本身引起的。

此外,我们的指控,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苏联和东欧的大多数工人和共产党人提出的指控,只包含了斯大林罪行的直接后果。要想控诉得更加彻底,那就必须把斯大林主义者和后斯大林主义者的政治错误的间接后果也包括在内。例如德国关于“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从 1936 年 9 月起西班牙工人统一的破裂;对 1942 年印度人民起义的背叛;对 1936—1945 年间波兰反纳粹人民抵抗的态度以及 1947—1965 年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对本国资产阶级军队采取的灾难性政策——这里仅列举造成了最严重后果的事例。在这些事例中,同样有数百万人由于这些错误的政治后果而丧失了生命。

以上简要回顾所显示的失败记录是触目惊心的。但是,国际社会民主党自 1914 年以来的失败记录在惨痛程度和流血程度上也毫不逊色。

除少数几个值得称赞的例外(主要是意大利),各国社会民主

竟几乎都以“民族防卫”为借口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血腥屠杀辩护并向其提供支持,而它们所假托的那些理由的荒谬性今天实际上已无人再否认了。这场严酷的战争不仅导致了上千万人(欧洲青年的精华)死亡,而且它还是现代史上的一道分界线,是现代史决定性的转折点。从这一刻起,祖国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日益严重的野蛮和暴力逐渐被当作命中注定的、无法逃避的和不可避免的东西而接受下来,<sup>8</sup>军国主义和由国家施行的暴力——现在人们谈论国家恐怖主义不是没有道理的——是社会主义者从19世纪初起就坚决反对的东西,但这些都逐渐为“自由主义的人道主义者”<sup>9</sup>和越来越多的社会民主党人所接受。社会民主党人放弃了以让·饶勒斯、我们伟大的罗莎(指卢森堡一译者)、卡尔·冯·奥西埃茨基和库特·图霍尔斯基为象征的不屈不挠的反抗,走上了怯懦的顺从之路,这条道路最终导致了诸如奥斯威辛、广岛、对柬埔寨的致使树叶脱落的轰炸和核战争对全人类的威胁等一系列恶果。

从盲目的反共主义出发,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18—1919年间有意识地使普鲁士的军国主义者集团得以继续存在并蓄意组建了志愿团,从这些志愿团中产生出了冲锋队和党卫队的核心。德国社会民主党庇护了杀害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和成千上万工人的行径。它阻碍了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德国的可能性,而这样的国家本可使人类免遭斯大林和希特勒所造成的可怕灾难。

德国社会民主党由于其在1929—1933年间的政治盲目性、荒谬的合法主义和拒绝在还有可能的时候组织反对希特勒政府的起义性总罢工而对纳粹专政的上台和巩固负有连带责任,纳粹专政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使人类付出了8,000万具尸体的代价。

社会民主党政府或有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参加的政府组织或者维护了在印度支那、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阿尔及利亚进行的殖

民战争。它们组织或者庇护了刑讯拷打,尤其是在阿尔及利亚。它们严厉限制民主的自由权利,尤其是在印度、印度尼西亚、埃及、伊拉克和新加坡。它们粉饰并支持在南非保留惨无人道的种族隔离政权。

英国工党政府应当对鲁尔区的煤炭和钢铁在 1945 年以后未实行国有化,致使这些自然资源继续掌握在曾资助和支持过希特勒的康采恩手里承担责任,尽管三分之二的居民明确表示赞成国有化,尽管这同一个政府在英国对煤炭和钢铁实行了国有化。

国际社会民主党参与冷战达数十年之久。它赞同在西欧部署核武器,支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并以陈腐的反共主义为理由维持了工人运动的分裂。它今天仍拒绝接纳法国总工会和葡萄牙工人总工会加入欧洲共同体范围的共同工会阵线,而这种做法只会对雇主方面有利,它一如既往地同帝国主义勾结在一起,共同致力于维护能对第三世界各国人民进行超额剥削的国际经济结构。它从 70 年代后半期起亲自支持或组织实施了紧缩政策,大资本利用这一政策力图实现通过降低工人的实际收入和提高失业率来捍卫并增加自己的利润这一目标。

然而,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性失败并不仅限于上述罪行的范围。它的最坏方面是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尝试的历史性失败。

今天,在成体系的社会主义行动开展了 150 多年之后,在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奋斗了 150 年之后,尽管经过了无数次惊心动魄的战斗并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世界上却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建成社会主义。任凭人们怎样努力为强调相反的观点而进行宣传,人民群众还是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思想迷惘和怀疑的最深刻的根源可能就在于此。追求一个甚至经过 150 年的努力都未能实现的目标现实吗?继续为此付出牺牲值得吗?这就是他们向自己提出的根本问题。

如此看来,人们能在思想上为国际资产阶级提供的最大帮助就是给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东欧和其它地方的不伦不类的过渡社会挂上“社会主义”的标签。恐怕没有什么能比干这种理论上的大蠢事更严重地败坏社会主义的声誉。它使资产阶级及其政治家和思想家有可能依据无可辩驳的证据讥讽地宣称:存在着“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社会主义的”集中营,“社会主义”下工人的物质贫困、对妇女的“社会主义”压迫、对人权的“社会主义”压制、普遍的“社会主义的”卖淫和营私舞弊等等。

巴黎公社的男女社员们、奥地利保卫同盟的战士们、1936年夏西班牙共和国的男女英雄们、斯大林格勒的男女英雄们和中国长征的男女英雄们难道就是为了这些而战斗和牺牲的吗?

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性失败的记录属于较低的层次,但其后果却差不多。在为争取能据以取得议会多数的普选权而斗争了100年之后,在“你们投给我们50.1%的选票,我们就会实现你们的(我们的)目标”一类的誓言喊了数十年之后,人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在社会党人拥有议会多数的任何一个地方,资本主义都在继续——金牛犊仍然存在。

最有说服力的两个例子是瑞典和法国(人们同样也可以列举奥地利、挪威、澳大利亚、新西兰、西班牙以及1974年以后的葡萄牙)。令人难忘的奥洛夫·帕尔梅在领导他临终前的某次选举斗争时曾用这样的论据来打动全体选民:“请给我们议会多数吧,否则控制着经济的15个家族就会同样控制政府。”在社会民主党人几乎不间断地执政了40年之后,15个家族仍继续控制着一个国家的经济,这难道不是一次失败的记录吗?

在法国,社会党和共产党在80年代初共同掌握了65%的议席,他们是在“变革”的旗号下得到男女选民稳定的绝对多数票的支持而当选的。然而“变革”实际上根本没有进行。经历了“左翼联盟”时期的法国同当初一样是资本主义的,而且失业现象更加严

重。在这种情况下，群众对彻底改造社会的前景和社会主义计划持怀疑态度难道还会令人感到惊讶吗？

### 三

然而，在对社会主义 150 年的斗争经历进行反省时，我们的指控在这一点上应留有余地：实现最终目标方面的失败是伴随着实现部分目标方面的同样引人注目的成就而来的。这就需要进一步阐明这一失败和这一成就之间较深刻的辩证关系。

社会主义者（还是指所有的流派）100 多年来的顽强努力，最终使社会现实发生了世界性的根本变化，尽管尚未在任何一个地方导致建成社会主义社会。

150 年前，8 岁的女孩子就在煤矿的非人条件下做苦工。而在今天，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这样的惨事都不再有了。甚至在我们这个世界的南方，这样的惨事也越来越罕见了。这要归功于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的顽强努力。

150 年前，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平均工时为每周 72 小时或者更长。而今天的平均工时至少在工业化国家中已缩短到了 36 小时，这又要归功于所有流派的工会会员、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的顽强努力。

150 年前，病人、残疾人、失业者和老年人只能在极度贫困中生活。1900 年时，在伦敦或纽约这样的富裕城市的贫民区里，孩子们还仍然光着脚走路。而今天，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障已有可能使绝大多数职工免遭这样的贫困。工会会员、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虽然也在第三世界国家为实现同一目标而进行了斗争，但迄今为止收效甚微。

150 年前，除极少数技术熟练工人外，大部分职工都是些未受过教育的、绝望的男人和妇女，他们常因酗酒而处于麻木不仁的状



态,而且多数是文盲。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顽强努力最终提高了职工的素质,使其具有了初步的知识、教育、人的尊严和自信。

斯大林主义和毛主义产生了可怕的后果。但是,俄国十月革命、中国革命、南斯拉夫革命、古巴革命和其它类似的运动使进步和初步的解放成为可能,这种进步和初步的解放是任何人凭良心都无法否认的。

要确证这一点,人们只需拿 1850 年的只因一点儿鸡毛蒜皮的小事便遭鞭笞和流放的贫苦农民,拿长期遭受 1900 年饥荒折磨的不识字的贫苦农民,同今天有文化的苏维埃公民对比一下就可以了。人们只要拿旧中国的城市同今天的中国城市对比一下就可以了。旧中国的城市挤满了苦力,他们凭自己的力气拉黄包车,即使在有饭吃的情况下每天也不过是靠一碗米饭充饥。而在今天的中国城市里,成千万男女公民拥有自行车,城市和农村 25% 的家庭拥有洗衣机。

人们只需了解一下,今天的古巴具有拉丁美洲最低的死亡率,并在扫盲、教师培训和出版书籍等方面位居世界前列。

因此,人们不能说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徒劳无功,尤其不能说劳动群众为改善自己的命运所作的努力是白费气力,所有这些工作,所有这些努力,已经使世界发生了根本变化。人们必须依据上述成就,依据对成功和失败同时进行批判性思考,来探讨社会主义的未来和可能性。

此外我们认为,广大群众的精神面貌和思想觉悟也发生了根本变化,这种变化是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斗争的结果,世界各地的大部分劳动群众不再接受束缚他们的锁链,而这些锁链过去曾被认为是好的和金子似的,因为它们是长久沿袭下来的。1850 年、1900 年或 1944 年时曾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传统价值”(这是上帝安排的)、“这是祖国的要求”、“贫困总是存在的”、“富人之所以富

是因为他们天生就是杰出的人”、“最优秀的人统治着我们”、“我们太无知了，取代不了资本家和部长们”、“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战争是培养勇敢精神和男子气概的好学校”，今天已被认为是可笑的或受到鄙弃。甚至连教会中最明智、最宽容的派别也不再固守这些“传统价值”了。

西方、东方或南方的大部分劳动群众今天确信，“上层人物”即统治这个世界的人，都是些既腐败又无能的人。<sup>10</sup>这是社会主义运动在其黄金时代能够清晰地加以说明的日常经验的结果，社会主义运动有助于（不是“导致”）人们意识到这一日常经验。这样就完成了精神和道德康复的重要工作。以上情况证实了亚伯拉罕·林肯的一段著名的话是至理名言：“人们能够自始至终欺骗某些人和在某一段时间里欺骗所有的人，但是人们不可能自始至终欺骗所有的人。”这是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始终支持着继续为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的社会主义者的历史乐观主义信念的一条主要理由。

绝大多数劳动群众比怀疑社会主义计划更强烈地否定资产阶级社会和东欧国家统治结构的合法性。这是可由经验证实的主观现实，我们必须从这一现实出发。

这里有人可能会提出异议：但是群众并不否认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价值，即力求挣更多的钱，以便改善自己的物质境遇，进而有能力购买由“消费社会”生产出来的充裕的商品。

这一异议反映了分析上和语义上的混乱。对于资产阶级社会来说，能表明其特性的不是作为交换手段、作为购买消费品工具的货币。表明该社会基本特性的是由赚钱过渡到积累资本。

在前一种情况下，货币是达到目的的简单工具。恐怕没有任何一个理智健全的雇佣劳动者会反对不用货币这种支付手段便得到所需要的商品和服务——例如：免费的医疗保健——，只要他或她能够自由选择，而且所分得的商品和服务是高质量的。而假如货币没有统治社会，那就没有任何一个资本家能作为企业主或投机商。

通过剥削他人劳动发财致富、积聚私有财产或将财产转让给自已的子女。这第二种“价值”是绝大多数雇佣劳动者既未“领悟”又不曾实际运用过的。资本主义的典型现象是，极少数人只有在对大多数人隐瞒这一价值的前提下才能运用这一价值。

一方面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 100 年来积累起来的部分改良和部分成果，另一方面是实现“最终目标”上的失败，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联系？无政府主义者和某些左翼派别断言存在着因果联系，但是他们所作的论证却并不令人信服。

帝国主义宗主国的雇佣劳动者群众今天是否因自身境遇无可置疑地得到了改善而比从前更容易接受资本主义的日常现实，对这一问题人们可以进行讨论。这一问题要求对各种不同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进行详细的、有经验根据和统计证明的分析。然而，认为雇佣劳动者群众在 1914 年之后更频繁、更大规模地一再举行反对资本主义的抗议活动的反论证，肯定不会因此而被驳倒。

而左派的论证最终却被驳倒了，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因极度贫困或绝对贫困化而导致以消灭资本主义乃至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为目标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我们这样说的理由是很明显的。

一个反对现存统治制度并力图用一个更美好的社会取而代之的大规模抗议运动需要劳动群众方面有高度的团结、组织、自信和斗争经验。而这种状况的实现绝不可能出自劳动群众的贫困化、无望的贫困、穷困潦倒和绝望。

群众坚持捍卫部分成果，这说明了为什么男女选民们在选举中通常——美国目前是个突出的例外——总是优先选择改良派政党和新改良派政党。甚至在匈牙利和波兰，被认为要对严重的经济危机负责的共产党在第一次真正的自由选举中也能同它们的联盟党一起赢得大约 30% 的选票。

虽然选民的态度在各个地方都表现出对这些政党的本质不抱任何幻想，也就是说，选民们是在带有许多保留意见和大量弃权的

情况下无可奈何地选择了“较小的祸害”，但是这种选民态度还是很能说明问题的。由于同样的原因，绝大部分社会主义者始终支持并试图领导争取改良、争取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争得并巩固民主的自由权利和争取改善群众的物质境遇的斗争。

我所属流派的革命社会主义者承袭了这一传统。它不仅谴责社会民主党人，而且不得不越来越频繁地谴责仍然——还能持续多久？——信奉共产主义的众多流派，因为它们放弃为实现必要的改良而进行坚决的、不妥协的斗争，为“社会和平”、“社会契约”、“维持公共机构稳定的承诺”、“优先维护在开放经济中的经济竞争能力”以及其它反映资本的阶级利益的考虑而牺牲必要的改良。

然而，“改良—革命”、“部分成就—最终目的”，这类罗莎·卢森堡早在她1900—1910年间写成的最重要的政治著作中就已出色地探讨过的虚构的二律背反，使人们注意到一个难题，这个难题造成了社会民主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在实践中的失败。它关系到部分成就在工人运动内部造成的社会的和心理的后果。这些后果可以概括为这样一个公式：极端保守的“工人”官僚机构和“社会主义”官僚机构的膨胀。

对于广大群众来说，改良取得成就并不一定总是要以接受现存统治制度为前提。一定时间的或暂时的失业、生活水平的一时下降、周期性反复发生的战争、危机和对民主的自由权利的限制，都是阻碍实现这种持久的一体化的反作用力。

而在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中发展起来的或已在后资本主义国家中取得执政地位的<sup>11</sup>官僚机构那里情况则不同。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与其所取得的地位及其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sup>12</sup>相适应，这些官僚机构最终已同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阶级国家一体化了。在东欧国家，上层领导集团在相当程度上为他们自己实现了“社会主义”，而没有为全体人民群众实现社会主义。<sup>13</sup>

一方面是无可置疑的物质利益，另一方面是社会民主党的、工

会的和斯大林主义的(后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机构所表现出来的越来越系统化地拒绝为实现最终目的而斗争。想在这两者之间确立一种直线式的、自动的因果关系,曾被说成是屈从于庸俗唯物主义或屈从于某种与对历史(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唯物主义解释相对立的“密谋理论”。

这两者一致证明,官僚机构害怕失去既得利益,害怕“冒险”,颠倒了“手段(工具)—目的”的关系,赋予被提升为“目的本身”的“组织”以独立性并对其盲目崇拜。捍卫由“党”行使的“政权”或“国家政权”压倒争取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而占了上风,其方式简直近乎狂热。社会民主党的官僚机构以此方式保卫“民主机构”,以防革命群众的冲击。“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机构也同样狂热地坚持为“一国范围的(或“社会主义阵营范围的”)社会主义”的神话以及“党国家”的神话(“假如党的领导作用受到怀疑,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资本主义复辟”)辩护,共同反对革命群众。

历史本身为防止这种情况找到的替代解决办法可以用英国左派社会党人安奈林·比万提出的公式来概括:“社会党人的任务不是行使政权。社会党人的任务是运用政权实现自己的纲领。”导致作出与纲领相抵触的决定——如果想避免“按规范思维”的责难,那么这样说更确切些:导致采取违背工人利益的措施——的任何一种执政方式、“行政社会主义”的任何一个变种,都不是较小的祸害,而毋宁说是较大的祸害。

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一条无可争辩的缺点需要克服。社会主义运动很早就认识到了这样一种危险,即它自己的干部有可能由公仆演变成为对群众多少有些专横的主人。不仅无政府主义者经常谈论这一点,而且马克思、恩格斯、年轻时的考茨基、年轻时的托洛茨基、让·饶勒斯、罗莎·卢森堡、年轻时的布哈林,《国家与革命》和晚期著作中的列宁以及奥托·鲍威尔,也都曾不止一次地谈到过这种危险。

但是,理论不可能超越物质现实。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后资本主义国家,都需要借鉴1914年的令人震惊的经验,以便在较深入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支持必不可少的反官僚主义方面的社会良知,无产阶级的良知。这一点已经部分实现了。

对一切官僚机构,包括对资本主义大公司的和所谓民主国家的官僚机构的不信任,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地扎根在群众的意识中。这是一个进步而不是退步<sup>15</sup>。它导致社会主义越来越同广大群众自身的主动性,自身的组织和自治融为一体。这不仅仅是向最初价值和真理的回归。这是向前迈出的一步,为在广大群众心目中重新确立社会主义计划的信誉,迈出这一步是绝对必要的。

决定性的回答毫无疑问要由实践作出。为最终消除群众的怀疑,需要有一个新的,令人振奋的经验,它类似于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或1936年夏的加泰罗尼亚的经验,不过影响面更广,而且取得的社会成就就要使前进了的资本主义所取得的成就相形见绌并有持久的成效。有可能一个大国未来的社会主义政府(工人的和人民的统治)立即实行半日工作制将成为这样的启动器。这将使全世界的雇佣劳动者振奋起来<sup>16</sup>。

大幅度地缩短工作日是一切自治方案取得成功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如果生产者—公民(女生产者—女公民)没有时间处理自己的事务,那么社会划分为管理部门和被管理者的现象就将继续存在下去或必然重新产生出来。此外,要在劳动生产迅速提高和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的背景下恢复并保持充分就业,也必然要求大幅度地缩短工作日。女权主义者的愿望——减轻对于领薪妇女来说意味着双重工作日的沉重负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的愿望也同样要求缩短工作日。

而大幅度缩短工作日首先是与一种双重的——主观的和客观的——变化相适应的,这种变化起源于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普遍危机。与一种没有任何经验根据

的神话相反,男女生产者越来越拒绝接受著名的(新教的?日本的?)“劳动伦理学”。减少工作和提高生活质量,这是他们的首要愿望——即使在日本也是如此。这是我们已经提到过的“价值革命”的结果。它首先是对地狱般的工作节奏使人精疲力尽同时毁坏人的身体、神经和精神健康的性质,对机械的、重复的、无创造性的劳动的单调的、因而同样具有破坏性的性质的日常痛苦体验的结果。

这里显露出晚期资本主义的致命弱点。它虽然能设法——其成效比通常假定的要小——使男女雇佣劳动者作为消费者一体化,也能设法使男女雇佣劳动者作为公民一体化或至少使其中立化,但是它不能使男女雇佣劳动者作为生产者一体化。

资本主义的本性决定了这个制度下的男女生产者不可能是自由的和独立自主的。自由劳动是自我控制和支配的劳动,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自己决定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和为谁生产。这只有在自由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者的领导下才能实现。在与支配雇佣劳动含义相等的资本的统治下,这种劳动是不可能的。

此外,与这种主观上的需要相适应的还有客观上的必要性。

第三次科技革命使那种以强化劳动者的体力投入作为增长的源泉——如果是也只是次要的——的作法,即使从任何意义上的“纯”经济观点来看,也显得既无效又不合理<sup>17</sup>。

今天,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可以说:宏观经济的“优化”,99%是取决于工具的种类和质量,商品流通和仓储的合理化,也就是说有计划的组织<sup>18</sup>以及男女生产者的技能专注和责任感。

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东欧由行政机构管理的或官僚主义的商业体制,其经济上最大的失败就在于它们没有能力调动起工人的这种注意力和责任感。工人们对于繁重的劳动怨声载道,在这种劳动中他们体会到,他们早晚要为此付出代价,而别人将坐享其成。日本资本家为解决“轮班工作制”和“质量保证制”产生的问题所作的

努力由于同样的原因而以失败告终，工人们不愿意“无报酬地”辛苦工作。

只有生产者自由联合的体制才能改进监督，发挥创造性以及个人的和集体的责任感，否则新工艺的相当一部分潜能将被闲置和浪费。要释放这部分潜能，恰恰需要对工作时间、学习时间（技能、信息、文化知识）和闲暇时间之间的关系进行彻底变革，而且是终身性的<sup>19</sup>。因此，实践经验证实了马克思在《大纲》中所作预言的合理性，根据这些预言，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水平后，闲暇时间而不是工作时间将成为财富的源泉和尺度。

结论：我们仍然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最高权力仍然掌握在大资本手中<sup>20</sup>。对于数十亿人来说，这种权力的后果是可怕的。这些后果有演变成灾难的危险。社会主义的斗争必须把争取改善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当前境遇的斗争同他们接管最高权力的系统准备工作联系起来，一旦出现夺权的有利时机就通过广大群众的行动接管最高权力。

#### 四

在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客观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的历史时刻，社会主义计划丧失了信誉，这不单纯是，但主要是由于经济效率方面的原因。

昨天的抉择是“社会主义还是野蛮”，而今天的抉择简直就是“社会主义还是死亡”。

马克思主义者经常受到指责，说他们低估了资本主义的适应能力及其经济和政治领导人的灵活性。这里不是探讨这种指责有多大根据的地方。它可能含有真理的内核。从1848年至1937年（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是从1940年至1973年）的长期经济扩张及其社会成就确实使马克思主义者感到意外。它现在同样也使自由



主义者和新保守主义者感到意外(试比较一下海恩斯和其他人反对凯恩斯和新凯恩斯主义者的愤怒的喊叫声)。他们曾宣称,“国家统治主义的”罪行的报应将是因通货膨胀而造成贫困化。而这一预言并没有应验——至少是没有在帝国主义宗主国应验。

然而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者仍然有理由提醒人们注意人类为资本主义的持续扩张所不得不付出、并且仍在付出的越来越高昂的代价。资本主义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代价才终于找到了摆脱1913—1939年的“长期萧条”的出路。我们已经提到过: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付出的代价是8,000万具尸体和前所未闻的野蛮(奥斯威辛、1942—1943年的孟加拉饥荒、广岛)。即使不使用核武器,第三次世界大战将付出多高的代价?

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必要性所依据的第二个中心论点是:资本主义丧失适应能力的临界线越来越临近了,资本主义的创造力量变为毁灭力量的暂时性的转变正趋向于变成永久性的转变。自杀性的灾难不仅威胁着文明的延续,而且还威胁着自然科学意义上的人类物种的延续。

《约翰启示录》的四骑士(原意分别是象征瘟疫、战争、饥馑、死亡——译者)已经在打猎。我们已经闻到了他们难闻的气息。这四骑士就是迫在眉睫的战争毁灭、迫在眉睫的对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破坏、迫在眉睫的第三世界的大规模饥荒和迫在眉睫的在帝国主义宗主国中随着贫困现象重新蔓延和对民主的自由权利的剥夺而出现一个“两极”社会。

第一种威胁最早是以核战争这种表现形式为人们所注意,没有哪一个有理智的人会怀疑核战争具有自杀的性质。但是威胁绝非仅限于核战争的可能性。在存在着核电站的时代,任何一场用常规武器进行的世界大战都会导致与核战争同样的后果。此外,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也有造成类似后果的危险。当人们正在计划制造具有与落在广岛的炸弹同样大甚或比它更大的破坏力的炸弹和非

核弹头——且不说“死光”和其它为坐在写字台后面的军事家和战略家们所向往的玩艺儿——的时候，“常规武器”这一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意义。

同样，第二种威胁也越来越强烈地被人们感受到。环境意识不是富国的奢侈品。它是全人类所面临的现实威胁的对应物。这种威胁在苏联、东欧、巴西、墨西哥和印度正在明显增强。许多有名望的科学家认为，爆发环境灾难甚至比战争毁灭的危险具有更大的可能性。

第三种威胁可惜甚至在西方和东方的左派圈子里也极少受到注意。南半球的居民对它当然是很熟悉的，因为他们每天都在目睹和经历饥荒的威胁。对此我们想举两个例子。

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统计，第三世界每年有 1600 万儿童死于饥饿和可医治的疾病。

这就是说，每 5 年的死亡人数与整个第二世界大战期间的死亡人数一样多。每 5 年一次针对第三世界儿童的世界大战。这就是某些社会主义者所极力赞美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实际运行的结果。

在最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里，50% 的男女居民食物摄入量下降到了这样的水准：自经济萧条开始以来每天大约 1700 大卡热量。这是 1940 年以前，即真正的灭绝集中营出现以前，纳粹集中营的令人营养不良的水准。

第四种威胁在一部分大城市的居民看来已是明显的事实。人们只需探访一下纽约的哈勒姆或贝德福德—斯泰弗森特的某些区，利物浦或格拉斯哥的某些区（更不用提那不勒斯或巴勒莫了），凭肉眼就可以确证这一事实。在巴黎的某些区，“打零工”的外籍工人在那里耐心地等待着象从前的“短工”那样被雇佣，他们是按小时计酬的，没有任何社会福利。他们的生活境遇就是这种可悲的社会发展进程的真实写照。

这一进程对整个工人阶级的长期影响目前还几乎不为人们所了解。让我们想想看，在美国的年轻黑人和波多黎各人中失业率已高达40%以上，与这种社会倒退相伴随的贫困、绝望、堕落等一系列伴生现象已经在发展。

此外我们还要想到，民主的自由权利在帝国主义宗主国逐渐被剥夺<sup>21</sup>与其在第三世界不断受到损害在时间上是同步的。据大赦国际统计，世界上有60多个国家存在着程序化的，甚至是由官方进行的刑讯拷打。

有的人承认这一阴暗的情景，但补充说：现在已经太晚了——《约翰启示录》的四骑士肯定将把我们杀死<sup>22</sup>。然而他说得不对。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劳动人民丧失了这样的能力，即阻止走向深渊的进程；把他们自己创造的工业技术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销毁库存的武器并最终制止武器生产；重建受到威胁的经济平衡并向第三世界和世界其它地区受贫困威胁的群众提供食品和医疗援助。他们有这样的能力。而要将这种能力付诸实践，需要的是采取行动的意志和行动计划，尤其是需要有实际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权力，以防止任何人把这种努力引向与上述主要目标相反的方向。

与上述“灭绝论”观点的支持者相对立的是那些指责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怀有“夸大其词的灾变论思想”的人。他们虽然不否认我们列举的危险，但却断言这些危险并不那么严重，涉及的只是枝节现象，这些现象由于政府和专家们的智慧已经得到缓解、它们不是在扩大，而是在缩小，到时候一定会一切顺利的。

这是一场旧争论的继续，这场争论100年来一直贯穿着工人运动，现在它进入了第三个阶段。这场争论最终奠定了“改良主义者”与“革命者”的对立。

爱德华·伯恩斯坦是社会民主党的渐进主义的创始人<sup>23</sup>，他的思想显然比他的绝大多数学生和继承者更清晰、更连贯。按照他的思想，本世纪的基本趋势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矛盾，尤其是其

爆炸性的对立不断缩小,经济危机将越来越少,危机的程度将越来越轻。因此社会的紧张气氛将日趋缓和,专制日益减弱,民主日益加强。战争和各种形式的暴力冲突越来越少。革命也必然会越来越少,或者更确切地说,在“文明”国家中干脆就不会再有革命。

相反的论点主要以罗莎·卢森堡为代表,她断言,尽管资本主义的对立在一一定的时期——我们今天可以补充说明:“持久扩张时期”——会暂时减弱,但是本世纪的基本趋势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矛盾日趋尖锐而不是日趋缓和。

那时经济危机将比19世纪更严重而不是更轻微。

将会有更多的专制和更多的革命,尤其是将会有更多的战争和更多的暴力,其破坏性的结果将比19世纪更严重得多。

毫无疑问,正确认识事物的是罗莎·卢森堡而不是伯恩斯坦。请记住这些决定命运的日子:1914年、1917年、1918—1919年、1920年、1922年(墨索里尼上台)、1925—1927年(第二次中国革命)、1929年、1931年(日本进攻满洲)、1935年、1935年(意大利进攻埃塞俄比亚)、1936年、1937年、1939年、1942—1943年(孟加拉饥荒)、1945年、1946—1947年(因划分印度而引起的骚乱,第一次阿以战争)、1949年、1950年(朝鲜战争)、1954年(阿尔及利亚的革命和战争)、1956年(苏伊士之战)、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1962年(美国人干涉印度支那)、1967年(第三次阿以战争)、1968年5月、1969年意大利的热秋、1970—1973年(智利革命高涨和皮诺切特的军事政变)、1973年(埃以战争)、1974—1975年(葡萄牙革命,第一次普遍的经济衰退)、1978年(伊朗革命)、1979年(尼加拉瓜革命胜利)、1980—1982年(第二次普遍的经济衰退)、1987年(交易所危机)等等。

自1935年以来只有唯一的一个年份没有战争。自1945年以来发生过80次战争。这难道还不足以使人明白吗?至少在有关对本世纪的评价问题上,看来恰恰革命者是现实主义者,而持调和立

场的改良主义者则是充满幻想的空想家。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种晚期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尖锐化的趋势会突然逆转。当戈尔巴乔夫“修正主义”顾问们同最温和的社会民主党人携手并进，郑重其事地宣称 21 世纪的特征将是阶级和解和合作而不是长期化、尖锐化的阶级斗争的时候，我们必须回答他们：“你们谈论的是哪个星球？你们的理想是彻头彻尾的空想。”

英国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充当了数十年斯大林主义的辩护士之后转入了新改良主义者的营垒，他声称，十月革命和成立共产国际是错误的，因为它们所依据的是三个未经证实的假定：资本主义的崩溃，革命扩展到德国和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硬栽到列宁头上的第三个假定是一个明显的谬误，再说它也与前两个假定相矛盾。关于第一个假定和第二个假定的说法是典型的诡辩，其奥妙在于，用故意夸张的言词来表述一个论点，以使其成为荒谬的。

列宁、托洛茨基和他们的同志既没有预言过资本主义崩溃，也没有预言过德国革命必胜，而是预言了资本主义极其严重的危机和德国会爆发革命危机。这些危机的结局主要将取决于“主观因素”，其中也包括社会主义政党和共产党的政策。这些预言有多少证明是错误的呢？

最后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同意我们的判断，但从中得出的结论却与我们截然相反。在资本主义国家和东欧国家的某些“正统的”共产党人中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一些不那么“修正主义的”顾问也属于这一类——在某些左派社会民主党人那里，尤其是在某些“绿党”和激进的女权主义者那里，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人。他们的论证如下：由于我们面临自杀性灾难的威胁，而占有者阶级肯定不打算自杀，所以他们最终将选择理智的道路。他们将同意用和平方式从根本上调解最危险的冲突和危机。

毋庸置疑，垄断大资本非常清楚地知道世界大战意味着自杀。它不再象 1914 年和 1939 年所做的那样把世界大战视为经济危机的最终解决办法。资本家不能把手中的商品卖给被核武器杀死的顾客，这样做他们“克服”不了经济危机。他们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一样清楚地懂得，自从核武器具备重复毁灭能力以来，世界大战已不再是政治以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因此，在核裁军和拯救环境的道路上与这些国家的政府共同采取一些起码的步骤是可能的和明智的。没有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会拒绝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裁军倡议和裁军建议。

错误是始于出现了这样一种倾向，即把这种合作尝试所取得的有限的、暂时的成就过分夸大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成就<sup>24</sup>。帝国主义虽然对防止核自杀，甚至于对稍微限制一下军备竞赛感兴趣<sup>25</sup>，但是它对全面地或哪怕只是较大规模地停止军备竞赛却绝对不感兴趣。“军事—工业集团”的利益阻碍这样做。尤其是在较长期的经济衰退时期，军备生产向来是最好的“替代市场”，正如罗莎·卢森堡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起所预言的那样<sup>26</sup>，以及 1914 年以来的全部经验所证明的那样。此外，无条件地保持核军备仍然是包括社会民主党政府在内的绝大多数资产阶级政府的原则信条，密特朗的例子不幸证实了这一点。（我们对金诺克、福格尔—拉封丹或克拉克西—奥凯托的政府将会采取不同的态度深表怀疑，但愿事实会驳倒我们。）

此外错误还在于，人们明显地低估了由于“地区性的”有限军事冲突和核武器扩散而酿成的核战争的危险，以及由于误解，由于错误的信息或感情冲动而爆发的核战争的危险。只要在世界任何地方还存在着核武器和核电站，这类危险就将继续存在。尽管有人可能认为这类危险是或然的，但是把人类的肉体生存寄托于侥幸之上，设想绝不会有人跨过核战争的门槛，这难道是理智的吗？这难道是负责的吗？

错误还在于以这样的假定作为出发点,即认为拥有核武器的资本主义强国的政治领导人永远是传统意义上的理智的政治家(就拿罗斯福、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尼克松、卡特、里根、布什这一类人来说吧,在他们中间也已显示出了某种才智和理性思维递减的趋势,不过这种趋势被他们的最重要的顾问们抵消了)<sup>27</sup>。但是这种假定缺乏现实意义,因为它没有考虑到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对资本主义国家挑选政治家的过程可能产生的影响<sup>28</sup>。

我们至少知道一个例子——德国的例子,在那里统治阶级曾允许,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提供了可能性,让一个不受任何束缚的肆无忌惮的冒险家,一个彻头彻尾的虚无主义者掌权,这家伙决心将一切孤注一掷,不惜冒险毁灭自己的国家、人民和政权甚至自杀的风险。我们毫不怀疑,即使在核武器具备重复毁灭能力的情况下,他也敢甚至在自己祖国的土地上使用核武器。1945年夏的日本也差一点落入同一类具有自杀倾向的疯子之手。

谁能向我们担误这样的局面任何时候都不会在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里重演?这不是又在轻率地拿人类的肉体生存冒险吗?这不是极端缺乏理智和不负责任吗?

根据这些天使般纯洁的假定,人们犯了根本性的分析错误,这就是没有认清正在临近的灾难与这样一种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着结构上的联系。如果人们想最终摆脱战争危险、对环境的威胁、第三世界的饥饿和贫困以及大都市中出现“两极社会”的危险,那么就必须对世界上一切工业技术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发展进行自觉的检验,看其是否合乎人道,也就是说,必须同时放弃中短期的打算和利益,放弃追求局部的、分散的利益,放弃各民族国家的主权和竞争。这显然是与一个以私有制、竞争和追求个人发财致富为基础的制度不相容的。这显然是与保持资本主义制度不相容的。这一制度内部存在着不断追求局部的合理性与不断产生全球性的、往

往具有爆炸性和毁灭性的不合理性之间的对立。这一对立只有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消失才会消失。

一切调和主义、改良主义和新改良主义用以对付人道危机的虚假解决办法的典型特征是，无论其中含有何种故弄玄虚的思想（“混合经济”，亚历克·诺夫的“可行的社会主义”等等），它们的内容都是以保持资本主义制度为出发点的。当代最博学、最有洞察力的社会民主党理论家是美国人迈克尔·哈林顿，可惜他不久前去世了。然而，在他充满自我批评和忧虑的极端批判主义之路走到尽头的时候，他在最后的著作中<sup>29</sup>得出了结论并提出了建议。《纽约时报》在报道这些结论和建议时直截了当地写道，它们的主旨是改良的资本主义。事实的确如此。因此这些建议不可能阻止滑向深渊的进程。因此它们并非是能取代对社会进行必要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替代解决办法。

经常有人说，为了阻止威胁着我们的灾难发生，进行一场思想方式的真正的革命、一场真正的道德革命是绝对必要的。必须彻底克服人类行为中对“本集团”和“外部集团”不一视同仁的“双重道德”。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就是：毁灭倾向（死亡之神）最终必定要被受到控制的、文明的娱乐倾向（受超我约束的爱神）所战胜。

但是历史告诉我们，“双重道德”，即对本集团（如部落、氏族、社会阶级、种族或国家）的成员和外部集团的成员使用不同的道德规范，既不是基于人类内在的邪恶，也不是基于原罪。它实质上是以利益的对立和冲突以及人们对这种利益的对立和冲突的感受为基础的，它在历史进程中随着这种利益对立和人们赖以出生、成长、工作和积累经验的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既想摆脱“双重道德”，阻止人类行为中攻击性的、自我毁灭的倾向占上风，同时又想保持以竞争和用攻击性手段追求个人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结构，这是最危险的空想。它只意味着更加直接地走向灾难。



只有以合作、团结和自觉地对经济发展进行民主监督为基础的社会制度才有可能——我们不能作过多的许诺——克服“双重道德”。只有这样的制度才有可能避免正在临近的灾难。这就是生产者自由联合的社会制度，用亚历克·诺夫的术语来说，就是“马克思式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这是当今世界上唯一值得人们全力以赴去争取实现的社会制度。

## 五

我们所阐释的这种社会主义是必要的。它同时也是可能的吗？它当然是可能的。这首先是因为资本主义导致了并将继续导致一系列的危机，这些危机提出了废除资本主义的问题。社会主义之所以是可能的，是因为正是这种资本主义业已创造出了战胜资本主义所必不可少的经济和文化前提：能够在世界范围建设生产者自由联合制度的人的和物质的生产力。

然而，实现社会主义还有两个绝对必要的附加前提。第一个是政治——社会性的：男女群众的意志，这些男女群众有足够的潜力以微小的、不会使奋斗目标从一开始就受到威胁的代价迫使社会革命的敌人服从自己的意志并按此意志行事。第二个是政治和组织性的：男女群众使这一困难的行动取得成功的能力。

这两个前提无论哪一个今天都不具备。这两个前提无论哪一个都不会由于“客观前提”成熟，文明危机或压在人类头上的灾难威胁严重而自动产生。它们无论哪一个都要经过一个很长的时期缓慢地、逐步地形成。实现这两个前提要花很长的时间，要费很大的气力，要有很强的洞察力和坚韧不拔的顽强精神，这样才能结束目光短浅的现实政策，不再继续为次要目标而牺牲主要目标。

这关系到为社会主义的胜利创造绝对必要的主观前提。在确定这些前提的过程中，经济发展对各阶级及其较大集团数量上的

实力和社会潜力的影响,是与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对群众的意识和精神状态的影响,物质利益的重要性和群众通过自己的行为而获得的经验,群众的行为,群众的精神状态与政党和工会对群众觉悟的(阻碍的或促进的)影响之间的交互作用以及许多其它因素相互关联的。

然而,在一个长长的,缠绕在一起的链条的所有这些环节中,决定性的环节是行动的出于物质利益的动机,不过它有时被意识形态的冲突所掩盖<sup>30</sup>。因此,西欧的资产阶级和东欧的亲资本主义的思想家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在苏联和东欧的危机或失败高兴得太早了。他们得出结论说,资本主义即将复辟。他们不懂得,通过公开性而有可能自由行动的各种社会力量利益是相互冲突的。绝大多数工资劳动者将利用公开性为自身的利益而斗争,他们的利益既同专制的、过分集中的特权花名册集团的利益相矛盾,也同过分经济自由主义的辩护士,即资本主义复辟的辩护士的利益相矛盾。苏联矿工的罢工已经相当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按马克思主义的定义所划定的工人阶级<sup>31</sup>仍然是当今世界上唯一拥有战胜资本主义,在威胁着人类的灾难面前拯救人类和实现更高的文明——自由联合的男女生产者的文明的必要潜力的社会力量,这支力量是实现上述目标所绝对不可缺少的。今天,全世界的工人阶级有 10 多亿人,也就是说,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

已经能隐约揣测到其轮廓的今后几十年的长期历史趋势,是趋向于工人阶级的壮大及其日益增强的紧密联合,而不是趋向于工人阶级的削弱或瓦解。这是我们探讨社会主义的状况和未来的第三个中心论点。

我们谈论的是历史趋势,而不是特定的情况,特定的国家或特定的地区。因此,考察这一趋势时必须同时考察向相反方向运动的趋势。正象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中常见的那样,当资本的流动性大于

劳动的流动性时,企业向新地区的迁移会导致“老”国家和“老”工业区雇佣劳动者数量——尽管是有限的——下降,但是,由于正在工业化的地区和国家中雇佣劳动者的数量上升,这种下降不但会得到补偿,而且还有盈余。

与“白领工人”人数引人注目的增长和妇女在无产阶级中所占份额的扩大——两个积极的现象——相伴随,也出现了一些消极的现象,如贫困化的、在整个工人阶级中被挤到边缘的阶层,即马克思所说的“穷困者阶层”令人忧虑地扩大了。“老”国家中无产阶级的某些传统堡垒的相对削弱<sup>32</sup>尚未完全由新堡垒的发展所弥补,尽管后者已经显现而前者还远未消失<sup>33</sup>。

但是,如果人们想避免乏味的折中主义,那么就必须对这两个相互作用的趋势哪一个将在世界范围长期占上风的问题明确表态。我们今天所掌握的大多数经验数据都导向这样的结论:就世界范围的和长期的发展来看,无产阶级不是趋向于削弱,而是趋向于壮大,不是趋向于涣散,而是趋向于联合。

公营部门的雇佣劳动者发展成为工会运动和群众行动的一个最富斗争性、最有战斗力的方面军,就是这一历史趋势的一个明证<sup>34</sup>。与此同时,出现了工人运动的新堡垒,如电信中心、公共交通部门(其中也包括航线和机场)、医院和银行或者学校系统。

这些堡垒联合了数以千计、有时是数以万计、或者就地区和国家而言是数以10万计的雇佣劳动者,这些雇佣劳动者的组织性日益增强,他们使资本主义经济瘫痪和动摇“资产阶级社会”的能力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的能力实际上比旧的工人堡垒的能力更大。钢铁业或汽车工业的总罢工不会使一个国家的整个经济瘫痪,而电力部门、电信业、公共交通业或银行职工的总罢工却肯定会使其瘫痪。

说到工人行动反资本主义的客观潜力,所指的正是它使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瘫痪,阻止其按照资产阶级的准则和逻辑实际运行

和在组织经济生活和国家生活方面取代资产阶级的能力。除了雇佣劳动者群众,当今世界上任何其它的社会力量都不具备这样的潜力。

雇佣劳动者群众在世界上5个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中已经占到职业人口中的90%以上,在数10个国家占职业人口的80%左右。如果他们行动起来,谁能使这样一支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大军循规蹈矩?19世纪德国社会主义诗人所说的:“只要你强健的臂膀想这样干,所有的轮子都将停止转动”这句话,用来形容20世纪末叶的现实,比形容上个世纪的现实更贴切得多。

人们可能会提出异议:公营部门的罢工可能更容易被“击溃”或被法律规定所禁止。这类罢工在消费者中,尤其是在低收入的消费者中是不受欢迎的。但是,雇佣劳动者以其堪称楷模的、讲求实际的理智,已经找到了对这种威胁进行反击的振奋人心的途径:积极罢工的途径。

当医院的各项医疗服务只缓慢运转的时候,当地铁、公共汽车、市郊列车停运的时候,当白天部分时间断电以及孩子们因教师罢工而不得不呆在家里的時候,“公众”肯定不会对此表示赞赏。但是,如果地铁、公共汽车和列车虽然运行,但却免费乘坐,乘客坐车不必买票;如果医院昼夜开诊,但也同样分文不取而且不必填写任何事务性的表格;如果孩子们照常上学,但教师让他们去做游戏或偏离正式的教学计划给他们上课,那么“雇佣劳动者公众”就会保护罢工者。如果罢工者不再断电,而只是干脆拒绝查电表,那么“公众”将会高兴地鼓掌叫好。

公营部门中的积极罢工统一了当今无产阶级的态度(情绪)的两种可由经验证实的倾向:满足于迫切要求(归根结底是要为公营部门的职工争得明确规定了的种种好处,而不是要废除资本主义制度)的倾向<sup>25</sup>和不让任何一种对资产阶级的“传统价值”的尊重再继续阻碍自己的倾向。

如果这些倾向在一场包括所有行业、持续时间超过 24 小时或 48 小时的总罢工中同时出现，那么最终将导致形成国家中事实上的对抗性权力，即导致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高度工业化国家中的任何一场革命危机都将遵循这样的模式。

向来既为现代社会民主党所采纳、同样也为斯大林主义者和后斯大林主义者所采纳的古典社会民主主义的最有害的原理之一，就是政党和工会之间在职能上的“分工”。后者应专门致力于雇员直接的物质要求，唯有前者才有权“从事政治”（即通过选举进入议会和政府）。这实际上排除了群众在政治领域中开展任何议会外的直接行动的可能性”。更糟的是：这使得工人群众除选举权外与一切政治主动性无缘。这使政治成为政党的领导集团独占的活动领域。

这一原理是以这样一种诡辩为基础的：工会应代表个别利益或者“阶层利益”，而议会党团和民主政府则应代表“全民意志（人民主权）”。然而，一旦人们发现在甲竞选纲领的基础上当选的议员和政府擅自实施偏离甲的决定甚至“非甲”的决定，这一骗局就真相大白了。谁给了他们这样的委托？

只要要求他们把以人民动议权为基础的全民公决写入他们的宪法，人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揭穿这些诡辩家。假如工会、雇员和大型公民团体有权向男女选民们陈述这样的或那样的要求——为什么不执行被“该”党放弃了竞选纲领的某项条款，而且这种要求不必仅限于经济方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选民的畏惧也许会阻止人们提出不适当的竞选诺言并毫无顾忌地抛弃这些诺言。

议会外的群众行动在积极罢工和总罢工的情况下具有强烈的政治意义，它实际上能够逐步克服群众的“政治冷漠态度”。而那些以此态度为其“代替论”辩护的人则企图不惜任何代价制造、保持和巩固群众的“政治冷漠态度”。

马克思的主要功绩之一在于：与第一批社会主义者和诸如格

拉古·巴贝夫一类的第一批共产主义革命家相反,他把“社会主义计划”同工人阶级自身的行动和自身的组织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工人的解放是工人自身的事业,而不是任何诸如上帝、凯撒、护民官、政府(国家)或政党一类的较高贵的救世主的事业,政府或者政党可以证明是必不可少的解放工具,但是有明确的条件,这就是,它们要开放、促进和鼓励群众自身的主动性及其直接的组织。如果它们限制、妨碍或阻止群众自身的主动性及其直接的组织,那么它们就不再是有价值的或有益的工具了。

继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托洛茨基、罗莎·卢森堡、1905年以后的列宁、年轻时的布哈林、葛兰西和其他许多人也透彻地理解并反复强调了这一点,因此,如果社会主义不彻底摆脱代替论的一切残余,它将继续处在危机之中并且前途渺茫。

我们这里所勾画的克服社会主义危机的一般战略——假如有人想更进一步,开一张对150个不同国家普遍适用的准则或策略建议的清单,那是可笑的!——不是象牙塔中某位智者幻想的产物。它只是对近几十年来已在大规模的工人斗争中初步显现出来的趋势加以概括所得出的一般结论:比利时1960—1961年的总罢工、法国的1968年5月、意大利1969年的“热秋”、1974—1975年的葡萄牙革命、1980—1981年波兰团结工会的兴起(不是指1989年的波兰)、巴西80年代的大罢工和1989年的苏联矿工罢工。在所有这些场合,向对抗性权力发展的趋势对于任何一个没有蒙上眼睛的、不带偏见的观察者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再说一遍:趋势乃至“初步显现的趋势”,说的并不是已充分实现了的东西或者人们自觉地去实现的东西。我们追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计划”,并不包含把无产阶级理想化的内容,我们针对的始终是本来面目的真实的无产阶级,连同其优点和缺点,这两者都是由于无产阶级是“不良”社会的产物(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社会,另一方面是官僚主义的、后资本主义的社会)。无产阶级是在这样

一些带有种种缺陷的环境中形成的,但它并非单纯地只是这些环境的果实,就象苹果是苹果树的果实那样。因为无产阶级的产生和成长与其所处的环境既是共生的,又是对立的。

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主义只能是这个现实阶级的现实斗争的结果,而不可能是某个理想阶级的想象的、假想的斗争的结果。这个阶级在通常情况下,首先就其思想觉悟而言对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还没有作好充分准备,所以它需要一个自觉的、有组织的先锋队。因此,只要列宁主义不蜕变成代替主义,我们就始终是坚定不移的列宁主义者<sup>17</sup>。

无产阶级的缺点之一——如早已承认的那样,这一缺点由于其党的执行委员会和工会的反动态度而增大了十倍,并且由于有关的理论,其中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陈旧而变得更加严重——在近几年里愈加明显了;它很难克服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拒绝克服自身队伍中的大男子主义、男性自大狂和男性至上论,这些观念的根源在于“以家庭为细胞”的社会结构。这是群众性的女权运动脱离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独立发展的主要原因。

同一论断大体上也适用于生态和反核运动。这个运动最初常常不仅在工会运动的部分组织中,而且也在工人阶级本身的部分成员中引起了事实上的敌视态度,这些人把上述运动看成是对自己就业岗位的威胁。

这些“新社会运动”只有从经验中学习才能懂得,他们所提出的对于解放的前景和人类的生存具有至关重要意义的问题,在不废除资本主义制度的情况下不可能得到解决。目前无产阶级愈来愈多的部分正以“自我批评”的态度逐步树立起女权意识和生态意识,如果上述正在发展中的意识再充实进来,那么工人运动将为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赢得强大的同盟者。

然而,必须力争实现的首要联盟仍然是与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解放运动的联合。随着那里的工业化进程以不同的速度和不可

避免地呈上下波动状地向前发展,无产阶级在这一运动中将发挥愈来愈大的影响,这种情况在南非已经发展到了给人以深刻印象的程度。而女工和女农民的联盟以及争取农业改革和城市改革(解决生活在贫困中的贫民区居民的紧迫问题)的斗争,对于把人民运动引向胜利仍旧是必不可少的。尽管“超级大国”、帝国主义和各国资产阶级为阻挡和镇压人民运动作了种种努力,人民运动仍将进一步兴起。

我们曾强调过,无产阶级日益壮大和日益团结的趋势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乍看上去这似乎纯粹是幻想。民族主义在国际无产阶级中难道不是具有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大的影响吗?究竟有哪些群众仍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句旧口号为依据来树立信念,采取行动和提出要求?

大的群众性工人政党和大的工会难道不是已经证明了自己没有能力在国际上共同行动吗?“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难道不是已被有计划地引入歧途,用来为所谓“领导国”的(确切地说是为在这些国家中当权的官僚机构的)利益服务,从而导致甚至各个“领导国”的群众都拒绝这一提法吗?

各个国家的雇佣劳动者(有时甚至一国的雇佣劳动者的不同阶层)的利益是有差别的,其表现形式是显著的工资差别,这种工资差别由于“劳动力市场”相互脱节而得以保持下来。上述一切挫折和失败的根源难道不是在于雇佣劳动者的利益差别吗?

这种论证无疑包含有部分真理。但是,20世纪末资本主义的基本发展趋势使这一论断难以成立,这一趋势就是生产力的国际化。尽管存在着种种国家的和意识形态的阻力,生产力的国际化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资本的国际化 and 阶级斗争的国际化。

今天,700家跨国公司控制着世界市场。它们使任何一种国家政策,使任何一种局限于一个国家或少数几个国家的抵抗失效的能力将进一步增强。至少就长期而言,这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有必



要和有可能复兴的客观基础。要么是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建立，要么是死亡。要避免威胁着我们的灾难，社会主义世界联邦是唯一可能的未来解决办法。放射性烟雾是不会在任何一条边界前停住的，无论是主权国家的边界，还是“联合起来的欧洲”的边界，无论是“伊斯兰世界”的边界，还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边界。

生产力和资本的国际化是下个世纪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而且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将来既不会有“后工业化社会”，也不会有“计算机社会”，既不会有“知识权力”代替资本权力，也不会有无产阶级的衰亡<sup>24</sup>。本刊的纲领性声明草案提出了相反的论点，对此论点我们是不同意的。因此，我们只是在明确的条件下同意自由合作，这条件就是我们绝不受这篇纲领性声明的束缚。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参加了撰稿，因为我们认为，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必须利用任何一个现成的讲坛，毫不退缩、毫无保留地捍卫自己的观点。何况不能自由地、公开地讨论工人运动内部的意见分歧自1914年以来一直是社会主义危机的原因之一，所以我们更要尖锐地阐明我们的观点。

用禁令、唯我独尊、不容异说、侮辱和诽谤或者人身压迫来代替恩格斯所说的“社会主义科学的自由”，更加剧了社会主义的危机。在不要求为最终达成妥协或一开始就意见一致承担义务的前提下重建进行自由对话的可能性，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公开性为此作出了贡献。我们希望本刊今后也这样做。

这绝非是知识分子的担忧，而是关系到这样一种认识，即工人运动中的民主是使工人运动获得成就、澄清工人运动的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和途径的绝对必要的前提条件。此外，工人运动内部的民主也是使不屈不挠的思想斗争始终具有团结一致、追求共同目标和反对共同敌人的意愿和能力的绝对必要的前提。

这又一次涉及到强调恢复社会主义的信誉的道德前提。如果社会主义者的实践与他们的原则不一致，那么群众就会继续持怀

疑态度。今天,唯有社会主义能够坚定不移地、无保留地为争取和全面捍卫男人和妇女的权利而斗争。而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者绝不能使男人和妇女的权利屈从于任何一种“国家利益至上原则”,即使是由社会主义亲自管理的国家也不例外<sup>31</sup>。这意味着社会主义者必须在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内部保障这些权利。

如果社会主义重新获得与世界各地反对剥削、压迫和不公正的斗争打成一片和不为这些丑恶现象承担责任的能力,如果社会主义重新系统地始终按照马克思的绝对命令行事,无论可能会付出何种短期的或中期的“政治代价”都绝不以任何一种借口容忍人的生活处境的恶化,那它最终将获得不可战胜的道义力量和政治力量。那时它将全面恢复社会主义方案的信誉。那时未来将属于社会主义——无论社会主义的进程要持续多久,不管有多少必须克服的重重障碍(我们对此不抱幻想,障碍非常多)。

#### 注释:

1. 多年来我们一直致力于总结一个世纪以来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讨论。这一总结的经济部分在我们为企鹅出版社以英文出版的袖珍版三卷本《资本论》所写的引言里得到了概述。

2. 这个问题请读者参阅我们的著作:《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期波动》(剑桥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

3. 我们是与民主多元论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民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拥护者。劳动群众必须独立自主地和自由地亲自决定经济资源的分配。如果没有在各种相关的分配方案之间,也就是说在几种不同的竞选纲领之间,或者说在若干个政党之间进行选择自由,这样的独立自主是不可能实现的。

4. 应该注意到这不是必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罗莎·卢森堡和托洛茨基始终否认社会主义的必然性的思想。他们把资本主义的未来描述为两种可能性中二者择一:或者是社会主义,或者是野蛮。为避免野蛮,群众和社会主义者的自觉的、有组织的行动被视为是必不可少的。

5. 亚历克·诺夫教授在一部对于改良主义者和新改良主义者具有权威性的书中断言,“马克思式的社会主义”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无法实现的(空想的)。同时他还对

种社会主义是否有益表示怀疑(《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学》,阿伦和昂温出版社伦敦1983年版)。

6. 有人居然把波布特称作是“犯过一些错误的”政治家,屠杀上百万人竟然只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这里我们简直是置身下乌布国王和卡夫卡的王国之中。

7. 我们不想用人身攻击来毒化讨论的气氛,但是“香槟社会主义”,即英国人所说的“与统治阶级在一起吃喝玩乐”的癖好,在人民群众中极大地败坏了社会主义。

8. 19世纪时,暴力曾在第三世界被大规模地使用,从1914年起,帝国主义以及后来的法西斯主义越来越多地把这种殖民主义的风气搬回了祖国。

9. 我们在阅读有名望的人道主义作家如托马斯·曼、埃米尔·韦拉朗、马塞尔·普罗斯特、格奥尔吉·普列汉诺夫、H. G. 韦尔斯和其它许多人所写的战争颂歌时,不能不为他们感到羞耻,只有极少数几个值得称赞的例外。

10. 资产阶级社会上层人物中不断增强的犯罪倾向变得日益明显也与此有关。这种犯罪倾向与晚期资本主义中投机成分、信贷和货币资本的膨胀有结构上的联系。

11. 夺取政权(“政治剥夺”)这句术语今天已不再是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标志。这一术语也出现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会议所通过的正式决议里。

12. 这种一体化是分三个前后相继的步骤发生的:社会党的受托人融入资产阶级国家;工人官僚与资产阶级国家机构和经国家机构的上层日益紧密地融合在一起;这种“社会民主党—国家的复合体”与晚期资本主义新的“计算机化了”的“私营成分”开始融合。

13. 关于上层领导集团、工人阶级、农民、“新的中等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我们已在《戈尔巴乔夫的尝试》一书中作过详细探讨(法文本由巴黎拉布雷舍出版社出版;英文本由伦敦韦尔索出版社出版;葡文本由法兰克福阿隆诺伊出版社出版)。

14. 这些机构的资产阶级本性主要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暴露出来。在葡萄牙,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公开宣布他们决心与工人阶级某些部分的“无政府主义自发论”作斗争。然而,他们“拯救”的并不是“民主”,确切地说他们拯救的是资本主义。今天从社会的倒退中可以看出这种拯救的结果。

15. 不能把对一切官僚机构的这种否定与赞同重新私有化混为一谈。重新私有化无非是用私人垄断和官僚机构来取代能够较好地接受监督的国家垄断和官僚机构。更不能把这种否定与刚刚开始废除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撤法混为一谈,几乎所有地方的绝大多数国家都拒绝这种做法,甚至连英国也不例外。

16. 实现这一目标同时又不危及生态平衡的经济上的可能性在于,存在着巨大的生产储备(未加利用的和用于破坏性目的的生产能力),其总量估计可达世界现有经

济潜力的 50% 至 60%。军备支出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17. 这正好离开了在东欧国家和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中被引用的,所谓工人的“懒惰”阻碍了生产的论据是多么的无聊和反动。当其个很少从事或根本不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对正忍受着令人疲惫不堪的体力劳动折磨的工人提出这样的指控时,这种指责多么无耻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任何一个技术员或生产工程师都会证实,通过引进生产流水线 and 更常见的采用半自动化的生产工艺来加大男女工人体力劳动的强度,这对提高产品的总数和质量只有微不足道的影响,或者更确切地说只会导致相反的结果。

18. 在大生产和大工业的领域中赞美市场经济是犯了时代错误。所有资本主义大公司都预先对自己的年度生产或 10 年生产作出计划。它们全都有制定计划的部门和机构。贸易关系的好处一般而言充其量只是在小工业和服务业的领域表现得明显。

19. 匈牙利持批判态度的马克思主义者姚茵什伊早在 60 年代就已强调过资本主义的这种矛盾的趋势,即在制造出工业后备军(失业,劳动力的培训水平降低)的同时,又明显缺乏受过良好培训的劳动力,这种矛盾的趋势在经济衰退时期尤其明显。

20. 可参阅尽管是持保守主义立场的美国社会学家万斯·帕卡德不久前出版的引起轰动的著作,《超级富翁,到什么程度才为过分?》,利特尔·布朗和赛伊,伦敦 1989 年版。这部著作是以往早已众所周知的研究工作的继续,譬如要道南、隆德贝尔格的《富翁和超级富翁》和 C. 威廉·多姆霍夫的《谁统治美国?》。对第三次科技革命条件下劳动时间与闲暇时间关系的论述见安德烈·戈尔兹的最新著作。

21. 在这一方面,英国在玛格丽特·撒切尔领导下对罢工权的限制(禁止同盟罢工)和对新闻自由的限制(在“国家安全”的借口下)最为令人担忧。

22. 这一派的思想先驱是英国教授 E. P. 汤普森(《灭绝主义和冷战》,非尔索出版社伦敦 1982 年版)。

23. 爱德华·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汉茨出版社柏林 1899 年版。

24. 通过限制战略武器协议,迄今为止销毁了不到 5% 的核弹头。重复毁灭能力仍继续存在。

25. 鉴于其财政赤字的规模,美国同苏联一一对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其军备支出(或者不如说是减少其军备支出的年增长率)感兴趣。

26. 这是她的《资本积累》一书的最有价值的部分。

27. 本·古里翁、摩西·沙莱姆、摩西·达扬、戈尔达·迈尔、西蒙·佩雷兹、伊茨哈克·拉宾、梅纳歇姆·贝京、伊茨哈克·沙米尔以及阿里尔·沙龙这个序列就更加令人担忧了。

28. 戈尔巴乔夫的思想家们担心这种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

尖锐化的危险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担心并不能代替对当前的发展进程的科学分析。即使该的是抵消这些危险的最佳手段,根据这种担心也提不出什么好建议。

29. 迈克尔·哈林顿,《社会主义:过去和未来》,列凯德出版社纽约 1989 年版。

30. 宗教上的区分尤其起了这样的作用,如天主教会接连不断的教派分裂,宗教改革以及从 4 世纪直至我们时代的 17 世纪新教本身的分化等。

31. 即所有那些由于经济上的原因不得不出卖自己劳动力的人。这个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公式曾被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第一个纲领中照原本本地采用。当然人们也可以以无产阶级的其它定义作为出发点,但是这就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和对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客观分析的逻辑相违背了。

32. 尤其是采矿、钢铁和汽车工业及企业,如比扬古的雷诺公司、威尔士和苏格兰的煤矿、鲁尔区的矿山,底特律的汽车制造厂、日本的三菱造船厂等。

33. 慕尼黑的菲亚特、沃尔夫斯堡的大众以及丰田等汽车制造厂,大型石化装置,大型炼油厂,宇航部门的工厂,以及制造电力和电子设备的大型工厂,仍然是欧洲、日本和美国的工人堡垒,尽管这些部门的就业率有所下降。

34. 在一些国家人们甚至可以把医生视为雇佣劳动者,他们越来越经常地从事领取工资的工作。社会条件的这种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的态度(作为自由职业者的医生过去和现在对工会和工人运动大体上总是持反对态度的):

35. 直接要求并非一定是经济要求。医护人员可以为改善护理工作,为其所学的知识受到更好的重视,反对等级制结构的固定化,反对公文旅行的泛滥等而斗争。反法西斯的斗争——实质上是政治要求——1934 至 1939 年间在动员工人方面就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36. 顺便提一下,政治经验清楚地说明了工人运动中的这种“分工”的虚伪性。德国社会民主党政府在 1920 年全党在大规模地把工人武装起来的同时举行政治性总罢工——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才阻止了卡普-冯·吕特维茨反动军事政变取得成功。

37. 参阅我们的资料集《列宁主义的组织理论》。

38. 纲领声明草案对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后果作了错误的判断,把即使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条件也还是受资本控制和使雇佣劳动者数量增加的“信息”与所谓的由专家、科学家和学者取代大资产阶级混为一谈。似乎人们相信,是电视、报刊、广告代理处、民意调查机构(更不用提各个大学了)的贫穷的技术人员在“控制”德伯内德公司、贝吕斯孔伊公司、贝尔纳·塔皮埃公司、特朗普公司、马克斯韦尔公司、默多克公司、播伯公司、贝特尔斯曼公司以及不管叫什么名字的公司,而不是控制着这些仆从的万能的、傲慢的托拉斯和金融巨头在控制这些公司。

据说一场不同于科技革命的新“工业革命”必将废除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但现

在没有任何征兆表明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即将出现这种情况。

39. 社会党国际的成员,以色列工党的部长们赞同、袒护或者怂恿把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所有学校关闭达 18 个月之久,为巴勒斯坦青少年的大规模文盲化如此地操心费力。这与人权难道是一致的吗?在这种特定的场合人权难道不是成了“国家安全”的考虑的牺牲品吗?

(原文为法文,王学东转译自德文)

---

## 未来的社会主义

焦尔焦·纳波利塔诺\*

如果我们想进行一场没有任何禁忌的、富有创见的讨论，那就必须象探讨“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那样探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概念。这一概念和这一目标实际上是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之间、资本主义经济法则和社会主义经济法则之间的基本矛盾——一个由于大量的历史经验，由于广泛的理论争论，由于在世界范围出现的新趋势看来定义正在经受严峻考验的矛盾。

---

如果否认社会主义等同于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如果承认各种不同性质的(私人的、国家的、合作社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相互结合的必要性，如果即使是在可以动用计划杠杆的场合也让市场发挥某种并非无足轻重的作用，那就必须确认，很难把“社会主义社会”界定和描述为这样一种经济和社会体制，它的运行机制与资本主义体制的运行机制是完全对立的。

---

\* 焦尔焦·纳波利塔诺：原意大利共产党议员、意大利议会外交与共同体事务委员会委员。

关于应选择何种道路的争论现在已经过时,这一争论曾使欧洲工人运动发生分裂。长期以来,革命的道路已不再受人推崇。今天甚至连确定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所能达到的目标看来也成了很棘手的问题。受到怀疑的不是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矛盾本身,而是这些矛盾的结果,即这些矛盾的尖锐化能导致“建立”一个完美无瑕的新制度这一事实。

此外,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按传统被认为是不可逆转的:简直就象是不可逆转的概念与完全遵守民主程序的规则的协调一致起来似的。仅仅确认社会主义社会的产生不能被理解为用暴力推翻现存制度,而应被理解为一个随着逐步改变社会的政治措施而出现的客观历史进程的结果,这是不够的。还必须明确,由于左翼力量和保守力量在各国政府中的更迭,继取得社会主义性质的成就之后可能会出现“复辟”时期,即取消或限制这些成就的时期,这些成就远非象人们根据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解释方式所设想的那样是直线式地和“客观”地发展的。

鉴于上述所有这些情况,把社会主义界定为与民主的发展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各种目标和价值的协调一致看来较为合理。这些目标和价值在业已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并正在继续发生变化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范围内,从更普遍的意义讲,在内在的相互依赖性日益明显的世界的范围内,必须被重新确定和追寻。

在西欧各国,工人运动和各左翼政党近几十年来实际上一直在努力争取把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价值——出发点是捍卫工人阶级的物质利益——逐步转变成改良的目标,即转变成逐步改变各阶级和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的各种“自发”倾向之间的关系的目标。今天必须确定新的改良目标,即调整、提高和控制社会整体发展的新目标。关于这些通过社会斗争和民主政治所能实现的目标和成果从社会主义的立场来看是否还有有效的讨论将继续进行下去,因



为既没有不可触犯的教条,也没有任何能赖以作出不容反驳的判断的权威。然而,在估价左翼力量起草的纲领和由他们并且主要通过执政时采取的措施所取得的成果的意义和效果时,恐怕还是可以设想有某些存在着广泛一致的标准。

因此,上述这个定义不再是“舒舒服服的”:它使人无法用不断地拖延来为自己开脱,并迫使人们对受社会主义信念鼓舞的力量能在实际变化过程中逐步引入这个社会的东西作出具体估价。事实上,过去和现在“较舒服的”做法是,以自己作为社会主义力量的身份——在放弃自己的职责的情况下——追求在遥远的未来“建立一个社会化的社会”这一毋宁说是假想的目标,同时却不去努力使自己的目标及当前的行为方式符合社会主义的理想,也不对此进行检验。

## 二

与从前相比,作为单一国家战略的社会主义战略在何种程度上和何种意义上缩小了活动余地?其内容和视野起了多大的变化?

可以断言,直到以 70 年代中期的石油危机为标志的转折出现以前,西欧各国的左翼力量曾卓有成效地向前推进了单一国家的战略。工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境况的根本改善和各国——由于工会的和政治的措施、反对派运动和左翼执政时期——取得的一般社会进步,可以被视为社会主义运动的巨大发展。然而,自从爆发石油危机以来,相互依赖现象及技术革新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大大加速了。

在对外政策方面,单一国家的尺度也证明越来越不够了。过去,执政的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只要想一想德国社会民主党或者瑞典社会民主党——还曾在国际关系的层次上作出了重要贡献,它们在这样做时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单一国家因素的重要作用。

最明显的转折点是以下列情况为标志的：欧洲共同体各成员国的经济和货币政策之间日益加强的相互适应；经1985年的欧洲统一文件批准的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新发展；“十二国集团”共同的对外政策倡议日益增强的重要性。看来至少最重要的左翼政党在这一领域已大体上认识到有必要使自己的改良战略、自己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战略具有欧洲的尺度，或者至少是将本国的战略纳入共同体层次上的协调一致和统一步调的更广阔的前景之中。

此外，西欧的发展与世界所有其它地区的发展之间的联系也变得越来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世界”性的难题和挑战的重要性正在日益增强。西欧各国的国家现实状况无疑还保留着自己鲜明的特性，它们的发展仍然是有差异的；但是在每一个这样的具体场合，工人阶级的利益，平等和公正的原则，自由、民主、宽容的价值——体现了社会主义传统的特征——必须得到具体的原则纲领的支持，这些原则纲领要考虑到各个国家的现实、历史特点及其新的方面。此外下述情况也是事实，即不仅欧洲共同体所有国家和在这些国家中活动的左翼政党所面临的同样问题和目标的范围扩大了，而且对竞争的依赖性和在欧洲和世界层次上合作的必要性，也对在国家层次上必须采取的措施和决定的可行性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找到一个与社会主义战略相一致的令人满意的平衡点是不容易的。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竞争也就意味着有责任捍卫和改善本国在欧洲共同体内和在建立欧洲统一市场进程中的地位。与新的社会均衡政策、反失业斗争政策、捍卫或提高工资水平和劳动保护标准的政策相比，这一责任——其中包括结构改革政策和现代化政策等——能被左翼力量认为是居优先地位的吗？一方面要维护阶级利益，另一方面要代表国家利益，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无疑不是一个新问题，这一问题今天由于不断加速的国际性的一体化进程和竞争进程而在一个更复杂得多的环境下呈现在左翼力量的执政

活动中。

而从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更困难更紧迫的问题还是西方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较富裕的社会中的左翼力量的行动与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平衡、特别是对世界新的较为公正合理的北南关系所承担的责任之间的关系问题。这可以被视为当代“世界性的”巨大挑战之一,因为对所有的人,甚至包括非社会主义力量来说,即使是从各主要工业国的利害关系的角度来看,目前的不平衡状况已成为最贫穷国家和人口最稠密国家的沉重负担,这种不平衡的延续和恶化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这些后果可能在总体上窒息世界经济发展的前景,可能导致无法控制的动乱和冲突。毫无疑问,西方的社会主义力量必须为采取最坚定的主动行动阐释和贯彻一项彻底开放、多方合作和将自己的财力转移到南半球的政策承担无可推卸的重大责任。迫使欧洲左翼政党的国家战略加以适应的、并非无足轻重的压力也同样起因于此,这已是足够的理由,要求重新考虑这一政策的内容和可行性。另一方面,当前推行一项支持东方的经济改革进程和经济启动进程的政策必要性,也要求西欧国家的政策在考虑财力的使用方面改变思路。

在最坏的情况下,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不平衡和不公正状况尖锐化、第三世界大部分地区的贫困和落后程度加剧的趋势将转变成人类文明的存亡问题。这无疑也适用于——正象现在日益被人们所认识到的那样——制止和扭转环境破坏过程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与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不加控制地使用财力有关,而且与广大不发达地区的绝望处境有关。

在重新理解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终究要形成与不久以前的理解有很大区别的阶级利益概念、国家利益概念和人类生存利益概念。重点必须移到表述和追求超国家的和世界范围的公正和进步的目标上来。要证明社会主义力量的措施的正确性,恐怕没有什么理由能比防止人类所面临的极度危险——首先指的当然是核战争

的危险——和保证在全新的基础上得到平衡的高水平的发展更有说服力了。

### 三

由执政的共产党建立和领导的制度处于失控状态的危机,以及在苏联和其它国家以极大的勇气开始的改革尝试,不仅遇到了巨大的困难,而且导致了严重的、有时是混乱的紧张局势。有人把斥谓现实社会主义的失败等同于社会主义理想的失败,对此看法必须加以驳斥。但是这一点无疑是肯定的,即一些最大的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实践的基本要素——关于夺取政权和行使政权的观点;关于国家和经济管理机关的作用;关于作为铁板一块社会的社会主义社会;关于工人统一政党的职能——因其僵化而导致了灾难性的结果;而另一方面,很长时期以来,尤其是自欧洲共产主义的极端尝试失败以来,不管象意大利共产党的实践那样的另一种源于共产主义本意的实践有多么重要,谈论一个有别于执政的共产党的学说和经验的共产主义运动已不再可能了。

继“历史的共产主义终结”之后,是会出现共产主义向其本源的回归,(这种回归的定义尚未明确),还是会出现一个同样不明确的新共产主义,这是无法预见的。我们不知道东方已开始的改革和民主化进程、以及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由于来自下面的不可抗拒的压力而出人意外地实现的变化将导向什么样的结局。我们不知道“革新的共产主义”会是什么样的。但是从波兰、匈牙利乃至苏联的情况已经可以看出,作为参照系,西方的法制国家、代议制民主、市场经济的经验是多么重要。戈尔巴乔夫以堪称楷模的巨大勇气为“现实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和发展开辟了这样的前景,它不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或者帝国主义)的传统对立,而是今天和明天世界各种不同制度的必要合作和相互融合;一个内在的相

互依赖性日益增强的世界，“一个唯一的世界”。人们超越了陈旧的“一致”概念，这不仅是因为明显地处于危机中的“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努力趋向在最发达国家中已经从 70 年代的恐慌中复原的资本主义制度，而且也是因为必须考虑各种不同的经验（也包括西方的经验）的广泛而复杂的结合过程，正如必须考虑多种多样的社会发展道路的试验过程一样。

这场讨论应当继续深入下去，——在考察意识形态模式和共产主义制度的危机的同时——以明确的批判意识考察拥有最发达工业和最先进民主的国家的现实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现实。80 年代把关于效率、革新和竞争的要求置于优先地位的政策（和思想）已在西方收到了明显的成效，尽管是伴之以巨大的社会和公共福利开支。同时应看到，南方最贫穷和债务负担最重的国家的处境令人担忧地恶化了，而与此同时，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国有化的和集中的经济模式由于以往的活力已经耗尽，由于保证其形象的突出特征即社会保障和社会平等的一定水准的可能性日益急剧缩小，今天已丧失了一切吸引力。对于既不认同于西方居主导地位的新保守主义思想，又不认同于东方的旧模式，也不愿对南方的爆炸性局势闭眼不看的一切民主和社会主义力量来说，由于上述所有这些因素而产生了新的责任。

西欧的民主制度不能否认存在着价值危机、不平等和歧视的扩大、权力集中现象以及无秩序的发展等等弊病，这些都给发展和社会福利的平衡加重了负担。左翼力量的任务是促使这个制度对自己的政治观点和实践进行决定性的反思。只有这样，欧洲的民主才能证明无愧于自己最优良的传统及其在东方涉及“现实社会主义”所唤起的期望；同时它没有把自由权和经济上、政治上的多元主义同社会公正、参与政权和保卫公共利益层次上的新发展分开。

90 年代初，受社会主义信念激励的力量在全欧洲为艰巨而困难的繁荣进程承担了义务，他们还应使自己的视野越出旧大陆的

界限,着手研究这样一些问题,对这些问题诺贝托·博比奥不久前作了如下表述:“管理着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的民主政体能解决共产主义所未能解决的那些难题吗?这是个问题。历史的共产主义失败了,但是,(……)为这一失败而高兴并幸灾乐祸地说:‘这我们早已经多次预言过了’,这恐怕是愚蠢的。也许你们沉醉于幻想,认为历史的共产主义的终结结束了对公正的需求和渴望?在我们这个世界中,占人口三分之二的上层社会处于统治地位并且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他们对占人口三分之一的下层社会的穷鬼们漠不关心,而在其它的世界中,这个下层社会占到人口的三分之二,甚至占到四分之二或十分之九,意识到这个问题难道不好吗?”

民主政体战胜了历史共产主义的挑战,我们承认这一事实,但是,民主政体究竟用什么手段和什么理想去应付共产主义的挑战所产生的那些难题呢?”

对博比奥提出的这些问题不可能只由西欧的左翼力量来回答。但是他们无疑有责任在为公正在全世界稳步前进探索和平的和民主的新道路方面不只是充当一个配角。社会主义的未来将取决于这一探索的成功。

(原文为意大利文,王学东转译自德文)

---

# 社会主义和社会进步

霍赛·费利克斯·特扎诺什\*

社会主义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无中生有,它的产生也不完全是由于工业革命爆发后出现的社会和经济条件。更确切地说,社会主义作为解放的理想有一种长远的历史眼界,各文明民族曾经从它出发努力组织自己的社会,使之同个人的尊严、自由和平等的原则相协调。

## 社会进步

西方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尝试真正实现民主这个理想的历史。从这个概念在希腊文明中的形成,经过法制基础在古罗马的发展,到代议制民主的前提在法国大革命及以后——作为社会革命结果——的大动荡中的确立,可以说存在一条使我们的社会在自由—平等这个复合词的基础上,按照人道主义的方案发展的共同路线。社会地位上的根本不平等(奴隶制对自由)和权力上的根本不平等(专制独裁统治对政治参与)的被克服,首先发展了个人的尊严和人在法律面前的平等这个概念,后来发展了政治的议会民主的形式(法制国家),最后发展了社会民主的形式(福利国家),而

---

\* 霍赛·费利克斯·特扎诺什:社会学教授,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全国执行委员会教育问题书记。

我们现在面临的任务是达到社会正义和参与民主这样一个更先进的阶段。

实际上,尽管存在挫折和暂时的倒退,但许多活动仍然超越了历史的具体情况和特殊的社会主义的政治方案而同历史上的这个进步的共同路线有关。

今天的人为了对历史上的这一进步作出一点贡献,能做些什么呢?今天的欧洲各国能向文明的这个发展方向迈出新的更大的一步吗?

尽管有种种反面意见,但事实是,在人类历史、全球范围的道德良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大,这恰恰是由于各种信息能够随便地直接进入我们各家各户深处。其结果是,上面所说的道德良知实际上,而且也许是越来越大地对暴力和压迫起着控制和限制的作用。

特别是在欧洲国家,目前已能看到可以使这个历史的日益文明化的发展前景获得新活力的成熟条件。教育的前所未有的发展,社会福利和经济发展的某种标准的普及,工艺革命开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巨大可能性以及更加民主更加强大的平等意识日益扩大的传播,使欧洲成了一个为深化民主这个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理想的实际进步提供特别优越条件的区域。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目前已具备一些客观条件,可以迎接进步的、也包括社会进步的新的历史挑战。然而,这些有利条件尽管是同关于我们生活在一个正在发生重大变革并提供巨大机会的时代这种实际意识并存的,但在政治观念领域目前却存在一种悖论,即它们并没有适当地推动革新。我们大多数人还沉溺于本应属于另一个历史时期(一个多世纪以前)的辩论,争论过去那些与今天完全不同的社会所提出的问题。

我们参加了像社会主义这样的观念运动,并且坚信世界是受观念推动的。最近几年某些知识分子和政治家被卷入的意识形态



方面消极隐退的漩涡，而我们却仍旧在尾随他们。对于这一情况，我们只能感到惊讶。

如果我们用深刻的历史观点来观察文明的进步，那么，我们必然会在下面的问题上取得共识：观念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就确实能推动世界。这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同样也必须承认，“观念”的僵化将使文明的这一进步成为偶像并且孤立起来。因此，任何使观念僵化和“静止”，抑制其自由运行和发展的尝试，最终都是对历史、对社会进步可能性的犯罪。可是，历史经验表明，每次强大的观念运动都有趋向僵化的倾向。这种趋势同正是产生这些观念的动力（就其提出最突出、最重要的要求或必然性这一作用来说），也同这些观念所取得的社会成果（也许还同成果的优势地位和它的变革社会的作用？）往往有直接的关系。可以说，观念运动本身的成果（理论的还是实际的成果——这是另一回事）是同一个使运动迟钝化的社会过程平行发展的。

因此，只能把最近几年发生的日益加快的马克思主义危机的进程理解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的腐蚀的结果，同样也是“同事实发生尖锐矛盾”的结果。除了政治方面的失败以外，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一危机使许多知识分子和政治负责人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心目中的楷模的局限性，而这种楷模是绝大多数欧洲左派多年来用各种不同的表达方式表示信奉的。

这次观念运动显示出了一次真正的崩溃的许多方面，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发生不是由于产生了另一种具有较大的实际能力的可供选择的模式，也就是说，不是某种外部失败或某种可以用经验证明的对模式的克服的逻辑结果（根据托马斯·库恩等科学革命的理论家们的设想，我们本来是可以预见到这一点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自己的内在意识（对理论的不完备性的认识）和自己的实践历史经验的结果。

这种独特的模式危机（正如它现在产生的那样）的最初后果是

留下或者说可能会留下相当大的政治真空,而且它正在为,或者说可能会为一种在理论上严重地失去防卫能力的情况大开方便之门,而且这涉及社会主义本身所特有的决定未来的力量。当然,一些值得颂扬的不可逆转的历史性成就除外。因此,未被填补的观念真空往往表现出被目光短浅和平庸的实用主义代替的趋势,或者还要更加严重:这一真空有时会被对早已过时的现存历史秩序的不公正的庸俗称颂(例如新保守主义)所占领。

我们不管用哪一种方式方法来描述这两种对历史上的某种特定情况的反应,我们都不能低估它们本身内在的巨大危险;这两种反应不仅对社会主义的未来是巨大的危险,而且对长期按人类历史进步的观点继续前进的可能性来说也是巨大的危险。

### 新保守派的论证路线

最近,一些新保守派理论家们找到了一条“脆弱的”,然而似乎符合理性的论证路线。这条路线对于一些已经在西方世界福利社会舒适地生活的公民是有说服力的。他们向这些公民传递的信息基本上是声称能够保证安定。同时,这条路线还依靠让人回忆历次战争之间的动荡和冲突,回忆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和其它几次革命(这些革命所走的是一条用暴力和对人的蹂躏铺就的道路)的“经验的”有害的、甚至不近情理的后果。

新保守派理论家们的论据归根到底是依靠人们对这些事件的回忆所唤起的消极反响,还有“现实社会主义”在经济成就上的反面经验。这个论据“警告”大家不要忘记在社会领域和经济领域进行“冒险性”实验将会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这样,就把民主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更为明智的”社会模式提了出来,或者如果人们愿意这样说的话,甚至作为一种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已知的“较轻的恶的”模式提了出来。他们论证说,这种模式曾经在精神上防止了“大

的迷误”，“保障”了更大程度的自由和政治稳定，使历史上已知的最高程度的集体福利成为可能。

因此，新保守派理论家们要求无条件维护一种曾经取得“良好的客观结果”的社会制度；明智地说，这种社会制度，只需在某些方面作少许“改善”就行了。

实际上，这种在发生伟大的社会变革和技术变革的时代可能会得到某种共鸣的论证路线，试图在实践中“证明”历史将趋向某种形式的“悲观的结局”。在这样做时它所依据的是道德上和政治上的“瘫痪”，而这种“瘫痪”能使人对用未来作赌注的打赌所包含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产生恐惧。

最近，福山用他的肤浅论点试图论证历史的这一臆想结局。这种论点把当前共产党国家的危机解释为 K. O.（意为在拳击时被彻底击败）或者“自由主义”的彻底胜利，并把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完美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加以永恒化，而不要可供选择的另一种意识形态，不要能够提出可供选择的另一种方案的有组织的制度。于是一些主张这种历史结局的新圣徒用一种狭隘的观点把自己封闭起来。这种观点把观念对立的结果同自己在冷战中的对手的危机相混淆，同样也把这种危机在实际生活中的被克服同各种不同社会制度的组织中的一切差别的消失相混淆。

一般来说，如果不去考虑那些会引出关于这个题目的富于诗意的描述的思考，那么，在已经达到某种程度的物质福利和社会福利的那些社会的公民中提出历史结局的问题（这是一种“思想渗透”），首先可能导致下面的结果：使这些公民对于自己支持革新和变革政策的能力采取冷静清醒的态度。

这里涉及的是一种政治上和观念上的清醒态度，而这种态度在实践中又能得到加强，这是因为人们日益明确地强调“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中表现出来的政治和经济的失败，此外还由于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观点自身已有思想枯竭的先兆。

但是,这些关于社会主义“无所作为”的观点是“纸做的”,“靠不住的”,它们错误地低估了共产党国家自身进行改革的可能性以及社会民主党进行卓有成效的革新并在思想上重新得到加强的可能性。这些观点没有想到,这些可能性最终将是纠正那种消极的、毫无结果的趋势的有效手段,因为正是由于这些可能性社会主义才有能力在现实的基础上进行活动,并迎接未来所提供的机会。

传统共产主义进行重大改革的趋势和欧洲社会民主党积累的治国经验本身——这是随着在实践中积累了社会政策的一些特殊形式而来的——实际上就是能在中期内普遍使各种社会主义抉择在公众中的形象更加具有吸引力的因素。这样一来,它们的成为一种可供选择的、代替自由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的运作能力也得到加强了。

必须把新保守派自负的对历史结局的预告看作是一种很不值得相信的假设,如果不是由于它的一些观点已得到如此广泛的传播,也就几乎不值得花力气去反驳它了。真正的历史经验证明,要绝对地掌握和支配孕育在每一个人类组织中的变革的生机勃勃的可能性是何等困难,虽然人类的其它时代的事件表明,有时能做到在很大程度上延缓这些可能性的到来。

社会主义像每一种变革的社会冲动一样,为社会组织形式的实际进步作出了贡献。从一种普遍的、我们可以称之为民主的发展和深化的观点来看,社会主义在其活动中是以表现出过时性、对抗性或未实现的可能性等等的那些社会裂缝和矛盾为出发点的。这意味着由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组织在自由、平等、公正、和谐的和 社会的发展等等准则的基础上采取实际行动。

在这里,新保守派旨在掩盖历史发展趋势的努力是彻底骗人的、错误的,尽管一种政治制度的模式在实践中可以维持很长时间并且在某些国家取得成就(尽管这是以某些社会和民族群体被迫处于社会边缘为代价的)。

## 社会主义未完成的任务

从一种普遍的观点看,很显然,社会不公正的危险还始终存在。我们距顺利地解决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大多数居民的匮乏问题和无文化问题还相差很远。要巩固一种文明,而又不要个人和集体承担任何风险,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成就更少。因此,在这个星球上还必须打胜许多战役,也就是说要克服几百万人所处的那种贫困、缺乏教育和个人不幸等等恶劣条件,以便为个人和集体争取一种更高质量的生活,建立一种开放的、容许参与的、稳定的政治制度,而首先是为了达到合适的环境生态平衡。

因此,社会主义的任务大部分是未完成的任务。这些任务必须通过对理论问题的提出、对政治观点和方案进行革新并使之符合现实,才能顺利完成。

所以我们可以说,对进行理论反思工作的要求在今天同在社会主义本身起源时同样重要。在历史上,理论辩论是伴随社会主义而发展的,而社会主义像每一次观念运动一样,从它的产生之日起就同活跃的、紧张的辩论紧密联系在一起。实际上,社会主义是在人类历史上一个看来最相信理性和人类进步的可能性的时刻产生的。尤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社会主义继承了启蒙精神,而自由的精神同时也产生了社会主义的精神。

社会主义的历史是以无数次活跃的思考运动和理论辩论为标志的。这一点不仅同社会主义扎根于强大的观念运动、因而孕育着观念动力有关,而且同下面的事实有关:它的历史现实从根本上说是伟大原则的理论同每一个国家和某个特定的时代相适应的历史。

伯恩斯坦、考茨基、罗莎·卢森堡、列宁的著作,费边派的著作等等,无非是在一定的国家、在非常具体的时代、为了努力把社会主义的普遍原理应用于具体实践的时代而进行辩论的结果。

如果这样理解,我们就可以说,理论辩论、建造为政治行动提供主导思想的理论思想大厦的努力,是社会主义者活动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但是,正是在最近几年中,批判性反思的影响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这种反思在整个政治的社会主义思想领域中都可以看到,而且左派知识分子自己都十分积极地参加了。

我们从手头现有的文献中可以看到的对以前的社会主义理论家们的评价和描述表明了一种相当严重的状况。关于先驱们,有人说他们是空想主义,是前科学的;无政府主义者被看成是头脑简单的人;有人为马克思开列了一份很长的错误清单。众所周知,考茨基被说成是“变节分子”,伯恩斯坦被说成是“叛徒”和“机会主义者”;列宁的转向专政遭到了批判。有人曾经说过,罗莎·卢森堡是一个社会海市蜃楼的俘虏;托洛茨基是教条主义者。有人说“现实的社会主义”充其量是实际社会主义的一个可悲的阶段。同时有人对战后时期社会民主党的经验也极尽批判和贬低之能事。

尽管如此,社会主义在千百万人的期望和意愿中继续存在,而且就它作为一种无疑在历史上取得十分令人瞩目的进步的实践活动的成果来说,也继续存在着。因此,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者在清点我们的遗产时绝不是两手空空。众所周知的历史上的社会主义在上个世纪为人类整个发展的进步写下了极为重要的一页。它以它的努力为纠正社会进化的许多反常的和可耻的路线作出了贡献。但是,如果我们——在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努力之后——从我们今天的观点出发,以严格诚实的态度来检查一下社会主义的理论遗产留下了哪些有效的和有用的东西,那么,我们就不能摆脱还存在弊端和不完美之处的强烈印象。

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各种重大变革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适应过程以后,目前的技术革命正在改变许多我们曾经当作出发点的设想和观念。其规模之大,使我们除了接受这一共识外别无

它途：必须发展社会主义理论的新观点。而这种新观点必须能够弥补由于左派自己的知识分子的毁灭性批判而在一个多世纪以前社会主义思想的伟大经典作家建造的理论大厦上撕开的裂缝。

我们目前的弊端和不完美之处必然需要重新表述以下各点：

——可以代替已被公认为不完美的社会模式的楷模（社会主义作为意识形态）；

——能够发展社会主义的一个或多个主体的概念的确定（社会主义作为社会运动）；

——对社会主义的进步所必需的步骤（战略）。

从最终的效果看——如果允许我作这个比喻的话——应当重新改写分镜头脚本并使它符合现实。同时要物色新的演员，并且用新的表现方法和技巧来上映。

实际上，社会主义的“什么”、“谁”和“怎样”，是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更确切地说，它们是同一事物的一部分，把它们分割开来并孤立地过分强调某一方面，在历史上曾经导致错误和（或）偏差。尽管如此，为了对这几个核心方面进行分析，把它们相互分开是不可避免的。

### 什么样的社会主义

经济、社会和政治关系的变化不仅影响人们对社会主义作为社会运动的理解，而且影响人们对社会主义作为“观念结构”和希望的理解。21世纪的社会主义不能像19世纪的社会主义一样来理解和解释。这不仅同社会变化的影响有关，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同下面一点有关：技术先进的社会中的期望、需要、要求和满足可能性的水平和方式与刚刚完成从传统农业向资本主义工业的巨大转变的社会中的期望、需要、要求和满足可能性的水平和方式不一样。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不平等和需求的本质和方式发生了变

化,而且集体的目标和期望也发生了变化。情况之所以如此,有的是因为出现了新问题,有的是因为出现了在迄今所取得的成就以外的新的可能性和要求。

从最终的效果看,这包括要求更高、内容更广泛的社会主义构想。因此,这个构想不能在很大程度上以过去的理论家据以设想的某些社会所处的具体历史时期的特点为基准。

从一种长远的历史观点看,社会主义不能按照对社会主义者在某一完全特殊的经济发展情况下所概述的具体目标来理解并仅仅据此来下定义(那些在当时可以要求而且可信的东西是由这种特殊的经济发展情况决定的)。

相反,必须尽可能广泛地和开放性地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人类进步和社会的动态发展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如果这样理解,我们就能给社会主义下定义为一种解放理想,它以清除在逐步地发展和深化自由和平等的道路上的障碍为目标。它既然有这样的目标,它的任务就是改变受到社会不平等、弊端、不均质性和社会支配关系的现存形式影响的社会关系和组织的各种形式。因此,社会主义致力于推进这样一种社会组织的形式和方法,在这样的组织中能够真正发展以充分发展人类的实现自由、首创精神、革新、博爱、合作的潜力,也即实现人类进步的潜力为基础的社会生活的可能性。

问题不仅在于我们能如何理解社会主义或如何给它下定义,而且还在于这一事实:我们的理解和定义也以同样方式对社会主义思想产生影响。

未来的社会主义首先不能理解为必须毫无目的地摸索着走一条不知通往何处的迷途,但是也同样不要以为社会主义是一个具有清晰轮廓的、可供选择的社会的具体的已明确定型的模式。

如果我们把为了解释社会主义的两条道路而迄今使用的比喻简单化,那么,我们基本上能找到在童年时代的梦幻中经常出现的某些初级的精神结构的基础。这样就可以明显地看到一种弗洛伊



德式的解释,它不仅存在于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构想中(理解为必须摸索行进于迷雾中的道路),而且存在于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构想中(理解为攻克一个在观念上好似一个出现在云雾中城堡的行动)。这个城堡几乎像童话中的城堡一样,有时变成梦魇,变成一个设有地下囚室的城堡。

今天所必需的社会主义既不能解释为幼稚的精神结构中的童话,也不能说它是不成熟的梦幻般方案的映像。无论是关于迷雾中道路的观念还是关于云雾中城堡的观念都不能成为解释下个世纪的社会主义的参照点。

作为参考性模式提出来的未来社会主义的楷模必须成为行动的准绳。但是——在此我冒昧地再次使用前面用过的比喻——这种模式不可能是预先写好的并附有到处都有效的严格、精确、明白的导演提示的分镜头脚本。

我们需要的社会主义模式必须是一个开放性的有辩证适应能力的参照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有关先前也许存在的和预先描绘好的社会模式的“观念”将不再是崇拜的偶像。更确切地说,最重要的基础是实际“对抗”在其中发生的社会特征和条件——对抗的意图是在为消灭不平等、支配关系、依附关系、异化,消灭贫困的根源等等而进行的斗争中前进。社会主义的目标是:从“解放过程”的角度为进步指明方向。对社会主义来说,问题不在于攻克某种只有在儿童的梦幻中才会见到的“变幻不定的城堡”。

社会主义思维方式的第二个重要变化涉及到对现实的复杂性作充分准备的必要性问题。如果历史上已知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发展表现出明确的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趋势,那么,要说这种发展趋势在我们当代随着技术革命的进程而得到充分加速和增强,就更是合乎情理的了。对此,我们只要作一番回顾,并将当代多方面的、多种多样的、多层次的社会同将近一个世纪以前的农业社会,或同工业组织的最初形式作一番比较就够了。

因此,按照简单的社会形式想象社会主义是不现实的,天真的。这种简单的社会形式同目前的社会没有共同之处,同未来的社会就更没有共同之处。社会主义的理论很可能必须与现代科学走一条完全相同的道路。社会主义的理论必将放弃这样的要求:在一种伟大理论的范围内进行思考,在一种知识的宏观综合的范围内,在一种对简便的单一因果解释进行探索的范围内或在一种紧紧依赖于唯一的严格的参照模式的单轨性的范围内进行思考。

面对新观点而提出的伟大挑战——如果新观点有朝一日进入多层次的现实当中的话——是我们在现实中能否使自己的有效力量整体化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如何为多层次的社会因素,即改革动力的基础、社会主义的进步的基础找到明确的解释?未来的社会主义的设计方案不会成为自我欺骗的牺牲品,它必然注定要在“简单性”和“明确性”方面有所减少,而在“现实感”和“真实性”方面有所增加。尽管如此,我们仍必须指出社会主义的若干主要的磁力线。这些磁力线可以转化成扼要的、社会学上和政治上明确易懂的信息。

坦率地说,这个问题不是随便能够解决的,尤其是在社会和技术急剧变化的时代。科学为了在当前复杂的社会动荡中找到能够促使社会主义解放过程发展的那些矛盾和支配关系的主要结合点,曾经使用了一些参考性模式,如果仅仅指出这些参考性模式所能给与我们的帮助,那也几乎不能给我们带来安慰。

即使我们能够综合性地指出矛盾和支配关系的最重要因素,并预见到它们在发挥作用时可能采取的方式,我们也充其量只是开始处理这个问题罢了。主流线的确定以及对社会进行“戏剧化和符号化描述”这一根本问题仍然始终没有解决,而从这些主流线出发才能做到利益的充分积累和归类,这一切能给予有影响的政治行动以积极的实践意义,以便调和社会压力下的离心倾向和相互抵销的现象。

在一种图式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开始发问,在下个世纪,社会中将有哪些关键性因素能引起更大的敏感性反应,使那些有可能在社会主义理想的实际推动下汇合到某项政治方案中的各个集团可以取得较大的共识。结合我们上面所说的一切,我们就可以直接转向如何确定未来社会主义的可能的主体这个核心问题了。

### 谁启动社会主义

最近几年中阶级结构发生的变化导致产生了某种不明确的、理论上含混不清的局面。在这种局面下——如皮兰德洛\*的名著中所说的——各种不同的社会形态(各种不同的工人阶级)似乎在到处踉跄,去寻找某位作家。今天,一些分析家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表现这个论题的,他们调换了角色:似乎这个作家由于考虑到难以找到令人信服的形态而决定放弃这些形态了。

未来的社会主义方案难道没有一定的社会主体就不能想象了吗?可以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一种超越人们在一定的社会里遇到的社会网络和矛盾与支配关系的独特观念吗? 21 世纪的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体就是 19 世纪的伟大理论家们设想的那种社会主体吗?

在这里,社会主义者在他们提出理论和实践问题时无疑没有解决一些重要问题,对这些问题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不予理睬。

生产体系的变化令人瞩目地改变了不平等和阶级结构的性质。这种变化也涉及那些在主观上和客观上都对克服今天产生的不平等和社会不均匀状态的新形式怀有较大兴趣的社会群体的本质和构成。当然这并不是说今天已在现存制度内获得“比较优越的”传统的重要阶级是处在新的社会组合界限的另一方。事实是:不平等体系的复杂性(工人阶级内部更大的内在的阶级分化的形

\* 路易吉·皮兰德洛(1867—1936),意大利作家。——译者注

成,双重的不平等体系的产生,“下层阶级”和新的边缘群体的出现,等等)引起更大的矛盾。这种复杂性还使已有稳定地位的社会群体同另一些因处在过渡时期的社会中的社会不平等的弊端和后果而深受苦难的群体之间产生更大的潜在的对抗性。

因此,简单的传统的社会主义图景——在各个时期的社会行动者所处的地位具有明确界限的情况下的阶级对立——必将被各种更加灵活得多的图景所代替。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正处在冲突中的社会行动者的行动方式将以越来越大的规模向更多层次的领域和日益复杂、变幻无常、相互交叉的方面发展。这种认识必将首先代替旧的概念。在当今的社会里,我们可以找到对那种被我们赋予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的社会和政治冲突有着显著影响的利益冲突的典型例子。现在和将来的各个社会主体之间的各种局部冲突将如何解决,是一点不难想象的。这些利益冲突和争取社会地位的冲突的结果可能引出一一种变化了的概念。

对客观情况的社会主义观点将合乎情理地促使我们去联合各方利益,而不是利用目前还未能克服依附关系和异化的旧形式的、新的受到歧视的群体之间的斗争,以便从中渔利。但是,即使会是如此,具体经验证明,特别是在方面日益复杂、层次日益增多的社会里,旨在激化可能发生的矛盾的倾向是存在的。

传统的单纯的工人阶级没有像马克思预言的那样成为最大的社会群体。这种认识早已创造了充分的客观前提,使社会主义能够克服革命只有一个主体的观念。

凭借今天对历史的观察,可以不无意义地肯定,许多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长年深信不疑的关于唯有一个革命主体的理论是多么站不住脚。但是,马克思著作中的具体的阶级分析及其经济观点表明,这种理论从根本上说,不过是一种政治的辅助手段。这种手段既不是建立在经验数据之上,也不是建立在经济逻辑之上的。从根本上说,马克思是以一种复杂得多的方式来理解这种辅助手

段的。

主体概念确定中的理论弱点和从社会学来看主体本身的实际薄弱点在某些情况下曾导致“优势强制”的介入(“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先锋党”的军事化和官僚主义化等等)。就其职能来说,优势强制是多余的,如果所涉及的社会主体在现实中的力量从社会学角度来说像所要求的那样强大,它的社会的、劳动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条件像所要求的那样同质的话。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显然是一个勉强作出的答案。在不少情况下,这种答案导致错误的实践。许多次以社会主义为名的革命(在俄国、中国等国)恰好都是在没有工业化、只有很少产业工人的农业国进行的。

根据经验得出的论断是,单纯的工人阶级远远未能提高自己在整个从业人口中的相对比重,相反,它趋向减少。这一论断促使社会民主党考虑新的观点。一些社会民主党最终撤回了它们对这个问题的提法,在社会学领域创造更加广阔的、包容范围更大的概念确定。比如,它们采用了“全民党”、“跨阶级的党”等概念。最后,它们把关于主体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弱点变成认为社会主义主体是薄弱的或轮廓不够明确的这一理论。

可以肯定以下的事实,尽管这在总体上说是一个悖论:最近几十年左派之间意见分歧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这个因素在许多方面是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分离联系在一起的(先锋党、无产阶级专政、具有巨大影响的群众性政党等等概念)——恰恰是由需要找出解决矛盾的紧迫的运作方案(哪怕从前景来看它们是错误的)的必要性造成的,这些矛盾已经导致对社会阶级作出既不确切又简单化的社会学解释。这一点清楚地告诉我们,重要的政治组织为何能花几年时间去讨论这些错误结论。

在我们当代,有一种阐述这个题目的新的迂回方式。这种方式是鉴于薄弱的社会主义主体理论出现危机而那种无所适从的主体的理论又存在弱点,就去坚决赞同社会主义无主体这种理解。根据

这种理解,社会主义显得只是一种道义的或理性的推动力,从社会学角度来说,它不需要通过任何特殊的主体来体现。

如果我们这样做,那么很明显,社会主义的辩论最终会陷入这样的危险,即放弃原有的政治阵地,首先进入观念和哲学的领域,而对于一种其目的不仅仅是“解释世界”,而且要改变世界的理想来说,这就会导致实际上解除武装。

但是,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特征呢?那就是它能够使观念的动力同社会的动力相结合。这是两种相辅相成的动力,没有互相补充就可能一事无成。因此,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首先是把注意力集中于社会现实的数据。从我们今天的观点出发,并用一种更多地着眼于未来的观点看,十分重要的是,我们应当意识到这一事实,即今天的技术革命使这一课题的复杂性增加了崭新的、极为重要的因素。

如果我们不想在事实的戏剧化方面走得太远(或者,如果我们宁可在时间上分析的视野放得较远的话),那么,下面一点是正确的:技术革命使我们在这里研究的社会主义的动力、即主体发生两个极为重要的变化:

——劳动的机器人化代表了一种缩短人的必要劳动时间,特别是缩短生产劳动时间的趋势。这必将导致缩短人在商品生产(还有服务性行业)中的劳动时间。传统的单纯的工人阶级的数量不断下降。此外,工人阶级将以完全不同于以往的面貌出现。

——劳动的机器人化包含这样的内容,即消除社会必要的商品生产和服务性生产中异化—剥削—支配关系的一个最重要的历史根源。“工业机器人”使从前以奴隶劳动和雇佣劳动为主的所有制关系的异化逻辑发生重要的“代替性”变化。机器人化本身并不意味着社会生产关系中存在更多的社会公正和更多的价值均等。实际上已经表明,剥削—支配关系下的千百万小时已被削减,随之而来的将是实际消灭部分在生产财富过程中出现的生产制度的基

众矛盾。这一点反过来也会使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动力减少很大一部分实际运作能力。

由于技术革命的发展而产生的新情况的异乎寻常的多层次性,无疑将使刚刚开始具有极大意义的辩论进行下去。

我们可以一般地、暂时地——本文限于篇幅,不能涉及更多的内容——想象,在未来的社会主义将要面对的、并把它的政治行动转入其间的多层次的技术社会这一形式下,必然要认真作出精神和政治适应的努力,才能理解以下各点:

1. 社会主义的产生不是只有一个动力因素,产生不幸、依附关系、异化、剥削、贫困等等的原因,也不是只有一个。更确切地说,这是与个人在其中进行社会活动的各种不同领域和范围(不仅在劳动中,而且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有关的诸多原因的总和。社会在组织自己的进行相互交换和适应物质环境的制度时是以这些原因为出发点的。这就是说,未来的社会主义必将放弃过去的“以劳动为中心的”和“经济主义的”观点,并且必将以对社会的更全面、更深刻的理解为出发点。

2. 变化的加速和过去观念上的僵化及偶像的形成在社会的各种概念世界中导致了相当大的错位,而这些社会概念世界曾经是集体组织形式的依据,也是社会代表机构解释问题的依据。这种错位对现在正在就未来问题进行严肃讨论的社会主义思想产生了显著影响。但它首先是对目前宁可向后看的资本主义思想产生了影响——连同错位的全部风险以及错位在中期可能造成的扭曲的全部风险。今天还缺乏合适的答案,缺乏能够确保对社会均等和生态平衡等领域中的某些消极的破坏性倾向进行自我调控的机制,这表明这种错位表现得更加强了。因此,机能紊乱和紧张的危险特别是在经济理论领域还会更大。

3. 社会复杂性日益增加,造成社会错位和作为社会主义有效动力因素的不均等冲突的原因各不相同。这一切都要求思想不能

停留在把唯一的社会主体当作社会主义动力的层次上。更确切地说,我们必须设想各种不同的主体。这些主体包括老的和新的群体,它们在有些情况下可能具有解放和社会进步这一共同的中心目标,但也许带有次要的而又不可忽略的矛盾,然而它们的影响和一体化的可能性必将将是社会主义者进行理论反思和实际努力的极为重要的题目之一。

### 若干结论

当今社会的上正在发生日益迅速的变革进程,而且已可明确断定,历史上继承来的社会主义显露出重大的“尚待研究”的领域和妨碍它采取相应措施以迎接未来挑战的一些不足之处,这些情况都要求进行紧迫的变革。这一点不仅适用于如何给社会主义下定义和如何辨别它必须解决的问题,而且还基本适用于如何理解它,设计它。

首先,不能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种同传统的工业社会有着紧密联系,因而服从人类社会这一具体进化阶段的条件和变迁的社会政治现象。其实,社会主义的理想和给社会主义注入生命的愿望和期待在工业社会发展以前曾经有过先驱,因此,它们也将有一个超越这些社会组织形式的存在的未来。

第二,对历史上已知的社会主义,无论就它的理论的发展方面,还是就它的实际的实现方面,都必须把它理解和评价为民主的深化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积极阶段。

第三,当前社会主义的理论危机表明,一定的表达和方案作为历史现象已经实际完成了它所能完成的一切。这就是说,理论上的有关社会主义的辩论必须从深远得多的前景出发。必须避免任何僵化的风险。必须阻止人们去继续探讨曾在与今天完全不同的社会中产生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一些错位不仅证明存在着范例和未来方案的内在危机,而且首先还证明,在利用机会方面存在着



一种真正的危机,因为我们对新的参照点,对孕育在社会主义方案的动态化过程中的新的机会没有足够地重视。

第四,过去的社会主义和未来的社会主义之间的联结点在于,保证社会主义继续完成其充当社会进步的发动机这个重要角色,因为它是自由、平等和生态平衡政策的动力。为了做到这一点,社会主义必须能够对特殊需要和实际问题作出可信的答复。说“观念推动世界”是正确的,但是,说观念是在得到具体的社会动力的支持下推动世界同样也是正确的。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的作用方向就是同时建立和刺激社会的自我维护和环境的自我维护的机制,发挥公民的、道义的、理性的动力(观念)。社会主义的作用还必须有一个目标,即联合基层群众的社会动力,使人们能够从中汲取足够的力量去从事变革,以便能够找到正确解决在任何一种形式的社会中都存在的矛盾、弊端、贫困、冲突等的办法。

第五,传统的社会主义范例在某些方面的危机不仅涉及一些具体的表述方式,而且同样涉及这种范例自身起源的方式,也就是说,它是以一个具体历史阶段的社会和文化坐标为出发点的。关于未来的问题,必须在新的坐标的基础上重新表述范例,而新坐标将对社会主义的定义方式 and 理解以及设计社会主义的范围产生影响。因此,如果我们要设计未来的社会主义,就必须首先努力获得一种新的思维方式。

第六,必须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一个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出发点是一组价值,这些价值同现存社会关系的一定形式发生矛盾或实际对抗,而且从这些社会关系中产生不平等、支配关系、依附关系、异化、贫困等等,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人们是通过对社会上可以确证为非人性的一切东西的否定性反应这一辩证关系而把社会主义具体化的。

社会现实中存在的矛盾、需要以及贫困和剥削的根源,以及它们所达到的使大多数公民在精神或肉体上难以忍受的程度,将影

响和确定变革和社会进步的动力。实际上,它们是为变革的发动机提供燃料的真正强大的力量。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社会结构中发生的和社会关系的体系中发生的变革要求改变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表述。同样,在社会主义作为社会运动的形态问题上创立新的观点,并使社会主义在逻辑上适应它的战略,也都是必要的。

未来的社会主义不能放弃自己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价值确定,否则它就有陷入过分的实用主义和沦为空洞的社会主义的危险;它不能放弃自己的社会学的方面,否则就有陷入抽象的“观念主义”即没有社会主体的社会主义的危险。

未来的社会主义工作的关键是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正在完成的社会作用。同时必须集中精力,确保自己今后还会继续完成自己的社会作用,而不是把历史上的社会主义所说的“什么样”甚至“为什么”当作偶像,因为历史上的社会主义是由经济发展趋势和各个时期的情况确定的。

第七,如果我们作一番回顾,那么,我们就会一天比一天更加明白,历史上的社会主义的某些表述是在对社会的极端简单化的基础上臆想出来的。这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关系甚少。当然,同越来越复杂、层次越来越多的现代社会和未来社会就更没有多少关系了。

这种在社会制度构想方面的极大简单化留下的遗产是两个错误的说法,今天我们还由于它们的停滞不前而受苦。这两个错误的说法是:关于唯一的、根本的、并且被当作对劳动的剥削和劳动异化来理解的“社会不幸”的理论。这一理论涉及到劳动与所有权的关系,是在它之前出现的理论,即关于唯一的革命主体的理论的结果。这就是关于无产阶级作为遍及全世界的——而且是(永恒的?)社会阶级的构想,这个无产阶级在遍及全世界的弊病之下受苦,它的解放也就是全世界解放的关键。

概括起来可以说,社会主义,如果按照“新的思维方式”,——请允许我打这个比喻——必须走类似前些时候现代科学所走过的道路,而在同一时期,许多分析家还沉湎于整个海市蜃楼之中。

下面的道路是发展的必经之路:

——从要求单方位理论到多方位理论的观点;

——从企求或相信创立一种伟大的、全面的、无所不包的理论到发展由一些中等范围的(在支配关系、生态平衡、下层阶级、劳动的民主化等问题上)的理论组成的总和,同时必须在理论层次作出特殊努力,思考我们在发挥影响的能力方面的缺陷和目前“尚未研究的领域”;

——从在一国实行社会主义的构想到社会主义的多元性;

——从唯一的革命主体的理论到社会主义主体的多元性;

——从社会主义的封闭的绝对的构想到开放的和复合的构想。

归根到底,我们社会主义者必须承认和思考(社会)现实的复杂性的原则,我们要按照理论多元化的标准进行工作,并证明我们有能力用新的精神观点理解未来的社会主义。

如果我们采用这个坐标,那么,实现政治上的合作和利益的联合,要比我们从铁板一块的观念出发来试图这样做更加容易和更加可行。

历史的经验向我们证明,教条主义和封闭的意识形态构想曾经在社会主义者中间引起分离、分裂和激烈冲突。我们只有从上述坐标出发,才可能在复杂的和文化发达的社会中实现利益的联合。

只有从民主的深化和扩大这个长远的历史观点来看,社会主义才是可运作的和有效的,并将以这种方式继续推动社会的进步。

(原文为西班牙文,蒋仁祥转译自德文,殷毅彝校)

---

## 什么样的社会主义？

卢恰诺·佩利卡尼\*

我们必须承认这一个事实：社会主义，至少是马克思主义所解释的社会主义正经受着危机。总危机不仅涉及社会主义的历史建树，而且涉及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原则。这里指的首先是这样一种思想：在各个结构层次上用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取代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将会创造出在技术工艺和精神道德方面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组织类型。这里用得上黑格尔的名言：“历史的无情回答”，没有提供在这方面存任何幻想的根据。在那些消灭了市场的国家里，产生的不是“人人自由平等的社会”，却是新型的极权国家，其经济完全政治化，没有能力保障有限资源的合理使用和生产力的发展。此外，那里还形成了一个新的剥削阶级——万能的官僚集团，它集中掌握着全部精神、经济和政治权力并将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变为其特权的制度的基础。结果出现了一种名副其实的反常状态，运动原本是为了消灭压迫和剥削而兴起的，实际上却产生出与预定理想相背的某种东西。

恩斯特·芒德尔说得对：“社会主义的历史——这是 20 世纪的悲剧”。但他又认为可以补充这样一句：“社会主义的危机是社会主义者实践活动的危机”。本人对此不敢苟同。我们面临的问题比

---

\* 卢恰诺·佩利卡尼：政治社会学教授、意大利《工人世界》杂志出版者。

芒德尔所想象的更令人痛心得多。如果问题只是社会主义政党实践活动的危机,那么,要使社会主义走出死胡同,只要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模式去实践也就够了。然而问题在于:在世界历史的考试中,马克思的模式不及格。不论各执政的共产党的实践本身具有什么偏差、理解不够和曲解,有一点几乎是无可争辩,那就是这些党所创造的社会类型都是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统一计划”为基础的。创造出这种社会类型的后果是众所周知的,在此无须赘言,因为苏共领导人已经向全世界公开承认了被控制的经济的彻底破产。

也可以假定,斯大林主义的罪行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仍旧有重大理由可以认为,共产主义思想有一个明确的倾向:消灭本质上与计划社会模式不相容的一切有自由思想的分子,包括高级专家、土地所有者、商人和小企业主<sup>1</sup>等等。而实际上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在革命进程中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福音而付出的巨大的人员牺牲,而是这些革命的历史结局即导致奴役和贫困的“现实社会主义”,而这恰恰就是因为完全摧毁了市场。

历史经验表明,蒲鲁东是对的,马克思是错的。市场是自由和合理经营的基础。消灭了市场也就消灭了诸如交换、竞争和供求等一切经济活动的机制和形式,而没有这些机制和形式,谈论经济是无法想象的,如果我们把经济理解为合理利用有限资源的话。的确,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总是要我们相信,计划能够消除“市场的无政府状态”,创造合理经营和生产力和谐发展的最高形式。但这种允诺并没有被事实证实,相反却被事实否定了。结果是像蒲鲁东所预言的那样,“统一计划”使经济核算成为不可能,使经济合理性消失殆尽,使人的科学技术创造性枯萎凋谢。这就是出现震撼所有选择集体主义道路的政党的灾难性危机的原因。上述国家在市场问

<sup>1</sup> 德文版中列举的是“自由职业者、小农、商人和小企业主”。——译者注

题上的反思,使人不得不承认,在这个特殊的问题上,“科学社会主义”很不科学。

不管人们承认不承认,但历史已经证明,蒲鲁东关于自由和市场有紧密联系的论点是正确的。看来,种种现象表明,市场是公民社会独立于国家而自治的经济基础。破坏市场(这已被清楚地载入本世纪的史册)就意味着破坏公民社会。而没有公民社会,自由和民主就无法生存和发展。这一结论的涵义是不言而喻的。如果马克思不可更改地向我们阐述的生产资料是“生活的源泉”这一说法是正确的,那么,由此可以得出一个完全合乎逻辑的结论:对生产资料的垄断会自动地变成对人的垄断性监督。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模式要求一切生产力都集中在国家手中,从而否定计划与自由可以相容并存。因此,在共产主义政党摧毁市场的每一个场合,权力制衡消失了,人的权利被拥有全部所有权、从而拥有万能权力的国家破坏了。结果,一切都按照极权官僚集体主义的逻辑发展。

关于生产与分配的“统一计划”在经济方面和精神方面的优越性的思想一旦破产,不仅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发展,而且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发展就会出现危机。改良主义者,至少是第二国际的改良主义者,摒弃了布尔什维克恐怖的和毁灭自由事业的政治路线,但并没有否定布尔什维克的最终目标——建立没有市场、没有私有制和超额收入的计划经济社会。他们确信,社会主义不消灭自由主义意义上的自由,相反,将使其具有普遍性。为了逐步达到这一目标,首先应当尊重自由主义传统,承认现代民主的竞赛规则。但他们同时又相信,计划经济的社会将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然而,这种信念在现实生活的致命打击下彻底粉碎了。计划经济的非理性的和毁灭自由的性质朗如白昼。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抱有任何幻想,如果我们想认真地谈论社会主义民主,就应当运用与马克思主义科学所确定的概念完全不同的概念来思考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我们应当设想一种既不同于资本主义也不同于集体主义

的社会经济组织。这种经济组织既保留市场和保留公民社会独立于国家之外的自治,同时又能保障公民有比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更高水平的决策参与。只要我们达不到这一点,谈论社会主义就毫无意义,如果这种社会主义既不是指通过市场对社会财富分配作简单调整,也不是指一种可供选择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模式的话。

老实说,这种既不同于资本主义也不同于集体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出现了,而且决不是不久前才出现的。这里说的是自治经济。在理论上,自治经济的优点在于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原则与多元化和竞争的思想相结合,自治被规定为参与的市场经济,在这种经济中,由于生产资料转归劳动者集体,直接生产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现象会被消灭。如果社会主义的目标真的是解放雇佣劳动者,那么自治经济是唯一与这一目标相符合的生产方式。无论按照自治原则改革经济生活在政治上和技术上多么困难,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这种改革不同于从国家化的角度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它挽救了经济的合理性和公民社会的自治,使在物质生产方面贯彻民主原则成为可能。

很遗憾,社会党国际各政党在 70 年代末悄悄地放弃了自治思想。而唯一有可能使它们摆脱困境、实行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相结合的切合实际的战略的,正是这一思想。我们感到不安的是,亲眼目睹了保守的新自由主义者打着复兴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旗号向福利国家发动的反扑。

所谓“蓝色叛乱”的领导人的言论,充分表明新自由主义者对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的反应的阶级意义。例如,摩根斯·格利斯特图普认为,“国家应当重新成为守夜人”;撒切尔夫人公开主张造就“上百个新的百万富翁”;维尔·杜兰则写道:“自由与平等——两者是永远誓不两立、不共戴天的敌人”;伊尔文·克里斯托尔洋洋得意地回忆说:“资本主义——这是一种不管分配面只管经济增长的体系”;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甚至认为应把“社会公正”这个

词本身从政治辞典中删去；罗伯特·诺季克在同约翰·罗维斯辩论时，把征收所得税同强迫人们进习艺所劳动相提并论，主张国家回到只起极有限的社会作用的状态。听到上述言论，我们不能不承认这种看法的正确：自由主义思潮的复活是企图撕毁“社会契约”，即破坏国家与市场之间的社会民主主义妥协、近几十年来决定着西方国家社会发展的一种妥协。上述那些人的言论仿佛把我们带到胡佛时代。这位美国总统宣称：失业使美国人意志坚强。

事态的发展也表明，一些人在道义上感到不安是有理由的，他们认为，如果否定以追求平等为目标的方案，西方文明也就否定了自身。英国保守党人奉行所得税和增加间接税的政策，极其明显地有利于在经济上享有特权的居民阶层。连英国最温和的刊物《经济学家》也不得不指出：“我们是遇见了真正的反改革势力，他们要恢复不受道德和法律约束进行竞争的最野蛮的资本主义”。谁要参加竞争，谁就可以冒险。至于那些没有什么条件进入市场的阶级就只好勉为其难了。从政治上看——更不用说道义上看了——这是不正常的，左翼政党历来坚决反对这种局面。这使实行平等这个一向激励着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主张显得尤为迫切。诺贝尔托·鲍比奥公正地指出，从价值观念看，社会主义并不一定要发明任何新的东西，只要忠实于自己的传统就足够了。这一传统至少部分地已成为西欧各国人民在其中生活的制度化范围了。反对这种传统，就意味着历史的倒退。

所有这一切使我们有理由指出，社会民主主义的时代并不像拉尔夫·达伦多夫所轻率断言的那样已经结束。决非为此。尽管社会民主主义模式有其局限性和不足，但社会民主主义仍旧是唯一能够不用牺牲平等而获取自由的制度化的运动。虽然社会民主主义的战略肯定未给我们带来社会主义社会，但它至少能够使资本主义“文明化”并使建立在市场经济原则基础上的社会不那么残酷无情和非人道。这本身就是说明社会党国际有前途的决定性论



据。但这一论据还不足以说明这将产生一种与各执政的共产党曾经建立的社会主义有根本区别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还有待创造出来,而更为重要得更多的是,它还必须完全得到实现。

(原文为意大利文,何小平转译自俄文,胡文建校)

## 社会主义的前途——斯堪的 纳维亚和非洲的展望

乌尔夫·希默尔施特兰德\*

我们在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问题又在哪儿呢?

现在存在着这样一种倾向,人们是按照社会主义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是按照社会主义诊断出来的并试图加以解决的问题来给社会主义下定义。

最经常和社会主义相提并论的标准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是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在实践中,这种社会化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进行——通常是通过对私营企业实行国有化,并且同时实行中央计划,或者实行作为计划和市场机制混合体的工人自治。

在东欧的“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失败、南斯拉夫工人自治机制发生长期危机以及非洲大陆对社会主义方向的追求破产以后,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斯堪的那维亚的社会民主党相对来说成功的经验,它从不尝试任何一种这类教条式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而只是努力去“驯化”私人资本主义和使之文明化。然而,即使这种“驯化”资本主义的战略似乎在某一范围内很有成效,但是社会民主党在贯彻它们的由雇员以正规的雇员基金<sup>1</sup>形式来实行的集体的营利参与时却遭到失败,从这件事毕竟可以推断出,即使对于激进的社会民主主义来说也存在历史的局限。

---

\* 乌尔夫·希默尔施特兰德: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社会学教授。

此外,由于资本主义国际化和跨国化的加快,也就越来越难于哪怕只是维持对私人资本主义的驯服已经达到的程度,除非国际工人运动变得更加强大,执政的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的数目在国际范围内继续增加。

然而工业工人的数量却到处都在继续下降,尽管在一些国家中公有成分中的职员在社会民主党的保持选票比例的接力赛跑中实际上已经接过了接力棒,但是职员在思想和组织上的强势不如传统的工人阶级明显。

在这样的一种形势下,所有的社会主义运动开始检查它们的意识形态立场,检查的结果可能是它们原先的思想被淡化,并且向政治上中间派的运动发展。但是在抛弃关于解决问题的各种可能性的空泛讨论和转向重新研究各种有待解决的问题的时候,也可能存在揭示新的解决方法的开端,我建议,就关于当前的社会主义解决方法模式的争论签订一项暂时的“延期付款协议”,而去致力于思考和研究有待解决的基本问题这一任务,不管这些基本问题在不同国家中有多大差别。今天的社会主义思想应该努力去为当前的并且很可能也为未来的问题作出诊断,而不是去讨论解决问题的方法,或一再阐述这些方法,何况往往是为了已属过去的问题或被歪曲和错误理解的问题。

在这样一篇文章中我要阐述这样一种想法,即我们应对我们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未来”的问题重新作出表述,但是一如既往要在社会主义的讨论范围之内表述,以便探讨基本问题,而不是探讨被简单地称为“社会主义”的解决问题的方法。“社会主义”这一简略语常常被用作政治攻击的武器或目标,以致它的概念的核心似乎已不存在了。我们应把我们理论上的注意力集中在怎样才能处理和缓解或消除结构上的矛盾和类似的行为冲突上,而经典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是应该为之提出解决方法的。这种企图在理论上准确地描绘社会主义思想核心领域中的“结构性共相”的努力,

必须通过对不同时代、不同的洲和不同国家中的结构性的矛盾的“历史特殊性”作经验的、历史的和比较性的研究加以补充。这种理论和历史的研究的成果之一就是指出，经典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是这样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它不仅作为一个历史事实是迄今少见的，而且就它作为一个只适合数目很有限的、理论上可能的或十分可能的矛盾情况的解决方法而言，它也是罕见的。换句话说，目前人们感兴趣的大多数结构性的矛盾，如果将它们与社会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联系起来分析的话，是可以得出和要求一些解决方法，而这些方法是不能被称为经典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甚至根本不能被纳入社会主义讨论的范围。

得出这个结论可能不合那些自认为是社会主义者的人的口味。对于这些人，“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与其说是一个分析的概念，倒不如说是一个引以为自豪的标志。然而得出这一结论决不会有损于社会主义思想和历史唯物主义讨论的重要性和适用性。

许多人遗憾地或者高兴地宣布，社会主义死亡了。人们可以同意或者反对这些意见，但是社会主义的讨论肯定不仅是由于它对过去和现在的分析，而且也由于它对未来的思考而具有充分的生命力并且是不可放弃的。在社会主义的讨论中提出来的是那些对于研究历史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而在其它的历史和社会研究的思想传统中完全被忽视的问题。

经典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实际上正是以研究问题或者“矛盾”为方向的，而不是为了探索多多少少是乌托邦的解决方法。卡尔·马克思把历史看作是辩证的运动，在这个运动过程中，技术、科学和人类的能力，也就是生产力的发展首先导致不适应和矛盾，然后由此引起社会生产关系的改变，以便使生产关系更好地与新出现的生产力相适应。例如，第一批工业手工工场一出现，就与农奴制和封建主的基本利益不可调和，因此必须“打破”封建制度，解放劳动力和资本。同样，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

在通过打碎封建制度而巩固下来并且解放了早期资本主义劳动和技术的生产力以后,也发展成为这种生产力的“桎梏”,完全如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马克思是在既考虑到结构也考虑到行动者的情况下,为这种新的不可调和性下定义的。

从结构上来看,日益增长的专业化的劳动分工和不断扩大的投资和消费市场意味着,生产力的社会性在不断增加,而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关系基本上仍是私有的,它除了关心私人资本积累外,对于社会的后续影响和生产的后果没有给予值得一提的关心。这种结构上的矛盾或这种不一致在古典的自由主义思想中通过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得到解决,而马克思明确认识到,这只“看不见的手”——尤其是在具有寡头政治结构和垄断结构的成熟的资本主义中是一个理想化的理论虚构,而不是一个现实。

马克思在对行动层次的分析中发现,这种基本的结构性的矛盾不仅仅反映在工会的阶级斗争中,而且也反映在通过“生产资料的社会化”超过并且最终打破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关系的斗争中。但是马克思虽然对他们所认为的成熟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问题、即正在出现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不适应和矛盾作出诊断,却从来没有同样深刻地分析并规定这个“社会化”的细节。所以今天我们在给社会主义下定义时就遇到了困难,但是我们也可以放开手来开始寻找更能胜任解决目前的和将来会发生的问题的社会主义解决方法。揭示社会主义解决方法的艺术就是找到缓解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的方法的艺术,即使不能完全消除这种矛盾,但也不要再制造出劳动人民看来更加严重的矛盾。要把这种非常泛泛的表述转化成活生生的真实,则又是一个正确着手实施并进行创造性改革的问题。

### 斯堪的纳维亚的情况

卡尔·马克思把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过渡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搁置下来未加解决，他宣称：“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的社会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对于这句话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一种以斯堪的那维亚的经验为基础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是，进步的资本主义一直到它创造出“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这一时刻还是可以被管理的，当然在这一情况下它导致日益增长的社会生产力和落后的私人占有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是这样的不可调和，以致一旦“在旧社会的胎胞里”促使社会生产关系发生深刻的群众运动和政治结构变化已经成熟并且强大到足以实现这一改变的时候，社会的转变就在眼前。<sup>2</sup>但是在这里还应该看到，我们如何解释“不可调和的矛盾”，如何判断“足够强大的”物质力量或者运动和结构，却是一个主观的问题。这里不是指社会科学家的主观定义，而是指真正地参与选民的群体行为，参与群众运动和有组织斗争的行动者的主观定义。

但是有组织斗争的强大只是这里适用的社会辩证法的一个侧面。另一个侧面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反应和生产力在这个制度中受到真正“束缚”的程度。例如就其能迎合斯堪的纳维亚工人运动的强大的政治和工会力量来说，资本主义表现了高度的灵活性，它也显示出有能力促进、而不是“束缚”新技术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非常认真地考虑，社会的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变革的时机是否真正成熟，尤其是因为这样的解决方法的意义本身已遭到怀疑，就更应该这样做了。

在斯堪的那维亚的情况下，这个问题被换了一种方式来表述。

主要是为了考虑到一个对资本主义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即打上竞争烙印的商品、劳动和投资市场这一因素。市场机制显然能维持下去,但是也显示出一定的局限性。我们在能开始讨论任何解决方法之前,必须把这些局限性当作问题来加以诊断。作出反周期性的市场干预的必要性是众所周知的,没有必要在这里重提。除此之外我们还要讨论市场经济的三个局限性。

1. 竞争市场从其自身的逻辑中产生出不平等。强者和富于创造性的人是市场竞争中的胜利者,就趋势来说这会促使资本的集中,并因此造成商品生产者和出资者之间产生寡头政治关系,而且也在劳动市场上的就业岗位竞争者之间造成不平等。在劳动市场上,这种逻辑由于瑞典的工人运动特别强大而部分地受到限制,瑞典的工资和薪金差别属于世界上最小的。但同时没有任何一个工业国家的资本有这样高的积聚和集中程度。市场机制本身不能纠正这样的不平等。

2. 竞争市场由于其内在的逻辑带来了一些外在的产物,如空气和水的污染,也就是说,这是一些未计入市场价格的外在的后果。因此这些后果的消除和缓解不受消费需求的影响。消除这些外在后果对于资本家和“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工业企业来说(一旦人们认识到它们是这样的一种后果的话),都是一个费用问题。资本主义企业为了保持其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在正常情况下是不会承担这笔费用的。

3. 竞争的市场不仅引起外在的后果,而且也显示出一些由内部生长出来的特性,它们给市场满足某一领域内的消费需求造成困难。如果涉及的是经常性的和重复的过程,例如,消费者购买他日常需要的东西,或者某一商人延长或取消与某一供货人的关于大宗商品的供货合同,那么竞争市场对于满足消费者需求是非常合适的。在这种情况下,竞争市场让人们在尝试和犯错误的基础上有一个学习过程,从这一过程中消费者或商人能够搞清楚,哪一些

处于竞争中的商品可以按某种价格最好地满足他们的需要。与此同时这种机制也通过销售额向生产者提供有关消费者需求方面的信息。但是,如果只有很少的生意可做,而且它们的作用和使用价值不能立刻借助于每天的通过尝试和错误得出的经验加以评判,在这一过程中的“错误”也许既是不可逆转的,又是毁灭性的,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就不是满足消费者需要的适宜的机制。保健部门和教育事业就是这种情况,但也涉及例如许多食品工业部门。为了消费者的利益,对于这些部门越来越大量使用一些几乎不知道会有什么长期后果的化学品的做法必须进行整治。一个有趣的特殊事例是投机的金融市场,在这里“钱可以生钱”,一般的消费者根本得不到什么商品,但还是要为“金融巨头”的这种费钱的游戏付款。

斯堪的那维亚的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力图保留那些有利于消费者的市场机制,同时如果明显地出现上面提到的市场机制的局限性,则采取法律手段和其它非市场的国家干预形式,消除市场的缺陷。在环境政策的一些领域内,人们却反而想到了要引进市场机制,即“把环境标明价格”,也就是把外在的后果转换为内在的费用,这种内在的费用要高得足以吸引人们明显地缓和环境的负担。

用统计加以比较可以看出,直到不久以前社会民主党的政府还通过支持市场机制并在市场机制明显出现局限性的地方采取完善市场的步骤而相当成功地“管理了资本主义”。有一个例外就是,对资本的积聚和集中,社会民主党不仅迟迟不加干涉,而且通过其政策推动了大的支配市场的工业企业的出现。统计对比表明,瑞典的私人资本积聚和集中程度是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最高的。<sup>1</sup>但是所有这些大企业都要经受国际竞争。此外,象瑞典这样一个高度依赖出口贸易的小国家,需要大企业的资金,以便它在国际市场上有足够的竞争能力。

一个有可能削弱瑞典社会民主党所取得的成绩的非常重要的因素正是我们的经济越来越国际化。原来的优越性是避免了第二



次世界大战的战争破坏,并因此在战后的许多年中能够有足够的资金,在保证工业成功地膨胀的同时还承担建立一个福利国家费用,现在这些优越性一去不复返了。目前在瑞典的大企业中有一种明显的倾向,就是在社会福利国家的费用不那么突出的外国的直接投资支出大大增加了。

尽管瑞典在社会民主党的长期统治下相对看来一直可以说是成功的,但是也出现许多问题和矛盾,要为这些问题和矛盾找到解决办法,必须对它们作出切合实际的诊断。

在此我想谈谈对社会民主党在瑞典执政的五个非常严重的挑战。第一,传统的社会民主党的选民从趋势上说分裂成一方面是一个由于资本主义的顺利发展或多或少地被排挤到社会边缘的强大的少数派,而另一方面是“工人贵族”和在公务部门任职的人员,他们从资本主义的顺利发展获得了好处——更不用说那些股票持有人了,他们虽不属于社会民主党的传统选民,但是也可能由于社会民主党对资本主义的熟练的管理获得好处。\*需要高度的创造力和处理社会问题的技巧,才能以这种方式解决这种内部不平等和党自身的这种政治矛盾,即不仅促成矛盾双方的平衡的妥协,而且事实上也实现一种新的综合,以使党的政治战斗力能够得到保持和继续巩固。

第二个挑战被自由党人判断为:生机勃勃的、生产性的私人企业被无效益的和病态的公有成分所“排挤”。但严肃的、以经验为依据的研究并没有得到任何能够证明存在这种“排挤效果”的确凿的经验性证据。为社会再生产面付出的大多数基础设施的投资和支出占公有成分的相当大部分,这实际上是有益于私人企业的,而且处于竞争市场中的私人企业是不可能以更低的费用和相同的质量水平做到这一点的。看来,自由党和保守党人士对于社会民主党执政下的公有成分提出指责,以及保守党政府试图让这些部门挨饿,以使它们不能有所作为和不受欢迎,其主要原因在于,私人企业为

了自身的膨胀需要有新的市场。它们想用某一价格出售它们的服务来赢利,但目前享受这些服务的权利在斯堪的纳维亚和其它地方都是由国家给与保障的。但正如我在上面所阐述的,公有成分提供的服务在通常情况下是不适应市场的,因为它们不是重复的日常营业,而且通常具有单向性的长期效果。

尽管有很好的理由赞成国家监督下的、不带有商品特征的、以权利的形式提供的许许多多的社会服务,反对把这些服务作为市场上可以买卖的商品,但是福利国家的所谓财政危机却是一个现实问题。福利国家是非常昂贵的。人们当然可以论证说,这种危机至少部份地是资本主义本身制造出来的,资本主义想以此逼迫公有成分认输,证明对公共设施实行私有化的要求似乎完全有道理。然而这也丝毫不能改变这个经济危机的现实。

可惜福利国家机构中的官僚对费用效果几乎不感兴趣。不需要从“公共选择理论”接受福利使财政预算达到最大限度的假设,就可以得出结论:在这方面,国家机构中的官僚的利益与普通的纳税人之间的利益存在着矛盾。此外,谁如果听到这样的说法,即在支付公共福利设施日益上升的费用中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他并不需要因此就想到,那些不可避免要使用大量人力的福利官僚机构中的费用效果必须与工业上的费用效果完全等同。

很明显,需要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它既不增加社会福利工作的费用,同时又避免由公共服务性行业私有化带来的风险。从消费者的立场来看,市场机制是不能令人满意地来提供这种服务的。

瑞典社会的福利体系中存在的另一个问题与其官僚结构的某些社会的和心理的方面联系在一起。官僚主义的规章制度常常根本不适合解决明显的个人的问题以及具有感情的人的问题。

第三个严峻的挑战产生于上面已经提到的环境问题以及生态运动。如果我们今天应当提到一种具有世界范围后果的基本的、结构性的矛盾的话,这就是由进步的工业体系——无论是资本主义

的还是“现实社会主义”式的一一中产生出来的消极外在现象与保持“生态空间”中的生产力和再生产力的必要性之间的不可调和性。如果我们可以行动层次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一种力量，一种新的、针对这种矛盾的力量，那么我们通常不是指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而是指绿党和许许多多与它联系在一起的运动，包括和平运动。然而我们肯定更愿看到环境保护运动、社会主义的左翼和改良的社会民主党之间很大程度地接近，而不愿看到民主运动和右翼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相互接近。

社会民主党的第四个挑战来源于当前和(或者)将来的失业的威胁——尤其是对那些传统上投社会民主党票的人。从斯堪的纳维亚的角度来看，似乎这种危险目前还不是很严重。例如瑞典目前失业率又达到了60年代中期时的最低水平。在今天所有的工业国中，瑞典的失业率属于最低水平之列。主要问题似乎在于缺乏劳动力，尤其是缺乏专业工人。但是必须严肃对待作为未来威胁的由技术造成的失业——或许这也是过完全另外一种的生活、以人道主义的形式利用我们生存时间的唯一机会，正如安得烈·高茨和其他人所暗示的那样。但是如果这种挑战的本质就在于此，那么我们必须通过分析和研究而使自己坚信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机会，而且愿意创造性地利用这个机会。人们的研究没有对于失业率的上升是否不可避免取得一致的意见——但是一定要严肃对待这种危险。尤其要考虑到青年人失业及其带来的许多社会和心理上的后果，例如吸毒之类的问题。

第五个挑战是与社会发展的道德方面的因素联系在一起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如丹尼尔·贝尔所称的资本主义消费社会在文化上的矛盾。<sup>4</sup>这种社会给人的印象——正是在青年人眼中——是助长一种极其个人主义的、享乐主义的、甚至自我陶醉的心态，但它同时却又要求人们团结互助，进行整体的结构性改革，以便能克服上述挑战。但这种文化上的矛盾不是今日社会的唯一特征。新

的环境保护与和平运动显示了完全不同的、能和今天的挑战更好地协调的道德观念。因此它能够吸引许多青年人。

由于我自己要推迟讨论解决方法,以便能够更好地把注意力集中在现存的问题上,所以在这里我还不能对上面提到的问题和挑战提出解决办法。对此我只能在本篇的结束语部份中作简短的阐述。我还想提醒我自己和我的读者注意一种对于马克思一直具有根本意义的分析方式,即使这种分析方式不能为将来提供任何社会主义的解决方法,它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仍将具有根本的意义。自由主义的思想总是顺利地以以下观点为出发点:人们在克服大多数困难和不平衡时可以信赖自己的自愈能力,剩下的问题和利益冲突可以在平等和交换意见的基础上通过各方之间的合乎理性的对话来解决。而社会主义的思想却一直是以对矛盾和不平等的分析为出发点的。属于这种矛盾的既有对劳动力的剥削,也有对自然资源的剥削。矛盾不能自动地得到解决,它经常被再生产出来,持续存在并激化到当事者之间多少带有冲突性的斗争不可避免的程度,然后这些矛盾才会得到缓和或者消除,或者为了统治者的某一权势集团的利益再次产生。在社会主义的思想中,处于相互冲突中的行动者通常不被视为同样强大,这样说当然不包括较弱的一方在集体的组织和团结方面或许具有的力量。

矛盾的概念是这个问题的困难所在,在这一点上,必须对社会主义思想作较大的改善,以便能够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从这个分析中合乎逻辑地指明能够为问题找到解决方法的方向。“矛盾”这一概念常常以相当含混的形式,并且通常在缺乏概念的准确性和经验依据的情况下作为某种政治雄辩的关键词汇来使用。如果这样看待它,这个概念可以指明一个寻找描述问题的普遍的方向。但是仅仅指出这种方向是不够的。当马克思说到日益增长的社会化的生产力和私有制社会生产关系的矛盾的时候,他是在试图建议对某种形式的矛盾作出更精确的描述——尽管这种精确的

描述还不足以避免对马克思的话的意义发生争论。<sup>6</sup>一些象马克思自己已做到的那样,为了更精确地表述马克思的这个概念所做出的努力也是不够的。还有其它种类的值得用马克思提供的工具去分析的矛盾——马克思没有更进一步研究的,一些不仅涉及生产力,而且也涉及再生产力以及正确和错误信息的力量和社会关系的矛盾——更不用说政治权力的力量和社会关系以及用暴力对人类生命的毁灭了。许多这种观点被马克思主义者当作一种伴随现象的“上层建筑”来讨论——最多是认为这些上层建筑能对经济基础发挥一些反作用,这种所谓的上层建筑也有其自己的逻辑、自己的力量和存在于意识形态的生产和权力斗争之间的社会关系,这些必须得到理解和考虑,尽管它们的作用“归根到底”被视为受历史上既定的经济基础所允许或引起的条件的限制和约束。

如果我们观察在无意之中摧毁我们的环境的那些力量和社会关系,我们也必须超越马克思。环境是我们生命的“载体”,它的“承受力”也受到了我们技术文明“毁灭力”的威胁。但如果走出这一步,就要继续采用马克思主义的寻找形式和内容之间的“矛盾”并寻找在分析的行动层次反映这些矛盾的载体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也能够做到这一点。

在这篇短小的讨论文章中不能指出,怎样才能从矛盾和行为冲突的角度分析和解释上面提到的五种挑战;怎样才能做到,在详细描述我们的问题的矛盾的同时,使这些描述也包含对怎样才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解决相应的矛盾的符合逻辑的指点。<sup>7</sup>

关于这些“矛盾”我在这篇文章中只想说明两点。由于发达的工业国家中目前的社会生产,再生产、信息和权力的状况面被束缚的“进步力量”,不仅是或不主要是已被使用的、今天已经高度发展的、能够应付上面提到的对生态和人类的一些挑战的生产力,而是在理论的规划中和正在工业界保密情况下的实验室中已经部分地发展出来,但由于现存的社会生产关系的束缚仍然没有投入生产

和没有被利用的力量。<sup>8</sup>为了解放这些受到压制的隐藏的革新和创造性的发展,绝对需要超越当前形式的国际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并且和生态运动相联系发挥一种政治力量,它会提供一种新的超越民族的政治工具,凭借这种政治工具,所有国家的资本家将较容易把他们的革新带进市场,而不必担心被那些由于成本效应而忽视相应的投资并从而至少能在短期内获得赢利的同行们挤出市场。

这里应该注意,这样的解决方法所建议的是通过发展新的和急需的生产力来消除“束缚”,而不是在世界范围内用不现实的革命方法消灭资本家。创立一个既不能由一个国家的资本,也不能由跨国资本本身提供的国际的“有能力的环境”的努力遭到危险。要创造这样一个重新确定经济活动的某些基本的成本参数并使之国际化、从而本着保护环境和人类生存的利益解放新的生产力的“有能力的环境”,需要国际上的政治合作,采取反对政治的、新自由主义的行为就意味着完全不理解在这一具体战线上的问题和可能的解决办法。

我们还可以列出其它的“束缚”,这些我们在不久的将来会不得不加以讨论,如果由技术造成的失业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如果福利国家的财政危机或许会由于不得不向那些被挤到正式的劳动市场的边缘的人发放一种有保证的最低工资或者所谓的福利工资而加深的话,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中我们要问,这些被挤到边缘的人是否将成为二等公民和纯粹的非生产性的消费者?抑或可以想出一些更富有创造性的替代方案,但可惜这些替代方案被“束缚”住了,因此未能实现。

一个可能的替代方案在于,把许多目前属于在国家监督之下的公共部门的劳动密集型的福利工作,委托给由日益受到自动化的工业部门排挤的公民组成的合作团体。<sup>9</sup>企图接过公共服务部门的市场来赢利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主不会欢迎合作制的再生产

力量的这种发展,因此他们会试图“束缚”它。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结构性的矛盾也必须加以讨论和解决。

### 非洲的情况

上面说到,“找到社会主义解决方法的艺术,就是找到缓和资本主义结构性矛盾的解决方法,如果不是完全消除,也不要引起其它在劳动人民看来更为糟糕的矛盾”。从正统的立场来看,“社会主义的解决方法”这种说法对于非洲似乎根本不存在。实际上,在这个大陆上于50年代末和60年代政治上获得独立的国家中,还没有一个国家有民族资产阶级和土生土长的资本主义<sup>19</sup>,因此也不可能用经典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来解决矛盾。80%至90%的居民过去和现在仍然是农民或自给自足的耕种土地的小农。

和别的国家不同,在坦桑尼亚和莫桑比克这样的国家里进行过这样的尝试,在其独立前的时间内产生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由上层决定,通过“强迫乡村化”建立新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关系以及对农业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这种生产方式只是在一些外向型的出口产品的生产方面才表现出资本主义的特征。采取这种措施时基本上是假定,由于没有资本主义的企业主和民族资产阶级,国家必须承担发展生产力的责任——这是一个历史上从来还没有尝试过的战略。在亚洲,如在日本,很久以后又在朝鲜和台湾实行的广泛的国家干预措施,并不是在这样一个真空中发生的。那里的企业主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萌芽已经出现。

非洲国家进行的、由上层规定的、以社会主义或非资本主义为方向的发展的尝试遭到了失败。从根本上看,它的结果是一个被官僚主义窒息的、很少或完全不能刺激生产力发展的生产机器和一个国家官僚机构,这个国家机构中的工作人员为了他们能在比较穷的国家中生存下去,要依靠贿赂,或者在自己本职工作以外在影

于经济中找到工作。在一些比较富裕的第三世界国家中或在穷国中的一些比较富裕的部门,官僚们可以将外国提供的援助和国家收入装进自己的腰包,用于奢侈消费或转移到国外的银行户头上。这样对生产性企业的投资相应地就少了。

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对 19 世纪的欧洲和北美洲发展起来的那种土生土长的或民族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无助于人们理解刚才写到的这种困境。首先必须分析国际资本主义,从殖民主义前开始,然后是殖民主义的资本主义,以便理解第三世界的困境,尤其是理解独立前和刚独立后的一段时间内非洲国家缺乏真正的民族资产阶级这一事实。这样的分析是着眼于依赖性和“世界体系”进行的。<sup>11</sup>但是正如其批评者、甚至左翼批评者强调的那样,这种分析方法也不能有助于人们理解第三世界的困境(这种困境有可能使这些国家内部产生现实的和进步的行为)。强调参与一个缓慢的、似乎不可能受到影响的、历史进程的那些遥远的和无法操纵的外部因素,如“依赖”和“世界体系”,并不能给这个问题作出回答,例如,在非洲各个民族国家或区域组织本身的范围之内,是否可以做出一点事来,以摆脱这块大陆所处的历史绝境。为了采取地方的、民族的和区域性的有利于正是在这些地区建立一个“有能力的环境”的措施,迫切需要有理论论证和经验根据的建议。因为,在第三世界无产阶级的压力下改革“世界体系”是完全不可能的,用革命推翻这种体制也同样是是不可能的。

此外,象例如沙米尔·阿明曾建议过的那样,选择完全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脱钩”的道路,似乎对于大多数非洲政府是不可行的,哪怕只作为一个替代选择也缺乏吸引力,因为大多数的从职位上捞到的好处是来源于外国的援助和与国际资本的贸易。

一个似是而非的情况是——也许这同时也是辩证的——非洲的这一由历史造成的和当前正在继续的落后和停滞的阴暗景象,已产生了一些有趣的、挑战性的,甚至是可以想象的可能性,而且



是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关于“结构性调整”和“整治”的纲领相对立的可能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整治”纲领通常不提 70 年代银行业昌盛时期，那时银行家们几乎是追逐第三世界的财政部长们，很可能特别是其中的比较腐败的人，以摆脱它们的石油美元。安东尼·桑普森在 80 年代债务危机才刚刚开始的时候在一篇关于世界银行活动的生动的评论中这样写道：“出售信贷的行为就好像给酗酒者提供一箱威士忌。”<sup>12</sup>我们必须时常回想这一情况，以便不要忘记，偿还债务一方面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一个必要的和合理的主要事务，但是另一方面，吸收外汇，以清偿到期的贷款的能力，并不能合法地被称为“为了发展的整治”。“整治”这一概念有双重意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玩弄意识形态手段运用这个概念，却勾画出一幅完全错误的图画。许多经验性的证据证明，鉴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条件”，“重新借钱来清偿债务”对于非洲的穷人和无法享受权利的人来说决不意味着整治他们的境况，同时也不应该忘记病人和挨饿的孩子。只有少数第三世界国家，由于其它原因日子相对好过一点，在它们发展中没有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条件的消极影响。

由非洲政界中间派一直到左翼所发动的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纲领的论战已经导致对非洲的困境作出一系列重要的诊断，并且从对这些问题的理解中也提出了解决办法的建议。我在这里想把乌干达政治经济学家曼达尼的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战略的突出的分析性论战作一概略叙述。<sup>13</sup>作为最好意义上的学者，曼达尼努力不去讽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纲领，而是让它自己来说话。我只想讲一下纲领中和曼达尼有关的重要几点。

“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观点，问题从长期或短期来看在于生

产的提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语言中,这就是一个供给扩大的问题。怎样做到这一点呢?通过将财力从消费阶层转移到倾向于投资的阶层,从占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和公务员,转移到占少数的企业主……。”(曼达尼:《非洲情况》1989年6月号第34页)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为了长期提高群众的收入,必须进行短期的缩减,以便为数不多的企业主将这些钱投资到生产性的和赢利的活动中去。应当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条件”来将资金转移到企业主身上,也就是转移到应该促进生产和经济发展的理想型的民族资产阶级身上。这些条件就是:货币贬值,紧缩信贷,贸易自由化,或“开放市场”和公有成分私有化。“正确地规定价格”是这份纲领的关键词。

但是就乌干达而言——这当然也符合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乌干达资产阶级具有企业主思想的设想已被证明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从曼达尼提到的统计数据来看,这个资产阶级非常嗜好奢侈豪华品的消费,而根本没有投资的愿望。乌干达这个人员阶层中的45%的外汇被用于非生产性的目的,其中包括用于进口大宗商品,而当地工厂是具有生产这些商品的能力的,当地也有未加使用的原材料可以提供。出售这些进口商品尽管有助于资产阶级积累财富,但肯定不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期望的那样会有助于生产的提高。

关于“开放市场”,曼达尼指出,在许多非洲国家中还没有只等着开放的市场。人们还必须建立市场。<sup>14</sup>但这是些怎样的市场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重点放到出口市场上(在乌干达是咖啡和茶叶),以提高外汇收益——当然也是为了好偿还贷款,但也是为了便于国际外汇的流通。工资很少的和挨饿的乌干达人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说居于次要地位。当然可以假定,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从收益中分给穷人“一点残屑”。

曼达尼作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家,在提出代替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和世界银行纲领的方案这一点上是很坦率的。他说非洲今天面临的真正的抉择,不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而是要对阻碍农民生产效益的古老结构进行改革。”曼达尼拒绝小农的土地所有制,决不是为了偏向社会或国家所有制,他拒绝所谓的市场力量,也不是为了偏向官僚主义的“中央计划”,但是他却督促我们在考虑必须加以利用和必须建立的市场时要决定,这是大规模的国际贸易出口市场还是要为国内消费者考虑的、首先利用本国资源的大众消费品市场。选择应该促进和应该创造什么样的市场是一项对于长期发展会起深远影响的政治决策。不能听任市场力量的“魔法”或国际经济的简直无法看见的手来创造市场,在一个大多数的人口都是由耕种土地的小农组成、而且饥饿仍然在扩大的大陆上,当务之急就是要改善农业的生产力。曼达尼对于非洲和其它地区的按社会主义方向改善农村经济生产的努力的失败非常了解,他欢迎由国内农产品市场带来的对生产力发展的刺激,以及能够在这样一个国内市场经济中促进农业以外的其它重要生产的倍增效应和连锁效应。

曼达尼的关于改革阻碍农民生产积极性发挥的古老结构的建议能导致社会主义吗?鉴于“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的象征性的而不是分析性的特点,正如它在非洲和其它国家中被使用的那样,我们或许应当把这个问题变换一下提法:曼达尼的建议是否有助于解决由于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以及在独立之后出现在国家官僚和贪污盗窃统治集团中的“内部殖民主义分子”所引起的非洲生产方式的矛盾?他的建议是否解放了对于克服落后至关重要的生产力的发展,即那些保证非洲的各个国家能够养活自己的人民,并且据情况还要救济境况不太好的邻国的生产力?我认为,这都是可能的——但结果决不是“社会主义”。

这篇文章的重点放在刚刚提到的这个问题上,而不是放在答案上。这个问题,如它被重新表述的那样,是用社会主义讨论中使

用的概念来表达的。我对此试图作出的回答是：实现曼达尼的建议，即曼达尼作为社会主义者在那次社会主义讨论中提出的这个建议，在非洲将不会产生经典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一词的经典意义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必须听任非洲按照自己的定义去解决自己的问题和矛盾，不是强迫它去实现欧洲式的梦想。

当然乌干达在非洲不如说是一个特例，即使不是一个完全不典型的例子。鉴于乌干达的握高生产和发展生产力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计划”的失败，我们也不必非得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无论在非洲哪儿出现都注定要失败。瑞典的一位国际著名的政治学家和非洲专家格伦·海登就确信这一观点：如果非洲不经过民族资产阶级领导下的资本主义阶段，它是没有能力发展的。海登的最近一部新书名叫《没有通向进步的捷径》，在这本书中他宣称，他的观点接近“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对早期资本主义在促进生产力的增长上的贡献给与了精彩的和著名的赞扬：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运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魔法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256页）

作为社会历史分析学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幻想的伟大在于，他们不仅承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巨大的”增长，而且同时也考虑到了广泛存在的剥削和贫困的状况，这是在有良好组织的工会、普选权和政治民主出现之前的资本主义的特征。

格伦·海登在他的书中忠实地遵循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他也认识到和早期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剥削和贫困以及以

后出现的反抗这种贫困的阶级斗争。他认为,即使在非洲也不会有避开建立一个民族资产阶级和随之而来的阶级斗争的“捷径”。他在书中强调,只有真正的民族资产阶级才能使生产力有足够的增长,可以克服落后状态。

不管人们是否相信“民族资产阶级的方案”对于克服落后发展的可行性,可希望程度以及必要性,但格伦·海登的这本书的确有助于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提到非洲研究的日程表上:在什么样的历史和地区条件下“民族资产阶级的方案”能够取得成功,它在什么时候会象在今天的乌干达那样失败呢?对此象肯尼亚、或许还有象牙海岸这样的国家尤其感兴趣。

1989年7月第一个星期在内罗毕举行了一次关于“非洲发展研究中的矛盾、困境和开放”的学术讨论会。格伦·海登和沙米尔·阿明都参加了这个讨论会。这次会议给人的一个印象是,海登对他的《没有通向进步的捷径》一书中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主要论点的适用性比从前怀疑态度,并且也能够认识到“捷径”在历史中的地位。他还暗示,由沙米尔作为克服落后的可能性而建议的“蓄意脱钩”在一些贫穷的和重要的非洲国家中有可能用“必不可免的脱钩”来取代——在此,他没有解决这样一个问题,这种必不可免的脱钩是另一种发展的一次难得的机会,还是会引向灾难的边缘。

曼达尼关于一种经过改革的面向国内的农业市场经济的建议,实际上是以一定程度的初步脱钩为前提的——不管这种脱钩是蓄意的,还是强迫的。这种经济主要依据小农对土地的占有作为“另一种发展”的递增过程的基础。这个“另一种发展”最终将会与非农业的、但依靠原料支撑的生产一起对国内外市场产生倍增效应和连锁效应。看来,在涉及非洲发展努力的更新的问题时,许多细心的和知识丰富的分析家目前似乎就朝这个方向思考。但是人们必须弄清楚一系列的矛盾,才能沿着这条分析路线继续前进,并

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建设性的政治干预。关于民主的重要意义和非洲的国家在它和私人领域和公民领域的关系中所起作用之间的矛盾,应当成为关于非洲发展的这种社会主义讨论的中心,同时也应该充分考虑到不同的非洲国家之间的差别。

### 结 束 语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有意识地将注意力集中在各种类型的问题、矛盾和挑战上,而不是把注意力放在这些问题的可以设想的解决方法上。我们常常在政治领域过于频繁地提出和坚持一些解决方法,却会忘记和疏忽真正要解决的问题。当相互竞争的关于解决方法模式的空话控制政治讨论的时候,基本的问题和矛盾很可能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所要求的解决方法就成为一些纯粹的空话,变得毫无意义和过时了。

我在这篇文章的主要部分中提醒人们注意不同类型的问题和挑战之后,还想在结束语中,当然是泛泛地说明一下克服这些挑战所必需的解决方法。

我想建议正如我们今天和明天所需要的那样对社会主义下一个带有派别立场的和规范的定义。当前的社会主义应该是一种与受到反周期性调节的竞争市场经济的一些好的方面相和解的政治,同时它对上文提到的这种市场经济的局限性应有批评的意识,即考虑到市场经济在不平等方面的影响,它所产生的一些消极的外在后果和内在缺陷。社会主义者应该直接参加到市场经济的这些薄弱环节上用公共的合作制的干预取代市场力量的尝试中去。<sup>16</sup>由于不同的国家存在不同的薄弱环节,因此社会主义的特征也是一个国家有别于另一个国家的。

从根本上说,这是挪威的纳维亚的社会民主党大约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在作尝试的一个方案。但是为了配得上“社会主义”这一

光荣称号,这个社会民主主义的方案应该突出下面三点:

第一,必须更加认真地对待社会主义伦理问题,不加任何限制地并且不仅是从传统的社会主义的团结互助的价值和解决集体问题所要求的共同努力方面,尊重个人的尊严和人权。这个方案必须找到在社会的各个层次促进和推广这种伦理的途径。

第二,公有经济成分的官僚制尽管不可避免地会保留下来,以便代替或补充那些经济成分中的竞争市场,在这些成分中市场力量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但社会主义者必须找到消除这种官僚制的最重要的人的方面和经济方面的缺陷的途径。

第三,这个方案必须在实践中,而不只是在口头上加强国际化的特点。社会主义不能与肆无忌惮的民族的或国际的资本主义和睦相处,但却肯定能和那些资本家和平共处,这些资本家的经济活动是由经过国际协商、与市场一致的社会和生态的成本参数来调节的。为了能够面对与相应的分配和环境意识相联系的持续增长挑战,这样的一种“有能力的环境”必须通过国际协议来约定,因为一国确定的成本参数会使以市场为导向的资本从成本昂贵的国家流向成本便宜的国家。

这篇文章中假设的五个挑战和在结束语中补充提到的提示,尽管承认市场经济适用于那些它能够掌握的营业,但它对于解决在社会主义讨论范围中诊断出来的问题,却是比任何一种单单对生产资料实行国有化都更加有效的行为方式。

归根到底,资本主义的灵活性和它的甚至可以适应某些有限制性的条件和参数的能力(只要它们在国际上对于所有的竞争者都是相同的话),在问题涉及把市场经济和与由社会主义价值和生态价值决定的国际政治干预手段牢固地结合起来时,确实是一大优势。进步的资本家和企业家也会意识到这种国际化的市场秩序的潜在优势,因为它可以产生稳定性和可预见性,这对企业计划,节约的企业领导和技术革新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北方国家在今天的和未来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必须遵循的国际方向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与所谓的南方,也就是非洲和其它地方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问题。在这一方面非洲和拉丁美洲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亚洲目前在经济增长方面进行得很好。其它的第三世界国家在它们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强加给第三世界债务国的过分笼统的、往往显得无知的所谓结构适应和整治计划的斗争中,需要西方社会主义者的具有非常广阔的分析眼光和经过深思熟虑的支持。这些计划要求“适应”,但它们并不适应各个第三世界国家本身的不同情况。

可惜有一大批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家,由于他们所受到的教育,他们不能认识到,处于他们的抽象的和有局限性的经济模式之外的某些东西。他们和社会党以及社会民主党共同工作,并在那儿充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教条的传送带。改变新古典主义在国民经济学说中的这一支配地位,不是一个纯粹学术问题,它对于要把第三世界的国家从债务的困境中解放出来,以便使这些国家能够开始发展自己的规划,而不是将他们的大部分的钱用于偿还西方银行的债务和利息的这种社会主义的努力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 注释:

1. 几年前瑞典实行的雇员基金是鲁道夫·麦德纳尔原来方案的打了折扣的版本。雇主联盟成功地掀起了一场几百万人的反对雇员基金的运动,使公众对这种基金产生很大的怀疑,竟认为这似乎是已经过时的苏联集中制计划和翻版<sup>(1)</sup>。因此社会民主党人最后只能做到这一程度,无法再把这件事更多地向前推进了。

2. 参看希默尔施特兰德、阿恩纳和伦德贝格著:《超越福利资本主义》,伦敦海纳曼出版社1981年版,第2部分。这本书是按70年代开始时的相当乐观的基调写作的,它在政治上已经过时,但仍旧包含着(甚至政治方面)很有意义的理论和经验的分析。

3. 参看B. J. S. 班因:《国际结构中的国际差别,20世纪50年代的8个国家》,纽海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46页以下,F. L. 普赖尔:《关于集中化比率的国际比



校》，载于《经济和统计评论》第54卷，1972年，第130—140页。

4. 纵向统计调查表明，1980年以前瑞典的不平等逐渐缩小的趋势在这段时间已被不平等逐渐扩大的情况所代替。参看J. 福格尔等著：《瑞典的不平等——发展和目前情况》，斯德哥尔摩SCB出版社1987年版。

5.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纽约基础出版社1976年版。

6. 参看例如G. A. 柯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1979年初版，1982年修订再版），乔·厄尔斯特《理解马克思》，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7. 我在联系另一问题时建议对这类矛盾的详细情况作一分析性研究，即所谓“行动者过程矩阵分析”（APM）（参看希默尔施特兰德，《作为研究工具的公式化了的历史唯物主义》，载于《国际社会学》1981年第1卷第2期第113—136页）。但在该文中运用的这一方法过于专门，不适合这里进行的一般讨论的范围。

8. 例如我想到一些创造发明，它们可以用一些对环境有利的发动机类型来代替机动车的传统的燃烧型发动机，功率不变，但能量利用率却更高。

9. 马茨·弗里贝格和乌尔夫·希默尔施特兰德在他们用瑞典文写的关于瑞典的社会结构和日常生活的一本书的第26章中讨论了这一代替方案（《瑞典一日常生活和结构》，乌尔夫·希默尔施特兰德编，斯德哥尔摩诺尔施特茨出版社1986年版）。参看乌·希默尔施特兰德，《福利国家的前途。一个整体诊断和结构改革的问题》，收入厄尔塞·欧文编《福利国家比较及其前途》，阿尔德斯霍特高威出版社1986年版。

10. 即使这一看法一般说来是恰当的，但也有一些例外。肯尼亚在获得独立时已有一个亚洲人肯尼亚资产阶级，这个阶级与其说是“买办阶层”，不如说是民族资产阶级。而且黑人肯尼亚民族资产阶级也在增长。肯尼亚与大多数其它非洲国家相反，迄今既能够在只需要进口极少量粮食的情况下养活本国居民并且建立一个小规模的基础工业，而且能出口茶叶、咖啡和园艺产品以换取一些外汇。对于一个第三世界国家来说，肯尼亚的通货膨胀率是相对低的，最近10年来处于7%和15%之间。

11. 布洛姆施特罗姆和赫特书中对这种观点作了很好的概括和评论：《转变中的发展理论。关于依附性的理论及其它：第三世界的反应》，伦敦泽得出版社1985年版。

12. 关于这句引文和其它评论可参看理查·施韦德贝格的很能说明问题的论文：《石油冲击，私营银行和债务危机》，载于《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87年8月号第323—336页。

13. 我指的是曼达尼的两篇论文。一篇是为UNRISD写的有很好的文件根据的未发表的报告，《乌干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划的矛盾和前景》。另一篇是通俗的但非常清楚的论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乌干达》，载于《非洲事件》1989年6月号第34—37页。

14. 参看约翰·托依在他的著作《发展的两难处境。关于发展理论和政策中的反向革命的思考》，牛津贝西尔·布拉克威尔出版社1988年版第19页以下。

15. 翰伦·海登：《没有通向进步的捷径。非洲的发展和管理的的前景》，伦敦海纳曼出版社1983年版。

16. 市场经济能否维持下来甚至取决于这些干预，因为一个完全不受控制的市场由于它本身的内在逻辑会形成一个自我摧毁的机制。因此会出现这种似是而非的情况：为纯粹的和不受控制的市场力量辩护的新自由主义派将成为市场经济的摧毁者。

（原文为英文，王怀成转译自德文，殷叙彝校）

## 斯大林主义之后

安德采伊·维尔布兰\*

本文论述的是“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尤其是波兰的社会主义的前途。单是“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就是模糊不清的，并且成了许多学术争论的一个诱因。这个概念是米哈依尔·苏斯洛夫在他与欧洲共产主义者进行争论的时候被采用为政治术语的。苏斯洛夫认为欧洲共产主义者的社会主义概念或他们所假设的社会主义模式是空想主义的，不现实的。因此就用这一概念来说明它们与现实的真实的社会主义的对立。这一概念虽不精确，却已为人们所接受，不仅在大众语言中，而且在科学语言中都被使用，尽管与苏斯洛夫赋予它的含义并不完全相同。

它被简单化用来描述那些选择了与苏联体制相近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国家集团。准确地说，这些国家的制度在一定时候实际上与苏联的制度是完全一致的，因为它们是在苏联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的指导下发展起来的。但是，今天这个集团的各个国家之间已经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尽管它们在根本的问题上总还是认为彼此相近。属于这一集团的主要有苏联、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和蒙古。与此相比，中国、朝鲜、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以及古巴，固然与上面提到的国家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却是在另一些条件下发展起来

---

\* 安德采伊·维尔布兰：原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委员、历史学教授。

的,而且具有另一些特点,因此人们甚至对于中国和苏联的发展过程中偶尔也有的令人吃惊的相同之处,也应当相当慎重对待。

“社会主义的未来”这个概念就更加不明确了。它是指社会主义的思想,是指致力于具体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运动,还是指社会主义的制度呢?社会主义甚至在工人运动的各种思潮中——更不用说在自称信奉社会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中——从来都是有各种各样的理解的。在这里研究通常很重要的社会主义的定义问题不可能也不需要。我认为,笔者自己的解释就足够了。我在说到未来的社会主义时,既不是将这一概念与共产主义的、也不是将它与社会主义的对一个新的制度的设想等同起来。我考虑的是各种各样的、所有的工人运动的思潮共同具有的想法和要求,即确信:出于社会公正的考虑,必须使劳动、而不是财产成为人们参与国民财产分配的基础。与此相适应,集体占有生产资料理应得到支持,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是每个人自由和发展的必要的前提;社会应为每个人提供同等的发展、工作、受教育以及参与集体生活和参与作出那些能产生公共效果的决定的机会。

我想首先以波兰的现实作为背景来阐述我的思想。但是不可避免地也要提到其它国家的,尤其是苏联的经验。苏联的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制度完全与中国和其它一些国家的制度一样,仅仅或主要是通过其内部的社会进程或在自己的社会力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不是舶来品,因此就其本质来说是原始的——更确切地说,在一定程度上是经典性的。

对于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否真的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我想给予肯定的回答。在这一问题上我同意亚当·沙夫的观点和论断。他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认为一个制度的本质是由它的所有制关系决定的(亚·沙夫,1983年)。这些国家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即消灭了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并用公有制(在这里的特殊情况下采用了国家所有制形式)取而代之,这就表明它们是社

会主义国家，至少从这个词的狭义来说是这样的。它们是社会主义的，不管它们的社会生活的其余组成部分在多大程度上偏离了社会主义思想。这就是社会主义——尽管是不完善的，丧失生气的，甚至令人厌恶的。

我们之所以不能否认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特征，还因为在这些国家中形成的经济关系，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还有社会和政治关系，它们的起源是马克思和 19 世纪欧洲社会主义者普遍宣传的思想。我们以后还要再一次谈到这种源流关系，但首先至少可以断定，在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形成的社会和经济关系，尤其是国家所有制对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的取代，肯定不是实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唯一可能的方式，更说不上是一种正确的实现方式。对这种起源的正统性人们可以争论，但不能否认它与马克思主义的血缘关系。

这一社会主义品种，或者用人们更加喜欢的说法，这种社会主义模式从一段时期以来一直处于危机状态。它在广大人民中间遇到了坚决的反抗，与此同时，统治的共产党也证明了自己完全没有能力对付这种局面和这些问题。苏联的改革和另一些国家的改革努力是一次克服危机，通过调整和开放来解决危机的尝试。在这里评价它们的前景还为时过早，尽管本文论述的结果也包含了一部分对这一国家集团中的社会主义前途这一问题的答案。在我们试图为这个问题提出一个假设之前，我们应首先观察一些历史问题，因为各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迄今的历史将从根本上决定它们的前途和划出为它们的前途进行搏斗的场地。在这里要突出地提出两个问题。在这些国家进行的是一种什么样的革命，哪些社会力量决定这一革命的形态，并保证它的胜利？——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这些国家在革命以后的发展会转变成经济上的停滞和政治上的专制主义？这个问题涉及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和本质。

## 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的本质

“社会的革命在现代世界史上是少见的,但却是重要的事件。从19世纪70年代的法国到20世纪中期的越南,这种革命完全改变了国家的构造、阶级结构和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革命使一些国家产生,这些国家的权力和自主性明显地超过了在革命前的情况,并且超过了在相似条件下生存的国家……在一些情况下,社会革命产生了强大的和具有世界规模的影响和吸引力的模式和思想——尤其在这样一些革命中,即发生这种变化的社会是地域辽阔的和在地缘政治上具有重要意义的、现实的或潜在的大国时,更是如此。”(Th. 施科斯波尔,1979年)

产生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就其本质来说是社会的和政治的革命,因为它们导致了国家构造和阶级构造的社会结构发生爆炸性的根本变化。从这一点来看,这些革命与仅仅改变国家结构的纯粹的政治革命不同,也与虽然有广大群众参加并且推翻了统治精英、但没有产生结构性变化的叛乱不同。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中,革命的胜利仅仅是或主要是由于革命得到了这些国家群众的支持。在欧洲,苏联和南斯拉夫的革命尤其如此。在欧洲以外,中国、古巴和越南的革命符合这一论断。在许多其它国家,其中也有波兰,以苏联的直接干涉和间接支持为形式的地缘政治因素起了重要的、甚至常常是决定性的作用。人们可以说它是一种革命的输出。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进行的变革缺乏本国的社会基础。历史上不乏“引进的”革命“站住了脚跟”、并且为自己创造了坚实基础的例子。拿破仑的军队从革命的法兰西带来的思想和制度被波兰的华沙公国和意大利北部地区接受,而在西班牙和德国却受到了抵制。

20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到目前为止主要是在经济不发达的、

有着强大的封建残余的农业结构的国家中获得胜利。这些国家社会结构的一个特征是农村人口大大过剩。对这个问题曾在波兰进行过详细的调查。波兰在本世纪 30 年代的农村过剩人口估计达 500 万至 800 万人,即占总人口的 14% 到 23%。农村人口过剩也是 20 世纪初沙皇俄国欧洲部分的一个明显特征,尽管这一点被广阔的公共土地占有(公社)所掩盖。经济历史学家估计,俄国有一半的农村人口不能依靠他们的田园维持生活。彼得·斯托雷平开始的、通过摧毁公社和移民西伯利亚来缓解这一局面的努力,也以失败告终(L. 巴兹洛夫,1972 年)。

农村人口过剩意味着很大的一部分的农民人口在那里没有土地、没有工作并且没有生存的机会。将大地产分配给农民的土地改革,只能缓解,但不能解决这一问题。例如在波兰的 1944—1945 年的土地改革中,分配的土地只能够满足所有小农业主和无地农民的一小部分,即使这些人当时至多也只能得到 5—6 公顷大小的、未经充分利用的贫瘠土地。由于农村人员过剩,那儿成千上万的人过着没有正常工作的赤贫的生活,他们没有任何资产,与所有的文化生活都无缘,过着一种半动物式的生活,对前途没有丝毫指望。

农村人口过剩在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中曾是一个普遍现象,为什么这一现象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欧洲某些国家中,以及在最近时期的一些第三世界的国家中表现得如此突出,对于这个问题需要作专门的分析研究。我在此不讨论这个问题,而只限于指出它们的严重的深远的后果。廉价的,没有受过教育的劳动力大量过剩,对于巩固农村落后的封建关系和拖延农村地区的现代化和工业的增长起了根本的作用。贫困和落后导致国家结构的虚弱,并且有助于保持在过时的政治结构。滋养俄国、中国和其它国家类似的革命的因素在于社会构造本身,大大地超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范围,尽管 19 世纪中期在主要的欧洲国家表现出来的

关于这一冲突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这种革命在政治上和道德上的指路明星,而且工人运动也为它们提供了组织、宣传工作和领导精英。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俄国许多潜在的能够导致革命胜利的因素汇合到一起了:军事上的失利导致国家的削弱和威信扫地;数百万贫苦的农民被征入伍并且武装起来;存在着一小股左翼的政治精英,他们来自知识分子和受到启蒙的工人,他们在道德上的动机在于反对人民遭受的不公正的那种人道主义和想使国家从衰落中振兴的爱国主义愿望。这些因素的融合给俄国的革命注入了巨大的力量。这些因素在以后的其它农业国家的社会革命中也表现出来。在阶级结构和社会及经济关系远为适合实施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设想的欧洲西部地区,要么根本就没有发生革命,要么革命没有达到必需的临界量,哪怕——象在1918年的德国——已经具备了許多成功的前提,例如国家的削弱和几百万绝望的士兵。迄今的经验似乎表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本身并不足以动员广大群众用足够的力量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尽管这种革命的思想体系认为革命的根源在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冲突。

### 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和本质

因此,落后的社会结构和低下的经济发展水平对于这里讨论的革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很长时间以来,亚当·沙夫一直强调这个因素。他不想说这一因素表明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只把它看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障碍(亚·沙夫,1982年)。尽管我赞同沙夫的这一观点,即在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落后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它们与马克思本意上的社会主义相对而言的“不成熟”,是产生不尽如人意的最终后果的主要原因。但是要说到这种落后状态对于革命本身的形态和它的结果的影响,我却有不同的



看法。落后状态和它的社会后续影响已被证明是强大的和提供动机的推动革命的力量。在不落后的国家中,要么根本就不发生革命,要么根本就没有成功的希望。而在落后的国家中爆发这样的革命却是根本上不可避免的,而且它的成功相对说来是简单的和有把握的。不幸的是,这些国家在发生这种革命之后朝着斯大林主义和其它主义形式的极权左倾专政方向发震,同样也被证明为是不可避免的。

斯大林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下定义——狭义的和广义的。直到不久前,共产党的作家还用这一概念去描述作为1930年到1953年之间的苏联特征的这种极端形式的专制和镇压式的统治权,这些形式是和斯大林个人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赫鲁晓夫所批判和谴责的,就是这个定义上的斯大林主义。今天人们主要使用的是斯大林主义的广泛的定义,它把斯大林主义称为政治领域里的极权专政,这种极权专政与全面服从国家的集中化的指令式经济完全地结合在一起。我认为,尽管第二个斯大林主义的定义很可能还不够完整,但是较为恰当,因此我在本文中从这里开始使用这个定义。

斯大林主义是由一个革命政党组织的、武装的暴动群众强制实行的专政发展到最后的产物。这个产物虽然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仍旧是一种变性的东西。人民的、革命性的专政朝着独裁的和专制的方向发展,这与其说是一种特殊的现象,不如说是一种具有代表性的现象,尤其是当革命就其本质来说主要是社会革命,并且把广大群众推到从前一直与他们无缘的政治生活的表层时更是如此。

革命和革命后制度的本质既不是由革命政党的意识形态的口号,更不是由通过其影响创造这些口号的科学理论来决定的。革命的本质是由确保革命胜利的社会群众,这些群众的真实的和想象中的利益,他们的真正的要求,以及——尤其是在开始阶段——他

们的乌托邦式的设想和幻想决定的。

俄国和中国的革命虽然发生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旗帜下,提出了促进无产阶级利益的要求,但实际上只不过是农民革命,或者确切地说,是农民的最贫困阶层的革命。这种革命的社会基础是那些在农业中看不到自己的前途、迁移到城市和工业中的、但对资本主义感到惊愕、并且对资本主义感到厌恶的农民。尤其是因为他们所知道的资本主义的唯一形态是原始的、掠夺性的、对待穷人和弱者毫无怜悯心的形态。

由于这样的革命的社会基础,农民的许多“永恒的”要求和古老的思想也就非常突出地进入政治生活的中心,并得到清楚的表述。最主要的要求就是被理解为分配方面的社会公正的平均主义,它和家长制思想结合起来反映出这样的信念,即占有和使用生产力不仅要承担供给人们吃穿的义务,而且也要求有管理劳动的权力。唯一的改变在于,这种义务和权力如今是转让给了新的、革命的“自己的”国家。国家在经济中拥有绝对权力并没有被看作是一件坏事。相反人们把它看成是必要的和合乎愿望的。这些逃离乡村的人感到“市场的看不见的手”是一种陌生的、威胁性的力量,它能够使富人得到特权地位,但却让穷人死亡,而且——更糟的是——使他们成为匿名的人。对此任何力量和祈祷都无济于事。

这种受人欢迎的、国家干涉主义的倾向和民众主义幻想实际上至少符合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念的两个思想。首先是期望用革命把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交给国家,其次是要求通过直接的物质形式的生产计划,采取不受市场控制的产品分配方式,取代作为异化源泉的市场和商品生产。在这里,最贫穷的工人阶层由于感到自己是弱者和受到市场竞争的威胁而产生的恐惧与欧洲左翼知识分子以道德上的考虑为基础的、对自发的市场经济机制的异化和分化作用的抗议交织在一起。左翼力量对市场的厌恶是多么根深蒂固,用奥斯卡·朗格的例子可以最好地加以说明。他是一位

著名的经济科学家，他对社会主义国家中实践的指令式经济模式产生的矛盾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但是朗格直到其生命的最后一息（他死于1965年）仍然抱有这样的愿望，即自发的市场机制能够被正确的计量经济学的核算方式所取代，而且认为这是社会所希望的，他把他的希望寄托在计算机上，并且在他毕生的最后一篇文章中，即用了“计算机与市场”这个意味深长的题目的文章中表达了他的这个愿望。

同时代的波兰社会学家诺瓦克指出了另外的一个促使革命后国家的结构朝专制极权的方向发展的因素。诺瓦克的表述是这样的：“革命意味着，群众从他们屈从于统治者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束缚表现为迫害，但也表现为社会日常生活在其中进行的环境：生产、组织、交往。革命的胜利导致社会的交往结构的逐渐瓦解……这里只有一个解决方法：重新树立权威。……”自由狂悖的护卫者逐渐失去了他们对于受惊的、厌倦混乱的群众的影响，而让位于虽不善于辞令但是更有效率的“干部”，对于这些“干部”，增加权力本身就是他们追求的目的。这些人之所以能取得了优势，是因为他们至少能够挽救表面的社会秩序。革命初期的“荒谬的无政府状态”越严重，革命结束时官僚的压迫就越深入。“一次胜利的革命首先导致无政府状态，接着便是极权主义。这不是出于某个人的凶恶的计划……，而是不由人自主的社会过程所产生的，我们参加了这个社会进程，但我们却无法控制它。”（L. 诺瓦克，1989年）

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看，斯大林主义是一个革命后的极权的专制主义、一个变质的革命专政。在这点上罗伯斯庇尔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之间没有根本的区别。依萨克·多伊奇就曾指出过这一点。当然在这种现象的规模大小、恐怖统治造成的牺牲者的人数、官僚化的程度以及外在后续影响的表现上都有着巨大的差别。斯大林统治了数十年，而罗伯斯庇尔还不到两年。正如罗伯斯庇尔主义由于其它的革命后专政——热月党专政和波拿巴主义——而受到限

制一样,温和型的斯大林主义官僚专政也取代了斯大林主义。然而制度的矛盾并没有因此而缓和,反而尖锐化了,并且加剧到危机的地步。

革命后的独裁政权不是由于理论上的疏忽大意或由于某一个恶魔式的人的脾气而发展起来的。它是由一些根本的原因和巨大的力量铸成的。它有许多来源:被压迫和剥削的群众的国家干涉主义的和民众主义的幻想,人们可以说,它是我们这个世纪的真正伟大的信仰;官僚化的年青的和新生的政治精英——他们简单而且粗暴,几乎无法消除而面临的各种严重问题,所以陷于独裁权力和专断的诱惑;而社会客观上所关注的要求也是要制止混乱和动荡,避免严重危机。上述情况距离集体迫害、压迫群众和极权的专制只差一小步。人们会说,这样一种专制主义的出现和鉴于这样一种社会环境而使它取得成功是极可能的,甚至简直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因为斯大林主义除了压迫和迫害,除了对领袖的神化和极端的教条主义以外,在长时间内还以一定的规模推动了社会的变革,而人们普遍地感到这些变革是进步的。这在开始阶段确保斯大林主义在本国赢得社会的支持,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在知识分子圈子里也获得了巨大的同情。

### 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总结

20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宣布了许多重大的目标:民族独立,通过工业化实现经济现代化,通过城市化和教育革命改变社会结构,用计划体制确保高度的生产率和经济效益,将人类从贫困中解放出来,以及按照“按劳分配”的规则实现社会公正。这些目标十分符合广大群众尤其是最贫穷的阶层和知识分子精英的意愿。由于革命的胜利,其中的一些目标很快就在广泛的基础上得到了实现。苏联和中国成了世界强国。从未发生过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也实现

了。最贫穷的社会阶层的命运通常由于从农村流向城市，由于在工厂或机关找到了有保障的工作，由于免费医疗和教育的普及而得到巨大的改善。工作的报酬是不高的，但工作有规律且有保障，而且可以在容忍低技能和低生产率的条件下进行。住房十分简陋，常常是好几家同住一个单元，然而房租是便宜的。医疗和教育部门的质量较差，但所有的人都可以免费享用。这种状况比人们所期望的和宣布要实现的要糟得多，如果和富裕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家能够做到的情况相比甚至更糟，但总是比以前的情况要好，而人们今天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大城市的郊区，仍旧可以在象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贫民区中发现这种情况。

正如在其它的目标上一样，上述方面的成功给人的印象也不很深刻和确定。由于补充投入许多劳动力和原料而在初期获得的高速经济增长，一段时间以后就由于个人低下的生产率和官僚主义的经济领导而开始回落。所谓“短缺经济”的强大的束缚和缺陷已看得十分清楚。社会公正主要是以相同的工资和和很大比例的实物分配以及免费享用各种待遇来实现的，并且和由管理部门作出决定给予的特权结合在一起，大大降低了传统的工作和提高技能的动机，却没有找到另一个取而代之的动机。平均主义和不考虑市场而付给劳动报酬的方式已被证明在一段时间内可以被最贫困的工人阶层所接受，因为这为他们提供了高度的社会保障，而熟练工人、知识分子和境况较好的农民的情况相对看来却恶化了，甚至有时是绝对恶化了，这些都会对生产起消极作用，并可能导致政治冲突的爆发。换句话说，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和社会成就与它的困难部分地是产生于同一种原因。广泛的经济基础首先能够促使工业很快膨胀，但是，一旦经济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制度就明显地表现出没有能力解决与效益、技术进步和均衡发展联系在一起的问题。从国际范围来看，革命前经济十分落后的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某一个时期——大致到

60年代中期——与情况相似但制度是资本主义的国家相比(例如俄国、波兰和保加利亚与土耳其或希腊相比),取得了相当大的经济增长和文明的进步。但从前已有高度发达的工业的国家如捷克和民主德国所取得的成就,与奥地利或联邦德国相比,却相差很大了。

革命在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中释放出来的经济增长的可能性,比人们在30年前所期望的小得多。当一部分可以追溯到第一次工业革命时的落后现象得到弥补之后,这些可能性就已经消耗殆尽。在新制度的曾经为这一制度赢得群众支持的社会成果与逐渐表面化的经济上的缺陷之间形成了巨大的,越来越深的矛盾,这个矛盾对于满足新的社会愿望是一个无法克服的障碍,甚至还威胁着这个领域内业已取得的成果。在这种情况下,从60年代初起社会的紧张关系也稳步地上升,并且已经达到了真正深刻危机的程度。

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和道德的状况看上去还要糟糕,而且简直是富有戏剧性的,对斯大林所干的大规模的恐怖行为、大屠杀和对许多国家进行侵略和征服的事实的揭露,在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尤其引起了巨大的震动。这种震动的机制应该着重加以说明。在一些国家,如波兰,斯大林主义是由外部强加进来的,因此这种震惊开始时是深刻和普遍的。但从长久看来它就不是那么强烈,而且只停留在表面上。道德上的愤慨不够深刻,而且主要局限于斯大林主义受到居民强大支持的那些地区的知识分子中间。在苏联,戈尔巴乔夫和一个极小的知识分子阶层对斯大林主义的巨大残余进行了背水一战。这些斯大林主义的残余不仅存在于少数领导者身上,而且也残留在广大群众的意识和行为中。

按照现代人类学揭示的规律,社会的良知很快就会忘掉由已被材料和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有力地证实了的极权主义迫害的集体性这一真相(A.季诺维也夫,1980年)。社会将罪责集中到某些个

人、组织或曾充当犯罪行为的跳板和“幌子”的那种思想本身上，以此摆脱集体罪责感。所以，非斯大林主义化引起的震动，不仅打击了丑恶的、变性的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形式，而且社会主义本身也成了它的牺牲品。所以提出以下这个问题是完全有道理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能否经受住这场震动，斯大林主义带来的打击是否是致命的？答案还不得而知。这只能由实践、生活自己来作出。

关于社会主义的未来这个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看法与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看法不同。在资本主义国家关于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和通向这一社会的道路的问题可以而且必须这样来考察，就象人们思考怎样在一座空白的地基上建一所房子一样。在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这个问题不是指资本主义社会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转变，而且指怎样能够找到一个替代办法，去取代这幅讽刺画，即已经名声扫地、但还不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在完全否定现在的基础上是不可能建设未来的。

### 社会主义在它的社会 经济基础上存在下去的机会

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社会主义，尽管它当然是一种已经变化的形式，仍有可能继续生存下去，而且很有可能。这首先要从按照马克思主义传统被界定为社会经济基础的领域来看，我们来逐个研究这个问题。

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经济运行得很差。多年来生产率和增长速度一直下降，比例失调不断扩大。通货膨胀加剧，同时市场上许多商品紧缺。与发达国家在技术上的差距日趋扩大。更糟糕的还是这种状况，即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被自给自足、小

生产、无足轻重的国际合作、鼠目寸光的政策和经济上的分离主义的毒瘤所吞蚀。低下的生产率和劳动质量与社会需求明显增长及无所不在的官僚主义联系在一起,更加剧了局势的紧张。根据新闻报导,著名的塞尔维亚作家多布里卡·科希奇不久前以辛辣的言辞抨击他的同胞说:“在这种制度下,我们所有民族的大多数的代表都过着一种比根据他们的工作、技能和诚实应该过上的生活好得多的生活……我们不可能再这样生存下去并仍旧保持我们目前这样的状况。”

这些现象的同时发生把波兰推到了一个持续的、非常深刻的危机之中,它的特点是生产和社会产品的不是相对的,而是真正绝对的下降。在苏联、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国民经济中也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信号。耐人寻味的是,如今在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进行的旨在减少官僚主义对国民经济的调节和适应市场调节的改革(这是科尔奈的说法),到目前为止只起到了暂时的缓解作用,有时连这点也达不到。

我认为我自己没有资格解释这种状态。从第一流专家们对这个问题发表的文章中似乎可以得出结论说,它的原因是结构性和体制性的。和我的观点一样,科尔奈令人不容置疑地证明了,任何一种受国家所有并由国家部门领导的公司控制的国民经济必然是一种“短缺经济”。它不受经济目的的支配,而是由官僚主义来协调,很容易采用对预算实行限制并将损失转嫁到社会头上等等手段。科尔奈在他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甚至怀疑,对于国家所有制中的各个经济单位是否能有效地实行市场机制的调节。人们不明白,这些单位是否真的能象私有企业那样对市场情况作出准确的反应,而且它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J. 科尔奈,1986年)我认为这个困境只能通过实践来解决。

从这些为数不多的零散的评论已可以看出,经济是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致命弱点。但同时这种经济又是社会主义的最持久



的、也许最难克服的组成部分。这听起来或许是自相矛盾的,但却符合事实的。生产性资产的绝大部分——在波兰占80%以上,在其它的社会主义国家占的比例还要大——作为集体财产掌握在公有成分的手中。今天它们大部份被掌握在国家手中,没有“留成的部分”。整个经济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一个单一的、集中管理的企业。它的最大的弱点的根源就在于此:垄断的结构、运转和信息方面脱离市场机制(市场也可充当特殊的信息来源,没有市场,评价某一经济行动的结果和合理性必然是纯粹的幻想)、官僚主义化等等(J. 施坦尼斯基斯,1988年)。将这一经济形式转变为混合的,包含多种部门的模式似乎存在着种种完全可以实现的、现实的前景,主要是通过促进地方的和外国私人企业的发展来实现。如果人们想到,在波兰的农业中,农民对土地的私人占有形式占主要地位,那么这种前景也就更加现实了。但是对农业之外大部分的甚至所有的大的国家资产,尤其是工业重新进行私有化是不可想象的,没有任何资本可以将它买下,这种转让在技术上也是不可行的,此外也只能引起公众的强大的抵制。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改革计划考虑过这种可能。

在此我想引述一位波兰当代经济专家的观点:

“如何评价将市场机制引进波兰的国民经济中去的这种尝试呢?我认为这种机制在国家所有制领域内决不会正确地起作用。它只能在私有制经济中和国家经济与私有部门的接触部分显示出积极的作用。从这里可以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政治上为将市场机制引进波兰的经济开绿灯,必须与经济的私有化进程同时进行。但是短期或中期内不可能对波兰的工业实行私有化。将工业中私人经济成分提高到30%至40%,这就可以使市场机制能够正常运行。然而这至少需要10至15年的时间。国内的资本相对地说很少,而且也不灵活;另一方面国外的资本多年来鉴于我们的经济状况,尤其是偿付能力,一直拒绝以值得一提的方式参与进来”(P. 包楚

克,1989年)。

在改革计划中也要考虑到将“没有留成部份”的集体财产转化为“有留成部份”的集体的、公共的财产,也就是城市的、合作形式的、或属于一个团体的财产(在最后一种情况中财产权力属于自治的职工)。这将意味着大大超出了至今遵循的想法,即限于给国家企业以部分的“自主权”,而与政府实际上是一码事的所谓“创业机构”则保留财产和其它与此联系在一起的权利。看起来,不拆散公有的生产性资产,就不可能实行非政治化,即把国家的政治领导与对经济和生产直接意义上的领导分开。但即使是在这个方向上走得最远的解决办法,也无法改变这样的事实,即公共的集体所有制在工业中仍占主导地位。

社会主义衰落的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和几乎不可逆转的原因在于整个社会问题领域。波兰的所有意见调查都清楚地表明,在从业者的绝大部分中,虽然不仅仅但主要是在工人中,有一种平均主义和民众主义的综合症。他们不信任私有化,反对社会中收入的差距增大,反对通过市场上各方面的力量自由发挥作用来调节价格,极力地维护有保障的就业制度,坚持执行对企业领导规定的劳动分工加以广泛限制的法律等等。在这个问题上广大群众是反对资本主义和拥护社会主义的,但同时也是反经济的。这种两难处境是导致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政策摇摆不定和在改革运动中出现裂缝的根本原因,此外从关于“波兰1984—1985年”的民意调查中40%—50%的城市居民反应出来的情绪和倾向来看,很大部分的群众在某些情况下会与新斯大林主义的官僚结成联盟。波兰社会经济关系的任何一种未来的模式——我认为这一点也适用于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照顾人民的这种优先考虑,因此必须保留社会主义的主要组成部分。

群众的、尤其是他们中贫困的和经济上较弱的这部分人的态度,不仅是一种成见和民众主义乌托邦的反映,而且也是他们对自

己真实利益的本能的感受。波兰是一个穷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估计为 3000 美元（一些经济学家估计得还要低——不超过 2500 美元），要低于美国的 5 到 6 倍，低于联邦德国 4 倍。在这样的一个国家中，如果“市场调节”和“纯经济”的解决方法占统治地位，那么社会差别就会不可避免地增大，随之就会有一大部分人陷于贫困。在这样的一个国家中，就会由于经济的原因而既谈不上免费的、普遍的、较高层次的学校教育，也谈不上今天标准上的免费的、普及的医疗服务。如果贫困占主要地位，人们就要以某种方式平均地“分摊”这种贫困。任何一个解决办法因此都必须是一种妥协。

在基础中的极其重要的社会主义成分的不可逆转的特点为政治生活中的社会主义力量和思潮提供了一个继续存在或甚至逐渐强大的机会。但它不可能是长期以来已被证明毫无用处的、不能发挥作用的和历史过时的形式。这是提出一个在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类型的政治替代方案问题。它不仅是政治制度模式的问题，而且也是社会主义运动的模式问题。

## 政治替代

政治生活中存在着许多替代极权专政的可能。这样的替代可以是另外一种样子的极权专政，或者是一个简单的“非极权”的专政，或者最终是一种多元化的政治民主，让我们来逐个考察每种可能。

斯大林主义之后的国家仍然是一个极权制的政权，这并不是像人们乍一看就以为的那样不可能的。当然这种极权主义会具有另外一种意识形态的特点——民族主义的或宗教的性质的。对于这种极权主义的唯一要求将会是，要得到群众持久的支持。这点相对来说是容易做到的，例如采取将民族主义与民众主义联系起来的方法。在这期间，由汉纳·阿伦特和卡尔·波普尔所做的第一流

的调查也表明,极权的专政需要整个的包括最底层人民的群众基础,它不需要阶级的支持,而是需要群众的支持,也就是那些宁可受支配,而不愿要自由的乌合之众的支持。如果用暴力使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现有的政治结构瓦解,那么在开始阶段可能会出现这样一种结构,它摆脱了旧的权威,却并不是以组织和行使另一种权威为目的而建立的。在这种情况下,当一个在推翻从前制度中立下了功劳的激进少数派许诺要向这个制度的代表人物进行报复并且提出民众主义要求时,就容易得到人们的支持。在伊朗,霍梅尼的信徒就是通过这条道路攫取政权的。某些迹象表明,在苏联的穆斯林地区正在形成类似的力量和思潮。

在波兰也有迹象表明正在出现激进的团体。他们声称要用革命方式推翻共产党的权威,但是坚持“在人民的监督之下”保留一种指令式经济,同时打着实行公正的再分配和平均主义的旗号行动。这些激进分子被上面提到的诺瓦克恰如其分地称作“反共产主义的布尔什维克”。这类思潮所依赖的社会基础是相当广泛的,而且正如我们所知,在所谓正在进行清除斯大林主义的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是一个事实,因此群众中的灰心和绝望情绪日益增长,而这种思潮所依赖的社会基础也会随之扩大。

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已经试验过用其它的非极权的或后极权主义的专政来取代斯大林主义。人们不仅应将苏联的勃列日涅夫体制,而且应将匈牙利卡达尔的统治,或者1956年后波兰的哥穆尔卡、盖莱克和雅鲁泽尔斯基的政府活动都列入这一类专政,尽管它们之间表现出明显的差别。一些政治学家称这种一党专政的形式为一元集中主义。

1955年后统治波兰的肯定不是极权主义。在这以前,极权主义也只是以一种极不明确的形式出现,我认为这主要是由于缺乏群众的支持。在1956年10月的转折点之后,出现了一种维持了许

多年的特殊的均势状态。社会容忍了波兰统一工人党的统治，虽然它并未对这个党表示认同。这个党进行了相当专横的统治，尽管它只使用了有限武力。除了在两个包括若干年的时间阶段（1968—1970年，1981—1985年）以外，实际上不存在政治犯，农村中主要是私有的农业经济，实用主义思想超过了政治意识形态。但是毕竟存在着—党统治的一元集中主义。这是一个继续声称拥有革命的、救世使命式的正统性的党。人们不要小看这种“非斯大林主义的”一元集中主义的后果。它一方面使—党垄断政治的统治相对来说顺利地存在下去。另一方面正是在这段时期内波兰和外界的许多学术、科学、文化和经济关系得以重建。政治很大程度地非意识形态化，在社会的哲学中多元主义活跃了起来，党内的改革思潮也公开表现出来（一种思潮被战胜，就出现新的），反对派的中心也形成了等等。类似的进程也在许多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出现，虽然规模比波兰的小。

所有的现象都表明，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中共产党的这种非斯大林主义的和不再是极权主义的过渡专政形式的时代已经结束。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排除其它形式的共产党的一元集中主义专政，尤其是军人专政。但1981—1983年在波兰实行战时法还不是一种军人专政的形式。战时法与其说是由军人、不如说是由警察来实施的，军队只是“保证”警察部队执行任务。国家政权几乎立即被党的部门及其机构接管。但是在将来，尤其是当社会生活中内部政策的争论有导致无政府主义现象和经济崩溃的危险时，不能排除出现一种波拿巴主义的可能，也就是说由军人解散所有的政党，真正接管政权。人们可以设想会出现被折腾得厌烦的社会同意支持这样一种政变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毫不迟疑地估计到，会出现愿意充分利用这种机会的野心勃勃的将军或他们的年轻部下，尤其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越来越频繁地借助军人的帮助扑灭社会动乱（波兰1981年，苏联多次，从1985年的阿拉木图到1989

年的费尔甘纳),对于军官来说,这必然会意味着诱惑他们有朝一日自己来关心社会的秩序。但是这种情况有可能发生在那些军队有着毫无限制的自主权的国家中,如在苏联,或者甚至还有南斯拉夫。在那些军队的自主权在几十年以来已经被取消的国家中,军队要想掌权得不到为此必须的社会认可。

这里提到的专政形式——我敢肯定并不止这几种可能——没有一种是合乎愿望的解决办法。任何一个专政,即使在它所使用的言辞和它的形象都表现为反对共产主义的,但归根到底都会是新斯大林主义的一种形式。在经济制度中它们必然要拥有广泛的发号施令的权力和分配的权限,而且注定要给民众主义因素留有余地。在最乐观的发展过程下,它可能是一种庇隆主义。它的不可避免的后果是无政府状态不断加剧和经济的崩溃,社会的分崩离析,新的危机和越来越严重的、令人绝望的权力斗争。社会主义的存在和振兴的希望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对斯大林主义的最值得向往的政治替代,而且实际上也是唯一能够提供一种克服危机和建立真正有承载能力的政治结构的机会的替代,是多元化的代议制民主。这种替代即使从社会主义前景的角度来看似乎也是最有利的。实行这种替代就会有最大的机会将经济的管理和公有经济成分这一方面与另一方面即国家行政合理地分开,并且给经济以真正的自主权。这样就有可能减轻官僚主义和民众主义的压力,换句话说,这样就能够消除目前妨碍或甚至完全阻碍给经济的公有成分注入活力的尝试的那些因素。

多元化的民主也可为社会主义运动和左翼政治团体本身的恢复青春提供最好的条件。即使社会的大多数人在受到后斯大林主义震惊之后起初会支持右翼团体,并且把权力交给它们,但是在民主的竞争过程中,扭转这种趋势和政治力量对比也有着最好的前景。多元的民主替代可能在实践中也是最容易做到的。可惜这些只是看起来如此而已。人们也可以设想下面这种通过自上面下的

改革实现从专制向民主过渡的发展过程：恢复开始建立政党的自由，并且在尽可能短的时间之内实行选举，在选举后由议会中占多数的党组成政府。在近期的历史上也有通过这种方法从专政过渡到民主的例子。为什么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者，即使是像戈尔巴乔夫这样激进的人，似乎也不愿意走这条路呢？只有匈牙利共产党具有改革思想的领导人极其谨慎地朝着这个方向移动。是什么东西阻碍了其它人这样做呢？

我认为人们大大低估了长期的专制统治对领导精英和整个社会的政治文化的影响。专政实际上是一种容易的统治方式，尽管不是一种很有效的形式。因此，独裁的、自我任命的和专制统治的出现在人类 4000 年的历史中与其说是例外，不如说是规律。事实已经表明，社会必须经过漫长的发展进程才能成熟到可以实行民主的程度。当前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对民主的认识与多元主义几乎不相干。在这些国家中最为流行的是老一套的公民投票表决民主，会议民主，在其中根据占多数的人的意见作出决定，但同时也就以多数压倒了具有不同思想的人，迫使他们沉默。

许多国家和各种制度中的专制统治者也很愿意用民主的外在标志来装扮自己，例如在选举中他们也会提出两个有完全相同的政治观点的人，也进行人民表决等等。民主的外在标志已深深地铭刻在大众的意识中，并且有时也和多元化的民主进行着有效的竞争。统治精英和广大群众都试图使这个空洞的外壳具有实质性内容。这些努力的效果是无政府主义的混乱，而不是民主化。或许这是进步的政治突破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副作用，是任何一个过渡阶段都具有的特征。然而它也使形势复杂化，并且提高了对前途的没有把握的程度。

如果以平分秋色的形式来调节，就会使双方都不断地受到在某种伪装之下建立一元集中主义体制的诱惑。非常困难的和绝望的经济形势能为此提供无数的机会，这将会是充满对立、流血和新

的专政的、消极的和恶劣的发展过程。但是双方也都存在致力于多元化代议制民主的力量。如果他们能够成功地通过一个新的法律，允许在下一轮地方选举之前建立政党，如果这种选举是按比例选举权而不是按照多数选举权进行的话，那么他们就能够开始在波兰建立多元化政治制度了。这会是积极的和乐观的发展过程，它让人们对未来的发展抱有希望。

无论在为争取这种前景而斗争的时候，还是在这种前景已经存在的时候，让一个左翼社会主义政党作为斯大林主义或新斯大林主义类型的党的替代出现，都具有巨大的意义。实际上在波兰应该首先形成这样的替代组织。

经过改革的或“恢复了青春活力”的共产党，即波兰统一工人党能够提供这样的替代吗？在1988年秋完成了从专制向民主的重大政治转变的党的领导目前宣称，党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必须从斯大林主义的遗产中解放出来。或许这个党能够成为波兰政治生活中社会主义思想的真正代表。我也希望会这样。我从1948年以来就一直是这个党的党员，当了33年的中央委员和6年的书记处书记。但从科学的角度理智地分析这个形势，我必须表达我的怀疑，即是否可以把这种期望称现实的？而且这种怀疑是有好几个理由的。

首先，波兰统一工人党几乎不能摆脱它的过去。这不仅仅和不完全是过去负有责任的问题，而且是由于波兰统一工人党几十年来一直是统治的、垄断政治的党。它的整个风格和它的工作方式已经适应了这种角色。作为党的精英分子的领导人努力想改掉自己的专制思想、唯意志论和想当然的思想习惯。在他们对民主的认识中，表面的装饰超过实际内涵的情况实在太多了。在多元化民主的新的条件下，一个左翼政党必须把自己纳入民主的机制，必须准备接受有时处于反对党地位、有时属于执政多数派这种交替发生的情况，还必须抛弃自己作为领导党的习惯态度。这是一个非常困



难的转变过程,这在一个与原来同一的组织中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

此外,在斯大林主义处于崩溃国家中的当代社会主义政党需要在理论上摆脱过去。人们几乎不能想象这个党能够不依靠过去的社会主义的好的和坏的经验,即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流派的成绩。但是它毕竟不能作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或其它什么主义的(按这个词从前的意义)而继续存在。从前的书本已再不能为处理现在的问题提供公式。没有人能够事先就预见到今天的发展。世界的发展离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已经很远。人们已经取得了关于人类和新的知识。这些知识是在科学机构中,远离政治而获得的。在 20 世纪下半叶,科学大大非政治化了。只有在这样一个宽广的、能够不受任何限制而加以利用的基础上,不受任何阻碍地对事实进行分析,才能够形成对社会主义的社会理想和道德理想有用的思想。

今天波兰统一工人党已不再是一个思想统一的党。多年来党内不断地发生冲突、对抗和出现各种各样的思想流派。它们的差别比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差别要明显得多。人们可以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内毫不费力地区分出许多明显的流派:独裁的民众主义派、自由主义改革派、保守的官僚主义派、企业管理派。如果每一派都各自独立存在,并且以广大群众能明显分辨出来的形式争取选票,那么有三个派加在一起就能够比现在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动员更大一批追随者。对于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大多数共产党也可以这样说。这些党的政策是各种各样压力、妥协和半心半意的措施的合力,而明显的意见不一致、经常性的错误、迟到的反应等等都是由此产生的。

此外在波兰还有很大一部分,很有价值的左翼力量目前处于波兰统一工人党之外。从 50 年代中期以来,各种各样的反对派集团退出或者被开除出波兰统一工人党。它们大多数是反斯大林主

义的叛教者,尽管也有一些是极端斯大林主义派别,如60年代在卡斯米埃茨·米恰尔领导下的波兰共产党。波兰统一工人党的一部分“跳槽者”对于社会主义已完全不抱任何幻想,并且背弃了社会主义,有一些人从波兰出走,然而大部分人仍然坚信民主社会主义的理想和左翼的传统。团结工会的没有宗教色彩的左翼有很大一部分人是由主要在60年代后期从波兰统一工人党“外流”的人组成的。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最近一次大规模的退党浪潮是在1980到1981年以所谓的“横向结构运动”的形式发生的。它是指许多大学和工业企业中的党的组织之间缔结的、旨在实行党的非斯大林主义化和消除党的机构权力过大的一个协议。在这场运动中,许多优秀的青年人以极大的意识形态热情聚集到一起。“横向协议”主要是在1981年第九次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大会的代表竞选中遭到失败的。他们在一些城市的组织中取得了胜利,但是在地区一级的大会上却被提出民众主义口号的、来自小城市和乡区城市的官僚主义分子以多数压倒了。这一官僚主义的胜利在党内形成了实行战时法的社会支柱。战时法实施以后,横向结构的大多数积极分子采取不同的方式脱离了这个党。看起来这些人重新回到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怀抱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没有这些人,社会主义运动要想在波兰再生是不可能的。只有这些积极分子才能够将已经断了的与青年人的对话线路重新联接起来。

最后,我不认为,当前在波兰和类似的国家中,单独一个党可以提出有生命力的代替社会主义的政治方案。认为单独一个党就可以代表社会主义的努力和工人阶级的利益,这已是一种过时的思想。这种思想产生于第一和第二国际的日子里,那时社会主义是一种群众的宗教,社会主义运动是一种介于宗教团体和政党之间的东西。第三国际尽管本身是从社会主义政党的分裂中产生的,但它却使运动的这种准宗教式的特征更加明显。在一定的時候,这对于组织党的基层和贯彻纪律,对于争取群众的支持是有很大帮助

的。但长此下去工人运动就因此迷失方向和脱离现实，而且落入彻头彻尾官僚主义的红色圣杯守护者之手。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一致表明，存在几个社会主义政党是有益的，它们反映劳动人民的意见、利益的真正的差异以及社会主义政策中可供选择方案的多样性。只有通过这些方案的多元主义的竞争，才能够找到最佳的政策，才能够纠正偏差和错误。

关于一般的展望就说到这里。这些怎样才能付诸实践呢？用摧毁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办法似乎是最顺理成章的了，但这在目前根本就不现实。单是下面这个原因就说明了这一点：波兰统一工人党作为圆桌会议协定的签约人之一，在今后若干年中应是维持国家中动荡的政治均势的支柱之一。由此可见，在波兰，必须既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内，也在党外实行社会主义的替代。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只能以一种方式为社会主义作出真正的贡献；他们必须放弃他们全部的、实际上是斯大林主义的仇视派别的空话以及与此相应的约束行为，重新回到社会主义运动的传统的民主模式，必须把党的出版机构和物质手段供党内事实存在的各种流派使用，其中也包括那些对现行路线和当前领导持反对立场的派别。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党的最高领导团体的成员应按比例选举产生。这样，不仅是民主、而且在一段时期内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团结也就有了保证。从长期来看，应当估计到在波兰会出现一些不同的、体现今天的社会主义的不同思潮的党。我相信，从总体来看，这些党会有赢得大多数波兰人民支持的机会。有许多巨大的客观因素是对它们有利的，尤其是不同形式的公共所有制在经济中占较高的比例，扎根很深的平均主义和社会公正的伦理观念，还有沙夫在他的《道路通向哪里》一书（1985年）中所描写的世界性的发展趋势。

我们就写到这里。在社会主义的传统中和在第一到第三国际的传统中，社会主义被视为一种用来改变现实的“伟大草图”。人们用这一草图调动了信仰和献身精神，但在实践中它也带有乌托邦

和专政的萌芽。多元化的民主制排除了去实现“伟大草图”的可能，因为多元化的民主制不能为任何政治力量以不受限制的权力进行长时间的统治提供足够的保证。但是它为社会主义政策以及按这种政策精神的实用主义方法塑造和协调公共机构提供美好的前景。这里说的不是像从前工人歌曲中宣告的那种“最后一战”、“决定性的胜利”的前景，而很可能是未来社会主义的唯一的、美好的和人道的前景。

### 参考文献：

- 亚当·阿斯尼克，《诗集》，1974年PIW版，第383页。
- 路德维克·巴茨洛夫，《沙皇俄国的最后年代。斯托雷平统治时期》，1972年华沙波兰文版。
- 巴维尔·包楚克，《市场偶像》，载于《政治杂志》，1980年第25期。
- W.布魯斯，《向社会主义的进军——期望和现实》，1988年手稿。
- 勒内·吉拉蒂，《替罪羊》，1982年法文版。
- 雅诺什·科尔奈，《短缺经济学》，1986年阿姆斯特丹英文版。
- 同上，《匈牙利的改革进程。幻想，希望和现实》，载于《经济文献杂志》第24卷（1985年）第4期。
- 拉泽克·诺瓦克，《一场被战胜的革命的力量》，载于《政治》杂志1989年第9期。
- 亚当·沙夫，《处于十字路口的共产主义运动》，1962年维也纳德文版。
- 同上，《社会主义国家是社会主义的吗？》，载于《欧洲评论》1983年第3期第13—16页。
- 同上，《道路通向何处？》，1985年维也纳德文版。
- 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关于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载于《文化》杂志1980年第1—2期。
- Ta. 德科斯特尔，《国家和社会革命》，1979年剑桥大学出版社英文版。
- J. 卢坦尼斯基斯，《一个形态断裂的动力机制》，1988年在华沙举行的关于波兰历史和未来的国际学术会议上的演讲。

（原文为英文，王怀成转译自德文，殷叙彝校）

---

## 《新社会/法兰克福杂志》特刊

### 《未来的社会主义》 第2期(1991年)社论

彼得·格罗茨

本刊是以“未来的社会主义”为论题而出版的第二期特刊。我们提醒大家，这项活动是由阿丰索·盖拉和奥斯卡·拉封丹倡导的，刊物以多种欧洲语言出版发行，西班牙社会党人承担了实际编辑工作，他们希望通过这项工作创办一种今后继续发行的欧洲性刊物。《新社会/法兰克福杂志》为这项计划的开端，为第1、2期刊物提供了论坛。我们经过编辑加工，提供了这些使德国人感兴趣的文章，以便使人们了解在欧洲有一个围绕社会主义问题进行争论的环境。不言而喻，我们的刊物并不因此对所有发表的文章都表示赞同。我们是欧洲多元化左翼力量的组成部分。保罗·尼采主张把“多样化”当作新型国际政治的一个关键概念，同样，我们也有类似的想法：东欧的社会—自由派政党——例如，匈牙利的自由民主联盟或雷彻斯基和J. 斯特比尔领导的捷克公民论坛左翼——与南欧的“增长社会主义”或奥地利、瑞典以及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最近主张的、以保护生态为特征的社会福利国家政策——都属于这支左翼力量。

同时，本期刊物再次表明：民主派左翼根本没有必要发誓放弃

自己的信仰。现实社会主义的崩溃决不是对里根、撒切尔或科尔的政策的确证。早在本世纪初，“修正主义”的左翼就已经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许多部分决裂了。在中欧和东欧，“社会主义”一词——在被共产主义滥用了几十年之后——很可能将在很长时间内很难加以解释。于是这个或那个政党必须改变其“法人身份”。奥凯托的意大利共产党刚刚忍痛做到了这一点。然而，抛弃自己的历史永远不会受到奖励。卡尔·马克思是摧毁虚幻偶像的伟大人物，他同查理·达尔文、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恩斯特·马赫或马克斯·韦伯一样，几乎不可能被从欧洲思想史上一笔勾销。

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人们将必须与列宁决裂，尽管欧洲的改良主义早已明确地摒弃了列宁所主张的“战争式的方法”。请想一想卡尔·考茨基或安东尼奥·葛兰西吧：但是，一些理论家仍然对这个有天才而又残酷的职业革命家依依不舍，就象猫儿总围着热粥转圈那样。关于列宁英明而斯大林罪大恶极的传说终究要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出于政治权力的考虑，戈尔巴乔夫尽管不得不坚持有关列宁的神话，然而对欧洲左翼来说，这绝不能成为哪怕只是容忍这个问题上的虚伪态度的理由。谨向所有犹疑不决者迫切推荐阿尔弗雷德·德布林的四卷本著作《1918年11月》。德布林在30年代末就已知道的事情——1938至1943年，他在法国和美国流亡期间写成他的小说——今天每个人都必须了解并说出来。民主社会主义不应允许失败主义，但也不允许不弄清事实。

本刊指导委员会由下述人员组成：阿丰索·盖拉，亚当·沙夫，奥斯卡·拉封丹，霍塞·费利克斯·特扎诺什，米歇尔·罗尔，海因茨·费舍，豪尔赫·森普鲁姆，克劳迪奥·马尔泰利，焦尔焦·纳波利塔诺，皮埃尔·圭多尼，拉尔夫·米利班德，卢恰诺·佩利卡尼，斯图亚特·霍兰德，若昂·克拉维纽斯。

本刊编辑部顾问委员会成员包括：曼努埃尔·阿斯卡雷塔，诺

贝尔多·博维奥, 汤姆·博托莫尔, 让·皮埃尔·科特, 雷吉斯·德布雷, 埃利亚斯·迪亚斯, 奥利维尔·迪阿梅尔, 让·埃伦斯坦, 艾哈德·埃普勒, 劳伦特·法比乌斯, 彼得·格罗茨, 乌尔夫·海默尔施特兰德, 皮埃尔·若克斯, K. S. 卡罗尔, 瓦尔特·柯皮, 鲍里斯·科瓦利, 欧内斯特·芒德尔, 兹德涅克·姆利纳日, 格雷戈里奥·佩塞—巴尔巴, 吉里·佩利康, 伊姆雷·波日高依, 阿道弗·桑切斯·巴斯克斯, 皮埃尔·肖利, 奥塔·希克, 乔尔弟·索莱·图拉, 戈兰·特尔波恩, 阿兰·图雷纳, 普雷德腊格·弗兰尼茨基。

(原文为德文, 陈育国译, 殷叙彝校)

---

## 当今的社会主义行动

米歇尔·罗卡尔\*

谁站在左边？哪里是左边？何谓左翼？何谓左翼政府和左翼政策？

如果这些问题没有解决，而且有时通过质疑或简直是批判的方式被提出，那么，其原因在于，简单的论据已经不复存在了。

我没有考虑传统的标准，如生产资料和交换资料的集体占有或无产阶级专政。但这些概念曾经在工人运动中创造了一种政治的和工会的文化，即使社会变革已经走上了其它的道路，今天的工人运动也仍然感到丧失了这些明晰的幻觉。一个左翼政府的观点已不再能具有一目了然的清晰性，这种特征本来能够使政府不必去做解释的。因此，今天的社会党人必须为了自己，并如我要说的那样，为了全世界的进步力量作一次清点。我们必须明了下面这点：我们的斗争只能是世界范围的。而且，我们今天在我们各自政党内部所做的事情，我们本应该在我们社会党国际的范围内也共同去做。

### 权力的教训

在新条件下，我们的确需要总结这方面的教训，因为我们已在许多国家执掌了政权，同时没有什么迹象表明，我们将不会长期处

---

\* 米歇尔·罗卡尔：法国社会党领导人之一、前法国总理。



于执政地位……。

这一事实不可能不造成影响。然而它不应该成为阻止思想自由的一个障碍。因为,尽管我们的价值观始终存在,但关键在于从根本上仔细思考我们的行为体系。我们必须认识到,传统社会主义教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致命弱点恰恰与权力问题、解决日常生活问题以及金钱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的问题密切相关。

我认为,根据我们过去和现在的实践,现在我们能够对这里加以概括的一系列教训取得一致意见。我们已经成功地按照理性而采取行动,并且最终祛除了对左翼的诅咒——因为我们已经证明左翼完全有能力执掌政权。但是,在把日常生活与想象结合起来这方面,我们的努力仍然不够。因此,仅仅把活动增加许多倍,并没有什么意义,关键在于作出一系列有关基本原则的决策并付诸实践。

然而,我们必须谨防两种幻想。一种幻想是:可以在单个国家做到所有事情;另一种幻想是:仅仅依靠多数就可以采取行动。我们现在所面临或未来将要面临的任何重大问题,离开欧洲整体环境,都不可能得到实际解决。而且,任何重大改革如不考虑到少数人的观点,都不可能持久。我将这两种看法作为清点的方法,它们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它们迫使我们必须明确地规定在我们的社会进行民主变革的方法和道路,这就是说,使妥协这一概念充分发挥作用。

在这方面,主要困难在于,创造长期和睦的社会关系面临着很多障碍。

由此可见,在今日社会,我们的政府必须努力争取得到公众的支持——必须克服在这一过程中遇到的所有困难。要想使关于政府、政党、工会以及联合会的作用的考虑真正达到目标,那么关注这一点至关重要。

## “现代化”

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如果建立在一种坚实的行动方案的基础上,那么它就更加有希望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开辟新的前景。在开放世界和商品经济中生活,迫使我们必须懂得并注意两种准则。我说的是“注意”而不是“尊重”,其原因在于并非所有准则都是值得尊重的。

我们当然知道它们的不公正与残忍,但是,人们也必须懂得它们的效用。共产主义是实实在在地“从内部爆破了”,因为它不承认这种效用。对市场经济,我们既不能盲目地、也不能听天由命地拥护它。我们必须直接实行市场经济,以便能够从中获取尽可能大的益处,在此过程中,我们必须头脑清醒,以便至少能够控制它的那些应当加以削弱或消除的弊端。但是,由此产生的复杂性使人们看不到关键所在,而且有时使本来面貌消失。

历史的进程已经使我们放弃了从管理技术的角度思考社会公正的方式,而转变到温和的资本主义。后者给社会主义传统带来的理论问题当然超过了给自由主义传统带来的理论问题。这种温和资本主义既不是一种愿望,也不是一种决定,它是一个事实。在此必须强调,资本主义只是由于工人的长期斗争和代价高昂的胜利才变得较为温和。

## 集体意志

起初,社会主义是一种要求多一些公正的道义上的呼吁,第一批社会主义者经常在理想主义的指导下借助工人联合会、互助基金会以及合作社,主要在生产系统之外去推进社会变革。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基于下述设想:只要废除了生产资料和交换资料的私有制,所有一切都会顺利发展。马克思、拉萨尔、列宁、茹尔·盖德等人的追随者们把这种设想推到了更为极端的地步。因此,马克思主

义的分析最终导致了这样一种信念：一个中央集权的行政领导能够代替分散的经济力量。这种设想的历史性失败是显而易见的。自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以来，社会党人选择了另一条道路，混合型社会概念代表着这条道路。我们虽然不打算清理全部纷繁复杂的历史，但还是必须深入探讨这一历史的很多内容。我不相信没有历史的政党，而且在我们的计划中历史绝不能付之阙如！

正如我们已在历次党代表大会上强调的，我们的价值观肯定毫无问题。但是，由于要适应日常生活中的复杂情况，因而它们有时难以被人们觉察出来。

然而，有一个所有其它东西都以之为基础的、不可动摇的核心原理，它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动，以及我的政府的前途赖以存在的基础。这个原理就是：我们社会党人相信集体意志的可能性和优越性，而自由主义哪怕是它的温和的形式，仍在很大程度上从原则上强调个人的行动，它认为个人纯粹是经济活动者，并且否认个人能够有意识地掌握他们集体的命运。

我们对个人主义没有反感，但我们拒绝将人类仅仅视为单个人的一种集合。而且，与自由主义者相反，我们不相信这种个人集合的自然运行足以创造和谐的秩序。恰恰相反，放弃调节总是导致不平等的加剧，总是导致所有社会合作的丧失。只有集体意志才拥有足够的智慧和力量，把实现所有人的利益置于任何个别的人的利己主义之上。

对于那些由于世界的无组织性而造成的荒谬场景，我日复一日地感到愤怒。贫困、不发达、以及我们的环境都是问题。但也可以看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行方案。这些方案从理论上是可以设想的，而且会给所有人带来利益。但是，由于没有（或者说缺少）一种集体意志——这种意志本来会是很强大的，足以克服复杂的情况——上述解决方案没有取得成功。

当然，促使这种意志在国内形成并克服各种障碍，是国家以及

在行政和立法机构中领导国家的人的职责,在国际领域,必须有一个真正的国际机构去从事这项工作。

我想指出,根据法国倡议、由 24 国签署的海牙呼吁书第一次提出了建立一个保护大气层的世界性权威机构。筹备工作正在进行。从法律角度看,这种机构的创建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我们已经从环境问题开始。但是,还有其它数不胜数的、涉及共同利益的问题:利息、债务以及其它许多问题。

### 今日的政治行动

当问题涉及发展集体意志并促使其转化为现实时,政党当然发挥着一种基本作用。遗憾的是,我仍然听到有人重弹政党已经过时的陈词滥调。现在没有取代政党的其它形式。但是,政党、议会及政府不可能仅仅由于它们拥有法律赋予的权力而无所不能。这一点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对共产主义传统的继承者来说也是如此。我们必须找到一种共同的解释。

首先,象我们这样的现代民主制中的人民代表没有任何法律根据、没有任何理由去要求不同于公民所要求的东西。法律根据是有关民主的问题,理由是有关思想敏锐性的问题。我们必须与具有集体智慧的公民们打交道。个人动机的非理性方面——这一方面通过政治讨论已被揭示出来——到底具有什么意义?民主炼金术所创造的奇证实了我——很可能与在我之前的许多人一样——曾在某一时候写下的这一观点:任何个人都不可能比其它所有人更有智慧。关键在于人民,而人民完全能够告诉我们,怎样在他们所想要的、他们所能容忍的、他们所反对的或他们在一定情况下漠不关心的事物之间作出区别。

在法国,在废除死刑和私立学校问题上出现的意见接近现象为上述观点提供了典型例证。民意测验表明,法国人对这两个问题

均持批判态度。然而，尽管他们完全反对废除死刑，但他们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他们没有接受这一决定，但容忍了它。相反，当问题涉及反对他们感到是对私立学校或不如说是对基本自由权利构成威胁的决定时，他们变得非常积极（而且取得了成功），而当时的政府提案却让人们期待着深刻的变革。

此外，我们还认为，欧洲各国人民有文化，有教养，而且参与政治。他们很少而且从未长期受到蒙骗。他们知道如何揭穿谎言和表面现象，如何看破藏而不露的动机，如何超越传播媒介的影响来评判人物。让·饶勒斯曾说过：“普选权就是光，它迫使各种力量公开表态，迫使每个人坦露内心。这样，阴谋诡计只可能得逞于一时。”

目前，在人们都围绕着人民与其代表相分离的问题进行辩论的时刻，我对事情的分析完全不同。选民们事实上并没有指责政治家们的实际所是，而主要指责政治家们自认为的所是：真理的拥有者。但他们并不占有真理。无论左翼还是右翼的政治家都没有完全摆脱这种观念，而列宁主义把这种观念推到了一个极端的、戏剧性的程度。根据这一观念，政治家们永远认为自己是有觉悟和有组织的人民群众先锋队，同时他们也按照这种观念从事活动，因为他们比人民更清楚地了解人民的利益何在，从而有能力承担进行变革的责任并且无愧于这一荣誉，而人民大众则由于缺少洞察力而不可能自发地要求这些变革。

## 改 革

我肯定有所夸张。然而，已经经常出现过那样的情况，即把决策形容为勇敢的，其原因仅仅在于这些决策有悖于众多人的意愿。在人们已经能够适应某些事情的情况下，再做这些事情就根本不需要什么勇气。因此，我们必须明了在民主方面或不如说在民主的

时代所发生的变化。

基于两种信念——人民比任何个人都更有智慧；人民知道他们想要什么，尤其知道他们不想要什么，我推论出两个观点（我在执政时时刻铭记这两个观点）：不易于实行的措施并不一定是不受群众欢迎的措施，而不受群众欢迎的措施则必定的是拙劣的措施，其原因或是在于这些措施本身，或是在于它们的益处没有能够体现出来。为了阐明观点并使人信服，每个政党都必须利用公众意见中的主要思潮。

不易于实行的措施和不受群众欢迎的措施，两者不能等量齐观。在要求公民们做某些事情时，如果他们看到了这些事情的必要性及合理性，他们总是表示赞同。他们像成年人那样，尽管不情愿让自己挨上一针，但仍然会为此而感谢医生，而不是像儿童那样，不仅讨厌针头而且讨厌拿针头的人。由此可见，如果希望我们要实行的变革能够持之以恒并卓有成效，那么，我们必须以国家所能承受的速度——既不过慢也不过快——来推进这些变革。

这不应该意味着政党必须尾随公众，相反，政党必须走在公众前面，必须启发公众并向他们提供思想和建议。而且，这也不应该意味着不实行任何改革，而只意味着改革将不会误入歧途和半途而废。

长期以来，我始终重视一条原理，这条原理在我任期内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证实。要想判定一个改革之为改革，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改革必须在法律的轨道上并且超越冲突面完成。如果缺少其中一个条件，就谈不上什么改革。如果同时具备两个条件，改革就被认为是改革。那时，一旦第一个变革出现，它实行的是否糟糕，是否只停留在表面或最终归于失败，就并不重要了。

让我们以法国为例。我们认为，第五共和国初期以来通过的法令，其中几乎有一半至今尚未在多大程度上实行！如果看一看那些粗制滥造、无法实行的法律，那些精心制订，但迟迟不具备实施条

件的法律,以及那些又被下一届政府的多数所废除的法律,那么,有一条统计规律是显而易见的:实际被接受而且改变社会现实的法律大部分是由大多数人通过的法律。但这些法律并不因此就是没有争议的:废除死刑得到了广泛赞同,但如果不是我们这个多数派,其它任何一个多数派在这一问题上都不会取得成功。

政府的所有组成人员都有这种经验:他们推行的改革,其意义起初只能由专家们来判断。然而,实际起作用的是,他们实行了这些改革并取得了成就。我宁愿人们根据一种改革的实际效果而不是根据对它的大肆宣传来接受它。当然,任何事情都有其反面。这种相对而必要的谨慎态度可以给人们造成某种停滞不前或过分谨小慎微的印象。这又是一个需要解释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何发生的原因。在激烈争论的时候,人们都关注戏剧性的场面。这种场面的实质性内容可能不多,但至少产生了轰动效应。只是演员最后必须轮流为此付出代价。

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新纪元。正如英国的一位法国问题评论家西奥多·塞尔丁所指出的,“法国也发现沉闷状况会伴随审慎而来。”尽管审慎态度将持续下去——正如我希望的那样,但我完全相信,沉闷只是一种很快就会消失的现象。它只是向新习惯发展的一种过渡状况,而且如果我们做了必要的工作,它也可以向着加强公民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的方向发展。

### 一个民主的新时代

在我们欧洲国家,工人运动创造了一种特有的民主形式,我们继承了下述现实:在这种现实中,主要是阶级冲突造成了政治分野,政党或多或少能够允许自己的周围存在这样的生活状况,使它们与选民的关系表现为一种文化共同体,而且非常稳定。这种民主的时代使得人们能够把社会问题提到政治生活的中心,从而使国

家成为反映社会现实的机构。

然而,目前我们的民主愈来愈成为这样一种制度:人民生存在这种制度下并且完全由他们承担了表达民主的责任。社会冲突不再是划分政治分野的唯一决定性因素。引起冲突的因素变得更加多样化。大众媒介毋庸置疑地行使着统一化功能。意见的形成不再局限在与世隔绝的小圈子内。选民组合不断变化成为必然结果。所有这一切都没有使政党的作用成为多余。我们必须理解这种新形势。因此,我们不要悲悲切切,更不必歔歔不已。如果仔细观察,可看到新的分野目前正在政党、选民、公众以及工会中间形成;这种分野为本来意义上的政治家提供了一种提出新倡议和采取新行动的机会。社会结构不再仅仅通过政治斗争反映出来。我们的责任在于,利用某一特定格局下有重要意义的分裂,以发展一个政治多数派。我们的职责在于,使一种公众的讨论形式生机勃勃地发展起来。

公众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的职责在于,正确对待公众,而主要是创造多种条件,以使我们的工作更加接近基层大众。彼埃尔·莫鲁瓦经常指出,法国社会党必须从一个拥有近 20 万人的干部党发展成为一个至少拥有 40 万党员的政党。要达到这一目标,关键恰恰在于接近基层大众,从而开拓使我们能够更加密切地与人民联系的道路。我在这里要毫不踌躇地提到社会的共同生活。承认现代化大众媒介的作用并不意味着放弃基层群众工作!但是,今天开展群众工作的方式已不能再象以往缺少信息的时候的那个样子了。

### 我们的敌对者与我们

首先,我们必定已经识别我们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敌对者。有两个敌对者可以明显看出: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前者拒绝集体意志,后者使集体意志转变成对其它集体意志的仇恨。如果我们现在



将集体意志的形成和实行置于我们行动的中心地位,那么显而易见,它与那些相信已经在个人主动性所独有的德行中找到了智者之石的人们截然对立。

除了公共权力,谁还能够关注集体需求的满足以及对未来的塑造呢?如果这种权力在完成上述任务所必需的措施方面总是在原则上遭到反对,它应该如何着手执行这项任务呢?例如,财政措施被批评为增加税收,而与此同时却要求增加军备;法律措施被指责为妨碍管理,而同时又谴责国家放任自流;人事措施在聘用官员的形式方面受到批评,而同时又要求增进公民之间的友谊。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赢得一场战役,以便重新确立公共权力的权威。社会主义必须清醒地承认我国及少数发达国家的市场的效率,同样,社会主义也必须明确地标出市场的界限并确定哪些东西不属于市场范围之内。

我们的敌对者的恶习并不局限于国内政治领域。在欧共体层次,人们可以听到他们的梦想:建立一个按照最迟钝的人们的观点采取行动的欧洲。在社会领域,他们听从那些主张实行最恶劣保障措施的人们;在税收领域,他们听从那些生活优裕人们的观点;在经济自由主义的领域,他们听从最冷酷无情的人们的观点;在援助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上,他们听从那些持最保留态度的人们的观点;在国际关系领域,他们听从大西洋沿岸那个最大的国家(指美国——译者)的观点;而且,他们把所有这些抬高成欧洲的准则。这样做无疑会使谈判变得容易,但当然不可能导致建立一个我们可以对之寄予希望的欧洲。

今天,面对欧洲所代表的价值观——人权、政治多元化、高度发达状况以及社会保障,我们不再需要任何情结。我们社会党人——工人运动斗争的继承人——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参与塑造了这样一个现实:尽管它尚需进一步改革,但仍不失为其它许多只知道未加节制的资本主义的不公正和暴力的社会可以效法的榜

样。

因此,涉及这一价值体系时,我们不再需要畏缩不前。我们只需赋予它更多的力量。在此,我们遇到了欧洲的问题。我们的讨论可以从根本上作这样的概括:首先,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不时地想要反对欧洲机制继续发展或使这种发展延缓,直到保守派与社会党人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更为有利的时候,以便能够在社会保障、雇员权利的增加以及税收政策方面得到更切实的保证。我们当中也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恰恰站在相反的立场,赞成不惜一切代价的进步,因为只有民主于欧洲的建设事业中全面发展的情况下,我们的要求公正的意志才会真正起塑造现实的作用。因此,鉴于欧洲所必须做的这些事情,我相信有必要加快统一进程,尽管在此过程中我们会在某些战役中失利。我们必须全力以赴,以便使欧洲的集体意志获得生机。那些干脆反对各个国家运用公共权力的人们,理所当然地在欧洲层次上也拒绝运用公共权力。我们能够而且必须坚持不懈地阐明这一切并不断提高我们的批判水准。批判将持之以恒并努力达到目的。是的,我们承认而且重视市场经济所蕴藏的动力。但是,我们不打算把金钱作为唯一的立足点。我们仍然坚持遵循社会中的生活伦理,一种生产活动的伦理,对于这种伦理、一意孤行的金钱往往要作出错误判断。

什么能比毒品贸易获利更多?什么能比接受一项公共订货更加容易经营?什么能比投机更为冒险?自由主义如果任其力量毫无节制地发挥作用,那么它的基本准则将自发地导致上述弊端。这正是我们必须公开谴责的,这正是我们必须与之斗争的,在此过程中我们必须为我们的努力确定一个地理范围。集体意志的所有努力,其主要目的必须是,将其伦理尺度重新加进社会生活的准则之中。

80年代,以厚颜无耻的态度对待被人们引以为荣的金钱,几乎不经过任何过渡阶段就取代了60年代和70年代的伪浪漫主

义。同时，那些为吹捧菲德尔·卡斯特罗或列入《幸福》杂志的风云人物的富翁而从事诗歌创作的人们，对于使西班牙摆脱独裁的那一史无前例的奇迹表现得无动于衷。我们西班牙工入社会党的朋友们还是在调和的艺术中表现了一种非同寻常的民主的创造精神，一种真正的公民勇气，而没有后退一步。我们必须使我们的斗争具备一个“抒情”的方面。斗争的世界性特征将能够使斗争本身具有“抒情”色彩。如果说我们需要那些要与幻想世界较量的英雄，那么，我们愿意在那些改善了曾经选择他们的人民的生活的人们中去寻找，而不是在前途渺茫的武装斗争的神话中或在站在经济入柜台里的投机分子的成功中寻找。

本世纪，有4种意识形态在欧洲造成了巨大影响。法西斯主义已在世界大战中失败。共产主义已在冷战中失败。现在只有两种意识形态产生于本世纪之前并将继续存在下去，它们就是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两者都不再是在它们的创建者心目中曾经设想的那个样子了。我们必须承认这点，因为如不这样我们就不得不后退到完全被动防御境地。而且，正是在这些重新得到确证的价值观的基础之上，在这种重新界定的民主的基础之上，在这种更新了的实践的基础之上，社会党人将提出一个纲领，欧洲的公民们将根据这个纲领为未来的世纪重新作出选择。我确信这一点。

(原文为法文，陈育匡转译自德文，殷叙彝校)

# 社会主义—自由—民主

克劳迪奥·马尔泰利\*

我们的前景是，在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基础上重建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以便由此而为人民的和进步的政党，为民主的和改革的现代政党提供来源和新的灵感。

但是，重建社会主义运动的这些基础尚不充分。原因有二：其一，历史上的左翼已不再能得到无产阶级多数派的支持——今天不再有这样一个多数派了；其二，左翼必须代表公民的多数而不是无产阶级的多数，而公民是根据文化和行为方式（它们是多元化的而且是在非常广泛的意义上）的不可来划分的。

历史上的左翼不可能单独做到这一点，因为在当今世界，在意大利、在世界经济中、在知识领域、在信息方面所发生的一切变化，都是我们的时代而不是 19 世纪的产物，因而对这些变化都必须用新的范畴而不能用 19 世纪的范畴进行解释。

左翼当然需要自己的传统，但这与革新的必要性并不抵触。相反，为了能够开始对传统进行深入思考，革新也是不可避免的。

原来的情况是：从上层进行改革，没有下层的改革者（无产阶级），没有革命；现在则不再有这种情况，或几乎不再有这种情况。相反，现在出现了某些原来不曾有过的情況：与民主制、与民主制

---

\* 克劳迪奥·马尔泰利：意大利政府副总统。

中生活的几代人即无产阶级的继承者建立新的联系,与为一切人付出代价的处于社会底层的英勇的少数人建立新的联系。

现在的社会是一种成熟的、分歧广泛的社会,这个社会要发展,要有一个革新的国家,这个社会关心的是把公共精神置于优先地位,而如果它从本身开始着手,也就是从公民、从公民的权利(如果这些权利受到认真对待的话)着手,它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

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个人的自由以及社会责任共同构成公众伦理。

我们必须促进的精神和伦理,是能够鼓励开放社会的公共选择和政治选择的精神和伦理。开放社会指的是以其成员的自由,以所有公民的个人自由为基础的社会。这是自由的制度,包括个人的生存的、经济的、政治的以及社会的自由。这种制度保障社会具有开放特征。开放是可见的和透明的意义上的开放,但首先是自由意义上的开放,而不是权威意义上的开放;开放是目标没有确定和限定意义上的开放,因为开放的最基本原则是个人的自由。

给我们以激励的政治文化有如下功绩:它不断促使人们深入思考我们的社会契约的目标与方法,从而再次把改革我们社会的必要性提到日程上来。在这个问题上,前提是必须能够推进自由和公正的条件共同发展,不是仅仅为了少数特权者,而是为了大多数的公民。这就要求——至少在开始时是这样——不进行那种政治和社会色彩很浓的传统斗争,也不进行由“知识分子组织”发动的传统的文化斗争,而是更多地要求一种自由的、社会—交流的新思维,要求相信现代事物这个向度,在这种向度中,许多自由民族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共同生活、相互竞争、相互交往;我们说有许多自由民族,是因为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已经建立了开放性社会,而这种社会能够在所有地区都取得进步,其原因在于经济、信息、生态以及为数以百万计的人们所广泛接受的对于世界的科学认识已经使世界统一起来。

把开放社会的公共伦理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之上,是这样一种尝试,它不仅可以与民主和进步的观点结合起来,而且简直是绝对必要地会同社会主义的观点结合起来。

我们提到的个人主义,并不意味着资产阶级的胜利,利己主义的泛滥,也不意味着退回到只顾自己的生活及其它令人厌恶的东西那里去。我们提出个人主义,首先是把它作为理性的基本原则。我们提出的是一种人道主义观点(尽管不是传统的),是成熟而文明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的基础在于视人如己,即将其他人视为一种机会而不是视为限制和威胁。

考虑到在这样一个人口拥挤、布满灭绝人性武器的地球上所发生的各种激烈冲突,如果仍然相互威胁而不是共同合作,那么这毫无疑问是一种丧失理性的疯狂。

然而,我们也把个人当作唯一真正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提出,因为这个价值对于不同的民族、种族、阶级及宗教都是共同的;也把个人作为人的存在当作独一无二和不可重复的现象,它在数十亿具有不可重复和独一无二存在特征的生命的生活历程和记忆中也具有独一无二性。

我们提出个人主义还基于下述信念:超越各种统治形式和各种社会中的所有迥然不同的事件而朝着主体、公民及个人的发展,关系到古往今来的每一个人,因而这种发展在所有的比较标准中是最公正和最统一的。个人既是起点也是终点。最后,人们要回到个人的生与死,回到他们的生活计划,回到利弊的权衡,回到可能性与风险、可靠性与不稳定性——它们与我们息息相关而且正在恶化,回到偶然事件,回到以往的生活,回到个人体验,而绝不是回到“范畴”、“利益”、“规律”、“集团”、“阶级”。

自此我相信,自由的社会主义,以所有人的自由为宗旨的社会主义,是唯一可行的社会主义,是唯一在这个时代有价值的和有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我还相信,所有自认为属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力量

与那些自称自由派的人们在进步观、政治观及纲领方面达到相互理解,而不纠缠于他们是否虔信宗教的问题,这不仅本身是极有价值的,而且通过这种相互理解能够更新社会主义的手段和目标,从而更新社会主义。

民主实际上是所有一切或几乎所有一切的基础,除了民主本身所赖以建立的基础——即个人的自由——之外,而且,如果我承认社会中其他人是自由的,其他人也承认我是自由的,那么我就是自由的。为了以和平的方式协调利益方面的不平等和个人见解的差异,而不屈服于暴政、寡头统治及蛊惑人心的煽动,人们需要民主和把民主按最佳方式组织起来的多数原则。

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是最有效地保障个人自由权利的制度,因为它避免了把多数的个人排斥于自由的享受之外的状况。但是,我们如何反对这样一种状况呢?在这种状况下,只有少数享有自由权利,这种有自由的民主不仅不使我们感到兴趣,反而会使我们感到恐惧,正如“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统治而并不是由“民选”产生的政府使我们感到胆战心惊那样。

我们反对古代的和现代的寡头统治,反对无法制约的、没有更新能力的势力,尤其反对暗藏的罪恶势力,同样,我们也担心出现纯粹的机构民主,担心过多地偏离有保障的个人自由。

那么社会主义又怎样呢?社会主义就是所有人——其中包括那些生来并非自由的,而是受到压迫或身患残疾的人们——都享有自由。我们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非常利他主义的使命,这项使命因此绝非轻而易举!这一点也说明了社会主义的理想为什么只是部分地实现,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背叛为什么如此经常地受到谴责。

如果社会主义只是为了社会上某一部分人的自由或为了社会上某一部分人的平等而进行斗争,那么,它一旦达到了社会一体化这一基本目的,就会丧失其意义和力量。然而,社会主义没有终点,因为不平等状况尽管被改变或在某一阶段被中断,但它仍继续在

较高阶段再次出现。此外,不存在不为某一方面的利益或不再为某一方面的利益服务的无关紧要的东西。我们关注环境,关注独立的文  
化,关注生活准则,关注涉及死亡、疾病、教育、安全以及和平的  
准则。

社会主义与自由毫无矛盾:它是自由的继续发展,因而它反对一切阻碍实现自由的事物。少数人享有自由通常被说成是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其实这种状况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主要的障碍;应该说,主要障碍在于根本不存在自由。这种认识比和平、独立以及社会进步等理想——它们也是界定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还要重要。这使社会党人成为极权主义的天敌,而且为他们在全世界开展争取人权的政治和思想斗争奠定了基础。

### 生态—社会主义

能源危机、生态危险以及由此产生的重新加强对核能的热衷,使我们面临着关于进步观的尖锐争论。我们并不放弃对合乎理性的进步的信念,但摒弃了对不惜任何代价的强制性进步的盲目而狂热的信仰。进步——利弊兼而有之,但利大于弊——曾经是西方世界的最大神话。这种神话曾使西方世界为所欲为并能够占据主宰地位。但是,这种进步观也是给人以宽慰的天命迷信的世俗的和技术的翻版。现在需要仔细思考。面临着对人类以及其它生物的继续生存所构成的威胁,面临着自然界的急剧失衡,面临着毫无节制的螺旋式加强军备,任何人都不再可能视而不见。

如果这些问题看起来是那么陌生,距离我们的心理状态和曾经塑造我们思想的传统的政治术语是那么遥远,那么这不是偶然的。

人类已经懂得,自然界也不是静止不动、一成不变的,它按照自身的循环周期——尽管相对来说时间漫长得多——新陈代谢,



不断更新。人类已经懂得，自然界也有历史；我们称之为世界的东西曾有过一个开端，将来某一天也会有一个终结。然而，与人类及其文化的历史的循环交替相比，自然界的历史——太阳系的形成、生命的出现、阳光的耗尽等过程的循环交替，看起来是难以想象的缓慢和平静。

一方面，人类是自然史的广阔而难以触动的地平面的一个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具体的人们在某一代、某一城市的文化和政治历史的狭小地平面内也创造自身的命运。人类随着自然界的历史发展而被创造出来，而他们也创造了自身的历史。传统的政治，在这个难以取消的分界的内部，以其宽容和冷酷、虚荣和慷慨的方式运行。然而，人们突然发现，这两个地平面（自然界的和历史的）在迅速地相互接近。我们的科学技术已经有能力影响到过去似乎非我们人类力所能及的领域，即自然史、基因和物种的生与死以及对它们的技术控制。受进化规律支配的现象，其变化缓慢得令人难以觉察，以致我们曾认为它们无足轻重，如今，这些现象的变化正在被加快，而且将在不远的未来的一、两代表现出来。

动植物物种的毁灭、温室效应、沙漠地区的扩大和森林的消失、人口缓慢地达到饱和、以及能源的滥用等现象，在我们的时代到来之前始终按它们特有的、数以千年计的节奏发展着，然而，现在它们不再按这种节奏发展了，因而将对未来 50 年构成威胁。

面对这种事件和时代都脱离原来轨道的情况，目前的政治毫无准备，惊惶失措地作出反应。它处于充满激情地表示支持具体计划而又内心负疚地加以拒绝之间发生分裂的状态之中，处于各个市镇、民族、阶级、宗教、性别和各洲之间发生分裂的状态之中。

一切都变得过大或过小：过去我们用望远镜观察星球的命运所遭到的威胁，现在却要反过来看，发现随便哪一个中等城市的垃圾处理已成为不可克服的问题。不仅如此，推迟即“延期偿付”代替了解决问题的方案，我们已甘心容忍无法把这些方案付诸实施的

状况了。

科学似乎已夺取了超验论者的最后一块领地。但与此同时,恐惧、易受伤害的感觉,对保障的需求都在增加。人们不一定虔信宗教才能感到和尊敬神明;对于所有不信教但是思考问题的人们来说,神明就是对尺度和限度的意识。在每一个领域,从生态领域到食品短缺,从核武器到生物攻击性,一定的尺度和限度的界定看来都是必要而紧迫的。但这不是一项轻而易举的任务。我们并不赞成不惜任何代价去争取无论怎样一种盲目的进步,但是我们对已经确定的现状也不放心。有些人看到了新的威胁和恐惧的恶魔已经出现,并且努力在迫不及待地作出回答之前尽可能准确地描述出它们的概况,我们站在这些人一边。

此外,我们还同这些人一致:他们始终关注同样的科技进步所带来的迥然不同乃至相互对立的可能性,关注造成毁灭性的和无法驾驭的后果的可能性,同时也关注大大扩展认识和解放的界限。不吉利的魔术师们可以使用拙劣的手段炸开并摧毁大自然的束缚,然而,这些束缚也能够耐心地加以放松,从而有利于进化。这种进化不再仅仅优先选择最强者或最幸运者,而是尊重和保护柔弱、宽容及多样化。我们可以使我们的根干枯,但也可以滋养我们的慷慨。我们只能把这种尝试和这种必要性解释为生态—社会主义的必要性。最后,为了得出部分结论,我们与那些相信信息的传播、相信责任和决策的人们持同样观点。如果科学剥夺了神性和自然的权力并取而代之,进而从根本上影响到生活的基础,那么,科学家的责任,而且更加顺理成章地说,管理者、政治家以及大众媒介掌管者们的责任,则有必要与公民的广泛责任再次结合起来。只有在这种结合没有出现的情况下,只有在僵化的偏见或短视的利益阻挡了通往这种广泛的共同负责的道路的情况下,那些的确决定“生存还是死亡”的问题才受到回答“是与否”的压力,才不得不付诸全民公决。我们不推崇全民公决拜物教,对后者来说,表达的形式是

重要的,而内容则往往陷入这样一种危险:它仅仅成为一个借口。我们没有就原子能发电进行全民公决,而这一全民公决已成为必要的了。

全民公决是实行直接民主的一种特殊的、有局限性的、但却是基本的工具。在我们看来,这种工具决不能取代现实民主的、信息的、以及讨论的不断运转,这种运转由于社会及其交往关系的文明发展——其中包括有效地利用电子和信息科学方面的新发展——而成为可能。

在对堕胎问题举行全民公决的时期,类似现象已经显而易见。存在这样一种意图,它企图使对堕胎(并从而对秘密堕胎的祸害)的刑事追究重新生效,对此投票反对是正确的和必要的,而且也是符合另一方面的一个倡议的。这肯定与生存的权利或自由的与负责任的母性这些决定性问题无关,那次投票并不涉及这些问题,今天的情况也不是这样。

对生态的忧虑不是新的专门方面,也不是必需强加在旧政党身上或者必须以新政党(绿党或半绿党)为基础的新增部门。这种忧虑是颠倒自然史与人类史之间界限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凡是相信不断进步(无论何种进步)之惯性力的人们,都会产生错觉,然而,那些想到走回头路,想到消除我们在其中活动的、错综复杂和相互关联的空间的人们,也会产生错觉。由于同样的原因,如果我们想要以僵化的方式用旧政策的基本原则去反对新政策的基本原则,那么我们也会犯错误。旧问题与新问题相互并存,相互交织,因此,解决方案的运用也是相互联系的。在这方面,改革者的答复距离极端主义的绝对化和纯粹的顽固守旧同样遥远。我们怎能满足于——哪怕仅仅出于对现实主义的尊重——一个其前提(除非以问题本身及其提出者的消失为代价)不可能证明为假的逻辑呢?难道这不适用于当今核电站可能出现的最大事故所造成的危险吗?难道这不适用于核武器吗?——人们可以自诩核武器阻止了灾难

性冲突,直到威慑作用失效使得能够记录这种错觉的任何证人不再生存之时,难道这不适用于生物控制吗?——它们的创始者没有能力而且经常没有兴趣预见后果并为这些后果担忧。

### “争取平等”的动力机制

如果忽视历史,我们会犯一个错误;但如果我们愿意把当今出现的,而以往尚不存在的所有问题都归咎于历史上的社会主义,那我们就会犯双重错误。

我们不应忘记,有多种社会主义存在,如果改革的开端能使它们统一起来(这还有待证实),那么,这种情况之所以能做到,也只是因为改革者仅仅是围绕社会主义方法展开讨论的人们。他们讨论了民主的和实验的方法,借助这种方法将能够逐渐实现内容和目标;他们还讨论了社会组织的力址,这种力量能够支持纲领同时为纲领提供大部分政治目标。

由于努力去理解当前这个时代和新生事物,因此,人们不可能退回到“祖父的教义问答手册”那里去了。

并不是我们自己创造了这个既充满机会又充满危险的、危机四伏的社会。但是,我们的责任首先在于努力去理解这个社会。

这种讨论之所以是重要的,恰恰因为它也促进我们尽力去理解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因为它使我们更明确地衡量我们经验的潜力和限度,也因为这会成为一些“宁静的假日”,在这一天,人们能够平心静气地交流思想,从而能够更为无忧无虑地思考。

如果我们注意到那些最为经久不变的结构数据,我们就能够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应该被称为民主社会主义世纪的世纪,而社会福利国家应该被认为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成就。

然而,这也是相对论和精神分析理论的世纪,是最大程度的资本主义的和非资本主义的工业化的世纪,是核时代的第一个世纪,

但愿这也是藐视人类(无论以什么名义)的战争、专横统治以及暴力的最后一个世纪。

相对论是本世纪最重要、而且影响深远的科学表述,它与社会的某种相对性相吻合,只是在最近意大利的文化才勉强承认这种社会相对性。

“社会相对性”本身与另一种特征联系在一起,这个特征是变化的迅速性。其中包括:“相对性”,例如,在国际领域,在国际市场的联合或军备均衡方面、在饥荒与军备之间、传统与过渡之间的冲突方面存在着相对性;“复杂性”,例如,行为方式、规范、机构、立法等方面的复杂性;“多元主义”,即种族群体、城市、社会群体、权力、宗教、行为方式、文化及感情方面的多元化。

“变化的迅速性”,由于新技术,尤其是“信息社会”的出现——它建立在传播系统与人工智能相结合的基础上——而具备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所有这些及其它许多东西都超出了“社会民主主义世纪”的范围:一个由技术统一起来的世界,一个由于分裂和巨大的不平等,由于这样一种危险(即使不是象戈尔巴乔夫所说的生态梗塞的危险,也是一种癌变不断扩散的危险)而受到威胁的世界,已经具有相互依赖的特征。

谁认为现在发生的事——即一个新技术时代的产生——与政治文化“毫无关系”,谁就似乎是没有认识到任何文明中都曾存在的社会文化发展水平与技术发展水平紧密相关这一事实。

雅典之为雅典,不仅在于它拥有艺术家、作家、哲学家,而且在于它与它那个时代的其它城市和其它国家相比,它在技术方面也更为发达。或更准确地说,雅典能够在以较先进的方式组织起来的生方式、社会以及职业分工的基础上,借助民主制度也发展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政治文化。

人们必须评估新技术的真实价值。人们必须认真地讨论这些

新技术,并对无益的、或者说不利于我们的技术持警惕态度。

首先,必须想到,人们不可能象购买可口可乐那样购买技术。把技术看成技术消费产品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技术产品能够促进技术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然而,新技术首先具有一种人们能够称之为“分布能力”的特殊能力。电子技术就是一种硕果累累的和“有附着力的”发明:它几乎与所有一切都有密切联系。信息学作为生产和作为新的消费分配结构,即公共行政、视听习惯、环境和空间的新的分配结构,将以日益改变的方式组织我们的生活。

我们每一个的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现象已经能够透露出“技术过渡”的明显症状。现在我们甚至成了蒙受这些症状之苦的人。

为了购买技术,人们必须应用它们,人们必须了解它们,而且,人们必须经常能够用它与既存事物交流或结合。当然,如果经济上是可行的,则选择“软”技术更为理想,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既有利于经济发展也有利于生态发展的基本条件,则更为理想。也许,根本不存在一种“后社会主义”——象密特朗的第一个顾问阿塔利所预言的那样,而是存在一种迄今尚未被想到过的“生态—社会主义”。

但是,反观我们自身:人们怎样才能缩短对于我们的发展是必要而且可行的技术(我们这样看)与南欧和南半球的年轻失业者之间的距离呢?除了学校教育还有其它方法吗?

而且,更一般地说,难道一个现代改革方案没有必要既从事组织分配,又(而且首先)从事组织生产吗?

然而,事情确是这样的:今天,在任何一个国家,社会主义方案都必须追求下述目标:以某种方式改善既存事物,从而使国家愈来愈富强和公正,而且两者同时兼顾。

在美国工人领袖、自由党人和民主党人,以及欧洲社会民主党人看来,这个任务曾经是不言而喻的。然而,今天这个任务则变得

较为困难,因为形势已变得较差,社会已变得更加复杂和多元化,国家和管理机构更多地成为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在我看来,一条可能成功的道路,一条出路和一次深刻的改革,总之,某种给社会带来实际进步运动的事物,不可能不考虑社会福利国家的改革;然而,在欧洲,以及更有理由地说,在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是,社会福利国家必须考虑教育制度和科学研究的真正改革。

我想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大家都必须努力建立现代学校,这个教育必须既是传统的维护者,又是最根本的财富(作为资本的人)的智力和动力的培养者。

在我看来,爆裂点就在争取社会公正的纲领——它们必须与现代化纲领同时提出——的核心内容之中。

所有人都应有机会享受中小学和大学教育并有机会从事研究,这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即促进所有公民的潜力,机会及成果的不断增长的动力,从而成为公民们享有新权利的前提。利益与公正、效率与创造、独立与责任都能促进学校教育的不断改革。学校教育亟需一个真正民主的现代化和改革过程。这是一项比产业部门中的任何一种具有可行性的革新都要更为勇敢,更为重要,而且更为紧迫的任务。

工会运动也能够参与检验新的创议,也能够参与推进社会科学和教育科学领域中的科研与教学。

所有这些都与改良主义的历史及其最初的设想完全相一致:通过团结一致和组织在公有经济中的劳动;首先是通过教育使人民得到解放的理论和实践,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多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我相信下述观点:在这样一个时代,在其中,权力的复杂性(某种法律——经济性的和社会性的城市化)足以阻碍多数公民了解实际发生的事情,而且使他们难以理解这些事情,乃至难以理解他

们的日常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在其中，思想和行动能力能够弥合裂痕，也能够使分裂重新达到势不两立的地步；在如上所述的这样一个时代，那些至少在思想上追求使每一个公民都可以在一个公正的（尽管不是绝对公正的）社会中平等相处的人们，其主要努力必须是：在教育、信息、文化、艺术、科学、技术及就业机会等方面提出并传播广泛的建议。

在复杂性时代，教育机构的质量和扩大是社会解放的中心问题，因为工作职位的获得和工作职位的质量取决于此，对世界和现代时代的知识与意识也取决于此。我难以设想，在没有获取和传播新知识和新见解的政治能力的情况下，在没有以挚爱传统并热衷革新的精神进行教育的政治能力的情况下，社会主义的复兴可以实现。

在这个时代，知识与能力之间的关系变得比以往任何一个其它时代都要密切；在这个时代，数以百万计的工人的生活受到具有人工智能装备的机器的制约；在这样一个时代，社会党人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为人类——为尽可能多的个人——创造这样一种关系：它使人们不致由于无知，由于难以接近科学、艺术、职业知识、信息而被排斥或被奴役。

觉悟——它的发展和扩散——是社会主义最重大的善事，是真正的平等与公正政策的基本支柱。社会主义的这个最有意义的成就已经成为能够结出累累硕果的种子，而教育和文化、教育与科学可以使这颗种子在众人的意识中不断发育成长。这颗种子本身就可以创造奇迹：把现代化与发展结合起来，把人的发展与经济的增长结合起来。这是推进平等的动力，是基于生存机会的增多，基于也为受到排斥者和一无所有者提供机会的发展。

有效地实行社会主义革新，其可能性也取决于教育。民主的意见形成的能力也取决于此，这种能力就是：在一个同时也受社会控制的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发展自己，传播更加合乎理性和自由的观



点,推进辩证的和不断丰富的理性——这种理性不仅在历史、政治和社会教育方面,在有组织的团体和利益集团中发挥积极作用,而且也在不断扩大的民主个人主义的后备军中发挥积极作用。

成为民主的个人,并不意味着脱离集体或单独生活。相反,一支不断发展壮大的、有觉悟的公民大军是这样一支大军:它需要广泛而深刻的团结,需要相互尊重,需要良好的教育,需要提出有争议的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意愿,而且需要一种有节制的个人主义,一种团结互助的和民主的社会主义——它对符合人性的社会持一种理性主义的信仰。

(原文为法文,陈育国转译自德文,殷叙彝校)

---

## 共产党政权将由什么来接替？

拉尔夫·米利班德\*

1989年下半年，东欧和中欧的共产党专政被推翻了，这是人民起义的结果。这些起义与本世纪发生的那些自发的、和平的革命属于同一类型，而它们的高度和平性质则使它们更加值得重视。这些政权被推翻得如此之快，说明它们极端不得人心，在人民中不能获得哪怕是很少一点的支持。在苏联放弃对它们的保护以后，由于持续不断的群众示威，它们本身的警察机构和军事机器很快就陷于瘫痪了。

但是，象在任何一次革命中一样，这些变革提出了一个问题：由什么来接替已被推翻的政权？

问题基本上涉及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有待建立的政治制度的类型，第二个有待建立的社会制度的本质。所有的共产党的（或曾经是共产党的）政权，首先是苏联所遭到的危机同样也提出了这两个问题。

世界上的许多次革命曾带来政治制度的变化，但很少或根本

---

\* 拉尔夫·米利班德：伦敦经济学院社会科学教授，《社会主义纪录》年刊主编。

没有对社会制度产生影响：最近几年拉丁美洲取得的民主主义成就就是这一方面的例子。在那里，专政也被人民起义推翻了。但是经济的、军事的和行政的权力集团却保持不变，只有不多的人事变动，尽管这些集团是支持原来的专政并且也受到专政支持的。新的政治制度与它们所取代的制度相比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社会制度仍和从前一样，是与他们格格不入的，是压迫性的。

就共产党的政权而言，经济的、军事的、行政的和政治的权力是非常密切地互相联结的，因此政权的崩溃必然会立即提出社会制度的问题，而且首先涉及以（至少是最重要的经济行为手段）的公共所有制为基础的国民经济。

至少在一个例子上，也就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例子上，由于共产党政权被推翻而提出的问题已经有了答案：这个国家应并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这意味着它也将完全加入联邦共和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并将对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遗留下来的国有财产实行私有化。要把数目多达 8000 家的国有企业投入市场出售，需要相当长的时期，但无论如何，这个目的是确定不变的。

对于其它的共产党政权或者曾经是共产党的政权来说，情况更为复杂，但主要趋势是要创立这样的国民经济，其中的工业活动、金融活动和商业活动的手段至少大部分将私有化并由本国的或国际的企业控制或占有。西方各国政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其它强大的保守势力持久地促进这一趋势，一批市场经济理论家和“顾问”又推波助澜。这些势力和人们充分利用了共产党政权的失败，企图把由“弱肉强食的规律”产生的经济政策强加给后继的政权。

这简直是要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这些国家发生过的社会革命完全取消。这些革命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自上而下进行的，甚至是从外国带来的，但它们仍旧是真正的社会革命。它们摧毁了战前

在大多数有关国家中存在的专制的或半专制的结构。它们也摧毁了社会等级制度，而除了在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以外，这些国家的绝大多数（很大程度上在农村的）居民曾由于这种等级制度而处于最恶劣的受奴役地位。

在 1945 年以后的若干年内，人们曾保持在可怕的战争年代产生的这种希望：在旧的、名誉扫地的战前政权的废墟上能够建立一个民主的、平等的制度。关于是否真正有过这种可能性，是存在争论的。即使确实有过，但在冷战开始而且苏联势力范围内的所有国家（同样还有独立的共产党国家，如中国）都被强迫接受斯大林模式的政治和经济组织以后，这种可能性无论如何已化为乌有了。但是这些政权在最初的几年里曾表现出两个方面。（不管这种说法今天多么不合时宜）：一方面它们实行了凶恶的残酷的压迫，另一方面，它们在经济增长、现代化、教育、福利和在为迄今严重受到歧视的多数人创造新的可能性方面决不是没有成绩的。那种认为东欧和中欧的共产党政权的所有领袖都不过是坏蛋和唯唯诺诺的人的看法也是不正确的。相反，他们中有许多人曾在本国多年从事反法西斯斗争并且因此遭到严重的迫害。他们和他们的接班人的悲剧在于：由他们建立或接受的制度是以不受控制的权力为基础的；这个制度十分清楚地表明：这种权力多么严重地使人腐化以及在它影响下对经济的领导是多么浪费而且归根到底是多么缺乏效率。

共产党政权尝试过一系列经济改革，企图摆脱指令式经济的僵化的束缚。但权力制度及其官僚主义机构保持不变，这使一切对付日益加剧的危机的尝试都遭到失败。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一个功劳是，他在掌握权力后不久就认识到，以扩大民主为方向改革政治制度，是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的、尽管还不是足够的前提条件。

去年的变革摧毁了从斯大林主义产生的权力结构。保守势力迄今仍在苏联的行政、军事和经济制度的各个方面维持地盘，但在

大多数情况下处于守势。在东欧，一些曾在旧政权中占据领导地位的人在新的情况下仍旧身居要职，但为此他们必须否定过去，而且他们很容易受到攻击。简而言之，1989年的革命（以及苏联的改革）为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腾出了位置，问题仅仅是：怎样来占据这些位置？

## 二

在选择取代共产党政权的政治制度时，人们把西方形式的民主制的这种或那种变型当成了模式。可以把这种制度理解为这样一种政权，它的基础是公认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政治竞争、定期选举、议会会议、官吏承担报告自己工作的义务、法官不受行政机关指令的约束、法官以及公民能够诉诸法律手段来对抗国家的专横行为等等，在具有深厚的法制传统和牢固的、独立的公民机构的社会里，这种政权毫无疑问会使人们能够发表意见、提出申诉和要求，并且会产生一种舆论，而通过普选产生的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对此是不得不加以考虑的。

西方色彩的政权的这些特征与作为共产党政权特征的统治形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这一对比的效果显然大大有利于前者。另一方面，在描绘西方类型的政权时通常使用的民主这一概念，受到浓厚的意识形态影响，留下许多问题没有解决，运用这一概念的政治家和评论家回避了一个情况，即西方色彩的民主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范围内运作的，由此就产生出它的重大的、甚至是会影响活动能力的局限性。民主制的一个前提是生活情况大致平等，这才可以使任何社会集团都不能在作出决策时从根本上拥有持久的权力优势和影响优势。但资本主义民主制政权的主要情况恰恰不是这样的。在这种制度下，公民在收入、财富、权力、影响等方面的不平等的程度在各个国家是不同的，但在任何一国都不是可以简

单地加以忽视的。与进步的资本主义世界相比,在美国、英国和法国这些不断歌颂自己的民主宪制的国家里,这种不平等特别明显。

作为国家行使职能的资本主义关系是:对巨大财力的控制处于相对来说占少数的人的手中,他们因此拥有强大的权力,他们的几乎唯一的目标是使自己的企业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自由经营的辩护人往往声称,似乎很大范围的中小企业都可以自由经营,它们彼此处于激烈的竞争之中。实际上今天的资本主义当然是受大康采恩支配的,谁控制了这些康采恩,就可以作出决定,这些决策不仅对于企业本身,而且也对他们所在的城市、他们所在的地区以及他们所在的国家、而且往往对远远处于他们国界之外的一些人和其它的国民经济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些决策的一个决定性特征是:它所涉及的人几乎或者根本对此不能产生任何影响。西方色彩的民主制通常不超出理事会一级的范围,它对企业的经济关系几乎不起作用。

资本主义的辩护士们还声称,在领导层作出的决策是符合公共福利和普通利益的,因为有一只由市场指引的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但是资本主义的全部经验证明这种说法是撒谎。资本主义经营只要被允许不受控制地行动,它对为它工作的人、对它的顾客以及所有其他的人一定会成为威胁。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的活力来自私人的赢利企图,任何其它考虑——对就职者的劳动保护、环境负担、产品伪造、公共利益——都必然要过了很久以后才提出来,而且不言而喻要成为赢利祭坛上的牺牲品。

在向东欧、苏联和曾经属于东方集团的其它国家提出革新方案时,必须把上述考虑当作背景。

在所有这些国家中,国有财产的私有化显然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即造成一个新的资本家阶级,他们的目标与他们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同类的目标不会有所区别。这一新阶级的成员的来源还不十分明确,因为这个阶级刚刚开始形成。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

们中有许多人会来自已经名誉扫地的特权花名册阶层,因为这些人现在已经找到门路,有种种合适的关系,自己有钱或者可以弄到贷款。此外还有那些影子经济中或黑市上发财的人,而且肯定会出现一群新的企业家,他们将贪婪地利用以优惠价格出售迄今属于国有财产的工厂、地产、设备和其它资源的机会。人们常常拿1921年列宁在苏联实行的新经济政策来作比拟,这是错误的:新经济政策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对国有财产和国家对最重要的经济活动的手段的控制表示怀疑,而现在恰恰是要对这些(以及一切其它的)手段实行私有化,而且有许多企业会被外国康采恩买去,那时当地管理人员将成为远处的财产所有主和支配权拥有者的代理人和职员,而这些所有主对于该国的需要和要求是更加漠不关心的。

不管怎样组成,肯定会出现一个新的资本家阶级。这个阶级就其本质来说与由共产党政权的“国家资产阶级”构成的“新阶级”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的基础是对私有企业的占有和控制,而不是国有企业。但正是由于他们的独立的权力地位,他们作为阶级是远为更加巩固的。

这个新的资本家阶级将和到处的资本家阶级一样,力求获得最大限度的、摆脱那些麻烦的限制的自由,这些限制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家认为自己有责任对私有企业主施加的。在雇主与雇员关系、工资、劳动时间和劳动条件、劳动保护、消费者保护、环境问题等方面,更不必说在象工作场所的民主程序这样棘手的问题以及所有其它能够影响赢利的事情方面,这个新的资本家阶级都想自行其是,为所欲为,并且会把任何“干预”都攻击成不能容忍的、向糟糕的旧时代的倒退,甚至是共产主义影响尚未彻底消除的标志。

这些企业家的所有企图肯定是行不通的。许多方面特别是工人和工会都将反抗他们。在共产党统治下工人听到的关于他们的权利和权力的甜蜜的废话始终是绰绰有余的。实际情况却完全不

一样。但是,关于工人应当有权利和权力的福音却不会被忘记,在工人摆脱了共产党政权的专制的企业领导以后,他们不会毫无抵抗地忍受他们的新的本国和外国老板的专制的企业领导。

共产党以后的政权所建立的政府将受到巨大的压力,要它们听任“市场的力量”自行其是。这些政权中的大多数现今已是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成员,或者已申请加入。从所有迹象来看,它们完全愿意采取这些组织的成员资格所要求的基本立场。这主要涉及采取以下形式的政治措施,即大大缩减公共开支,对本国和外国企业给予税收优惠,私有化和解散(企业)以及(按照银行家、企业主和保守主义经济学家的解释的)资本主义理性看来还会提出的其它要求。而这种理性并不包括充分就业和劳动权的概念。也不包括这样的设想,即主要应由国家来保证社会和集体在保健、教育、交通、环境、闲暇时间等领域提供的服务和经费处于较高水平。与此相反,这种理性希望尽可能广泛地消除生活的商品性(非商品化)并且把金钱关系确认为社会关系的基本机制。今天在所有的地方,在政府危机或其它情况下,都可以听到这样的声音:高失业率、不断上升的物价、社会福利的削减以及一切其它与市场统治相联系的弊病现在都成了为获得“健康经济”所必须付出的一部分代价,而这一代价主要将由那些最无能力支付的人来付出。而“健康的经济”这一概念本身又是和一些受意识形态影响的,回避了事情真相的假设相联系的。

### 三

原共产党国家中的资本主义复辟将导致新的资本家阶级和控制国家的人们之间的伙伴关系。像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一样,这种伙伴关系并不能摆脱互相抗争的目标、紧张情况和冲突。资本家追求的利益有可能与国家掌权者的利益相冲突,但目标相重合的方面



不是很多的,市场经济方针的影响也是很强大的,足以保证伙伴之间适当程度的一致,无论如何,外部势力所施加的压力将持续不断地补充来自国内资本主义力量的压力。

由资本家为一方,掌权者为另一方组成的权力集团将像所有这类权力集团所设想的那样,力求保持、捍卫和巩固赋予他们以财产、地位、特权和权力的那一制度。这样的目标在阶级社会中会对政治制度的运行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

如上面已强调指出的那样,新的资本家和新的国家掌权者在贯彻他们的意旨时将遇到工人和其它方面的反抗。这类反抗在许多原共产党国家中已经表现为居民的零星罢工和其它表示不满的行动。如果市场统治的消极后果日益明显,这种情况还会增加。不仅如此,这些国家从1989年发生革命以来进行的选举清楚地表明,居民固然拒绝了以前的政权,但并没有拒绝由这些政权宣布的社会成就,这些成就尽管还很不完善,但曾使居民在保健、教育、住房和交通等领域得到了保障。许多新掌权者对市场经济的热情并未得到群众的赞同,他们理所当然地对他们面临的后果担心,他们可能对于为了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必须做什么事并没有很大把握,但是已经感到,就他们自己的生活而言,市场并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

政府看到自己面对居民对它们的政策的反抗,同时又受到强大的国内和国外势力的驱使,不得不继续执行这一政策,这时它们才认识到,人们据以界定资本主义民主制的那些民主形式已愈来愈不适用。因此它们在有强制作用的政治逻辑的支配下,不得不减少这些民主形式的效用。要做到这一点,有一种可能性是通过损害立法机关和其它抗议与抵抗的来源来加强行政机关的权限。另一种途径是削减工会的权利和其它权利,例如限制罢工权。最后,还可以扩大警察的监视和限制下面对不得人心的政治措施的抗议的权力,尽管已不再能把抗议和反抗说成“由莫斯科指挥的”而置之

不理,但是把抗议者抹黑,说他们是共产党人,煽动家和打算破坏本国改革的罪恶势力的代理人的做法还是很流行的。一切资本主义民主制政权尽管声称信守多元主义和言论自由,却总是努力阻挡、扭转、削弱并且往往压制令它们讨厌的表示不同意的形式。在这种情况下,由政府的政策和措施引发的危机当然会加强这一政权的镇压倾向。这一说法对于曾经是共产主义的政权也是适用的。换一种说法,资本主义复辟将很有可能寻致在民主改革的结构内部悄悄向专制发展,导致歪曲和挖空这些民主形式。那时在这些国家里,国家机器将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首要资本主义势力的家奴而主持工作。它对于国际资本主义将是软弱的,但这却不妨碍它对于本国的公民以强硬的姿态出现。拉丁美洲提供了许多这种在国外软弱和依附、在本国却拥有强大权力的例子。

除此之外,在包袱很重的政治制度下出现的危机条件也为自封的救世主的出现提供了土壤,这些救世主夸夸其谈,发表民众主义的解救民族的言论,狠狠鞭斥形形色色合适的替罪羊。这意味着,东欧的资本主义复辟将为专制主义运动的兴起(当然是在一个民主的标签下)提供土壤,这种运动企图再次使“强有力的”政权出现,这种政权是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在两次大战之间时期的特征。

种族的和民族的紧张关系加强了这种企图,而共产主义政权的消灭往往以一种有传染力的形式使这种紧张关系重新出现。共产党政权显然未能做到消除这种紧张关系,而只能阻碍它公开爆发。苏联的若干部分的不同民族集团之间爆发了流血冲突,这明显地说明了共产党政权在这方面的失败的程度。虽然苏联公民好几个世代以来都首先受到忠于苏联的训练,但地方上的情况却使原来的弊端和对立继续存在。东欧的情况也相似,那些新政权接受了民族的、人种的、宗教的和种族主义的敌对和偏见这一令人痛苦的遗产,而反犹太主义在其中占主要地位。

构成这一遗产的一部分是由多种紧张关系构成的,它们深深

植根于地区之间的经济不平衡,并且通过由压迫、歧视和贫困产生的弊端而得到加强,根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假设,由市场作为起组织作用的生存原则来指引的政权能够更加有效地对付这些问题中的某一个。这也会助长掌权者对民主形式的不耐烦情绪,并且加强许多人的这种印象,即这些民主形式是一种奢侈品,而如此分崩离析的并且受到这些争端侵袭的国家是无力承受这种奢侈的。

在实行市场方针的国家里,竞争和个人对物质优先权的追求被看成是最高尚的德行,它们从定义来说是不允许一种道德观念产生的,而共产党政权由于它的社会主义词藻和实际之间的矛盾也没有使这种道德实现。这些国家能够作为意识形态上的粘合剂而提出的最好的东西只是民族主义,它很容易被引入排他的、进攻的,歧视外国人的沙文主义的歧途,而由基督教信仰中的落后和反动的因素产生的某种宗教虔诚也可以算作这种沙文主义。1989年的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自由和民主的名义进行的,人们曾经努力作了大量的宣传,以便使关于自由经营是自由和民主的基本前提的看法得到承认。实际上资本主义复辟不如说是会创造这样的条件,在其中自由经营可以繁荣发达,而自由和民主却反而会被大大削减。

#### 四

在原共产党国家,由几乎没有或者根本没有合法根据的、实行镇压的政府来领导的指令式经济效率极其低下。毫不奇怪,经验助长了认为唯一可以设想的代替方案是这一国民经济的全盘私有化的看法,而在西方,有为数不多的有影响的人发表意见,向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和居民担保,私有化与市场的不受限制的统治相结合将是唯一能代替受到全面控制的国民经济的抉择。

但这种“非此即彼”的主张应当被看成实际上只是一种装成客

观判断的宣传和偏见。问题不在于是否应有市场，而不如说是在于市场在经济生活中应当占有的地位以及需要对它进行调节的程度。甚至最积极鼓吹市场经济的人也承认有些领域是不允许市场和自由经营活动的，例如国际和内部安全事务。他们中的许多人大声疾呼，认为国家必须不惜代价为积累武器做更多的事，他们也属于那些极其慷慨激昂地督促国家扩大和加强警察权限的人们之列。他们只是反对国家干预资本家的特权而已。

反对他们的社会主义者也并不迷恋国家，而只是宣称，国家必须为广泛的集体服务如保健、教育和交通，提供生活方便、环境保护、迅速的和廉价的司法等等承担责任，而这一切加起来应当决定生活的质量和实在的公民权利，而且不应当受到市场规律的支配。

在生产活动方面也表明，鉴于资本主义经营的“非社会的”和“反社会的”动力机制，一定程度的调节和控制始终是绝对必需的，而尽管资本主义企业主声称讨厌国家，尽管市场规律在起支配作用，资本家却总是国家（以津贴和保护主义形式的）补助的最贪婪的受益者。因此人们这样考虑是有好处的：最近几年大受称赞的自由经营制的范例——例如南朝鲜和台湾，更不必说日本了——不如说应当被看作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范例。简而言之：国家干涉主义迄今到处都是资本主义历史的基本的决定性组成部分，问题仅仅在于使这种干涉主义为社会服务而已。

目前左派中普遍取得一致的看法是，国家不能把计划贯彻到经济活动的每一细节，至少不能以令人满意的方式做到这一点。但这不等于说，一个由经过适当的协商讨论而自由表达出来的人民意志授权的民主制国家不应当规定经济和社会方面的优先项目并且为这些项目的实现制定计划。今天的国家已在许多领域如交通、基础设施以及卫生和教育机构方面承担了这一任务，它也在制造军火方面非常热心地制定计划。在这里也有一个古怪的意识形态上的成见，即认为计划从定义上说就是不受欢迎的。恰恰相反，在

真正为社会服务的国家手中,计划是一个重要的工具。

关于“是私有经济还是公营企业”这一问题,关键也决不在于应否有一个私营成分,而是在于混合经济制度的“混合比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谓混合经济制度经常是拥有(主要限于基础设施的)辅助性公有经济成分的极其强大的私有经济的一种“委婉说法”。而且最近 10 年来资本主义国家的私有化努力已使这一公有成分进一步减少和削弱了。

应当用一种混合经济制度来代替指令性经济以及自由的市场经济。在这种制度中,公有成分和私有成分的相对地位与上述情况是相反的,经济的关键部门连同它们的战略性工业、金融和商业企业应当成为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公有财产或社会财产,对民主国家承担严格的报告义务,从而接受它的监督和调整。一些不处于很高地位的决策机构也应如此。国有制只是社会所有制的一种形式,它适用于大的生产企业和服务企业,但应当尽可能由城市或地区经营的地方性和地区性企业及合伙企业或者各种社会组织和合作机构来加以补充。所有这些领导层次都应享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并且将多方面与处于较低领域的、或在国民经济基层的私营企业竞争,提供广泛的商品、服务和生活方便。也不应当把国营企业设想成垄断性独家企业,不如说应当把它看成尽可能按照“几家比一家好”的原则来管理的经济活动领域。

以公有成分为主导的经济制度能比私营经济占支配地位的制度更有效益,但并不一定如此。而认为它必然是效率更低的说法也无非是宣传和偏见。甚至在共产党统治之下,公营企业也并不总是无效率的,而且由于那里特殊的经营条件,共产党的公有企业的经验也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结论性的。不仅如此,资本主义国家的公有制企业的经验也已证明,它们至少可以和资本家领导的康采恩同样有效率,有创新能力和“符合企业精神”。

不过效率并不是人们愿意采用公有成分占优势的混合经济制

度的唯一理由。也应当考虑到这一有决定意义的事实：通过公有制可以把财富从私人手中转移到国家手中。这一事实对于社会的意义与它的武器储备的意义同样重要——实际上甚至远为重要得多。这些财富必须受到一定程度的监督、控制和引导，而这在私有制和私人控制下是很难做到或者根本无法做到的。国家显然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合适机构。有理由指出，这会有导致国家权力膨胀的危险，因此必须把国家本身纳入一个民主制的整体之内，要求它严格地履行公布账目和报告工作的义务。

要在民主制社会内实现国家的民主化，首先需要废除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标志的那种权力体系。这一体系的核心是集中在大企业所有主手中和控制这些大企业的企业（即经济、金融、交通、商业等方面的大寡头）手中的大量权力。把这些寡头所掌握和控制的财富转交给公有经济成分，是有效地使他们的权力社会化的唯一可能性。肯定会有人反驳说，这是一种幻想，因为新的控制者会建立一种新的，更加不民主的权力体系并使自己成为关键性因素。但这就是说，要把关于“寡头制铁律”不可避免会发生作用的想法当作神圣信条，并认为民主的监督和有效的报告义务是纯粹的理想。共产党的经验也为这种对事物的看法提供了论据。但并不存在这种“铁的规律”。确实存在一种向寡头制发展的现实趋势，必须不断地对它斗争和加以克服。没有理由可以假定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占优势的公有成分是创造以合作和集体精神为基本价值的社会的一个基本前提，但确实没有人主张这是一个足够的前提。这只是一个基础，在它之上人们能够通过一种肯定是漫长的和艰难的过程来建立新的社会关系。但是这一过程开辟了人类解放的可能性，而资本主义的精神和实践却挡住走向解放的途径。

在原共产党国家内，企图实现私有化和市场统治的力量是很强大的。另一方面，要把国有财产统统出售给私人买主还会是一个长期和困难的任务。尽管有些国家，如匈牙利和波兰，看来已经走

---

上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但另一些国家,首先是苏联,还处于仍未最后作出根本性决定的关头。这就是说,还有时间可以按社会主义精神来满足由最近的变革唤起的希望。西方的社会主义者迄今很少对苏联和东欧的抵制资本主义思想方式和实践的人给予鼓励。他们实际上把阵地让给了右派,而右派则充分利用机会大事渲染自由的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左派的迫切任务是说明为什么这种图景只是一种的戏法,并且必须致力于促成社会主义性质的代替方案。

(原文为英文,殷叙彝转译自德文)

---

## 未来的社会主义：改革和人道主义

伊万·T. 弗罗洛夫\*

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反差大得惊人的时代。大家公认的、作为公元 20 世纪末的标志的特点，是科学思想的空前发达；但同时人们也谈到一个不祥的时代，今天的普遍不安就象是 10 世纪初席卷欧洲的对世界毁灭的恐惧，长达 1000 年的历史阶段给人们灌输了迷信的恐惧心理。对未来的担忧迫使我们去寻找问题的答案和解决办法，迫使我们为人和人类采取坚决行动。

对于这个挑战的回答之一是新的政治思维，即苏联的改革和公开性政策。今天我们对我们的国家在世界历史上、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激烈的、多层次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有了不同的理解。根据这种看法，我们认为苏联和美国这两大强国之间的关系具有特别的意义。已商定的苏联总统米·谢·戈尔巴乔夫 5 月份对美国的访问，必将成为在逐步销毁敌视人类的武器的道路上，使整个国际关系人道化的重要的里程碑。

我们在广泛的社会历史的联系中看到了改革的意义和使命——这就是改革的辩证法，即它自身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的逻辑。我们的与此有关的概念就是在这个自身发展的进程中发生变化的。5 年前，当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开始转向全面改革苏联体制时，

---

\* 伊万·T. 弗罗洛夫：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真理报》前总编辑。



在许多方面都涉及到对斯大林主义的后果和停滞时期的遗产的直接反映。但是在改革的进程中,事情变得越来越清楚,仅仅解决最紧迫的任务是不够的,因为对社会主义的歪曲有根深蒂固的原因。人们已经开始把改革理解为一项在质和革命性上审查关于社会主义的教条主义概念的任务,理解为一项改变 20 年代末至 30 年代初产生的、经过若干变化后一直保存到 80 年代中期的独裁和官僚主义状况的任务。

但是从广泛的整个政治的观点来看,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改革触动了作为一种体制的社会主义的最深刻的基础。在这方面,许多人说,改革已彻底抛弃了在我们社会的发展中过去所发生的一切,改革剥夺了社会主义的要素。但是事实上发生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作家们已经预见到了的事情,即社会主义的自我发展,用马克思的话来说,社会主义处在“绝对的形成和发展的运动之中”。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是,作为社会主义发展中所获得的经验的结果,我们关于新制度的本质的概念也在发生变化。这些概念具体化了,变得精确了,充满了新的内容。正象列宁已经说过的那样,“人们在书本上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我们没有这种经验,我们要在变革和改造中获得经验。这是我们极其重要的任务……”。

今天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有了丰富的经验——有肯定的,遗憾的是,也有否定的。我们也能在 4 月后开始的这几年的发展总结某些经验。我们今天已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在改革的进程中一个新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已建立起来了。在这种社会制度下,人的幸福、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不仅是一个战斗口号,而且成了迫切的社会必要性,尤其是成了具体的、实际的任务。过去 5 年中,我们党的全部政策无论从经济方面来看,还是从社会和精神方面来看,都是以这个任务为目标的。我们党的政策是建立

在人的需要和随着经济发展满足人的需要的可能性的基础上的。而经济发展已基本上转向把社会领域摆在优先的地位。

我们党为迎接第 28 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而提出的政治纲领叫作《关于人道的和民主的社会主义》。我们宣布的这个目标和以往经常出现的情况不同,绝不是重新强加于人的、与现实格格不入的关于未来的幻想、观点和死板的模式。这个理想是从现实中,从我们的生活中产生的,并和我们社会的改革联系在一起。这个改革的目的是要赋予社会主义以“第二次生命”,并使社会主义转向它的真正的——人道的和民主的本质。

在我们国家偶尔也有人拒绝社会主义思想本身,说它“不符合”人的天性,是脱离生活的理论家冥思苦想的产物。但是,当一种思想正是把人在一个摆脱了一切形式的剥削和歧视的自由社会里,在物质、智力和道德方面的发展当作它的中心时,难道能说这种思想和人是格格不入的吗?正是现在,当社会主义思想有时受到猛烈攻击时,绝大多数苏联人对社会主义的价值保持着忠诚的信仰,因为社会主义的价值已深深扎根于人民的经验和人的健康理性中,扎根于百年来对较好的生活和社会正义的渴望中。因此,我们的理想绝不是“脱离实际的梦想”,绝不是“空中楼阁”,如有些人有时企图描绘的那样。

我们越尖锐地感到我们所宣布的理想和远远不符合理想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我们就越必须确定我们通过改革要达到的目标。

这个未来的社会不仅将与我们现有的社会,而且将与今天世界上存在的一切社会模式有质的区别。我们不想抄袭任何人,或者机械地重复这种或那种固定的发展模式。然而它应该是一个集世界文明发展的一切价值于自身的社会。它将从改革中、在民主化和科技进步的条件下产生,它将建立在不仅是我国各族人民的而且是全人类的传统和人道主义价值的基础上。

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思想,首先是自由的思想,这种自

由是以人的理性、关于个人(当然是生活在其他人当中的个人)的权利的人道主义概念为依据的,是以一种和无政府状态毫无共同之处的自由概念为依据的。人道的和民主的社会主义将是一个意识到文明和自然的统一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是历史的目的本身。

我们不仅是生活在一个计算机、电子学、机器人、信息学以及生物工程学的世界中,而且也是生活在人本身的发展中——他们的理性和人道性的发展,他们在精神领域内的个人表现的独特性和多样性的发展。机器人无疑能比它的创造者更快、更好得多地做许多事情。但是问题的核心在于,新技术掌握在谁的手里。我们的社会正在尽一切努力使新技术掌握在人道的、有很高文化素养的、负责任的人的手里。

因此,问题在于,在那些从个人需要中产生了高尚道德原则的地方使行之有效的道德成为日常的行为准则。人们遵守这些准则,就是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而自觉地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人的道德准则与进步的社会愿望相一致,与促进人们之间真正的人的关系的产生和发展的那一切相一致时,人同时就是自由的。那时,人就会把自己理解为有荣誉的人,他就会使他的生活服从于他自由选择的崇高原则和目标。

新的人——有“高尚的灵魂”的人(普希金语)的道德哲学,包括一切从人们的共同理想中产生的主要道德原则。人们的共同理想是在若干世纪的进程中、在生活本身中逐渐形成的,并且反映在哲学、文学和艺术中。这些领域的最优秀的作品总是充满崇高的道德激情,充满对人的爱和对他的痛苦的同情,同时又号召人们为正义、理性和人道主义的胜利而斗争。

在革命的改革进程中,随着许多实际倡议的提出,人的问题被提到了首要的地位,这体现在由慈善组织和其它组织筹建的文化基金和苏联“乌·伊·列宁”儿童基金的成立和活动中。这也鼓舞

了对人本身进行全面研究的理论工作。

具有特征的是,正是在改革的进程中,对人的问题的综合研究工作才真正开始进行。在进行这项工作时,不同的知识领域、不同的科学机构的代表必须齐心协力。迄今为止,这类研究工作照例是在几个专门的科学领域,如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或技术科学领域里孤立地进行的。结果获得的关于人的比较可靠的知识整个说来并不少。然而尽管如此,迄今为止尚未能在这些知识的基础上形成一幅完整的图画。人、人类具有高度的整体性,因此对人类的研究需要有新的创见和全面的方法。

实现这个任务是苏联科学院主席团通过的《人、科学、社会:全面的研究》这个全院优先项目的责任。一个跨机构的关于人的科学的全苏联中心创立了,从事对人的研究的研究所和杂志《人》也隶属于这个中心。这一新结构应该促进这一科学的发展,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在全国各地活跃起来,支持制定对人进行全面研究的方法和对这一研究的新理解。进一步的目标是关于人的科学研究的协调一致和通过组织机构把与此有关的一切努力统一起来,特别是探寻不同流派的科学家——不管他们是科学院的代表、高等学校的代表还是实践科学的代表——合作的新形式。此外,这一切应促进关于人的理论研究同实际任务、首先是同教育和卫生事业等方面的任务建立更密切的联系,以及促进在社会伦理方面经过深思熟虑实际运用这些研究的可能性,而且也应促进人道主义教育理想的提倡和人的一切活动领域的人道主义化等等。

摆在研究人的全苏中心和研究所面前的科学任务和科学实践的任务是多种多样的,这就要求我们社会中一切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作出最大的努力,以及全部科学和文化的协调一致。有理由认为,现在一种新型的科学正在形成,这种新型的科学比以往更加积极地致力于人的研究,并且和实践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和全部社会伦理规范及文化联系在一起。因此产生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不仅

在理论上,而且在组织上保证对人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并提出相应的在社会、道德和生物学等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下教育和培养个性的建议。

未来的人将是什么样子?将来他们会发生什么变化?科学、艺术、文学如何影响人的能力和需要的发展?在保持个性特征的条件下怎样达到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平等?在这方面社会抱有巨大的期望。科学必须做好准备以满足社会的期望。这些问题不仅是未来的问题,它们在今天,在创造新的人——只有理性的和人道的人的过程中已经具有现实意义了。但是为了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他必须创造一个与此相适应的新世界,一个理性的和人道的世界。所有人都必须为这一目标而努力工作。这或许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否则将会出现的不是身体的虚脱,就是道德、精神的退化。那时法国哲学家和作家阿尔贝·加缪的话就将被证实。他是这样说的:对未来的历史学家来说,描绘现代人的特点只用一句话就够了:“他们进行性交和读报”。

新的未来世界的人,他的行为、理想和价值——这是重要的东西,主要的东西,这是既应在政治上,也应在科学和哲学代表“磁力线”交点的东西。今天已开辟了探寻有理性的和人道的人的新的方向和可能性。在历史上,包括在哲学思维的历史上,过去已经开始这样做了。毫无疑问,我们将会看到造就新人的各个新阶段。

(原文俄文,张廷春转译自德文,李俊骥校)

## 共产法西斯主义——起源和社会职能

亚当·沙夫

“法西斯主义”一词至少有两种含义。一是作为政治制度的法西斯主义，二是作为一个个人或一个人类集体的行为的法西斯主义。如果我们用“法西斯主义的”这个形容词来代替“法西斯主义”这个概念，那么二者的区别就更加明显了。这样我们就会确定法西斯主义制度和个人的法西斯主义行为之间的区别。那时我们就会看到，我们所研究的现象包括许多方面。虽然如此，这两种含义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内在联系。这同一种“反馈”机制有关，对这种机制应该去理解，否则我们不可能真正弄清问题的两个方面。

### 作为政治制度的法西斯主义

这种类型的国家制度在历史上是人所共知的。这个名称来源于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但是这种政体的最完备的形式体现在希特勒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即纳粹主义中。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者是这类制度的最纯粹的代表，然而对于这一类现象来说，历史上还有过其它许多例子，这里可以指出佛朗哥的西班牙、萨拉查的葡萄牙、皮诺切特的智利以及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其它许多政府。具体情况千差万别，我们只想过滤出这种制度的共同特征。当然，所有这些国家都有过法西斯专政，然而尽管如此，由于它们的发展

程度不同,由于它们当时的历史和条件不同,它们之间是有区别的。但是我们所要研究的不是这些国家之间的差别,相反,而是它们的共同点,把它们联系起来共同点,在所有这些国家中都能找到可以作为法西斯制度的标志而强指出来的共同点。不言而喻,研究这个课题时我们要把重点放在典型的例子上,放在那些对其它形式具有样板意义的这种或那种形式的例子上,就是说,重点研究希特勒德国和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这两个国家尽管有区别,但显示了非常明显的相似之处。

第一,可以把法西斯主义制度即法西斯主义国家称为恐怖国家,称为为了捍卫自己阵地而与社会其余部分相对立的有产阶级的恐怖主义专政。法西斯主义制度是民主社会制度(即使是形式上的民主)的直接对立面。在法西斯制度下不象在民主制度下,根本谈不上人民权力(“民主”一词在语源学上的解释);根本谈不上公民权利(公民权利使人——个人——有可能参与权力的行使)。恰恰相反,人民被排除了任何一种参与行使权力的可能,公民被剥夺了各种权利,而这些权利可以通过这种或那种形式保证这种参与。法西斯主义借助于以恐怖为支柱的血腥专政压服和奴役社会的多数人,使他们战战兢兢,听命于少数资产阶级的摆布。我们首先将完全自觉地、有意识地去研究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制度。

第二,除了以恐怖为支柱的专政外,极权主义倾向是法西斯主义社会制度各种表现形式的典型特征。这里说的是极权主义制度,因为这种制度试图使个人完全屈服于国家。

这种制度的残酷性、它的恐怖主义和它的极权主义倾向、它的热衷于把全体公民都“改造”得一模一样,可以有不同的结果。

法西斯主义社会制度的残酷程度,取决于当时对有产阶级的威胁程度和它们对企图打倒它们的革命运动的恐惧程度。然而在任何情况下基本的一点是:没有公民的权利,同样,也没有个人的

自主。因此，所有的人都必须按照国家的愿望来思维。他们必须按照国家的命令行事，听从行使专政的有产阶级或集团的利益的驱使。这是极权主义专政如此敌视知识分子的原因之一。知识分子力图按照自己的意向成为自主的人。戈培尔曾经说过：“我一听到文化这个字眼，就要抓手枪。”这不是偶然的。主要的问题是要影响知识分子，使他们保持一致，来建设一个按照由上面发出的命令的节拍行进的极权主义社会。

第三，必须强调指出，法西斯主义制度必然是作为一党制组织起来的，它严格按照集中制原则活动，并且服从于来自唯一指挥中心的严密的内部纪律。所有法西斯主义制度都是一党制度。取消民主和公民基本权利，不仅仅是由于执行一种意识形态准则。更确切地说，这是制度的逻辑必然性，这种制度在相应的意识形态中得到反映，并通过这种意识形态来为自己辩护。

第四，法西斯主义制度使全部社会生活服从于一个专门为此面组织和控制的、作为最高指挥中心运转的国家，因此法西斯主义制度必然要建立一个强大而又极端集中的官僚主义机构。这样组织起来的官僚机构喜欢建立一种领袖体制。官僚主义机构需要一个领袖，因为一个救世主式的人物的存在总是有助于控制社会。同时，一个领袖和一个以他为支柱的制度也有利于在官僚主义机构内部建立一种等级制度，使官僚主义机构分为不同的等级，另一方面又产生出许多低等级的头头。出现了一种多层次的头头等级制，这种等级制从基层一直延伸到最高领导，延伸到救世主式的领袖（他变成了象征）。法西斯主义专政之所以能够得逞，部分原因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法西斯主义政党、官僚主义机构，善于推出救世主式的人物充当它们的领导。虽然如此，不管最高领袖以及低等级的领袖们会有多大的能量，他们并不是以他们为首的法西斯主义制度的真正始祖，他们仅仅是通过他们而出现的制度和机构的简单产物，也许他们把历史交给他们的角色扮演得差一些，因为救世



主式的精神变态者并不总是能够最好地行使一个必须对群众催眠的领袖的职能的。然而历史已经证明,即使最伟大的领袖也很容易被其他人代替,只要这种换班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建立在由一个领袖培育起来并由他领导的官僚主义机构基础上的集中制国家,是所有法西斯主义制度的一个特征。

第五,法西斯主义的社会职能在于以有产阶级专政的名义恐吓社会,从这种社会职能出发,法西斯主义合乎逻辑地必然把民族主义的因素吸收进自己的意识形态原则。要想取得人们对自己的好感,最好的办法就是诉诸某种天性,这种天性一定要起源于很久很久以前,那时人们自己分成了“自己人”和“外人”。这种因素把人们团结在一个主导思想周围,团结在一个起鼓励作用的指导路线周围。如果人们利用本民族优越这一思想作为推动力,就可以取得惊人的成就。是的,各种社会对于诉诸于民族主义感情的口号有不同的反应。但是同样正确的是:象“德国,德国高于一切”这样的口号作为与超人和统治种族(它可以而且必须征服其余的人类)的认同可以发生一定的影响,如果它们占了上风,可以导致另一个对法西斯主义具有典型意义的特征的产生。我们已经看到,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如何推崇建立现代奴隶制的思想。我们在意大利和日本的法西斯主义中以及其它国家中也能够观察到十分明显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的因素。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同样在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特性和统治本质。

第六,既然狂暴的民族主义—沙文主义,有如下这样一个指导原则,那就不可避免地要导致种族主义。这个指导原则就是:我们的民族共同体所做的一切都是好的,其他人所做的都是坏的,因此我们比其他人优秀、优越,高居于其他人之上,我们有权利统治他们。这是法西斯主义首先是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典型特征之一。

由此可见,法西斯主义具有整整一系列特征,把这些特征综合起来就构成一定的制度。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不再是一个症候群,不

再是一个由许多共同的、然而相对来说彼此之间互不联系的特征构成的整体，而是一种有内在关联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中，各种典型特征相互依存、彼此相联、相互制约，共同构成一个整体、一种模式。

现在我们想谈谈起源的问题，回到法西斯主义的起源上来。法西斯主义作为政治制度是制度虚弱的产物，德国法西斯主义以及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其它国家法西斯主义的历史告诉我们，当统治阶级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时，当它们感到自己受到威胁和看到自己的统治处于危险之中时，它们就会抛掉民主的假面具，试图借助于最血腥的恐怖和专制（可惜它们成功了）把自己的统治强加于社会。人们可以大胆地断言：如果没有发生俄国的十月革命，那也就不会出现吓坏了的资产阶级的暴力反动，而导致许多国家出现法西斯主义专政。俄国革命取得了胜利，推翻了一个巨人（虽然是在冰上跳舞的巨人，但毕竟始终是个巨人）的统治，工人群众取得了政权（不管人们是否支持他们所做的事情和采取的办法），这些群众有能力把政权保持在自己手中——所有这些事实都使资产阶级吓破了胆。在魏玛时期的德国那样的国家里，存在着强大而又组织得很好的左派力量，随时有夺权的可能，这样，所感到的威胁就更实在了。恐怖主义专政就是对这种威胁的答复。当然，想象如果不发生十月革命那会出现什么情况，是不太严肃的。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这次革命是一种非常有力的推动，促使这个社会中最反动、最保守的分子，特别是兵痞，去夺取政权，并且借助恐怖来镇压想要改变社会制度的一切尝试。凡是资产阶级感到自己强大而它的政权没有受到直接威胁的地方，资产阶级会仍然保留它的民主形式，因为这对它有利。历史证明，凡是社会危险具有了具体形式的地方，凡是资产阶级由于面临丧失政权而恐慌万状的地方，资产阶级就会抛掉它的民主假面具，而实行恐怖主义的专政。如果了解法西斯主义的社会职能，那就要看到，这种使法西斯主义产生的

因素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尽管如此,没有一种制度能够离开人而运转。没有愿意追随领袖使一种专政暴动能够成功的相应的人,专政是不能随意地强加给人们的。上述两种因素就是这样互相联系的。这是问题的两个方面,它们通过一定的方式构成同一种法西斯主义现象的两种不同的含义:制度和人,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关系。

### 作为人的行为的法西斯主义

以暴力和压迫为支柱的制度,包括恐怖主义的专政在内,要想建立起来和维持下去,都需要群众的支持。这种看法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在许多著作,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通常都闭口不谈。为什么群众支持法西斯主义专政呢?分析这种现象对我们来说会十分有益。对将来可能出现的危险,这种分析对我们确是富有教育意义的。由于自己的文化发展而站在人类前列的民族(例如德国人)竟变成最黑暗最可耻的专政的一种民族大屠杀的意识形态的拥护者,这是怎么回事呢?这种专政(例如希特勒专政)竟得到群众性的支持,这是怎么造成的呢?我必须遗憾地指出,对这个问题的分析,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是非常不够的。我过去已经多次谈过这个问题,但是我想再重复一遍:马克思主义社会分析最致命的弱点是对表现形式多种多样的心理因素估计不足和缺乏理解。恰恰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对这种现象的解释是比较简单的。马克思主义发现和说明了社会的特别是经济的宏观结构对动力和社会发展的意义。宏观结构的作用迷惑了马克思主义,使它轻视人的因素,而在社会生活中离开了人任何事情也得不到解释。人不仅作为群体,作为阶级,而且作为受一定动机所驱使的个人,还依赖于心理素质的因素。说来很难为情,但不得不承认,1933年在德国发生希特勒暴动的时候,一大部分积极的共产

党员,包括许多当时属于世界要人的该党高级人物,都转向了纳粹党。怎么能发生这种事情呢?是什么机制运转起来了呢?不论是希特勒还是墨索里尼和佛朗哥,都得到了无产阶级的支持。是的,许多人牺牲了,有过大规模的抵抗,但是那些掌握了法西斯主义论据的人还是得逞了。是的,流氓无产阶级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不是决定性的作用。种族主义的独裁制度的确得到了群众性的社会支持。

我们应当考虑,那些甘愿成为法西斯主义宣传的俘虏,吞食这种宣传的观点的人是些什么样的人呢?这里首先说的是单个人的态度,他们情愿按照社会所接受的(不管是什么样的)一定的价值观来行动。我们知道(因为历史已经向我们表明),并非所有的人都会受人哄骗。我们知道,许多人曾下定决心要同法西斯主义的倒退进行英勇斗争,他们在这场斗争中甚至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但是我们也知道,多数人接受了法西斯主义的原则,服从于它们的支配。

不应当忘记,法西斯主义并不是一种已被永远埋葬的危险。现在,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倾向还仍然十分引人注目。我也看到许多新法西斯主义现象,这甚至出现在那些曾为法西斯主义制度的存在而不得不付出高昂代价的国家。在意大利、日本和其它一些国家都有新纳粹分子和新法西斯分子。这里重要的问题是要知道,如何抵制这种倾向,如何抵销他们的通常具有很大吸引力的宣传,以避免重新出现历史上已经发生了一次的的事情。

现在我们来列举那些我认为对人的法西斯主义观点具有典型的决定性意义的特征。这里所说的是对于接受法西斯主义宣传因素没有抵抗力的人,就是说,他们按照埃里希·弗洛姆所理解的社会性格来说具有一种“类法西斯主义的”性格。弗洛姆认为,人的社会性格是他们关于一种被接受的价值观的信念和意见的总和。这种性格使人在他们的社会环境中按照一种几乎是本能的方式行动。这样,就填补了由于进步和文明而造成的鸿沟,即本能的消失。

如果人被夺去了动物的本能,而又没有得到一种作为补偿的机制,使他能够迅速地辨别方向,并且对他所接受的信号同样迅速地作出反应,那么他就会处于一种极度危险的形势中,这时上述意义的社会性格,这种单个人能够在一定的形势中对一定的信号作出反应的机制,就发生作用了。社会性格是在社会中通过社会教育而形成的,但无论在个体发育方面还是在系统发育方面,它同时又同人的身心医学结构有关,这指的是借助于遗传密码传递我们暂时只是模模糊糊认识到的各种各样的特征。必须指出,在这方面存在着极大的阻力,因为同微观生物学一起,随着确定遗传密码起作用的规律的发现,出现了一种新排外主义甚至新种族主义的危险。此外,我们还不太清楚,我们通过遗传密码从我们的双亲那里所受到的影响究竟有多大范围。我们不能确定,性格特征在多大程度上是遗传的。社会宁愿制止和限制这种影响,它企图借助于命令和禁令,借助于宗教和世俗的伦理学以及教育来在性格上塑造人。但是很明显,在人的性格的形成中存在着遗传的影响。在这里,我们所感兴趣的是那些甘愿吞下法西斯主义因素和把人变成法西斯主义宣传俘虏的性格类型和行为。

不言而喻,对于历史,对于大规模的法西斯主义运动,特别是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经验必须进行认真的研究和分析。但是人的精神部分在这里却总是被搁置一旁,只有借助于集体或个人进行的研究才能认清这个部分。为了进行这种研究,必须熟悉心理学(包括潜意识心理学)的各个方面。

为此需要有点想象力,否则很少或者根本不可能收到成效,所谓经验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空白,正是同这种缺乏想象力有关,因为它们被引向定量分析,而忘记了上个世纪在这些领域已经进行的研究,当时还没有出现很完善的定量方法,但是已经有了伟大的、非常善于幻想的思想家,这些细心的观察家懂得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并从他们的经验中得出一般的结论。

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首先会发现,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大多数追随者和拥护者都是这样的人:他们愿意在集体中活动,如果他们 是群体的一部分,他们就感到更安全,因为他们到时候不必自己作出决定。这种人一般都优柔寡断,通常都怕负责任。这种怕负责任的心理是很合乎人性的,即使这有时会达到病态的程度,在极端的情况下近似真正的心理变态。如果我们看看,穿黑衫制服、褐衫制服、蓝衫制服和其它什么制服的纳粹队伍是怎样成长壮大的,我们就可以断定,这里到处是同一种机制在起作用:通过群体而产生的吸引力。这种形势使人们不必自己作出决定,不必独立思考,不必承担个人责任。

这种分析同那种通常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据的分析相距甚远,后者的出发点是宏观结构,是集团和社会阶级的动力。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分析是重要的,但是不够充分。正是由于这种不足,在德国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法西斯分子和共产党人之间的斗争中,法西斯分子如此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胜利。他们更好地懂得把他们的口号介绍给人们,介绍给个人。他们所以成功,不是因为他们受过更好的理论教育,而是因为他们懂得自发地迎合群众的情绪,因为他们懂得向这些群众讲话。例如,当我们分析希特勒这个不寻常的人物(他无疑是一个精神变态者,并且没有太多的知识)而来看看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讲到宣传的一章时,我们就会发现,其中描述的构想是很精彩的。希特勒这样一个没有受过心理学和社会学教育的人所写的这部著作,竟远远超过有学问的教授们在宣传方面所能想出的一切。希特勒作了示范,使人们看到,如何利用某种应用心理学和某种实用主义手段,使之与如下一个也许连希特勒本人也未必理解的事实协调起来:存在着被列队齐步走的可能性所吸引的人类群体。组成这种群体的人愿意同其他人完全一样,不想有别于其他人,不想出人头地,想同其他人一起行动,不想作出任何决定。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不应当承认对事实的歪曲,即把法

西斯主义的信徒群体说成是流氓无产阶级和失业者的大杂烩。是的，流氓无产阶级支持了法西斯分子，说失业者支持了法西斯主义也是对的，但是同样千真万确的是：法西斯分子比那些使用一种不大容易学的语言的共产党人更好地懂得向他们讲话，从而争取到他们。事实要复杂得多，在法西斯主义的信徒中有许多社会阶层的人。也有这样的人：他们以前从属于共产主义运动，后来他们在新的运动和新的纪律中感到十分舒服，因为他们加入了群体，他们作为单个的人可以消失在这种群体中。这些以前的共产党人对于作为群体成分而行动曾有过精神准备。在生活中，在社会中，回避个人主义一般是正常的。极少有人试图保留自己的个性而拒绝同群体、同绝对纪律、同极权主义有关的一切。由于这种原因，人们通常把那些具有认识自己特点的感受力的大人物、大艺术家和大科学家视为不正常的人，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也是不正常的。但是一旦这种正常性被引向恰当的方向，它本身就包含着一种巨大的危险。这种正常性是那些甘愿被卷入法西斯主义影响漩涡的人的第一个典型特征。

第二，要考虑的是这样一种人，他们有变态心理，首先是有一种自卑情绪，这种自卑情绪通常通过一种过分的虚荣心来得到补偿，这种虚荣心又导致一种优越感。现在我们就进入潜意识心理学研究领域。不研究这种心理学，我们就很少能够取得成就。我们只要注意一下我们的生活环境，观察一下我们的朋友圈子，就可以看到，有多少“失意的人”，有多少生活中的“乘船遇难者”：残疾人、失恋者、阳痿患者、无才华的人，他们无力实现他们在科学、艺术和其它方面的理想和抱负。有许多这样的人，他们而前明显摆着他们很想学习的榜样，而且他们非常清楚，他们多么喜欢这样做，可是他们同样很清楚，他们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他们受到了阻碍，等等。虚荣心和嫉妒支配了他们对那些有文化、有能力、比他们自己优秀的入物的关系。于是出现了仇恨，另一方面，很难在典型的、正常

的、常见的行为方式和心理变态现象这两者之间划清界限。但是也有一些这样的人，他们由于无能而企图把自己的统治强加给其他人，以证明自己的优越性，实现自己的意愿，贬低所嫉妒的人。对这类人还应加上那些特别喜欢暴行的人。在极端情况下，这是一些病态的犯罪分子。典型的例子是所谓强奸杀人犯，这种人由于情欲而杀人。这些家伙一定要杀人，因为他们有病。我们不知道，这些特性在多大程度上是社会教育的结果，在多大程度上是由遗传密码决定的。我们现在还处在一次长途科研旅行的起点。没有分子生物学，没有破译遗传密码，我们就不能弄清这些未知数。我们知道，在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的人们中，首先是在马克思主义者中，这些看法都会被认为是不能接受的而遭到反驳。他们断言，所有这一切都只有社会原因，没有任何理由必须求助于生物学。这是不正确的。我们不了解真实情况。我们拒绝这种遗传学的可能性，因为我们不喜欢它，因为它对某种信念是危险的。我们同哲学的、社会学的和其它流行的信念发生了冲突，但是我们没法解决这个问题，除非求助于关于非常可能存在遗传密码的影响的科学假说。科学已经能够把强奸杀人犯的遗传密码破译出来。科学已经能够把“先天愚型”的遗传密码破译出来，因此可以预料，科学也将能够把其它疾病和坏事（如我们在这里所研究的）的遗传密码破译出来。但是这并不是我们所最关心的。我们只是顺便涉及这一点。真正使我们关心的是这样一个公认的事实：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有统治癖好，因此他们很容易接受使他们（因为这些运动要求服从）遵守纪律的运动，就是说通过强制使人们随大流和发展有中央指挥部门的群众运动，这种运动的目的是取得那种渴望已久的权力，而他们单靠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天赋和才能、自己的精神能力和知识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正是这些人在镇压机关中干得最起劲，也就是说在这样的机构中最起劲，因为，人们在那里对那些被突然袭击的人实行全面的统治。这是集中营（不仅在资本主义中）的许多卫兵、看守、密



探、监视者的典型特征。这一切对许多监狱看守、法官和机关的各种领导干部也具有典型意义。这些人掌握着控制其他人的权力，他们可以利用他们自己的卑鄙性来侮辱、践踏和蹂躏那些独立思考的人（即使他们还很有影响）。这里的问题不在于阿克顿勋爵上世纪关于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所讲的那些话。这关系到更重要的事情，因为这可以在法西斯主义制度中培养出一大群刽子手。这不是个别现象，不是一些蜕化的、变态的人。我们周围有多少是蜕化和变态的人，我们对此一无所知。共同的社会生活排除了蜕化的行为方式的危险性，它阻止和限制了这种生活方式。然而许多人并不是好惹的。对这些人来说，只要出现了适当的条件，他们那些被克制的变态的本性就会公开表露出来。我们往往看不到这种情况。

第三，必须谈谈可以组成法西斯主义作战部队的民族主义分子和种族主义分子。我们已经说过，法西斯主义依靠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所赞美的价值观，因此这两种倾向的拥护者接受法西斯主义的口号并对之表示认同。然而这不是说，所有民族主义者或种族主义者都必然是法西斯主义者。要成为法西斯主义者，还需要具有其它的典型特征，这些我们已经指出过。虽然如此，在多数情况下，民族主义者、种族主义者与那些提出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亲和性。由于这些原因，民族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成了法西斯主义宣传的最好的对象。他们是一些很容易相信法西斯主义纲领的人。由于本集团的优越感，由于有可能征服和统治其它集团从而证明自己的优越性，所以法西斯主义的理想很容易受到民族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的重视。

第四，必须指出某种经济利益和军事利益的代表，他们把践踏和统治其他人看作最大的胜利，人们可以从这一点来理解经济竞争和军事对抗。这不是说，所有工业家和所有军事家都是潜在的法西斯主义者。虽然如此，必须强调指出，正是在这些人中间通常有许多法西斯主义及其阴谋活动的拥护者，尽管他们常常想方设法

不使这种同情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些工业家经常资助法西斯主义的和军事的行动,借口这是国家的最高利益,而人民通常也在这一方面支持他们。

第五,我们还必须指出另外一些人,他们人数最少,但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就是那些思想家,他们依据的是他们自己的哲学、社会学、政治和道德方面的观念,他们有一种反常的个人和民族自大狂,他们身居法西斯主义运动的领导地位。这种人越是反常,他们成为救世主式的领袖的机会就越大,这些领袖利用他们的狂热,利用他们确信自己所干的事情和所说的话正确无误的坚定信念,能够使群众着魔,即使这些演员实际上都是在干疯狂的事。只要我们看看有希特勒出场的纪录片(为了挑起新希特勒倾向,这些纪录片确实在德语国家放映过),只要我们看看其它法西斯主义领袖的行为,我们立即就会明白这一点。我们会意识到他们所引起的迷惑力和他们所具有的魔力。群众心理学部分地研究过这些问题。社会学也在一定程度上研究过这些问题,但是我认为还缺乏埃里希·弗洛姆在他的《理智社会》一书中所间接要求的那种基本的分析,即社会精神病学必须进行的分析。有许多现象是属于社会精神病学范围的。

### 作为政治制度的共产法西斯主义

现在我们想转到有关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的问题上来,我们想确定,“共产法西斯主义”这个概念究竟是否符合我们所感兴趣的标准,因为它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来说具有一种非常不好的味道。同它有关的种种现象发生着双重的负作用。它们所表示的因素加重了生活在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的人民的苦难。而从外部来说,它们把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了宣传攻击的对象,使西方的共产主义运动同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世界所发

生的事情断绝了联系。

可惜事实令人感到震惊，我们在这里所提到的种种现象把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变成了社会主义理想的反面模式。如果我们承认有一种理想的社会主义模式存在，那么我们也必须承认，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和它的那种典型的制度是这种理想模式的负版本。如果用专政代替了民主，如果用极权主义（它企图使单个的人服从于国家，国家使人受各种各样的机关奴役）代替了言论自由和参与决定的自由等等，如果用公开的民族主义、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等等代替了梦寐以求的博爱和国际主义，那么这对社会主义理想来说就真的是一种反面模式了。这种变形的每一种表现，对社会主义理想的每一种背离，都有自己的名称，都代表一种现象，这种现象很容易同其它种现象区别开来。但是，如果以为这些现象可以分开研究，那就错了，因为这里所说的交织在一起的种种因素构成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中，每一个方面都同另一个方面相联系，都制约它，同时又是它的一种职能。由于这个原因，所以非常需要给这种现象起个正确的名字，使用一种能通观全局、概括所有消极因素的概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反映真实情况，从而作出相应的判断，采取更加适宜的社会措施，实行社会服务制度。我们建议使用“共产法西斯主义”这个概念，它的适当性将经得起考验。

我认为，我想用这个概念来说明的种种现象之所以发生，主要原因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虚弱，这种虚弱的根源在于这种制度产生时的环境。所有这些制度都是在不顾马克思的意见，不顾马克思所认为的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重要条件的情况下产生的。我们所知道的所有情况都是：这些国家无论在客观上，还是在主观上（实现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人的成熟），还是在它们的物质发展方面，对于实行新的社会制度都是没有准备的。

马克思向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动者指出了非常具体的先决条件。首先他在1847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用非常精辟的语言深

刻而透彻地阐明了他的思想。马克思在有关段落中说道,如果不重视这里所说的条件,那种“陈旧的肮脏东西”就会回来,尽管会换上一种新形式。马克思表述了各种物质性的条件,他说,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必须在一个其发展程度能使社会财富重新分配的社会中进行。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大家同等贫穷。第二个条件是要存在一个有才智的、能够作为社会基础承担新的社会制度并能掌握现代技术的工人阶级。当然,我们知道,在马克思当时所认为的“现代技术”和这几个字今天所具有的意义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这只能使它的意义更加巨大。第三,马克思说,革命必须在所有“决定性的”国家同时胜利,马克思有时也讲在“全世界”胜利,当时人们所理解的“全世界”(尽管这一思想会在欧洲中心主义的反对者中间引起很大的惊慌)是指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比荷卢三国。列宁于19世纪末修改了这一要求,但并未取消这一要求,而是指出,革命可以在单独一个国家开始。但是列宁从未反驳过革命可以采取某种程度上全球性规模这种必然性。不用说,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都未具备马克思所表述的先决条件。

尽管如此,马克思还间接地表述了社会主义取得胜利的主观条件。葛兰西对比作了明确的说明。他对社会主义革命表述了一个新条件:与实现这一革命有关的社会共识。葛兰西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取得社会多数人的同意和支持,至少要取得工人阶级多数人的支持。这个阶级必须支持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这里所说的不仅是要拒绝先前的社会制度,反抗由资本主义国家造成的压迫制度,而且更要自觉地支持社会主义。葛兰西认为,取得这种支持需要一定的时间,必须进行适当的思想工作。由于这个原因,他把他的条件同他赋予知识分子和工人运动的那种无与伦比的作用联系起来。在他看来,知识分子代表一种意识,要把这种意识从外面带进工人阶级中。这并不是新发明的论点,因为考茨基已经说过这一点,列宁自己在他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中也重复过这一点。

并且明确地提到考茨基。但是葛兰西对这个论点作了正确的表述。

如果上述两个条件(物质条件和主观条件)不具备,那么可以预言,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将会很困难或者根本不可能。在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所有国家中,只有苏联这样做是有理由的。尽管布尔什维克面临着种种困难,但是他们下决心发动了革命,因为1917年,在战争之后,国内存在着普遍的革命形势。此外,人们可以认为(人们也的确这样认为),俄国是资本主义国家链条上最薄弱的一环,它可以发动革命并成为某种炸弹引信,随着它的爆炸,在西方将为一次胜利的革命打通道路。列宁从来都是毫不犹豫地公开谈论这个问题。他认为,俄国虽然暂时是先锋队国家,但是如果革命在西方爆发,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它仍会重新变为一个落后国家。正如人们所知道的,这个预言没有实现,然而它对布尔什维克的行动和决定来说是一种极好的辩护理由。甚至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组成形式和发动本身进行过严厉批评的罗莎·卢森堡,在她关于俄国革命的小册子的最后几页也赞成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党的观点,因为正如她自己说的,在象俄国当时所出现的形势下,革命家必须敢冒风险,作出决断。在其它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中,发生这种情况多半是因为有苏联军队驻扎在它们的领土上。虽然不具备所提出的条件,虽然没有得到居民的支持,仍然进行了革命。不管今天人们怎样说,必须把这种革命看作严重错误。如果今天在第三世界国家出现类似的情况,如果我们虽然有了有关的历史经验而仍然发生了这种事情,那么不仅把这种事情叫作一般错误,而且叫作十分严重的错误,也许是很恰当的。

一般可以这样说:没有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肯花大力气进行自由选举和让公民真正参与行使权力。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与其说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对一般民主有一种抽象的反感,不如说是因为这些国家不敢采取这些措施。社会的反抗很强烈,一旦社会有了作出决定的机会,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至少就要发生危

险。1989年波兰选举的经验证实了这个论点，这次选举甚至使最固执的乐观主义者都不再抱有幻想。

于是我们就看到，在类似情况下发生了法西斯主义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夺取政权时我们所看到的现象。既然有产阶级感到自己受到威胁，既然它不能花大力气去实行民主（因为这种民主会毁掉它的政权），那就要转而采取公开专政的方案，依靠镇压机关消灭居民的反抗。在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类似的现象。

问题的核心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中法西斯主义的典型特征和社会主义制度所产生的法西斯主义之间是否有一种真正的亲和性？如果有这种亲和性，那么我们就可以直截了当地使用“共产法西斯主义”这个概念。

在这里必须谈谈这样一些人的看法，他们利用各种各样的论据，否认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真正是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他们说的对，那么讨论共产法西斯主义就没有根据了。很简单：如果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那么也就谈不到在这些国家存在共产法西斯主义这个现实社会主义的畸形产物。关于这一点，我已经多次发表过意见（特别是在巴塞罗那—马德里1989年出版的《当代社会主义的前途》一书中），因此我可以不再重复我的看法。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至少它们的基础是这样，因此可以就这些国家研究共产法西斯主义问题。

的确，我们已经涉及到的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生活中的消极现象同我们所指出的法西斯制度的典型特征有一种亲和性。在这里我们也看到恐怖，也看到企图把人变成奴才、使单个的人屈服于国家、屈服于机关的极权主义。我们看到具有阶级性质的官僚主义机关，它在某种程度上比资本主义国家还强大，这是一条规律：官僚的权力随着其它表现形式的消失，随着依赖于出身和金钱的所谓绅士的消失而增大，因为官僚机关的权力并不因为其它权力的影响而受到损害。同样存在着民族主义、沙文主义和常常达

到令人厌恶程度的种族主义。由此可见,我们所指出的法西斯主义政治社会制度的典型特征全都出现了。

但是,在对这一切作出断言的同时却开始出现了困难。有必要为每一个国家和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想出新的名称吗?由于种种原因,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要这样做需要付出大量的劳动,撇开这一点不谈,其结果会不符合我们所定下的目标,而形成对共产主义的强烈的控诉。在“公开性”时期,只要看看苏联的报刊,每天都可以发现不是一个,而是一千个上而所讲的和其它具体得多而且强烈得多的“控诉”。但是,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满足于一般的说明吗?即使我们这样做,我们还会有许多困难,因为我们在这里所研究的国家不是全都有相同的制度,即使在同一个国家范围内也不是相同的,因为它可以有各种发展阶段。有区别、强度不同,这同该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条件有关。是的,有的发展阶段,例如苏联的斯大林时期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使一种制度暴露无遗,这种制度把共产主义制度的所有特征集于一体。然而在上述国家中也有过其它阶段,这些阶段表现为另一种形式。30年代的苏联和今天的苏联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我们越是强烈地注意到那些其表现形式不同或者不太显著的国家,这种区别就越加明显。

最后还有一个最重要、最复杂的问题。是的,存在着某种亲和性,存在着一定的共产法西斯主义因素,有些地方甚至存在着发达的共产法西斯主义制度。但是这种制度没有成为这些国家的唯一生活形式。在这些国家中,同时还存在着其它的表现形式,如果闭口不谈这些表现形式,我们所描绘的图像就会失真。在所有这些国家中,甚至在发生了最令人厌恶的共产法西斯主义变质的国家里,也存在着积极的表现形式,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不论是在公民的精神生活中还是在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中都是这样,这些国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虽然人们可以断言,这些变化应当归功于普遍的社会进步,这种进步本来就会发生,就是说,这同现实社会主义存

在与否无关。这种断言即使不是错误的,也是不完全的。我认为,这些国家所取得的巨大的物质和精神成就是社会主义的成果,虽然是扭曲的社会主义,但终究是社会主义。由于这个原因,如果我们想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我们就必须看看事情的不利一面。这是一种错综复杂的、极端困难的、不可想象的冒险行为。因此,应当以如下的断言结束这些思考:在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社会生活中既存在可以归于共产法西斯主义的因素,也存在绝对共产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制度。然而这个事实并不符合社会主义现实的全貌,它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本身所固有的弊端产生的结果。就是说,这不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必须以深信人们可以改造和避免这种状况为出发点。我对此深信不疑:这种消极特征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对社会主义革命理论运用不当而产生的结果,这不是由于这种理论而产生的弊端。因此可以避免和改变这些消极的表现形式,这正是我们的思维进程所追求的目的。

共产法西斯主义的确存在,它可以变成最使人不安的现实。尽管如此,这是一种可以改变的现象,我们的任务应当是寻找以这种变化为目的的措施以及行为方式和形式。

### 人的共产法西斯主义行为

对于我们的研究具有中心意义的第二个问题是:在社会主义中,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否能够发现那些特征,即我们所指出的具有“类法西斯”观点的人的典型特征。对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给予肯定的答复。很明显,社会主义制度,它的社会所留下的人的遗产带有旧社会的特征。如果以为仅仅改变经济制度和生产方式就能自动地改变人们的性格特征,改变他们的社会性格,那是很可笑的。人们的社会性格是几百年所形成的产物,同社会和人民的历史命运紧密相连。因此完全可以理解,生活在具有新的经济基础(社



会主义结构的基础)的新社会中的人们中间,也可以看到具有典型的“类法西斯主义”的特征的人,这些人企图逃避自由,因为他们害怕对决定承担责任,宁愿把自己交给能保证个人由于不必负责任而得到心灵上安逸的群体。这些人更喜欢他们的头头们为他们作出决定,特别是在需要作出的决断的结果没有把握的时候。同样也有这样的人,他们愿意在群体中承担义务,以便统治其他人,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是最简单、也是唯一可能的解决办法。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一些病态的人,他们具有暴虐狂的天性,他们指望参加到镇压机关和权力机关中去,以便使他们的变态心理发泄出来;使他们的自卑情绪得到补偿,通过给别人制造痛苦和不幸而使自己感到好受些。我们也会看到这样的人,他们被仇视外国人的情绪所控制。这就是那些民族主义者、种族主义者。这种种表现形式的强度取决于每个社会的历史和发展阶段而有所不同。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具有反社会观点的人。这些人把他们自私的利益置于集体的利益之上,只要他们个人的利益需要,他们就准备用暴力去反对这种集体的利益。这一切都是真实的,这是平淡无奇的事实,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人们可以想一想,社会主义社会是由从以前的社会形态中产生出来的居民建立的。这些居民的社会性格,是在几百年的历史中,通过各种社会条件,通过其它许多对每个民族来说都各具特色的因素形成的。人们曾抱有一种幻想,以为通过改变社会的经济形态,可以完全改变人的社会性格。然而现实证明,这是没有根据的幻想。如果我们把社会主义中和资本主义中人的性格特征相互比较一下,那么我们不能得出结论,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同两个人类集团的这种共同的起源相分离的亲性和性。这种共同的来源本身,决定在这两种社会形态中都同样存在具有“类法西斯主义”性格特征的个人或集团,这种性格特征在社会主义中的存在就使共产法西斯主义有可能在这个社会制度中得到发展。

我们感到有趣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如果

它一旦具有了形式),是以什么方式对生活在这个制度中的人的性格特征发生影响的。因为如果说在每一个国家的居民中也都有有一定数量的有毛病的、对社会不利的、对变态发展无抵抗能力的人,那么我们从经验中知道,社会对这些倾向会施加一定的影响,使它们具有一定的形式。社会可以促进或者限制这种倾向。伦理道德的、宗教的、意识形态的法律条文中的种种禁令,通常都试图对消极的表现形式加以监督,但是有些病态的人或者犯罪分子仍能逃避这种监督。在社会主义中这个问题是怎样提出的呢?

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实现社会主义,不仅仅意味着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结构中的一种革命。它首先包括一种人的革命,社会性格、人的性格和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种革命。

当然不存在一种法律,规定这些人必须是什么样子。过去和现在任何人都不能开出这样一个药方,然而很明显,这里所说的必须是这样的人,他们比起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来,具有完全不同的性格特征,而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则是竞争、分裂、自私利益占统治地位等等所产生的消极结果。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完全不同的理想,这种理想被当时的社会看作是作为最高理想必须达到的目标。在古代这种理想是美善合一;人必须是 *kalos kai agathos*, 即美和善。马克思在这方面是人道主义思潮的继承人,他把理想的人描写为一种全面的创造物,这个创造物不仅比以前时代的人掌握更多的知识,而且作为这种更多知识的附加物也具有道德特征。显然,这种社会主义的新人(即使不曾明确地说过)必须是有社会觉悟的人,他能够把他个人的特殊利益同社会的利益协调起来,他甚至能够为了集体利益牺牲个人利益。就是说这里所说的人不满足于决定资本主义中人的生活的那种斗争,即不满足于在国内市场以及在国际领域的竞争。这种社会主义的人必须是自由、平等、博爱的卫士,必须宣告法国大革命的这些原则是最高原则。就是说,这种人在他为一一般人的权

利和自由、特别是为自己的权利和自由进行的斗争中具有公民意识。这种人在已经拒绝了私有制和生产关系所造成的不平等之后，还必须同样地唾弃人们中间的通过其它因素加以辩解（如种族主义者所说的因素）的不平等。这种社会主义的人必须维护国际主义理想，并通过这种方式在人们中间实现博爱的口号等等。

不可能塑造这样一个大公无私的人，他愿意使自己的个人利益服从于社会利益。他意识到，如果人们不保证给他以回报，他把个人的利益放在后面对自己也是有利的。一个几十年不得不生活在贫穷中（更不用说生活在困苦中）的人很难抗拒腐蚀，他很容易追求个人的利益，把个人利益置于社会利益之上。他比那种基本需要已得到满足、不必再为这些需要的解决而操心的人更愿意这样做。如果说今天西方对消费行为进行讨论，如果说它的表现形式在社会中受到批评，那么这是因为人们注意到了这种现象的消极方面。社会主义产生这样一种人，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消费行为比起在这方面最极端的西方社会还要突出得多。这种现象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西方社会已经吃饱了。西方社会已经可以花费力气来提倡苦行主义观点了。而每天忍饥挨饿的人是不可能花费力气来这样做的。

如果我们考虑一下，塑造社会主义新人这一问题在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是怎样解决的，那么我们也必须承认，马克思所提出的、而人们却不能满足的主要条件，变成了正是在那些不具备相应物质条件的国家中所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原罪。这不能不影响到在新制度中人的发展。对于社会主义新人和他们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人的性格的社会性格，人们可以随意评论，然而归根结底必须承认，人们所说的一切都是错误的。

在社会主义中有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人有各种不同的性格特征。然而更为重要的事实是：同一个人可以有非常不同的表现，有时是很消极的，而在其它情况下又是很积极的，甚至是充满

英雄气概的。人们一般对于社会主义的人在工作中表现的英勇精神和对于他们为反对国内外敌人进行的斗争所说的话,并没有夸大,这是纯粹的事实。今后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些人可能由于其它的行为和行为方式被判刑,而他们正是我们在这里所研究的那种人。

首先提出的是新人的培养问题和这种人通过社会,通过社会主义国家得到推动的导向问题。我们必须清楚,这种推动是促使社会主义的人具有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具有公民意识,捍卫自由、平等和博爱,还是拥有另一种含义。可惜必须强调指出,由于原罪,即由于不顾欠缺的物质和主观条件而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所造成的现实是不好的。

我们先谈这样一个论点: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诞生时所处的具体环境使共产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制度成为必然。如果全社会都进行反抗,那么想通过另一种方式保持政权和影响是不可能的。如果物质条件和主观条件不允许正常地建立社会主义,那么想阻止共产法西斯主义是不可能的。因为别无选择,所以人们就借助于恐怖来建设社会主义。但是如果人们用一种以无产阶级名义实行的专政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这种专政公开反对这个无产阶级,反对社会(它使社会受某些权力中心奴役),那么人们就必然陷入一场斗争,其目的是把居民变成卑躬屈膝的人,使他们愿意接受专政,或者至少不反对专政。如果作了这种估计,那就不言而喻,对塑造这种“完美的”社会主义新人的所有要求,是完全注定要失败的,必然变成空洞的口号。事实上,这里所说的不是要有一种充满公民意识、能够独立思考、热爱自由、人权等等的居民。人们企图达到的与此正好相反,就是说,企图在人们中间引起对所有这些事情的反感,从上面借助于极权主义制度使人们完全屈服于指挥中心,听从它们的命令和指示。正是这种决定性因素在实践中破坏了塑造一种新人并依靠他们建立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可能性。这

种倾向的后果和具体行动的过程取决于每个国家的形势，取决于当时实行一种程度不同的恐怖的可能性。所有这一切都首先取决于制度的虚弱程度，也取决于在每个社会中都存在的人的潜能。这里可以有很大的区别。如果我们看看俄国，那么我们必须作出结论：这个国家的人的潜能比起其它国家来，对于接受这种行为方式要容易得多，这通过历史是可以解释清楚的。蒙古人和鞑靼人数百年的奴役，封建贵族和沙皇数百年的统治，数十年的非常强硬的极权主义专政，培育了某种心理，这种心理同例如说波兰人的心理完全不同。在波兰，历史沿着相反的方向发生作用。它产生了一种心理和社会性格，这种心理和社会性格有利于反叛，有利于出现“职业暴乱分子”，有助于出现喜欢斗争的个人主义者，有助于出现不驯服的人，对这些人可以这样说：面对死亡，他们是最好的战友，可是要共同生活和组织一个共同的社会，却很难相处。19世纪波兰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思想保守的卡米尔·诺尔维德作过很有远见的预言，他说：波兰不是一个社会，而是一面“民族旗帜”。

我了解俄国人，而且在第二次大战期间（有时是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同他们共同生活过许多年。他们是令人惊异的人，我很钦佩和喜欢他们。他们是热心肠的人，都有这样一颗有口皆碑的俄国心：时刻准备为别人牺牲自己和作出英雄事迹。但是也必须说，由于他们的国家几百年所处的条件，他们同时又是很顺从的人，喜欢组成纪律严明的队伍，遵守纪律，服从命令。更重要的是：在多数情况下，服从这些命令不是为了尽义务，而是（这很值得注意）出于这样一种考虑（而且引证独特的论据）：执行命令所涉及的是一种真正的义务。命令来自上面，来自领导，所以命令一定是合理的，因为领导总是正确的。

在这样一种形势下，虚弱的制度需要有顺从的和听话的人，这种人可以听从别人的统治和执行领导干部的命令。他们需要有统治群众并且为此不惜利用各种手段和方法（包括恐怖）的干部。统

治制度为此目的培养自己的干部。不言而喻,当社会给以相应的刺激时,人所具有的一切自发因素有时会以本能冲动的形式被诱发出来,适当的人会由于自己的本能而被挑选出来。然后把他们培养成听话而又守纪律的干部,成为喜欢统治别人、以制造痛苦为乐的人。如果碰上有虐待狂倾向的人,那么可以把他们用来进行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活动。他们借口为理想而斗争,把群众控制起来,强迫他们服从。由于这个原因,这种制度有助于(因为自身虚弱而不得不采用恐怖主义的和专政的方法以维持它的政权)发展我们称之为“类法西斯主义”观的典型性格特征的那种性格特征。由此可见,不是在这种社会中本来就存在着这样一类具有这种爱好、弱点或倾向的人,相反,而是制度首先塑造这样一种人的原型,从而有利于造成一批家伙,这批家伙是同新人本来应当成为的样子正好相反的东西。

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可以产生和存在各种各样的上层建筑,特别是各种各样的政治上层建筑。我们从资本主义中可以看到这种现象,但是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社会主义中,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产生条件曾使这些国家采取了非常相似的制度形式。

这就是说,在一个社会(指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化的基础上可以建立各种各样的政治上层建筑。然而并非所有这些上层建筑都能促进社会的发展。可以产生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政治上层建筑,也可以产生限制甚至阻碍社会发展的另一些政治上层建筑。这是个难点,因为在我们寻求克服现存弊端的办法时,我们必须认清这样一个事实:社会主义的发展只有具备了一定的先决条件才是可能的。

第一,很明显,共产法西斯主义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存在和人的共产法西斯主义的性格特征使社会主义的发展成为不可能。为了完成我们向自己提出的关于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和达到社会主义

社会新的发展阶段的任务,我们必须为使这个过程成为可能创造社会条件。如果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创造了阻碍这个过程(归根结底是发展民主)的社会条件,那么人们必然通过这样一种行为使社会主义的发展进入一种停滞状态。我们可以肯定,共产法西斯主义可以在遗传学意义上加以理解。我们可以理解它的根源和原因,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这里所涉及的不是一个单纯的弊端,而是限制和在一定先决条件下甚至阻碍发展的现象。它所产生的后果如果用哲学语言来说,可以一般地称之为革命的异化。

第二,这种机制不仅在上层建筑中起作用,而且在基础中也起作用。共产法西斯主义不仅对意识形态的、政治的和人的变化成了一种障碍,它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发展也成了一块绊脚石。一切似乎都暗示,涉及经济基础和生产方式的一切都是自发发展的,同上层建筑和人的觉悟无关。然而这是不正确的。在这方面也存在着相互作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人,首先是恩格斯,曾经强调指出,基础对上层建筑发生影响,正象上层建筑对基础发生影响一样。上层建筑可以加速、限制或者阻碍基础的发展。还必须记住,说到生产方式,说到社会的经济基础,同时也就涉及到人。生产方式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决定的。在生产力中就有人和他的专门知识、他的个人素质。为了能够适当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所有决定发展的因素都必须一起发生作用,特别是人的有独创性的思想,这种思想只有在思想完全自由的条件下才能发挥出来。允许思想对抗是绝对必要的,而由指挥中心强迫人们接受他们的意见(理由是他们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懂得在什么情况下必须采用哪一种解决办法),则是不能容忍的。

如果我们分析当前的形势,我们必须忧虑地指出,在科技革命这个今天决定经济基础发展的因素方面,社会主义国家同另一种普遍的制度(指资本主义—译者)相比,明显地处于劣势。这种形势同缺乏自由有关。但是不能这样提出这个问题;似乎我们所涉及的

是给予同发展生产手段有直接关系的技术人员、数学家和其他科学家以某种自由。一定要把技术科学同社会科学，把自然科学同人文科学联系起来。特别是在今天，在我们被迫面对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革命的时候，要想达到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经济水平，革命是不可缺少的，面要进行这样一场革命，没有思想自由，没有倡议自由是不可能做到的。

概括起来可以说，共产法西斯主义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是一种决定性障碍。甚至可以更进一步说，当两种制度之间（首先是在科技革命领域）的竞争尖锐化的时候，共产法西斯主义会把社会主义引到十分严重的危险中去。

## 结 论

这里说的是由于产业革命面必然要实现的社会主义。这种革命不象近来某些机构（甚至包括很有威望的机构）的声明和纲领中所说的那样，可通过适当的方式，按照一种新的自由主义方案来进行。为了不使人们责备我只采取一种消极态度，我要讲一些积极的东西，虽然这些东西都很一般。这里说的是这样的运动和人，他们的目的是消灭任何一种人对人的剥削，他们并且准备为此而斗争。这是社会主义理想的精髓。其它一切仅仅是对这些理想的一种解释，而且对这种解释可以作各种各样的理解。

这里说的是未来的社会主义，即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它必须适应新的条件和需要，必须适应社会生活的新的时代，而这个时代主要是由当前的工业革命决定的。这一现实将导致改变和在某些情况下取消社会主义的旧的表现形式。在这条道路上，人们必须清除一切禁忌，清除共产法西斯主义所产生的东西，清除也把传统的“社会主义”拿来使用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倾向所引起的东西。

如果我们的出发点是坚信新的工业革命会促进建立一种新型



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必然性,那么我们在分析问题时就会得出整整一系列结论,这些结论乍一看似乎很简单,但是历史已经证明,它们具有高度的普遍意义。

第一,马克思在上个世纪中叶阐明了一个规律: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可能性是同具备相应的客观和主观条件的一定形势相联系的。超越这个规律而随心所欲地建立社会主义会造成它的失败,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这就是这些国家发生危机的主要原因。

第二,同样的经验表明:没有社会的共识,没有葛兰西所说的社会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赞同(指的是这个词的最广泛的含义),社会主义就不能实现。这个要求具有特殊意义。不实现这个要求,就会使社会主义反对社会,践踏必要的前提和条件,民主就是这样的前提和条件。

第三,从社会主义的思想命题和共产法西斯主义的消极经验中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告诉我们,不可能存在没有民主的社会,也不可能存在没有持不同政见者的自由的民主,而没有一种由社会加以制度化的监督,没有政治多元化,就没有民主。

第四,如果不想把民主变成空话,就必须使民主具有实际内容,这种内容以创造相应的经济条件为前提。为此必须实行社会自治,社会自治可以防止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产生人对人的剥削。所有制必须受社会监督,社会监督必须有相应的专门机构。

第五,上面所讲的所有这些要求,首先是有关自由和民主的要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矛盾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共产法西斯主义实践的基础,它陷入了一场大危机,目前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在经受这种危机。未来的社会主义必须从所有禁忌中解脱出来,必须丢掉所有过时的或者错误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这样。

问题涉及到的首先是或者仅仅是共产党,因为社会党实际上

没有这种情况,在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本来应该表现在一个司尼基塔·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所阐述的论点相对立的论点中。批判不应当仅仅集中在斯大林个人身上(他是一个患偏执狂的病人),而应当集中在通过党和国家建立起来的斯大林主义上,集中在使所有罪行都不受惩罚的那种制度上。

第六,有些人,由于存在非常具体的限制性条件而对于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产生怀疑(这首先适用于第三世界国家)。为了使这些人放心,我想指出,这里所说的不是革命的唯一可能形式,也不是新社会制度的唯一表现形式。社会主义革命不能随心所欲地进行,因为它会带来消极的后果(我们在第三世界也可以看到这些),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人们必须无限制地忍受带来损失的制度。这种制度是可以取代的,必要时可以通过革命途径来取代。但是每个新的社会制度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考虑到国家及其社会的可能性和需要。我们希望,共产法西斯主义的幽灵对那些想用不理智的方式加快变革速度的人来说能起一种刹车的作用。

(原文为西班牙文,籍维立转译自德文)

---

## 运动和纲领——共产主义的发展

圣地亚哥·卡里略\*

所谓的现实社会主义的垮台使我们不可避免地面对作为历史运动、作为自由、平等、博爱——这是法国大革命的口号，它准确地表达了人类最高尚、最宏伟的追求目标——的人类理想的社会主义的未来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有两种可能的答案。一种答案来自社会上和政治上的右派。他们的论点代表一种可疑的看法，即认为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它没有未来，资本主义是终极的社会制度，在它之后没有什么东西了。东方国家的某些原来的共产党干部看来相当厚颜无耻地赞成这种看法。

我们社会党人提出第二种答案。我们这些来自社会民主党队伍或民主共产主义队伍的社会党人在进一步努力重新制定改造社会的条件，即根据一个世纪以来发生的矛盾的、戏剧性的事件的经验重新阐明未来的社会主义。

如果我们纵观我们这个行星的全球形势，我们就不会相信“历史的终结”，是的，根本不会相信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人类“史前史”的终结。

世界不会到发达国家为止。这些发达国家借助于今天正受到威胁的所谓福利国家虽然可以缩小当前占统治地位的制度的极端

---

\* 圣地亚哥·卡里略：西班牙工人党主席。

不平等,但并不能完全消除它。21世纪初将有70%到80%的人生活在我们所称的“第三世界”里,一条越又越深的鸿沟把他们同发达世界分隔开来。可以设想,第三世界的人口爆炸将导致在北半球某些国家中已经看得出来的,由于人口移动而造成的困难更加尖锐,这些困难既不能通过关闭边界,也不能通过管理法令一劳永逸地予以解决。如果我们这些进步力量没有能力建立起更加团结互助的世界经济、社会和政治秩序,那么,比较富裕的北半球将始终是第三世界贫困大众试图通过外流的道路,甚至将来有一天可能不是用和平的方式向它靠近的诱人的天堂。

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资本主义并非顶峰。社会主义仍有必要在它作为历史运动、作为一种理想的广阔天地里克服已经存在的和将要出现的矛盾。问题在于,关于未来的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更多的是,它不能和不该是什么样子,而不是它看起来真正是什么样子。

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奠基人的许多预言都被历史的进程超过了,因此需要对当前的现实重新进行分析并得出新的结论。

我们还知道,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矛盾不可能用牺牲自然界的办法来消除,否则,我们会危及人类的未来,因为事实上人是这个自然界的组成部分。

并且,我们知道,如果没有民主,没有参与决定,没有批评自由,没有充分尊重人权的全部含义,那么,归根结底,也就没有社会主义。

首先我们共产党人曾经不得不获得一个痛苦的经验。多年来我们都相信,苏联是社会主义的榜样。我有意使用相信这个词,因为我们的行为带有很多宗教神秘主义色彩。有时人们谈到犹太—基督教文化对革命运动的影响不是没有根据的。苏联是上帝许诺的福地,是家园,正像我入党时老党员所说的那样,是我们的家园。但所有这些信念都已土崩瓦解了。许多怀有这种信念的人

今天还不甘愿认清现实，他们仿佛还生活在梦魇之中，怀着自欺欺人的希望，以为有朝一日他们会从梦中惊醒，然后断定，现实只不过是一场恶梦。

我认为这种看法同另一些人的看法是同样不合理的，那些人目前在世界上旅行，一心只想恳求人们原谅他们作为共产党人的过云，好像这段历史是一个可耻的负担一样。有多少共产党人为了自由和民主而英勇地献出了他们的生命？尽管1917年十月革命付出了代价——这是一切革命都无法避免的，但它仍然是人类发展的一个进步。没有十月革命，现今的资本主义及其福利国家会像今天这个样子吗？最近我访问莫斯科时，人民代表科罗季奇对我说了些非常真诚的话：苏联人民所作的牺牲，为西方劳动者带来的成果比为他们自己带来的成果还要大。

我们这一代的许多男男女女通过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走向了共产主义；当法西斯主义在西方民主制国家接二连三地占据实力地位，并成为局势的主宰时，苏联一直是保护人民免遭法西斯主义之害的安全所。共产党证明自己在战胜这个危险方面比社会民主党更有效。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起，共产主义运动开始发生分裂，这个分裂在一个极其矛盾的过程中逐渐加深。它首先在西欧各党与东欧各党之间表现出来。东欧各党在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一次会议上尖锐地批评了意大利共产党人和法国共产党人的改良主义的和议会政治的“偏差”，说他们“没能力”进行革命——当时他们所理解的那种革命。此后，南斯拉夫人成了与斯大林的帝国思想决裂并实行改革的“离经叛道”分子，这种改革归结为群众通过自治实现某种直接民主。

1956年在匈牙利和波兰发生的事件也清楚地表明了共产党人中间的统一的破裂、民主化倾向的出现。这一直发展到在捷克斯洛伐克产生带有杜布切克印记的“具有人的面貌的社会主义”，这

种社会主义已经标志着公开宣布的分裂,这个分裂意味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苏共对它的控制的终结。

随着“布拉格之春”事件的发生,一连串西方共产党开始清楚地意识到它们所处的现实,以及它们自己的实践和东方各党的实践之间的矛盾。

那么,这个矛盾是什么呢?在东方掌握政权、实行专政的党认为自己是“布尔什维克的”党,是真正“革命的”党,但它们却忘记了它们是跟在苏联军队后面、而不是依靠本国人民的起义获得政权的。有时西方各党代表特别不愿与东方各党代表接触,因为东方各党代表不时公开或暗地里指责我们没有能力“接管政权”。

在此期间我们的一些共产党在西方进行了一次改良主义的和民主的实践,——我们之所以这样做,也是因为客观条件不允许我们干别的——同时还普遍地、和这种实践相矛盾地谴责了“改良主义”。

在各自的国家里都带有细微差别的欧洲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于在发达的西方只能民主地实现社会主义这一意识。这一点在1976年在《欧洲共产主义和国家》一书中已被下面这些论述所证实:“斯大林主义现象是极权主义的一种形式……,它削弱了共产党的民主声望。”“十月革命创造了一个国家,不言而喻,它不是一个资产阶级国家,但它也远非由有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国家……。在这个国家内部,斯大林主义现象发展起来,并产生了影响,出现了一系列和法西斯专政相似的表面特征。”“社会主义为了得到传播,并成为一种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推广的经济制度,就必须为自己重新赢得民主和自由的价值,保护人权包括尊重持不同政见的少数派”。

同样,在《欧洲共产主义和国家》一书中当时已经指出,“不消除1920年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之间的分裂,以及不去就科学社会主义和民主的基础取得一致意见,是没有道理的”。

毫无疑问，欧洲共产主义已接受了——在我看来当时的西班牙共产党尤其是这样——民主社会主义的原则。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已出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倾向，它和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联领导公开决裂，并遭到了勃列日涅夫（比对于社会民主主义更为）猛烈的抨击。

欧洲共产主义的这种态度的意义在于，有一段时间它符合为改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而在其中进行斗争的各党的集体主义态度。这种思潮肯定影响苏联共产党内部为改革和公开性而斗争的力量形成。当然有一些人采取个人行动，离开共产主义转向社会民主党，而且部分人早在欧洲共产主义出现之前就已这样做。但是个人行动没有产生后来集体立场所造成的那种影响和轰动。

如早已承认的那样，西方各共产党为克服民主和改革的实践与大大落后于现实的意识形态上的咬文嚼字之间的分歧却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尽管岁月消逝，却一代接一代地重新爆发的题为“改良还是革命”的论战——甚至在引起论战的具体条件已根本不存在的情况下还在进行——对十月革命的意见分歧；社会民主党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这使社会民主党的某些领导人有资格被称为“资本主义的忠实辩护士”）；此外，在西班牙的情况下与共和国的失败有关的“不干涉”政策的影响；最后是打上冲突烙印的过去留下的后果，所有这些情况非常严重地阻碍了同社会民主党的接近，困难主要存在于下述考虑中：我们共产党人对自己的错误进行自我批评，我们赞成民主社会主义，但我们绝不准备接受社会民主党的传统。我记得，当我还年轻的时候也只有少数几个社会主义者愿意接受西班牙的社会民主党传统。我永远不会忘记正是胡利安·贝斯泰罗这样的人物 20 年代末在马德里人民之家所发表的演说。他在演说中宣称，1917 年他在俄国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

## 对未来的社会主义运动的看法

我们不仅处在一个世纪的末期，而且还处在整个时代的末期和一个新的、迥然不同的时代的开始。虽然我们仍处在一个过渡时期，但是我认为，今后的趋势是：无论对这种历史，还是对那种历史，无论是对共产主义的历史，还是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都采取批评的态度。就我这方面来讲，我认为应把这项工作交给 20 世纪工人运动的历史学家去做，而政治家们另有一项任务：他们应该去设计、去想象未来的社会主义运动，以及未来的社会主义应当是什么样子。

今天，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一定的经济发展和自从葡萄牙丁香革命以来民主制所取得的进步，人们感到一种欣欣向荣的景象，今天我们在这样的国家里研究这个问题，存在着一种危险，即我们可能欣喜若狂，陷入乐观主义的梦呓，把未来描绘得天花乱坠。

法国新闻界不久前开展了一场辩论，它反映了对民主的未来的深深忧虑。鲜明地代表了法西斯观点的勒庞民族阵线，在选举中利用社会困难、利用对移民现象的根深蒂固的反应获得了 15% 的选票，并设法通过同资产阶级政党中政治上最腐败的集团结盟来上台掌权。这些以希拉克或吉斯卡尔·德斯坦为首的资产阶级党派正发生分裂：一方面那些愿意坚持民主原则、拒绝与法西斯主义者来往的人；另一方面则是政治冒险家，他们为了战胜左派，肆无忌惮地与名不副实的所谓民族阵线串通一气。他们奉行那种使法西斯主义通过议会途径在意大利和德国夺取政权的策略。人们看到，民主的未来毫无保障，它需要我们经常保持警惕并进行政治斗争。

此外，我们面临的还有科学技术革命的前景、自动化装置得到



越来越多的运用的前景、以及生物工程的前景。这些前景，正如亚当·沙夫所一再宣称的那样，是历史上最不平常的革命，它们本身并不能担保会出现平等与团结互助的未来，出现一个自由的制度。它们甚至可能容许新形式暴政的产生，某些政治空想著作的作者已经对这种新式暴政作过预言了。

如果我们进入——看来我们显然正在这样做——这样的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的体力劳动被废除了，信息与科学构成生产力，在那里通过改造基因甚至生物的类型也可以预先确定，那么，在这种社会里，社会结构和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将成为重要的基本问题。

如果结构和意识形态继续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依靠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依靠享有特权的少数人——不管他们由哪些人组成——对经济权力的占有，那么，我们担心，将会出现一个社会非人道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将损害今天整个进步力量的基本价值，自然也会损害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

无论如何，从目前这种社会（在这里机器人还没有把男人和女人排挤出体力劳动，或者说最多不过是把一部分人非挤出体力劳动）向另一种社会（在那里人被排挤出体力劳动将成为普遍的现象）的过渡会遇到非常多的冲突。首先，在社会道德领域，在对人的劳动（这是人与社会生活的基础）的看法方面，在对劳动在历史进程中所具有的整体意义的看法方面就是这样；这种意义最初表现在下面这句话中：“你必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但它也表现在实际领域：越来越多的人被排挤出生产，被限制只能起消极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今天工会提出的充分就业的要求还能被证明是现实的吗？一个以私有制原则为出发点而不是以社会原则为出发点的制度，难道不是肯定会建立一个真正的犹太人隔离区吗？对这个隔离区起决定作用的将不再是肤色或信仰，而是工人被排挤到一旁，与生产机器不沾边。

如果出现这种形势，那么，一场空前规模的、会带来不可避免的政治后果的社会冲突的爆发是可以预见的。换句话说，如果不发生也会危及社会平衡的变革，这场大规模的科技革命的发展就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在这里谈的是今后 30 至 50 年内可能发生的过程。我们这一代人不可能在这段时间以行动者的姿态出现。但是年轻人会很好地熟悉和体验这种可能性。许多人今天在寻找工作岗位时已经体验到的困难，从根本上说也可能只是他们以后将会碰到障碍的预兆。

因此，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之初，重新开展能够向自己提出一些基本是崭新的问题的社会主义运动确实是迫切必要的。意识到这种必要性也许是所有认真研究社会主义未来的人的主要任务。

今天，这场运动可以以社会党国际和互相配合的，尽管决不是统一的国际工会运动为核心而团结起来。今天除了社会党国际之外没有任何国际运动。尽管人们可能对社会党国际过去的历史提出批评，但毫无疑问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争取一个更合理、更团结的社会的斗争——在一个以世界规模来考虑贸易和经济的时代，在一个将成立大的区域联合体，而国家主权将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从属于它们的时代——如果要获得胜利，就不能在有限的民族范围内、在没有真正的自主决定的条件下进行；而必须在这个大联合体的范围内、甚至超出这个界限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社会主义力量、左派力量及进步力量的行动如果不具有世界规模，就会冒证明自己毫无用处的危险。社会党国际的力量由于为改革而奋斗的苏联人士，由于经过更新的、源于共产主义的党派，由于解放运动，由于各种保护环境的潮流，由于妇女解放运动而得到加强，它的行动能代表足以胜任时代新任务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新阶段。

关于民主社会主义，我想强调指出一些本质的东西：这种社会

主义不应重犯维利·勃兰特在他的回忆录中称之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及其领袖对纳粹主义所表现出的怯懦和投降的那种错误。民主社会主义必须是一个富有斗争性的运动，它在民主的权力机构中确立自己的地位，但它特别重视这些机构和群众的联系，群众的参与政治活动以及这些机构动员群众和对任何反民主的企图给予抵抗的能力。

现代社会主义运动必须作好准备不惜一切代价去捍卫并进一步发展民主。

在我国，我们今天确认，在民主自由方面已经达到了令人满意的程度，首先是与我们那过去还不太久的独裁专制时代相比较而言。在我们的欧洲环境中也存在着民主制度。但是难道我们可以把这些成就看作是一成不变的吗？在一个面临像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日益加深的鸿沟以及科学技术革命的开展这些挑战的世界中，难道不会出现破坏民主的危险吗？人们不无道理地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巩固和进一步发展民主是一项应天天重复而且不容忽视的任务。

常常有人断言，我们生活在一个技术统治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没有意识形态的地位，因而左派与右派之间的对立不再符合现实，已成为过时的东西。我认为，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对不同的情况作出明确的区别。根据我的印象，在涉及当今的一些问题——例如，保护自然界，从而保护人类的未来的必要性问题，或者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核灾难的必要性问题，以及使风俗和生活习惯世界化的必要性问题——有一些人，甚至包括资产阶级出身的整个整个的社会群体，他们本来是会赞成右派的观点的，现在却对新的现实有了认识，并在许多问题上与社会主义政策的支持者观点一致。这里当然谈不上用意识形态的障碍来封锁人类在维护共同利益方面可能同样关心的领域。然而这种看法与左派和右派根本不会再发生对立的结论二者之间有天壤之别。右派的意识形态仍很活跃，它

对人权和人道主义毫不感兴趣。我们在一些民主制度相当稳固的国家中，从排外情绪和种族主义的重新抬头中体会到了这一点。右派的这种思想财富有时甚至能渗透到具有传统左派倾向的民众之中；社会现实是非常复杂和矛盾的。此外，右派很会利用民众主义和煽动手段，使右派得以滋长并使之保持活力的那些利益继续存在着，这就要求左派提高警惕，保持自己的警觉。

我还想就新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标志说几句——我说新的社会主义运动，尽管它的核心是具有一段悠久的，但却往往是并不十分光彩的历史的国际。首先，我想强调一下我的一个观点，即这个运动或者政党必须带有还政于民的印记，也就是说，它不应该代表传统的哲学倾向，而应该首先为达到民主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目标而联合起来。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把社会的不平等与不公正、把某些阶级和人民对其它一些阶级和人民的压迫与剥削远远甩在后面，在为最广泛意义上的人权而奋斗中，在实现裁军、和平与国际合作这个目标上团结起来的社会。

在这样的运动或政党当中，不仅有来自社会民主党传统的人的位置，而且有信仰马克思主义并视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门需要适应现实的科学的人的位置，还有来自基督教运动或其它宗教运动、但倾向于社会主义的人的位置，还有认为在一个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里人们将享受到最充分的人权的朴素的人权捍卫者的位置。

因而这里谈的是一个通过共同纲领联合起来的党，但它有各种不同的文化思潮。在这些思潮中会有一个符合准则的，会带来丰硕成果的对立面。这个党会是非常民主的，党内会出现大量不同意见，但它在行动上是一致的，这个一致的基础就是已经通过的纲领。对此有人会提出异议，说我对社会主义政党不是一贯这样设想的，这种异议也许是有道理的。但是扔第一块石头的人谁没有罪呢？我认为，在目前的历史情况下走这条道路是最有成功希望的解

决办法。

### 纲领的意义

在本文的开头我曾写过，关于未来的社会主义，我们所知道的更多的是，它不该是什么样子，而不是它将是什么样子。这种论断肯定含有一点夸张的成分。我认为，未来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我们和它是和睦相处的——之间的差别不是量的差别，而是质的差别。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终究将是继资本主义之后的、并战胜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中间阶段，这些中间阶段绝不是和 100 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想象的一致，它们与其说取决于政治上的唯意志论，不如说取决于生产力的实际发展。第一个要求必须是：不要把还不是社会主义的东西称为社会主义。

此外，必须从我们会在资本主义留下的遗产中找到不少社会主义的工具这一原则出发。马尔库塞的一句话对我一直有很大的吸引力，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以前描绘的福利国家的景象符合介于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奴役与自由之间、极权主义和幸福之间的一个错误发展阶段。

如果这个论断是正确的——许多人都表示赞成——那么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今天某些为资本主义服务的机构也能为社会主义服务，只要用国际层次的政治行动来改变它们的实质就行。例如，今天对计划方案的激烈批评是从自由派经济的意识形态立场出发进行的。但是，多国际采恩难道就没有利用计划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没有在一一定的——肯定不是随意的——限度内推行计划吗？当欧共体下令改造这项或那项工业时，这难道与计划无关，与国际分工无关吗？而且这绝不是以一种按照预先通知的方式，而是以极端独裁的方式进行的。

如果你读过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西班牙经济的报告这类

文件的话,你就会确认,在这个报告中,除了厂主的收入外,对所有的问题应当如何处理都作了规定,而且几乎是详尽无遗地列举了西班牙政府应当采取的措施。事实上情况的确如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一切国家——不管它们的实际情况如何——准备好的都是同样的可以说是单行道的解决办法。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乌干达提出了一个有利于所谓“负有投资使命”的阶级、即资产阶级的把收入转换成外汇的办法。然而这个资产阶级实际上往往把他们的收入用来购买奢侈品,而不是用来进行生产投资。

人们以新自由主义的名义用一只手制止国家干涉经济,而为帮助和促进这些或那些资本主义集团却用了另一只手,不仅动用了国家的资金,而且还使用了由国家建立的区域性的或遍及全世界的工具,这就是说,直接干预经济,而且,总是为了替资本主义集团服务和为了它们的利益而进行干预。

对此我想说明一下,在资本主义本身中正在形成一些与其说适应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经历过它的形成过程——,不如说适应社会主义世界经济所需要的工具和结构。

我认为,当前关于未来的社会主义的辩论应当朝下面这个方向发展,即在社会中造成广泛的社会主义意识,使一切把社会主义看作是灾难,认为这种制度想使富人变穷,使一切道德价值失效,并把社会搞得天翻地覆的观点都站不住脚。实际情况看来是这样的: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会产生一个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这个制度不是照顾一个群体、一个阶级的利益,而是照顾社会的集体利益,照顾共同体全体成员的利益,而不是照顾共同体少数成员的利益。自然的发展不会自动地给我们造成这种状态。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决心进行大胆而明智的改革和改造的男人和妇女采取坚决的行动,以便防止科技革命的发展和发达世界与不发达世界之间的鸿沟引起宇宙范围的大混乱,防止享有特权的人通过自己活动在这场大混乱中制造新的、也许是无法想象的、可能意味着人

类终结的灾难。

在欧洲的实践中已经可以看出,使促进昂贵的技术发展所必要的积累成为可能的经济政策,很难与名副其实的社会福利政策协调起来。在现存制度中,这一点反映在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之间的对立上,还表现在税收政策的改变中。这种税收政策直接地或通过间接税收增加劳动收入的负担和减轻资本收入的负担,从而实现与迄今经常有效的累进税观念的决裂。

另一方面,这意味着这项税收政策减少了社会保障,因为它使社会保障私有化,使社会保障所需要的费用更加昂贵,并一再地以技术发展需要更多积累为理由推走社会政策所需要的资金。

这是今天一方面在工会与企业主之间,另一方面在工会与政府之间逐渐发展的辩证法。在现存制度内部,左派如果参加了政府,那么它在实现自己的社会政策方面会遇到困难,如果它不愿被人指责使技术进步陷于瘫痪的话。反之亦然。

从这种形势出发,就应该制定一个能消除经济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对立的改革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纲领。在这个纲领中必须预先确定要实现的目标和阐明要在国际层次采取的措施。因为这样的改革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实行才能获得成功。一个国家单独干是很困难的。

如果考察一下现实,那么开始解决这类矛盾的办法之一就是大幅度削减军费开支。这将意味着在经济领域消除最落后并且对社会集体利益最危险的工业部门。但归根到底,最重要的目标在于使经济进步与社会进步相互协调起来,因为如果没有经济进步,社会进步必定会停滞不前。反之亦然。如果没有社会进步,经济进步就会被用来服务于除人道主义事业以外的任何事情。这个目标要靠导致逐渐废除阶级差别和少数人的特权的变革来实现,也就是说要靠具有社会主义内容的变革来实现。

制定一个被奥凯托称作“坚强的改良主义”的纲领——虽然名

字并不是最重要的——，在我们这个时代就能为不断壮大的，可以把越来越广泛的社会阶层融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主义运动提供理论根据。这是当前的一个首要任务。

（原文为西班牙文，张为民转译自德文，李俊聪校）



# 历史的开始

曼努埃尔·卡斯特尔斯\*

如果把一种特定的生物的历史理解为这种生物具有表达自己与其它生物的不同之处的能力,而在涉及人类时,指的是他们有能力创造可以转化为物质形式的精神世界,那么,人类的历史不是临近结束,而是刚刚才开始。

## 出发点?

几千年来,男男女女日复一日地为自己生存下去而斗争,为抵御无情的大自然的严酷而生存下去,在具体的现实中,大自然与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家根据当前工业社会所带来的舒适而描绘的田园诗般的自然图画相去甚远<sup>1</sup>;为逃避在欧洲一直肆虐到18世纪的瘟疫和饥荒而生存下去<sup>2</sup>;为反对来自对弱者为所欲为的专制国家和专制统治的蛮横无理且又令人窒息的压迫而生存下去,这种情形是无所不在的,以致可以说,人权大概是我们人类在历经天灾人祸的漫长路程中享受得极少的宝物<sup>3</sup>。而首要的是,在战争中幸免于难。战争这个不断出现的生活和计划的破坏者,几千年来,

---

\* 曼努埃尔·卡斯特尔斯:西班牙政治学教授、新技术社会学研究所所长。

并且直到几年前,同样是几乎每一代人的残酷的经历。经历过战争,回忆战争并且面对战争随时会再度爆发的可能性,这些曾一直是人的个体存在和集体存在的关键因素。战争就像春天和夏天那样在某个时候出现在人的生活中,随之而来的是和平,和平总是受到威胁,总是处于岌岌可危的战争状态并且被野心家的诡计所出卖。饥饿、疾病、刑讯、监狱和战争,无论它们是现实中的还是仅仅有发生的可能,迄今都在不同程度地塑造了人类生存的基本特征。

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期或许是历史上少数几个使“革命”这个词获得真正含义的时期之一。因为当前,欧洲以及所谓北方的其它地区所处的地缘政治态势——它使希望萌生,尽管界限不确定——对于绝大多数人,因而对于社会本身来说,似乎已达到了这个程度:即克服了极大的物质匮乏,争得了政治上的自由和人权,并且特别是和平已作为日常经历和未来的前景面出现。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可以把当前发生的过程——这个过程至少可能是这样,但愿它会是这样——看作是离开史前时期的隧道。在这个史前时期中,自然(即粗野的暴力)控制着人类,权力机器(即武装的专横)压制着社会,战争(即有组织的摧毁)折磨着人的肉体并成了生活中不断令人惶恐不安的因素。我们认识了历史,认识了我们支配并驾驭作为自身发展的社会的能力,不用说,这个社会包含任何人类团体所共有的一切矛盾和冲突,但是,它们处在共同生活、理智、合作和意见一致的自由空间。

当然,不公正、统治和某种意义上的暴力仍会继续存在,但是,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大部分地区,形成了一种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和道德的制度,它为真正人道的和人文主义的文明创造基础,这种文明产生的价值为绝大多数人所共有并得到他们的维护;这种价值使社会的共同生活、政治的合法化以及经济的进步上升为决定社会组织性质的因素。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超越了必然王国(尽管不是多种多样需求的王国)而达到了自由王国(尽管捍卫自

由的斗争从未完全停止过)。同时,由于人类充分认识到了这种自由,他们就能够开始创造自己的历史,而不是使自己在历史中终止生存;就能够为使自己作为人而完全实现自己生物上的和文化上的一致性创造种种前提条件。

## 巨 变

如果我们暂且不谈这个星球上的一些地区(当然,我们在分析过程中还会提及这些地区,把它们纳入总体的考察中),而把注意力集中到历史转变过程的地缘政治中心即欧洲,那么,这种巨变可以归结为三大相互关联的过程的汇合,从总体上说,它们意味着两大军事集团之间的战争结束了。这些过程就是:信息领域的技术革命、世界经济和西欧政治的一体化以及作为一种体系的共产主义的灭亡。尽管这三个过程已为人们普遍知晓,但是,指出它们的特征,以便能分析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且指明它们同时在历史上出现的意义,是很重要的。

作为 70 年代的重大发明(追忆一下:1971 年发明了微型信息处理机,1973 年人工合成脱氧核糖核酸,1975 年发明了个人计算机)的成果而在 80 年代日臻成熟的技术革命,体现了我们的生产能力和管理水平在质上的飞跃,因为,它使科学进入了信息的生产、加工和传递,从而进入了人类活动的中心过程<sup>4</sup>。信息对于当前发生的革命所起的作用,同能源对两次工业革命的作用一样<sup>5</sup>。信息也像能源那样,对人的全部活动发挥间质的作用:因此,这是一场技术革命,它涉及整个体系,而不是仅仅涉及生产过程和劳动领域,尽管它主要发生在这个范围内<sup>6</sup>。这场技术革命集中于信息领域这种情况,在历史上第一次把社会的文化和科学效能同生产力的发展直接联系在一起。这是因为,这种联系实际上是通过一个社会性的、机构性的和企业性的组织建立起来的,该组织使操纵数

据的能力成为信息的生产过程<sup>7</sup>。随着受编制好的程序支配的机器接替了生产劳动的物质部分,编制程序的能力,换句话说,赋予符号发现以一定结构的能力,在检查经济生产力和军工技术力量,即在检查财富和实力的源泉方面,成为关键因素<sup>8</sup>。在这个过程中获得的技术效能如此巨大,以致只要社会能够克服从它所固有的组织中产生的种种障碍,就会出现普遍过剩的物质基础。众所周知,在西欧农产品结构性生产过剩取代了饥饿;在美国3%的劳动人口生产的农产品足以养活全国,此外还能有50%的产品出口。而把生物工程和信息工程引入农业才刚刚开始。同样,我们在90年代还会看到,信息化和传真通信网络将如何全面地渗入到服务行业,从而有可能使这些部门的强大生产潜力释放出来。于是,我们的经济全面增长的一个极大障碍将会被消除<sup>9</sup>。随之而来的是必须使技术现代化并同时扩大世界市场,需求应当与供给方面的特大大进步相应增长,以使供求平衡<sup>10</sup>。

从这种关系上看,80年代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种全球性经济这件事也具有决定性意义。这远不仅是指经济的国际化过程,还指经济的一体化<sup>11</sup>。历史学家们很久以前就指出过,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反映出来的制度<sup>12</sup>。经济的国际化是一个异乎寻常的过程,自50年代以来它大大地加快了。与此相反的一个全新的现象是,单个国家(特别是指在经济合作和开发组织中联合在一起的国家)的各经济部门深深地相互渗透,以致形成了一种唯一的经济现实,即一体化经济,在这种一体化经济中,资本、劳动、商品、服务行业、技术和信息每日每时都在超越国界而彼此交织在一起。这样一来,国民经济作为管理和规划生产活动的统一体的职能最终过时了。因此,这不仅是指世界成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更多地是指经济活动在这一期间已经以世界规模展开,而且这种经济活动既包括大型跨国企业(即新经济秩序的主角),也包括那些通过转手承包以及适应市场需求提供商品与国际事务发生

联系的中小型企业。最后,还指这些国家本身,它们已经不能够继续在本国范围内推行其经济政策,而必须代之以着眼于全球范围的政策,并且是以从国家的角度确定的社会政治利益为基础。

这种一体化经济和在所有部门互相渗透的世界体系之所以可能形成,就是因为最近这个时期发生了技术革命,形成了以传真通讯网络和声像通讯网络的全球系统为基础的信息系统<sup>13</sup>。

在一个不可分解的体系里,经济上和技术上的相互渗透,从客观上看,使大型管理单位受益,因为在世界体系内部,它们拥有优势,而且是既在市场规模方面又在科技手段和在社会权力中所占的政治份量等方面拥有优势<sup>14</sup>。这一点特别适用于美国,它基于自己特有的历史形成进程在这个新体系中获得较大的好处。日本善于通过下大气力拓宽自己的国内市场和提高本国的技术效能来使新模式的第一个发展时期达到充分的临界点,尽管日本基于本国资源的贫乏在将来或许不得已而采取扩张战略。欧洲不得不作为历史性的集体作出反应,以防止它的个别国家作为孤立的并且等级较低的成员在一个以太平洋为轴心集结的世界中一体化。法国的民族主义和德国所面临的向欧洲东部敞开大门(从一种已为最近的历史证明是正确的观点出发)的必要性,以貌似矛盾的方式为欧洲的加速统一创造了前提。这是对欧洲各个国家在经济上、技术上和战略上发展成为美日轴心的卫星国这种日益增长的趋势的回答。欧洲条约,对1993年的展望和政治欧洲的加速建设,要不了几年就能使世界最大的市场形成,使科技手段大规模集中,并造成一种从政治上干预改造世界秩序的过程的集体能力。欧洲撇开了一切差别和国家间的争端,已从根本上懂得了如何应付它由于最近10年经济和技术的转变而面临的历史性挑战。

但是,使一个时代的转换面不仅仅是世纪的转换明朗化的历史事件是:共产主义的灭亡。共产主义曾经是历史的现实,是人类史前时期的价值的空想主义代表者。共产主义的崩溃,或者从某种

意义上说是自杀，来得如此突然，如此迅速并表现为历史的不可避免性，而这一切是和我谈到过的经济上和技术上的结构性变化密切相关的，否则就无法解释这样一种制度的衰亡；它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顶住了一切社会压力，遏制了被苏维埃政权奴役的各国各族人民对自由的所有渴望；一些重大的起义，例如 1953 年在柏林，1956 年在波兹南，1956 年在匈牙利，1968 年在布拉格或 1970 年在波兰等地发生的起义遭到镇压就表明了这一点。东部国家的社会运动和争取民主的斗争不是这种制度的上层所引发的变化的原因，而是其结果，尽管这些民主化运动一旦得到允许，甚至得到支持，就会远远漫过它们原本应当注入的河流的堤岸，直至最终强大到能以意想不到的速度将苏维埃政权带来的变化导往一个始料未及的方向。

我们仍然处在东欧新社会和新政治制度形成的过程中，并且有一点还完全不清楚，即共产党或者其继承人在苏联、保加利亚、匈牙利、南斯拉夫是否会从屏幕上消失殆尽。在条件不同的地区，如中国、越南和古巴，就更难说了，在这些国家，共产党曾是本国历史上民族解放运动的起决定作用的组成部分。而在东欧业已消失，在苏联（可能还在世界其它地区）正处于解体之中的，是我多次分析过的那种特殊的共产主义制度<sup>5</sup>，这种制度的特征是党统治国家，国家统治社会，它是靠中央控制的国家计划经济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规定为强制性意识形态来维持的。历史的转变已经挖了这个制度的墙脚，但是，它还没有完全坍塌，因为这个制度当年的社会主体还远没有消失。无论如何，在整个东欧，除阿尔巴尼亚，或许还有南斯拉夫以及罗马尼亚之外，人们已经可以谈论民主形势了——尽管还有过渡过程必然产生的种种限制。同样可以说，苏联看来正不可阻挡地朝着市场经济、政治民主化和非殖民化方向发展。毋庸置疑的结果将是苏联这个国家确定新的机构，苏联分崩离析为一系列主权共和国——它们将来彼此间的联系还是个未

知数。

为什么并且如何发生了这次意味着共产主义灭亡的历史大转变,又为什么恰恰现在发生?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因为目前正在发生的过程是可以逆转还是不可逆转——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表述的话——从长远的观点看,取决于这个答案。我的建议是:这种制度的革命必须同最初以改良的方式设计的改革方案结合起来,而这个方案又必须同在 80 年代表现为一种新的历史模式<sup>16</sup>的经济上和技术上的变化结合起来。戈尔巴乔夫和苏共的改革派结合着赫鲁晓夫提出的问题,经过对僵化思想的各种冲击,终于在勃列日涅夫死后掌握了政权,他们立志要消除这个基本的似非而是的现象:革命成功近 70 年了,而在世界上这个最大的国家,尽管它的资源不可估量,它的人民勤劳并受过教育,但它的条件却越来越不如西方工业国家;条件坏到这样的程度,以致苏联成了在近 10 年里儿童死亡率上升的唯一国家。同时,由于苏联的微电子、信息和传真技术落后,又由于它的科学和工业手段集中在军事工业综合体方面,苏联没有能力补上信息技术革命这一课<sup>17</sup>。于是就出现了这种离奇的情况:一个社会至少将本国总产值的 15% 和预算的 25% 用于军事目的,整个整个的部门都被置于军方的监督之下(如电子、传真通讯、宇宙航行、造船业、重型卡车制造业、化学工业的大部分等等);但尽管如此,苏联的军事机器——它不能充分利用一个灵活机动的军事战略所必需的分散形式的信息技术——却由于美国 1983 年按“星球大战”计划发起的技术上的竞赛而有迅速过时的危险<sup>18</sup>。共产主义制度既在物质财富方面又在军事力量方面达到了极限,并且从内心里意识到自己历史性的失败。

从阿甘别吉扬的经济计量学著作中可以看到,1971 年以来,苏联国内总产品增长率如何下降,以致正好在 1985 年达到了停滞阶段;增长的源泉如何相应地从量的因素(资本和劳动的增长)转

变为质的因素(技术工艺、企业领导,资源使用的灵活性和效益)<sup>19</sup>。事实上,戈尔巴乔夫——作为农业工程师,他对苏联农业的难以置信的失败有切身的体验——的最初的改革是针对机床制造业的,希望这个工业部门的新技术方法的引进将会波及苏联的整个生产网络。然而,在这种技术工艺现代化的技术统治过程中,出现了在其它国家和其它制度下出现的同样的情形:在低效管理下提高技术效率,结果是增加而不是降低低效的程度。因此,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前后就认识到,不搞经济改革便不可能实现技术工艺现代化和企业现代化。但是,他也认识到——这一认识证明了他的卓识远见——如果他不缩减军费开支(这是裁军并从而真正实现缓和的前提),就不可能拥有必要的资金来补救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重重矛盾;而如果他不同时在自由化的标志下实行民主开放,他就没有不可或缺的政治资本来进行这种补救。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公开化、裁军以及放弃对东欧殖民化这一促进和平的、值得信赖的举动,都是必要的因素,它们同属戈尔巴乔夫以实用主义的、很少受到监督的方式制定的那个战略。但是,由于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开放,社会问题和被压迫民族的问题都爆发出来,这些问题使改革最终乱了套,使戈尔巴乔夫不得不就自己的行为方式进行商讨,而越商讨他就越是落在苏联国内发生的种种事变的后面。其结果却是——尽管很有保留——加速共产主义制度的崩溃;苏联放弃在军事方面行使大国的权力。

许多不同因素的汇合已经结束了冷战的局面。这些因素包括:技术工艺革命、经济体系走向一体化、欧洲的统一、西方七大国合作体系的保持、共产主义的终结、东欧民主化以及苏联实际的和平主义。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的倒塌揭开了历史的新篇章。在短的时间内,我们看到了军事集团的末日,甚至可能看到苏联将来与大西洋联盟联合的看似荒唐的局面。



## 人类社会新的历史性分裂：第四世界

如果我们注意到，当前发生的变化在世界各不同地区和在各个社会内部是有选择的和不均衡的，那么，这些变化所展现出来的前景就十分阴暗了。尤其是，在我们的星球上每天都有上千儿童在死亡；在几乎所有的纬度上，成百、成千、乃至成万人还在因战争而丧生；刑讯是现今多数当权政府的日常活动；政治自由和人权对于许多民族来说依然是没有实现的梦，在这种情况下谈什么反对饥饿和疾病的斗争取得了成功，无疑是个辛辣的讽刺。工业化的民主社会必须明了，它们是波涛汹涌的人类——它的绝大多数不得不忍受着痛苦——大海上的—座和平、自由和福利（即使把这些概念高度相对化）的孤岛。

然而，这个基本的和必要的提示不能掩盖如下的认识，历史上新的一页已经开始，尽管重要的是，应当把我们当前所经历的历史转换过程放到这个过程所产生的贫困和压迫的总体联系中来看。进一步说，“新的历史”的共同创造性和人类社会大部分地区实际的消极状态之间的对立，可能引发破坏性过程，对来自新时期的促进转变的动力起反作用，或者甚至完全抵销它。为了能了解和判断这个潜在的破坏过程的强度，必须明确地弄清楚，哪些社会是在新发展中被排挤到局外的社会，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sup>20</sup>。

公众舆论中有个广为流传的看法，说第三世界总的形势在恶化，或者说，北南之间发展程度的差别将普遍继续增大，事实上，这些说法是根本不切实际的<sup>21</sup>。虽然非洲和拉丁美洲在80年代经济增长出现停滞（在某些地方，例如在秘鲁，国内生产总值甚至大大下降），而在整个亚洲，近几年来经济却保持年平均增长6%的势头<sup>22</sup>。而且，占世界人口67%的人生活在亚洲。这样的增长不仅仅局限于“亚洲四小龙”，它们在前25年里的发展过程证明，在新的

世界秩序中,处于落后状况和从属地位的国家也可能出现经济繁荣。这样的增长还发生在其它国家:80年代,中国的增长为8—10%,泰国为11%,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介于6%和7%之间,而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也呈现出明显的活力,经济增长在80年代后几年达到了4—5%。甚至在拉丁美洲,智利经济焕发出生命力,墨西哥经济复苏,巴西南部工业区企业出口取得成就,玻利维亚继1985年的极度通货膨胀之后出现经济稳定,这些都表明,债务负担不一定是埋葬所有为争取发展而付出努力的墓穴<sup>23</sup>。认为第三世界很糟,是剥削它们资源的那些不讲团结的北方国家的牺牲品,这种简单化的、宿命论的、陈旧的观点从经验上看是错误的,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作这种一般的概括也是不合适的。更糟糕的是,把问题简单化和一般化的做法妨碍人们恰当地诊断整个星球遭受的严重危机,堵塞了克服危机的道路。

所谓的第三世界正在经历的根本性过程是它本身的解体,即一个相对同质组成的形体在消亡<sup>24</sup>。南朝鲜或新加坡就经济和社会发展来看,更接近于欧洲而不是接近菲律宾或印度尼西亚。但更重要的是,从社会来看,圣保罗更远离累西腓而不是马德里。的确,甚至在圣保罗州本身,阿维尼达—保里斯塔和工人城奥萨斯库却从属于不同的社会经济态势,具体地说,不仅在社会不平等方面,而且在发展动力以及文化环境方面都有所不同。第三世界已不复存在,有两个因素清楚地表明它将来的矛盾的发展:一方面,那些尽管处于重重矛盾之中,但都在逐渐适应世界高度发展的新模式的国家、地区和城市的发展过程不平衡;另一方面,一部分国家、地区和社会集团继续与整个经济和社会分离,它们对于整个制度已失去了职能上的和经济上的兴趣,因为它们过于贫穷,以致无力形成市场;因为它们过于落后,以致不能作为劳动力在以信息为基础并使原料的相对价值迅速降低的生产体系中发生效用。至于我在其它文章中说到的“新的依附性”<sup>25</sup>,是实质上与技术落后变得日

益严重联系在一起的现象,它导致社会的分裂,使由社会中分化出的各部分被零散地划入相互依存的全球网络。由于这个过程,所有的社会都陷入落后状态。但是,一个很大的区别在于:居民中有多少人已适应了高度发展的新模式;在这种一体化过程中,以信息为基础的生产体系的各个部分都起着什么作用。这个历史时期在我们地球上相当一部分人被隔离在外的条件下就这样开始了,但是,人们不能仅仅从北南之间危险的简单化的对立这个框架看待这种情况,而必须以复杂得多、全面得多的方式找到解释。一些社会集团、文化、区域和(在某些情况下)国家,对于推动经济发展和在体系中具有的功能的必要性来说将变得微不足道。这样一来,它们将发展成为社会问题(从而成为国际公共秩序的问题),或者发展成为道德问题,并将不再是权利平等的社会。

无论是在南布朗克斯、在拉库尔讷沃、在安第斯山脉的高原地区、在加拉加斯的贫民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贫民区、在秘鲁的“年轻的村镇”、在阿尔及尔的棚户村,还是在被“白色革命”的现代化手段夷为荒野的伊朗村庄,凡是被以上述方式淘汰出来的人,都在负隅顽抗,以免被抛入星球的垃圾堆,那里围绕“新历史”的发射台四周聚集着人类中派不上用场的残物。被淘汰者的反应形式多样,但总是和以下几种现象交错在一起:

(1) 一帮帮天不怕地不怕的青少年进行暴力斗殴成了家常便饭,他们搅得第四世界城市中的大街小巷不得安宁,而他们并不为无端的凶杀感到畏惧,反而以此来证明自身的存在;

(2) 边缘地区被隔绝的经济与世界经济中枢取得在我看来是违反常情的联系,这种联系是通过毒品交易和其它违法行为——走私、非法武器交易、拐卖妇女、洗钱等等——建立起来的,据某些估计,它们的总价值可能超过了全世界电子工业的价值;

(3) 由绝望而酿成的集体的、几乎毫无政治动机的突发事件,属于这一类事件的主要有大城市例如圣保罗、加拉加斯、罗萨里奥

以及其它许多城市中的抢劫行为。同无数类似的事件一样，这类突发事件在世界新闻界不会见诸报端：

(4)特别是无理地、愚昧地呼吁文化、人种或宗教方面的统一，这种要求以狂热的原教旨主义的形式出现，不论它是宗教(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的变种还是意识形态(像秘鲁的“光辉道路”组织那样的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狂热)的变种。如果新体系的发展使世界人口中举足轻重的部分降到无足轻重的地位，那么，遭受如此冷遇(就算是没有受到剥削)的个人和社会就会认为自己降到下等人的地位，他们会自己着手重新确定表明人这个概念的标准，以此作出回答。他们称那些属于新体系的人为非人类的生物、“不信真主者”、“魔鬼”或“剥削者”。一旦这样来解释将要发生的情况，那么，由此迅速得出的逻辑结果是爆发自取灭亡的反抗或者毁灭性战争，向另一个极端走到底，也就是说，直到不加区分地、普遍地推行恐怖主义——被淘汰者的最后武器。原教旨主义的恐怖将是(或者说已经是)21世纪的世界大战。

不触及、探讨并解决地球上很大一部分地区被淘汰状态以及不发达状态这类实质问题，人类就可能一开始便埋葬它的共同希望。所谓的文明不可能仅仅存在于一个由电子设施和移民局防卫的岛上。

### 历史更替的艰难过渡

历史，不论它是神的造物还是生产力的逻辑产物，在任何时代都不曾是超越社会意义的预先规定的路程。已经开始的新的历史同样如此。实际上，展现在人类面前的宏伟前景主要取决于，如何从仍是我们当前的一个重要部分的历史遗留问题出发，制定并引导向新的社会过渡。当前是政治时期，是重大政治时期，这种政治是旨在转变我们的命运及今后几代人的命运而采取共同行动的

能力。与餐桌常客们自发的外行想法相反,政治从未如此重要,政治的内容对于社会日常生活从未起如此关键性作用,这一点是可加以证实的——当然不是在本文中。因此,大可不必去留意在我们的许多社会中,公众舆论尤其是传播媒介是怎么热衷于张扬人的微小不足之处,这些不足之处在任何国家都总是一切行为的附随现象;特别是在目前时期,出现了一些重大的集体辩论,辩论的结局还不明确,辩论的内容关系到人类的未来。历史过渡的政治应当承担起一项在战略上起决定作用的任务。

虽然共产主义的灭亡已是不容改变的事实,但对于苏联的政治形势还决不能这样说。这种情况正是这个过渡过程中的薄弱环节。很多事情恰恰取决于:苏联——当今在各个方面仍不失为大国——国内局势的稳定,继续在各民族协同合作下朝着和平、福利和民主发展。苏联正面临着中央控制的经济崩溃的考验,例如消灭插手经济的黑手党,使政治体制民主化,以及在机构上肢解苏维埃帝国,帝国解体后将组成主权国家的新联盟等等。而危险不仅仅并且主要不是来自苏联国家机器和党的机构中的保守势力,危险主要来自军事工业综合体的决策者,他们正受到失业的威胁,受到各加盟共和国中类似黑手党那样的强大地方组织的威胁,受到过分的、要求民族统一的民族主义(包括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威胁,受到中亚地区加盟共和国的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和蛊惑民心的宣传的威胁,这种宣传有可能为了突出他们的领导人的个人作用而破坏引导改革的政权的稳定性。苏联改革的重大过程尽管由具有非凡远见的、大胆机灵的人物戈尔巴乔夫领导,还是遇到了政治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的反抗,他们都极不成熟,他们往往使用纯道德的论证,结果导致政治上的不负责任。事实上,就我从1989—1990年苏联的现实中所能得到的直接认识来看<sup>27</sup>,有一个极其意外而又极其深刻的印象铭记在我的脑中,这就是:唯独克格勃成了稳定并使改革逐步完成的一支重要力量,它已对国家和对苏联作为世界

大国的利益的连续性承担起责任,以使社会制度的过渡过程在不受重大挫折的情况下完成。

不管这个基于个人印象的看法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实际,但在苏联开始爆发的巨大的离心力量和巨大的革命力量——为什么不应该这样称它呢?——被置于控制之下这一事实对于世界规模的整个历史性改革看起来是很重要的。如果一方面是以极强大的力量出现的各式各样的社会运动,另一方面是毫无前途的国家机器,两者之间发生冲突,并且国家正处在经济混乱和缺少政治媒体的状况,那么,转折的倒退是可以想见的,但是,正如苏联的政治学家们——他们同我一起参加过1990年5月由共青团学校组织的有关专题的讨论会——一致认为的那样,转折的倒退并非指退回到勃列日涅夫时代,而是退回到斯大林时代,从而对千百万人的无情镇压又成为长期维持政权以确保合乎国家机器利益的继承的唯一形式,这样的结果将会在国际政治领域中引起怎样的反应,是完全不可预见的,然而不能排除世界范围的对抗。

在这种情况下,为戈尔巴乔夫政权的稳定和为改革的逐步开展作出贡献,是民主的工业化国家(也就是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的国际机构范围内)的新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不仅仅并且不主要意味着提供银行贷款或经济援助,这特别意味着苏联同西方在贸易往来、技术工艺现代化以及共同的政策机构方面协调一致。根据1990年7月在伦敦召开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首脑会议确定的革新路线而倡议采取相应的措施,这种勇敢精神是西方大国,特别是欧洲共同体的责任,欧共体必须说服它的美国盟友放弃跃居唯一的世界大国的企图。在苏联和西方国家之间编织一个包罗各方面的多层关系网,是保证苏联的改革不可逆转,并同时保证世界划分为集团的局面最终消逝的唯一形式。

东西方结合,如果不同时将所谓南北关系中那些残缺不全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重新弥合起来,就只不过是给新的史前分裂

让位。这种情况从根本上决定了人们应该采取全球政策的形式来考虑我们这个星球上的经济、技术和社会发展的问題，而这种政策只能由各国政府推行和控制，尽管它在以市场作为永恒标志的经济体系中是由企业实行的<sup>28</sup>。

这种双向的战略是北方工业化国家根本利益的组成部分，但是，除此之外还有必要解决一些更加深层的，特别是较易爆发的问题。诸如：过分强调文化上的同一性，或者不宽容的民族主义，后者在第三世界和欧洲招致如下危险：在重大斗争中重新分配世界政治游戏之牌，而斗争可能导致摧毁我们正要创造的共同的和普遍的文明。技术革命使启蒙运动当时所确立的历史目标的实现可望成为事实，而又不致使我们陷入启蒙运动本来所固有的开明的专制主义；不过，在这一个时刻，20世纪末期的民族主义的新浪漫主义就同民族的最原始的劣根性结合在一起，并将造成排外的、种族主义的以及狭隘地方主义的反应，这股巨流可能由于新的世界秩序无法通过调解取得一致而把它的建立进程冲向倒退。

所以，向一种世界精神过渡，不能并且不允许无视在社会共同记忆中存在的实际的文化同一性。更确切地说，向世界精神过渡必须利用实际的文化同一性为出发点，使它充实，把它包容在自身之中，使它纯化并克服它，而不是抹煞它。向世界精神过渡必须同时使这个同一性不要在各文化间作贬低性的比较，要架起联系的桥梁，使之通过分散政治机构，在视听通讯媒体共同构成的整个感观范围内表现出来。新的世界秩序看起来可能像是无政府主义者所宣扬的公社联盟那个样子，而不是像民族国家为了能在一个世界体系内存在而一心向往的民族联盟。但是，所有这些民族国家无疑都追求在运用视听媒体的宇宙中与其它国家分享并共有一种文化，追求一种以大型企业为中心的经济结构。

最后，向“新历史”的过渡要求从政治上控制技术工艺的转变，这主要是为了防止输送给我们这个制度的非同一般的生产力从另

一方面招致以下几种人对这种转变作出对抗反应,其一为受到结构性失业威胁的人,其二为居民中猛然间认识到自己的基本价值——家庭和本性——已被剥夺的人群,其三为被迫失去作为真理的宣告人和正义的卫士职能的知识分子。没有社会的和机构的转变,技术工艺的转变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社会的和机构的转变为建立一种由思维能力决定生产效益的生活方式开辟了途径。

### 新的视野

如果我们从不确定的假设——假设我们的社会有能力完善向当前发生的变化的主轴过渡——出发,就能够着手执行新历史阶段的独特的任务。

在所有公民的生活达到充裕的水平并得到保证(生活水平肯定不可避免地有些差别)的前提下,在生产率显著提高、市场扩大和产品多样化的基础上,我们可以重新规定人类生活的条件并为了这一目的塑造我们生存的基本特征。与此相关的挑战是多方面的,可以通过对三个大问题的说明解释这些挑战,这三个大问题只可能在新的历史情况下从结构性变化的意义上谈及:

(1)通过建立差别内的平等,消除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对立(从而消除对女人的统治)。这一点决定了个人之间的关系,从而两性关系的深刻变革,同时也决定了家庭生活的、文化再生产过程以及心理社会化过程的深刻变革。这里所提及的范围几乎没有得到研究,因为迄今为止,女权运动必然要同最原始的歧视和最直接的统治形式进行斗争。结合女权运动的宗旨而肯定妇女价值的特点以及以消除统治和暴力的文化——即使男人和妇女同样运用这种文化——为目的来改变我们社会的文化,所有这些都是新颖目标,只有那种不再受贫穷困苦威胁的社会和放弃暴力的世界能够实现这些目标。



(2)使社会和自然协调起来,按生态学和经济学之间的动态关系使物质进步和环境保护协调起来,这样做能够消除两个方面之间的史前的对立,一方面是人类几千年来屈服于敌对的自然,另一方面是工业化社会的复仇——它从生产力能够遵循其内在逻辑发展的那一时刻开始毁灭它自己的生存基础,即毁灭它的客观环境。科学地认识宇宙间的相互作用链;战胜必然王国;承袭社会的方方面面和个人之间保持平衡的价值,所有这些过程都将为确保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在人的一切行动领域都能重视基本的生态平衡而创造前提条件。

(3)随着作为毁灭的共同模式——战争的消除,并且由于文化效益和物质发展之间关系密切化,有害社会的两个极端,即为果腹而狩猎,为强占猎物而杀人——它们直至不久前还控制着社会的共同的和个人的思路——就失去了它们的功能。在这条道路尽头,人是与自己相对的,他们必须形成自己的个性、自己的人格,无须为解决那些能否生存下去的日常问题而去冒什么风险。不言而喻,新的社会将拥有各级机构,以致也会有不平等、冲突和统治现象。但是,这种冲突的逻辑性和这些问题的核心将由社会决定,并且与人的相互关系有原则上的联系,结果是,占有紧缺资源的不可避免的斗争葬送没有得到社会合法承认的统治,使冲突暴露出来,一旦社会问题被认清是社会关系的表现,那么,表现自我以及他对“另一个人”和“其他一些人”的关系的方式方法就成了校正行为准则的重点,这是从必然走向作为行为的结构原则的愿望的一个步骤,是有可能增加个人和集体的忧虑的一个过程,然而,这个过程同时在自我的永远是脆弱和无把握的学习过程中为战胜自我准备条件。对我们的内心世界的研究也许将是一种冒险,它比对地球以外的宇宙空间的不可回避的、按程序进行的考察或许更加引人入胜,并更加错综复杂。

在迷醉于当前的历史转变过程之后,接踵而来的将是一种冗

奋的感情。尤其明显的还会有，直接或间接地创造出各种范畴的重大理论，也就是我们仍然用以——尽管利用得不够充分——掌握我们的世界的那些重大理论，已经过时了。对我们来说，马克思主义的废墟甚至都不再适于作基准点了，因为在它的设想中包罗的问题不符合人类新经验的大题目，自由的传统将失去它区分个人与国家之间由两极分化推动的过程的能力。

在民主的社会中，人们已经开始克服这种力量，使之让位给个体的价值和策略之间日益加强的区分。这些个体摆脱了社会内部组织的禁锢，分属于精选出来的群体，致力于文化项目。在这种情况下，很大的危险来自无知和忧虑增加了的诱惑，即想重新制定一种新的、统一的、关于历史形成的理论，这是一种大胆的行为，它在由必然性统治的世界上——这里，历史的主体与受到如此统治的历史相对抗——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那种基于人的个体和集体行为而不断重新形成的历史视野面前，这样一种理论无法成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为物质的其它表现形式采用的科学方法应当也运用到人的行为时刻也许就到来。同时还要从社会科学对于人的行为的认识出发，还必须从一开始就承认这些知识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生物界大部分行为的规定性和预见发展趋势的可能性必然会被接受下来，用以证明社会事实是可以得到阐释的。总而言之，在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中，社会行为与社会本身同步发展，这个阶段必然随着用一种（把社会看作是了解我们本身的最重要的灵感来源的）多元化科学替代那些“原社会”理论而到来。

在向人们展现新的视野的时代中，尽管存在着重大的矛盾，但思想观念的争论必定能抑制旧秩序的最后抽搐——它的出现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必须不懈地努力，提出条件和方案，让人们想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正在开始。

注释:

1. 斐尔南·布劳德耳:《15—18世纪社会史》,慕尼黑1985—1986年德文版。
2. 雷蒙·阿隆:《工业社会十八讲》,巴黎1964年法文版。
3. 尼柯拉斯·普朗察斯:《左派,权力,社会主义》,巴黎1978年法文版。
4. 托姆·福来斯特尔:《高技术社会》,牛津1987年英文版。
5. 布鲁斯·R. 吉尔编:《信息技术和社会变化》,华盛顿1985年英文版。
6. 曼努埃尔·加斯特尔斯:《信息化城市》,牛津1989年英文版。
7. 曼努埃尔·加斯特尔斯:《新技术、经济和社会》,马德里1988—1989年西班牙文版。
8. 马丁·刚道尔与纳森·罗林贝格编:《积极的总体战略》,华盛顿1987年英文版。
9. 华莱斯·O. 塞拉斯:《技术与金融服务社会的前途》,载于《技术与社会》第7卷1985年第1—9页。
10. 乔万尼·多西等:《技术变化与经济理论》,伦敦1988年英文版。
11. 大前健一:《三合一的力量。世界范围竞争的新形式》,企业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
12. 伊曼努尔·瓦勒施坦因:《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纽约1989年英文版。
13. 马克·赫普勒斯:《信息经济地理学》,伦敦1989年英文版。
14. 曼努埃尔·加斯特尔斯:《新技术对世界经济的冲击》,马德里1990年西班牙文版。
15. 曼努埃尔·加斯特尔斯:《共产主义的终结》,载于《关键》杂志(马德里)1990年4月第1期。
16. S. 卡洛斯·泰保:《戈尔巴乔夫的苏联》,马德里1989年西班牙文版。
17. 这一意见是以曼努埃尔·加斯特尔斯正在为马德里自治大学进行的一次关于苏联的调查(包括1989年9—10月和1990年5月的现场考察)为根据的。
18. 曼努埃尔·加斯特尔斯等:《国家和技术政策》,加利福尼亚1988年英文版。
19. 阿贝尔·阿甘别吉扬:《经济学和改革》,汉堡1989年德文版。
20. 阿兰·图兰:《言语与血。拉丁美洲的政治和社会》,巴黎1988年法文版。
21.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89年度,华盛顿英文版。
22. 林达·G. 马丁编:《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功的故事》,檀香山1987年英文版。
23. S. 斐尔南多·卡尔德隆和马里奥·多斯·桑托斯:《拉丁美洲的变化》,布宜诺斯艾利斯西班牙文版,在印刷中。
24. 尼格尔·哈里斯:《第三世界的终结》,伦敦1987年英文版。

25. 曼努埃尔·加斯特尔斯和罗伯托·拉泽尔纳,《新的依附》,载于《社会学论坛》1990年夏季号。
26. 曼努埃尔·加斯特尔斯,《高技术与新的国际劳动分工》,载于《国际劳工评论》1989年10月号。
27. 曼努埃尔·加斯特尔斯:《在苏联的现场考察》,1990年英文版。
28. 约翰·W. 塞维尔和施图亚特·K. 塔克编:《在一个变动的世界经济中的增长、出口和就业》,华盛顿1988年英文版。

(原文为西班牙文,卢晓萍转译自德文)

---

## 集体主义的反经济

卢恰诺·佩利卡尼

政治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的思想,无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比人们通常所设想的更具影响力。实际上,支配世界的东西很少不是出自他们的头脑。

凯恩斯

马克思主义作为对人和历史的哲学解释,必然要表现出对计划的偏见:对理想主义和暴力的这种确认,就是用理想主义的暴方对待事件。

萨特

为搞清促使苏联领导人举起改革旗帜的原因,我们必须从两篇关键性的文章谈起: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阿贝尔·阿甘别吉扬的《经济改革》。

戈尔巴乔夫一开始就写道:“改革是从社会主义社会深刻的发展进程中产生的紧迫的必要性。这个社会已经成熟到可以进行它长期以来一直力求实现的那种变革的地步。推迟改革在最近的将来就可能导致国内形势的尖锐化,坦率地说,这将导致严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他继续写道:改革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因为从70年代后半期起,“发生了一些乍看起来似乎难以解释的现象。国家开始失去活力,经济工作中愈来愈频繁地出现失

误。困难开始成堆而且日益严重,未能解决的问题愈来愈多,社会生活中开始出现种种可以斥停滞的概念来称谓的成分,以及其它一些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现象。形成了一种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阻塞机制。而这一切都是在科学技术革命为社会和经济的进步开辟了新前景的时代发生的。”<sup>2</sup>现在,当市场上的中央经济跨入这个通常被称之为后工业的发展阶段时,庞大的计划机器——这部机器从前并非只是在共产党的知识分子中引起过如此强烈的赞叹——的巨大飞轮“还在继续转动,而连接机器和工作地点的传动带却失灵了,或者说是领导机制的效能减弱了”。<sup>3</sup>如果从所谓“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出发看问题,那么苏联经济的停滞现象确实是“难以解释的”。马克思主义断言,以“市场的无政府状态”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就是荒唐的,荒唐到可以将它界定为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sup>4</sup>此外马克思主义还确认,以“一切生产资料集中在国家手中”<sup>5</sup>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不仅保证了对人剥削人现象的镇压,而且还具有合理使用生产资料的优越性,从长远来看,它最终将在全世界取得胜利。

以这两条原理——地道的信条——为基础,世界范围的共产主义运动产生并发展起来了,由于不厌其烦地重复这两条原理,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数十年间,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广为流传的观点,即“这两条原理的正确性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不必作任何解释”,它们被视为已经过科学论证的真理,而且从苏联经济所显露出的非凡活力来看,它们得到了充分的证实。虽然这两条原理的显而易见性并非在各方面都得到了证实,但是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辩证唯物主义的卫道士们这样断言——必须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蛊惑性影响以及与此相应的、统治阶级拒绝承认这种抉择在科学上、技术上和道义上的明显优越性的态度中寻找,因为这种抉择危及了统治阶级的特权。

现在,苏联共产党的这位书记在《改革》一文中直言不讳地承

认,计划经济——更确切地说应当称之为指令经济<sup>8</sup>——不是一种有活力的、合理的制度,而是一种趋向于停滞的制度<sup>9</sup>,而且出现这种情况不是由于经济上的原因——领导工作中的失误、资源短缺、经营管理人员不足等等,而是由于结构上的原因。由此产生出对苏联经济体制的生产结构、分配结构和运行机制进行激进改革的要求。戈尔巴乔夫用简直象是直接来自蒲鲁东甚至米塞斯那里抄来的话写道:“目前的改革规定,利益的重点在一切方面都将从主要是行政的方法转向经济方法。改革的基础是大大扩大企业和公司的自主权,使它们转向独立核算和自筹资金,并赋予其劳动集体应有的一切权利,它们从现在起将对管理的效能和最终成果承担全部责任。集体的收益现在要同它们的工作效益直接挂钩。”<sup>10</sup>

戈尔巴乔夫的诊断的基本思想是明确的:集中的计划是“经济的阻塞机制”,<sup>11</sup>因为它不仅使官僚主义“在国家的一切行政事务和社会事务中取得无比的影响”<sup>12</sup>,而且还用“指令性的领导”<sup>13</sup>取代了经济规律。结果是:苏联领导人现在处于这样的境地,他们操纵着一部不是使“未知事物变成已知事物”,<sup>14</sup>而是在黑暗中盲目运转的机器。这部机器直到不久前还被说成是“为增进全民福利而开发资源和发展工艺”<sup>15</sup>的不可缺少的工具,而现在它却表明是苏联和一切采用这种组织模式的国家所遇到的经济、科学和工艺倒退的根源。这是一个出人意料的、甚至可以说令人震惊的结果,它深深地刺痛了计划经济思想和认为计划经济相对于市场经济而言是合理性的更高层次的概念。<sup>16</sup>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市场规律——苏维埃政权曾试图彻底铲除这些规律,认为这些规律是“资产阶级的”,因此是不公正的和荒谬的——就是经济规律。压制这些规律就意味着压制合理的手段和客观的机制——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市场——市场机制保证了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从而使一直在贫困的无情法则下生活的人类大多数有可能战胜贫困的统治。阿甘别吉扬讲话比戈尔巴乔夫直率

得多,他告诉我们:“与市场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特性之一就是消费者有权选择商品。相同的或可互换的商品的生产者之间的经济竞争对于市场的建立是至关重要的。”<sup>17</sup>他接着写道:“完成经济发展中的计划目标也要通过市场:因为在市场上每一种生产出来的商品都要由消费者来评价,也就是说,它或者被人买走,或者无人问津。作为调节因素的市场就是以这种方式对生产进行补充。确切地说是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范畴内,因为价值要通过市场来实现。”<sup>18</sup>

上述言论表明,戈尔巴乔夫和阿甘别吉扬认识到,“资产阶级批评家”对指令式经济的批评击中了目标:集中的计划根本不具有更高的合理性,运用集中计划原则的社会注定会不合理地滥用资源,注定会出现科学和工艺的倒退。集中的计划已表明是“阻塞机制”,而不是发展的工具。此外这两位批评家还认识到,苏联如果想摆脱停滞,就必须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一向认为应当加以接弃的制度,即作为“资本主义的秘密武器”(P. 斯威奇)的市场敞开大门。换句话说,他们告诉我们,共产主义革命的最终目标——“通过破坏市场来根除异化现象”<sup>19</sup>——与马克思主义讲的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前提条件,即发展生产力是不一致的。这就导致人们得出如下结论:这个直到不久前还骄傲地显示自己为全世界各国人民指明了前进道路的国家,现在只有进行一场事实上的反革命,才有可能打破它目前所处的恶性循环状态。

虽然戈尔巴乔夫在其《改革》一文中着重声明,集体化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成就”,没有集体化,“任何进一步的发展都是不可能的”,因为集体化是“经济的农业部门革新的基础,它使采用现代化的耕作方法成为可能”,<sup>20</sup>但是,他说这些话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安抚苏联共产党,使其相信指导改革的经济理论是严守教义的,而继之而来的却是相反的决定。这种说法尤其适用于1988年7月29日的中央全会所公布的决定,该决定的内容正是要重建小农阶级。



几乎无法想像,还能有哪一项立法措施会比这个决定是更加反列宁主义的,因而也是更加反革命的。

## 二

列宁所做的一切,都是以废除利润法则、消灭一切形式的私有制和自由贸易为最终目标的。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和摧毁市场经济是一回事,他这样写道:“只要仍然有交换,谈论什么社会主义就是可笑的。”<sup>21</sup>因为他坚信,“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sup>22</sup>;只有遏制这种自由,才能遏制资本主义。这就是说,社会主义是与反资本主义同时并进的。正如马克思所教导的那样,社会主义是“否定的否定”,<sup>23</sup>这就意味着要摧毁所有那些导致人被贬低为商品的制度——私有制、市场、货币等等。

根据上述导言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布尔什维克党在通过以十月革命的名义载入史册的成功政变夺取政权后,立即放弃了“土地归农民”的口号,过去它曾通过这个口号在工人群众中得到广泛的支持,而从这时起,却开始了一场反对小农经济的真正的毁灭性战争,小农经济被看成是大农经济的萌芽,因此是资本主义的萌芽。在这一点上,布尔什维克党的所有主要领导人毫无保留地意见一致。在他们看来,党的历史使命就在于建立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中,没有个人主动性的任何地位,无论这种个人主动性有多大。一切都必须是公有的,而不能是私有的,<sup>24</sup>这就是决定他们各方面政策的基本原则。<sup>25</sup>他们的理想是“和谐的社会”,“这是一个只有通过彻底铲除商品生产的根子、彻底清除“利己主义”和“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作用范围”才能逐渐具体化的理想。

对于布尔什维克认为应通过其针对商品生产的歼灭战来完成的神圣的解放使命,没有人比S. 格里戈里耶夫描述得更清楚。他写道:“在一个以社会主义为基础的社会中,将不再有买和卖,我们

今天用一个独一无二的词即商业来表述的东西,那时将不复存在。商业就其目前这种形式而言将彻底消失。任何一种商业公司都将成为过去,都将被仓库和集中的市场所取代,这些仓库和集中的市场将提供自由人过舒适生活所必需的一切,当然不是用货币来换取;实际上,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既没有商品和货币,也没有买主,而只有尽自己的力量和可能性为公共福利工作的生产者,这些生产者同时也是各取所需的消费者。还必须指出,通过废除商业机构,一批今天在商业机构中工作的人(店主、售货员、推销员、经纪人等等)将因此而失去他们的职业,这批人将有可能转而参加对社会有益的活动,由此将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这能量今天在以暴力和欺骗手段进行的严酷的生存斗争中被白白浪费掉了,也就是说,在追逐利润和个人收入的进程中被白白浪费掉了。”<sup>24</sup>

甚至“第二个布哈林”——“新经济政策”的代表——归根结底也并不怀疑这一事实,即共产主义和市场是彼此不相容的:如果存在着前者,那么后者就不可能存在,反之亦然。事实上,就在他向被党允许享有在市场上出售剩余产品的自由小农宣传基佐的著名口号“发财吧!”的同时,他仍在不断地强调自己对列宁的基本学说的无限忠诚。在1925年4月24日发表在《真理报》上的一篇文章中,我们可以读到他的这样一段话:列宁在《论粮食税》这本小册子里说,在走向社会主义运动中首先必须克服极分散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小业主是我们的主要敌人,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必须有勇气同大资本结成联盟,主要是通过租让制。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经济成分,要与大资本组成联盟,这个联盟将粉碎分散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sup>25</sup>布哈林接着又补充道:“我们必须实现社会主义,即计划经济,这是我们的最终目标。但是,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我们必须联合得到允许的资本主义,即国家资本主义这个大同盟者来战胜它。虽然这种合作有助于资本主义成分、农村的富农成分,但是我们把这个环节

添加进我们的国家资本主义体系,这样我们就能够同这些资本主义成分联合起来克服困扰着我们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sup>30</sup>

布哈林所描述的这个战略计划——按照某种流传很广,但却毫无根据的解释,这个战略计划似乎是从理论上论证了共产主义与市场之间的永久共存<sup>31</sup>——可以概述如下:为使苏维埃经济从“战时共产主义”<sup>32</sup>所造成的灾难性危机中解脱出来,需要有勇气实行一次“农民布列斯特”,即通过给予小农贸易自由来寻求与小农和解。但与此同时,为了排除资本主义复活的危险,必须巩固一党专政,<sup>33</sup>“加强作为国家机关组成部分的高层次领导的经济力量”,<sup>34</sup>“通过完全国有化的银行体系来控制富农”,“通过对外贸易垄断”<sup>35</sup>建立起足够高的壁垒,从而使脱离共产主义对于俄国社会来说最终成为无法想象的。换句话说,就是要“把下金蛋的母鸡”——布哈林这样解释个人主动性——关进笼子,在一个长时期里利用它,而最终则要让它消亡。这就是这位“全党所喜爱的人”所理解的“渐进的共产主义”,即1921年以后重新建立起来的市场的微观经济的一种安乐死,其公开宣布的目标是避免出现“农民旺代”,并使由于征集和配给政策而受到严重损害的生产和生产率得到提高。

但是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并非所有的人都同意布哈林关于渐进战略的设想。例如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就认为,与小农经济的停战状态不可能持久。他在1921年冬与扎钦托·梅诺蒂·塞拉蒂的一次谈话中表述了如下思想:“耐普曼分子是苏维埃制度中的劣等分子。他们不参加选举,不参与社会公共生活。他们就像是某种为了能在圣诞节宰杀而被养肥的牲畜。一旦共产党政府认为时机成熟,新经济政策就会结束,这些既得利益者就会完蛋。他们对此知道得很清楚,听说的很多,因此他们不储蓄,什么都不积累,什么都不浪费(原文如此——译者注)。他们似乎有一种临近末日的直觉……。他们现在还不是一个阶级,而且我们也不会让他们成为一个阶级。这是些为了享乐和发财致富而致力于利用时局捞取好处的个体户

……。我们现在已经如此强大：我们可以戏弄他们，就像猫戏弄老鼠一样……我们今天喂养他们，这些耐普曼分子，就像古罗马贵族对待海鳕一样。不同的是，我们是用他们自己的肉来喂养他们：我们让他们自相吞噬，最大的吃掉最小的……。而我们则清楚地了解他们所有的人，这些鲨鱼们，他们的生命掌握在我们手里。有朝一日我们将封住出口，进行一场大围捕，这将成为革命的新阶段。”<sup>25</sup>这就是这位“抽调论”——意指将农业部门的资源“抽调”到工业部门——理论家的深刻信念，根据这种理论，社会主义只有在一种由中央调控的完全国有化和完全计划化的经济中才能实现，这种经济被理解为“一个与政权溶合在一起的统一的整体，其条件是有计划地限制直至彻底消除竞争”，<sup>26</sup>布尔什维克党内有一种传播很广的信念，认为斯大林从1929年起正是采用了这一理论，“其表现是他用暴力的浪潮淹没了农业地区”，<sup>27</sup>这股暴力浪潮不仅打击和毁灭了富农，而且还过宽地打击和毁灭了绝大多数农民。

这场“大围捕”是以冷酷无情的手段进行的，其残忍程度只有纳粹的“最后解决”才能与之相提并论，它造成了这样的结果，以致苏联历史学家 A. 巴尔索夫将它称作是“绝对的经济灾难”。<sup>28</sup>事实上，通过强制集体化，军事法则几乎完全取代了经济法则，“行政机关的强制”渗入“生产的心脏”，并“使劳动力市场服从它的命令”，“它把整个社会变成了一座大兵营。重工业得到极大的扩充，而为此却让第一产业流尽了血，并从制度上奠定了农业低生产率的基础，这种农业的低生产率至今仍拖累着苏联经济，使它无法满足居民的食品需求。

摩西·莱温曾断言，强制集体化产生于“一系列由事态所决定的步骤”，<sup>29</sup>对这一论断我们无疑可以表示赞同。但是人们必定记得——而莱温却小心翼翼地回避了这一点——集体化与马克思、列宁和恩格斯的学说是完全一致的。斯大林的解决办法并非是“思想上误入歧途”的产物，而是恰恰相反，它是对正统共产主义纲领

的合乎逻辑的运用,对这一纲领列宁在 1919 年曾作过这样的表述:“共产主义的彻底胜利”要求把“被压迫的劳动阶级彻底打倒资本、彻底消灭商品生产的斗争提到首位”。<sup>42</sup>“我们正在同资本主义进行真正的战斗,我们说,不管资本主义迫使我们作怎样的让步,我们在这方面将要象对付高尔察克、邓尼金那样作无情的斗争,因为援助他们的是资本主义的力量,资本主义的力量当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以粮食和商品的自由贸易为基础的……。如果我们在这场斗争中取得胜利,资本主义、旧政权和过去的一切就不会复辟。必须进行斗争反对资产阶级,反对投机,反对小经济,只有这样,这一复辟才不可能……。只有使农民与私有制脱离,使他们为我们的国家工作,我们才可以说,我们走过了我们路程中艰苦的一段。”<sup>43</sup>

### 三

斯大林所走的道路肯定不是唯一可能的道路。“但同样肯定的是,这条道路不是歪曲列宁的正统革命纲领<sup>44</sup>的产物,这一纲领可以概述如下:竞争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以何种手段进行,不管怎样都应当废除,而代之以生产和分配的统一计划——这在当时是一个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完全一致的纲领。《共产主义原理》一书这样写道: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将根本剥夺相互竞争的个人对工业和一切生产部门的管理权。一切生产部门将由整个社会来管理,也就是说,为了公共的利益按照总的计划和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这样,竞争将被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消灭,而为联合所代替。因为个人管理工业的必然后果就是私有制,因为竞争不过是私有者管理工业的一种方式,所以私有制是同工业的个体经营和竞争密切联系着的。因此私有制也必须废除,代替它的是共同使用全部生产工具和按共同协议来分配产品,即所谓财产共有”。<sup>45</sup>

上述观点——根据这一观点，社会主义和竞争是相互对立和相互排斥的术语——清楚地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可能同意蒲鲁东关于通过建立由工人自己管理的市场经济来使生产资料社会化的思想。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人看来，这不过是资本主义的隐蔽形式。这种形式虽然消除了生产资料和直接生产者之间的分离状态，但却保留了利润法则和价值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惊恐不安地注视着两个方面。在他们看来，“与资本主义相反，社会主义是一种有集中计划的经济，是一种生产过程的各种主要关系由社会的有形的首脑机关、而不是由市场规律的无形机制来调节的经济。”<sup>17</sup>

但是，如果不是把经济仅仅理解为单纯地生产产品和服务，而是理解为合理地使用资源，即与“针对不同的用途要有选择地使用的短缺的资金和目标之间的关系”问题有关的一切活动方式的总和，那么，没有市场的经济能被视为经济吗？“经济的规律确切地说不就是“触媒”的规律吗？

在一个废除了供求法则，而又要以此机制作为市场上价格构成基础的生产体系中，怎么可能进行生产体系内部的经济核算呢？由于以货币表示的市场价格是说明短缺情况的要素，所以难以想象，经济专家们能通过何种替代的信息体系来调整他们的决定。他们不得不在黑暗中摸索，而作为经济活动核心的机制合理性的同一原则从这一时刻起将被置于死地，因为如果没有关于物品短缺情况的说明，任何决定都将成为主观随意的决定。众所周知，这个论点曾得到米塞斯特别强有力的支持。<sup>18</sup>而鲜为人知的是，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一书中就已对这一论点作过极精辟的表述，人们在这部著作中可以看到，马克思的恶意批判将该书斥为伪科学的文献是毫无道理的。书中写道：“什么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就是达到吞噬个性和个人主动性程度的国家的经济思想。共产主义不懂得国家的本质和使命。它为了赋予自身具体形态而紧紧抓住这

个范畴不放,而与此同时,它从这一观念中只理解了反动的部分。共产主义的无能就表明了这一点,由于无能,它把工业组织表述成了警察组织。共产主义声称,国家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支配其雇员的服务,作为回报,国家养活自己的雇员,为他们安排工作并为他们提供养老金;也就是说,国家能够领导农业和工业,它能够养活全体工人并为他们提供养老金。社会主义比政治经济学更加无知,它看不到,通过把其它种类的工作划给国家,它便把生产者变成了非生产者;它不懂得,公共服务业正因为是公共的或者说是由国家兴办的,所以其价格高于价值。社会发展趋势应当是不断缩减公共服务业的数量。我们绝不想使个人自由服从于国家,而要使国家即公团服从于个人自由。”而这还不是全部。蒲鲁东还写道,集体主义压制经济的合理性。事实上,“竞争为价值的构成所需要,就是说为分配的原则所需要,因而也为实现自由所需要。只要一种产品仅由唯一的一个制造商所出售,这种产品的真实价值就始终是一个秘密,或者由于生产者的隐瞒,或者由于不注意把成本价格降低到最低限度,或者由于无法把成本价格降低到最低限度。因此,生产的特权对于社会是一种总体损失。工业的竞销和劳动者的竞争一样,都为社会所需要。所有想象出来的和可能想象到的乌托邦都不可能摆脱这个规律。”<sup>56</sup>

但是,正是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是可能的,而且认为不会因此给生产机器的效能和动力造成危害。恰恰相反,他们甚至认定自己的设想具有更大的合理性。对此《反杜林论》一书曾非常明确地写道:“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并且以直接社会化的形式把它们应用于生产,每一个人的劳动,无论其特殊用途是如何的不同,从一开始就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那时,一件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可以不必首先采用迂回的途径加以确定;日常的经验就直接显示出这件产品平均需要多少数量的社会劳动……社会也无需给产品规定价值……社会也必须知道,每一种消费品的生产需要

多少劳动。它必须按照生产资料,其中特别是劳动力,来安排生产计划。各种消费品的效用(它们被相互衡量并和制造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相比较)最后决定这一计划。<sup>51</sup>

既然废除价值规律必然等同于废除经济的基本规律,即为针对不同的用途有选择地合理使用短缺的资金提供基础的规律,那么这时我们就不能不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废除经济。这是一个罗莎·卢森堡曾毫不犹豫地公开表述过的论点,她写道:“由于经济学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规律的科学,所以它的存在和作用依赖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一旦不存在了,经济学就将失去其全部基础。换句话说:一旦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经济让位于有组织的和由劳动人民的社会整体自觉领导的计划经济制度,作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就将失去它的作用。现代工人阶级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的实现,即意味着作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的终结。”<sup>52</sup>

这就意味着:压服资本主义就必然等同于废除作为一种由价值规律调节的生产体系的经济,以及废除从该生产体系中推论出它的运行规律的学科,这种做法绝不会为“利润制度”开方便之门,却导致破坏(市场的)不可替代的机制,而多亏这种机制,社会的资源才有可能得到合理的使用,即在严格的成本和收益核算的基础上被使用。如果没有显示短缺情况的标志,核算是无法进行的。要否定自我调节的市场的法则,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在道义上,都有合乎逻辑的理由。

这里只要提一下凯恩斯的已成为经典的名言也许就足够了:“没有能力解决充分就业、随意地和不公正地分配财产和收益”。<sup>53</sup>而尽管如此,鉴于在共产党国家中发生的事情,人们还是很容易就能看出,米塞斯的论断是正确的。他说,在一个一切生产资料都被剥夺了触媒作用的社会中,经济核算将无法进行,机制的合理性也将化为泡影。实际上“由于任何产品都不再成为商品,所以确定货



币价值是不可能的。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货币从来也不可能起它在竞争社会中所起的确定产品价值的作用。按货币价值进行核算是不可能的。”“如果不能进行货币核算，那么经济核算就无法进行，因为只有在各种贸易关系均按统一尺度换算的条件下才能进行经济核算；这种做法在集体主义体制下是不可能实行的，因为按照定义，集体体制是不存在以货币表示的价格的。这样的一种体制能够迅速取得巨大的物质成果，但它却不可能认识比较成本，原因虽然简单，但却是决定性的，即它废除了显示短缺情况的标志。它注定要象孟德斯鸠笔下的专制暴君那样行事，如果想要一只梨，就砍倒整棵树。由此可见，这是一种只知道结果而不懂得效益的制度。由于结构上的原因，它对于发挥最大值的思路一窍不通。完全象战时经济<sup>54</sup>一样，集体主义经济“既是力量又是浪费”。<sup>55</sup>

这一切意味着，国家社会主义导致生产和分配过程的“实物化”，换句话说，它导致这样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货币核算被实物核算所取代：“一个原则上只能依据传统或者依据毫不含糊地调节着消费的独断的判断来解决的问题。”<sup>57</sup>货币不再是生产过程和分配过程中的调节因素<sup>58</sup>，计划者占据了它的位置：计划者的法令、命令和干预决定着该生产什么以及按什么标准分配社会财富。生产和消费脱离了经济规律，成为国家官僚机构独霸的职权范围，这些官僚机构因此而“控制了整个经济生活”。<sup>59</sup>而由于控制了经济生活的人同时也就控制了生活，所以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集体主义的社会中，官僚机构是无所不能的；没有任何东西能逃出它的统治，公民社会中只有极少数人除外，地下的或者得到当局容忍的市场（即所谓在国有经济的夹缝中生存的微观资本主义）使这些人得以摆脱计划者的指令性决定。后果是：整个社会（资源、物资、设施、人、精神财富）因此都成了官僚机构的附属物，或者用布鲁诺·里齐的定义来表述，成了“阶级的集体财产”。<sup>60</sup>

考茨基也曾谈到过这个问题。考茨基生前曾数十年之久一直

致力于与“资产阶级批评家”作斗争，维护马克思恩格斯的集体主义。<sup>61</sup>他在1922年出版的《无产阶级革命及其纲领》一书中写道：“在没有货币的情况下，只能有两种经济类型。第一种是原始经济。要适应现代的尺度，这种经济形式就意味着国家的整个生产活动必须组成一个独一无二的、处于中央调控之下的工厂，中央把各种任务分派给各个生产单位，全民的所有产品都被集中起来，以实物形式向各个生产单位分配生产资料和向每个消费者分配消费品。这种经济形式的完美范例是监狱或者兵营。隐藏在社会主义实物经济的观念背后的就是这种冷酷无情的单调……。货币制度是以细致的分工为特征的社会为了保持正常运转所不可缺少的发动机……如果为了重新启用实物经济的原始手段而有意识地破坏这部机器，那就是向原始野蛮状态倒退”。<sup>62</sup>

生产资料全部国有化——这是能够消除竞争并以此废除价值规律的唯一手段——最终只能产生如下结果：“经济政策成为社会真正的调节要素”。“由于按照共产党的传统，经济政策首先涉及意识形态转化为体制和指令性决定，所以就出现了这种指挥权。由此产生出对各种需求的意识形态上的预先规定，并必然造成进一步的后果：在市场社会中通过法定的契约制度而实现的社会伙伴之间的自由协商，被占有一切的国家的命令所排斥。国家成了唯一的雇主，而对国家，工人们除了服从没有任何其它自由。”<sup>63</sup>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市场的“看不见的手”被国家的“看得见的手”彻底取代，不可避免地导致两个后果：废除经济的合理性以及取消一切领域中的决定自由。对这一点，苏联著名法学家法苏卡尼斯曾作过精辟的说明：“个人的独立意志是提出价值范畴和交换价值范畴的前提。一旦交换关系被一个在市场通行的法理之外运作的权威所规定，那么交换价值就不再成其为交换价值，价值也不再成其为价值。”<sup>64</sup>而这正是批评共产主义思想的人（其中既有右派，也有左派）经常说的话。

## 四

对米塞斯从外部,考茨基从内部提出的批评,有人认为,通过求助于经济总体平衡的理论,可以给予有效的回答。根据这一理论,价格形成机制可以不通过市场,因为它可以通过一种相似的体制来表示,这就引出了由克劳迪奥·纳波莱奥尼等人表述的论点,按照这一论点,在恩里科·巴罗内论集体主义国家生产的奥秘<sup>66</sup>的著名文章中,已经可以找到对米塞斯提出的问题的答复。然而人们不能不反躬自问,纳波莱奥尼是否理解巴罗内这篇文章的含义,这一含义(尽管只是很隐晦地)包含在帕雷托的《政治经济学手册》第三章里。书中以纯粹数学的术语证明,假设有一个由100人组成,只有700件商品供交换的社会,那么在这个社会中,市场——真正的“天然计算机”,借助于这架计算机,需求和供给通过负反馈联系在一起——可以立即实实在在地同时进行70699次演算。<sup>67</sup>无法看出,这怎么能导致对在现实社会中没有市场也能计算出价格的实际可能性作出乐观的估价。此外,巴罗内还说明,一个集体主义国家的生产部长不得不应付由于“必须顾及的人和物的庞大数量”而产生出来的巨大难题。<sup>68</sup>而另一方面,当纳波莱奥尼把消费者的嗜好也归入计划者为进行计算所必须依据的指标时,他就是间接地承认了“集体主义的方程式”是无法解开的。这样说的理由虽然很简单,但却是决定性的,即在没有市场的地方,消费者的嗜好注定是永远不为人知的因素。

奥斯卡·兰格注意到了问题的这一方面,我们要把对米塞斯的唯一有价值的回答归功于他。<sup>69</sup>兰格在其著作中一开头就肯定了米塞斯迫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讨论经济核算问题的功绩,而从马克思起,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一直错误地认为经济核算对未来的集体主义社会是毫无意义的。他接着又指出,即使在一个全部

生产资料都已国有化的社会中,经济核算也是可能的,其方法与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使用的方法有相似之处。这种方法要由在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存在一个“消费品和劳务的有效市场(按这个词的作为制度的意义来说)”来保证。<sup>70</sup>为此目的,只需在国家制定的法律规范的范围内给予生产单位——公共企业——以广泛的决策自主权就足够了,不过国家制定的法律规范不可阻碍“触媒”作用的自由发挥。一旦社会主义的市场广泛使用了计算机,那么——按照兰格的说法——它将在事实上优于资本主义市场,因为资本主义市场归根结底不过是“一个为解决同时计算的体系问题服务的特殊的电脑”,<sup>71</sup>所以说它只是计算机的模仿物,它在技术上劣于计算机,而且劣势是如此明显,以致人们可以断言,市场是“前电子时代的计算体系”。这就是说,米塞斯说“触媒”作用是确定价格和——在确定价格基础上——合理使用紧缺资源的必不可少的前奏,这是正确的。但这绝不是一个无法克服的障碍,因为社会主义体制可以这样构成,它可以模拟竞争市场,由此甚至可以通过采用最先进的技术使它更完善。

在已经有了一个像看不见的头脑那样运行的“天然计算机”——市场的情况下,难以看出应用巨大的计算机化的计算体系优点何在。尤其无法看出,兰格所描述的模式怎样才能变为现实。也就是说,我们面对着一座极其辉煌的思想大厦,而不幸这座大厦却无法成为现实。这是一个应当放进“人类天才博物馆”的解决方案,不过只是很难想象,它有朝一日能走出这座博物馆,以现实的生产方式的面貌出现。有充分的理由设想,“一个详尽的、包罗万象的价格控制体系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灵活的或合理的,尽管它是基于价格尺度。”<sup>72</sup>要同时算出结果的计算不仅数以十万计——甚至数以百万计——而且还必须不断重复进行,此外在每一次计算中,还会有技术、知识甚至风格的微小变化。

## 五

不管兰格模式<sup>73</sup>的命运如何,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苏联和中国企图通过为“天然计算机”让路,走出“坟墓”。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这部“计算机”自发地执行着许多职能,任何模拟市场,即使是高度电脑化的,也不能恰如其分地代替这些职能。<sup>74</sup>

首先,市场是“永恒的全民公决”,“它为经济学家(官方的或私人的)提供有关消费者嗜好的经常不断的信息流。如果真想使产品和服务业的生产适应于居民的需要,是不能忽视这个因素的。而在由中央领导的经济形式中发生的情况恰恰相反。有人说(如多勃就心平气和地这样说过),正是因为没有任何竞争,正是由于自动调节,这种经济形式才不能看到“原是经济无政府状态产物的不平衡趋势和波动趋势”。<sup>75</sup>这样说不过是一种无济于事的安慰。这两种趋势都与自动推进的经济密切相关,都经常随着技术革新和新产品以及消费者口味的变化而变化。只有一种方法可以消除这种趋势,这就是冻结生产力发展和在每一届政府任职期间都一劳永逸地确定必须满足的需要。到那时也可以说,与经济核算有关的问题解决了(这些问题只有“在经常发生变化、每天都必须处理新问题的经济中”<sup>77</sup>才能发生),而这仅仅是指把有限资金加以合理利用的可能性。

此外,全部国有化的经济的命令中心,能够获得一切“次要的”信息,为了熟练地作出决策,也需要这些信息。的确,“如果从社会的经济问题,首先是迅速适应于地点和时间的特殊情况这样一个前提出发,那么在这方面的根本决策必须交给这样一些人似乎是合乎逻辑的,这些人熟悉这方面的情况,并且了解重大的变化和随时可用以解决问题的第一手材料。即使这样,也不能指望通过如下方法解决这个问题:把所有这些信息交给一个中央机构,在它考虑了所有信息之后,由它发布命令”。<sup>76</sup>这个问题只能通过采用一种

体制来解决,这种体制固然不排除通过一个高级机关来进行某种程度的协调,但归根结底还是要分散决策权,这就足以使各个生产单位能够尽可能好地利用它们(而且只有它们)所掌握的特殊信息。就是说,这是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体制,按照定义,它有一种分散的决策结构。

如果情况真是这样,那就可以由此得出结论:市场体制(不管是资本主义的还是自治的)的运行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任何决策单位都不能做到对信息和知识的垄断,而集体主义体制的运行则基于完全相反的认识。换句话说,集体主义体制是建立在要求计划者不仅无所不能、而且无所不知的基础上的。简言之,这种要求毫无意义。托洛茨基比任何其他人都更中肯地批评过这种要求。他写道:“如果真有一个象拉普拉斯凭他的智力幻想所描绘的全才头脑,这个头脑同时储存着所有自然过程和社会过程,能够测定运动的力度和预见到其活动的结果,那么这样一个头脑显然可以一开始就提出一个最终的、完美无缺的经济计划,从计算草场的面积到计算背心的扣子。官僚主义实际上常常自以为正是有这样一个头脑。由于这个原因,它干脆丢开市场调节和苏维埃民主的尝试。实际上,官僚主义对它的智力源泉的估计大错而特错了。在它的创造能力方面,它实际上不得不依靠它从资本主义俄国继承下来的均衡(其实这里也可以称之为不均衡);而现在,它必须依靠当代民族的结构和最终依靠苏维埃经济成就的经验与错误的教训。但是,即使能把所有这些因素都正确地结合起来,也不能构造一副不完整的计划骨架。”<sup>19</sup>

竞争(即使是不充分的竞争)不仅为企业家提供信息,没有这些信息,他们的决策必然是盲目的;竞争还能起另一种同样重要的作用:它能刺激人们尽可能有效地工作,即提供利润。马克思主义曾以和谐社会的理想为背景谴责利润。<sup>20</sup>然而看看苏联领导人当前为重新采用利润法则所作的努力,不能不得出结论:如果不想消

死“下金蛋的母鸡”，一个社会要取消利润法则就必然发生问题。如果对此进行仔细的考察，那么有两种手段来代替能刺激人们以最大责任心进行工作的利润：热情和恐怖。这两种替代手段在斯大林主义革命年代显然都曾被粗暴地采用过。弄坏一部拖拉机被视为破坏活动而受到严惩。<sup>41</sup>当时，恩斯特·诺尔特所说的“建设激情”<sup>42</sup>笼罩全国，激发起极不寻常的献身精神。那是既令人激动又令人恐惧的年代，现在连苏联人回想起来也感到可怕，因为为了恢复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遭到破坏的工业机构，在人力和道义方面付出了高昂代价，而且是以热情和恐怖相结合进行的。这里所说的结合，只有在社会处于非常的历史存在阶段才可以采用，而且这种结合的合理性无论如何也远远低于“触媒”机制的合理性。

必须补充说明，利润是可以衡量投资的生产效益的唯一工具。它不仅是一种刺激，它在一定意义上首先是计算机。的确，如果有了“成本盈余”，<sup>43</sup>就是说，如果收入的货币额超出投入的货币额，那么就具有了利润。取消利润等于取消强有力的合理化力量，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替这种力量。

因此，取消利润的生产方式是一部动力不足的机器，这样说并非随意得出的结论，这是因为它所取消的正是彼得·怀尔斯称之为“边沁刺激”<sup>44</sup>的东西。它让单个的人自我牺牲，以便作出最大贡献。因为他们这样做了，他们就促进了社会财富的增长。设想生产结构没有这种刺激也可以开足马力运转，等于假定在人类学上能发生神奇的变化，即真正的脱胎换骨，通过这种变化，早期基督教关于“自然人”死亡、“新人”诞生的梦想会最终成为现实。只有在这种场合下，执行刺激职能的利润才能真正被取消，但是作为各个生产单位效益尺度的利润则不能被取消。因此，布兰科·霍尔瓦特和沃齐米日·布鲁斯特别强调指出，即使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也不能把工具的合理性紧紧捆在各个企业的自主权和“触媒”法则的制度化上。<sup>45</sup>这是两个以利润为依据的因素。

但是触媒还有其它的任务,这是任何经济计划(即使是高度电脑化的)都不能代替的。市场是“发现新事物的操作方法”,“即根据反复实验原则查明“可能范围”的方法。只是由于“触媒”法则的正常运行,企业家才可以起“有创见性的突破者”的作用,开发新市场,规划新的生产联系,打破托因比所说的“习惯势力”,就是说,成为生产力“不断革命”的主角。这种“不断革命”曾使马克思赞叹不已,他理所当然地在其中看到了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前提。技术权限可以通过专业性的社会化来授与。新事物的计划和试验,要求社会组织具有这样的结构:两个领域都受到法律保护,有创见性的人在其中能自由活动。就是说,在这两个领域,在最合理的解决方案或至少在最好地满足消费者需要的解决方案方面,达尔文的选择规律能起作用。换句话说,它们要求发挥“触媒”作用。顺便指出,“苏维埃制度没有为采用新事物创造最有力的刺激,高度优先的领域例外”,“这绝非偶然。例外的通常是军事领域,在这里,由于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竞争规律是起作用的。苏联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倒退,正是苏联拒绝利用市场(它是主要的调查手段,是今天随时可为人类效劳的一种发现和革新)的必然结果。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奥托·席克作为捷克计划工作的负责人直接了解到集体主义的不合理性之后,已经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市场是不可代替的”。<sup>66</sup>

## 六

的确,共产主义的奠基人曾经认为,压制价值规律可以使生产力无限发展,直接生产者将不必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换句话说,他们认为,实行统一计划可以结束贫困和剥削。实际上,情况的发展正好相反,根本不像他们关于基督教千年太平的预言所说的那样。正如蒲鲁东所预见的,取消价值规律破坏了价格构成的客观机制,在缺乏显示短缺情况的客观标志下强迫计划者不断地违背比率的



需要。在集体主义社会中,价格实际上没有真正的经济意义,因为它“既不反映生产成本,也不反映市场供求关系”。<sup>98</sup>这是与现实毫无联系的价格,是“非现实的价格”,也可以说是,或者几乎是,党权国家官僚机构必然的随意决策的表现。<sup>99</sup>

然而,这种随意性不仅涉及事,它也涉及人。由于内在逻辑,指令经济只能归结于“降低和被迫控制需求”,<sup>100</sup>即对需求实行专政。这是因为工人有法律规定的和在意识形态上被确认的义务,按照由帝国确定的价格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这个帝国是作为唯一雇主的主体,即占有一切的国家。这种价格只是主观判断的东西,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对于所出卖的东西的价值,根本没有检验工具。这种工具之所以没有,是因为取消了供求规律,不管怎样反复强调这一点都不嫌多。不仅如此,还缺少通过工会进行自由的工资谈判的可能性。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集体主义制度把一切生产力(包括劳动力)都控制在唯一的权威手里。否则就不可能计划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和分配。因此,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妨碍计划者的决策,相比之下,工人则处在依附关系中,就像军队中的士兵一样。他们只能尽义务,必须服从。

在这方面,托洛茨基是直言不讳的,他写道:“在军队中有适当的手段强迫士兵履行义务。对工人也必须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做到这一点。如果我们都想严肃认真地谈论由中央领导的计划经济,如果我们想根据经济计划的需要分配劳动力,如果我们想考虑到经济发展达到了什么阶段,那么毫无疑问,我们不能允许工人群众从俄国一端到另一端自由流动。工人必须像士兵一样通过类似的方式接受领导和命令。这是工人军事化的基础。”<sup>101</sup>说到工会,那么它应当(由于指令经济的独特需要,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变成国家的经济部门和权力机关”,<sup>102</sup>就是说,它应当放弃为改善工人生活条件而组织斗争的职能,严格执行中央计划机关的决策。在这样一种制度中,根本谈不上契约自由或罢工自由。对国有化原则的

理解是如此绝对化,以致可以说,“一切都属于国家,财产、土地、人的生命和公民的思想”。“苏联的共产主义比其它任何国家的共产主义都更加彻底地改变了社会结构,把国家据为私有财产,马克思曾把这一点看作官僚主义的典范。从一切属于国家时起,苏联的官僚主义,无论从实践还是从法律上看,就“占有了一切,因为它控制一切,它认为怎样合适就怎样支配生产”。“于是官僚主义的集体主义就有了动员一切生产力的非常能力。一旦确定了目标,那个在各个领域都垄断着主动权的主体(特权花名册阶层)就可以把全体人民动员起来,他们就像一支庞大的军队一样。

苏联在斯大林主义革命时期所取得的轰动世界的成就,甚至使共产主义思想的死敌也认为,对于这样一些民族来说,指令经济“可以成为一种发展的技术,这些民族必须努力建立由于其历史情况而未能出现的工业社会”;“其次,他们认为,能够表述一种理论,根据这种理论,“国家必须是强有力的,以便加速工业化”。“指令经济的确牺牲了自由,然而它可以借助于交易业务而有效地把生产力动员起来,可以最好地代替在“先到的”国家中资本主义竞争所起的作用。因此,必须把集体主义看作积累资本和发展生产力的非同寻常的促进者;如果从不太严格的经济角度来看,由此产生的是一种历史进步现象。简而言之,苏维埃俄国为第三世界国家指出了一条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它们可以借助于权力机器消灭它们的差距,摆脱不发达状态。

这种论点现在已经站不位脚了。事实证明,从1979年起,共产主义中国逐步取消了集中计划的模式,采用了另一种模式,在这种模式中,“私人企业被承认是社会主义社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支持国有企业、合作社和私人企业之间的一切联系形式”。<sup>98</sup>发生这种变化显然是认识到,指令经济本身不能使工业化机器运转起来。在大跃进时期,紧接着又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曾两次试图通过靠群众热情代替经济规律开始实现这种发

展。两次的解决办法都是(意识形态的)政治优先于业务工作。<sup>99</sup>这种解决办法也是由于相信辩证的革命灵知具有改变一切的神奇力量而引起的,这比“征服太空”还难以做到。两次想取消(经济)现实原则的尝试,在各个方面都造成了灾难。无论是50年代初还是60年代末,中国大地到处都发生了可怕的贫困,<sup>100</sup>因此很明显,威廉·勒普克把集体主义称作“走向贫困的道路”,<sup>101</sup>正是击中了要害。

甚至斯大林主义俄国的发展速度也不能驳倒勒普克的论点。早在1935年鲍里斯·索瓦林就曾指出,“说苏联必须在一张白纸上建设一切,是完全错误的”。<sup>102</sup>他提醒人们注意,沙皇制度为俄国经济的工业化奠定了基础。从1885年起,虽然全国还是贫困的大海洋,但是的确出现了一些“发展中心,撇开丰富的自然资源不说,这些中心对于促进1928年以后的工业化给了宝贵的支持”。<sup>103</sup>首先在19世纪最后10年,工业生产开始以每年7.5%的速度增长,结果俄国1913年在世界强国的行列中占据第五位。这种“巨大的现代化工业发展”<sup>104</sup>是沙皇制度留给布尔什维克党的头等重要的遗产。这笔遗产使俄国经济有了一个很好的起点。然而它同时使人产生了一种幻想,以为指令经济同市场经济比较起来具有更大的合理性。苏联领导人直到今天还想使这种幻想延续下去。

这一点具有根本的意义。只有从集体主义幻想的开端观察,才能看清在“战时共产主义”一极和新经济政策一极之间的经常摇摆,这种摇摆是苏联历史存在的特点。我们已经说过,共产主义意味着消灭商业生产。我们还说过,按照列宁的意见,消灭商业生产只有在一种严格的条件下才能完成,这就是彻底消灭商业、货币、利润、竞争,总之消灭一切没有它们就根本谈不上经济的东西。因此共产主义国家出现了种种怪事,似乎党的灵知想消灭(经济)现实,以便使阿兰·贝桑松所说的“意识形态超现实”<sup>105</sup>独占统治。党的灵知对此加以谴责,因为它真正在尝试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即实

行一种意味着“政府和人民之间某种隐蔽的内战”<sup>106</sup>的制度。人民就像关在笼子里供实验用的兔子，可以通过改变遗传密码对它进行独特的实验，使它变成另一种生物。这种做法非常愚蠢，如果这种实验成功，其结果将是实验用兔子的死亡，就是说，由于不尊重一切经济规律而导致社会毁灭。然而，总是充满无秩序激情的革命精神，拒绝接受现实原则。它的行动受“要么全部，要么全无”<sup>107</sup>的原则支配。不管付出多大代价，资本主义这个“颠倒的世界”必须被颠倒过来，全部现实必须通过集体主义这个符合人本性的唯一社会组织形式加以改造。人们之所以对党的灵知“科学”制定的计划进行反抗，是因为他们还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蒙蔽。另一方面，只要没有彻底消灭腐蚀人本性的非自然制度（私有制、货币、市场等），人们就不能摆脱“错误意识”。换句话说，人们必须被迫成为自由的人，他们必须被迫放弃腐蚀一切和使一切反常的“触媒”规律，他们必须被迫接受意识形态的超现实。这种做法短时期内无疑代价高昂和令人痛苦，但从长远看是很值得的，因为由此会最终出现非异化的人类。

这样一来，不止一次地发生过这种事情（1918—1920年和从1929年起在俄国，1958—1960年和1966—1976年在中国，70年代末在柬埔寨，这是一些最著名的事件）：共产党的政策在试图把（经济）现实纳入严格的（意识形态）超现实的形式时，制造了空前规模的大饥荒。在这种饥荒时期，成百万人饿死。这一切都是由顽固地、几乎是凶暴地拒绝承认：马克思所开出的克服异化的药方（它集中全力咒骂触媒，把它看作“一切祸害的根源”和唯一来源）只能导致生产能力的大崩溃，尽管当时情况特殊。

不仅如此。意识形态的超现实和经济现实之间的冲突大部分是统治原则和自发性原则之间的冲突。列宁的确坚信，资本主义和自发性是一回事。据维克托·达林称，列宁曾反复指出，“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村庄的重新获得自由的市场，也可以使整棵资本

主义大树重新生长起来”。<sup>108</sup>布哈林也同样认为：“资本主义不是被建设起来的，而是它自我建造起来的。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有组织的体系，是无产阶级这个集体的、有组织的主体建设起来的。如果说建立资本主义的过程是自发的，那么建设共产主义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自觉的，就是说，是一个有组织的过程。”<sup>109</sup>毛泽东也一样，他多次提醒他的党员同志：一旦社会放弃了它的自发的发机制，它就会取消私有制、劳动力和资本主义剥削。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存在着非对称性：资本主义是自发的制度，共产主义是有计划的制度，它是按照自党的计划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不是被建设起来的，而是在社会可以避免夺取国家政权的时刻自然产生的。与此相反，共产主义为了达到目的必须取消商业<sup>110</sup>而为了实现这一点，它只能这样做：它必须把所有社会力量置于唯一权威的思想控制之下。因此，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是两种互相对立的制度，正如自觉性和自发性互相对立一样。两者的和解是不可想象的。最多只能妥协，或者更确切地说，最多只能停战。而从原则上讲，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唯一可能的关系是“生死决斗”的关系。

有趣的是，单就这一点来说，列宁的看法同哈耶克的想法不谋而合。两者都认为资本主义是自发的和不道德的现象。但是哈耶克认为，最好是顺其自然，永远丢掉社会公正的想法。<sup>111</sup>列宁则相信，人剥削人的现象是可以克服的，办法是消灭社会的自发性，列宁把这种自发性同贸易自由相提并论。这种意见有各种各样的结论，其中重要的结论是：共产主义愈想真正实现计划经济的理想，它就愈不得不实行被压迫者的专政，以便防止社会自发势力占上风而导致资本主义报复。换句话说，共产主义必须始终把所有社会力量控制起来，使国家对一切领域的主动权的垄断制度化。如果不这样做，就是说，如果意识形态权力放弃对社会的监护，那就会逐渐脱离共产主义。因此，意识形态权力必须建造得像一个“鸟

笼”。<sup>112</sup>这个笼子的大小可以变化(如果它是相当大的话,就可实行新经济政策,在这种政策影响下,为经济失败所迫,党不得不放松对社会的压力,允许社会有一定的行动自由),但它的职能,即防止脱离共产主义,无论如何是不能改变的。因此要求实行经常不断的控制,当形势被认为有利于“最后突击”的时候,就要求对社会的自发性进行一场战争。这样的战争永远不能停止,严格地讲,它可以具有世界范围的性质。如果只是世界的一部分摆脱了意识形态权力的压力,那么资产阶级精神也会重新污染人类,使人类不可挽回地受到腐蚀。因此,共产主义计划同意识形态专政、同反对公民社会自发倾向的经常不断的战争是密切相连的。只有当完全脱胎换骨、丢掉资产阶级癖好的“新人”诞生了,党的灵知才能解除武装。只要这种人类学的突变没有完成,共产主义计划就有权利和义务要求对一切的一切实行无限统治。

## 七

如果共产主义的实现要求彻底摧毁市场,如果从另一方面说市场的死亡意味着经济的死亡,那么,从中就要得出结论说,共产主义可以自我毁灭。不摧毁现实(它赖以生存的市场经济)共产主义就不可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因此可以说,伊戈尔·萨瓦列维奇的论点中有些真实的东西,这种论点认为,死亡学原则始终贯穿在马克思和列宁的计划中。<sup>113</sup>至少柬埔寨的革命使人不得不同意,被按字面执行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教条导致了一种并非自愿的集体自杀。波尔布特领导下的柬共是唯一拒绝向(经济)现实妥协的共产党。它忠于科学,废除了贸易、私有制和货币,而代之以合理化。直接的结果是:成百万人由于生产几乎全面崩溃而死亡,幸存的柬埔寨人受到少数狂热者的威胁,他们在贯彻集体主义思想时毫不犹豫地实行了“彻底清理”的政策。柬埔寨的共产主义无疑是极端的共产主义。正因为这个原因,人们可以从它身上极其清楚地看到一

场以消灭市场经济为目的的革命必然导致的结果,而其它形式的共产主义为了避免自我毁灭而制止了这种结果。其它形式的共产主义从来都不同意这些原则。它们总是容忍某种形式的市场生产。甚至在“战时共产主义”年代也是如此,“尽管遭到种种限制和禁止,自由市场仍然存在并得到发展,农民和投机分子通过多种渠道把他们的粮食运到城里,用以交换工业品,虽然从苏维埃政权成立的最初几个星期起就发布了许多与粮食投机作斗争的法令,这些法令甚至规定,投机分子或进行破坏者一经发现立即枪毙……,但实际上可以说,自由市场的存在是布尔什维克保持政权的一个因素”。<sup>115</sup>

甚至斯大林主义的革命也未能取消自由市场和彻底消灭属于典型资本主义的经济范畴。<sup>116</sup>恰恰相反,在计划经济背后,在当权者默许下,形成了一种由“触媒”原则来调节的生产和贸易。“这种并行的产品市场”的主角“是托尔卡契(组织者),或多或少合法的中间商,他们形式上是某企业的职工,走遍整个国家以开展非法的经营。1952年3月30日,讽刺性的《鳄鱼》杂志为这种人画了一幅绝妙的小漫画并配有一首小诗,其中说,他们可以得到一切,铁、砖、木材、钉子……使用的方法总是走后门,即对最高主管机关进行贿赂。在斯大林时期整个苏联流传着这样一则笑话:后门硬于斯大林。这是不奇怪的。”<sup>117</sup>要想知道在计划经济夹缝中形成的黑市有多大规模,只要看一看下列统计数字就够了:1950年5月15日发表在一家苏联报纸上的一篇文章估计,1959年一年中,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国民经济委员会各办公室就有足足7000(!)名托尔卡契拜访过。

在斯大林时代极盛时期,存在着一种繁荣的、最高主管机关被迫容忍的、具有商业性质的平行经济,这一事实最清楚地说明,任何一个复杂的社会都不能放弃作为生产和分配过程自动的自我调节机制的市场。这意味着,马克思和列宁废除“触媒”规律的计划使

“共产主义制度注定要生存在一种精神分裂症般的境况中：一方面它咒骂自由贸易、竞争和价值规律，另一方面却不能放弃它们。这种制度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为了扼杀资本主义萌芽，它必须从“一种经济转向一种非经济”。<sup>114</sup>然而除非使它所依赖的物质基础遭受可怕的崩溃，否则就做不到这一点。因此，这一制度（柬埔寨的共产主义是唯一的例外）总是破坏自己的原则，而口头上从来不否认这些原则，因为如果它这样做，它就会在所统治的群众面前失去合法性的主要根据。它注定要生存在明显的自我矛盾之中，而为了不使这种明显的矛盾公开化，它不得不掩饰现实。这种制度化的谎言对这一制度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的是禁止提出问题。因此必然要限制自由思想，并使埃德加·莫兰称之为“垄断情报和真理”<sup>115</sup>的作法制度化。否则将会表明，共产主义理想同经济的合理性是格格不入的。

这里自然会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列入特权花名册的人们顽固地闭眼不看指令经济的全部非合理性？为什么他们不去彻底改革这种经济？从这一点来说，这些人同布尔什维主义的革命家毫无共同之处。这些革命家曾狂热地相信已经掌握了恰恰是“复活人性”<sup>120</sup>的药方，他们实际上不可能对事物有正确的理解。而事实上从赫鲁晓夫开始，在特权花名册阶层中就已经有人认识到进行激进改革的必要性。1962年叶·格·利别尔曼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著名文章，文中建议为了“取得最大的生产效益”拓宽商业经济的范围。办法是分散决策过程，保证企业自主核算，实行“预算利润”原则。<sup>121</sup>接着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尽管使用的是公式化的语言，在讨论过程中表明，大部分经济学家和经营者对指令经济的生产能力是不满意的，甚至是担心的。然而毫无改变。虽然前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1965年底曾宣布进行一系列改革，以便“扩大企业自主权和按照利别尔曼路线改变经济刺激制度”；<sup>122</sup>但是保守的倾向终于对合理化的倾向占了上风，因为机关当权者害怕（很自



然),决策过程的分散会使权力从中央向周围大量转移,从而使他们丧失部分权力。不仅如此,通过引入多头政治因素,实行利别尔曼模式最终会侵犯制度的严格中央集权的逻辑,结果会至少部分地恢复公民社会的自主权,十月革命通过普遍剥夺生产资料 and 分配手段,已经破坏了这种自主权。《真理报》写道:“把国民经济的经营管理转交给所谓的生产者实际上意味着中央集权国家的毁灭,由此将产生一切严重后果”。<sup>123</sup>

有超凡能力的官僚主义充分意识到由政权和阶级特权产生的危险,它拒绝可以提高生产力的改革。它毫不迟疑地为了极权统治而牺牲经济合理性。在它继续相信资本主义由于“无可救药的内部矛盾”注定很快就会崩溃的情况下,就更是这样。既然只要等着“腐朽的西方”崩溃就有可能取得世界范围的胜利,为什么要冒险采用会导致无法控制的权力转移的模式呢?根据这种信念,最合理的解决办法是:积极向军事领域投资,以便为最后的冲突进行全副武装,同时避免俄国社会受到“资产阶级思想”污染,加强党对社会生活一切领域的思想监督,对“持不同政见者”毫不留情。于是不进行改革,而是探讨最大的稳定性:这就是苏联共产党在权衡了赞成还是反对带有把俄国引向资本主义怀抱危险的合理化论点之后所采取的路线。<sup>124</sup>这一路线由勃列日涅夫向中央委员会全会作了如下表述:“我们必须强大,以便抵御帝国主义势力;我们同他们进行贸易,我们建议同他们保持和平合作,同时我们力图使我们的力量保持节奏,以避免思想污染。我们要保持党的统治和社会监督,以便在不稳定的世界中创造一片稳定的绿洲。让我们等待西方由于它的内部经济危机和它同第三世界越来越紧张的关系而自行灭亡。我们应当避免冒险或采取危险的倡议。历史在我们这一边”。<sup>125</sup>

通过这段话可以看出,为什么戈尔巴乔夫在进行激进改革之前举起公开性的旗帜。公开性不仅意味着决策过程的透明度和促

进政治讨论,公开性也意味着对外部世界的新关系,首先是克服对精神污染的恐惧,这种恐惧从一开始就笼罩着苏维埃制度,并使它组成一个把一切不符合正统观念的思想统统作为“资产阶级”思想拒之门外的军事化寺院。只要苏联共产党仍然禁锢在自己的意识形态之中(这似乎是充满戈尔巴乔夫政策的信念),那它对现实的看法就是扭曲的,而且当它以惊人的速度走向不发达状态时,它却相信苏联是先锋战士。党必须从禁锢它的意识形态的笼子里走出来,这是它能够对苏联反经济所具有的弊端作出合理诊断不可缺少的条件。因此,公开性意味着从思想封闭走向思想敞开,放弃作为产生经济闭关自守条件的思想闭关自守,克服意识形态超现实,采取现实原则。换句话说,接受修正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可以和合理性相提并论),以便取消列宁所说的特殊形式的思想检查制度,这种制度被称为“民主集中制”,它创造了职业革命家的党,这些人作为马克思主义灵知的主宰者坚定不移地相信,他们是历史的主人。

### 注释:

1. 米·戈尔巴乔夫,《改革》,1987年米兰蒙达多里出版社版第13—14页。

2. 同上,第15页。

3.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面对1929年的危机和苏联五年计划所取得的惊人成就,熊彼得得出结论说,“没有任何东西不在纯粹的社会主义逻辑学中起作用”,“从逻辑学观点看,不可否认,社会主义模式是在更高的合理化计划基础上创造出来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民主》,1964年米兰社会出版社版第167、168页)。熊彼得多少有点傲慢地讽刺说,现在只有米塞斯一人相信,计划经济根本没有合理性。大概用不着重提,在非共产主义左派中曾经多么广泛地流传一种看法,认为“国有经济从根本上说是先进的”(P.布尔然、R.兰贝尔《社会主义》1955年巴黎PUF出版社版第18页),虽然它自身带有独裁甚至极权主义性质。

4. 米·戈尔巴乔夫,《改革》,第25页。

5.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928页。

6.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2

页。

7. 让·保罗·萨特：《辩证性批判》，1960年巴黎加利马尔出版社版第275页。

8. 这是因为实际上“苏联的计划工作主要是极为杂乱无章的”（M. 托德，《最后的崩溃》，1976年巴黎拉丰出版社版第94页）。真实存在的不是通常不能“切中”目标的计划，而是计划者借以进行工作的管理技术的命令。

9. 可见，罗伯特·海尔布龙纳（《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和发展》，1973年耶不勒斯利果里出版社版第35—37页）的评论是不正确的。他说，与传统经济相比，指令经济的决策特征是动力。恰恰相反，苏联经济的历史寓言（和采用它的基本制度的所有国家一样）显然表明，一个生产组织如不考虑市场，其必然的结局就是停滞。

10. 米·戈尔巴乔夫：《改革》第36页。

11. 同上，第55页。

12. 同上，第58页。

13. 同上，第58页。

14. 莫·多勃：《社会主义的理智》，1973年罗马里乌尼蒂出版社版第57页。

15. L. 休伯曼和P. 斯威奇：《社会主义导论》，1973年罗马辛维里出版社版第86页。

16. 如果集体主义能够保障更高层次的自由、平等、博爱，那么不言而喻，它的经济衰退本身不是反对它的充分理由。糟糕的是，凡是集体主义已经制度化的地方，集体主义都造成了新的、更严重的异化形式。这是随着取消自由之花和建立一个“新阶级”同时出现的。有非凡能力的官僚机构是辩证革命灵知的唯一权威权的传声筒，因此它能够对无产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17. 阿·阿甘别吉扬：《经济制度改革》，1988年米兰蒙达多里出版社版第173页。

18. 同上，第176页。

19. R. 加鲁迪：《如意算盘》，1976年阿西斯奇塔代拉出版社版第43页。

20. 米·戈尔巴乔夫：《改革》，第45页。

21. 列宁：《19世纪末俄国的土地问题》，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7卷第111页。

22. 列宁：《论粮食税》，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226页。列宁在评论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一书时，对这个思想重新作了表述，他写道：“小生产者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引自斯大林《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见《斯大林文选》下卷第125页）

23.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832页。

24. 列宁在给人民委员库尔斯基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们不承认任何‘私人’性质的东西，在我们看来，经济领域中的一切都属于公法范畴，而不是什么私人性质的东西。

我们容许的资本主义只是国家资本主义，而国家……就是我们。”（《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427页）

25. 公有化政策不仅涉及经济，而且涉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艺术、科学、哲学、家庭等等）。一旦物质资源方面的私人领域和公法范畴之间的任何区别都被取消了，那么目的自然也就公有化了。可以一再强调指出，谁控制了手段，谁也就控制了目的。可见，取消了市场（在这里，个人的目的和集体的目的在组织起来的基础上通过经济体制的一些中心而互相对立），也就等于取消了公民社会在国家内部的自治，走上极权主义道路。只要看看普鲁东和巴枯宁对马克思恩格斯集体主义的批判，就可以认识到，苏联的极权主义不是历史上的偶然现象，而是生产资料全部国有化的必然结果。（参看 L. 佩利卡尼《市场和社会主义》，1979年米兰苏加加尔出版公司出版）

26.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为一家共产主义杂志写的一篇导言：见《伦理主义和政治革命》1972年罗马牛颈·康普顿出版社版第161页。

27. 卡·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30页。

28. 罗·麦德维杰夫，《革命之后》，1978年罗马里乌尼蒂出版社版第35页。

29. 尼·布哈林：《关于革命的道路》，1980年罗马里乌尼蒂出版社版第36页。因此不能说，“布哈林认为，市场及其供求规律对于制度是完全中立的，因此对社会主义也是有益的和必要的”，“资本主义的本质不是市场，而是大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海因茨·蒂默曼就是这样说的（《从布哈林到戈尔巴乔夫的反覆》，见1989年《世界工人》第1—2期第109页）。马克思和列宁的社会主义同其它一切社会主义的区别，恰恰在于它拒绝承认市场是一种中立的的东西，因此取消市场同消灭人剥削人现象是一致的，在这个根本性的重要问题上，布哈林从未离开过共产主义的正统观念。

30. 尼·布哈林：《关于革命的道路》，第48页。

31. 大家知道，最热心地为布哈林主义的这一论点辩护的是斯蒂芬·科亨（《布哈林和革命的共产党人》，1975年米兰费尔特利尼里出版社出版）。C. 萨尔蒙不指名地批判了这一论点，见1980年巴黎无花果出版社出版的《尼古拉·布哈林的严密理想》。此外，值得一提的是L. 卡塞纳的精彩的短评《布哈林和过早的革命》（见1976年《世界工人》第12期）。

32. 关于1918—1920年俄国发生大饥荒的原因，至今为止还是B. 布鲁茨库斯在《苏俄经济计划》（1935年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出版）一书中所作的分析最为有趣，必须指出，布鲁茨库斯是用文件证明指令经济本来就不合理的第一位知识份子。

33. 1926年10月，布哈林批评了工人亚科夫·奥索夫斯基。这位工人建议成立第二个党并承认自由交换意见合法。布哈林提醒人们注意：“辩论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它会动摇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我们党的统一和党在全国的统治，它会助长希冀政治自

由的各种派别的声势。”(引自 M. 里勒和 A. 涅克列克《苏俄史》1984 年米兰里佐利出版社第 236 页)

34. 尼·布哈林,《关于革命的道路》,第 49 页。

35. 尼·布哈林,《关于革命的道路》,第 112 页。

36. R. 蒙多尔福,《赤色革命研究》,1968 年耶不勒斯莫拉诺出版社版第 207—208 页。

37. 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关于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基本规律》,见尼·布哈林、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社会主义积累》,1975 年罗马里乌蒂尼出版社版第 91 页。

38. 让·埃伦斯坦,《斯大林现象史》,1975 年罗马里乌蒂尼出版社版第 91 页。

39. H. 卡雷尔·霍拜科斯,《斯大林. 恐怖制度》,1979 年巴黎弗拉马里翁出版社版第 33 页。

40. D. 鲁塞,《分裂的社会》,1973 年巴黎格拉塞出版社版第 313 页。

41. 摩·莱温,《关于斯大林主义的社会根源》,1988 年都灵埃瑞迪出版社版第 73 页。

42. 列宁,《在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6 卷第 335 页。

43. 列宁,《关于粮食状况和军事形势》,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7 卷第 117—118 页。根据这个纲领性声明还不能回答:为什么可以说“战时共产主义是一种经验的创造而不是一种理论本来就会产生的结果”(莫·多勃,《苏联经济史》,1972 年罗马里乌蒂尼出版社版第 142 页)。事实正好相反,“新经济政策可以用事物本身的力量来解释,战时共产主义可以用错误思想的力量来解释”(R. 阿龙《为没落的欧洲辩护》1977 年巴黎拉丰出版社版第 172 页)。

44. A. 埃利希,《苏联关于工业化的争论》,1969 年罗马拉泰尔扎出版社版。

45. 恰恰相反,罗伊·麦德维杰夫认为可以肯定,斯大林主义革命破坏了“列宁主义的自愿集体化原则”(《斯大林主义》1972 年巴黎门檀出版社版第 135 页)。可是他忘了告诉他的读者,早在 1918 年 5 月,关于为消灭小私有者必须采取的方法,列宁曾讲过这样的话:“和平是不可能的,人们甚至很容易使富农同地主、沙皇和教士和解,即使以前互相发生过争执;但是,永远不能使富农同工人阶级和解。因此我们说,对富农的斗争是最后的、决定性的斗争……是对富农的一场不可调和的斗争。一直斗争到死。对于为他们辩护的政党,对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现在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要憎恨和厌恶。工人必须用铁拳粉碎富农的暴动。”此外还必须考虑到,如在喀琅施塔得二人的的一份文件中写道,从 1918 年起,“全体农民群众都被宣布为人民的敌人和富农的朋友”(见 G. 德拉卡塞,《陌生的反革命》,1977 年米兰亚卡·布克出版社版第 52 页)。

46. 弗·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17页。
47. 沃·布鲁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运行》,见《马克思主义史》,1987年都灵埃瑞迪出版社版第4卷第226页。让·埃伦斯坦认为,斯大林“对(马克思的)思想作了无谓幻想的解释”(《斯大林》,1984年巴黎山毛榉出版社版第182页)。这种说法使人惊讶。一切都说明,斯大林主义革命是返回到“战时共产主义”,而“战时共产主义”无非是一种尝试,企图把俄国现实硬塞进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阐述的集体主义幻想的形式中去。就这一点来说,他是忠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的,连采用的方法也是这样。“奠基人”曾赤裸裸地指出,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权力思想,有必要使用恐怖和暗杀手段(见L.佩利卡尼,《马克思主义的贫困》,1984年米兰苏加出版公司出版)。
48. L.罗宾斯,《论自然和经济学的重要性》,1953年都灵UTET出版社版第20页。
49. L.冯·米塞斯,《人的行动》,1968年芝加哥当代图书出版社出版;《社会主义》,1969年伦敦凯普出版社出版。
50. 比·约·翰森,《贫困的哲学》,1975年卡塔尼亚无政府主义出版社版第192、146页。参看1961年有冬印书馆中译本第85页。
51. 弗·恩格斯,《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48页。
52. 罗·卢森堡,《政治经济学评论》,1955年米兰亚卡·布克出版社版第73页。
53. 约·梅·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71年都灵UTET出版社版第516页。
54. L.冯·米塞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核算》,见A.F.冯·哈耶克《集体主义经济的计划性》,1946年都灵埃瑞迪出版社版第90页。
55. 见S.T.波索尼,《关于全面战争的经济学》,1939年都灵埃瑞迪出版社出版。
56. F·福特,《政治经济学手册》,1970年都灵埃瑞迪出版社版第1卷第593页。
57. M.韦伯,《经济与社会》,1958年米兰联合出版社版第100页。
58. 这就是说,共产主义和货币是互不相容的:“不是制度败坏货币,就是货币败坏制度”(P.R.曼比斯基,《计划经济》,1984年巴黎门霍出版社版第159页)。
59. P.纳维尔,《官僚主义与革命》,1973年米兰亚卡·布克出版社版第222页。
60. 布·里齐,《官僚主义的集体主义》,1977年米兰苏加出版公司版第66页。
61. 有趣的是考茨基在《爱尔福特纲领》(1971年罗马萨奎里出版社版第141页)中毫不犹豫地承认,“社会主义生产同完全的劳动自由,即同工人的劳动自由(不管它以什么方式和在什么地方),是互不相容的。”
62. 引自奥·兰格,《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见《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经济学》1975年罗马苏维里出版社版第129、131页。书中指出,考茨基的这些话使他开始接近

下第二国际第一个修正主义社会党人弗朗切斯科·萨韦里奥·梅利诺(这种说法不妥。梅利诺在第二国际时期是无政府主义者,不能说是“第一个修正主义者”。——译者)的立场,梅利诺1920年写道:“价格决定个人消费,压制这个调节者是不可能的,除非国家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所有的人,压制任何主动性,把农民和工人管制起来,使他们军事化,强行规定价格,进行查封和没收,垄断和限制消费……。自由是不能取消的,因为即使有其它各种积极性,自由也是经济积极性的推动力,否则会使经济资源枯竭”(《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和政治》,1948年米兰隆加内西出版社版第57页)。

61. G. 索科洛夫,《顺从的经济》,1976年巴黎卡尔曼—莱维出版社版第148页。

64. 重提托洛茨基的话很有意义。他在1937年写道:“在一个国家是唯一主人的国度,提反对意见意味着饿死,‘不劳动者不得食’的旧原则被‘不听话者不得食’的原则所代替”(引自A. F. 冯·哈耶克《通向奴役的道路》,1948年米兰里佐利出版社版第106页)。

65. D. 佐泽:《马克思主义者和国家》,1976年米兰天平出版社版第330页。

66. 克·纳波莱奥尼,《900人的经济思考》,1963年都灵埃瑞迪出版社版第151—154页。

67. V. 帕雷托:《政治经济学手册》,1974年帕多瓦CEDAM出版社版第165页。

68. 恩·巴罗内:《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部长》,见《经济学家日记》1968年版第410页。

59. 莫里斯·多勃的说法不能被看作是回答,因为他只限于重复说统一计划优越于市场,他确信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价值规律将“不存在”(《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1972年都灵博林希里出版社版第306页)。二是他就同这样一些人站到了一起,这些人犯了相信社会主义问题仅仅是技术问题的错误。山德罗·彼得里内曾把这个错误称为“严重的”错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见《世界工人》1962年第3期第89页)。卡尔·波拉尼关于非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核算问题所写的文章(见《一个复杂社会中的自由》,1959年都灵博林希里出版社出版,第1部分中收入的他的文章)属于市场社会主义传统,因此不能认为是为马克思主义模式即严格国有化模式作辩护。

70. 奥·兰格:《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第75页。

71. 奥·兰格:《电脑和市场》,见《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学》,1975年佛罗伦萨意大利新闻出版社版第348页。

72. A. 诺夫:《一种可行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学》,1986年罗马里乌蒂尼出版社版第157页。

73. 这种模式曾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强烈批判,他们认为这是假竞争经济(见B. 明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1967年米兰费尔特利尼里出版社版第357—359页)。

74. 赫鲁晓夫下台前不久,关于电脑、线性程序设计和数学计算为计划工作提供的可能性问题,在苏联曾展开过大规模辩论。经过辩论认识到,如果想通过集中方式处理一连串完全被分解的数据,电脑绝对不可能胜任成百万的变量(А. 诺夫:《斯大林和斯大林之后在俄国》,1976年波伦亚磨房出版社版第231页)。

75. L. 罗宾斯:《计划经济和国际秩序》,1964年米兰里佐利出版社版第29页。

76. 莫·多勃:《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第266页。

77. L. 冯·米塞斯:《社会主义》,第139页。

78. F. A. 冯·哈耶克:《交换和民主》,1977年米兰天蝎座出版社版第195页。

79. 托洛茨基:《1929—1936年文集》,1970年米兰蒙达多里出版社版第77页。

80. 自诩社会主义则不同。例如赫鲁晓,他用明确的语言阐明了这样的思想:社会主义“必须通过按照相互关系和联合权利原则‘恢复’所有权把工人变成工业机构的共同占有者及其利益的部分所有者,而不是把他们作为奴隶锁起来”(《交易所投机商手册》,1957年巴黎加尼耶出版社版第465页)。因此可以说,赫鲁晓的社会主义并不打算取消利润,而是把利润社会化。

81. 读一下安纳托利·雷巴科夫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对斯大林时期集体主义运转效能所作的历史和经济的分析。书中写道,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由于一处印刷错误被判刑3年,一个学生食堂的厨师由于汤没有做好被送到西伯利亚,一个集体农庄工人由于弄坏一部脱粒机被判刑坐牢。有人错误地以为,这种方法缺乏任何理智。由于取消了市场经济特有的刺激,共产党没有别的手段,只能求助于恐怖,以便强迫工人遵守纪律,尽最大努力完成分配给他们的任务。《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一书中另一个主要人物(一位共产党员领导人)赤裸裸地讲述了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党所遵循的价值观念,另一个方面是党的政策的残酷无情。他完全意识到这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矛盾。他说:“我们还能怎么办呢?等待俄国农民改变他们的性格,克服他们几百年之久的落后,任他们在这期间去破坏拖拉机吗?不,我们只有唯一的手段,即恐怖。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这就是破坏活动。你使一部拖拉机趴窝吗?好吧,你就是破坏分子,这意味着10年坐牢。如果是一部联合收割机,甚至还要多于10年。这样,农民自然就会多考虑考虑,当他坐在拖拉机时,他就会感觉到背上起了鸡皮疙瘩。”

82. 恩·诺尔特:《民族社会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1988年佛罗伦萨桑家尼出版社版第330页。

83. J. A. 熊彼得:《经济发展理论》,1968年佛罗伦萨桑家尼出版社版第169页。

84. P. J. D. 怀尔斯:《经济制度比较》,1977年牛津布莱克维尔出版社版第15页。

85. 布·霍尔瓦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1982阿蒙克夏普出版社版第269页及以下各页。沃·布鲁斯:《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1965年米兰费尔特利尼里出版社版第



167 及以下各页。霍尔瓦特和布鲁斯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同市场是可以协调一致的,这个论点是绝对站不住脚的,我在我的《计划经济和极权主义》一文(1986年《世界工人》第6期)中曾论证过这一点。

86. F. A. 冯·哈耶克:《知识、市场和计划性》,1988年波伦亚磨房出版社版第309页。

87. B. N. 沃蒂:《社会主义经济》,1967年纽约伦道姆·豪斯出版社版第263页。

88. 奥·席克:《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工业社会》,1974年米兰加尔桑蒂出版社版第212页。

89. 奥·席克:《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见L. 因凡蒂诺《集体主义幻想》1983年米兰苏加出版公司版第223页。

90. 我这里说“几乎是”,是因为同计划者帝国所规定的价格现实有某种联系。这至少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因为在集体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一种由价值规律调节的经济成分,这相当于法律承认的微型资本主义或者隐蔽的资本主义。其次是因为有些资本主义国家的计划负责人定期地调整价格的发展,使之适应于管理价格。这就是说,共产主义不可能放弃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的使命是把资本主义连根拔除,但是它不得不容忍资本主义,以便把自己的生产能力保持在相当水平上。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共产主义可以不必利用资本主义(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这就是,当它能够把自己的制度强加给地球上所有民族的时候。到那时就没有了进行比较的可能性,因此任何人也不再能够衡量它的非合理性。

91. F. 费尔、A. 赫勒、G. 马库斯:《对需求专政》,1983年米兰苏加出版公司版第316页。

92. L. 沙米利:《社会主义经济的第一个模式》,1978年那不勒斯利果里出版社版第83页。

93. 尼·布哈林、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共产主义ABC》,1975年罗马牛顿·康普顿出版社版第250页。

94. D. 西尼亚夫斯基:《苏维埃文明》,1988年巴黎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版第100页。

95. G. 奥维尔,《1984年》,1973年米兰蒙达多里出版社版第232页。

96. R. 阿龙:《进步的幻灭》,1969年巴黎卡尔曼—莱维出版社版第47页。

97. J. H. 考茨基:《共产主义和发展的政治学》,1968年纽约威利出版社版第73页。

98. F. 勒穆瓦纳:《中国经济》,1986年巴黎地平线出版社版第32页。

99. F. 费日托:《列宁的遗产》,1973年图耐卡斯特曼出版社版第231页。

100. 不久前中国当局承认,1958—1960年之间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的人数不少于

1,000万。因此琼·鲁滨逊把大跃进确定为“不负责任的冒险”不是没有道理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1969年巴里拉泰尔扎出版社版第13页)。说到所谓文化大革命这种“战时共产主义”的死灰复燃,不能不把它看作一种残忍的试验。事实证明,把经济完全意识形态化是一条走向贫困的道路。可是这种意识形态化的做法又被重新采用了,而完全不顾及它所带来的痛苦。

101. 威·勒普克,《集体主义的危机》,1951年佛罗伦萨意大利新闻出版社版第35页。

102. 鲍·索瓦林,《斯大林》,1977年巴黎钱普·利布里出版社版第452页。

103. G. 格罗斯曼,《俄国和苏联的工业化》,见C. M. 奇波拉《欧洲经济史》,1980年都灵UTET出版社版第4卷第372页。

104. A. 格申克龙,《经济落后的历史问题》,1974年都灵埃瑞迪出版社版第126页。

105. 阿·贝桑松,《苏联学短篇论文集》,1976年米兰天蝎座出版社版第56页。

106. 米·吉拉斯,《新阶级》,1957年波伦亚磨房出版社版第99页。

107. 英·科拉科夫斯基,《革命精神》,1982年米兰苏加尔出版公司版第9页。

108. F. 布劳德,《资本主义的发展》,1977年波伦亚磨房出版社版第74页。

109. 尼·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1951年三联书店版第49页。

110.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商业是一种“非自然的”和“违反常情的”现象。因此它想建立一个没有市场的社会。共产主义的所有悲剧都是由于这种观点造成的。这是一种“发疯的”观点。原始社会固然不知道西方文明所规定的那种经济人,但是即使在这种社会中,我们也看到触鼻规律发生作用(见H. K. 施奈德《经济人类学》,1985年波伦亚磨房出版社出版),虽然这种规律不像在资本主义社会占有独立地位。可是这种规律却被社会主义者限制起来了。

111. 首先见F. A. 哈耶克,《法律、法规和自由》,1986年米兰天平出版社出版。也许完全有必要提醒人们,哈耶克的极端自由主义严格说来会导致社会解体,卡尔·波拉尼在《大转变》(1974年都灵埃瑞迪出版社出版)一书中非常精辟地阐明了原因。由自我调节的市场产生的文化灾难之所以受到限制,正是因为,在工人运动的压力下,国家和市场之间的社会民主主义妥协已经制度化。

112. 赫齐亚诺·慕尔恰尼关于中国共产党人对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看法是很有教益的。他写道:“共产党领导人一再强调的基本观点是,经济必须是社会主义的,私人成分必须在国家计划范围内活动。北京一位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告诉我,它像一只鸟,它可以随便飞,但只能在笼子里飞。”(《禁止通行的门》,1984年米兰隆加内西出版社版第14页)。

113. 伊·萨瓦列维奇：《社会主义现象》，1877年巴黎索维尔出版社版第320、324页。

114. E. 费尔：《奥姆斯：凶手的乌托邦》，见《世界工人》1983年第3期；L. 佩利卡尼：《奥姆斯：凶手的乌托邦的来源》，见《世界工人》1983年第4期。

115. 罗·安德维杰夫：《革命之后》，第47页。

116. 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对此感到震惊，为了照顾到他们亲眼看到的令人不安的现象，他们提出了各种美妙的想法。例如，夏尔·贝特兰认为，商业范畴的存在可以用“生产力处在不发达阶段”来解释，因此一个社会经济中心不可能切实地、完全熟练地支配所有产品并精确地按照社会需要调整生产（《社会主义经济过渡》，1958年米兰亚卡·布克出版社版第55页）。欧内斯特·芒德尔则断定，“经济范畴在苏联的存在显然说明了这个国家还不是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文集》第2卷第283页）。他显然认为，这些因素的存在是苏联经济制度中始终具有某种合理性的主要原因。爱德华·利干斯基有一次向我说，如果没有黑市，共产主义国家的经济崩溃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崩溃会具有宏观规模。

117. 欧·芒德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文集》，第2卷第325页。

118. 阿·贝桑松：《对一个幽灵的分析》，1981年巴黎卡尔曼—莱维出版社版第141页。

119. 埃·莫兰：《苏联的本质》，1983年巴黎法亚尔出版社版第63页。

120. 尼·布哈林、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共产主义ABC》，第7页。

121. 叶·格·利别尔曼：《计划、利润和奖金》，见A. 诺夫和D. M. 纽特《社会主义经济学》，1976年伦敦企鹅出版社版第309、314页。

122. 莫·多勃：《苏联经济史》，第437页。

123. F. 迈耶：《苏联的衰亡》，1984年米兰隆加内西出版社版第215页。

124. 斯坦尼斯拉夫·维希科夫把至今还笼罩着苏联与东欧的不安情绪表述如下：“如果某人开始雇了一名雇员，那么谁能说这会引起什么后果呢？今天他雇了5个人，明天10个人，几年之内也许就会有整整100人依附于他。这样他就走上了过劳资本主义所走过的道路。”（《世界经济新观察》，1989年米兰里佐利出版社版第75页。）有了这样的想法，就很难设想苏联怎样才能走出停滞的泥潭，更何况维希科夫已经认识到，迫切需要“更大量的私人企业，它们有能力在全国国有企业不能给以适当照顾的领域和方面满足对产品和服务的需要”（米兰隆加内西出版社版第37页）。

125. 诺夫：《斯大林和斯大林之后在俄国》，第253页。

（原文为意大利文，王学东、籍维立转译自德文）

---

## 自治——持久的革命

普雷德腊格·弗兰尼茨基<sup>\*</sup>

本世纪是这样—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社会革命产生了，但社会主义还没有实现历史对它的期待和希望，还没有成为一个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体系。资本主义还有力量通过其内部的变革（首先是依靠科学和国家）一直统治着世界舞台，尤其是在经济和技术方面。情况为什么是这样的呢？

原因简单得出乎人的预料。社会主义迄今主要是在比较落后或者完全落后的国家中扩展。革命力量在经济和文化相对落后的前提下取得成就。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在经济基础与全社会的、特别是政治的上层建筑之间出现某种矛盾。上层建筑在一定程度上匆忙地走在了历史的前面，超过了其经济基础。

由此首先产生迄今的社会主义的困难，甚至是双重的困难：其一是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足而出现的内部困难。结果是作为新社会的阶级基础的工人阶级不够发达，民主意识、文化意识不够发达以及科学不够发达。所有这些问题迫使社会主义发展在第一阶段要解决那些在发达的资产阶级社会已大部分完成了的任务。

---

<sup>\*</sup> 普雷德腊格·弗兰尼茨基：政治学教授、原南斯拉夫萨格勒布大学校长。

社会主义的这一早期阶段不能发展新的社会关系,不能扩大那些使消灭劳动分工成为可能的人类“财富”,而必须在先锋队的极其明显的政治支配权下去解决有时甚至是人的基本需要问题。这又说明,社会主义必须尽可能地加快经济发展,这常常是首要的社会主义任务。

其它的困难是外部性质的困难:资本主义仍是人类的发达部分,以致无产阶级到现在为止不得不面对由资本统治着的、发达的世界市场,面对发达国家的科学文化潜力。这种局面迫使社会主义接受一种发展的逻辑,而如果社会主义是在经济和文化上统治世界的各国出现,这种发展逻辑就会是大不相同了。限制社会主义发展的另一个因素,就是存在着侵略形式的资本主义(例如法西斯主义),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必须加强军事潜力,同样也加重了克服经济与文化落后的困难。社会主义是在落后条件下产生的,加上民主传统薄弱,工人阶级特别是在管理社会方面经验不足,它在历史上开始是作为国家社会主义存在的。这一事实决定了迄今的整个社会主义过程。这种社会主义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后人所称的社会主义的设想是不一致的,特别是如果把这种国家社会主义形态固定下来,就更不一致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看到,无产阶级在一定的时间内需要国家来保卫革命成果,同时他们又看到,自由生产者联合体是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前景,国家必然也随之消亡。

这也是列宁的基本观点。他不仅在革命前夕写的论述国家与革命的著作中阐述过这一观点,而且在进行革命的过程中也多次阐述过。在当时的大部分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心目中,苏维埃共和国是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型的国家,同时也是对国家的否定。随着社会主义在世界上首次取得突破,历史的钟摆就越来越多地向有利于党和国家的政治力量方面摆动,并且,随着这些力量取得了日益增大

的优势,社会主义就采取了一种极其明显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形式。

社会主义的这一缺陷,特别是那些同作为更公正、更人道、更自由、更团结的社会的社会主义的原则和历史使命相抵触的现象,削弱了整个社会主义阵线,这在那些自由和民主的意识战胜了极权和屈从意识的工业国家内尤其如此。接着应该指出一些错误,这些错误到现在还在对社会主义变革的速度和方向起着消极的作用,甚至经常损坏其名誉。不改正这些错误,不去深刻地、批判地理解社会主义存在的问题,就会给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带来不必要的困难。

在迄今的发展形式中存在的社会主义的第一个战略上的错误结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至关重要的。革命时期总是充满着浪漫主义和唯意志论。尽管人们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进行战斗,却总是忘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其中之一就是一般、特殊和个别的辩证关系。一般是一种抽象,是具体的空想(布洛赫语),是一种能激励革命力量去改变历史的指导思想。然而历史不是统一的实体,而是在形形色色的人民群体中呈现出来的,这些人民群体有着自己特有的传统和习惯,有着自己特有的心理,有着不同的发展水平。因此,特殊范畴在历史实践中非常重要,并起着决定作用。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没有中介形式,没有媒介,一般,即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和观念就不可能一下子在社会实践中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一个消灭私有制、消灭商品生产和剥削等等的社会。但社会主义进步力量的责任是要重新创造性地揭示在每一个国家实现这种消灭的速度和方式方法。

革命的唯一意志论促使人们想要超越这个不可避免的阶段,这是一个错误,它引导社会主义者,更确切说共产主义者得出后果极其严重的错误结论。历史的坟墓是不会靠拍胸膛奋力一跃而跳过去的。

这种唯意志论的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苏维埃俄国和其它一

些社会主义国家内实现了工业、商业和农业经济的国有化。这些措施引起了农民的反抗,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官僚机构和警察机构的加强,这最终不是引向社会主义,而是引向背离社会主义。特别是中小型工业和商业的国有化明显地降低了社会生活的质量。

另一个错误结论是低估了理论的作用,对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和哲学的发展缺乏理解。首先是低估了知识分子在当今社会的作用,认为上而颁布哲学和理论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对自由对话在发展哲学和理论方面的意义给予应有的评价。

范畴总是历史地确定的、相对的。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进步还是退步,都是相对的。批判已经断定,私有制是人类不平等和异化的根源,但这不是意味着生产资料的任何社会化(到现在为止它还只是国有化)都是正面的,有生产效率的,就像任何私有制并不都是起负面的作用一样。共产主义的目标固然是消灭和扬弃生产资料私有制,但这并不意味着私有制在社会主义制度中,在过渡时期只具有负面的含义。相反,迄今为止的全部经验说明,无论是国有化经济还是国营服务性企业都不能马上完全地代替分支广泛的、小的私有成份或私有经济。这是非辩证地和非历史地理解历史范畴的结果。抽象地理解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就会认为一个虽然贫穷和不发达、但忠于原则的社会,比其它任何社会都重要。

完全可以理解,在发展私有成份方面仍然必须有某些限度,以便一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经受住考验。私有成份和私有制总是具有加强自身领域和征服其它领域的倾向,但限制它们的最重要的办法是要成功地发展社会化成份,成功地发展消除雇佣关系、消除劳动者异化状态的社会主义自治的社会关系。在一个发达的社会中,工人们更喜欢的总是自己的自治状态,而不是私有成份中的某种雇佣关系。当然,只有通过大大缩短劳动时间,自治才能成为人们在理论上对自治所期望的东西,同样,也只有全面发展的个性,才能是一个新人的基础,才能是人道、民主和自由的关系的真

正保证,背负着各种不合时宜的宗教、民族和意识形态的偏见的单向度的个人,是非理性的社会冲突和非人道的行为方面的一个经常的危险。

另一个根本的错误和错误结论是认为社会主义、即所谓的整个过渡时期,无非就是国家社会主义。20年代以斯大林为中心人物的极其明显的官僚主义—国家干涉主义和不民主的实践,助长了这种错误结论。从此,在很大一部分社会主义运动(首先是共产主义运动)中,国家社会主义直线地、有机地向其更高阶段发展的错误占居上风。由此,国家所有制的统治地位和推广的程度以及社会物质力量的发展水平成了评价社会主义制度发展阶段的标准。如果把社会主义的发展理解成国家社会主义的有机发展,那么,出现官僚主义—国家干涉主义的反革命也就十分可能了。这就是斯大林主义的本质,它不是复辟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而是建立新的专横统治,这种专横统治靠国家的镇压机器支撑,对内实行政治恐怖,其规模在当代是意想不到和从未有过的。

斯大林主义使人们在理论和实践上再好不过地认清了,发展社会主义不能等同于加强政治领域(国家和政党),使这些政治领域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对所有至关重要的问题具有决定性的垄断权,同时又削弱工人阶级对自己的劳动成果,扩大再生产以及经济计划的支配权,而工人阶级的这种支配权正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所在。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民主才能超过发达社会已达到的那种民主程度。社会主义民主的前提是在其它一切社会生活领域中把劳动人民的创造力从官僚主义影响下解放出来,是扩大科学艺术创造的自由和整个舆论的自由。只要社会主义不能充分保证各种民主影响和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也就谈不上社会主义发展的发达阶段。

在以往的社会主义发展中还有一个由上述错误引起的错误,这就是传送带的理论和实践。我们在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一



书中看到这种传送带理论已经形成。官僚主义—国家干涉主义的意识形态借助于这种传送带理论,把社会主义社会划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是积极的、创造性的部分,这一部分集中在党的首脑机构,他们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其次是社会整个的另一部分,他们以各种方式来传送首脑的决议和首脑的才智,说到底这是消极的部分。然而,生产者的自由联合(这是大多数革命的社会主义者、首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导思想)在社会主义中必须首先管理劳动领域。社会主义共同体自由发展的基础是个人的尊严和自由,而不是政治领域(指国家和党、见前——译者)的自由,政治领域的自由是社会一小部分人对个人,从而对整个工人阶级施加权力和统治的自由。

政治垄断的必然结果是在政治和公众生活中民主的消失,在落后的一党制条件下情况尤其如此。对每个阶段没有自由的批判性的分析,没有争论和尖锐的对话,社会主义就不能卓有成效地发展。同时,马克思主义没有自由发展,就必然变成一种无聊乏味、空洞无物的辩护。认为在国家社会主义条件下人在经济上和社会上的异化已被扬弃,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在国家社会主义条件下,作为人的异化基础的雇佣关系并没有被消除。政治领域支配着积累,支配着工人阶级的剩余劳动,并按照自己的准则(这也可能是最好的准则,虽然在许多情况下并不如此)通过国家计划来支配这种剩余劳动,于是就发生了异化。如果政治权力是万能的,如果它在不可能遭到抗议的情况下决定国家的整个政策,那么公民的异化也就会发生。异化的某些形式可能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但这只是在特定的阶段和在限定的时间内。社会主义的直接目的不是造出新的利维坦,这一利维坦在落后的条件下不仅吞噬革命的敌人,而且也吞噬革命的婴儿。

由于人们通常把民主只理解为政治民主,在以往社会主义政治中又产生另一个错误结论,人们不明白,人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

曾取得过极其伟大的成就，不能把民主仅仅局限于议会制度之内。争取民主的斗争在历史上一直也是争取扩大社会自由的斗争，这一点在社会生存的所有领域中极为明显。

民主，即民主关系的发展是一个社会规律。在不同阶段，争取民主的斗争总是以争取某种形式和内容的民主为主，例如：以争取思想自由、宗教宽容、经济自由为主等等。但是归根到底，这总是一种力求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中扩大民主的斗争。从这方面说，必须把社会主义视为社会发展中的进一步措施，也就是说，只要可行，就在经济民主范围有限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基础上，实现生产者的自主权。

在政治民主和文化民主方面，同资产阶级社会的成就相比，社会主义没有任何新的东西可以显示。确切说，社会主义必须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并必须是人类发展的一个实现了经济民主和自治民主的新阶段。不言而喻，在这新的过程中，也必须实现人与人之间新的和进步的关系，实现一种新的社会联系、团结和对个人尊严的尊重。

在政治民主方面，必须有了许多不愉快的经验，才能使人们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下实行一党制的理论不能成为适用于所有历史情况的范例。一党执政的社会主义首先适合于发展中国家，因为在这些国家中，工人阶级只是居民中的一小部分，其它社会阶层的大部分人并无社会主义意向。虽然一党制在这种情况下有其正当理由和必要，但它总是民主舆论的障碍和官僚主义蜕变的原因。在资本主义工业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新发展中，人们终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必须充分利用现有的政治民主（这种民主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纯属形式），社会主义的未来包含多党制。

从以上所说中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首先，社会主义在落后的条件下必须采用国家社会主义这种迫不得已的形式，在国家

社会主义的早期阶段,必须进行巨大的社会变革,最重要的是消灭作为阶级的资产阶级,继而消除私有制的统治。但是,社会主义的这一阶段解决不了作为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看到,在这一阶段,无论是雇佣关系问题,还是政治异化和精神异化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在迄今所有的革命运动中,这些问题的解决只在自治的观念中可以看到。这一以各种不同形式显示出来的社会主义前景把所有的革命思想家,从蒲鲁东和巴枯宁、马克思和恩格斯,到索列尔和基尔特社会主义者(霍布森、柯尔),直到无政府主义的和委员会共产主义的各种流派统统联系在一起。在这方面,首推列宁为建立苏维埃进行的努力,其次特别是卢森堡、柯尔施、潘涅库克、葛兰西以及这一时期其他许多人为争取实现一种一贯到底的委员会制度的主张而进行的努力,他们认为,从各个企业到社会管理的最高部门都要建立委员会制度,劳动者在其中应起直接的、有效的作用。委员会(苏维埃)思想的核心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直接掌握权力,而不是由以各种政党形式和官僚国家形式出现的政治中介者掌握权力。

如果劳动者成了自己的劳动及其成果的主人,如果劳动者从基层到上层都实行了自治,支配扩大再生产,那么,资本主义社会把个人分别划归政治领域和劳动领域的情况也就随之被消除。所以,社会主义者都清楚地知道,解决社会主义之谜的关键就在于取消国有制、国家计划和国家对剩余劳动的支配。这应该通过自治关系体系来实现,每一个团体都将按其可能、传统和发展程度建立这种自治关系。

因此,社会主义的民主不能局限于多党制和国有化。在发达的社会主义条件下,民主必须以经济民主为基础。不大力发展民主关系,社会主义民主在社会生活的其它领域,在经济、艺术和社会舆论领域也不能得到发展。社会主义也具有国家和政治组织(它们总是谋求自身的独立和加强)为一方,与劳动领域、即生产和生产者

的自治组织为另一方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发展的每一个进步阶段都不能以加强国家、政党等等这些历史上采用过的形式为基础，而要以加强历史上新的形式、真正的共产主义萌芽、人的自决和各种形式的劳动者自治组织为基础。社会主义发达阶段的标准，既不能是物质生产资料和社会关系国有化的程度，也不能只是共同体在物质上的加强，而是物质资料和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自治关系和国家消亡的发展程度。

把社会主义理解为过渡时期，特别是把过渡时期理解成只是一个相对短的时期，这也是一种战略上的错误结论。人们忽略了资产阶级革命巨大的历史经验，没有看到资产阶级经过了几百年的时间才在欧洲成为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即使这样，例如在19世纪的欧洲，也还同时存在着许多旧的集团和阶层，它们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即使人们并不绝对地认为取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需要几百年的时间，但要达到这一目标，仅仅几十年的时间肯定也是不够的。自从俄国十月革命以来，已经过去70多年了，这段时间证明了，如果相信能够用行政命令手段在很短的时间内废除经济形态，即废除构成这种经济形态的一切私有制和国有制形式，那是一种巨大的幻想和一个严重的战略错误结论。

如今已经完全清楚，社会主义变革必然要经过一个长期的混合经济阶段。这里应该提到的是，例如在苏维埃俄国，有过像右哈林及其追随者这样的一些理论家和政治家，他们在提到农村问题时指出，应该听从列宁的指示，农村的社会主义化应该让步于一种正常的发展，即让步于经济发展。斯大林派强制实行的集体化，把完全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野蛮行为带到社会主义中来，不是实行社会主义原则，而是加强暴政制度，在持久的政府制度中加强了暴政。加强了政治镇压力量，导致了转向一种从未有过的官僚主义—国家干涉主义。

几十年过去了，人们没有看到甚至也不想承认，这个经济学上

的国家资本主义既没有解决雇佣关系问题,也没有解决经济异化和政治异化问题。这是新的社会革命,即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社会主义的真正历史任务在于:超过资产阶级所能做到的,解决经济民主问题。

经验表明,在这些相对落后的国家内,不可能一夜之间扬弃旧社会;强行消灭私有制就会加强政治上的官僚主义,同时削弱劳动者的权力,削弱民主和整个生活文化;社会主义必须延续资产阶级时代取得的成就。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社会主义必然是一个存在着各种不同形式所有制的混合社会。所有这些都是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相一致的。正如我所说过的,这个阶段是一个比人们所想像的还要长期、复杂并充满矛盾的过程。因此,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个过渡社会(谁也不知道这个过渡时期有多长),它不是自成一体的社会体系。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不能规定社会主义开始向共产主义转变的具体日期,因为共产主义早已随着新社会的第一个自治组织的出现而开始了。

另外一个严重的错误结论涉及工人运动的观念和实践。早在俄国革命时期就已经出现明显的分歧。有人认为,既然工人阶级自己在执政,工会也就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另外一些人,例如工人反对派,他们的观点却相反。他们认为,工会是真正的工人阶级的机构和组织,所以工会必须掌握经济政策。而列宁则认为,自由工会并不胜任这种任务,但是为了在国家官僚主义面前保护工人阶级,工会也还是需要的。

在苏维埃俄国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中,在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主义—国家干涉主义反革命时期和在党政垄断制度和极权主义时期,工人运动失去了其作为工人阶级追求的自由表达的意义。工会失去了其独立性,成了传送带政策的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

现已证明,社会主义,即一种新的民主社会的化身,绝不能不民主。消灭异化关系的关键所在是社会主体的独立自主,是自治。

社会一切阶层都应该能够自由地安排和掌握自己的生活。总之，生产者和劳动者的自治已被证明是作出历史决定的场所，是决定新的社会经济关系命运的战场。

另一个错误结论表现在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的估计上。一直流行着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并即将崩溃这一论点。资本主义有其衰弱黑暗的方面，这些方面以世界危机和战争的形式在我们这个世纪表现出来。尽管如此，资本主义并没有被消除。世界在变化，新的形势要求人们进行新的努力去理解世界。然而人们低估了当代资本主义在科学技术这些引起真正革命的领域发展的可能性。当代资本主义再也不能用旧的方式来解决其内部矛盾了，因为在当今核武器存在的条件下，这关系到全人类的生存。

当代资本主义已不同于本世纪初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趋势和进程（即使并非没有退步）以及信息学和科学的发展，在许多方面已根本改变了现代国家的作用。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扩展及其成就已经开始冲击旧的社会根基。这些社会主义的政治力量比共产党人更好地理解新的形势，并选定了通过旧制度的体制进行缓慢的长期进军的道路。

当代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必须抛开所有上述这些偏见和错误结论。社会主义者必须考虑混合经济，权衡各种形式的所有制，认识到社会所有制是以其经济逻辑、而不是以行政命令逻辑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将发展一种更广泛的民主，一种意见和组织的多元主义，最根本的是争取在一切社会领域中的自治。因此，种种不同的体制将趋同，尤其是在民主传统和社会传统最强的欧洲。这不仅仅像人们经常听到的那样是资本主义趋向社会主义的问题，而且不如说是资本主义越来越转变为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则变成一个现代民主社会的问题。社会主义如果没有经济民主、政治民主和文化民主，那是没有什么历史前途的。资本主义如果企图永远

保持雇佣关系,认为在极大的社会差别继续存在的同时,仅仅用政治民主和文化民主就可以解决人类自由问题,那也同样是没有什么历史前途的。

在这些问题上,我作为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不简单地讲一下南斯拉夫的情况。我们首先经历了一场名副其实的真正的社会革命。这场革命是在反法西斯和占领者的解放战争范围内开始的。1848年同斯大林的骄横跋扈发生历史性冲突以后,我们对这次冲突以及苏维埃俄国的社会主义以往的发展进行了分析,从中得出许多重要的认识。我在这篇文章中已谈到了这些认识。首先是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缺点的认识;对在这种社会主义中来自官僚主义的危险的认识;对斯大林主义这种官僚主义—国家干涉主义反革命(我在70年代末已提出这一论点)的认识;对自治思想的认识;对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必要性,以及经济民主、政治民主和文化民主在社会主义中的作用的认识;对社会主义是开放的制度,人可以自由交往,商品和资本等等可以自由流通的认识。其中的许多认识已逐渐地得到实现,但往往是不够充分地、而只是部分地得到实现。尽管如此,南斯拉夫与其它东方集团各国是有区别的。

即使所有这些认识和观点或多或少地被接受,旧的领导也有其局限。首先,他们并没有彻底认识到,经济过程应该更强烈更彻底地摆脱“党国家”的监护。其次,他们还停留在一种不够完备的民主范围内,特别是在政治领域和舆论领域。所以就出现了深刻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这些危机并不是自治和民主的后果,而是一种不发达的自治的后果,是党和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垄断的后果。南斯拉夫经济中的主要过失和错误的产生,并不是由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的自治性质,而是由于生产者对经济的走向和经济的抉择没有发挥足够的影响。另一个原因则是政治民主的落后,这是共产党垄断的后果。

我认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的未来几年，其特征将是围绕自治结构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关系开展激烈的争论，尤其重要的特征是一党垄断将被取消，它将随着多党制的实行而消失。如果没有经济民主、政治民主和文化民主，任何社会主义都没有前途。

社会主义是人类，首先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获得进一步解放的阶段，否则为之斗争就失去意义。社会主义不是用某种较好的对人的统治取代较坏的对人的统治，如果是这样的话，也就没有必要去为之作如此之多的牺牲，经受如此之多的苦难，放弃如此之多的企望了。因此，自治思想必须重新成为主导观念和指导思想。只有自治才是当代真正持久的革命。

（原文为塞尔维亚文，周志军转译自德文，胡文建校）



---

## 欧洲的紧密结合 与世界范围的共同体

艾哈德·埃普勒\*

关于欧洲紧密结合与世界范围共同体,我的思考建立在如下前提之上:

1. 一个民族、一个洲有权利、也有义务安排自己的事务,即使这会暂时地转移对其它问题的注意力。德国和欧洲的紧密结合令我神往,我全身心地关注此事,我并不因此就对第三世界感到内疚。

2. 在近 10 年内,南北关系比上一个 10 年更令人悲哀。南北之间没有作过一次真正的对话。总是南方的申请者提出要求,然后遭到西方国家的拒绝。在大多数情况下,在会议结束的时候要通过最低限度的妥协为下一次会议的大门打开一条缝隙。至今也不曾有过一次名副其实的南北对话。

---

\* 艾哈德·埃普勒:哲学博士,1961—1976 年任联邦德国议会议员,1968—1974 年任联邦政府经济合作部部长、德国社会民主党执委会委员,1973 年以来任德国社会民主党基本价值委员会主席,1985—1989 年任两届纲领委员会副主席。

3. 自 1960 年以来,在 80 年代第一次不再有什么政治上有效的发展战略。60 年代曾依据马歇尔计划的经验实行过一种天真地相信技术统治的发展战略。人们以为,大量注入资本和技术,就会使“发展中国家”迅速走上西方工业国家的道路。

一些国家曾被承认,它们已经走近这个门槛,因此被称作“门槛边的国家”。而今天人们依然如此称呼它们,因为它们一直也没有近过“自力发展”的门槛。

在 70 年代实行过一种更加细致的战略。它的基础是 1969 年皮尔逊委员会的报告,即应把满足食品、住房、教育、工作、社会保障等基本需要放在首位。我还能怀着悲喜交集的心情回忆起 70 年代初的蒂德瓦尔特会议。当时西方工业国家的负责人同加拿大的皮尔逊和世界银行总裁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一起开会,曾就发展战略达成了共识。而今天对发展战略已不再能有一致意见了。

1973—74 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使得这种一致实际上告终。民族利己主义成了最时髦的事,在联邦德国也是如此。因此我于 1974 年 4 月引退了。

关于 80 年代,后来勃兰特委员会曾呈交过一份报告。但它——首先是报告最精彩的部分,即维利·勃兰特所写的序言,没有对政府的政策发生任何作用。我想不到有哪一位德国政府首脑、哪一次曾引述过、或哪怕只是稍微提及这份报告。80 年代不如说是受到里根任职期间的满不在乎态度的影响,只按照东方和西方对立的范畴思考,而南方只是在这一对立中才起着它的作用。发展援助最终要服从于军事战略的利益。此外,里根还忠告许多穷国说,它们应当象美国那样干,美国就是靠自由经营而富起来的。

4. 时间越久就越清楚地显示出,冷战是靠第三世界的负担而支撑的。这不仅是因为,冷战占去了大部分政治精力。不仅是因为,与军事预算相比,发展预算少得可怜,不过是勉强维持而已(其比例多数为 10:1 以至 30:1)。80 年代的高额军备竞赛导致首先在

美国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国家债务。大约 3,000 亿美元的军备开支使举债达到大约 2,000 亿美元。这促使利率升高到如此地步,以致负债累累的发展中国家在 80 年代喘不过气来。在 80 年代债务还本付息大大超过了发展援助,这种差额最后高达数倍。

5. 在我们同南方国家的关系中,援助是正文旁的一个边注。但是如果集中注意力于这种边缘现象,就会使我们不断排斥最重要的事情。债务的还本付息和减免债务,资本的利息和原料的价格,军备输出和代理人的战争,私人投资和银行战略,跨国康采恩的计划和欧洲共同体的农业政策,我们拒绝彻底节省能源的态度和我们的垃圾出口,首先还有我们的货币基金方针,所有这些问题都比如何使这个或那个发展项目更有效益这个合理的问题更为重要。

要是集中注意力于援助项目的规模和效益,它也会使围着固定餐桌空谈的政治家问心无愧。他们会说:我们援助了那些国家 30 年,它们却一直未有由此搞出什么名堂来。但是为了购买一台拖拉机,不得不提供更多的成袋咖啡和成包棉花,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定着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政治路线——所有这些都未加以考虑。

## 二

我承认,我的开场白写得比较详细,因为它要对我在论述这一题目时提出的问题进行论证。我并不想谈论如何拯救一个由于欧洲的紧密结合而失去动力的发展政策。可惜这样一个发展政策并不存在。我要研究的是,欧洲的紧密联合是否能在中期内开辟一种机会,出现一个名副其实的欧洲发展政策。我并不怎么担忧西欧国家发展援助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可能会下降千分之一(这大概是目前可以设想的上下波动幅度),而不如说是希望发展政策依旧能够成为欧洲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

25年来深入思考的结果使我感到，发展政策如果不成为所有政策都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就会成为首先粉饰我们自己的本来面目的政治装饰。

当欧洲共同体通过它的农业政策促使巴西那里从事种植供本国公民食用的黑咖啡豆的农民越来越少，而为我们的农业工厂生产大豆的农场却越来越多的时候，这种发展项目对巴西有什么帮助呢？当欧洲的公司参与热带雨林的摧毁的时候，一两个植树造林的项目又有什么用呢？

### 三

在人们具体论证为什么欧洲的紧密结合是以牺牲第三世界为代价的时候，我认为一些论据——并非所有的——是十分软弱无力的。

20年来与我友好相处的尤利乌斯·尼雷尔表示遗憾说，现在不能再在“为了更多的公正而进行的斗争中”指望共产党国家的援助了。

这里要问，这种援助给南方国家带来了什么？我想不起在哪一次会议上东方国家的投票曾起过决定性的作用。有时是因为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西方国家肯定是要采取拒绝态度，才使东方采取如此明确的支持态度。谈到实际援助，穷困的东方与富裕的西方同样吝啬。

还有一个论据也不能使我信服，这就是，现在西方的私人投资越来越多地流到东方，而不再流向南方。我对迄今一直控诉与这种投资联系在一起的人们拿出这种论据感到惊异。此外，南方在西方公司的投资中所占的比例最近15年已急剧下降。在70年代大约有30%的国外投资流向南方各国，今天则只约10%而且集中到少数几个国家。德国私人投资的一半投向巴西，在那里又几

乎全部投放到两个工业集中地区,而由于生态原因,本来最好是不再向那里投资的。

最近几年发生的这种趋势今后会进一步加强,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我相信,民主德国、波兰、或者匈牙利,与其说是会与西班牙或爱尔兰,倒不如说是会与秘鲁或肯尼亚展开竞争。

法兰克福的社会科学家洛塔尔·布罗克从欧洲的紧密结合中看到了三点忧虑和三个希望。

第一个担心是,第三世界在工业国家面前的谈判地位将会进一步削弱,因为它们已不再能利用东西方矛盾了。第二个担心是,“由于西方霸主地位的巩固,在政治制度方面的行动范围将受到很大限制,社会主义作为可供选择的发展道路已经报废了”。最后,第三个担心是,东方国家有可能在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和发展政策方面的合作中成为(南方的)竞争者”。

关于第一点忧虑,南方的谈判地位反正已被可怜地削弱了。但我想不起在哪一次大型会议上南方曾经利用了东西方矛盾冲突——即使曾试图这样做的话。

第二点忧虑可说是根据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在未来的机会将更加减少。如果能够证明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能带来好得多的结果,这倒也并不坏。问题是基本上——在非洲——所有模式都失败了。人们说,只要有可能,世界银行和货币基金组织施加的政治经济压力将变得更加粗暴,更加不受拘束,这完全可能是真的。但是,缺乏一种自称是社会主义的代替方案,却也有可能增加使人们至少是正确地提出问题、并且对一种市场模式制定修正方案的机会,这在个别场合会对南方国家继续有所帮助。

对于经济竞争,可能会这样发生影响:欧洲共同体既然有近在门口的工资便宜的国家可用,那么在工资较高地区的一些定货,还有迄今为止面向东南亚的全部加工任务将来会转向中欧和东欧。只是我们不应忘记,这种政策上来回摇摆的情况多年历来如此。此

外我还可以设想,在5年内这种情况还会发生变化,因为至少是在民主德国,还有今天的经互会其它国家内,工资将会大幅度上涨。

我还可以设想,对于西欧的银行和政府来说,与波兰或匈牙利签定把短期信贷改为长期信贷的协定——罗马尼亚的债务由于齐奥塞斯库严格规定的强制节约今天已经很少了——会比墨西哥和阿根廷处于更加优先的地位。但这件事也有两个方面,在东欧大规模地减免债务很可能成为一种先例,人们不能长期阻止象牙海岸——何况它的货币是与法国的法郎通用的——获得保加利亚有权利获得的好处。

最后是发展援助,今天人们称之为“发展政策上的协调合作”。如果注意到使用于这个目标的预算无论从绝对数目上,还是从在总开支中所占的比例方面都不能下降,这肯定是必要而且有益的。然而我坚持认为,在我们与南方国家的关系中,援助是正文的一种旁注。如果确实想给南方以帮助,那么增加援助经费很可能也只是次要的。

布罗克还提到三个希望:

第一、改善调解地区冲突的基本条件;第二、由于裁军,出现了可以把更多资金用于发展援助的机会;第三、“有希望重新设计发展合作或者提高它的作用”。东西方在强权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对抗的消除也会使人们更敏锐地看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日益激化的结构缺陷。

我们不应低估第一个希望,如果代理人的战争不再是必要的了,如果美国和苏联在非洲南部和东部的和平方面的共同利益生效的话,这可以使南方国家减少许多可怕的事。

第二个希望肯定不会这样实现,联邦德国或美国不会从它们在军备方面中节省下来的每一个美元或马克中拿出50美分或者分尼送给南方各国,但是哪怕只拿出10美分或10分尼,长期积累起来也赶得上迄今为止的发展预算了。

更加重要的可能是另外一些事情。降低军备开支可以使正被向东方国家的投资高潮弄得精疲力尽的资本市场得到缓解。它会压低利率,使东方热迅速升温。完全可以设想,几年之后会出现一种缓和,使得大规模地减免债务似乎很容易就可以实现。

对洛塔尔·布罗克的第三个希望我愿意作另外一种表述:如果东西方的人们不再死盯着所谓来自对方的威胁,那么他们就可以不带偏见地注意到现实情况。即将结束的 20 世纪所呈现的决定性的现实是有 35 亿人口。他们之所以如此迅速地增加,也是因为他们不再能消除自己的贫困,一个想有所作为的政论家迄今为止都一直是研究东西方问题,而不过问南北关系的题目。我当部长的时候知道,略微懂得南北问题的记者是屈指可数的,这一段时期以来,这种人的数目进一步减少。情况很快会发生变化的。

我们将不再提出这种错误的问题:治理南方各国的良药妙方究竟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如果只是简单地把北方的经验移植到南方的话,这两者都不行。

我们将学会提问,哥伦比亚、尼日尔、或者缅甸的事例怎么会给人一种独立发展的印象?我们要问,南方各国如何能够按区域联合起来,使它们能够满足自己的基本需要,首先是食品的需要;使它们能够参加世界市场,而不受剥削。我们尤其应当开始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了使南方获得一种独立发展的机会,在我们这里,我们的技术政策、我们的财政政策、我们的农业政策、能源政策、交通政策中有哪些是必须修改的。

我们现在有机会创造一个面向南方、对南方开放的欧洲。如果我们指出南方遭受忽视并从而抱怨欧洲目前所出现的情况,我们就不会利用这个机会。如果我们持续不断地、顽强地提问:欧洲必须变成什么样子,才能最终与南方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我们就会利用这个机会。

· 维利·勃兰特有一次曾建议,今后的联邦政府在每一份内阁

提出的草案中,除了要对财政上的影响作出评估之外,还要就预计对第三世界可能产生的影响作出一种评估。这会迫使联邦政府的所有职权部门,如经济部门、财政部门、交通部、农业部从发展政策的角度进行考虑。这首先会使内阁认真对待发展政策的观点,并公开地进行辩论。为什么在欧洲共同体的委员会中不能这样做呢?

只有在我们改变自己,我们能够建立起伙伴关系的时候,南方各国才会有—次机会。但迄今为止,我们都还没有这样做,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

如果北方的某一巨人从共同阵线中分离出来,开始与南方达成妥协,才有可能在南北的经济关系中建立起一种新秩序。可以考虑这样做的既不是美国、也不是日本,而只有欧洲共同体。它必须在发展政策上独立行动。它越强大,就越能这样做。自然,它不能简单地接受南方的立场,而且这种立场绝对不是统一的。但是它能够、例如通过它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投票来推行—条新的路线。它可以敦促建立—个新的世界货币秩序,它可以在减免债务方面率先行动,它可以实行—种对南方也有所助益的农业政策。在欧洲共同体内已经有人准备在荷兰、丹麦、部分地在法国这样做了。我在20年前曾梦想,联邦德国会有效地发挥这种欧洲中间人角色的影响。这个梦想当时是过早的。但到了90年代这个梦想还—定是很早吗?

如果说我因此更加乐观的话,这也由于今天诉诸公共利益已更加容易了。人们经常发誓要做到的国际依赖、南北之间相互依附性在经济上从来没有存在过,南方对北方在经济上的依赖要多好几倍,而不是相反。当在孟加拉国或埃塞俄比亚有几百万人惨死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地过日子。

在生态方面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可以证明,热带雨林的摧毁或者沙漠的扩大对我们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关于只有—个地球的意识以及从而必须要有世界共同政策的意识,借助生态要比通



过经济能够更迅速、更彻底地渗透到人们的心目中。欧洲可以成为这样一块大陆，使这种意识在这里，首先在政治决策中，在政治机构中，甚至在宪法中得到反映。如果我们在一个全德宪法中写上，我们如何看待我们与南方的关系，怎么样？

（原文为德文，张世鹏译，殷叙彝校）

## 东欧的变化和社会主义

吉里·佩利康\*

过去人们可以看到两种试图改变极权的(“现实的”)社会主义的形式:一种行动形式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改革,它是根据执政的共产党的倡议,在社会压力的支持下实现的。尽管在苏共二十大以后赫鲁晓夫执政期间,波兰、匈牙利和苏联已经进行过类似的尝试,但最著名、最典型的事例却是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这种尝试为自己提出的辩护是准备回到原来的未经斯大林歪曲的列宁主义。这种尝试被说成是给社会主义恢复名誉,使社会主义重新与代议制的、议会的和直接的民主制,与工人苏维埃的传统以及各种自治形式联系起来。

最重要的同时也是最后的一次这种尝试是受到人民大力支持的布拉格之春。然而它却被几个华沙条约国家的坦克镇压下去了。

因此,以后的尝试显然必须从下面开始,即不是由执政的共产党开始,而是通过工人阶级的直接倡议开始。1980年,波兰成立了“团结工会”,它迫使政府在更广泛的民主、自治和经济改革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让步。但即使这一尝试也在勃列日涅夫领导的苏共的压力下,于1981年12月被一次受到波兰统一工人党的保守势力支持的军事政变镇压下去了。这些经验告诉东方国家的人民,如果

---

\* 吉里·佩利康:《列斯特》杂志主编、东西方研究所所长。

变革的尝试不是几乎同时在苏联集团的所有国家里进行,尤其是如果在中央,即该集团的中心莫斯科没有发生变革,那么在一个国家的民族范围内的变革尝试是不可能取得任何成果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通过改革和公开性造成的正是这种形势。

尽管由于缓慢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民族问题上的迟疑、与保守派和党的机构的妥协以及破坏活动的骚扰,人民对于戈尔巴乔夫的政策不是无保留和无批评地接受的。但戈尔巴乔夫的历史功绩却是不可抹杀的:他有抛弃勃列日涅夫的有限主权论的政治勇气,从而为东欧国家和苏联的变革和民主革命开辟了道路。

## 民主革命

随着 1989 年的革命变化,东方国家的发展和过去截然不同了:“现实的社会主义”在群众眼里已失去了信誉,这样一来,社会主义思想不幸遭到了极其严重的损害。由于社会主义被看作是极权主义以及自称为社会主义的反动政权的同义词,所以社会主义已经失去意义。

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倾向和无政府倾向已被压制下去和克服了。代之而起的是作为公民社会的表现的各种独立运动(团结工会、77 年宪章、公民论坛、苏联各共和国的人民阵线以及保护环境与和平主义运动,等等)。它们的目的不再是恢复社会主义的名誉和更新它,或者使现存的旧体制民主化,而是实现与过去彻底决裂的变革,从而开辟一条通向议会制的、多元化的民主和考虑到社会公平的市场经济的道路。西方左翼党派的朋友们经常问我,这些东方国家的社会将向何处发展?是简单地回到共产主义之前的过去,还是仿效西方的制度?

即使有些人持这种观点,即使有人试图在曾经有过民主传统的国家(例如捷克斯洛伐克)继续扩大这种民主传统,但归根到底,

这些国家既不会按照这一方向,也不会按照另一方向发展,没有人能够削弱在共产党垄断权力 40 年中造成的、给这种社会打上鲜明烙印的非常深刻的政治变革和经济变革。

### 新 阶 段

东方国家共产主义以后的第一个发展阶段是以 1990 年春季的选举而告结束的(苏联是一种特殊情况),它们走上了议会民主的道路,政治极权主义已经结束。现在,第二个阶段可以开始了:从集中制的和国家控制的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毫无疑问,这个阶段将持续更久,困难更多,也会更痛苦,因为它会导致新的社会紧张关系。为了摆脱过去继承下来的危机,相当大的一部分居民不得不作出牺牲。正是这个阶段可能危及通向民主的发展,而没有有效的经济,民主是维持不下去的。东方国家 1990 年春的自由选举说明了什么呢?

首先,它证实,东欧社会总的说来已成熟到能进行巨大的政治变革和经济变革了,特别是已成熟到能实行民主了,尽管从极权主义精神状态中解放出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种精神状态首先表现在对待政治上的少数派和少数民族缺乏宽容和忍让。

一些西方政治家强调他们的乐观主义,并把东方国家向民主的过渡同在法西斯独裁垮台后民主迅速巩固起来的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这些历史范例作对比。但是这些情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这些西方国家的独裁控制集中在政治领域,而在经济方面,即使在独裁制度下,占统治地位的仍是市场经济和经济多元化。

东方国家的极权主义政权通过完全国有化,不仅控制了政治,而且控制了经济。这样,国家机构就成为唯一的政治和经济的统治者。因此,象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等国向政治民主的过渡——不仅是欧洲,其它大陆的国家也是如此,如皮诺切特以后的智利——

比东欧国家更有组织,更顺利。而东欧国家的中央集权的和官僚主义的经济必须彻底地向混合经济和市场转化,因此,这个过程将漫长得多,不能排除严重而且充满戏剧性的社会冲突——包括由此引起的对年轻的新民主制的一切消极影响。

这些国家的选举结果有很大差别,但也有一些共同点:

它们都是自由的,但还不是完全民主的选举,因为没有足够的时间对许多新党(包括改头换面的旧党)的纲领进行比较(何况它们有许多雷同的地方),没有时间多半是陌生的候选人中间进行选择。这样的选举不如说主要是赞成“新事物”、反对“旧事物”的公民投票,甚至可以说是反对共产主义的公民投票。在自称为“社会主义”的极权主义统治40年戏剧性的经历之后,只能出现这种情况。没有一个东方国家认为共产党(一点没有变的,或者以更新的形式出现的,或者用其它名称掩盖起来的)是非法的,尽管某些政党和部分舆论鉴于共产党过去犯下的残暴行为曾经要求这样做。这对民主制而言也是有意义的。

### 左翼党垮了,但右翼党并未获胜

左翼党不得不到处遭受损失,首先是共产党,尽管它们改变了自己的名称和更换了领导力量,其中一些党甚至开辟了通向改革之路(匈牙利、波兰)。这个结果是可以预料的——许多人在问自己,东方的共产党属于左翼,还是不如说属于右翼,——但社会民主党的失败却是更沉重的和更惊人的。它们是从隐蔽状态或流亡中出现的,人们不能责备它们,不能把压迫制度的责任加到它们身上,因为它们本身就是这种制度的主要牺牲品。除东德外,这些政党——在这期间,它们被允许加入社会党国际——未能超过派议员进入全国议会的必要最低选票数额。这大大伤害了左翼,因为左翼反对党的角色仅仅留给了共产党的议员。

社会民主党的失败不能仅仅用它们在竞选活动中所犯的错误来解释，即使它们犯过这样的错误；为了和共产党人划清界线，这些政党在许多情况下成了最极端的反共产主义者，它们恶毒攻击共产党人，所以错过了获得那些被开除或者退党的共产党人的选票的可能性。它同样丧失了那些不满意共产党的政策而愿意支持社会民主党的共产党人的选票——这就是说，他们失去了组成支持非共产主义左派的选民“后备军”的一切潜在力量。

但此外还有其它一些造成失败的政治原因和技术原因：东方社会民主党也为共产党政权的暴行引起的迷误付出了代价，因为接受民主社会主义以及和社会党国际发生关系，就会冒由于社会主义遭到这些国家大多数居民普遍拒绝而引起的风险。社会民主党人必须从“零”开始进行他们的竞选活动，没有资金，没有组织机构，没有新闻报刊——这是与某些在民主革命前充当政府帮凶的非共产主义政党不同的地方。

东方国家的左派分裂了，迷失了方向，并且经常在竞选活动中同自己的不同派别集团发生冲突。这些派别集团是：改良主义的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社会党人、替代派左翼力量、绿党和靠近左派的环境保护党等等，这意味着，东方国家的左派必须努力在这种多样性的基础上重新建立起来，并获得成功，而不要陷入分裂主义或者以往那种错误的意识形态争论。这个过程肯定是漫长的和困难的，但是新的民主政府必须实行的经济改革和不受欢迎的措施，使作为工人和地位较低的居民阶层的主要保护人的左派的改组过程变得非常必要，但是，这一个过程也是现实的和可能的。

但是如果左派没有获胜，仍处于防御和探寻自己未来的特有面貌的境地，那么这并不意味着象一些西方报纸和政治家大言不惭地所主张的那样，右派或者基督教民主党人已获得了胜利。但匈牙利和东德例外，匈牙利的新政府自称为“中—右”政府，但在匈牙利的民主论坛中的自由派倾向和社会民主党倾向同样起了作用。

东德最初是赞成加速德国统一的,而这个统一的象征就是联邦总理科尔和他的基督教民主联盟。除这两国外,可以认为,在其它东方国家不如说是中—左派的政党获得了胜利,取得了成功,并有可能进一步发生分化,首先是一些社会力量的壮大。这一点反映在众多的独立运动中,如捷克斯洛伐克的公民论坛、波兰的团结工会和公民委员会、保加利亚的民主联盟、苏联的“民主俄罗斯”联盟以及其它。

我们不能把 1990 年选举中发生的事件说成是一种稳定和持久的趋势。相反,东方国家的政治局势在 2 至 3 年内在向市场经济和经济改革的过激中很可能发生巨大变化,社会利益的差别将变得更加悬殊。这有助于成立新的政党,新的运动以及在这些政党之间实现新的联合。公众对处于党派阵营之外的运动——如捷克斯洛伐克的公民论坛、波兰的团结工会、罗马尼亚的民族解放阵线等等——的大力支持表明,舆论拒绝了新的或旧的政党,它彻底认清了“党的统治”(人们在一些西方国家里也能听到这种说法)的危险和政治生活的毁灭和解体。

### 共产主义之后的党派

共产党的相对稳定是东方选举结果的另一个共同点。东方国家中有些共产党保持原来的形式,如捷克斯洛伐克,其它的则更改了它们的名称,纲领和领导力量,如匈牙利、民主德国—东德、保加利亚、波兰以及有一定特殊性的南斯拉夫及其各共和国。这些共产党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党员和拥护者,还拥有一部分党的机关、报刊和可观的财产。它们从执政党变成了反对党。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问题是,它们在这些国家向民主发展的过程中会起什么样的作用呢?它们将毫无保留地接受民主生活的规则,还是试图从年轻的民主政体的困难中捞取好处,把一切有不满情绪、怀念斯大林

过去的人争取到自己这边来,以便削弱民主政府甚至重新上台执政呢?最好的道路是建设性的反对党的道路,也包括通过反对那些完全不得人心的措施而获得支持,从而赢得人民的信任,并在将来加入执政联盟,但是我们也不能低估相反道路的危险,即来自对民主政府政策的非歧视性批评的危险。如果民主政府在行动上与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极端分子、各种独立的地区性和地方性团体以及形形色色的民众社会主义者联合起来,它们的地位就可能被不满群众的示威游行、罢工和议会内外的反对派削弱。

当然这样的政策将在这些共产党内把愿意同一切民主力量合作的改革派与受到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的束缚、对民主采取敌视态度、屈服于带有旧的印记的暴力和分裂主义的教条主义派区别开来。

西方的左翼改革派必须仔细地和以充分理解的态度观察共产主义之后的世界内部的发展,并向共产党中的这些改革力量提供合作和支持。西方的左翼改革派必须和这些力量进行公开的真诚的对话。在检验实际变化基础上进行的对话能导致政治联盟,从而扩大非共产主义左派的基础。社会党国际在这个发展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各种非社会民主主义的党和后共产主义的党为了摆脱它们的孤立状态,都想加入社会党国际,国际不应该局限在东方国家的社会民主党这个唯一的范围内。相反,它必须和社会民主党外的左翼力量进行合作,并在工作上进行接触。

### 民族主义的危险

在西方,人民经常谈论东欧发生的变化和民主抉择的不可逆转性。可惜历史上不存在“不可逆转”的发展,东方目前的情况也是如此。我个人也确信这些变化的“不可逆转性”,但是我也看到了可能出现的而且相当严重的危险。我不认为最大的危险是重新恢



复“共产主义的特权花名册制度”，尽管在一定情况下这种危险是不能低估的（我指的是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首先是苏联）。

在我看来，目前最现实的危险是民族主义、沙文主义和民众社会主义，这些现象已在几个东方国家通过歧视少数民族表现出来。如果新的民主政府没有能力使它们的国家摆脱经济危机，而是通过休克疗法进行经济改革，向没有社会公正的市场经济过渡的话，这些现象可能成为头号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居民会问，一种没有社会保障的民主制，即还会使生活水平继续下降并且受到种种矛盾、不安全、示威游行和动乱冲击的民主制有什么价值？这种民主制会支持希望成立“一个坚强的政府”的要求或者出现一个能够保障国家的秩序、防止“无政府状态的危险”的“铁腕人物”的要求吗？而这种角色的自荐者将不乏其人。

当年著名的波兰持不同政见者亚当·米切尼克说得对。他认为在东方国家存在着“两种互相对立的文化：一种是欧洲的自由文化，另一种则是民族主义、民众社会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混合物”。毫无疑问，民主社会主义是欧洲的自由、民主方向的伟大联合的中心，苏联的发展会促进这一趋势；那里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后果将产生积极的影响，并将加强东方国家民主发展的有利的外部条件。相反，进步团体和斯大林主义者之间以及各民族之间的武装冲突和单靠权力来解决这些冲突和矛盾的企图，将促进旧的教条主义或新的民族主义和民众社会主义的发展趋势。如果说，东方国家向民主方向的发展日益变得不可逆转，那么这句话对苏联却不适用，在那里旧的花名册特权制度的力量还很强大，还得到一些人民群众的支持。虽然象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波兰的瓦文萨和马佐维耶茨基、捷克斯洛伐克的哈维尔和杜布切克、匈牙利的彼日高伊和涅尔什等这些政治领导人物开辟通向民主变革的道路并成为这种变化的象征的伟大功绩得到了承认，但是能使这些变化不可逆转和民主获得加强的真正英雄和保证却是互相交往的社会

(soziale Gesellschaft), 即已意识到自己的权利, 并准备为保护它们而向一切专制倾向作斗争的公民的政治意识和道德意识的增长。

### 西方左派和东方

西方的左派力量和民主力量有义务去帮助东方国家的民主新政府和这些国家的人民运动发展政治民主, 以便使这些国家摆脱经济危机。某些西方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一点, 有些政府还没有, 它们抱着不同程度的保留态度在旁观, 并提出一些侮辱性的条件。左派必须承担责任, 敦促西方政府支持东欧的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 从而使它们能够越来越顺利地加入欧洲统一的进程。但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也必须认识到东方国家中因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失败而造成的政治真空的危险。这个真空不仅可以由改革派社会主义思想和民主思想来填补, 而且也可以由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保守思想来填补。毫无疑问, 正是改革派社会主义的复兴代表了西方左派的利益, 但这种复兴不会顺利地发展, 这不但因为共产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政权留下了悲剧性的严重的遗产。西方左派也为他们最近在涉及东方国家民主反对派力量时所采取的矛盾态度付出了代价。前不久某些社会民主党认为, 维持欧洲的政治现状是和平的最好保障, 并从这个观点出发认为东欧反对现政权的反对派运动的存在和斗争是“破坏稳定的因素”。幸运的是, 这种态度最近改变了。但是一部分反对派, 即现在已执政和掌握政权的那部分反对派对此是不能轻易忘记的。

但是我必须立即补充说明一下, 西方右派根本没有为民主反对派做什么好事, 尽管他们的某些代表试图在舆论面前把自己打扮成是这些变革的真正的和实际的英雄。

## 主要贡献

如果我们必须回答这场辩论一开始就提出的“欧洲未来的社会主义的前景如何？”这一问题，那么要作出回答并不容易，首先在涉及东方国家时是如此。许多人说，在这些已经摆脱“现实社会主义”的可怕经验的国家里，社会主义理想已彻底完蛋。的确，必须承认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试验已遭到失败，而许多人曾长期以来认为这场试验是左派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场试验损害了社会主义思想，而且它在败坏社会主义思想的声誉方面比反动宣传或右派所能做到的有效得多。但是另一方面，东方国家的民主社会主义以各种形式继续存在，尽管它现在已不再称为民主社会主义。东欧的社会不能称为社会主义社会，即使它实际上将包含民主社会主义的许多因素。那里呈现出议会民主和混合经济的早期结合。这种混合经济拥有广阔的公开领域和一个从民主国家的社会观点来看受到调节的市场。这种形式的发展可以被看作是对改革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重要贡献。

民主力量、特别是这些国家中产生的或者更新的左派需要西方左派的政治声援和物质援助；他们需要书籍、报纸和杂志，需要培养新的领导力量和工会干部的学校，但首先他们必须在关于世界社会主义和民主的大争论中享有平等的发言权。不过他们首先需要有一个正面的榜样，或者许多正面的榜样。这些榜样能以具体的方式说明，改革的和民主的社会主义在解决我们社会的重大问题，能够比传统的右派做得更恰当，更有效，我坚信，改革派的社会主义者和其它民主力量一起一定能提供这种正面的榜样，从而为欧洲的这个第二部分即东欧打开通向统一的欧洲的大门。东欧虽然留下了长期难以愈合的创伤，但它像整个西欧一样，享有同样的发展、同样的自由、公正和过同样的富裕生活的权利。东欧和西欧

---

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创造一个共同的民主的欧洲。这个欧洲反过来又能帮助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发展,从而建立起新的、有希望长期保持世界和平的经济和政治均势。

这便是对未来的改革派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伟大挑战!

(原文为意大利文,周福海转译自德文,李俊聪校)

---

## 马克思主义正在死亡,马克思主义 已经死亡,社会主义万岁!

让·埃伦斯坦\*

套用博胥埃在罕丽达·冯·英格兰的葬礼上发表的演说,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正在死亡,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我们不想谈社会主义,而只想谈谈近百年来提出的贴上社会主义标签的教条,以及1917年俄国革命后在世界各地诞生的、今天在一切领域都证明业已破产的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45年是对命运的多么令人惊奇的报复!在这个时期苏联——尽管深受4年战争的折磨——处在它的强权政治的高峰。红军占领了东欧和中欧以及除希腊之外的巴尔干半岛,距离斯特拉斯堡不过500公里之遥。

它占领了北朝鲜和满洲。失去领导的德国被占领,并被消灭;法国和英国经济上和精神上被削弱了,它们的殖民地正准备起义。只有美国经过战争后变得更强大了。但是它能阻挡苏联统治整个欧洲吗?看来办不到。而对温斯顿·邱吉尔称之为“斯大林大帝”的那个人来说,似乎一切都是可能的。

今天苏联必须承认,受它统治的各国人民要自由决定自己的

---

\* 让·埃伦斯坦:巴黎《宇宙》杂志主编、国际政治论坛主席。

命运。在苏联的结构上到处都发出了破裂声。它的经济正在越来越迅速崩溃，它的社会潜伏着危机，它的人群正在起义中。

相反，西欧尽管有使它分裂的矛盾，但正在经历一个繁荣昌盛的时代。政治民主到处获胜，经济正在发展，并将实现现代化。欧共体正在准备建立 1993 年内部统一市场，以及政治联盟和货币联盟。历史的决定是有利于民主社会主义的，它是欧洲的主要力量，最近几十年来，它在欧洲的复兴中起了非常巨大的作用。

自从社会主义思想在 19 世纪产生以来，马克思强调人剥削人的现象，蒲鲁东与巴枯宁则强调人统治人的危险，他们彼此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这个理论辩论在 20 世纪继续进行。随着 1899 年伯恩斯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的发表，一些新的批判的观点已经可以看出来。按照伯恩斯坦的看法，马克思所阐述的革命的概念不符合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他说来重要的是运动，而不是目的。在他看来，那种认为资本主义受到本身的矛盾的破坏、因而会崩溃的看法是不对的。德国社会民主党——1914 年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党——的内部争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结束了，被当时席卷一切欧洲国家的民族主义浪潮冲走的社会党人未能阻止这场战争。

1917 年 3 月俄国开始进行革命，但是，由于民主革命领导人的无能，国家陷入了混乱。布尔什维克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领导下，得到大城市少数居民和军队的支持，通过一次政变（在此之前在 1917 年 9 月已发生过科尔尼洛夫将军的叛乱，它的威胁继续存在）夺取了政权。在 1917 年 12 月举行的立宪议会选举中，革命社会党人成了少数派，这促使列宁解散新的议会，尽管布尔什维克在 12 月的选举中只获得了 25% 的选票。此后国内战争疯狂地进行了许多年，布尔什维克在经过一场使俄国陷入饥荒的流血之后，终于获得胜利。受到政治警察——肃反委员会支持的布尔什维克的专政是全面的专政。于是列宁在 1906 年提出的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

无限权力的思想便变成了持久存在的现实。莱昂·勃鲁姆向1920年在图尔举行的(法国社会)党代表大会提出了这一指责。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法国社会党分裂了,法国共产党成立了。缺乏一切民主是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原罪。因此,国内战争、外国干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怖看来都能够替这种被理解为暂时性的专政作辩护,认为它是正当的。但是在布尔什维克的思想中有许多矛盾。列宁曾在当时的一份秘密文件《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自由出售莫斯科库存书籍的决定草案》中这样写道:“应将色情的和宗教内容的书籍剔除……造纸。”!‘罗莎·卢森堡在布勒斯劳的监狱中则是这样写的:“不过托洛茨基和列宁发现的拯救办法是对一般民主的废除,是比应得到控制的弊端更糟的东西”。往下她继续写到:“但是,随着全国政治生活的被窒息,苏维埃的生活也必然会越来越死气沉沉。没有普选,没有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争论,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都将消亡,变成一种存在的假象,在这些公共机构里只有官僚主义还是起作用的因素。”此外,苏维埃革命导致一个党对消灭了民主的社会的统治。这个党不仅统治着国家机器,而且统治着国家的全部生活,直至个人的思想。1929—1930年布哈林在《真理报》上发表的几篇文章中强调指出了这一点。列宁恐惧地感觉到了布尔什维克脚下的万丈深渊——大俄罗斯帝国主义、官僚主义和野蛮状态——但是,他既没有时间来加深他的这一批判,也没有充分认识到他本人和他的党必须为之承担责任的那些东西。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怖的戏剧性事件似乎表明,那些为推翻足以导致这种结果的制度而斗争的人是正确的。

马克思逝世后,他的伙伴和继承人恩格斯利用马克思思想财富中最教条主义的要素创造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始形式。这些要素是:救世主的空想和马克思在他的整整一生(其标志与其说是政治活动,不如说是脑力劳动)中不断重复的大量突然提出的论断。对19世纪早期资本主义的影响的合理批判,变成了对资本主义的经

营机制的不全面的分析。社会划分为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被理解为历史的基础，社会主义在历史上经过革命之后必然继资本主义而出现，由此，无产阶级应成为统治阶级，并应建立它的有一定期限的专政。于是历史便发生一个转折，在这转折中生产力的进化起着核心作用。然后，恩格斯出版了《资本论》第二卷，马克思本人未能亲自看到它的问世。这样恩格斯便把一种在马克思那里基本上还是批判地理解的思想财富教条化了。最后，他把一位科学研究者变成了19世纪末宣布的、适应新时代需要的教义学的精神之父。马克思在去世前徒劳地写道，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已经太晚了。马克思主义已经诞生了。这样，一个容纳了世界的矛盾并把它们列入思想和行动体系的整个学说便发展起来了。正在产生的、联合组成第二国际的社会党更进一步，特别突出了日常政治活动所需要的教条。

“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对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希望”和“对纯粹的社会主义的信仰”变成了考茨基和茹尔，盖德等人的A和O<sup>1</sup>”。

马克思从未理解的民族的作用，越来越让位于一种令人同情的但伤感的国际主义而退居次要地位，而这种国际主义自1914年以来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好像被严酷的现实的现实压倒了。

布尔什维克在国内战争中获得的结果给马克思主义注入了新的生命。在列宁和他的追随者中间出现了各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变种：季诺维也夫的、加米涅夫的、或布哈林、托洛茨基的，以及最后，斯大林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尝试。

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别的，正是在苏联获胜的斯大林主义。1945年它传播到世界的一部分。为了使马克思主义的教条越来越通俗化，一个真正的教会发展起来了：这个教会就是共产党和它们

• 本质、灵魂、主要的东西。——译者注



的在世的或已故的神——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包括它们的信徒和殉道者在内。共产主义在历史上找到了它的位置，不过它是以犹太—基督教救世主义的世俗化形式出现的。当时可能觉得，民主社会主义似乎坚持不下去。恩格斯和考茨基的早期马克思主义教义学长期支配着社会党。勃鲁姆虽然充分认识到了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危险——磐石一般的、全能的党的创立——，但他在图尔的演说中仍继续接受无产阶级专政。于是产生了行使权力和夺取权力之间的教义分歧。社会主义等于生产资料和交换资料的社会化，这仍然是一个非常有力的教条，1981年掌权的法国左派还在企图广泛实现这个社会化。

起初在欧洲产生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在俄国获得了胜利，并在第三世界所有国家中广泛传播。在这些国家里，长达百余年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变成了富国和穷国之间的斗争。

随着冷战和非殖民化的开始，民主社会主义似乎重又走进了死胡同，因为它在这里或那里参加了殖民地战争，以便保卫帝国；这主要说的是法国。但是，在被简单称为冷战世界的背后出现了另一些基本力量。国际紧张关系必须缓和，这样风才能转变方向。继冷战开始时的一方面有利于斯大林主义者、另一方面有利于保守派的“善恶对立学说”之后，一个对民主社会主义比较有利的时代来到了。这个时代的成就可以根据它在言语上和行动上与马克思主义教条决裂的能力来衡量——不仅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决裂，而且还同前一个时代的原始形式决裂。伯恩斯坦的有历史意义的，然而却是微小的胜利正是在这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哥德斯堡最先表现出勇气来证实这一点。

民主社会主义的贡献是捍卫、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恢复和扩大政治民主。民主社会主义发展保护最贫穷的人的社会福利国家和建立在市场及其由国家调节的基础之上的混合经济。国家作为相当大一部分生产资料和交换资料的所有者在财政和预算领域进行干

预。国家在文化领域对教育政策、宣传媒介和文化中心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法治国家不仅是一定的法制形式，而且还是欧洲国家所固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现实。这些国家正致力于消除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的、被 19 世纪的早期资本主义大大加剧了的社会和文化的的社会的不平等。马克思主义教条的完结并不能使它传播的价值，即 19 世纪和 20 世纪各种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的合法愿望被消灭。

现在，是把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全部埋葬的时候了。现在，在 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即将到来之际，必须给社会主义的性质下一个更好的定义。在西欧，我们已不再处于马克思所描绘的，而且往往谴责得非常正确的资本主义阶段。我们要提防口号！在我们的西欧社会里当然还继续存在着人剥削人的现象。市场经常对很大一部分居民产生不利影响，但是，技术的不断发展，自我调节和国家的干预改变了我们的经济制度的性质，而不仅是改变了早期资本主义的形式。社会主义不应和一种生产方式混为一谈。当今世界错综复杂，我们必须懂得，我们正在同崭新的东西打交道，不管是马克思所描绘的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空想中的社会主义，都已成为过云。那些社会充满错误和矛盾。民主导致腐化堕落和某种无秩序的状态。把管理当作目的本身来追求，不会赋予青年以令人满意的理想。这样他们倾向于寻找危险的快乐，如服用麻醉品。这种危险的快乐助长宗教狂热，助长犯罪，破坏一切道德价值。高效率的管理是需要的，但这是不够的。毫无疑问，对西欧各国当代社会主义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就在这里。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它们名称没有任何作用——是用民主的方式取得政权的，不管它们现在是单独掌权，还是在民主联合的范围内同其他人分享权力。例如在法国，社会党受它和共产党的联盟以及它自己源于盖得的传统的影响，起初推行了大规模的国有化政策，但后来很快便发现了这个政策的不利影响：通货膨胀、预算赤字和

资本外流。这导致了莫鲁瓦政府时代所奉行的所谓紧缩政策。这个政策有利于制止通货膨胀、限制预算赤字和鼓励投资。但是,社会主义的特性不能仅仅存在于这一政策中。健康的经济政策必须是有目标的,必须是和自由主义(即使是最现代化的自由主义)不同的前景的一部分。由于在西欧之外(首先是在美国和日本)发生的争夺欧洲的国际竞争,由于建立在富裕和稳定基础上的内部和外部平衡的极端脆弱,领导这样的事业是一件棘手的事情。但是,必须明白,社会主义虽然承认要有良好的经济政策的必要性,但也必须提出一项社会和文化总计划的基本原则,这个总计划将使社会运转起来,并能使日常生活略带一些梦想,而如果没有这种梦想,事物就只会像它现在这个样子。

19世纪产生的伟大的乌托邦构想的没落也不可能消除超越现实、在某种程度上也超前于现实的新思想的必然性。人们可以提出一系列假设来作为思维模式。我们成立了欧洲共同体,它首先是一个经济共同体。它正在努力,并将继续努力成为一个政治共同体。和许多社会党人(如法国的雷吉斯·德布雷)的担心相反,这个欧洲不会破坏组成欧洲的那些民族。不能像雷吉斯·德布雷根据雅各宾民族国家传统所干的那样把国家和民族混为一谈。创建欧洲,使它具有联邦的结构,既不意味着削弱民族意识,也不意味着削弱形成民族的基本标志。我们生活在全球一体的时代,欧洲共同体可以成为我们今天为迎接技术挑战和对付我们的环境受到的威胁所需要的新社会组织的基础之一。必须确立一种新的、民族的同时也是欧洲的意识,从而回答自19世纪以来我们的世界的一个关键问题。毫无疑问,1914年以后,凡是在社会主义不能阻挡住淹没了欧洲并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民族主义浪潮的地方,社会主义的失败最明显。

因此,未来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促成欧洲的统一。这一点之所以必要,尤其是因为,东欧共产主义制度的倾覆为

民族主义的复活开辟了道路，这对欧洲的未来可能是极其危险的。东欧各民族在历史上第一次能够自由决定自己的命运。他们在1848年时未能做到这一点。欧洲列强统治着这些民族，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1919年的凡尔赛条约是由胜利者强迫签订的，1945年这些民族被交给斯大林任其摆布。如果通过各种各样的机构能够为这些民族保证欧洲的未来，那么，这将对产生冲突和不平衡的民族主义潮流形成必要的抗衡。当建立在刺刀力量基础上的苏维埃制度崩溃之后，必须紧接着建立在民主和人民自由决定一切的基础之上的欧洲和平。今日苏联欧洲部分的居民将决定，他们是否要参加建立一个欧洲邦联的这一过程。如果参加，那时它就能把从大西洋到乌拉尔之间的、迄今彼此分离的各族人民联合在一起。这个实行邦联制的欧洲将成为共同体的欧洲的必然补充。当然，这不会把美国排除在外。美国在欧洲的存在，对于保持我们大陆的平衡仍是很重要的。

在这个欧洲政策——一方面 is 共同体，另一方面是邦联——的帮助下，我们就能进一步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前景，消除社会和文化上的不平等，并赋予所有的人以一种新的、建立在国家、社会和个人这三者之间均衡和谐关系基础上的伦理学。国家调节经济，保护最贫困的穷人和维持公共秩序。社会把个人联合起来，并把他们组织在工厂、家庭和学校，以及不管什么形式的机构里。个人则致力于在社会上，在国家的保护下发挥自己的种族的、经济的、或文化的特点，同时官僚主义的恶习和腐化堕落的危险将被铲除。铲除的办法不仅以公共自由、选举权和议会制度为基础，而且还以公民积极地直接参与管理自己的事务为基础。这样社会主义将获得有决定意义的价值。正像已经提到过的那样，和我们长期以来的认识相反，社会主义不是生产方式。它代表一种赋予我们的技术文明以良知和道德的新企图。由人设计的技术改造的加速并不随之带来道德上的进步——恰恰相反！

和 19 世纪及 20 世纪(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的幻想相反,技术进步没有导致幸福,而是往往导致不幸。战争和军备竞赛迄今支配着国际关系,一部分环境的被摧毁和地球上生命遭到的威胁表明,技术进步多么危险。问题不在于反对技术进步,而是在于使技术进步尽可能多地造福于人。这表明,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就它们的本性来说,对这个问题的反应多么无能。马克思主义也否认这个问题,或者,它所找到的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些专横的办法,比它们要医治的弊端还更糟。

最后,与世隔绝和排斥第三世界的存在,或者满足于个人或集体的慈善行为的政策是不可能的。第三世界的人口在急剧增加,发达国家和其它国家之间的鸿沟日益加深。40 多亿人正在变穷,而发达世界的 10 亿居民正变得越来越富,尽管富裕的程度不同。在未来 20 年内,由于这些国家的人口增长——特别是在非洲,那里每个妇女平均生 5 个孩子——,这一情况还将变得更严重。人们可以对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和西方提供援助的形式进行争论,但是人们不能用念咒语的办法让这个问题简单地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甚至免去债务看来也只有象征性的意义,而没有什么实际好处。我们可以通过吁请发达国家的居民以个人行动和集体行动采取各项措施——地区、城市和家庭之间建立伙伴关系,组织“世界医生”或“没有国界的医生”、制定家庭计划、管理、教育,等等——来帮助这些国家降低它们的出生率和提高它们的生产效率。

建设共同体的欧洲,创立欧洲邦联,控制我们的技术发展,使之为人服务,消除社会和文化的不平等,真正支持第三世界,改善民主的实践以便使国家为所有的人服务,促进各民族的发展,把个别民族置于行动中心,但同时尊重每一个民族的特点,也就是差别——这必须是今天的社会主义和明天的社会主义的目标。因此,这里谈的是一种新人道主义的复兴。这种新人道主义和过去的极有害的乌托邦风马牛不相及,但同时也不满足于严酷的现实和反

对这种现实的日常活动。我们希望，以实现社会主义为己任的政治家，不管执掌政权是一件多么困难的艺术，也不要忘记这一点。

我们同革命、同无产阶级专政、同阶级斗争毫不相干。尽管阶级斗争非常重要，但不能把历史仅仅归结为阶级斗争。我们同生产资料和交换资料的社会化、同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一切神话毫不相干。这些说教不仅导致了灾难，而且今天它们已经过时了。它们所确定的救世主的和太平盛世的目标（这是使它们与众不同的标志）已证明在物质上和道德上是有害的。我们让信徒去追求他们的彼岸世界。我们要为他们以及所有的人找到一条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不是别的，正是当代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正在死亡，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社会主义现在活着，将要活下去，并将发展壮大，因为它将拯救人类免于灾难和实现生活所必需的条件。为此它必须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存在下去，即体现为物质存在于意识中。21世纪将以精神的优越性及其控制科技进步影响的斗争的胜利为标志。

#### 注释

1.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141页。
2. 《罗莎·卢森堡全集》，第4卷第355、362页。

（原文为法文，李俊聪转译自德文）

---

## 改良主义社会党在 混合经济制度中的战略——瑞典模式

瓦尔特·科皮<sup>\*</sup>

我打算在这里论述混合经济制度这个非常广泛的论题范围内的四类问题，这些问题都是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即工会和社会民主党不得不面对的。这些问题涉及：一、西方社会中工人与其它利益集团，特别是与雇员能够结成的联盟的形式；二、社会民主党与工会关系的性质；三、在西方国家消除不平等和维持充分就业的可能性；四、这一政策对于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率所产生的后果。

上述问题当然至少可以说是包罗很广的，因此我在这里只能略谈一下。我将把它们同瑞典工人运动的发展联系起来讨论。在某种程度上说，瑞典社会民主党是西方最有成绩的改良主义社会党——这是就选民对它的赞同和执政时期的年数而言。没有任何左派政党在战后时期曾在这一方面而取得它那样的成就，而在右翼方面，只有日本的自由民主党能与它相比。

因此我试图讨论一下，从瑞典自本世纪 30 年代到目前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和 70 年代中期以来的高失业率时期的发展可以学到什么东西。在 30 年代和战后的最初几十年，瑞典社会民主党通

---

<sup>\*</sup> 瓦尔特·科皮，斯德哥尔摩大学社会学教授

过它的政策——这种政策往往被概括为“瑞典模式”这一相当含糊的概念，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90年代的成就较小。最后我将对90年代初期的形势发表一些看法。

### 社会民主主义

一个社会民主党与其它政党的区别在哪里？由于“社会民主主义”这个概念在北欧和南欧是完全不同地使用的，因此提出这个问题可能是有道理的。在20年代，瑞典社会民主党人用三个步骤来界定他们的长期战略，即获得：一、政治民主，二、社会民主，三、经济民主。在那以后，当然不仅右翼政党承认了政治民主，而且今天共产党也承认了，因此它已不再是社会民主党人的特征。现在，从1973年以来的经济危机已使所有的社会民主党处于守势。东欧的“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巨大失误同样也给共产党人的传统敌人即社会民主党蒙上了阴影。因此如果现实地考虑问题，目前经济民主的问题已不再列在政治日程之上了。

如果我们打算找出社会民主党的特征，我们就必须考察第二个阶段即创造或获得社会民主。在30年代，人们在瑞典基本上把“社会民主”理解为两件事：一、与世界经济危机期间的高失业率斗争；二、取消根据济贫法对一切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养活自己的人的歧视对待。在30年代和战后时期，社会民主党的近期计划显然是企图建立福利国家来减少不平等，保持充分就业并与此同时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益。

大家都知道，充分就业既增加平等也促进经济增长。失业数字的变化直接对收入的分配产生影响，而且也影响经济增长。但是现在流行的经济理论往往把平等看成与经济效益相抵触的因素。前些时候去世的著名美国经济学家阿塞·奥库恩在1975年曾把在平等和效率之间的选择描述成“重大的目标冲突”。<sup>1</sup>流行的经济



理论主张这样的观点：对于市场的有效率的运转、市场信号的清楚明确的传递（这种信号向行动者指明他们应当怎样配置自己的财力）来说，不平等的付酬是十分需要的。如果我们缩小了不平等，就会或多或少歪曲这一市场信息系统，后果就是降低效率。目前占支配地位的新古典学派经济理论主张，不平等对于经济效率干脆就是必需的。根据这一理论，不平等既然提高经济效率和促进经济增长，也就促进了普遍福利。在这里应当指出，新古典学派经济理论在这一方面与政治自由主义中的自由市场派所提出的论据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后者的前提也是：不平等的报酬会导致社会地位不平等，其结果不仅对富人有利，也对穷人有利，因此是符合正确理解的普遍利益的。

区别社会民主党和处在它右边的政党的一个中心问题是它们对平等的态度。结果方面的平等而不仅是机会上的平等，很可能是确定左右的试金石。但是允许达到的平等程度是有差别的。因此各个社会民主党在实践中的差别主要是看它们能忍受不平等到多大程度。在一些国家，社会民主党是相当“自由主义的”，这是就它们能容忍程度相当高的不平等而言。另一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的自由主义倾向较少。

政党的名称并不总是能真正恰当地告诉我们各个不同的政党所主张的具体政策。因此我认为，判断一个社会民主党所持政策的性质的最好标准首先不是它的名称，而是它与工会的关系。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的工会具有明确阶级基础。因此可以认为工会明确表述工人自己所感到的阶级利益。

但是，全体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或工业工人在人数上总是太少，不能形成政治上的多数派。因此社会民主党总是不得不与其它阶级或利益集团结成同盟。因此它试图通过妥协而放弃部分的工人利益。如果社会民主党能继续获得工业工人工会的支持，我们就可以认为工人阶级的利益是令人满意地得到保护的。相反，如果这

些工会激烈反对一个社会民主党的政策,那么这个党的政策大概就有问题了。

### 平等、充分就业和高税率

如果我们把减少收入不平等当成衡量一个社会民主党成就的标尺,那么瑞典社会民主党可以说是相当成功的。今天我们掌握了关于1980年左右12个西方国家的可支配家庭收入(在纳税和拨款以后)的可靠数据(表一)。这些数字表明,瑞典的不平等是最低的,其次是荷兰和挪威,再次是德国、英国以及瑞士、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荷兰和法国属于不平等程度较高的,而以色列和美国最高。西班牙的不平等程度相对来说也是高的,本来很可能也把它放在最后列举出来,不过西班牙的数据并不能直接拿来和其它国家比较。

瑞典也做到了保持很低的失业率人数。在80年代,瑞典的年平均失业率不到3%。在欧洲只有瑞士能达到相似的失业率,但为此它必须驱逐很大一部分“客籍工人”。挪威和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政府曾经使失业率降到与瑞典相同,但在最近几年却让失业率提高到几乎5%。与英国、荷兰、比利时和德国的大致10%相比,这当然还算是低的。当然这个数字也决不能与爱尔兰和西班牙的大致17—20%灾难性失业率相比。

有一点瑞典是处于表格的不受欢迎的一端的——税收额。瑞典的直接所得税和间接税目前和欧洲各国相比都是超过平均数的。但连瑞典社会民主党人也不特别乐于交纳许多税。

### 通过政治战略确定公民利益

今天人们提出一个问题:瑞典民主党是怎样能做到这一切的:

一、几乎为每个人提供工作,妇女和男人都一样(在瑞典,有小孩子的已婚妇女一般也至少工作半天);二、减少经济报酬方面的不平等;三、让公民交纳世界上最高额的税款,却没有引起较大的“抗税行动”;四、在私营企业即瑞典的多国公司很强大的情况下实现上述各项。

我认为要从公民如何确定他们利益这一点来找解释,而这又是受到以下方面影响的:一、历史情况;二、结成的阶级联盟的性质;三、创立的社会机构;四、新的政治思想。

人们作为个人和作为集体以行动来促进自己的利益。但是他们在这样做时并不能一劳永逸地确定自己的利益所在。在这方面有许多不同的潜在的断裂线在互相竞争,例如职业、收入、人种、种族、宗教或地区。利益的确定要根据人们对许多不同的、始终存在的断裂线赋予的或多或少的重要性,也就是说,根据他们对“我是谁?”这一问题作出的实际回答。我是工人还是职员,或者我们是否处于收入分配的中等地位?我是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我是黑人还是白人?是西班牙人,德国人还是瑞典人?是来自南方还是来自北方?这些潜在因素各自的重要性并不是一经确定就无法改变的,而是在实践中由历史因素、社会机构和阶级联盟决定的。

历史情况对瑞典工人运动的发展是有利的。当瑞典在1909年最终丧失欧洲大国的地位时,它的居民在人种上是同一的。16世纪的宗教改革使它成为新教国家,因此瑞典没有群众性宗教政党,而在德国、意大利、比利时和荷兰,这种政党是很强大的,而且很有成效地与社会党竞争。瑞典的封建主义传统的影响整个说来较弱。另一方面,我们有一个巨大的中农和小农阶层,他们成立了自己的政党。这一政党使资产阶级分裂。它在若干决定性时期,在30年代,曾与社会民主党组成联合政府。

## 历史性妥协

不过,瑞典工人运动的历史和瑞典模式的发展并不是一幅完全和平的图景。直到本世纪30年代初期,瑞典就罢工和关厂的次数来说在世界范围内处于首位。与它的工人阶级的人数相比,没有哪一个国家象瑞典那样在罢工斗争中损失了那么多工作日。工人和雇主都组织得很好,这就使罢工和关厂旷日持久,而且很激烈。

1932年社会民主党在左派各党第一次获得几乎50%的选票成立政府时,情况改变了,社会民主党这时可以利用政府的权力来在世界经济危机时期与高失业率斗争。工人也不再必须依靠以罢工为形式的劳动斗争来改善自己的处境,因为这时可以作另一种政治抉择了。1932年,也就是还在凯恩斯发表《就业通论》之前,社会民主党就发明一项新的政策以促进通货膨胀来调控全面需求,从而启动经济并创造需求和工作岗位。经济史学家对于这一政策在多大程度上是成功的是有争论的。但无论如何,选民们认为它是有成绩的,因此社会民主党在30年代能够扩大自己的追随者队伍。

雇主的冲突战略对于瑞典模式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社会民主党得到强大的而且从各种迹象来看都是稳定的支持,这也为雇主造成一种新的形势,问题在于,雇主是应当继续实行对工人运动斗争的战略还是努力取得一种妥协。在雇主内部,基本上由为国内市场生产的部门组成的多数派战胜了由大跨国企业组成的好斗的少数派,与工人运动进行了谈判。在谈判中,强大的、集中制的雇主联合会以显然日益获得更多政治支持的强大的工会为对手。这就导致我所称的瑞典的劳动和资本的“历史性妥协”。历史性妥协是在30年代后半期达成的,那时社会民主党已做到了意大利共产党在70年代还未能做到的事。

瑞典的历史性妥协的正式部分是工会和雇主之间经过 1936 年到 1938 年的谈判而达成的所谓主要协议。但最重要的部分却是劳动和资本之间的一项关于合作促进经济增长的非正式协议或协定。社会民主党政府应当为私营企业创造有利条件，雇主则不应当直接参预各政党之间的政治争执，而是作为社会的一个利益集团出现。社会民主党政府应当能利用它的权力来重新分配经济增长的成果。几乎不再发生罢工和关厂，于是瑞典长期以劳资和平的国家著称。但应当强调的是，这一和平并不是建立在没有利益冲突的基础上。不如说，这是在组织得很好的对立双方之间充满强烈紧张情况下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

对于这一历史性妥协，以下几个方面是重要的。依靠一项政策创新即全面需求调控，社会民主党能在充分就业政策的基础上创造与工业工会合作的坚实根据。这一政策对农业工人和农场主也是间接有利的，因此社会民主党也与他们达成了支持这种政策的联合。

应当指出，30 年代左右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工党政府拒绝了这种政策。相反，它们依靠紧缩性经济政策，这就使失业成为工党政府和工会之间发生深刻分裂的原因。

与此相比，瑞典的工会却能持久地支持社会民主党政府的政策。这成为集中制统一工会的基础，这种工会在战后时期广泛发展起来。工会运动的集中化使它能够采取战略行动，可以在不同的战略中进行选择。工会运动不再限于一种单一的战略，即为尽可能大幅度提高工资而斗争。工会运动现在具有基本的战略能力，可以等待并且找到代替性的行动途径。

### 雷恩—麦德维尔模式

本世纪 30 年代当然是瑞典模式的产生时期，但战后的几十年

对于它的发展却是起决定作用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年代，欧洲工人运动面临两个重要问题。其一是通货膨胀与失业二者之间的两难问题，另一个则是工人运动与日益壮大的“新中间阶级”即职员的关系。

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两难问题与这情况有关：在劳动市场的需求很大和失业率低的情况下，通货膨胀有加快的危险，而且会局部地超过就业者工资提高的幅度。在许多国家，战后时期的社会民主党政府试图通过敦促工会克制自己的工资要求或者宣布冻结工资来解决这一困境。40年代末瑞典社会民主党政府也尝试过这种方法。

但是事实表明，工会不能充当反对自己的会员提高工资的组织。这样做当然会损害工会组织的合法地位，并且会使工会与社会民主党政府之间产生较厉害的紧张关系，在一种新的经济政策思想产生和可以避免许多这类问题的战略付诸实施之前，在瑞典确实出现过这种紧张关系。

这种经济政策思想是由工会的两位顾问，古斯塔·雷恩和鲁道夫·麦德纳尔提出的。雷恩-麦德纳尔模式的出发点是这一假设：不能通过创造普遍的高需求水平和高的经济赢利来维持没有高通货膨胀情况下的充分就业。由于劳动市场的需求程度随部门而有所不同，因此在为劳动市场的最疲软部门创造足够的需求之前，整个经济已经会出现过热并产生迅速通货膨胀的后果。应当采取相反的做法，使总需求和经济赢利保持在较低的水平。某些经济部门会因此产生倾向性失业，但是对此应当用一种积极的和选择性的劳动市场政策来加以抵制。应当在发生失业的领域实行这种有选择的劳动市场政策，它将创造工作岗位，提供转业培训的可能性或者把雇员重新安排到另一些经济部门或另一些地区。

通过保持较低的需要水平和赢利水平，再配合以积极的和选择性的劳动市场政策，充分就业可以得到保证，通货膨胀会受到限

制,工会也能完成它们作为提高工资和改善就业者劳动条件的组织的正常任务。除此之外,这一政策避免了工会和社会民主党政府之间的激烈紧张关系。在长达 20 至 30 年的时间内,这种做法已被证明是对瑞典工人运动有效的方法,它使党和工会之间能够结成密切的联盟并且还导致大幅度经济增长。

### 在通向制度化福利国家的道路上

福利国家的发展对于工业工人与新的雇员中产阶级之间结成阶级联盟是重要的。在这一领域,按照传统,制度和机构对于公民利益的表述具有重要意义。在这方面有三种不同的战略。

最早的影响公民确定自己利益的战略是俾斯麦的按照职业集团分别实行社会保险的类型,这受到欧洲大陆保守的天主教集团的支持。对不同的职业集团,例如对工业工人、农业工人、海员、铁路工人、矿工、独立经营者、农场主、私营企业的职员和公务人员分别实行社会保险。经费视各不同集团的收入而定,这就把各个集团彼此区分开来。这种制度包含着一种想法,就是要避免在阶级基础上确定利益,而代之以促进在不同的职业集团之间区分利益。这种形式的社会保险在德国、奥地利、比利时和法国实行,也在西班牙实行。

第二种战略是社会自由主义的战略,主张政府只应为所有的人提供某种最低限度的保障,即成立一个不漏掉任何人的保障网络。主要方面是普遍提供一揽子的经费,即接近济贫水平的低经费。在这一基础上,允许并且建议每一个集团建立自己的改善处境和保障收入的体系。这一战略由自由党人首先在英国实行。由此产生了工人与职员之间的分裂,因为工人只能依靠最低限度的经费,而职员往往能建立自己的单独的补充保险制度。

瑞典的福利国家在战后实行了第三种类型的战略,即这样一

种模式,在其中普遍的保障与视收入而提供的养老保险和疾病保险经费相结合,因此瑞典建立了一种制度化的福利国家,所有的公民都被包括在内。<sup>3</sup>在这里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工人和新的中产阶级即职员都是同一个系统的成员,因此他们确定自己利益的形式也比在其它方式时更加相近。

这种制度化福利国家的形式并不着眼于重新分配,也就是说,不是把经费仅仅或主要用于贫民。因此制度化福利国家不对贫民实行任何所谓的“建设性歧视”。由于既向富人也向中等收入者和贫民同样提供经费和服务,制度化福利国家就趋向于创造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利益共同性。在这种类型的福利国家中,处境较好的公民在实行自助的同时支持贫民也参加的计划。由于每个人都从福利国家得到好处,每个人也都愿意为此纳税,可以把缴纳的税款看成人们不仅为一些也许由于不愿劳动才贫困的贫民,而且也为自己提供的经费。制度化福利国家依靠社会总产值中拨给社会福利的部分而成为一个资金雄厚的企业。对贫民的“建设性歧视”尽管是明显地以重新分配为方针的,但这种计划通常是规模有限的,因此这种战略最终仍将导致对贫民的歧视。在实践中,制度化福利国家由于它的规模却归根到底成了个强大得多的重新分配的工具。

1973年以后经济危机袭击了瑞典,资产阶级政府在70年代末开始对福利国家提出怀疑并建议削减经费。但事实表明,只有很少的人希望削减。关于削弱福利国家的意见和相应的建议威胁了所有公民的利益,因为他们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从福利国家得到好处。削减经费不仅影响贫民(许多人认为贫民是不喜欢劳动的,因此应当自己承担责任)。在这种形式的制度化福利国家中,中等阶层也从福利计划获益,因此愿意捍卫它并为保持它而交纳高额税款。

还有一个改革领域对于发展工人和职员之间的共同利益是重



要的,这就是关于雇员在工作场所参与决定的立法。70年代上半期的一系列立法涉及工作场所的劳动保护,但也有较小的一部分涉及雇员在参与决定方面与雇主的关系。这些改革强调了工人和职员在对他们雇主的依附性方面的共同地位,因此很可能有助于他们之间缔结阶级联盟。

### 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

适当程度的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至少从长期来看是任何一个政府的合法性的一个必要前提。在东欧的“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除了缺乏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以外,在提高生活水平方面与西方国家相比成绩很差,这一点很可能对于这些政权的崩溃也是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的。

经济史的研究表明,西方中最富的国家在经济增长方面通常比较不富裕的国家要慢。这说明存在所谓的“弥补效应”,即较不富裕的国家可以借用富裕国家的技术和资本,而且在农业部门保持更大的劳动后备军,也还没有建立大规模的、增长潜力很低的第三产业或服务部门。50年代瑞典成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最富裕的国家,并且整个说来能够保持这一地位直到80年代末。在80年代,瑞典人均总产值的增长大致与富裕的经合组织国家即美国、加拿大、瑞士、丹麦、荷兰、西德和法国的平均值相等(参看表二)。

还有一个有趣的情况,即瑞典通过积极的劳动市场政策保持充分就业的形式并不是费用很高的。1987年的数字表明,用于劳动市场政策的公共开支,积极的和消极的措施(失业救济金和提早退休)都包括在内,在那时略低于瑞典总产值的3.0%(表三)。在同一时期,丹麦、比利时和荷兰用于劳动市场政策的经费要大得多(4.0—5.0%),而英国的开支与瑞典相近,但是这些国家的失业率处于8—11%之间,而大部分开支是用于失业救济金。瑞典的失业

率不到 2%，大部分开支用于积极的措施和创造工作岗位。

由于所谓石油冲击而引发的 1973 至 1979 年的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使西方国家出现新的政治形势。在战后时期第一次重新出现了大批失业，而政治决策者以及选民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忍受这一情况。

人们多次尝试解释高失业数字的原因。一个最重要的假说认为这是由于固定不变的工资。在原料价格上涨和欧洲国家的贸易条件改变的情况下工资却居高不下。因此工资过分高了，把工人自己赶出了劳动市场。在一些国家，这种“工资漏洞”的假说也许曾起过一定作用。但这种解释不能使我们对继续居高不下的失业人数的理解有多大帮助。例如，英国和荷兰容忍了 10% 的失业率，但它们受石油冲击的影响很可能并不比保持充分就业的瑞典或奥地利更大。

另一种假说认为，失业是政府的一种手段，可以当作工具用来调控通货膨胀，使私营企业保持有利的赢利地位，最后也可使工人驯服并避免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初曾经有过的那种激进的政治发展。

后者指的是象巴黎 1968 年的事件，1969 年德国和意大利发生罢工高潮的“热秋”，1973 年英国保守派党政府由于矿工罢工而被推翻，以及有组织的工人和工会的力量在战后充分就业时期普遍得到加强。

人们认为“石油冲击”后失业率提高的原因在于石油输出国而不是本国政府。这样就使选民或多或少能容忍失业数字，至少可以使人在存在大批失业的情况下仍能在选举中获胜，而在 60 年代任何人都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不管原因在哪里，无论如何各个社会民主党都面临一个新的极端困难的情况。

## 瑞典民主和 90 年代

1982 年瑞典社会民主党重新掌握政权以后面临一个非常困难的经济形势。存在世界范围的衰退和外国的高失业率,瑞典还必须克服巨大的预算赤字和支付平衡问题以及日益增加的外债。在这一情况下新政府把瑞典克郎大幅度贬值(16%)当作使瑞典摆脱危机并用出口来刺激工业膨胀的主要手段。这种大幅度贬值使瑞典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了。尽管如此,工会拒绝要求调整工资,以便使出口工业能增加赢利并从而使生产处于能提高就业程度的地位。

这一新的战略在很大程度上是有成效的。私营企业的利润大大提高了。私营企业股票的价格猛涨。在整个 80 年代,斯德哥尔摩交易所的股票价格每年增加一倍,这就大大改变了瑞典的财产分配状况。一部分赢利重新用于在瑞典和国外的投资。

社会民主党的这一新战略也给党带来另一方面的、消极的后果。这一战略是在瑞典的雇主已改变他们对待工人运动的战略的条件下采取的。在 70 年代,主要是作为对关于“雇员基金”的提案和共决法的反动,大跨国公司例如沃尔沃公司采取了非常激烈的反对工人运动的战略。这一战略的一个重要部分是破坏工会运动的统一。他们摧毁了全国范围的工资协议制度,而这一制度曾使工会谈判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起过中心作用。在 80 年代,雇主做到了抵制这一全国范围的谈判而代之以部门工资谈判。工会在分裂成互相竞争的集团之后就重新丧失了选择战略的能力。提高工资的要求重新成为工会最重要的替代抉择,因为它必须向其它工会的要求看齐。

与此同时,雇主愿意把自己的高额利润的一部分用来提高被他们挑中的职员集团的薪金,例如某些专业工人和高级管理人员。

这使工资差距日益扩大,破坏了习惯的工资比例,由私营企业的职员带头,另一些集团也试图提高自己的薪金,公营部门也这样,但那里的薪金是相当晚才提高的。这就导致工会之间相当严重的紧张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政府必须对工会运动施加压力,要它们限制自己会员提高工资的要求,以保持高额赢利和优惠的投资环境。结果是70年代中期中等的工薪领取者的实际工资下降了。无需特别说明就可以理解,这一战略导致了工会运动与社会民主党政府之间的严重紧张关系。在充分对照的情况下,工会被要求劝说它的会员忍受较低的工资提高,而与此同时,股票市场却创了新纪录,赢利和被挑选出来的职员类别的薪金明显提高了。

除此之外,80年代末社会民主党政府与自由党一同提出了一项从根本上改革税收制度的提案。尽管税收制度由于种种原因需要改革,但这一提案的主攻方向是显著地减少累进税率。至少在短期内,这种降低最高税额的做法当然主要对高收入和中等收入者有利,对于低收入的工人却是不利的。许多工人认为这一提案进一步证明,社会民主党政府不再努力促进工人阶级的利益了。新的税收提案讨论了12个月之久——从1989年初到1990年初,而在这一期间,民意测验的结果表明,社会民主党损失了大约10%的支持者。这一减少很大程度上是在工人方面。大多数心怀不满的工人并未决定支持另一个政党,而只是在被问及他们最喜欢哪一个党时回答说:“我不知道。”

由此可见,瑞典社会民主党在90年代的处境非常困难。过去已经有两次,也就是在本世纪的30年代和50年代,它曾经做到了通过转向一种新政策而巩固自己的地位:通过(30年代在凯恩斯之前)发明全面需求调控和50年代发明雷恩—麦德纳尔模式。到80年代,它却无法重新依靠一种新的经济思想了。相反,它基本上是倒退回去采取许多社会民主党在30年代和战后时期曾经实行

过的战略,也就是说,试图通过提高赢利来改善私营企业的环境,同时要求工会忍受工资限制并且使工人保持平静。象其它国家一样,这一战略也已表明对社会民主党政府是非常危险的。它导致政府和工会关系中的严重紧张状态。与此同时,它加强了职员中的离心力,这股力量倾向于按照收入集团来分别考虑职员的利益。

瑞典社会民主党是否能找到新的政治战略来使工人和职员重新团结起来并缓和工会和政府之间的紧张状态,还有待证明。

表一

1980年左右12国  
(等值的)可支配收入  
支配收入方面的分配

不平等程度  
(基尼指数×100)

	基尼
以色列	33.3
美国	32.4
法国	30.9
荷兰	30.6
加拿大	29.8
澳大利亚	29.7
瑞士	29.6
英国	27.6
德国	26.2
挪威	23.8
荷兰	22.5
瑞典	20.2

表二

1950—1988年19个经合组织国家人均  
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

1979—1988年的次序		50—60	60—73	73—79	79—88
1	日本	7.7	8.5	2.5	3.4
2	荷兰	4.0	4.6	2.0	3.0
3	挪威	2.0	3.5	4.4	2.9
4—5	意大利	5.1	4.6	3.3	2.2
4—5	加拿大	1.9	3.9	2.9	2.2
6—7	爱尔兰	2.2	3.8	3.1	2.0
6—7	英国	2.7	2.6	1.6	2.0
8—9	西班牙	—	—	1.2	1.9
8—9	瑞典	2.8	3.5	1.5	1.9
10—11	美国	1.4	2.7	1.4	1.8
10—11	奥地利	5.9	4.3	3.0	1.8
12—14	澳大利亚	1.7	3.3	1.6	1.7
12—14	比利时	2.6	4.4	2.1	1.7
12—14	联邦德国	6.9	3.6	2.5	1.7
15—16	丹麦	2.5	3.6	1.6	1.6
15—16	瑞士	3.3	3.0	-0.5	1.6
17	法国	3.6	4.5	2.3	1.4
18	新西兰	2.0	2.1	-0.9	1.3
19	荷兰	3.3	3.7	2.0	0.7
平均		3.4	3.9	2.0	1.9

表三

1987年19个经合组织国家用于劳动市场政策的总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为积极劳动市场措施支出的费用和失业率

	劳动市场政策总 开支占国民生产 总值的百分比	“积极”措施费用 在这项开支中的 百分比	失业率的百分比
1. 爱尔兰	5.1	28	17.5
2. 丹麦	5.0	23	7.8
3. 比利时	4.4	25	11.0
4. 荷兰	4.0	28	9.6
5. 西班牙	3.3	23	20.1
6. 法国	3.1	24	10.5
7. 瑞典	2.7	70	1.9
8. 英国	2.6	35	10.2
9. 芬兰	2.4	32	5.0
10. 联邦德国	2.3	42	6.2
11. 加拿大	2.2	25	8.8
12. 新西兰	1.7	38	4.1
13. 澳大利亚	1.5	21	8.0
14. 奥地利	1.5	28	3.8
15. 意大利	1.3	36	11.2
16. 美国	0.8	29	6.1
17. 挪威	0.8	54	2.1
18. 日本	0.6	29	2.8
19. 瑞士	0.4	43	0.7

**参考文献：**

阿塞·奥库恩，《平等和效率，重大的抉择》，1975年华盛顿英文版。

瓦尔特·科皮，《福利资本主义中的工人阶级，瑞典的工作，工会和政策》，1979年伦敦英文版。

瓦尔特·科皮，《民主的阶级斗争》，1983年伦敦英文版。

安古斯·麦迪逊，《资本主义增长的阶段》，1982年牛津英文版。

（原文为英文，殷叙彝转译自德文）